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总策划 张余胜









丛书主编 余太山

刘迎胜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项目执行／施援平
责任编辑／施援平　杨洁
封面题字／冯天亮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4466-4

定价：150.00元（上、下册）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蒙元史考论

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刘迎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元史考论 / 刘迎胜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5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4466-4

Ⅰ. ①蒙… Ⅱ. ①刘…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元代
Ⅳ. ①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166号

策划编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施援平 杨 洁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蒙元史考论(上册)
作 者 刘迎胜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总 印 张 47.75
总 字 数 653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466-4
总 定 价 150.00元(上、下册)

出版说明

随着20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目录

上册

文献编

1 《元史》卷2《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记事笺证 / 3

2 《元史》卷2《太宗纪》太宗二年记事笺证 / 13

3 《元史·太宗纪》太宗三年以后记事笺证 / 24

4 《元史·百官志》武官正三品资阶订误 / 77

4.1 有关元武资阶的主要史料 / 77

4.2 元武官资阶制的金代背景 / 80

4.3 元正三品武官的除授实例 / 82

5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考 / 88

5.1 《元典章》“官制资品职品”表中问题的研究思路 / 89

5.2　有关元代文武官员资阶的其他
3种史料 / 91
5.3　《元典章》《辍耕录》《事林广记》与
《元史》有关元代文武官员
资品的记载 / 96
5.4　中国古代文武官员资品的
历史传承 / 107
5.5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疑问的
解决方法 / 120
5.6　《元典章》中的错误问题 / 129

6　玉山草堂与3位《元史》编修者 / 131
6.1　至正十年王祎在玉山佳处 / 132
6.2　陈基、王祎与顾瑛的玉山草堂 / 138
6.3　张简——王祎的友人 / 146
6.4　玉山草堂与大都、上都庙堂 / 148
6.5　结语 / 152

7　《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 / 153

8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 / 173

8.1 《突厥斯坦》汉译本中的学术性附注 / 174
8.2 《突厥斯坦》汉译本中有改进余地之处 / 177
9 哈沙尼和他的《完者都史》/ 186
10 评罕伯莉校勘本《完者都史》/ 189

专题研究编

11 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 201
12 读《定宗征拔都》/ 210
13 关于马薛里吉思 / 216
13.1 马薛里吉思的民族背景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撒麻耳干基督教的描述 / 217
13.2 侵夺佛寺田产 / 221
13.3 样宜忽木剌、主鹘人与荐桥 / 224
13.4 杭州的回回人 / 227
13.5 聚景园 / 230
14 《大兴国寺记》的作者梁相其人 / 233

14.1 就任镇江儒学教授的时间 / 233
14.2 参与月泉吟社活动 / 234
14.3 在江西庐山的踪迹 / 238
14.4 在镇江任职期间的活动与思想 / 242
15 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 / 246
15.1 贵族妇女的私属人口 / 248
15.2 从嫁人 / 250
15.3 战时出征——从嫁人的义务 / 256
15.4 从嫁人的妻室与侍妾 / 258
15.5 真金——阿合马的使主 / 261
15.6 几位宏吉剌部的从嫁人 / 263
15.7 近臣——权臣 / 270
16 时代的见证
——凤凰寺与元代杭州的色目人 / 274
16.1 凤凰寺所存墓志状况及前人研究 / 275
16.2 元代杭州的回回人 / 281
16.3 居杭的其他各族人士 / 288
17 丁鹤年及其家族杂考 / 292
17.1 有关其先辈的考察 / 292
17.2 丁鹤年身世与家庭的疑点 / 295

17.3 赛景初学字考 / 310
17.4 余言 / 315
18 高克恭杂考 / 318
18.1 族属与家室 / 318
18.2 画作 / 320
18.3 藏品 / 331
19 迺贤杂考 / 333
19.1 籍贯及生平 / 333
19.2 作品与评价 / 339
20 从北平王到北安王
——那木罕二三题 / 343
20.1 漠北前线的形成 / 344
20.2 那木罕统兵漠北 / 357
20.3 那木罕的人神世界 / 378

下册

21 钦察亲军左右翼考 / 401
21.1 元哈剌鲁万户府 / 403
21.2 元东路蒙古军 / 413
21.3 余言 / 422

21.4 结语 / 424
22 元统二年收田事件研究
——国家与贵族、寺院争夺土地的背后 / 427
22.1 问题的提起 / 427
22.2 对文献本身的考察 / 429
22.3 元代官寺与贵族赐田的收租权与
还官问题 / 431
22.4 元廷向贵族与寺院赐田的问题 / 442
22.5 涉案事主赐田的几种分析法 / 465
22.6 主要涉案贵族、寺院背景调查 / 470
22.7 清算政治旧账 / 482
23 王仲德家族与元末江南古玩收藏 / 484
23.1 王仲德及其家族 / 485
23.2 窑器与元末社会 / 508
23.3 其他元代窑器 / 516
23.4 王氏家族的败落与其藏品的命运 / 523
23.5 江南士人与新价值观 / 528
24 元代的海外贸易 / 540
24.1 对南宋海外贸易的继承 / 540

24.2 元对海外贸易的管理 / 546
24.3 贸易对象地区与航海路线 / 549
24.4 进出口商品 / 557
25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序 / 571
26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五国城等地 / 574
26.1 水达达及其周边 / 578
26.2 五国城 / 586

其他

27 草原帝国
——追寻成吉思汗的地理足迹 / 601
27.1 话题的背景 / 601
27.2 帝国的摇篮 / 606
27.3 草原以外的内陆亚洲
——绿洲世界 / 614
27.4 中国历史上最辽阔的版图 / 619
27.5 失败的海外征服 / 623
27.6 横跨欧亚的草原帝国 / 625

27.7 拉开人类全球化的序幕 / 629
28 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创造者
——纪念成吉思汗诞辰 850 周年 / 635
28.1 个人和家族命运的改变 / 636
28.2 民族命运的改变 / 636
28.3 国家命运的改变 / 637
28.4 世界命运的改变 / 639
29 无私的奉献者与不倦的探索者
——周清澍先生八十喜寿贺词 / 643
30 《明四夷馆鞑靼馆及〈华夷译语〉鞑靼"来文"研究》序 / 647
31 中国元史研究会锡林浩特学术讨论会开幕辞 / 649
参考文献 / 652
索引 / 681

文献编



1 《元史》卷2《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记事笺证

自2010年起，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会重大招标项目“《元史》会注考证”后，深感课题难度高，工作量大。考虑到考释部分内容较多，故取段后注形式容纳所收集的前人成果与作者浅见，以及《本纪》部分中华书局标点本的自然段出注。今不揣浅陋，将所承担《太宗纪》的部分内容初稿刊出，以及时听取学界批评与建议。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1]，太祖第三子[2]。母曰光献皇后，[3]

---

〔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考异》卷86《秘史》作斡歌歹，陈桱《续编》作斡可歹，石刻或作月古台。《黑鞑事略》作兀窟(王国维著：《蒙古史料四种》，台湾正中书局，1972年，页465)。《史集》作اوكتاى قاان(Ūktāy Qā'ān)。——第1卷第1分册，《部族志》，1965年莫斯科合校本(Рашид-ад-Д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т.1, кн.1, 以下版本信息略)，页140。周良霄：“原注(按即博伊尔的注释)：蒙语Ögedei或Ögödei，加儿宾Carpini作Occoday，穆斯林史料中之ögetei明系畏兀儿字母之误读所致，在畏兀儿字母中t与d无所区别。”——见氏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以下版本信息略)，页23。

《史集》(Jāmi' al-Tawārīkh)说窝阔台(Ögedei)在蒙古语中：“ بالامعنى اين مفط عروج باشد بر سر(ma 'anī-yi īn lafz 'urūj bāšad bar sar-i bālā)，这个词的意思应为‘提高’，‘向上’。——德黑兰刊本(جامع التواريخ, تهران, 1373/1974)，上册，页618。”——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以下版本信息略)，页4。德国已故突厥学家德福释曰：اوگتاى(Ögätäi) Name des drittälsten Sohnes Tschinggis Chans, angeblich='Erhöhung', dies wohl volksetymologische Ableitung von mo. sspr. öγede 'aufwärts'(اوگتاى〔Ögätäi〕成吉思汗第三子的名称，据说意为“提高”，也许是通俗词源学派生字，出自书面蒙古语öγede，即“向上”)——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chen*, Band I, Wiesbaden, 1963.(格尔哈尔德·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第1册，1963年，蒙古语第49条，页167。)

王恽：“太宗英文皇帝，天容睟表，一类释迦真像，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俭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贰。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廓廓无事。”——《秋涧集》卷44《杂著》，四部丛刊景明弘治十一年马龙、金舜臣刻本。

注释〔2,3〕见下页。

吉剌氏[4]。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太祖崩，自霍博[5]之地来会。

注释〔2,3〕接上页。

〔2〕成吉思汗长子为术赤，次子为察合台。

〔3〕汪辉祖《〈元史〉本证》卷1，证误1：案《后妃表》，当作“光献翼圣皇后”。按，“光献皇后”为“光献翼圣皇后”在元代的缩称，即孛儿台/孛儿帖旭真，成吉思汗正后。如《武宗纪》至大二年(1309)“十二月乙卯，亲飨太庙，上太祖圣武皇帝(按，成吉思汗)尊谥、庙号及光献皇后(按，孛儿台旭真)尊谥”。——《元史》卷23，中华书局标点本，页519。此称号《元史》中数见。

〔4〕孛儿台/孛儿帖为宏吉剌部贵族特薛禅之女。《秘史》作孛儿帖兀真(Börte üjin)，《史集》(Jāmi‘ al-Tawārīkh)《部族志》作بورته اوجين(Būrta Ūjin)。——第1卷第1分册，1965年莫斯科合校本，页394。卷114《后妃传》：成吉思汗有旨：宏吉剌氏“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元史》卷118《特薛禅传》：“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岁四时孟月，听读所赐旨，世世不绝。”《史集·部族志》此部有传。

《史集》(Jāmi‘ al-Tawārīkh)：دی نویان اوکتای قاآن بسر سوم چینگگیز خان است و از خاتون بزرگ او برته فوجین که مادر چهار بسر بزرگتر و بنج دختر معتبر بوده از قوم قنقرات دختر (Ūktāy Qā’ān pisar-i siwum-i Čīnggīz Khan ast wa az Khātūn-i buzurg ū Būrta Fūjīn ka mādar-i čahār pisar-i buzugtar wa panj dukhtar-i mu‘atabar buda〔az qawm〕qunqrāt Day nūyān)，“窝阔台合罕是成吉思汗第三子，出自其长后孛儿帖夫人，她是四位长子与五位尊贵女儿之母，出自孛弘吉剌惕部，为德那颜的女儿。”——德黑兰刊本，上册，页618；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4。

《太宗纪》德译者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2)：Es war Börte von den Unggirat. Biographies im YS 114, 1r—1v. Kuanghien ist ihr posthumer Ehrenname(此即宏吉剌氏孛儿帖。《元史》卷114。光献为其死后谥号)——Waltraut Abramowski,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von Ögödei und Güyük——Übersetzung des 2. Kapitels des Yüan-shih,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0 (1976), pp.117－168(瓦勒特劳乌特·阿布拉莫夫斯基：《窝阔台及贵由之汉文编年纪——〈元史〉卷二德译》，《中亚研究》第10辑〔1976〕，页117－168)，见页137。以下简称《太宗纪》德译。

〔5〕〔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294册景印胡玉缙抄本，页23)：《睿宗列传》：“太祖崩，太宗留霍博之地，国事属拖雷任之。”《西北地附录》有可不里。按，李文田误，霍博非可不里。刘迎胜《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页31：霍博(Qabaq)，又音译作火孛，虎八，多次见于元代波斯史书，为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位于新疆塔城和布赛克尔草原。马纳思河入准噶尔盆地后，流出部分称火孛河，位于叶密立之东。窝阔台汗国灭亡，火孛并入元朝，成为和林行省丞相脱火赤所部12万军队的冬营地，与之相望的野孙漠涟则为其夏营地(见《完者都史》，罕伯莉波斯文校刊本，页202－203)。故火孛未入《经世大典》和《西北地附录》。

元年己丑夏，至忽鲁班雪不只[1]之地。皇弟拖雷来见[2]。

---

〔1〕〔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294册，页23)："《辍耕录》：'太宗即位于忽鲁班雪不只之地。'"

陶宗仪《辍耕录》："太宗即位于忽鲁班雪不只之地。"——卷1，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页9。其地望应大致与怯绿连河曲雕阿阑(Ködö'e aral)之地相近。

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6)：*Gurban subči. Hu-lu-pan gibt mong. Gurban, "drei" wieder. Hsüeh-pu-chih entspricht möglichweise einer ableiteten Form von alttürkisch sub, "Wasser" (s. RÄSÄNEN, Versuch eines etymologischen Wörterbuchs der Türksprachen. POUCHA,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S. 98, gibt zwei mit-subčit zusammengesetzte Ortsnamen an und meint, dies sei ein mongolicher t- plural von alttürkishc suwči "Pilot". Die Hypothese einer von sub "Wasser" abgeleiteten Form erscheint wahrscheinlicher und kann evtl. durch folgendes gestützt werden: Gurban subči bezeichnet, wie aus dem Zusammenhang deutlich wird, das Ordo von Činggis Qan, das Tolei nach mongolichen Brauch als jüngster Sohn geerbt hatte. Das "Ursprungsland der Ahnen"—somit das Ordo von Činggis—wird in YS 1, 12r "san-ho chih-ti" "das Land der drei Flüsse genannt. Es ist also möglich, dass "gurban subči" einer mongolische Form für chines. San-ho, "drei Flüsse" ist (*Gurban subči，"忽鲁班"复原为蒙古语"三"〔刘按，《至元译语·数目门》："三，兀鲁班"——贾敬颜、朱风合编《〈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以下版本信息略)，页12；明火原洁、马沙亦黑编《华夷译语·数目门》："三，忽儿班，γurban"——同上书，页52〕。"雪不只"或相当于一个源自古突厥语sub"水"的派生形式。见列塞能：《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稿》。普察：《元朝秘史》〔德译，页98〕提供了两个带词缀-subčit的复合地名，且称据云系对古突厥语suwči"领航人"添加蒙古语复数-t。此从sub"水"派生之假设，看来是相当可能的，且可能得到下列支持：Gurban subči指拖雷作为幼子按蒙古习俗所继承之成吉思汗的斡耳朵，正如由于因果关系而变得明晰。"祖先起源之地"——即成吉思的斡耳朵——以《元史》卷1中称为"三河之地"。因此有可能"忽鲁班雪不只"是汉文"三河"的蒙古语对应词。)——《太宗纪》德译，页137。按，此说虽然有一定吸引力，但将Gurban subči比定为三河仍有一些疑问。

〔2〕拖雷(Tolui)，成吉思汗与孛儿台旭真所生第四子。《蒙鞑备录》作"天娄"。——见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湾正中书局，1972年，页438。《世界征服者史》中称之为兀鲁黑·那颜(Ulugh Noyan)，意为大那颜。本书卷115与《史集》卷2有传。《元史》卷115《睿宗传》："方太祖崩时，太宗留霍博之地，国事无所属，拖雷实身任之。"按蒙古旧制，父亲年长诸子成年后各自营生，幼子守产。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监国二年。拖雷前来见窝阔台，当是为商量皇位继承权之事。拖雷在窝阔台登基的问题上，直至确定交权日期前二日，还曾犹豫不决，经耶律楚材劝说，方决定交权，详见下。但按阿布拉莫夫斯基有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的考证，似是窝阔台前往拖雷领地商谈。

秋八月己未[1]，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2]曲雕阿兰[3]之地，以太祖遗诏[4]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阿剌里[5]。始立朝仪[6]，皇族尊属皆拜[7]。

---

〔1〕"八月己未"，即八月二十四日（公历1229年9月13日），《圣武亲征录》记为"己丑（1229）八月二十四日"，与此同。——见洪金富编著：《辽宋金元五朝日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目录索引丛刊，台北，2004年，页331。这一日期亦见证于陶宗仪"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宋绍定二年己丑年（1229）八月己未，即位于忽鲁班雪不只。"（刘按，陶宗仪此处将窝阔台与拖雷会面之地误以为窝阔台即皇位之地）——《辍耕录》卷1《列圣授受正统》，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元朝秘史》第269节记窝阔台即位为鼠儿年（1228），误。道藏中保存的元李道谦所编李志常传则记"庚寅（1230）秋七月，太宗英文皇帝始即大宝"——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真常真人（李志常）》，明正统道藏本；及《佛祖历代通载》中"辛卯（1231），太宗皇帝即位"的记载，亦误。——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2〕怯绿连河，即今克鲁伦河（Kelüren）。

〔3〕〔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294册，第23页）：此与下文阔帖乌阿剌里本是一地，其地近斡难河。按，不确，应在克鲁伦河之旁。

〔4〕窝阔台以成吉思汗遗诏即位事，见于数种文献，如苏天爵：《中书耶律文正王》引李微所撰《耶律楚材墓志》："己丑（1229）秋，公奉遗诏立太宗。"——《元名臣事略》，卷5，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以下版本信息略），页76。又徒单公履：《皇太子册文》提到："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元文类》卷10，上海涵芬楼影印元至正杭州西湖书院刊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并见《元史》卷115《裕宗传》中有关记载与此同。

〔5〕〔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294册，页23），见注释（3）。

库铁乌阿剌里，《圣武亲征录》作月忒哥忽阑。王国维："蒙古语阿剌勒，水中岛也。《秘史》续集二称客鲁连之阔迭兀阿剌勒，则当是客鲁连河中之岛，后为太祖第一斡耳朵所在地。日本箭内博士谓此岛在桑沽儿河入克鲁伦河处，殆近之。"——见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载于《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49。

有关此地，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10）：Ch'ü-tiao a-lan 曲雕阿阑 und K'u-t'ieh-wu a-la-li 库铁乌阿剌里 sind zwei verschiedene Schreibungen für "Köde'u aral" am Zusammenfluss des Kerulen und Senggür. CCL hat die erste Form, GG §136 hat die zweite Form. Die Kompilatoren des YS haben dies als zwei verschiedene Ort aufgefasst, 1. Ort des qurultai, 2. der Ort der Inthronisation. Es finden sich jedoch nirgends Hinweise, dass beides an verschiedenen Orten stattgefunden hat. Eine ausführliche Diskussion der Namen findet sich bei PELLIOT, Notes, S. 321f.（"曲雕阿阑"与"库铁乌阿剌里"为怯绿连与桑沽儿〔两河〕汇流处之"阔迭兀阿剌勒"〔Köde'u aral〕之不同写法。《圣武亲征录》取第一种写法，《元朝秘史》第136节取第二种写法〔刘按，不确。《秘史》此节写为"阔朵额阿剌仑"，但在述太宗即位时写为"阔迭兀阿剌勒"，与此相近〕。《元史》编著者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地方，即前者为忽里台大会地点，后者为即位地点。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两者发生于不同的地点。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页321脚注中有关于此名称的详尽讨论）——《太宗纪》德译，页138。《太宗纪》

注释〔5－7〕转下页。

注释〔5－7〕接上页。

所据之《太宗实录》此处可能系后世编成，其所依据资料当有《亲征录》与《脱卜赤颜》的蒙文本，因而造成两名并录及史实之混淆。

《圣武亲征录》："己丑(1229)八月二十四日，诸王、驸马、百官大会怯绿连河曲雕阿兰，共册太宗皇帝登极。"——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苏天爵《中书耶律文正王》引李微所撰《耶律楚材墓志》云：己丑(1229)秋，公奉遗诏立太宗，择定八月二十四日。诸皇族毕至，至二十二日尚犹豫不决。公曰："此社稷大计，若不早定，恐生大变。"睿宗曰："再择日，如何？"公曰："过此日皆不吉。"至日，公与睿宗翼太宗登宝位。——《元名臣事略》卷5，页76。《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称太宗即位在：در سال هوکار ییل که سال گاو باشد موافق شهور سنه ست و عشرین و ستمایه(dar sāl-i hūkār yīl ka sāl gāw bāšad muwāfaq šuhūr-i sinast wa ʻišrīn wa satmāyah)，"在忽客儿(hūker)年这一年，即牛年，相当于626年之诸月。"——德黑兰刊本，1974年，页636；汉译本，第2卷，页30。牛年即己丑年。《世界征服者史》记为回历626年(汉译本，上册，页217)，相当于公历1228—1229年。《至元译语》"走兽门"："牛，兀哥儿(üker)"。——贾敬颜、朱风汇集本《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页10，即《史集》所云"忽客儿"(hüker)。此事亦见《秘史》第269节，兹略。

〔6〕有关制定朝仪，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11)：Über die Art dieses frühen Zeremoniells ist nichts zu erfahren. Die Einführung von Hofzeremonien werden an anderer Stelle erst für die Zeit von Qubilai bestätigt: "Der Kaiser befahl dem Liu Ping-chung und dem Hsüh Heng erstmalig (!) das Hofzeremoniel zu regeln". YS 67, 1v. Weiter heisst es, dass von da an bei offiziellen Anlässen, wie Krönung, Geburtstagen, Empfängen usw, das bei Audienzen übliche (chinesische?) Zeremoniell angewandt wurde, bei der Ahnenverehrung und bei Festen für hohe Beamte in den meisten Fällen nach mongolischem Brauch verfahren wurde (YS 67, 2r). "未闻有关这种早期礼仪之事。在另一处，朝仪被确认在忽必烈时才引入：帝"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元史》卷67。还说，自是在正规的场合，如登基、天寿节、接待等，正式会见使用(汉？)仪，而在祭祖及为高官的节日时，在多数情况下用蒙古礼。"——《太宗纪》德译，页138。

从阿布拉莫夫斯基在其脚注(16)中提及罗亦果的《耶律楚材(1189—1243)——佛家理想主义者与儒学政治家》(Igor de Rachewiltz, Yeh-lü Ch'u-ts'ai〔1189—1243〕: *Buddhist Idealist and Confucian Statesma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1962)及容克的博士论文《耶律楚材》(D. Jonker, *Yeh-lü Ch'u-tsai*)看，他接触过有关耶律楚材的史料，但似未注意到耶律楚材的太宗即位时确定朝仪之事，此议不足取，详见下。世祖时参与制定朝仪者除刘秉忠、许衡等人外，还有史天泽之子史杠，详情笔者拟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7〕苏天爵《中书耶律文正王》："己丑(1229)，太宗即位，公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尊长之有拜礼，盖自此始。"——《元名臣事略》卷5，页76。《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标点本，页3457。

颁大札撒[1]。华言大法令也[2]。金遣阿虎带[3]来归太祖之赗[4],帝曰:

---

〔1〕"札撒"通常写作"札撒"。有关窝阔台颁布大札撒之事,《世界征服者史》记,元太宗即位后,"他开始治理国家,安排朝政。首先,他制定一条札撒称:成吉思汗原来颁布的法令和敕旨,应予以维护、支持和保卫,不许恶意变动、窜改和混淆。这时候,到处都有造谣生事者来报告、揭发异密和长官们的行为。但是,合罕说:'我登基之前,任何人嘴里散播的流言蜚语,我们予以原谅。但是,自今以后,谁要角犯新旧法令和札撒揠苗助长,即说按其罪行轻重给以惩处。'制定这些札撒后,他派军征讨世界各地。"——汉译本,上册,页220。《史集》亦记:پیش از این چینگگیز خان فرمود مصون و محروس که نافذ باشد و از تغیر و تبدیل قآن چون بر سریر ملک مقرر گشت اول یاسق فرمود که تمامت احکامی که (Qā' ān čūn bar sarīr-i mulk muqarrar gašt avval yāsāq farmūd ka tamāmat-i ahkāmī ka pī az īn Čīnggīz Khān farmūd ka nāfiz bāšad wa az taghīr wa tabdīl masūn wa mahrūs),"当合罕即位之后,他颁布札撒道:此前成吉思汗所下达的所有命令,均应被遵守,改动与变更是不能允许的。"——德黑兰刊本,1974年,页636。

札撒,辽时称闸撒。东部与南部突厥语作yasaq,经北部突厥语读法jasaq/zasaq传入蒙古语后为jasaq,意为命令。在13—14世纪波斯文史料中写作یاسا(yāsā)。《至元改元诏》:"据不鲁花、忽察、脱满、阿里察、脱火思辈构祸我家,照依成吉思皇帝扎撒,已正典刑讫。"——《元典章》,诏令卷1,典章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页3;此诏亦收入《元史》卷5《世祖纪》,至元元年(1264)八月条,见标点本,页99,但称为"太祖皇帝札撒"。"成吉思皇帝扎撒"与"太祖皇帝札撒",即大札撒。大札撒为成吉思汗所颁法令汇集。关于大札撒,中外学者有详尽讨论,见:David Ayalon, *The Great Yasa of Chingiz Khan, in Studia Islamica*, 33 (1971): pp.97-140; 34 (1971): pp.151-180; 36 (1972): pp.113-158; and 38 (1973): pp.107-142(戴维·阿亚隆:《成吉思汗大札撒》,刊于《伊斯兰研究》,1971年第33期,页97-140,1971年第34期,页151-180;1972年第36期,页113-158;1973年第38期,页107-156);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persischen*, no. 1789, band IV, Wiesbaden, 1985, s. pp.70-82(格尔哈尔德·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份》,卷4,第1789条,威斯巴登,1985年,页70-82);David O. Morgan, *The 'Great Yasa of Chingiz Khan' and Mongol Law in the Ilkanate*,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9 (1986): pp.163-176(戴维·O.摩根:《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与伊利汗国的蒙古法》,刊于《亚非学院学报》,1986,页163-176),同氏 *The "Great Yāsa of Chingiz Khan" Revisited*, 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Bill, Leiden & Boston, 2005(戴维·O.摩根:《〈成吉思汗大札撒〉再思考》,原载于《蒙古人、突厥人、与其它——欧亚游牧人与定居世界》,莱顿与波士顿,2006年,辛卓如汉译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第1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69-180);Igor de Rachewiltz, *Some reflections on Činggis Qan's Ĵasay*, in *East Asian History*, no.6 (Nov. 1993), pp.91-103(罗亦果:《质疑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刊于《东亚历史》,1993年12月,第6期,页91-103)。

笔者初步查检到有国内有关大札撒的研究,按发表年份排列计有:

奇格:《再论成吉思汗〈大札撒〉》,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06期;张长利:《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问题》,载于《民族研究》,1998年,06期;吴海航:《成吉思汗〈大札撒〉探析》,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05期;李玉年:《〈大札撒〉对元朝立法的影响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

(注释〔1-4〕见下页)

(注释〔1-4〕接上页)
载于《史林》,2007年,06期;那仁朝格图:《成吉思汗〈大札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蒙古史研究》第9辑,2007年;才盛:《成吉思汗〈大札撒〉逻辑思维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赖秀兰:《成吉思汗〈大札撒〉中生态法探析》,载于《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28期;王磊:《〈大札撒〉中宗教问题探析》,载于《政法论丛》,2010年,03期;杨洁:《论〈大札撒〉中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观》,载于《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年,03期。

〔2〕窝阔台颁布大札撒事,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12):Es scheint sich hier nicht um eine neue Gesetztgebung zu handeln, sonder nur um die Bestätigung der Gültigkeit der von Činggis Qan festgelegten Regelungen. Vgl. Auch JUVAINI S. 189, RASHID, S. 32."此处似不涉及一项新的立法,而只是确认由成吉思汗所制定的规矩的有效性。试比较志费尼书页189及拉施都丁书页32。"——《太宗纪》德译,页138。

大札撒曾为数种元代文献提及。王恽《定法制》:"自古图治之君,必立一定之法。君操于上,永作成宪;吏行于下,视为准式。民知其法,使之易避而难犯,若周之三典,汉之九章,一定不易。故刑罚省而治道成。今国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大小之法尚远定议。内而宪台,天子之执法;外而廉访,州郡之刑司也,是有司理之。官而阙所守之法,至平刑议狱,旋旋为理,不免有酌量准拟之差,彼此重轻之异。合无将奉敕删定到律令,颁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为成宪,岂不盛哉!若中间或有不通行者,取国朝扎撒,如金制别定敕条。如近年以来审断一切奸盗,省部略有条格者,州县拟行,特为安便,此法令当亟定之,明验也。如此则法无二门,轻重当罪,吏无以高下其手,天下幸甚。"——《秋涧集》,卷90,四部丛刊本,页864。柯九思《宫词十五首》,其一:"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初一作所秩,勋贵先陈祖训严。凡大宴使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扎撒以为训。"——《丹邱生集》,卷3,清光绪三十四年柯逢时刻本。柯九思为元中后期文人,至他生活的时代,大札撒尚存。《吏学指南》:"大扎撒谓依条例法度也"。——卷4,"法例",元刻本,北图藏。此书为明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中全文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

〔3〕有关阿虎带出使蒙古事,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13):Nach MS und HYS ist A-hu-tai identisch mit Wan-yen Nu-shen (CS 115, 1 der im 9. Monat 1228 zu den Mongolen geschickt worden war, wo Ögedei ihm empfing. Im 6. Monat des folgenden Jahres wurde er nochmals zu Ögedei gesandt. 1233 wurde er von Ts'ui Li getötet). "按《蒙兀儿史记》与《新元史》,阿虎带应为完颜奴申(《金史》卷115,1228年9月被遣至蒙古,受到窝阔台的接待。次年六月他再度被遣出使窝阔台,1233年被崔立所杀)。"——《太宗纪》德译,页138。

阿虎带实有其人。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元遗山集》,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卷19;《元好问全集》,卷19,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521。另外,刘祁提到,金大正九年(1232)二月,"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吏部侍郎刘仲周等诣北兵告和,一云'诣北兵请和'。不从。"——《归潜志》,卷11,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页122。上述两书中所记阿虎带当即此人。查屠寄虽然引证完颜奴申出使蒙古事,但并未否定阿虎带出使。完颜奴申与阿虎带在金的资阶相近,两人可能是分头出使的。

〔4〕读作fèng,助主人送葬之物。归死者曰赗。

“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赗何为哉！”却之。遂议伐金。[1]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2]。始置仓廪，立驿传[3]。命河北汉民以户计，

---

〔1〕《圣武亲征录》：“太宗遂议征收金国”。——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

〔2〕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14)举证《秘史》第279—280节；及舒尔曼《〈元史·食货志一、二〉译注》(Herbert Franz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translation of Chapter* 93 *and* 94 *of the Yüsn shih*,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元代的经济结构——〈元史〉卷九三及九四英译》，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剑桥，麻省〕, 1956〔以下版本信息略〕)页65及以下。

《秘史》第279节旁译：“百羊处一羊教出着”。《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窝阔台于马年“规定了牲畜的忽卜出儿(qūbjūr)，规定了每百头缴纳一头。”——汉译本，页60。《大元马政记》：太宗皇帝五年(1233)癸巳圣旨谕田镇海、猪哥、咸得不、刘黑马等人：“其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若有隐漏者，尽行没官。如各处收拾牧放，开具何人头疋，备细花名数目闻奏，听候支拨，不得违错。如违慢者，人岂不断罪！”——《大元马政记》，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2集，叶29-30。《元经世大典·马政》此段资料略为：“太宗时家有牛、羊(为)〔马?〕及百者，取牝牛、羊、马各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者，亦各取一头入官。”——《元文类》卷41，四部丛刊本。

〔3〕阿布拉莫夫斯基脚注(15)举证奥勒布里希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P. OLbricht, *Das Postwesen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im 13. und 14.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54)。

《秘史》第279节记，按察乃、孛勒合答儿两人提议，太宗因的使臣来往，使得百姓也沿途奔驰，来行的使臣延迟行程，百姓劳累受苦，遂决定各处千户派出站赤和兀剌赤，在各处设置驿站。使臣们若无紧要事，不得沿着百姓处往来，而要沿驿路行。太宗将此议提请察合台考虑，察合台表示同意，并提出从他那里将驿站连通至拔都处。《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为使诸王或合罕陛下的急使能够不断到达，以利于办理重要事务，在各地设立了 bāyān/tāyān 驿站。为了建立这些驿站，从诸王处派出了一些急使，并且作了如下详细规定：从合罕处派出了必阇赤忽里带(qūrīdāy)，从察合台处派出了亦木阔勒臣(īnkljīn/ābkljīn/ābklhīn)、泰赤兀台(tāyjūtāy/tāyčīūtāy)，从拔都处派出了速忽·木勒赤台(sūqū mūljītāy)，按只合(aljīqah)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之命，从拖雷汗处出发。上述异密们出发后，在所有各地区和国家，按照地区的广袤，建立了驿站”。——汉译本，第2卷，页61。

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载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12月，页157)：《元朝秘史》(续集卷2第280节)：“斡哥歹皇帝说，……使臣往来，沿百姓处经过，事也迟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户每出人马，立定站赤，不是紧急事务须要乘坐站马，不许沿百姓处经过。……(察阿歹)说，站赤一节，我自这里立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里立起，接着我立的站。说将来了。”作者认为据此认为立驿传(站赤)自窝阔台汗始与事实有出入。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某些地区已经建立了站赤。根据：第一，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刘仲禄去山东敦请丘处机时，益都军阀张林曾

注释〔3〕转下页

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1]；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2]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3]。印度国主、木罗夷[4]国主来朝。西域伊思八剌纳城[5]

(接上页注释〔3〕)

“给以驿骑”；丘处机东归后，成吉思汗有圣旨慰问，其中说：“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及附录)；第二，又十六年从南宋方面派遣来北方的使臣也有记载说“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国王处来者，所过州县及管兵头目处，悉来尊敬，不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礼。……凡见马则换易，并一行众人，悉可换马，谓之乘铺马，亦古乘传之意。”(赵珙《蒙鞑备录》)。据此，作者认为太宗窝阔台不是站赤制度的创始者，而其功绩在于扩大了站赤的规模，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

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探源》(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认为：根据《世界征服者史》《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可知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贵族便已经建立了驿传制度。而《元史》此处、《圣武亲征录》中有关太宗简历驿站一事的记载皆本于《蒙古秘史》，实际太宗所诏并非建立驿站，而是关于驿站管理方面的规定，此亦间接说明在元太宗窝阔台继承汗位之后对驿传制度的贡献主要是在整顿、规范等方面。

〔1〕《圣武亲征录》：“助贫乏，置仓戌，创驿站。命河北先附汉民赋调，命兀都撒罕主之。”《耶律楚材传》：“上雅重其言，置之左右，呼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兀都撒罕/吾图撒合里，蒙古语Urtu Saqal，此言长胡子。

〔2〕邱树森《蒙古国时期的回回人》，载于《邱树森七十自选集》，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页288：1241年，牙剌瓦赤奉调至汉地，任燕京行省大断事官，河中由其子马思忽惕主持政务。牙剌瓦赤父子的政绩主要有：第一，医治战争创伤，安抚残存居民，到1259年，“这些州县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原来繁荣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接近原来的水平。”第二，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废黜苛捐杂税和强制兵役。例如，牙剌瓦赤“废除了扯里克(指非正规军)和签军的强制兵役，及种种临时赋税的负担、摊派”。第三，制定“以丁计，出赋调”的赋税制度。这一制度详细情况，在蒙哥汗即位后，出任阿姆河等处行中书省长官的阿儿浑提出采用牙剌瓦赤在河中的办法中有所透露。他们主张“应按丞相牙剌瓦赤在河中采取的办法来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忽卜绰儿税，按照它，每人一年的缴纳是按他的财富和交纳来决定，并且在缴纳了这个规定的数目后，在同一年内不得再找他，也不得给他别的摊派。”由此可见，牙剌瓦赤制定的“忽卜绰儿税”，不仅在察合台汗国领地的河中，而且在后来属于伊利汗国的河中以西地区也得到推行。

〔3〕《圣武亲征录》：“西域赋调命牙鲁瓦赤主之。”——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乃波斯文مخمود خوارزمی (Mahmūd-i Khwārezmī)的音译，意为“花剌子模人马合木”，指牙剌瓦赤。《秘史》263节将牙剌瓦赤、马思忽惕父子称为来自兀笼杰赤(Ürgenč)的“忽鲁木石(Qurumši，姓名)斡孛黑坛(oboγtan，姓有的)撒儿塔兀勒(Sarta'ul，回回)，自来见太祖。”“忽鲁木石(Qurumši)”即“滑剌西迷”之倒语，指花剌子模人。

〔4〕周良霄《卢布卢乞东游记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此木罗夷在《元史》第3卷作末来，没里奚，《元史》第147卷《郭侃传》作木乃兮，《圣武亲征录》作木剌奚，《西使记》作木乃奚，均为阿拉伯语ملاحده (malāhidah)的音译，义为异端，指亦思马因派اسمعيليه (Isma'īlih)。此派教徒以狂信著称，否认《古兰经》中的若干教义。

注释〔5〕转下页

酋长来降。

是岁，金复遣使来聘。不受[1]。

（原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接上页注释〔5〕）

〔5〕有关此地，前人大致持两种意见。〔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3）：《西北地附录》有亦思法抗。布莱特施奈德（Bretschneider）认为此处之西域伊思八剌纳、《亲征录》之亦思八剌纳，可能即此亦思法杭（第2册，页113）。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 页753）中，亦认为伊思八剌纳乃为亦思法杭之讹写。

王国维在考察《圣武亲征录》中"是年，西域亦思八剌纳城城主遣使来降"的记载时，认为"亦思八剌纳，即《秘史》之亦薛不儿，前作泥沙兀儿、匿察兀儿"（《〈圣武亲征录〉校注》）。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4）亦持此见。但周良霄认为"匿察兀儿为Nishapur之音译，与Isfahan迥不相侔"——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页61。

阿布拉莫夫斯基在其脚注19中只是重复了上述意见（《太宗纪》德译，页139），未提出己见。上述诸位学者将伊思八剌纳/亦思八剌纳比为亦思法抗（Isfahān）与泥沙兀儿/匿察兀儿/亦薛不儿（Neišāpūr——呼罗珊四郡之一，今伊朗马什哈德郊外）之议均误。伊思八剌纳/亦思八剌纳原名应为Isfarāyin，此城在宽定吉思海（突厥语Kül-tengisi，今里海〔Caspian Sea〕）以南，位于《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Juwayni）的家乡术外因（Juwayn）以北不远处。中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的关于此地的描述，见G. 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emur*, Cambridge（斯特朗日：《东大食国地志——伊斯兰征服至帖木儿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与中亚》，剑桥大学出版社），1930年，页381，页391-393。

此地在成吉思汗西征，命速不台、哲别追击花剌子模国主时为蒙古国控制（《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页171；其遗址位于比里吉思市〔Šahr-i Bilqīs〕，见同书页175，注〔14〕），书中译作"亦思法剌因"。据志费尼记载，当绰儿马罕至西域时，蒙古国镇守西域的大臣真帖木儿（Čin Temür）命属下怯勒孛剌（Kül Bolad）带几位降蒙呼罗珊异密入朝，其中包括居于亦思法剌因以北的宝合丁（Bahā al-Dīn）。他们是阿母河以西诸国首次入朝者，受到太宗的欢迎。宝合丁被命治理呼罗珊，包括亦思法剌因、术外因等地。——何高济汉译本，页580-581。

〔1〕《金史》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记："六年（1228）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栾为小使，径来行省。……初以斡骨栾来，行省恐泄事机，因留之。蒲阿等既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乃遣还，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语甚不逊。斡骨栾以此言上闻，太宗皇帝大怒，至应州，以九日拜天，即亲统大兵入陕西（标点本，页2459）"，应对应此事。此处将唐庆使金事置于正大六年（1228）有误，详见后。对照《金史》记载，可知金遣使之后，蒙古方面也先后派出唐庆与斡骨栾等两批使团赴金，而非简单地"不受"。而双方交涉的失败，应与金扣留斡骨栾，以及大昌原之战获胜后，因错估己方力量，对蒙古采取强硬政策有关。

2 《元史》卷2《太宗纪》太宗二年记事笺证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从事"《元史》会注"项目多年,并纳入内蒙古社科院主持的"草原工程"项目。其中《元史·太祖纪》的注释工作由陈得芝先生承担,其部分先期成果已刊出。《太宗纪》的会注工作由笔者负责。

注释《太宗纪》首先要考虑的是与《太宗纪》有密切关系的编年史料,如《圣武亲征录》与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史集》中的《窝阔台合罕传》,及《元朝秘史》。此外,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时期重要大臣耶律楚材因参政中枢,宋子贞所撰其神道碑与王国维整理的耶律楚材年谱也应参考。太宗朝对金与高丽战事在《金史》与高丽史料中亦有记载,因此注释《太宗纪》的相应部分时,也要查考上述两种史籍。

《元史·本纪》部分多取自《实录》,由于元各朝实录今已不存,日本学者植松正所编《元代政治法治史年代索引》(汲古书院,2008年),汇集《元典章》《至正条格》《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大元马政记》《秘书监志》等数十种史料中的编年资料,对于补充《太宗纪》十分有用。

迄今对《太宗纪》做较详尽研究的当属我国学者屠寄与德国学者阿布拉莫夫斯基。屠寄重修了窝阔台的《本纪》,而阿布拉莫夫斯基将《太宗纪》全文译为德文,并加注释。近年来,元史室组织硕博研究生与博后,广为收集前人对《元史》文本与所记史料所作考订的成果。笔者在此基础上,汇集前述史料中的有关部分,再加自己浅见,附注于《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文的自然段之下。

"《元史》会注"课题难度高,工作量大。在进行会注工作的过程中,不时听取学界的批评与建议非常重要。《太宗纪》太宗元年部分的研究

成果，笔者已单独成文提交《西北民族研究》，将于近期刊出。今将太宗二年部分研究稿奉献给读者，以待指教。

二年庚寅春正月，诏自今以前事勿问[1]。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2]，杂税三十取一。[3]

是春，帝与拖雷猎于斡儿寒河[4]，遂遣兵围京兆。金主率师来

---

〔1〕此事汉文与波斯文史料均提及。《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网，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众以云云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标点本，页3457)拉施都丁有相应记载："朕下旨道：在朕登基之前[如]有人犯下任何罪行与过失，全部予以宽宥"(و هر جريمت و خطا تا روز جلوس ما از كسى صادر شده باشد تمامت عفو فرموديم, wa har jarīmat wa khatā tā rūz-i jilūs-i mā az kisī sādir šuda bāšad tamāt ʻafū farmūdīm)——《史集》德黑兰刊本，1974年，页637；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页31；周良霄汉译本，页46。《史集》的这条记载《太宗纪》德文译注者阿布拉莫夫斯基已注意到，见 Waltraut Abramowski, *Die Chinesischen Annalen von Ögödei und Güyük——Übersetzung des 2. Kapitels des Yüan-shi,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0 (1976), pp.117-168(瓦勒特劳乌特·阿布拉莫夫斯基：《窝阔台及贵由之汉文编年纪——〈元史〉卷二德译》，载于《中亚研究》第10辑〔1976〕，页117-168)，见页139。以下简称《太宗纪》德译。

〔2〕有关酒税问题，舒尔曼有研究，见《〈元史·食货志一、二〉译注》。Herbert Franz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translation of Chapter 93 and 94 of the Yüsn shih*,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元代的经济结构——〈元史〉卷九三及九四英译》，页203、209。)

〔3〕舒尔曼有关蒙古国初期的税制研究，见其《〈元史·食货志一、二〉译注》，页65、89-92。

〔4〕〔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续修四库全书》第294册景印胡玉缙抄本，页23)：六年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即鄂尔昆河。《圣武亲征录》的不同抄本中，此河名写法不一。王国维校改为"斡儿寒河"："《说郛》本、何本寒作塞，今从汪本、《秘史》作斡儿洹，今鄂尔昆河。"见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以下版本信息略)，页54。今蒙古鄂尔浑(Orkhan)河，色楞格河上源之一。

援,[1]败之,寻拔其城。[2]

夏,避暑于塔密儿河[3]。朵忽鲁[4]及金兵战,败绩,命速不台

---

〔1〕阿布拉莫夫斯基已注意到《金史》中的下述3则记载与此有关:一为卷17《哀宗纪》,大正"(1229)春正月,副枢蒲阿、总帅牙吾塔、权签院事讹可解庆阳之围。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标点本,中华书局,1975年,页382)。二为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十二月,诏以牙吾塔与副枢蒲阿、权签枢密院事内族讹可将兵救庆阳。七年正月,战于大昌原,庆阳围解。诏以牙吾塔为左副元帅,屯京兆。"(标点本,页2459)。三为卷112《移剌蒲阿传》:大正六年"十二月乙未,诏蒲阿与总帅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讹可救庆阳。七年正月,战北兵于大昌原,北军还,庆阳围解。诏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未几,以权参知政事与合達行省于閺乡。八年正月,北军入陕西,凤翔破,两行省弃京兆而东,至洛阳驿,被召议河中事,语在《白华传》。"(标点本,页2471)——《太宗纪》德译,页139,注24。

上述《纥石烈牙吾塔传》中:"六年(1228)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栾为小使,径来行省。……初以斡骨栾来,行省恐泄事机,因留之。蒲阿等既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乃遣还,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语甚不逊。斡骨栾以此言上闻,太宗皇帝大怒,至应州,以九日拜天,既亲统大兵入陕西。"(标点本,页2459)应对应于太宗元年最后一条"是岁,金复遣使来聘。不受。"此事亦与围攻京兆之事有关。该传中有关唐庆使金时间有误,详见他注。

对照《金史》记载,可知金遣使之后,蒙古方面也先后派出唐庆与斡骨栾等两批使团赴金,而非简单地"不受"。而双方交涉的失败,应与金扣留斡骨栾,以及大昌原之战获胜后,因错估己方力量,对蒙古采取强硬政策有关。

〔2〕《圣武亲征录》:"庚寅春,遣军将攻守京兆。金主以步骑五万来援,败还,其城寻拔。"——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

〔3〕〔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3),《宪宗纪》:"六年夏四月,驻跸于答密儿,五月幸昔剌兀鲁朵。"《提纲》23:"他米勒河,亦曰塔米儿河,南源出杭爱山北麓,在鄂儿勒昆河之西,三涧合二水皆会,又东北始曰他米儿河,又东北与北源会,北源出枯库东麓,在杭爱山西三百里,东北流三涧合,又东北始曰他米勒河,又东北会鄂勒昆河。"《元史·严实传》:"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牛心盖塔密儿河上之山名也,是时未城和林。

今蒙古Tamir河,鄂尔浑河上源之一,位于和林城以西数百里处。

〔4〕阿布拉莫夫斯基对此人注曰:"可能是《秘史》中经常提及的多忽勒忽·扯耳必。在《秘史》节281中提及,窝阔台秘密地处死了他,也许是因为他在庆阳的战败。"——按,屠寄原文为:"说一件,将有忠义的多忽勒忽因私阴害了,必以是役失律之罪。——参见《金史》卷17,七月条。"(Vermutlich Doqolqu čerbi, der häufig in der GG gennent wird. In GG §281 bezigtigt sich Ögedei, ihn heimlich umgebracht zu haben, möglicherweise wegen der niederlage, die er bei Ch'ing-yang erlitten hatte.)(CS 17, 9r, im 7. Monat)——《太宗纪》德译,页139,注25。

《史集》(Jāmi' al-Tawārīkh)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记载:参与灭金之战者为孛斡儿赤那颜之弟朵豁勒扯儿必(Tūqūlqū jerbi),当即此人。

援之。[1]

秋七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2]、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3]等堡，遂渡河[4]攻凤翔。[5]

---

〔1〕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庚寅（1230），太宗命睿宗（按，即拖雷）循宋徼而北，营取河南，公（按，速不台）亦在行。道出牛头关，遇金将合达，帅步骑甚众，□上问方略所便。公进说曰：'城邑中人，遇劳苦即倦厌，逗挠气堕，与战易胜。'"——《秋涧集》卷50，四部丛刊本，页520。速不台，兀良哈氏。

刘敏中《益都行省达鲁花赤珊竹公神道碑铭》："岁庚寅，太宗念公英果，令督阿术鲁攻信安，下之。明年为监战万户，同万户额里晃兀尔破汴。"——《中庵集》卷6，元刊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册92，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无出版时间。同氏《赠奉政大夫骁骑尉大同县子萧公神道碑铭》："岁庚寅，太宗皇帝大举伐汴，选才堪近侍者，君为选首。汴平，凯旋，君所俘户几四百。"——《中庵集》卷6。

〔2〕《圣武亲征录》："秋七月，上与太上皇亲征金国"。——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太上皇"即拖雷。

〔3〕屠寄考曰："金有天成县，隶大同府，此外河东更无天成堡。且是月汗始率兵度漠至官山，岂得遂渡河攻凤翔乎？《亲征录》：由官山、铁门关、平阳南下渡河，攻凤翔，便文总叙之词，非谓七月渡河也。"——《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民国23年（1934）毗陵屠氏结一官刻本，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版（以下版本信息略），页5。

阿布拉莫夫斯基此处注曰：位于大同附近，可勘同为"天城"（In der Nähe von Ta-t'ung. Identisch mit T'ien-ch'eng天城）。——《太宗纪》德译，页139，注（28）。

〔4〕阿布拉莫夫斯基注："屠寄认为（《蒙兀儿史记》卷4，页5），渡黄河事应迟在12月。《圣武亲征录》记所经路线为官山（见注〔33〕）、铁门关及平阳（即今之临汾）南下。十二月份所攻克的韩城和蒲城诸堡分别位于黄河之西及西南；蒙古人此前已必然且不可避免地渡过了河。对位于更西方的凤翔的进攻，有可能视为远期目标，此为围攻此城之役发生于次年（1231）一月（《金史》卷17）。速不台及进攻庆阳队军所起的作用，《元史》未加说明。"（T'U Chi〔MS 4, 5r〕meint, die Überquerung des Huang-ho habe erst spatter, in 12. Monat stattfunden. CCL sagt, man habe die Route über Kuan-shan〔s. Anm.33〕, T'ien〔按，应作T'ie〕-men-kuan und P'ing-yang〔das heutige Linfu——按，应为Linfen〕nach Süden genommen. Die im 12. Monat eroberten Festungen Han-ch'eng und P'u-ch'eng befinden sich westlich bzw. Sudwestlich des Huang-ho; die Mongolen mussten also zwangsläufig den fluss vorher überquert haben. Der Angriff auf Feng-hsiang, das noch weiter in Westen liegt, is wohl als "Fernziel" anzusehen, da die Belagerung diesen Stadt erst im 1. Monat des folgenden Jahren〔1231〕began〔CS 17, 9v〕. Die Rolle die Subutai und dire Truppen, die Ch'ing-yang belagert hatten, dabei gespielt haben, geht aus YS nicht hervor.）——《太宗纪》德译，页139–140，注（29）。

〔5〕《圣武亲征录》："南下渡河，攻凤翔。"——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

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1]，以陈时可[2]、赵昉[3]使燕

〔1〕《考异》卷86：陈桱《续编》在二月。

〔2〕设十路课税所事在宋子贞《耶律文正公碑》中亦有记载："乃奏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如燕京陈时可，宣德路刘中，皆天下之选。"——《元文类》卷57，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除依据上述宋子贞《耶律文正公碑》写成的《元史》耶律楚材本传之外，陈时可在《元史》还出现过两次，均在《太宗纪》中：一次是太宗八年丙申(1236)春"秋七月，命陈时可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另一次是太宗十年(1238)"秋八月陈时可、高庆民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5-36。

陈时可是金元之交时代北方的重要文人。元人鲜于枢记："寂通老人陈时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学士，仕国朝为燕京路课税所官。"——《困学斋杂录》，〔清〕知不足斋丛书，畿辅丛书本。元好问在抄录此段时，将"寂通"误为"通寂"。这段记载为我们补充了查找陈时可的重要线索：陈时可字秀玉，号寂通老人，燕京人氏，曾为金翰林。笔者见闻所及，迄今虽然尚无专门有关陈时可其人的研究，但并不等于此人未受学者关注。据笔者查检，认真考察过陈时可的学者有3位，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有关陈时可的资料。第1位是清乾嘉时代的施国祁，他在笺注元好问诗文集《遗山集》时，除了引据上述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与鲜于枢有关陈时可的记载外，还提到10条史料：

"《湛然居士集》有《过燕京和陈秀玉韵》，又《寄清溪居士秀玉诗》，又《戏秀玉诗》，又《谢赠阮杖诗》称秀玉殿学，又《和陈秀玉绵梨诗》注：清溪、秀玉，道号也。《二妙集》，段成已有《冯生成之自燕归平杨赖寂通先生获脱奴役诗》，《万松老人和节度陈公绝句》云：清溪居士陈秀玉，要结运宫香火缘，嫌得梢翁摇橹棹，却云到岸不须船。《宝坻县志》赵铸：兴宝《圣母庙记》：岁庚寅(1230)国朝设十路征收所，前学士陈公秀玉为举首，充燕路长；前大中正赵德辉副之。案，《环宇访碑录》：时可撰《重修柏林禅院碑》，性英书，在赵州。又潭柘寺《归云大禅师塔铭》，大兴。"——〔清〕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卷10，清道光二年南浔瑞松堂蒋氏刻本(以下版本信息略)。

第2位是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他在负责编写《畿辅通志》的金石部分时，就前述施国祁提到的第9条史料，即《环宇访碑录》所记赵州陈时可撰《重修柏林禅院碑》，考证了陈时可署名时的官衔，今录其内容如下(作者补入的字置于方括号之中)：

谨案，此碑撰文人为陈时可，书丹者沙门性英。陈时可，《元史》无传，但见于太宗《宣谕夺罗斛碑》文(此即元末明初人宋濂所提及的《元太宗皇帝御制宣谕》，详见后)。其题衔"宣差燕京路课税长官、兼提领编修所、司天台事"，考元《地理志》：中书省大都路：元太祖十年(1215)，为燕京路；世祖至元九年(1272)，改大都。又《百官志》：至元十九年(1282)，置大都税课提举司，而无燕京路课税长官。"提领"二字为元时职事官之总称。《百官志》：提领某所、某局者甚多，而无所谓"编修所"者。刘侗《帝京景物略》有《双塔寺碑》，为"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撰，可知元初曾设编修所之官与燕京课税长官，后皆裁汰。《百官志》皆漏之。司天台事，《百官志》：属司天监，中统元年(1260)因金人旧制立司天台。中统上追[乃]马真后称制垂二十年，而此碑已载有此官，其非中统以后所置，亦可知。又案，篆额者为释印简。《帝京景物略》引元庆寿寺僧《海云碑》，称：海云名印简，金宣宗时为成吉思帝所执，后住持燕京庆寿寺，与此题款称燕京(□)[庆?]寿(□)[寺?]堂海云袭祖印简者，其时、其地、其人，无不吻合也。——〔清〕莲池书院主讲黄彭年主纂：光绪本《畿辅通志》卷152(以下版本信息略)。

（注释〔2-3〕接上页）

第3位是前已提及的赵琦博士，她的《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中对陈时可有较详细的记述，其关注的中心是燕京路征收课税所，所注的内容如下：

“陈时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学士，道号清溪老人，又称寂通居士，通寂老人（按，“通寂老人”之号有误，详见后），宁道居士：《困学斋杂录》；耶律楚材：《和秀玉韵并序》，《湛然集》卷11；《归潜志》卷14《归潜堂铭并序》；《析津志辑佚》，第152页《名宦》——赵琦原注。此条见《顺天府志》引《析津志》，缪荃孙于清光绪丙戌（1886）辑自《永乐大典》卷4650，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页207。他是耶律楚材的老朋友，而且是耶律楚材向万松老人（释行秀）学佛的引荐人，《湛然居士文集》中收有数首两人唱和的诗作。邱处机西行途中，寓居燕京玉虚观，陈时可是与邱处机诗歌“日所与唱和者”之一，被称为“京城吾道”。邱处机逝后，他的弟子尹志常以“知先师者，君最深”为由，请求陈时可撰写《长春真人本行碑》。此外陈时可还撰有记录邱处机葬事的《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他与终南山重阳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善庆、佐玄寂照大师冯志亨等道教名人多有来往 。看来陈时可是一位兼通儒、释、道三教的金朝文人。——参见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77-78。

赵琦博士对陈时可做了认真研究，但缺陷是未注意到前述施国祁与缪荃孙的考证。此外，金人刘祁《归潜志》卷14收有“寂通居士陈时可秀玉”所撰之《归潜堂铭并序》。这位号为“寂通居士”的陈时可秀玉，清乾隆末学者鲍廷博确定他就是后来充任燕京路征收课税使的陈时可，并记入其14卷本《归潜志》抄本中。当代出版的崔文印先生点校本《归潜志》在录写上述鲜于枢有关陈时可的记载后，将鲍廷博所抄录上述的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中的内容，移录至“陈时可秀玉”之下，但未作进一步考订（刘祁：《归潜志》，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见页173）。近年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刘永海先生发表的《论〈甘水仙源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中，也提及陈时可（《中国道教》，2008年，第1辑，页38-43）。

施国祁、缪荃孙与赵琦3人虽然切入点不同，但研究都很深入，特别是施、赵二位学者对有关陈时可的史料挖掘最多，为查找陈时可踪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前引施国祁所举楚材的第五首诗《和陈秀玉绵梨诗韵》收于《湛然居士集》卷1：

石门九月西风高，梨出于石门之北遵化县。绵梨万树金垂梢。清溪秀玉道号也千里携赠我，藤筐初发香盈包。

谪仙风度清溪亚，春风曾饮梨花下。不用红妆唱采莲，醉望青天歌二雅。

我有斗酒清且醇，同君荐此鹅黄新。初见分香剖金卵，更看削玉飞霜鳞。

缥叶紫条何足语，夜光安可同鱼目。文园尘渴政难禁，咀嚼冰雪剩香玉。

——《湛然居士文集》卷1，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页17。

诗中“初见分香剖金卵”一句，校注本所据之“渐西本”作“初见清香剖金卵”；“缥叶紫条何足语”一句，“渐西本”作“缥叶紫条何足录”。王国维认为：“此诗作于秀玉入觐时。秀玉于甲午（1234）、乙未（1235）二年均至和林，见《文集》十《谢西方器之赠阮杖诗序》及《元史·太宗纪》。”故点校者谢方将此诗系于1334—1335年间。前已提及，陈时可甲午岁（1234）与耶律楚材见面时，曾携苏东坡铁杖相赠，在两人的唱和诗作中，并无一字提及梨，故可知携梨北上必为乙未年（1235）。绵梨为河北遵化名产，《大明一统志》有载。清人斌良有诗题为《遵化绵梨》，曰：

秋实骈佳果，倾筐摘未完。枝柔粘紫蒂，颗重叠黄团。

(注释〔2-3〕接上页)

瀣露浸喉润,琼浆沁肺寒。笑凭儿女索,和枣饤牙盘。

——〔清〕斌良撰:《抱冲斋诗集》卷23《粉署趋承集》4,清光绪五年崇福湖南刻本。

得燕京征收课税使职后,陈时可不再贫困,他利用赴漠北的机会,向耶律楚材赠河北遵化的梨,当有感谢之意。

施国祁所举第6条史料为《二妙集》中段成已所写《冯生成之自燕归平阳,赖寂通先生获脱奴役诗》。这位施救的"寂照先生"除施国祁《元遗山集》笺注本引文称"寂通先生"之外,今存《二妙集》诸本(包括四库本),以及在《全金诗》录文中,均作"寂照先生"。此外,诗中提还到救冯成之的"寂照先生"乃"世外人",当属佛家人或道士,与陈时可的身份不符。查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与忽必烈的海云,即号寂照,居燕(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程雪楼集》卷6,明洪武二十八年与耕书堂刻本,南京大学元史室藏)。而继承邱处机的冯志亨亦号寂照大师(虎岩赵着撰《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公讳志亨,字伯通,寂照其号。"——〔元〕李道谦辑:《甘水仙源录》卷6,明正统道藏本)。笔者推测,施国祁误将"寂照"读为"寂通",因而笺注有误,兹不足据。

耶律楚材的《用樗轩散人韵谢秀玉先生见惠东坡杖》诗为"圆方顶足法高卑,五九苍苍老节奇。一日湛然获二宝,东坡铁杖寂通诗。"(《湛然居士文集》卷10,中华书局,1986年,页215。)题目中的"秀玉"即陈时可,"秀玉"为其字,号"寂通"。此诗作于甲午年(1234)陈时远赴漠北时。从诗中可知,陈时可不但托带了苏东坡的铁杖,还送上自己为此所作的诗,惜此诗文失传,无法从中得知更多信息,此诗为耶律楚材答谢之作。

商丘城破后,史料只说了然居士携此杖来到燕京,想藏起来,但恐怕保不住,欲以"神物终须归俊"为辞,将二杖赠耶律楚材,但未见其人,遂委托两位有机会与耶律楚材联系的友人陈与田,即秀玉殿学、田公奉御转交。"秀玉殿学"即陈时可,"田公"当为元人刘敏中所撰《田氏孝敬堂记》中提到的"田阔阔"(《中庵集》卷2,元刻本)。

陈时可是耶律楚材的旧友,早年曾介绍他拜万松老人为师。陈时可认识邱处机也很早,是当时华北地区著名的文人。太宗二年被提名任职燕京,当出于耶律楚材对他的报答。

〔3〕金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金史》,卷14,《宣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04。此事又见于《金史》卷110列传第39"贞祐二年(1214)五月,判南京留守,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乃决。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诏迁都。"——《金史》卷110《仆散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232。并见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下版本信息略),页78。

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提到邱处机赴中亚途中,路过燕京时与之诗文唱和的文人有:"孙周楚卿、杨彪仲文、师谞才卿、李士谦子进、刘中用之、陈时可秀玉、吴章德明、赵中立正卿、王锐威卿、赵昉德辉、孙锡天锡。此数君子,师寓玉虚,日所与唱和者也。"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其中之赵昉德辉,王国维已指出即与邱处机交往的赵昉。

"《宝坻县志》赵铸兴宝《圣母庙记》:岁庚寅(太宗二年,1230)国朝设十路征收所,前学士陈公秀玉为举首,充燕路长;前大中正赵德辉副之。"——〔清〕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卷10。赵德辉即赵昉。

京，刘中[1]、刘桓使宣德，周立和[2]、王贞[3]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

〔1〕赵琦怀疑《金史》卷128《赵重福传》中的下列记载“大安三年（1211）……［重福］行西北六部郎中，治密云县，……贞祐二年（1214），以守密云功迁同知河间府事，行六部侍郎，……三年，河间被围，有刘中者尝与重福密云联事，劝重福出降。”并进而猜测他早有为蒙古人效力的打算（赵琦：《金元文际的儒士与文化》，页78）。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提到邱处机赴中亚途中，路过燕京时与之诗文唱和的文人中，与陈时可、赵昉并列者有“刘中用之。”（王国维校注本《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足见他与邱长春早就相识。

宋子贞《耶律公神道碑》提到：耶律楚材“乃奏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如燕京陈时可、宣德路刘中，皆天下之选。”——《元文类》，卷57，四部丛刊本。

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昔我太宗皇帝平金之四年，干戈甫定，朝廷草创，即遣断事官朮忽乃、宣差山西东路征收课税所刘中，巡行郡国，程试故金遗士，中选者复其家，盖兴文以为治，储材以待用，已造端于斯焉。”——《滋溪文稿》卷3，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页28。

又同上书卷29《题咸淳四年（1268）进士题名》：“我国家初定中原，岁次丁酉（1237）诏遣断事官朮虎乃、宣差山西东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刘中，遍诣诸路收金遗士，程试所学，以复其家。”此事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至正集》，卷44，清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第95册）与《庙学典礼》卷1《选试儒人免差》条亦有记载（王颋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丛刊，1992年，页9）。此人应即太宗二年任职十路课税所的刘中。

元好问提到：“戊戌（太宗十年，1238），天朝开举选，特诏宣德课税使刘公用之试诸道进士，君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刘公因委君考试云燕。俄从监试官北上谒领中书省。耶律公一见，大蒙赏，异力奏荐之，宣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遗山集》卷23；并见苏天爵：《廉访使杨文宪公》，《元名臣事略》卷13；陶宗仪：《辍耕录》卷1。

《元史艺文志》第四别集类“《刘中文集》。字正夫，渔阳人，左司都事。”与此刘中非同一人。

〔2〕刘桓、周立和二人待考。

〔3〕《元史》卷98《兵志》记至元十三年（1276）事时提到，有山东莱州酒税官名王贞（标点本，页2516），虞集提到，至治年有枢密院史名王贞（《道园学古录》卷20《王贞传》），此外元代文献中还可检出几位名贞者，均非此人。

太原[1]，杨简[2]、高廷英[3]使平阳，王晋、贾从[4]使真定，张瑜[5]、王锐[6]使东平[7]，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

---

〔1〕此二人《耶律楚材传》有记载："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解。"（《元史》，卷146，标点本，页3462。）——〔明〕黄淮、杨士奇等辑《历代名臣奏议》卷152"用人"，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刻本。

〔2〕此人待考。

〔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载于《王国维遗书》第1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13），《过平阳高庭英索诗强为一绝》（见《湛然居士集》卷8）认为"高庭英"与高延英为同一人。这里的"高延英"或为"高廷英"之讹写。

〔4〕王晋、贾从两人待考。

〔5〕此人名见于金元时代数种文献，如《金史》卷129《王浩传》等。苏天爵《太师鲁国忠武王》："己卯（1219），以萧神特末儿为左司郎中，狼川张瑜为右司郎中"（《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见页5）中的"张瑜"即此人。又见于《孔氏祖庭广记》："宣差东平路万户严实、课税所长官张瑜申禀朝省，丞相领省耶律楚才重道出于特意，古燕义士萧元，素与朝廷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为师友，独肃公亲诣，以为先容，具道其所以然。儒教由此复兴"。——〔金〕孔元措辑，卷6，四部丛刊续编景蒙古本。

〔6〕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时京城吾道孙周楚卿、杨彪仲文、师谓才才卿、李士谦子进、刘中用之、陈时可秀玉、吴章德明、赵中立正卿、王锐威卿、赵昉德辉、孙锡天锡，此数君子，师寓玉虚，日所与唱和者也。"——卷下。《金史》中有金将名王锐者，当非此人。

〔7〕陈高华、史卫民指出《元史·食货志》和《元史·百官志》都记载着是益都路置征收课税所，而非东平。——见陈高华、史卫民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页40。

西、[1]李天翼[2]使济南。[3]是月，师攻潼关、蓝关[4]，不克。

---

〔1〕王德亨、侯显、夹谷永、程泰、田木西此五人待考。

〔2〕元好问辑《中州集》有"李警院天翼"条，记："李天翼，字辅之，固安人。贞佑二年进士，历荥阳长社，开封三县令，所在有治声。迁右警巡使。汴梁既下，侨寓聊城，落薄失次，无以为资。辟济南漕司，从事方凿圆枘，了不与世合。众口媒蘖，竟罹非命。天翼材具甚美，且有志于学，与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为流涕。予谓：天道悠远，良不可知。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亦自不泯也。"——辛集第8，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此人名见《耶律文正王》，载于《名臣事略》；并见《金史》卷129《王浩传》。

姚从吾在《元好问癸巳上耶律楚材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行事考》一文中对李天翼有扼要介绍（《姚从吾先生全集〔六〕：辽金元史论文〔中〕》，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页212）。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亦汇集其资料（凤凰出版社，2005年，页876–879）。

〔3〕阿布拉莫斯基对十路课税所长官人选简注如下：这里提到的人物中仅仅只有几位可大致确认：陈时可（参见注〔114〕）与刘中在下文中被再次提及（页131、133），后者（按，即刘中）亦见于《中州记》（卷4，页17）；而此书还有李天翼的一则简注（卷8，页23）；王贞见于《道园学古录》（卷20，页14），吕振与刘子振则为《耶律楚材传》（《元史》卷146，页14）所再度提及。（Nur über einige der hier genannten Personen konnte näheres festgestellt warden: Ch'en-shih-k'o 〔s. Anm. 114〕 und Liu Chung warden im folgenden nochmals erwäht 〔S. 131 und 133〕, letzterer auch im Chung-chou-chi 4, 17v; auch über Li-T'ien-I gibt es in diesem Werk eine kurze Notiz 〔8, 23v〕; Wang Chen wird in *Tao-yüan-hsüeh-ku-lu*, 20, 14e, Lü Chen und Liu Tzu-chen warden in der Biographie von Yeh-lü Ch'u-ts'ai, YS 146, 8v, nochmals erwähnt.）——《太宗纪》德译，页140，注（30）。按，虞集所记王贞与此王贞非同一人，阿布莫夫斯基误。

〔4〕阿布拉莫斯基对潼关与蓝关注曰：黄河河曲的著名关隘（Die bakannten Passfestungen im Huang-ho-Knick）——《太宗纪》德译，页140，注（31）。按，蓝关距黄河河曲甚远，其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蓝关镇，距市区22公里。东南以秦岭为界与渭南、华县、洛南、商州、柞水等县市相望，北部以横岭与临潼区为邻，西部与长安区、灞桥区接壤。

十二月，拔天胜寨[1]及韩城[2]、蒲城[3]。

（原刊于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屠寄注曰："《金志》无天胜寨，有天圣寨，属镇戎，非当日冲。"——《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页5。

阿布拉莫斯基表示：天胜今地无法确定（T'ien-sheng konnte nicht localisiert werden）——《太宗纪》德译，页140，注（32）。

查《金史》卷118《燕宁传》提到："燕宁，初为莒州提控，守天胜寨，与益都田琢、东平蒙古纲相依为辅车之势。山东虽残破，犹倚三人为重。"又，同书《金史》卷102《蒙古纲传》记兴定五年（1221）"是岁，燕宁战死。纲奏：'宁所居天胜寨，乃益都险要之地。宁尝招降群盗胡七、胡八，用为牙校，委以腹心，群盗皆有归志。及宁死，复怀顾望，胡七、胡八亦反侧不安。臣以提控孙邦佐世居泰安，众心所属，遂署招抚使。以提控黄掴兀也充总领，副之。此当先奏可，顾事势危迫，故辄授之。'燕宁死而纲势孤矣。"

天胜寨遗址位于今山东泰安泰山景区。

[2]治今陕西韩城市。

[3]治今陕西蒲城县。《元史》卷115《睿宗传》："明年庚寅（1230）秋，太宗伐金，命拖雷帅师以从，破天城堡，拔蒲城县，闻金平章合达、参政蒲阿守西边，遂渡河，攻凤翔。会前兵战不利，从太宗援之，合达乃退。"——标点本，页2885。

3 《元史·太宗纪》太宗三年以后记事笺证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1]。

〔1〕《考异》卷86：据《金史》，凤翔之陷在四月，非二月也。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此时不应有攻下河中事。《本证》卷1，证误1：案，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二月未尝下河中也。

《圣武亲征录》："辛卯(1231)春二月，遂克凤翔，又克洛阳、河中数处城邑而还。"——〔清〕何秋涛校正：《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清光绪小沤巢刻本，王国维校注并跋，现藏北京图书馆。《蒙古史料四种》本中无"二月"。又，《圣武亲征录》："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金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市。

《永乐大典》卷10889录元明善《清河集》中《按竺迩神道碑》："辛卯，大军复围金凤翔。公攻西南陬，城陷，追斩守将刘兴哥。从击西和。宋将强俊壁数万人，清野以老我师。公将死士诟城下挑战诱俊。俊怒击我，公佯北，贼逐利去城稍远，奇兵入夺其城，要其归师。贼亦殊死战，斩首数千级，生获俊。余众退保仇池，击之乃溃。"

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1]。命拖雷出师宝鸡[2]。遣搠不罕

[1]《圣武亲征录》："避暑于官山。"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3)：《辽志》："丰州天德军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迹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张鹏《使俄罗斯行程录》："叶不孙郭儿地稍平，衍清水北流有九十九泉，元太宗尝避暑于此，其水发源官山，流为黑河，云是蒙古祖塚"。何秋涛注《圣武亲征录》时提到："宫山当作官山。《纪》作九十九泉，当是一地。考《元一统志》，官山在废丰州东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即其地也，在今归化城境内。北魏《太祖纪》：天赐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即此。然《水经》水注又谓：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庙、沮阳故城。在今宣化府怀来县南，即《水经注》所称，乃妫水上源也。疑北魏有两九十九泉。"——〔清〕何秋涛校正：《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清光绪小沤巢刻本，王国维校注并跋，现藏北京图书馆。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3)：九十九泉位于官山；形成南穿今归绥县之黑河(《明一统志》卷22，页8；《蒙古游牧记》卷5，页5；《归绥县志》，页14)。《元朝秘史》节272提到，1231年窝阔台于失剌迭克秃儿，龙虎台(按，此地名《秘史》音写为失剌近克秃儿，旁注为龙虎台)驻夏。这与《元史》所述不一致，因为此地位于北京西北的南口(有时称居庸关)(Die Neunundneunzig Quellen befanden sich auf dem Kuan-shan; sie bilden den Hei-Fluss, der südlich vom heutigen *Kuei-sui-hsien* verläuft. 〔*Ming-i-t' ung-chih*, 22, 8r, *Meng-ku yu-mu-chi* 5, 5v, *Kuei-sui-hsien-chih*, 14r.〕 GG §272 berichtet, dass Ögedei den Sommer 1231 in Šira-dektur, Lung-hu-t' ai, verbracht habe. Dies stimmt nicht mit der Angabe im YS überein, da dieser Ort am Nan-kou-〔bzw. Chü-yung〕 Pass, nordwestlich von Peking liegt)——《太宗纪》德译，页140。

辽重熙十三年(1044)九月"壬申，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辽史》卷19《兴宗纪》。《元史》卷115《睿宗传》："辛卯(1231)春，破洛阳、河中诸城。太宗还官山。"——标点本，页2885。

据检索，近二十余年中有关"九十九泉"较为重要的研究有：李逸友：《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载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常谦：《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载于《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3期；张文生、曹永年：《隋炀帝所幸启民可汗牙帐今地考》，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03期；孟克巴雅尔：《九十九泉》，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导师白音查干，2006年6月；白音查干：《九十九泉与匈奴文化》，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S1期；孟克巴雅尔：《历史上的九十九泉》，载于《蒙古史研究》第10辑，2010年，等。

九十九泉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南、阴山北麓的辉腾锡勒草原，指此处为数众多的小湖。

[2]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4)：在官山的一次忽里台大会上确定，分两路攻金。此计谋出自金降人李昌国(《元史》卷115《拖雷传》，页1，参见注〔36〕)。拖雷应从南方发起进攻，因此必须通过宋境。试比较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页286。(Man hatte auf einem qurultai auf dem Kuan-shan beschlossen, die Chin von zwei Seiten anzugreifen. Der Plan dazu soll von Li Ch' ang-kuo 〔s. Anm. 36〕, einem Chin-Deserteur, stammen. 〔Biogr. von Tolui, YS 115, 1 v〕. Tolui sollte den Angriff von Süden her führen, und musste deswegen durch Sung-Gebiet ziehen. Vgl. auch O. Franke IV, S. 286.)——《太宗纪》德译，页140。

使宋假道，宋杀之。[1]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2]。

[1]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4)：在官山的一次忽里台大会上确定，分两路攻金。此计谋出自金降人李昌国(《元史》卷115《拖雷传》，页1，参见注[36])。拖雷应从南方发起进攻，因此必须通过宋境。试比较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页286。(Man hatte auf einem qurultai auf dem Kuan-shan beschlossen, die Chin von zwei Seiten anzugreifen. Der Plan dazu soll von Li Ch'ang-kuo [s. Anm. 36], einem Chin-Deserteur, stammen. [Biogr. von Tolui, YS 115, 1 v]. Tolui sollte den Angriff von Süden her führen, und musste deswegen durch Sung-Gebiet ziehen. Vgl. auch O. Franke IV, S. 286.)——《太宗纪》德译，页140。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5)表示此人不可考，仅提出有关汉字"搠"在元代的读音，参见伯希和1934年刊于《通报》第31期，页158。(Nicht zu identifizieren. Zur Aussprache "ch'o" für 搠, zur Yüan-Zeit, vgl. P. Pelliot, TP 31 [1934], S. 158)——《太宗纪》德译，页140。

其实有几种史料提及搠不罕使宋事。如《秘史》第251节提到：在后，成吉思汗差使臣主卜罕(中)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旁译)。其中之"主卜罕"，当即此人。《蒙韃备录》："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联辔闲，速不罕未尝不以好语相陪奉慰劳，且曰：'辛苦无管待，千万勿怪。'"——[宋]孟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韃备录〉笺证》，《蒙古史料四种校注》。按此记载，搠不罕为汪古人。[宋]魏了翁《应诏封事》："虏将[别]大赤辈已纵骑焚掠，出没吾地。而虏使速不罕方以议和留兴赵原，我使王良能、李大举方以报聘，诣鳳翔府。"——《鹤山全集》，卷18，"奏议"，四部丛刊景宋本(以下版本信息略)。同氏《故太府寺丞兼知兴元府利州路安抚郭公墓志铭》："四季正月，韃人又至，则径属他官往武休议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虏又出嫚书索粮二十万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速不罕诸人裴回兴赵原，而别大赤辈已纵骑焚掠，出没自如。制帅方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举诣鳳翔。"——《鹤山全集》，卷82，四部丛刊景宋本。《元史》卷115《睿宗传》："拖雷总右军自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涉宋人之境，沿汉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会于汴。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标点本，页2886。

关于这位搠不罕(Ĵubqan)，罗亦果有详论，见氏著《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下册，页909-910。(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with a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Commentary, vol. 2, Brill, Leiden-Boston, 2006, see pp.909-910.)以下简称《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下册。

[2]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6)：这里涉及的是李邦瑞，其传记在《元史》卷153，页12-13。其名字为昌国(国昌乃误)。此为他第三次使宋，为与之达成一项我们尚不详知内容的和议。参见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5卷，页154-155。(Es handelt sich hier um Li Pang-jui, dessen Biograpie im YS 153, 12v-13r steht. Sein persönlicher Namer war Ch'ang-kuo [Kuo-ch'ang is falsch!]. Dies war seine dritte Gesandtschaft zu den Sung, er handelte mit ihnen ein Abkommen aus, über das wir aber nichts genaueres erfahren. Siehe O. Franke V., pp.154-155.)——《太宗纪》德译，页140-141。阿布拉莫夫斯基证据甚为充分，查清代以来续《元史》诸家，包括屠寄均未发现《元史》此处之错误。李邦瑞与耶律楚材交往密切，《湛然居士文集》中保留了几首楚材与之唱和之诗，多可证其使宋事。详见卷153《李邦瑞传》。

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1]。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2]，镇海[3]为右丞相[4]。是月，以高丽杀使者，[5]命撒礼塔[6]率师讨之，取四十余城。高丽王㬚[7]遣其弟

---

〔1〕李涵：《宋辽金元史论集暨师友杂议》(2002年12月初版，页17-21)：在唐长儒先生的基础上，对元代中书省制度的演进有研究。

〔2〕《元史》卷157："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粘合重山为金金紫光禄大夫、中都留守粘合合答之孙，金大安三年(1211)人质蒙古宫廷，窝阔台在位时任中书左丞相。刘晓有研究，见《〈全元文〉整理质疑》，载于《文献》，2002年第1期。

〔3〕《元史》卷120有传。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9)：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页626中有其简传(Eine kurze Lebensbeschreibung findet sich in PELLIOT, Chrétiens, s. 628)——《太宗纪》德译，页141。

〔4〕《圣武亲征录》："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秋涛案：西京仍金旧名，本纪云幸云中是也。执事之人各执名位：兀都原作相，秋涛校改撒罕中书令，粘合重山右丞相，镇海左丞相。张石州曰：《纪》作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秋涛案：《镇海传》亦作右丞相。"——〔清〕何秋涛校正：《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清光绪小沤巢刻本，王国维校注并跋，现藏北京图书馆。

赵琦、周清澍：《蒙元时期的粘合家族与开府彰德》：壬辰年(1232)随邹伸之出使蒙古的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则说："其相四人：曰按只斛(黑鞑人，有谋而能断)，曰耶律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专理回回国事。"——《中华文史论》，2001年，第2期。按只斛，据王国维考证："彭氏所指，疑即《秘史》之额勒只吉歹。《秘史》续集卷2：'皇帝圣旨，众官人每着额勒知吉歹为长，依着额勒知吉歹的言语行事。'是太宗即位时，额勒知吉歹实为宰相。"额勒知吉歹与按只斛(eljigidei)是同一人名的不同汉译。以蒙古人(黑鞑人)为长是元朝任官的惯例，蒙古国时期更应如此。耶律楚才被称为中书令，王国维为了弥合《黑鞑事略》与《太宗纪》的矛盾，因此又推论说："明年，乃以耶律楚材代之。"但《太宗本纪》载始立中书省是在彭大雅使金的壬辰年的前一年辛卯，因此，不能以"明年(癸巳)乃以耶律楚材代之"来解释。……《重山传》称"耶律楚材为右丞相"，这与"中书令""中书侍郎"一样，只是汉语对比阇赤的不同称译。耶律楚材是1218年受成吉思汗之召至漠北，或许是因为耶律楚材是契丹帝裔，契丹与蒙古同为金人世仇，所以位居从敌国来附的"金源贵族"粘合重山之上。

〔5〕指太祖十九年(1224)蒙古使臣著古欤被杀事。

〔6〕《本证》卷3，证名1：撒里答、吾也而传。撒儿台、耶律留哥传。撒里台、王荣祖传。撒里塔、洪福源传。传又作撒里苔、撒礼塔。撒里塔，阿布拉莫夫斯斯注(41)已将此名还原为蒙古语Sartaq——《太宗纪》德译，页141。此名意为"回回"。

〔7〕高丽高宗。

怀安公请降。[1]撒礼塔[2]承制设官分镇其地，乃还。[3]

---

〔1〕标点本校勘记(1)：怀安公，本书卷149王珣传附王荣祖传、高丽史卷90宗室传均作"淮安公"，当以作"淮"为是。——页40。

本书卷208《外夷·高丽传》：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礼答征其国，国人洪福源迎降于军，福源所率编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来师者——标点本，页4680。

〔朝鲜〕权近等撰：《朝鲜史略》："蒙古兵分屯京城四门外，王遣闵曦往犒，仍结和亲。时元帅萨喇达(按，撒礼塔)驻军安北都护府，三军皆降。王遣淮安公侹讲和。初蒙使珠格尔(按，爪古与)还国道死，蒙人疑我杀之，构为衅。"——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明万历四十五年赵宦光、葛一龙等刻本。淮安公侹在《高丽史》中出现多次，兹不一一赘引。

〔2〕《圣武亲征录》："自此使遣撒哈塔火儿赤征收高丽，克四十余城还。"王国维注："征高丽者，《秘史》为札剌亦儿歹豁里赤，与此撒哈塔火儿赤盖一人也。《元史·塔出传》：蒙古札剌儿氏，父札剌台，历事太祖、宪宗"。秋涛案：《纪》作撒礼塔"——〔清〕何秋涛校正：《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清光绪小沤巢刻本，王国维校注并跋，现藏北京图书馆。阿布拉莫夫斯基亦以为"撒礼塔"即前述《元史》卷133《塔出传》所提及之塔出之父"札剌台"(详论见下)，但他注意到此传未提及其征高丽之役(Dort wird aber nicht von seinem Feldzug nach Korea berichtet)——《太宗纪》德译，页141，注(41)。其实《塔出传》言及札剌台征高丽之役，不过系之于甲寅年(元宪宗四年，1254)——《元史》卷133，标点本，页3223。

按，前已指出撒里里塔，可还原为蒙古语Sartaq，意为"回回"，与札剌台(Jalayirtai，蒙古语意为"札剌亦儿部男子")当非同一人名。《塔出传》明言札剌台征高丽事在甲寅年(元宪宗四年，1254)，与此处太宗三年征高丽应非一事。元代史料中有关撒里塔此次出征事，有如下记载：

"太宗三年，遣元帅撒里塔火里赤等讨之，王(暾)[瞮]降，置京、府、县七十二达鲁花赤而班师。"——《国朝文类》卷41《征伐·高丽》，四部丛刊本。

《元史》卷208《高丽传》："太宗三年(1231)八月，命撒礼塔征其国，国人洪福源迎降于军，得福源所率编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来师者。撒礼塔即与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儿秃与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瞮，瞮遣其弟怀安公王侹请和，许之。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标点本，页4608。其他有关记载，详后注。

此战郑麟趾的《高丽史》记载最详，其多处提及撒礼塔，如辛卯年(1231)八月壬午："蒙古元帅撒礼塔围咸新镇，屠铁州。……曦与兵马判官员外郎崔桂年承三军指挥往犒。蒙兵有一元帅，自称权皇帝，名撒礼塔，坐毡庐，饰以锦绣，列妇人左右。乃曰：'汝国能固守则固守，能投拜则投拜，能对战则对战，速决了也。汝职为何？'对曰：'分台官人。'曰：'汝是小官人。大官人速来降。'"——《高丽史》，世家，卷23，《高宗二》，明崇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现藏云南大学图书馆(以下版本信息略)。

〔3〕《元高丽纪事》(页3)：九月，上命将撒里塔火里赤，领兵(争)[征]讨。国人洪福源迎军投降，附近州郡亦有来归者。撒里塔火里赤，即与洪福源攻未附州郡。撒里塔火里赤又差阿儿秃与福源，赴其王京招其主王瞮。瞮遣弟怀安公请和，随置王京及诸州郡达鲁火赤七十二人镇抚，即班师。

冬十月乙(酉)[卯],[1]帝围河中。[2]十二月[3]己未,拔之。[4]

〔1〕标点本校勘记(2):冬十月乙(酉)[卯],是月癸丑朔,无乙酉日。圣武亲征录有"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按十月初三日为乙卯,十二月初八日为己未,与下文"十二月己未,拔之"合。今据改——页40。

〔2〕《元高丽纪事》(页3)对次月记:"十一月二十九日,元帅蒲桃、迪巨、唐古等三人,领兵至其王京城。高丽瞰遣监察御史闵曦、郎中宋国瞻等,奉牛酒迎之。"《元史·洪福源传》:"十一月,元帅蒲桃、迪巨、唐古等领兵至其王京,瞰遣使奉牛酒迎之。"——标点本,页4608。

〔3〕对于此月高丽之役,《元高丽纪事》(页3):十二月一日(按,壬子),高丽王瞰遣曦,诣元帅行营问劳。二日,曦与元帅下四十四人,入王城,付文牒。五日(按,丙辰),国王瞰遣怀安公王侹、军器监宋国瞻等,诣撒里塔屯所犒师。《元史·洪福源传》:"十二月一日,复遣使劳元帅于行营。明日,其使人与元帅所遣人四十余辈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瞰遣王侹等诣撒礼塔屯所犒师。"——标点本,页4608-4609。

记载最详者为《高丽史》:"十二月壬子(按,初一日)朔,蒙兵分屯京城四门外,且攻兴王寺。遣御史闵曦犒之,结和亲。翼日,曦又往蒙古屯所,偕蒙使二人、下节二十人以来。命知阁门事崔珙为接伴使,备仪仗出迎宣义门外。入宣恩馆时,撒礼塔屯安北都护府,亦遣使者三人来谕讲和。……丙辰(按,初五日),遣淮安公侹以土物遗撒礼塔。……丁卯(按,初六日),遣人遗唐古、迪巨及撒礼塔之子银各五斤,纻布十匹,粗布二千匹,马鞴、马缨等物。甲戌(按,十六日)将军赵叔昌与撒礼塔所遣蒙使九人持牒来。……三军阵,主诣降权皇帝所。……庚辰(按,二十二日)蒙古使赍国赆黄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领、马百七十匹而还。遣将军曹时着以黄金十二斤八两、多般金酒器重七斤、白银二十九斤、多般银酒食器重四百三十七斤、银瓶一百十六口、纱罗锦绣衣十六、紫纱袄子二、银镀金腰带二及细布襦衣二千、獭皮七十五领、金饰鞍子具马一匹、散马一百五十匹遗撒礼塔。"——《高丽史》,世家,卷23,《高宗二》。

〔4〕《大元仓库记》(《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2集,圣仓明智大学刊行,以下版本信息略,页9)记此年或次年事:辛卯(按太宗三年,1231)、壬辰年(按太宗四年,1232),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令陈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一时漕运毋违慢。其通州北起仓,据见可收物处。仰达鲁花赤管民官,备木植差夫,令和伯拨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铁匠一人速修,及差守仓夫役三人,半年交替,如失盗就令均陪。

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1]渡河。[2]庚寅，拖雷渡汉江[3]，遣使来报，即诏诸军进发[4]。甲午，次郑州。金防城提控马

---

〔1〕《圣武亲征录》记太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取河中府后："时有西夏人速哥者，来告黄河有白坡可渡，从其言。"屠寄《蒙兀儿史记》称速哥为克列亦惕（按，克烈）人——《斡歌歹可汗纪》，页6。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3)：在河南，今孟津西南——《太宗纪》德译，页141。

〔2〕《圣武亲征录》："壬辰（四年）春正月初六日，大兵毕渡，及获汉船七百余艘。"

《金史》：天兴元年(1232，按，此年本为正大九年，正月改元开兴，四月再改元天兴。)春正月"丙戌（按，正月初五，1232年1月28日），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丁亥（按，正月初六），长乐、撒合引兵至封丘而还。戊子（按，正月初七），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上书请斩长乐、撒合以肃军政，不从。都尉乌林答胡土一军自潼关入援，至偃师，闻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壬辰，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甲午（按，正月十三），修京城楼橹及守御备。"——卷17《哀宗纪》。

同书："正大九年正月戊子（按，正月初七，1232年1月30日），北兵以河中一军由洛阳东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县，河有石底，岁旱水不能寻丈。国初以三千骑由此路趋汴，是后县废为镇，宣宗南迁，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为忧，每冬日命洛阳一军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夺河阴官舟以济诸军。时胡土为破虏都尉，戍潼关，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师，闻白坡径渡之耗，直趋少室，夜至少林寺。"——卷111《乌林答胡土传》。

上述《哀宗纪》与《乌林答胡土传》所记白坡渡河日期差两日，《亲征录》与《金史》差一日。

《元史》卷119《塔察儿传》："太宗伐金，塔察儿从师，授行省兵马都元帅。分宿卫与诸王军士俾统之。下河东诸州郡，济河破潼关，取陕洛。辛卯，从围河中府，拔之。壬辰，从渡白坡。"——标点本，页2952。

〔3〕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4)：汉水此时大致为金宋边界。拖雷应是请求大军借道宋境的使臣被杀之后，越境向宋，并征服了彼处多个城池。此时他引所部军从南进攻南京（开封）。参见福兰阁：《中华帝国史》，卷4，页286。(Der Han-Fluss bildet zu dieser Zeit etwa die Granze zwischen Chin und Sung. Tolui hatte nach der Ermordung des Gesandten, der den durchzug der Truppen durch Sung-Gebiet erbitten sollten, die Granze nach Sung überschritten und dort mehrere Städte erobert. Nun führte er seine Truppen von Süden her zum Angriff auf Nan-ching (K'ai-feng). Siehe O. Franke, IV, S. 286.)——《太宗纪》德译，页141。

〔4〕《圣武亲征录》："太上皇遣将贵由报，集军兵等已渡汉江，上亦遣使于太上皇，曰：'汝等与敌连战日久，可来合战。'"

《金史》："戊辰，北兵渡汉江而北，诸将以为可乘其半渡击之，蒲阿不从。丙子，兵毕渡，战于禹山之前，北兵小却，营于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驿报，百官表贺，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先是，河南闻北兵出饶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险固，及闻敌已退，至有晏然不动者，不二三日游骑至，人无所逃，悉为捷书所误。"——卷112《完颜合答传》。

《元史》卷115《睿宗传》："乘骑浮渡汉水，遣夔曲涅率千骑驰白太宗。太宗方诣汉水，将分兵应之，会夔曲涅至，即遣慰谕拖雷，亟合兵焉。"——标点本，页2886。

伯坚[1]降，授伯坚金符，使守之。丙申，大雪。丁酉，又雪。次新郑。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2]之三峰，大败之，[3]获金将蒲

---

〔1〕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6)：有关此人未发现更多史料(Über ihn waren keine näheren Angabe zu finden)——《太宗纪》德译，页141。其实在史料中尚能找到几则有关马伯坚的记载：

《圣武亲征录》："上于正月十三日至郑州，守城马提控者以城降。"何秋涛注："本纪作马伯坚。"

《金史》：天兴元年(1232)春正月甲午"大元兵薄郑州，与白坡兵合，屯军元帅马伯坚以城降，防御使乌林答、咬住死之。"——卷17《哀宗纪》。

《元史》卷122《槊直腯鲁华传》："壬(申)[辰]正月，太宗自白(波)[坡]济河而南，睿宗由峭石滩涉汉而北。撒吉思卜华集西都水之舟，渡自河阴。至郑，郑守马伯坚降。"——标点本，页3014。

《元史》卷151《王善传》："壬辰，从征河南，至郑州。州将马伯坚素闻善名，登陴大呼曰：'藁城王元帅在军中否？愿以城降之。'善直前，免胄与语，伯坚果率众出降。善令军中秋毫无犯，民皆按堵，愿从善北渡者以万计授之土田，以安集之。"——标点本，页3573。

〔2〕今河南禹州市。

〔3〕《圣武亲征录》："太上皇既渡汉水，有金大将哈答秋涛案，《金史》《元史》俱作合达。麾下钦察者，逃来告：哈答伏兵于邓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会兵明烛而进，哈答、移剌闻知，入邓以避其锋。"

《金史》：天兴元年(1232)"乙未，大元游骑至汴城。丁酉，大雪，大元兵及两省军战钧州之三峰山。两省军大溃，合达、陈和尚、杨沃衍走钧州，城破，皆死之。枢密副使蒲阿就执，寻亦死。"——卷17《哀宗纪》。

同书卷112《完颜合答传》："九年正月丁酉，两省军溃于阳翟之三峰山。初，禹山之战，两军相拒，北军散漫而北，金军惧其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时北兵遣三千骑趋河上，已二十余日，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乃并山入阳翟。既行，北兵即袭之，且行且战，北兵伤折亦多。恒山一军为突骑三千所冲，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两省命收军。少之，雾散乃前，前一大涧，长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明日，至三峰山，遂溃，事载蒲阿传。合达知大势已去，欲下马战，而蒲阿已失所在。合达以数百骑走钧州，北兵堑其城外攻之，走门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发而杀之。时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赐以手诏，募人访之。及攻汴，乃扬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与合达耳。今合达为我杀，黄河为我有，不降何待？'

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张行信尝荐之曰：'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

同书同卷《移剌蒲阿传》："十二月，北兵济自汉江，两省军入邓州，议敌所从出，谓由光化截江战为便，放之渡而战为便、张惠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于北事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碛，且当往求之"，况今自来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旧卫州、扇车回纵出之。'定住、高、樊皆谓蒲阿此言为然。合达乃问按得木，木以为不然。军中以木北人，知其军情，此言为有理，然不能夺蒲阿之议。

顺阳留二十日，光化探骑至，云：'千骑已北渡'，两省是夜进军，比晓至禹山，探者续云：'北骑

(注释〔3〕转下页)

（注释〔3〕接上页）

已尽济'。癸酉，北军将近，两省立军高山，各分据地势，步迎于山前，骑屯于山后。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帅以两小旗前导来观，观竟不前，散如雁翅，转山麓出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进，辎重外余二万人。合达令诸军：'观今日事势，不当战，且待之。'俄而北骑突前，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北骑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亲绕甲骑后而突之，至于三，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帅以旗聚诸将，议良久。合达知北兵意向。时高英军方北顾，而北兵出其背拥之，英军动，合达几斩英，英复督军力战。北兵稍却观变，英军定，复拥樊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军殊死斗，乃却之。

北兵回阵，南向来路。两省复议：'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当拥之。'张惠主此议，蒲阿言：'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不从。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无一耗。两省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送及路人不绝，而亦无见者，岂南渡而归乎？己卯，逻骑乃知北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昼作食，夜不下马，望林中往来，不五六十步而不闻音响，其有谋可知矣。

初，禹山战罢，有二骑迷入营，问之，知北兵凡七头项，大将统之。复有诈降者十人，弊衣羸马泣诉艰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始悟其为觇骑也。

庚辰，两省议入邓就粮，辰巳间到林后，北兵忽来突，两省军迎击，交绥之际，北兵以百骑邀辎重而去，金兵几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惧军士迷路，鸣钟招之。樊泽屯城西，高英屯城东。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邓城下。北兵不与战，大将使来索酒，两省与之二十瓶。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步十三万，骑帅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将按忒木，忠孝军总领夹谷爱答、内族达鲁欢，总领夹谷移特剌，提控步军临淄郡王张惠，殄寇都尉完颜阿排、高英、樊泽，中军陈和尚，与恒山公武仙、杨沃衍军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鸦路，北兵以三千骑尾之，遂驻营待杨武。

杨武至，知申、裕两州已降。七日至夜，议北骑明日当复袭我，彼止骑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乃伏骑五十于邓州道。明日军行，北骑袭之如故，金以万人拥之而东，伏发，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顿安皋。辛卯，宿鸦路、鲁山。河西军已献申、裕，拥老幼、牛羊取鸦路，金军适值之，夺其牛羊饷军。癸巳，望钧州，至沙河，北骑五千待于河北，金军夺桥以过，北军即西首敛避。金军纵击，北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北军复渡河来袭。金军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变雪。北兵增及万人，且行且战，致黄榆店，望钧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进，盘营三日。丙申，一近侍入军中传旨，集诸帅听处分，制旨云：'两省军悉赴京师，我御门犒军，换易御马，然后出战未晚。'复有密旨云：'近知张家湾透漏二三百骑，已迁卫、孟两州，两省当常切防备。'领旨讫，蒲阿拂袖而起，合达欲再议，蒲阿言：'止此而已，复何所议。'盖已夺魄矣。军即行。

北军自北渡者毕集，前后以大树塞其军路，沃衍军夺路，得之。合达又议陈和尚先拥山上大势，比再整顿，金军已接竹林，去钧州止十余里矣。金军遂进，北军果却三峰之东北、西南。武、高前锋拥其西南，杨、樊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东。张惠、按得(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万，约厚二十里。按得木与张惠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骨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与河北军合，四周

（注释〔3〕转下页）

(注释〔3〕接上页)

边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崩山,忽天气开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

武仙率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樊、张三军争路,北兵围之数重,及高英残兵共战于柿林村南,沃衍、泽、英皆死,惟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蒲阿走京师,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

《永乐大典》卷10889录元明善《清河集》中《按竺迩神道碑》:"睿宗分兵迂道,并山南间入金境。公前驱趣散关,宋人已烧绝栈道。乃由两当出鱼关,军沔州。而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议使如渊假道。公在行,语如渊曰:宋雠金若何?胡不肆我兵锋,一洗国耻?我欲假南郑道,道洋、金牧马唐邓,与王师会,剿金孱王,宋因之剂其利。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如渊即输刍粮,使百人导之东。适汉水可涉,达邓西,破小关子,金人大骇神我。其平章完颜合答、枢密使移剌蒲[阿]、元帅十七,都尉、兵数十万,御师于邓,不与战,直蹴钧州。金师陈三峰山下,会大雪,交战。公先所部摧其前拒,众乘之奋,金师败绩。由是金不能国。睿宗以玉杯盘生口二十赏公假道功。"

《元史》卷121《按竺迩传》改为:"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按竺迩假道于如渊曰:'宋雠金久矣,何不从我兵锋,一洗国耻。今欲假道南郑,由金、洋达唐、邓,会大兵以灭金,岂独为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渊度我军压境,势不徒还,遂遣人导我师由武休关东抵邓州,西破小关,金人大骇,谓我军自天而下。其平章完颜合达、枢密使移剌蒲阿帅十七都尉,兵数十万,相拒于邓。我师不与战,直趣钧州,与亲王按赤台等兵合,阵三峰山下。会天大雪,金兵成列。按竺迩先率所部精兵,迎击于前,诸军乘之,金师败绩。"——标点本,页2983-2984。

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壬辰,从睿宗大破金兵于钧州三峰山,尽殲其众,金人自是不复能军。睿宗表其功于太宗"。——《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续稿25,四部丛刊本;并见《元史》卷121《抄思传》:"壬辰,兵次钧州,金兵垒于三峰山,抄思察其营壁不坚,夜领精骑袭之,金兵惊扰,遂乘击之,拔三峰山。睿宗以抄思功闻于朝。"——标点本,页2993。

元人郝经有诗《三峰山行》:

朔方善为干腹兵,岂肯掠地还攻城。北王战罢马首回,十年大军不南行。
西域既定杀李王,疾雷破桂关中惊。鸷鸟匿形深且蟠,汴梁不悟空椎冰。
小关幸胜未足多,举朝刻日期中兴。都人尽喜识者惧,俄闻遶出西南路。
突骑一夜过散關,汉江便着皮船渡。襄阳有兵隔岸看,邓州无人浑不顾。
纵入腹心将安归,彼骑岂足当吾步。脱兔一去不可及,却兵洛涧苻坚误。
日日鏖战深且艰,我帅益忙敌亦闲。短兵相击数百里,孤穷转斗甲尽殷。
直向虎穴探虎子,既入重地宁肯还。扫境尽至欲一赌,前后百匝相回环。
就中真人有天命,跃马直上三峰山。黑风吹沙河水竭,六合乾坤一片雪。
万里投会卷土来,铁水一池声势接。丞相举鞭摔黏言,大事已去吾死节。
彦章虽难敌五王,并命入敌身与决。逆风生堑人自战,冰满刀头冻枪折。
一败涂地真可哀,钧台变作髑髅血。二十万人皆死国,至今白骨生青苔。

(注释〔3〕转下页)

（注释〔3〕接上页）

壕堑已平不放箭，城门着炮犹自开。大臣壅蔽骨肉疏。事急又送曹王来。

至了不去误国贼，向非汝南死社稷，欲为靖康不可得。

——《陵川集》卷11，歌诗，〔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册91，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无出版时间（以下版本信息略），页572。

同氏《合达平章》：

乘舆已播迁，乾坤在孤注。维时忠荩有哈达，应敌东西无定住。

职兼将相为国桢，身系安危如尚父。贼国布色深冒嫉，小臣献谗极谄附。

飞章诬陷罢兵柄，几把功臣荐刀锯。子仪召入奉朝请，彦章不用大事去。

事急复起使迎敌，即日上道无喜怒。并命鏖战来报捷，每从中制肘屡掣。

峣关透漏斡腹出，大河绝流两军接。天欲亡人不可为，六合横倾数丈雪。

人自为战身伴僵，空拳无皮冻枪折。力竭慷慨赴敌死，死恨不能存社稷。

至今三峰山，白骨尽衔铁。老臣一片忧国心，惨淡悲风与寒月。

——《陵川集》卷11，页574。

又同氏《仲德行院》：

士穷见节义，国乱出忠勇。仲德帝室胄，虎文将家种。

俨俨静且深，辨事不赖宠。帝闻彭城有逆节，诏公密取不敢泄。

临行斩首挂马鞍，万众不譁皆妥帖。仗钺东南当一面，冠去看书冠来战。

中枢大府无人声，儒将威名满淮甸。甫临秦巩遮长安，大军失利三峰山。

径穿敌垒数千里，乘舆已出空泪潸。过门不入急赴难，犯围直向黄河岸。

照碧堂空幸汝南，贼臣新诛卫士散。自古未有降天子，君臣血视付一死。

夫人徒步自拔来，命妇般炮自我始。夫妇死国无与侔，至今闻者涕泗流。

——《陵川集》卷11，页575。

《元史》卷119《塔思传》（按，即查剌温）："壬辰春，睿宗与金兵相拒于汝、汉间，金步骑二十万，帝命塔思与亲王按赤台、口温不花合军先进渡河，以为声援。至三峰山，与睿宗兵合，金兵成列，将战，会大雪，分兵四出，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锋，诸军继进，大败金兵，擒移剌蒲瓦，完颜合达单骑走钧州，追斩之，遂拔钧州。"——标点本，页2938。

同书卷149《郭德海传》（郭宝玉子）"冬十一月，至钧州。辛卯春正月，睿宗军由洛阳来会于三峰山，金人沟地立军围之。睿宗令军中祈雪，又烧羊胛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沟中军僵立，刀槊冻不能举。我军冲围而出，金人死者三十余万，其帅完颜哈达、移剌蒲兀走匿浮图上，德海命掘浮图基，出其柱而焚之。"——标点本，页3522-3523。

三峰山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战例，较为重要的研究文章有：陈高华：《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载于《文史哲》，1981年03期；朱玲玲：《蒙金三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载于《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04期；石坚军：《蒙金三峰山之战新探》，载于《兰州学刊》，2010年第10期，等。

阿。[1]戊戌，帝至三峰。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2]遂下

---

〔1〕蒲阿即移剌蒲阿，与完颜合答均为金军统帅，两人传记均见《金史》卷112。《本证》卷37，证名1：蒲瓦、塔思、史天倪、李冶传。蒲兀、郭德海传。

《圣武亲征录》："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钧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温不花、国王答思将军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与哈答、移剌合战于三峰山，大败之，遂擒移剌。"

耶律铸："《战三封》太宗皇帝马渡大河，睿宗皇帝马渡汉江，与金人大战于三封之原。会雪蔽天金人大溃也。豁然雪霁，月色如昼，一袭殆尽，因志其事云：

河汉吞声自请平，冷光横绝见长庚。是岁长庚见，数月不灭。

纛挥戈去日西坠，触折柱来天北倾。

威控望舒延苦战，势征滕六纵疑兵获泽阳之美，尝谓：是日雪之作也，惟见旌旗降马，蔽天而下皆北兵也。予怪其言，而访诸他人，一如其说。

若非不世云龙变，一举谁收万古名。

——《双溪醉隐集》，卷4，民国辽海丛书本。

《元史》卷115《睿宗传》："拖雷既渡汉，金大将合达设伏二十余万于邓州之西，据隘待之。时拖雷兵不满四万，及得谍报，乃悉留辎重，轻骑以进。十二月丙子，及金人战于禹山，佯北以诱之，金人不动。拖雷举火夜行，金合达闻其且至，退保邓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将而北，以三千骑命札剌等率之为殿。明旦，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拖雷以札剌失律，罢之，而以野里知给歹代焉。未几，败金军。

壬辰春，合达等知拖雷已北，合步骑十五万蹑其后。拖雷按兵，遣其将忽都忽等诱之，日且暮，令军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噪以扰之。'太宗时亦渡河，遣亲王口温不花等将万余骑来会。天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拖雷即欲击之，诸将请俟太宗至破之未晚。拖雷曰：'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况大敌在前，敢以遗君父乎。'遂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余众迸走睢州，伏兵起，又败之。合达走钧州，仅遗数百骑。蒲阿走汴，至望京桥，复禽获之。"——标点本，页2886-2887。

〔2〕《本证》卷37，证名1：合(鞑鞑)[达](据点校本元史改)雪不台传。哈达、郭德海传。合答、李冶传。

《圣武亲征录》："十七日上行视战所，嘉之。二十一日克钧州，哈答匿于地穴，亦擒之。"

参与三峰山之战的还有史天泽。王盘《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记："壬辰岁，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趋阳翟与睿宗相会，破合答军于三峰山。"——《元文类》，卷58，四部丛刊本。

《元史》卷115《睿宗传》："太宗寻至，按行战地，顾谓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诸侯王进曰：'诚如圣谕，然拖雷之功，著在社稷。'盖又指其定册云尔。拖雷从容对曰：'臣何功之有，此天之威，皇帝之福也。'闻者服其不伐。从太宗攻钧州，拔之，获合达。"——标点本，页2887。

金朝方面的主要将领，非汉文史料《秘史》与波斯史籍亦有提及。据志费尼记载，为 قدای رنکو (QDAY RNKW)与 قمر نکودر (QMR NKWDR)两人。《秘史》节251记为三人"亦列(Ile)、合答(Qada)、豁孛格秃儿(Höbögetür)"。

志费尼书的英译者据伯希和的意见将 قدای رنکو (QDAY RNKW)校正为 قدای سنکم (QDAY SNKM)，读为 Qadāy senggüm，并释为"合答将军"；至于 قمر نکودر (QMR NKWDR)，柯立甫有两种

(注释〔2〕转下页)

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睢、永等州。[1]

三月,命速不台等围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2]入质。帝还,留速不台守河南。[3]

(接上页注释〔2〕)

考虑。其一是将它读为Temür Negüder,但他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即将此名与前《秘史》提到的最后一位金将豁孛格秃儿(Höbögetür)相勘同。——《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30,注(5)。

至于《秘史》所记之三人,罗亦果有详论,即亦列(Ile)即移剌,乃耶律之另称,指移剌蒲阿;合答(Qada)即完颜合答;而豁孛格秃儿(Höbögetür),他引那柯通世之意见,以为即完颜陈和尚。——罗亦果:《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下册,页911-912。

〔1〕《圣武亲征录》:"又克昌州、廓州、嵩州、曹州、陕州、洛阳、浚州、武州、易州、邓州、应州、寿州、遂州、禁州等来降。秋涛案,《本纪》云: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颍、寿、睢、永等州县,与此多异。考金时河南无昌、廓、易、应、遂、禁等州,疑昌、廓即商、虢之音讹,应即颍之音讹,遂即睢之音讹,禁即永之音讹。余未详也。"阿布拉莫夫斯基未注意到这些地名有误,见《太宗纪》德译,页141,注(52)。

有关本月征高丽事,《元高丽纪事》(叶3):"四年壬辰正月,遣使持玺书谕高丽。"《元史·洪福源传》:"四年(1232)正月,帝遣使以玺书谕瞰。"——标点本,页4609。

〔2〕标点本校勘记(3):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入质,按金史卷17《哀宗纪》、卷93《宣宗诸子传》,讹可为荆王守纯子,金哀宗守绪之侄,此处称"弟",史文有误,页40-41。

刘祁《归潜志》:"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又完颜讹可,亦以能打球,号(杖)[板](据黄丕烈、施国祁校本改)子元帅者。"——卷6,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64。"完颜讹可"称"板子讹可"亦见于其他史料,如《金史》卷17《哀宗纪上》:八年十二月"河中府破,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死之。元帅板子讹可提败卒三千走阌乡。诏赦将佐以下,杖讹可二百以死。"同书卷101《内族讹可传》:"完颜讹可,内族也,时有两讹可,皆护卫出身。一曰草火讹可,每得贼,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讹可,尝误以宫中牙牌报班齐者为板子,故时人各以是目之。"

〔3〕《圣武亲征录》:"速不歹拔(相)[都]、忒木[歹]火儿赤、贵由拔(相)[都]、塔察儿等适与金战,金遣兄'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质,我军遂退,留速不台拔(相)[都]以兵三万守镇河南。"日本学者堤一昭对此有考证——《忽必烈政权的建立与速不台家族》,张永江译自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8卷第1号,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第2期,页9。

至于此年高丽情况,《元高丽纪事》(页4):"三月,高丽遣中郎将池义源、录事洪臣源、金谦等,赍国赆文牒,送撒里塔屯所。"《元史》卷208《高丽传》:"三月,瞰遣中郎将池义源,录事洪巨源、金谦等赍国赆牒文送撒礼塔屯所。"——标点本,页4609。

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1]高丽叛，杀所置官吏，徙居江华岛。[2]

---

〔1〕《圣武亲征录》:"上与太上皇北渡河，避暑于官山。"

《睿宗拖雷列传》:"出北口住夏于官山。"《特薛禅传》:"葬官人山。"《金志》:"西京路大同府宣宁县有官山。"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云:"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3。

〔2〕《元高丽纪事》(页4):"四月，国王瞮遣将军赵叔璋、御史薛顺等，奉表入朝。"《元史》卷208《高丽传》:"四月，瞮遣其将军赵叔(章)[昌]、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标点本，页4609。

《元高丽纪事》(页4):"五月，复降旨谕高丽。"《元史》卷208《高丽传》:"五月，复下诏谕之。"——标点本，页4609。

《元高丽纪事》(页4):"六月，本国叛，杀各县达鲁花赤，率王京及诸州郡人民，窜与海岛拒守。洪福源集地界四十余州县失散人民保聚。撒里塔火里赤，中流失卒。别将铁哥火里赤领兵回。其已招降之地，复令福源管领，屯于各处。"《元文类·征伐·高丽》:太宗"四年(1232)六月，杀达鲁花赤而叛，保海岛。"——卷41，四部丛刊本。《圣武亲征录》:"是年，高丽复叛，再命撒儿搭火儿赤征收。"

《元史》卷154《洪福源传》:"壬辰夏六月，高丽复叛，杀所置达鲁花赤，悉驱国人入据江华岛。"——标点本，页3627-3628。同书卷208《高丽传》:"六月，瞮尽杀朝廷所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诸州县民窜海岛。洪福源集余民保聚，以俟大兵。"——标点本，页4609。

〔朝鲜〕权近等撰《朝鲜史略》:"崔瑀胁王迁都江华。杀指谕金世冲。瑀欲迁都以避蒙兵，与宰枢议于其第。人情安土重迁，然畏瑀，无敢言者。俞承旦极言其不可，世冲排门而入诘瑀迁都之误，瑀怒杀之。王发开京，入御江华客馆。"——卷8，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明万历四十五年赵宧光、葛一龙等刻本。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3):明人所称觉华岛即其地也。《提纲》卷1:"海西经松山、杏山，又西经宁远县东南水口口东，有桃花、菊花二岛。"菊花即明觉华岛也。阿布拉莫夫斯注(55):此岛位于汉江入海口，汉城/首尔西南(Die Insel ist der Mündung des Hanggang vorgelagert, südöstlich von Seoul)——《太宗纪》德译，页141。

至于此月其他政事，《大元马政记》"马政杂例"(《广仓学窘丛书》铅印本，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民国5年〔1916〕，甲类第2集，以下版本信息略，叶33):"太宗皇帝四年壬辰六月二十四日，圣旨：谕西京脱瑞勾索等，即目见阙饮马槽。除东胜、云内、丰州外，依验本路见管户，计一千六百二十七户。每户办槽一具，长五尺，阔一尺四寸，蒙古中样。各处备车牛，限七月十日以内赴斡鲁朵送纳，不得违滞。如违，断按荅奚罪。准此。"

《大元毡罽工物记》"杂用"(《广仓学窘丛书》铅印本，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民国5年(1916)，甲类第2集，以下版本信息略，叶，):"太宗皇帝四年壬辰六月，敕谕丰州云内、东胜二州达鲁花赤官员人等，今差毡匠诣彼居。止岁织韩耳朵大毡四片，长一丈六尺。给以羊毛五百斤、驼毛一百斤及染颜色物料，验三州各管。见在军数均科外，旧欠羊驼毛并今岁者就纳足之。后依例科，取毯匠达鲁花赤都束并诸匠家属三十人，续添二十五，计口五十五，人日支米一升，于云内支付，就报宣差征收禄税所，于秋税内克除。云内州官应付大屋、二门□木二株，长一丈四尺。造毕驿递斡耳朵送纳。"

秋七月，遣唐庆使金谕降，金杀之。[1]

〔1〕《圣武亲征录》：太宗四年“秋七月，上遣唐庆使金促降，因被杀之。”

唐庆使金事，亦见于《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秋七月，北兵遣唐庆等来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当自来好议之。’末帝托疾，卧御榻上，见庆等掉臂上殿，不为礼。致来旨毕，仍有不逊言，近侍皆切齿。既归馆，饷劳。是夕，飞虎军数辈，愤庆等无礼，且以为和好终不能成，不若杀之快众心。夜中持兵人馆，大噪，杀庆等。馆伴使奥屯按出虎及画二人亦死。案明抄本及聚珍本画皆作昼。迟明，宰执趋赴馆视之，军士露刃诣马前请罪。宰相惶遽慰劳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赏。京师细民皆驩呼踊跃，以为太平，识者知其祸不可解矣。”——卷11，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见页124。

《金史》卷18《哀宗纪》：天兴元年“甲申（七月五日），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诏贳其罪，和议遂绝。”同书卷44《兵志》：“此外招集义军，名曰忠义，要皆燕、赵亡命，虽获近用，终不可制。异时擅杀北使唐庆，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另，〔宋〕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卷26《义宗皇帝》：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春，天使复至，命帝黜尊号，拜诏称臣，去冠冕，髡剔发，为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难之。防城提辖张玉饵‘飞虎军’三百人为变。”——《〈大金国志〉校证》，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页363。

唐庆曾于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及次年两次使金，《元史》卷1《太祖纪》：十二月“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责岁币于金。”次年“五月遣唐庆等使金。”——标点本，页24。《金史》卷111《纥石烈牙吾塔传》：正大“六年（1228）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栾为小使，径来行省。”（标点本，页2459）此处将唐庆使金事置于正大六年（1228），有待研究。

八月，撒礼塔复征高丽，中矢卒。[1]金参政完颜思烈[2]、恒山公武仙[3]救南京，诸军与战，败之。[4]

---

〔1〕四年(1232)"八月又遣撒里塔讨之，中流矢，军回。"——《国朝文类》卷41《征伐·高丽》，四部丛刊本。

《元史》卷154《洪福源传》："秋八月，太宗复遣撒礼塔将兵来讨，福源尽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处仁城，撒礼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还，唯福源留屯。"——标点本，页3627-3628。

《元史》卷208《高丽传》："八月，复遣撒礼塔领兵讨之，至王京南，攻其处仁城，中流矢卒。别将铁哥以军还。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领之。"——标点本，页4609。

《高丽史》："撒礼塔攻处仁城，有一僧避兵在城中，射杀之。"——世家卷23。又同书"金允侯，高宗时人，尝为僧，住白岘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乱于处仁城。蒙古元帅撒礼塔来攻城，允侯射杀之。王嘉其功，授上将军，允侯让功于人，曰：'当战时，吾无弓箭，岂敢虚受重赏。'固辞不受，乃改摄郎将。"——列传卷17《金允侯传》。

朝鲜权近等撰《朝鲜史略》："金允侯射杀蒙古元帅萨喇达(撒礼塔?)。允侯尝为僧，避乱处仁城。萨喇达来攻，允侯射杀之。王嘉其功，授上将军，不受，乃改摄郎将。"——卷8，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明万历四十五年赵宦光、葛一龙等刻本。

〔2〕元好问《照了居士王彧》："正大壬辰，参知政事宗室思烈行台洛阳，以知非(笔者按，知非为王彧字)有重名，力致之，使参议台事。城陷，不知所终。"——元好问辑：《中州集》，壬集卷9，四部丛刊景元刊本(以下版本信息略)。同氏：《李讲议汾》："既而恒山(笔者按，即武仙)与参知政事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长源言论，欲除之。遁之泌阳，竟为所害。"——《中州集》，癸集卷9。

完颜思烈，《金史》中多见，《金史》有传，见卷149《内族思烈传》："内族思烈，南阳郡王襄之子也。资性详雅，颇知书史，自五、六岁入宫，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当宣宗入承大统，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龀，尝涕泣跪抱帝膝致说曰：'愿早诛权臣，以靖王室。'帝急顾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后由提点近侍局迁都点检。天兴元年，汴京被围，哀宗以思烈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邓州。会武仙引兵入援，于是思烈率诸军发自汝州过密县，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涧之策，遂败绩于京水，语在《武仙传》。"

〔3〕《金史》有传，见卷118。有关此人，吉林大学张哲先生有硕士论文《金末汉人地主武装人物武仙研究》(导师程妮娜)专论。

〔4〕《圣武亲征录》："八月，金之参政完颜思烈、(桓)[恒]山公武仙将兵二十万会援南京，至郑州西，合战。"

《金史》卷18《哀宗纪上》"丙午，参知政事完颜思烈、恒山公武仙、巩昌总帅完颜忽斜虎率诸将兵自汝州入援。以合喜为枢密使，将兵一万应之。命左丞李蹊劝谕出师，乃行。八月己酉朔，合喜屯杏花营，又益兵五千人，始进屯中牟故城。庚戌，发丁壮五千人运粮饷合喜军。辛亥，完颜思烈遇大元兵于京水，遂溃。"

九月，拖雷薨，[1]帝还龙庭。[2]

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剌温[3]之野。

十二月，如太祖行宫。[4]

---

〔1〕《元史》卷115《睿宗传》："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阙。"——标点本，页2887。《元朝秘史》与波斯史家拉施都丁亦有类似记载，《秘史》见节272，《史集》见第2卷，周良霄汉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202；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页201-202。

有关论文参见甄金：《从拖雷之死谈起——对蒙古帝国早期内讧问题的探讨之一——质疑》，载于《内蒙古师院学报》，1979年02期。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载于《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罗贤佑：《从拖雷、贵由和阿里不哥的死因论大蒙古国的分裂》，载于《民族研究》，2006年04期。

〔2〕阿布拉莫夫斯基推测，这里的龙庭指和林，见《太宗纪》德译，页142注(61)。

有关此月及次月元高丽关系纪事，《元史》卷154《洪福源传》："辛卯(1231)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礼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儿秃等进至王京。高丽王瞮乃遣其弟怀安公(按，当为淮安公之误)请降，遂置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标点本，页3627。按，撒里塔已于8月中矢卒，《洪福源传》此处当有误。

《元高丽纪事》(页4)："十月，国王瞮遣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璋，上表陈请。"

〔3〕〔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4)：是年九月，帝还龙庭。则此地乃和林左近之地，纳兰河名，武宗大德十一年以纳兰不剌粮赈旁近饥民。《土土哈传》："败海都之将于兰不剌纳兰之河上。"其他有赤剌温山也，此与《武宗纪》及《土土哈传》之纳兰皆隶和林旁近之地。按，《大元仓库记》(《广仓学窘丛书》铅印本，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民国5年〔1916〕，甲类第二集，以下版本信息略，叶6)："纳兰不剌建仓宁夏府。"并不在漠北。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中认为，此即和林之北之日月山。——页7。

阿布拉莫夫斯基提出此名可还原为蒙古语"太阳石"(mong. Naran čilao'un)"Sonnenstein"，并支持屠寄之意见，据《元史》卷72《郊祀》上的记载，提出自蒙哥之后，此处应一直为施行祭天供奉之所(Von der Zeit von Möngke Qan an, sind dort Opfer an den Himmel vollzogen worden)。——《太宗纪》德译，页142，注(62)。

〔4〕有关此年其他政事，《大元仓库记》(页9)：辛卯(太宗三年，1231)、壬辰年(太宗四年，1232)，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令陈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一时漕运毋违慢。其通州北起仓，据见可收物处，仰达鲁花赤管民官，备木植差夫，令和伯拨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铁匠一人速修，及差守仓夫役三人，半年交替。如失盗就令均(陪)[赔]。

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1]，金主奔归德[2]。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3]、完颜习捏阿不[4]，以南京降。[5]

---

〔1〕《考异》卷86：《金史》作己未，先一日。

〔2〕《圣武亲征录》："癸巳春正月二十二日，金主出南京，入归德。"

刘祁《归潜志》："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颙望东征之捷。俄闻北渡，前锋方交战，有功，取蒲城。进取卫州，白撒等望见北兵，遽劝上登舟船南渡，从官多攀从不及，死于兵。而骁将徒单百家、高显、刘奕辈初不知上去，已而军士皆散没，上以余兵狼狈入归德，杜门，京民大恐，以为将不救矣。"——卷11，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126。

〔3〕《金史》卷115有传。

〔4〕刘祁《归潜志》作"完颜习你阿不"或"完颜习你阿勃"，《金史》作"斜捻阿不"。详见下。阿布拉莫夫斯基注(67)：《金史》无传。——《太宗纪》德译，页142。

〔5〕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劫杀宰相，送欵行营。"——《遗山集》卷19，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以下版本信息略）。同书《奉直赵君墓碣铭》："壬辰，避乱京居。车驾东狩，崔立劫杀宰相，都人闻变求死无所。"——卷22。同书《聂孝女墓志铭》："壬辰之冬，车驾东狩。……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举兵反，杀二相。"——卷25。

刘祁《归潜志》："天兴改元，末帝东迁，留二执政居守，元吉预焉。崔立之变，二执政死，元吉亦被创甚。"——卷5，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以下版本信息略）。

同书"十二月，朝议以食尽无□，末帝亲出东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颜斡出、改工部尚书权参知政事李蹊、枢密院判官白华、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左右司郎中完颜进德、张衮、总帅徒单百家、高显、刘奕皆从。上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大恸，誓以不破敌不归。仪卫萧然，见者悲怆。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习你阿不权行尚书省兼枢密事。以余兵守南京。……廿十有一日，忽闻执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计事，诣都堂，余同麻革潜众中以听。二执政立都堂檐外，杨居仁诸首领官从焉。省掾元好问宣执政所下令告谕，且问诸父老便宜。完颜奴申拱立无语，独完颜习你阿勃（按，上文作'习你阿不'）反复申谕：'以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且继以泣涕。诸愚叟或陈说细微，不足采。余语麻革，将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计密陈。子归草之，吾当共上也。'余以是退，将（按，黄丕烈、施国祁校本作'俟'）明日同革献书。其夕，颇闻民间称有一西南崔都尉、药招抚者将起事。众皆曰：'事急矣，安得无人？'余既归，夜草书，备论其事。迟明，怀以诣省庭，且邀革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是旦，大阴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间。忽闻军马声，市人奔走相传曰：'达靼入城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归。路闻非北兵，盖西南兵变，已围尚书省矣。

时崔立为西面都尉、权元帅，同其党韩铎等举兵。药安国者北方人，素骁勇，为先以进，横刀入尚书省，崔立继之。二执政见而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安国先杀习你阿不《金史》作斜捻阿不，次杀奴申。又杀左司郎中纳合德晖一作德浑，击右司郎中杨居仁、聂天骥，创甚。省掾皆四走，窜匿民家。

崔立既杀二人，提兵尚书省，号令众庶曰：'吾为二执政闭门误众，将饿死，今杀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诸军士：'取民一钱处死。'阖郡称快，以为有生路也。食时，忽阴雨开霁，日光烂然。立提兵入宫见太后，具陈其事，太后惶怖听命，拜立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

（注释〔5〕转下页）

（注释〔5〕接上页）

立以太后令，释卫邸之囚，召卫王故太子梁王某按梁王名从恪。监国，遂取卫族皆入宫。即遣使持二执政首诣军前纳降款。

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谕言，皆曰：'谢丞相得生。'立又自诣军前投谒归附。命归，令在京士庶皆割髮为北朝民。

初，立举事止三百人，杀二执政。当是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刘祁：《归潜志》卷11，页127-128。

《圣武亲征录》："金人崔立遂杀留守南京参政二人，开门诣速不台拔都(Sübe'hedei ba'atur)降。"

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噜噶齐王公神道碑》："壬辰，苏布特(速不台/Sübe'hedei)围南京城。守崔立遣使纳欵，情伪未可知。公与来使同往，立出降。"——《紫山大全集》卷16，四库本。

《金史》卷18《哀宗纪下》："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韩铎、药安国等举兵为乱，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卫王子从恪为梁王，监国。即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寻自称左丞相、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哥御史中丞，韩铎副元帅兼知开封府，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答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尚书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刘仲周并为参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为尚书左丞，户部侍郎张正伦为尚书右丞，左右司都事张节为左右司郎中，尚书省掾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都转运知事王天祺、怀州同知康瑭并为左右司都事。开封判官李禹翼弃官去。户部主事郑着召不起。是日，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左右怀员外郎聂天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并死之。遂送款大元军前。癸酉，大元将碎不觧(按，速不台/Sübe'hedei)进兵汴京。"

《金史》卷115《崔立传》："崔立，将陵人，少贫无行，尝为寺僧，负钹鼓，乘兵乱从上党公开，为都统提控，积阶遥领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为选曹所驳，每以不至三品为恨。围城中，授安平都尉。天兴元年冬十二月，上亲出师，授西面元帅。性淫姣，常思乱，以快其欲。药安国者，管州人，年二十余，有勇力，尝为岚州招抚使，以罪击开封狱。既出，贫无以为食立，将为变，潜结纳之。安国健啖，日饱之以鱼，遂与之谋。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胜，则挈以逃。日与都尉扬善入省中，候动静。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杀之。二年正月，遂帅甲卒二百，撞省门而入。二相闻变，趋出，立拔剑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处之？'二相曰：'事当好议之。'立不顾，麾其党张信之、孛术鲁长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驰往东华门，道遇点检温屯阿里，见其衷甲，杀之。既谕百姓曰：'吾为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满阿忽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皆死。立还省中，集百官议所立。立曰：'卫绍王太子从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党韩铎，以太后命往召。从恪须臾入。以太后诰命梁王监国，百官拜舞山呼，从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纳款。"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国维遗书》第1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14)注：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金主奔归德。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不，以南京降。)蒙古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汴京垂陷，首将速不台遣人来报，且言此城向相

（注释〔5〕转下页）

二月，幸铁列都[1]之地。诏诸王议伐万奴[2]，遂命皇子贵由[3]

（注释〔5〕接上页）

抗日久，多杀伤士卒，意欲尽屠之。公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争者地土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上疑而未决。复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上使然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时避并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万，仍奏选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散居河北，官为给赡。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神道碑》。

德国学者黑尼士曾发表过有关崔立叛乱的论著《有关叛军将领崔立的纪念碑》(Haenisch, *Die Ehreninschrift für Rebellengeneral Ts'ui-Lih*, Berlin, 1944)，见《太宗纪》德译，页142注(65)。国内有关研究可参见狄宝兴：《元遗山在崔立碑事件中的动机及其评价》，载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02期；孙智勇：《金末崔立叛乱原因浅析》，载于《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01期。

〔1〕〔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4)：《太祖纪》："帝复伐薛彻、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即其地也。故泰赤乌部盖在大漠之偏东，盖万奴故女真地也。《北边备对》："回纥部，其先匈奴也，后呼铁勒。"按铁列与帖烈皆铁勒之声转。又按，铁勒亦有两部。

同氏《元秘史注》："独撒察别乞泰出两人罄身走至迭列秃(Tele'etü)口子行被太祖拏住《本纪》曰：帝遣六十人征兵于辥彻别乞，辥彻别乞以旧怨故杀十人，去五十人衣。帝怒，因帅兵踰沙碛，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辥彻太丑仅免。越数月，帝复伐辥彻太丑，追至帖烈徒(Tele'etü)之隘，灭之。按，帖烈徒(Tele'etü)即迭烈秃(Tele'etü)对音，然迭烈秃(Tele'etü)即'口子'之义。后文王罕被乃蛮将帖列格秃百姓掳去，与此并非一地。并称帖列格秃为口子，足见帖列格秃与迭列秃即口子。《太宗纪》：五年，幸铁列都之地，亦即此口子矣。"——清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本。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69)：蒙古语"帖列秃"即为"帖列秃·阿马撒剌"，即《秘史》第136节之帖列秃山口，并参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注》，页262–263(Mong. "telētü"=Telegetü amsar, die Schlucht Teletü. (GG §136). Siehe auch PELLIOT, Campagnes, S. 262–263)——《太宗纪》德译，页142。

按，蒙语telege，意为"车"，telegetü，此言"有车地"。

〔2〕蒲鲜万奴。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0)有此人简介，见《太宗纪》德译，页142。

〔3〕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27)：长子贵由Güyük彼之禹儿惕在称为——地之霍博Qobaq之地、叶密立Emil或——。原注(即博伊尔的注释)：贵由之封地位霍博(今新疆北部之和布克赛尔)与叶密立(今伊敏)之间。后一名似为QWM SNKR之讹，当即横相乙儿Qum-Sengir。按：俄译本此句作"彼之禹儿惕在称为Бери-Манграк之地的Кумак、Имилб与Урмаур"。叶密立，名从《元史·宪宗纪》，在汉文史料中又作也迷里(《元史·速不台传》)、叶密立(《耶律希亮传》)、也迷失(《西北地附录》)和业瞒(《西使记》)。加宾尼作Omyl，谓其为窝阔台所筑之新城。然考之术外尼，此城乃耶律大石西征中所创筑(《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页355)。霍博，名从《元史·太宗纪》，有火孛(《耶律希亮传》)、虎八(《亲征录》)诸译。《元史·速不台传》有也迷里霍只部，无疑亦即其地。《耶律希亮传》云：叶迷里"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

及诸王按赤带[1]将左翼军[2]讨之。

夏四月，速不台进至青城[3]，崔立[4]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单氏

---

〔1〕成吉思汗弟合赤温之子，又作按只带、按只吉歹、阿勒赤歹(Elǰitei, Elǰigidei, Alčidai)等。关于此人，可见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来顿，1945年(Louis Hambis, *Les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 avec des notes supplementaires par Paul Pelliot, Leiden, 1945)，见页29。

〔2〕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3)：左翼同意为"东部"。(Linker Flügel ist gleichbedeutend mit "östlichem Gebiet")——《太宗纪》德译，页143。

〔3〕〔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4)：青城者，汴梁城外之地；屠寄："在南熏门外，本宋祭天斋宫所在。别有北青门，在封邱门外"。——《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叶8；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4)沿袭屠寄：地在南京(开封)之南熏门前。早先宋在此祭天(Der Ort lag vor dem Nan-hsün-Tor von Nan-ching (K'ai-feng). Die Sung vollzog dort früher ihre Himmelsopfer)——《太宗纪》德译，页143。

〔4〕崔立后为降宋金将李伯渊所杀。据〔元〕刘一清《钱塘遗事》"三京之役"条记："宝庆乙酉(按，二年，1225。崔立被杀事在1234年，此处纪年有误)，赵葵、赵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之议，以闻于朝。'乃命起范开阃于光黄之间。六月，全子才合淮南兵万余人赴汴，以十二日离合肥，七月二日抵东京，距城二十里，驻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结约，乃杀所立崔立，率父老来降。"——卷2，清光绪刻武林掌故丛编本。

此事有两种史料记载较详，一为《元文类》中所收曹居一《李伯渊奇节传》：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渊传，既少暇且，未详其事，窃有待焉。岁戊申(按，元定宗贵由三年，1248)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过客舍，因语及向壬辰(按，元太宗四年，1232)之变之后之事，始悉伯渊诛崔立之所自，盖惠安长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残，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暮]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堕马门外，从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无累乎？'令视之，识者谓：'总帅李伯渊也。'使扶诣方丈憩倏。其醒，语之曰：'当此大丧乱，公何心嗜酒如是？生为男子，与其徒沉溺于乱世，曷若立身后不朽之荣名哉？'伯渊矍然，若有契于衷者见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黄愊元帅者，相与拜恩而师焉。居无何，往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竖，乘国家倾危，天子播越，輙敢叛乱乃尔。吾欲诛之久矣。师谓男子身后不朽之荣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尔何遽出此速祸语？殆非老僧所敢闻者。'伯渊泣且誓，恩察之诚也，乃握手叹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祸乱之地否？吾天地间一闲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国厚恩二十余年矣，图报万一，此何爱焉！在吾教中有大报恩七篇，是固当为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济耳。今幸闻公举非常之事，树万世之名，使老僧朝见而夕死无憾，合爪加额曰惟以必中为公贺。'未几，适驿使有相困者，伯渊因之入见崔立，绐曰：'丞相避扰不出，则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动乘堕，辄欲回。伯渊厉声曰：'我辈兵家子，偶堕马又何怪焉？'因强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愿丞相与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诃不止，直诣立马首，挽其鞚。时伯渊骖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贯至自中其左掌，与之俱坠马。崔尚能语，曰：'反为贼奴所先。'随毙。伯渊暨黄愊等五人，实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稍稍鼠窜，蜂逝

(注释〔4〕转下页)

及(荊)[梁]王从恪、[1](梁)[荊]王守纯等至军中,[2]速不台遣送行

(接上页注释[4])

帖如也。遂礫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门下,一军哀号,声动天地。翼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时甲午(按,元太宗六年,1234)秋七月也。呜呼!金之亡也,以忠义闻者,不为不多。至于表表独见于后世者,得三人焉。"——《元文类》,卷69。

二为《金史》卷115《崔立传》:"李伯渊者,宝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户,美姿容,深沉有谋,每愤立不道,欲仗义杀之。李贱奴者,燕人,尝以军功遥领京兆府判,壬辰冬,车驾东狩,以都尉权东面元帅。立初反,以贱奴旧与敌体,颇貌敬之。数月之后,势已固,遂视贱奴如部曲然。贱奴积不能平,数出怨言,至是与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传近境有宋军,伯渊等阳与立谋备御之策。翌日晚,伯渊等烧外封丘门以警动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渊等身来约立视火,立从苑秀、折希颜数骑往,谕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诣太庙街点集。既还,行及梳行街,伯渊欲送立还二王府,立辞数四,伯渊必欲亲送,立不疑,仓卒中就马上抱立。立顾曰:"汝欲杀我耶?"伯渊曰:"杀汝何伤。"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处,再刺之,立坠马死。伏兵起,元帅黄掴三合杀苑秀。折希颜后至不知,见立坠马,谓与人斗,欲前解之,随为军士所斫,被创走梁门外,追斩之。伯渊系立尸马尾,至内前号于众曰:"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曰:"寸斩之未称也。"乃枭立首,望承天门祭哀宗。伯渊以下军民皆恸,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阙前槐树上,树忽拔,人谓树有灵,亦厌其为所污。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儿赐丞相镇海帐下士。"

[1]标点本校勘记(4):(荆)[梁]王从恪,据金史卷93卫绍王子传改。考异已校——页41。

[2]标点本校勘记(5):(梁)[荆]王守纯,据金史卷93宣宗诸子传改。考异已校——页41。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5):《金史》卷18记载,据说两位亲王及金主从属男子均被杀,仅二皇后被送往哈剌和林(CS 18, 6v berichet, dass die beiden Prinzen und alle anderen männlichen Angehörigen des Herrscherhauses der Chin getötet worden seien, nur die beiden Kaiserinen seien nach Qaraqorum geschickt worden)。——《太宗纪》德译,页143。

在，遂入南京。[1]

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儿率师围之。[2]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

[1]关于此月元与高丽关系，《元高丽纪事》(叶415)记："五年癸巳四月二十四日，谕王瞰悔过来朝。诏曰：'汝表文奏告事理具悉，率谄妄推托之辞，彼此有何难知。汝若委无谄妄，可来朝觐。自昔时讨平丹贼，杀讫札剌之后，未尝遣一人赴阙。尔等曾无遵依大国法度施行，此汝之罪一也。赍擎长生天之训言省谕，去者使命，尔等辄敢射回，此汝之罪二也。尔等又将著古欤谋害，推称万奴民户杀坏。若获元告人，此事可明。如委系万奴将尔国排陷，朕命汝征讨万奴，为何逗留不进，此汝之罪三也。命汝进军，仍令汝弼人朝。如此明谕，尔敢抗拒不朝，窜诸海岛，此汝之罪四也。又令汝等民户俱集见数，尔称若出城计数，人民惧杀，逃入海中，尔等尝与天兵协力征讨，将尔等民户诱说出城，推称计数，妄行诛杀，辄敢如此妄奏，此汝之罪五也。除此罪之外，尔等谄妄过恶，岂可胜言。长生天之训言省谕去时，不为听从，欲行战争。仰赖上天之力，攻破城邑，将执迷不降之人，歼剿者有之。或伏降出力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尝妄杀。尔之境内，西京金信孝等所管十数城应有人民，依奉朝命，计点见数，悉令安业住坐。除外，普天下应有民人，何啻亿万，悉皆输贡，按堵如故。尔或未知信，可遣使前来，朕将领尔观之。朕惟天之圣训省谕之后，将尔等悯恤思济。尔等曾未之悟，窜入水中，引惹争战之语，良以此耳，止托天之威力，克取尔国，固亦小端。尔等或存或亡，初无利害。朕惟上天圣训省谕之后，欲令尔等输贡服力。今则汝若不为出海来朝，苟避一时之难，我朝何如。上天其监之哉，以尔拒命不服，申命大军，数路进发。以尔反复二心，惜乎服力之兆民，妄遭杀戮。斯民垂死之际，莫不憾恨，归咎于汝，底于灭亡也。汝欲六师还旆，汝可躬领军民，进讨万奴勾当。尔或坚执不朝，又不躬行征讨，自陷罪恶死亡之地也。止缘万奴勾当及汝谄妄之故。世间真伪，朕胸中了然矣。尔与黎民灼然可见之事，何难之知。数皆何丧，定不可逃。以致尔等自贻其咎，自抵灭亡耳。'"

[2]《圣武亲征录》："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将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诸族人来献，遂人南京。六月，金主出归德府，入蔡[州]，塔察儿火儿赤统大军围守。"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7)：塔察儿，他是帖木哥斡赤斤之侄，见韩百诗：《〈元史〉卷170〈宗室世系表〉译注》，表13，卷119。(Tačar. Er was〔按，此处误为英文，应为 war〕ein Enkel von Temüge očigin〔Hambis, Chapitre CVII, Rab. 13〕. Biogr. 119, 15v-17r)——《太宗纪》德译，页143。

这里塔察儿所戴名号为"火儿赤"(qorči)，在蒙古语中意为"箭桶士"，属怯薛执事之一种，其地位与斡赤斤之侄的尊贵身份不符。阿布拉莫夫斯基虽然提及《元史》卷119《塔察儿传》，但显然并没有读过此传。该卷所有传主均非宗室。《塔察儿传》传中写明，这位参与灭金之战的塔察儿，为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儿忽之从孙(见标点本，页2952)。《黑鞑事略》所记"曩与金虏交兵关河之间"，与速不䚟、忒没䚟并列的将领"塔察儿"，即此人。他虽然与斡赤斤之侄同名，但非同一人。

(楷)[措]袭封衍圣公。[1]

秋八月,猎于兀必思[2]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馀。[3]

---

〔1〕标点本校勘记(6):元(楷)[措],据本书卷146耶律楚材传、卷158姚枢传改。类编已校——页41。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8):据《金史》卷150,此处所言即孔元措,他在1192年即从金获此头衔(Es handelt sich um K'ung Yüan-ts'uo, der bereits im Jahr 1192 von den Chin diesen Titel einhalten hatte〔CS 105, 5v〕)——《太宗纪》德译,页143。

〔金〕孔元措辑《孔氏祖庭广记》所记较《金史》早一年:"五十一代元措,字梦得,揔之长子,年十一。章宗明昌二年(1191)四月,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特旨令视四品。其诰云:'圣谟之大,遗范百王。德祚所传,垂光千祀。盖立道以经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公五十一代孙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润,芝兰异禀,蔚为宗党之英。诗礼旧闻,蚤服父兄之训语,年虽妙论,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仍换身章之数。非独增华于尔族,固将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卷1,四部丛刊续编景蒙古本。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礼乐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数輩。"——《元文类》卷57,四部丛刊本。

王恽《立袭封衍圣公事状》:"国朝自壬辰年间钦奉圣旨,于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孙孔元措,赴阙令袭封于鲁。"——《秋涧集》卷85,四部丛刊景明弘治十一年马龙、金舜臣刻本。

〔2〕屠寄:"今地未详,当距和林不远"。——《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叶8;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9):此地无法确指(Der Ort konnte nicht näher lokalisiert werden)——《太宗纪》德译,页143。

《辽史》卷2《太祖纪》载天赞三年九月西征,"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又"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同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记,钦察大将土土哈之子创兀儿帅师至"和林兀卑思之山",周良霄以为兀卑思即"胡母思"。——见氏撰《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页246。这些文献提到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在古鹘城,即和林城附近,即此"兀必思"。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其《史集·部族志》中记札剌亦儿人的十个部落时说,其中一部名Kūmsāūt,或可还原为Qumsa'ut,其单数形式或为Qumus。——参见刘迎胜:《〈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载于《蒙古史研究》,第4辑,中国蒙古史学会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氏《辽与漠北诸部族——胡母思山蕃与阻卜》,载于《欧亚学刊》第3辑,2002年,应即此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兀必思。

〔3〕屠寄:"《亲征录》作按脱,即阿同葛异译"。——《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叶8。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0):阿同葛无传。(这个华北被征服地区的人口统计数在1238年更为详尽,见页131〔A-t'ung-ko hat keine Biographie.—Diese Zählung der Bevölkerung der eroberten Geboet von Nord-China wurde im Jahre 1238 vervollständigt. Siehe S. 131。〕)——《太宗纪》德译,页143。

九月，擒万奴。[1]

冬十一月，宋遣荆鄂都统孟珙以兵粮来助。[2]

十二月，诸军与宋兵合攻蔡，败武仙[3]于息州。金人以海、沂、莱、潍等州降。[4]

是冬，帝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5]。大风霾七昼夜。敕修孔子

---

〔1〕有关次月元与高丽关系，《元高丽纪事》(页5)：五年癸巳“十月，瞰复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处降民，亦劫洪福源家。时福源以前为高丽所侵，后为女真契丹等贼来攻。福源上言讫，领降民，迁居辽阳等处。”

〔2〕《圣武亲征录》：“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领兵五万，运粮三十万石，至蔡来助，分兵南面攻之。”屠寄：“按，太尉系珙加官，今依宋史本传”。屠寄改为“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孟珙。”——《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页8。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2)：《宋史》卷112传记所言时间引人注意(Biographie in SS 412, 1r-14r; S. 6r-v behandeln den hier interessieren den Zeitraum)——《太宗纪》德译，页143。

〔3〕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3)：参见《金史》卷1182——《太宗纪》德译，页143。

〔4〕《圣武亲征录》：“金人举沂、莱、海、潍等州来降。”

〔5〕〔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4)，世祖至元七年纪：“赈兀鲁吾民户钞。”疑即其地。按，此议毫无根据。

屠寄：“旧《纪》作阿鲁兀忽可吾行宫，译音差误不备。阿鲁，当作斡儿洹；兀忽可吾，当作兀忽可纳浯儿。张德辉《纪行》曰：自浑独剌水西北行五驿，过大泽，周回六、七十里，水极澄彻，北语‘吾误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按，吾误竭，即兀忽可之异译，义谓大；脑儿，即纳浯儿之异文，义谓泊。今赛因诺颜部鄂尔浑河上游古崖，邹译图有乌格淖尔。胡刻图作额归泊者，即此兀忽可纳浯儿。德辉以汉语译言大泽是也。”——《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页8。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5)：似乎此处涉及位于鄂尔浑河与塔密儿河汇流处附近之乌格湖之地(Es scheint sich hier um das Gebiet des Ugej-Sees zu handeln, der in der Nähe des Zusammenflusses von Tamir und Orkhon liegt)，并在此后引述上举屠寄之意见。——《太宗纪》德译，页143。

庙及浑天仪。[1]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2]，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馀骨以归。金亡[3]。

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4]

---

〔1〕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6)：在燕京。——《太宗纪》德译，页143。

有关此年政事，《大元马政记》(页29)记："太宗皇帝五年癸巳，圣旨：谕田镇海、猪哥、咸得不、刘黑马、胡土花，小通事合住、绵厕哥、不速、孛伯，百户阿散纳、麻合马、忽赛因、贾熊、郭运成并官员等，及该不尽，应据斡鲁朵商贩回回人等，若曰，其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若有隐漏者，尽行没官。如各处收拾放牧，开具何人头疋，备细花名数目闻奏，听后支拨，不得违错。如违慢者，人岂不断罪。外据张德常、郭运成、蒙古斛，并山西东西两处燕京路。但有迭百头口官员等，一体施行。准此。"

《大元仓库记》(页9)："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诏：前令随处官司就差元设站夫修治运粮河道，可疾遣站夫自备粮物速为修治，工军放还专委。运粮河所属各州县长提举河道，差能干官吏及约粮差夫以时巡护，不致贼盗滋生。若遇失盗，不以官私之物，并勒提举河道及巡护者赔偿。如元赃不获，依条断罪。如有河岸缺坏，不分昼夜多差丁夫併力修筑，违慢迟滞并以违制论。仍仰沿河以南州府达鲁花赤等官，各于濒岸州城置立河仓，差官收纳每岁税石，旋依限次运赴通州仓，其立仓处差去人取。"

〔2〕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7)：无有关此人进一步信息。参见奥勒布里希特：《关于两个帝国的衰落》(P. Olbricht, *Zum Untergang zweier Reiche*, Wiesbaden, 1969)，页10，注(16)及(18)；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4卷，页290；第5卷，页157(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d. IV, Berlin, 1952, S.290, V, S.157)——《太宗纪》德译，页143。

〔3〕《圣武亲征录》："甲午春，正月十日，塔察儿火儿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传位于族人承麟，遂缢焚而死。我军入蔡，获承麟，杀之。金主遗骸，南人争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

《大金国志》卷26：正月"初十日，摘三面精锐军备西城。未明，大军果复来，方大战，南面宋兵万余已薄城矣。国主知城必破，乃诏大臣逊位于东面总帅(丞)[承]麟。(丞)[承]麟西向固让，金主自持符玺授之，(丞)[承]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国主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马，城陷之后，驰突必难。顾卿平昔以趫疾闻，且有将略可称，万一得免，使国祚不绝，此朕志也。'因起授符玺，(丞)[承]麟惶恐跪受，帝乃退。"——〔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页369。并见《金史》卷18《哀宗纪》下。

〔4〕今蒙古国鄂尔浑(Orqan)河。

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1]之地，大会诸王百僚[2]，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论罪。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镞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捕)[补]足之。[3]诸人或居室，或在军，毋敢喧呼。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羁，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4]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骣牛

〔1〕〔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4)：达葩者，山岭之名，此山名达兰，故曰达兰达葩，《醉隐集》："达兰河，河名也，在和林北百余里"云云。据此则达阑山乃达兰河所出，即本年所住之荅阑荅八思之地。《定宗纪》："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荅阑荅八思之地。"即此达兰达思之对音。关于《圣武亲征录》中的"答兰答八思"，王国维提出："《元史·太宗纪》作达兰达葩，《双溪醉隐集》5《达兰河》诗注云：'河名也。在和林北百余里。'疑此是也。"——《圣武亲征录校注》，载于《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84。屠寄释曰："地名见《亲征录》，义谓'平野之山梁'。旧《纪》作达兰达葩，释地详下八里里荅兰荅八思下。"——《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9。周良霄《〈元史〉点校献疑》(载于《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答阑答巴思名屡见于《元史》，其义为七十山口。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9)：达兰达葩，"七十山口"。参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页244；及《哈剌和林注》(Notes on Karakorum, JA, 206, 372-375)，页313(Dalan daba, die "Siebzig Pässe". Siehe Pelliot, Campagnes, S.244 und Notes, S. 313)。——《太宗纪》德译，页143。

〔2〕《圣武亲征录》："是年夏五月，于答兰答八始建行宫，大会诸王百官，宣布宪章。"

〔3〕标点本校勘记(7)：抽(捕)[补]足之，从殿本改——页41。

〔4〕阿布拉莫夫斯基注(93)：乞烈思为西部蒙古语kirya"栓马处"之复数kiryas之汉语音译。参见德福《新波斯语中的蒙古语与突厥语因素》，卷1，页464，第330条(ch'i-lieh-szu乞烈思 ist die chinesische Wiedergabe von westmongolisch "kiryas", Pl. von kirya =Sattelplatz. Siehe 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ischen* I, S. 464; sub. 330)。——《太宗纪》德译，页144。

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1]

秋七月，以胡土虎[2]那颜为中州断事官。遣达海绀卜[3]征蜀。

---

〔1〕有关此月元与高丽关系，《元高丽纪事》(页516)记：六年甲午五月一日，赐高丽降人麟州探问神骑都领洪福源金牌，俾领元降民户于东京居住。初，福源率民千五百户来降，且有请曰，若大事底于成，天子当念臣愚忠，其或败事愿就地弗敢辞。至是有旨，以元降民户令福源管领。复谕之曰，尔能戮力效职，则后降者皆令尔领之。是日，遣使持玺书，谕高丽国未降人民节该，若将高丽国王王瞮及元谋构起战争人员，执缚来朝者，与先降洪福源，一同优加恩恤任用。若天兵围守之后，拒我者死，降我者生，其降民悉令洪福源统摄。

〔2〕《圣武亲征录》：“又遣忽(相)[都]忽主治汉民，别遣塔海绀孛征蜀。”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所记：“甲午(1234)，诏括户口，以大臣忽睹虎领之。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至是始隶州县。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邪？’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卒从公议。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即为此事之背景。

王国维将《圣武亲征录》中的对应史文订正为“遣曲出、忽都都伐宋。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并提出：“《太宗纪》作‘胡土虎’，乃误以忽都忽当之。”——《圣武亲征录校注》，《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85。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67)：周按，胡土虎以太宗六年七月充中州断事官，故《铁蔑赤传》称忽都行省，与八年主括中州户口之大臣忽睹虎(《元文类》卷57，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同为一人无疑。关于此人推测甚多，或以为即成吉思汗之弟失吉忽秃忽(Šigi Qutuqu)(王国维《黑鞑事略》注)，敬山则又以七年与曲出伐宋之胡土虎当蒙哥次子忽都秃，而充中州断事官者则为忽秃忽。

〔3〕《本证》卷37，证名1：塔海绀不、河渠志二三白渠。塔海甘卜、拜延八都鲁传。塔海绀卜、探马赤、帖木儿不花、塔海帖木儿、耶律秃花、李守贤传。(点校者按，卷150《李守贤传》作塔海绀布。)速不台、郝和尚拔都、刘亨安传止称塔海。答海绀卜、忽都传。答海绀卜、刘黑马传。

是秋，帝在八里里答阑答八思[1]之地，议自将伐宋[2]，国王查老温[3]请行，遂遣之。

冬，猎于脱卜寒地。[4]

---

〔1〕《本证》卷49，证名13：答兰答八思，(宪)[定]宗纪首。(据元史卷2定宗纪改。宪宗纪首不见此名。)答兰答八，察罕传。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4)：《定宗纪》："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苔阑苔八思之地，议立帝。"《察罕传》："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还清水苔阑苔八思之地。"则八里里者，八剌河，汉语乃清水二字也，西番语谓河为里，太祖初起于八剌忽，又驻军于苔阑版朱思之野，此云八里里当即八剌合黑河，番语以河为里也，苔阑苔八思即苔阑版朱思之异文，译云有缓急，故每有异字耳。

屠寄："旧《史》《察罕传》：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道清水苔兰苔八思之地。按清水即八里里之译名，即此八里里苔兰苔八思之地。耶律铸《双溪醉饮集·苔兰河诗》注云：达兰河，在和林北百余里。按，达兰河，即清水，亦即八里里。所谓苔兰苔八思，即在此达兰河之濒无疑也。"——《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10。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213)，周按，此处之"八里里答兰答巴思"即《元史·定宗纪》："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答兰答八思"Dolan-Daba，义为"七十山口"。而《察罕传》载是年窝阔台返自河南，居"清水答兰答八之地"。"八里里"之义不明。至若清水，则与青色之湖之Köke-Na'ur自可联系。前文窝阔台《本纪》谓阔阔脑兀儿为大汗秋狩之地，离和林四日程，疑答兰答八思地近阔阔脑兀儿，故中外所纪，名虽不同，地望实一也。同氏《〈元史〉点较献疑》(载于《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又记：答阑答巴思名屡见于《元史》，其义为七十山口，与八里里当分标专名号。

阿布拉莫夫斯基未查上述诸家意见，其注(98)：八里里可能是一个附近之地方(Pa-li-li ist möglicherweise eine nähere Ortsbestimmung)。——《太宗纪》德译，页144。

〔2〕《考异》卷86：按，是春伐金之役，与宋合攻，金亡之后与宋约和，以陈蔡东南为宋，西北为蒙古，各引兵还矣。乃宋相郑清之忽主收复二京之议，遣全子才等率淮西兵万余人，以六月出师，七月二日抵汴，而赵文仲以淮东师五万继至，乃遣徐敏子为监军西上，二十八日入洛阳。元戍兵先期空城而去矣，宋兵粮尽不能守，引还。八月二日，元兵追击之，大败。敏子中流矢，徒步间行，由浮光遁。子才在汴，闻洛东丧师，亦于二十五日弃城遁。此元太宗所以有自将伐宋之议也。纪于分地约和及宋背约北侵事俱不之及，则议伐宋为无名矣。

〔3〕《考异》卷86：即木华黎之孙塔思也。"查老温"(Čilao'un)，蒙古语意为"石"；"塔思"(Taš)，突厥语亦意为"石"。

〔4〕屠寄："脱卜寒，义谓山梁，地当与苔兰苔八思相近。"——《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叶10。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00)：Topqan(?)未详其地(Nicht zu identieren)。——《太宗纪》德译，页144。

有关此年政事，《大元毡罽工物记》(《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二集，页7)记：六年甲午，元帅刁剌奉剌聚诸工七千余户。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1]，作万安宫[2]。遣诸王拔都[3]及皇子贵

〔1〕《圣武亲征录》："乙未（按，元太宗七年，1235）春，建和林城宫殿。"

《醉隐集·取和林诗》注云："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作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

〔2〕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85）：周按，《刘敏传》"己丑，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据此，窝阔台宫殿兴建之次第，略可概知。耶律楚材《湛然文集》卷13《和林城建行宫上梁文》："抛梁南，一带南山揖翠岚，创筑和林建宫室，酂侯功业冠曹参。"酂侯当即喻刘敏。和林之定都，据许有壬《至正集》卷45《敕赐兴元阁碑》谓在成吉思汗之十五年，《元史·地理志》同。然疑惑甚多，颇难肯定。至若土木宫殿之兴建，实始于窝阔台之七年。此城之概况，据鲁不鲁乞所纪："至于说到哈剌和林，我可以告诉您，如果不把大汗的宫殿计算在内，它还不及法兰西的圣但尼（Saint Denis）村大，而圣但尼的修道院的价值，要比那座宫殿大十倍。城里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它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得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坐落在城市的最末端）。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它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出使蒙古记》，页203。）

〔3〕《元史译文证补》卷5《拔都补传》。

由、皇侄蒙哥征西域，[1]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2]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3]。

秋九月，诸王口温不花[4]获宋何太尉[5]。

---

[1]此即《秘史》节270总译所记之“长子西征”：“斡歌歹既立，与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亲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种的王合里伯，曾命绰儿马罕征进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秃儿，同蒙格秃两个做后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Batu)、不里(Büri)、古余克(Güyük)、蒙格(Möngke)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回兄察阿歹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罗亦果有关此事的释文见《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下册，页989，及以下。

志费尼记：“因为钦察与克列儿(Keler)各部尚未完全摧毁，所以，征服和消灭这些部族就成为首要的任务。诸王拔都、蒙哥可汗、贵由，领命指挥这次战役，他们率大食和突厥大军各返己营，准备在来年初春出师。他们作好这次远征的准备，在预定的时间出发。”——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234。其中与钦察并列的克列儿(Keler)，波斯文原文写作 كلار (KLAR)，伯希和在《金帐汗史评注》中指出，即《秘史》页262、270之克列勒(Keler)，源自马札儿语 király，乃“国王”这个词之讹。参见《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236，注(3)。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中有一段记载非常值得注意：“乙未(1235)，朝议以回鹘人征南，汉人征西，以为得计。公极言其不可，曰：‘汉地西域相去数万里，比至敌境，人马疲乏，不堪为用。况水土异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进，似为两便。争论十余日，其议遂寝。”——《元文类》卷57。这段记载中的“朝议”，当发生于和林。所议调用汉人征西域，即当指“长子西征”之役。既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诸王贵戚各出长子之事。据宋子贞的记载，当初蒙古国朝廷讨论西征军的组成时，曾考虑过征发汉人的问题，因耶律楚材反对，廷议争论十余日而后才放弃。如果此议得行，历史可能要改写。

[2]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此“曲出”当为“阔出”之误。同氏《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67)：周按：此处之曲出，证以《阿剌罕传》《察罕传》《铁蔑赤传》《脱欢传》《元文类》卷25《曹南王世德碑》皆作“阔出”。惟《塔思传》有：太宗六年(甲午)，“命与王子曲出总军南征”。《太宗纪》八年冬：“皇子曲出薨”。《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本纪》改曲出作阔出，一若“曲”字为误植。然则曲出即阔出，译音以方言也。

《圣武亲征录》：“冬十一月，[曲]赤(曲)、(阙)[阔]端等克西川。”

[3]《元高丽纪事》(页6)：七年乙未，命将唐古拔都鲁，与福源，同领兵征高丽。攻拔龙岗县、凤州、海州、洞州。九月，山城、慈州等处。

[4]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06)：口温不花，成吉思汗弟别里古台子。见《元史》卷117；韩百诗：《〈元史〉卷170〈宗室世系表〉译注》页49，注(2)(Kü'ün buqa, der Sohn von Činggis Qans Bruder Belgütei. YS 117, 1v; Hambis, *Le chapitre* CVII, S. 49, n.2)。——《太宗纪》德译，页145。

[5]屠寄：人名、地名均失考。——《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10。

冬十月，曲出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

十一月，阔端攻石门[1]，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2]降。中书省臣请契勘大明历，从之。

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3]来会宴。万安宫落成[4]。诏印造交钞行之。[5]

二月，命应州郭胜、钧州孛术鲁九住、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6]。

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

---

〔1〕屠寄：西和州本石门镇升。——《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11。

〔2〕《元史》有传，见卷155。

〔3〕屠寄：所谓治具，旄车载酪湩而已。——《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11。

〔4〕《圣武亲征录》："丙申，大(庆)[广]和林城宫。"

〔5〕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1)：蒙古统治下最早纸币似乎在1224至1227年间已在山东博州流通。参见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货币与经济》，页35(Das erste Papiergeld unter den Mongolen scheint bereits zwischen 1224 und 1227 in P.-chou 博州〔in Shan-tung〕 in Umlauf gewesen zu sein. Siehe H. Franke, Geld und Wirtschaft, S. 35)。——《太宗纪》德译，页145。

〔6〕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1)：蒙古统治下最早纸币似乎在1224至1227年间已在山东博州流通。参见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货币与经济》，页35(Das erste Papiergeld unter den Mongolen scheint bereits zwischen 1224 und 1227 in P.-chou 博州〔in Shan-tung〕 in Umlauf gewesen zu sein. Siehe H. Franke, Geld und Wirtschaft, S. 35)。——《太宗纪》德译，页145。

夏六月[1],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2]。耶律楚材

[1]屠寄:耶律楚材旧传作秋七月。——《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11。

[2]屠寄:《亲征录》事在乙未,数字是一百二十万。——《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页11。

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期,第4分,页853):癸巳(1233)、乙未(1235)两次所载籍户数,记载颇多歧异。爱宕松男以为《元史·太宗纪》:丙申(1236)"夏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中的一百一十余万户,并不包括癸巳年所籍的七十三余万户。换言之,两次共籍到一百八十余万(110万加上73万)。见《蒙古人政權治下の漢地に於ける版籍の問題》,载于《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陽市論叢》,1950,页387-298。按,乙未年一百一十余万户含癸巳年所籍七十三万余户在内。《圣武亲征录》(《蒙古史料四种》本)页105a载:"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万有奇。"《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篇》:"忽都忽等籍到诸路民户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说:"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国朝文类》卷57)这几个数字与一百一十万相近。《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篇》另段记载,有"断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户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人数内……"云云,可知《太宗纪》"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云云,乃合癸巳年七十三万与乙未新籍三十七万,计一百一十万之谓。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3):请比较页128及注80(按,指《太宗纪》德译页及注)。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提供的数据,这一括户是在失吉忽秃忽领导下实施的。同时比较舒尔曼《〈元史·食货志〉译注》,页67(Vgl. S.128 und Anm.80. Angaben in der Biographie von Ye-lü Ch'u-ts'ai [YS 146, 7r] zufolge, wurde diese Zählung unter der Leitung von Šigi Qutuqu durchgeführt. Vgl. Auch Schurmann, S. 67)。——《太宗纪》德译,页145。

[日]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卷四元朝史》(三一书房,1998年,页215-216):《圣武亲征录》载:"(太宗七年乙未)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万有奇。"《元史·本纪》载:"(八年)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作者认为两书所载日期虽不一致,却并不代表记载的是两件不同之事。宋子贞撰《耶律楚材神道碑》载:"甲午诏括户口。以大臣忽睹虎领之……丙申秋七月。忽覩虎以户口来上。"所谓的由忽睹虎那颜主持的中原的民户抄数通常是指乙未年括户。从《耶律楚材神道碑》可见,其初始实际是从太宗六年开始的,实际的完成是在太宗八年。

方龄贵:《元史》等史籍"所记户口数并不一致。以意度之,籍户或非一朝一夕可就之事,谅系太宗六年创议,七年初有成果而上其数,八年最后卒事。然则七年所上户数,当以《地理志》所录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为近是,八年所上户数,当以《兵志》所录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为近是;合之,得户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三。《亲征录》所著录之一百一十一万(按:他本或作一百二十万)有奇,《研北杂志》之一百一十一万,及《元史·太宗纪》八年之一百一十余万,与此相去不甚远;但'得续户'云云,似不足据,盖合七年、八年两次所籍之户而计之耳。《亲征录》系于乙未岁,疑亦同此。至于为户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三与一百一十一万、一百一十余万、一百一十一万有奇之出入,或当由于其中有逃户之故。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亦曾考论及此,可参考。"见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卷2《户令·户例》,中华书局,2001年版,页27-28。

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1]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2]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3]。

秋七月，命陈时可[4]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5]，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6]斡鲁

---

[1]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页60)，苏天爵：《题诸公与参议先生书启》，《滋溪文稿》卷30。文中说"是时耶律公楚才领中书政务，命诸路置经籍所以儒者司之，盖欲士明经学，兴起文治。"但从现有材料看，似乎只有燕京、平阳和京兆设置过编修所或经籍所，而且其创设与耶律楚材和胡天禄等人有密切关系。

[2]宋子贞《中书耶律公神道碑》提及："初汴京未下，奏遣使人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礼乐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数辈。于燕京置编修所平阳置经籍所以开文治。"——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四部丛刊景元至正刊本。

其后裔即蒙古国与元初名臣梁暗都剌，按王恽记载，其"故曾祖金中奉大夫、司农少卿陟，早登科第，顯历仕途，履正奉公，才优国计，持难抗节，身为大闲，在先儒耆德之间，有泰和能臣之誉，经纶事往，道义日尊，流泽远及于子孙，致位有开。"——《追谥故都运梁公通宪先生制》，《秋涧集》卷67，叶8上。"暗都剌"，为阿拉伯语'Abd al-Allāh"真主之奴仆"音译，乃回回人名。

[3]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4)：只有赵著稍有名：他是燕人，充编修官(《困学斋杂录》)；《蒙兀儿史记》补充下列内容：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令大臣子孙执经听讲(Nur über Chao Chu ist ein wenig bekannt: Er stammte aus Yen und war als Komilator〔pien-hsiu-kuan〕tätig〔KHCTL, 18v〕; MS 4, 12r ergänzt noch folgendes: Sie sollten die 9 Klassiker ausgegen und den Kronprinzen darin unterweisen. Auch die Söhne und Enkel der hohen Minister sollten an diesen Unterweisung teilhaben)。——《太宗纪》德译，页145。

[4]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5)：他是燕人，在金为翰林学士，蒙古统治时期为燕京课税官(见页125——按，指《太宗纪》德译页)。《困学斋杂录》及《归潜志》(Er stammte aus Yen, unter Chin wurde er Han-lin Gelehrter, unter den Mongolen Steuernkommisar von Yen-ching.〔Vgl. S.125〕. KHCTL 18v und Kuei-ch'ien-chi 14, 7r)。——《太宗纪》德译，页145。

[5]《考异》卷86《食货志》："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丙申年，分拨真定路八万户。"盖太后汤沐之邑，后为睿宗所有。洪金富《元代文献考释与历史研究——称谓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4分，2010年，页747)："太后"为唆鲁禾帖尼。原来名单写有唆鲁禾帖尼(唐妃)之名，名列第四，而与其前的三人依序代表太祖正妻所生的长子、次子、三子、四子。《元史·太宗纪》上的顺序是后来的更动。

洪金富此议甚是。将唆鲁禾帖尼称为太后，是宪宗朝以后事。原《实录》所记顺序当为术赤位、察合台位、窝阔台位与拖雷位。此处将唆鲁禾帖尼封户列于第一，当系后来所改。

[6]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8)：《元史》卷95有民户分封的详情及数字(Eine ausführliche Aufzählung, mit Angaben über die Zahl der verteilten Haushalte findet sich im YS 95, 1v-34r)。——《太宗纪》德译，页145。

朵[1]：拔都，平阳府[2]；茶合带，太原府[3]；古与，大名府[4]；孛鲁带，邢州[5]；果鲁干，河间府[6]；孛鲁古带，广宁府[7]；野苦，益都、济南

[1]阿布拉莫夫斯基在此处将斡鲁朵视为人名，即拔都之兄斡儿答，读为"斡鲁朵、拔都"，并译为 Wo-lu-to und Pa-to。他在注(119)中表示：斡儿答和拔都，《新元史》卷160，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Orda und Batu, HYS 106, 4v. Söhne von Čingis Qans ältestem Sohn Jöči)。——《太宗纪》德译，页145。

[2]《考异》卷86《食货志》："术赤大王位：分拨平阳四万一千三百二户。"拔都者，术赤之子。

[3]《考异》卷86《食货志》："茶合䚟大王位：分拨太原四万七千七百三十户。"茶合䚟者，太祖第二子察合台也。《世祖纪》，太原乃阿只吉分地。阿只吉，即察合台之孙。

按，察合台(Čaγatai)，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国的创立者。

[4]《考异》卷86《食货志》："太宗子定宗位：分拨大名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三户。"定宗名贵由，此作古与，声相近。按，贵由(Güyük)，元太宗长子。

[5]《考异》卷86《食货志》：八答子"丙申年，分拨顺德路一万四千八十七户"。顺德路即邢州，则孛鲁带疑即八答子矣。《世祖纪》：邢州有两答剌罕，其一为启昔礼，即哈剌哈孙之大父，其一则《太祖纪》所谓把带，即八答子也。或云启昔礼之子，名博理察，与孛鲁带声亦相近。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2)：邢州(即顺德路)及一万四千八十七户均封给八答子(《元史》卷95，页21背面)。哈佛燕京引得将八答子与博理察视为同一人，但这一点无法证实。(Hsing-chou〔Shun-te-lu〕wurde mit 14,807 haushalten an Pa-ta-tzu gegeben.〔YS 95, 21r〕. Laut Harvard-Yenching- Index ist Pa- ta- tzu mit Po- li- ch' a identisch, die Angabe dort konnte aber nicht nachgeprüft werden)。——《太宗纪》德译，页146。

[6]《考异》卷86《食货志》："阔列坚太子河间王位：分拨河间路四万五千九百三十户。"果鲁干，即阔列坚也。

按，阔列坚(Kölgen)，成吉思汗庶子，排位第六子。参阅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页51；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3)，《太宗纪》德译，页146。

[7]《考异》卷86《食货志》："孛罗古䚟子广宁王位：丙申年，分拨恩州一万一千六百三户。"此云广宁府，疑志误。孛鲁古带，即别里古台。

按，别里古台(Belgütei)为成吉思汗庶弟，《元史》卷117有传。

二府户内拨赐[1];按赤带,滨、棣州[2];斡陈那颜,平、滦州[3];皇子阔端[4]、驸马赤苦[5]、公主阿剌海[6]、公主果真[7]、国王查剌温[8]、

---

〔1〕《考异》卷86《食货志》:"搠只哈撒儿大王子淄川王位:分拨般阳路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三户。"淄川王,名也苦,即野苦。

按,也苦(Yekü),成吉思汗弟搠只哈撒儿之子。参阅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4;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5),《太宗纪》德译,页146。

〔2〕《考异》卷86《食货志》:"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位:分拨济南路五万五千二百户。"济南王,名按只吉歹,即按赤带也。

按,按赤吉歹(Alčidai),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子。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9罗列此人名称的不同拼法;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6),《太宗纪》德译,页146。

〔3〕《考异》卷86《食货志》:"斡真那颜位:分拨益都等处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案斡陈,即斡赤斤,其后为辽王,则纪云平、滦者,为得其实。

按,斡赤斤(Očigin)即铁木哥·斡赤斤(Temüge Očigin),成吉思汗三弟。参阅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3;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7),《太宗纪》德译,页146。

〔4〕《考异》卷86《食货志》:"阔端太子位:分拨东京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东京,盖东平之讹。《元典章》有东昌路达鲁花赤探马赤前去永昌府,将军粮交付了当云云。则东昌乃阔端太子分地。元初,其地隶东平行省也。

按,阔端(Köden),元太宗子。

〔5〕《考异》卷86:《公主表》,郓国公主位:秃满伦公主适赤窟驸马。即此赤苦也。《食货志》:"郓国公主位:丙申年,分拨濮州三万户。")。《本证》卷37,证名1:赤窟,公主表。

按,赤苦(Čikü),成吉思汗女帖木仑公主驸马。参阅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页160,注2;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9),《太宗纪》德译,页146。

〔6〕《考异》卷86:《公主表》,赵国大长公主阿剌海别吉适赵武毅王孛要合。《食货志》:"赵国公主位:分拨高唐州二万户。"

阿剌海(Alaqai)公主,成吉思汗女。参见参阅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页25;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0),《太宗纪》德译,页146。

〔7〕《考异》卷86:《公主表》,昌忠武王孛秃继室,以太祖女昌国大长公主火臣别吉。火臣,即果真也。《食货志》:"昌国公主位:分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户。失书地名。"

火臣(Gojin)公主,成吉思汗女。参见参阅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页30;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1),《太宗纪》德译,页146。

〔8〕《考异》卷86《食货志》:"木华黎国王:分拨东平三万九千一十九户。"查老温,即木华黎之孙。

按,前已提及,查剌温(Čilao'un,蒙古语意为"石"),即木华黎孙塔思(Taš,突厥语亦意为"石")。

茶合带〔1〕、锻真〔2〕、蒙古寒札〔3〕、按赤那颜〔4〕、圻那颜〔5〕、火斜、术

〔1〕《考异》卷86:茶合带,未详何人,恐是衍文。

屠寄:所谓茶合带,决非成吉思汗之子察阿歹,因上文已见"茶合带,太原"也。他在《蒙兀儿史记》中的相应段落中行文中,删去茶合带(卷4《斡歌歹可汗纪》,叶11),当是遵从上述《考异》意见。这位茶合带(Čaγatai),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系表五怀疑为木华黎之侄;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3),《太宗纪》德译,页146。按,其名接于查剌温之下,或与木华黎家族有关。

〔2〕《考异》卷86:按术赤台有孙端真拔都儿,袭爵郡王,即锻真也。高觿传,父守忠,从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食货志》:"术赤台郡王:丙申年,分拨德州二万户。"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4):锻真,术赤台之孙。《元史》卷120。(Dönĵin〔?〕, Enkel von Jočidai. YS 120, 8r–10r),《太宗纪》德译,页146。

〔3〕《考异》卷86:按畏荅儿之子忙哥,封郡王,疑即蒙古也。《食货志》:"愠里荅儿薛禅:丙申年,分拨泰安州二万户。"愠里荅儿,即畏荅儿,寒札未详。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5):蒙古寒札,忙兀部首领畏答儿之子(Mönggü qalĵa, Sohn von Quyidar, Chef der Mangγut〔Chaptre CVIII, S.176〕)。——《太宗纪》德译,页146。

〔4〕《考异》卷86:按赤那颜(按赤那颜,即国舅按陈那颜也。《食货志》:"鲁国公主位:丙申,分拨济宁路三万户。"

按,姚景安编《元史人名索引》汇集此人不同名称写法:按嗔那颜(按赤那颜、按赤那延、按只那演、按陈、按陈那衍、济宁王、河西王、忠武、济宁忠武王、鲁忠武王)。又王恽《追封皇国舅济宁王谥忠武制》文(《秋涧集》卷67,叶5上)与程钜夫《皇太后故曾祖父追封济宁王谥忠武,加追封鲁王仍谥忠武制》(《雪楼集》卷3,叶11上)均写为按赤那演。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6):按赤那颜,成吉思汗妻孛儿帖之兄弟(Alĵin noyan, Bruder von Börte, der Frau von Činggis Qan)。——《太宗纪》德译,页146。

〔5〕《考异》卷86:"圻"当是"折"字之讹,哲别以骁勇事太祖,与虎必来、者勒蔑、速不台称四先锋。纪、传或书遮别,或书者别,郭宝玉传作柘柏,吾也而传称折不那演,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称者必那演,实一人也。《食货志》:"和斜漫两投下一千二百户。丙申年,分拨曹州一万户。"和斜漫,即火斜木思也。而圻那颜则志遗之。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7)亦将此人视为哲别(Ĵebe noyan, der berümte Gemeral Činggis Qans)——《太宗纪》德译,页146。但屠寄则将圻那颜改为册那颜,并表示"册那颜,阿勒赤那颜之弟。旧纪、食货志作圻那颜,据《德薛禅传》改。"即将此人视为宏吉剌部人。——《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叶11。

思[1]，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2]。耶律楚材言非便，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3]。阔

---

〔1〕钱大昕读为"火斜木思"，《考异》卷86《食货志》："和斜漫两投下一千二百户。丙申年，分拨曹州一万户。"和斜漫，即火斜木思也。

屠寄在火斜与术思之间不点断，并改"火斜术思"为"豁儿赤塔思"。他写道："原作火斜术思。按旧史《忙古台传》曰：蒙古达达儿氏，祖荅思火儿赤，从太宗定中原有功，为东平达鲁花赤。《食货志》云：塔思火儿赤位下五户丝，丙申年(按，1236)分拨东平种田一百户，即火斜术思也。'火斜'之异译为'火儿赤'，异文为'豁儿赤'，为佩櫜鞬宿卫之官。'术思'疑本作'荅思'，形近之讹。魏氏源《元史新编》作'和斜术'，谓即《食货志》之'火斜温'，丙申年分拨旧州一万户，误也。"——《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叶11。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文在火斜与术思之间亦不点断，并在注(138)中表示此人不可考(Konnte nicht identifiziert werden)——《太宗纪》德译，页146。

〔2〕《考异》卷86又按：志所载丙申年分拨者，尚有太祖叔荅里真官人、火雷公主、孛罗先锋、行丑儿、乞里歹拔都、笑乃带先锋、带孙郡王、孛鲁古妻佟氏、孛罗台万户、忒术台驸马、斡阔烈阇里必、合丹大息千户、也速不花等四千户、也速兀儿等三千户、帖柳兀秃千户、灭古赤、塔思火儿赤、折米思拔都儿、迭哥官人、黄兀儿塔海、添都虎儿，纪俱不载。

《本证》卷1，证误1：案《食货志岁赐》当作"东京路"。(按，纪是。诸王岁赐民户均在中原，而东京路即后之辽阳路，不属中原。校点本《元史》已改"京"为"平"。)

〔3〕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其秋七月，忽睹虎以户口来。上议割裂诸州郡分赐诸王贵族，以为汤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与金帛，足以为恩。'上曰：'业已许之。'复曰：'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差可久也。'从之。是岁，始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已上以为永额。朝臣皆谓太轻。公曰：'将来必有以利进者，则已为重矣。"

屠寄此处注："按《食货志》，丙申年分拨五户丝者，尚有阿里不哥，真定路八万户；郓国公主，濮州三万户；鲁国公主，济宁路三万户；火雷公主，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孛罗先锋，广平等处种田一百户；行丑儿，大名种田一百户；乞里歹拔都，东平一百户；笑乃带先锋，东平一百户；孛鲁古妻佟氏，真定一百户；八荅子，顺德一万四千八十七户；忒木带驸马，广平路磁州九千四百户；帖柳兀秃千户，河间路临邑县一千四百五十户；火斜温两投下，曹州一万户；灭古赤，凤翔府一百三十户；折米思拔都儿，怀孟等处一百户；孛哥帖木儿，真定等处五十八户；迭哥官人，大名清丰县一千七百一十三户；黄兀儿塔海，平阳一百四十户；添都虎儿，真定一百户。旧纪不悉载，附注于此以待考。"——《蒙兀儿史记》卷4《斡歌歹可汗纪》，叶11。

钱大昕与屠寄虽然在此处均比照《食货志》，但因对人名解读不同，因而录《食货志》文时取舍有别。

端[1]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2]，斩蜀将曹友闻[3]。

冬十月，阔端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皇子曲出[4]薨。张柔[5]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6]领襄阳、樊城事。

---

〔1〕窝阔台第三子。

〔2〕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42)中表示无法确定此处究指何处(Es konnte nicht festgestellt werden, um welches Gebiet es sich genau handelt)——《太宗纪》德译，页146。〔宋〕曹彦约所撰之《与蜀帅桂侍郎札子》提到："或谓近日议论有欲弃关外四州者，以其费多而守备众也。不知四州之急起于中兴，失关陇则四州急；弃四州则梁、洋、沔、利急；地愈狭则急愈甚矣。"——《昌谷集》卷1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此，关外之地当指关中的西界大散关以外诸地。

〔3〕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43)：宋著名将领曹彬的一位后裔，《宋史》卷449，叶12上-16上(Ein Nachfahre des berühmten Sung-Generals Ts'ao Pin. SS. 449, 12v-16v.)——《太宗纪》德译，页146。

〔4〕即阔出，窝阔台第四子。

〔5〕《元史》卷147有传。《太宗纪》与《定宗纪》自太宗八年(1236)起，提及张柔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人，似显示此两本纪所据之原始资料与张柔家传有关。

〔6〕游显，字子明，《元史》中数见。其神道碑《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为姚燧所撰，收入《牧庵集》卷22。

九年丁酉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1]。蒙哥征钦察部[2],破之,

[1]〔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九年春、十年夏、十一年春、十三年春均猎于揭揭察合之泽,《提纲》32:"鄂勒昆河东北流折西北二百里有朱尔马台河,自西南来会,亦曰朱勒马台河,出额黑铁木儿山,南麓东南流,绕布库铁木儿山足三面,东北流曲曲二百余里,潴为池曰察罕鄂模,广数十里。"后卷《宪宗纪》作怯蹇义罕,即其地也。同书(页25)《宪宗纪》:"三年,猎于怯蹇义罕之地。"殿在揭揭察罕泽上,故曰揭揭察罕殿,察罕者,白也,湖水色白,此湖亦名揭揭脑儿,转写亦作颗颗脑儿也。《宪宗纪》云云即此殿,《明宗纪》:"次洁坚察罕之地。"亦即此地也。《地志》云:"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48):蒙古语"Gegen chaγan"。这些湖泊位于哈剌和林以北约70里处。1237年夏窝阔台在此区域建迦坚茶寒宫。《元史》卷58,叶38上。并见博伊尔《窝阔台大汗的季节性居地》(按,*The Seasonal Residence of the Great Khan Ögedei*,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Alten Orients, Berlin, 1974 (Protokollband der XII. PIAC): 145-151),页146(Mong. "Gegen chaγan". Diese Seen lagen etwa 70 li nördlich von Qara-qurum. In dieser Gegend liess Ögedei im Sommer 1237 den Chia-chien ch'a-han Palast errichten. YS 58, 38v. Siehe auch BOYLE, Seasonal Residence, S. 146). ——《太宗纪》德译,页147。

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揭揭察哈—迦坚茶寒,是蒙语Gege(n)-chagha(n)的音译,意为"洁白"。揭揭察哈之泽即"洁白湖",窝阔台与蒙哥每年春天多到这里游猎。扫邻城、迦坚茶寒殿即建于湖旁。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和《经世大典·站赤》中的"扫邻",该词大约指驿站的顿舍,当为蒙文sa'urin的音译,有座位或驿站顿舍的意思。这里所谓"扫邻城",应是大汗的春猎地行宫。《元史·地理志》未载筑扫邻城事,仅言"治迦坚茶寒殿",本纪屡载太宗、宪宗春季猎于迦坚茶寒之地,亦未言及扫邻城。可见并无所谓"城",大约只是建筑了一座宫殿,四周围一道围墙而已。拉施都丁《史集》记载说:"合罕(窝阔台台)命木速蛮(穆斯林)工匠于距和林一日程之地建造了一所宫殿",这座宫殿就是迦坚茶寒,在今察罕泊西南。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89:按《元史·太宗纪》,九年夏四月,"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新元史·地理志》:岭北行中书省,"丁丑,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又《双溪醉隐集》卷2《取和林》:"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揭书中提及的坚察哈Gegen-Chaghan无疑即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原注(即博伊尔的注释):此地名之第一部分布洛歇本作KR,维尔霍夫斯基本在译文中采之(Karchagan),然他的稿本作KHZ,其字形更接近于其原形KKH即Gegen Chagan(意为"明亮和白色"。这明显地是哈剌和林以北二十五公里处至群湖的名称。它可能即在鄂尔浑河上近古畏吾儿都城(Qara Balghasun)之附近。

[2]〔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5),《宪宗纪》:"尝攻钦察,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西北地附录》有钦察,《醉隐集》:"麈沆,马挏也,以马乳为酒,愈挏治则味愈甘,甘谓之麈沆,奄蔡语也。奄蔡,西汉《西域传》无有,《大宛传》:'宛王昧蔡。'师古曰:'蔡,千葛切,《书》:"二百里蔡。"'毛晃韵:葛,桑葛切,广韵亦然,奄蔡,蔡,千葛切为是。今有其种,率皆从事挏马。"按耶律铸以钦察二字不古,当仍写《汉书》之奄蔡而读为钦察耳,沈垚云:"钦察部,近宽田吉思海,在斡罗思思西阿。"

(注释[2]转下页)

擒其酋八赤蛮[1]。

（接上页注释〔2〕）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12外集6《西北地名杂考》："元钦察部近寛田吉思海，速不台传，癸未太祖十八年，速不台请讨钦察，许之。隧引兵绕寛定吉思海，展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租河，纵兵旧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按太和岭有二，一在钦察境，速不台传所言是也；一在大同，成宗纪大德四年二月置西京太和岭屯田，百官志，太和岭千户所于大同路昌邑县本隘置司。又地理志，至元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亦大同之太和岭也。土土哈传，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钦察属月祖伯分地。术赤传，术赤者，太祖长子也，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术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苔嗣，撒里答薨，弟忙哥帖木儿嗣，忙哥帖木儿薨，弟脱脱忙哥嗣，脱脱忙哥薨，弟脱脱嗣，脱脱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别嗣。盖自后，部落遂以为号矣。月即别即月祖伯也。钦察去京师极远，则寛定吉思海去中国亦极远矣。地理志，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旁，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禽八赤蛮。则海中有山，今塔尔巴哈台之西临边有巴尔噶什泊，泊中有山。以钦察去京师三万余里较之，则宽田吉思海当尚在此泊之外，巴尔喀锡泊之东北千数百里有慈谟斯夸泊，中亦有山，其为元之宽田吉思海乎？慈谟斯夸泊之西北八九千里有额纳噶泊，中亦有山，以去中国三万余里言之，必额纳噶泊足当钦察之海，然其地益远矣。按钦察与斡罗思、阿速、康里诸国为邻，元史述征诸国事，曷思麦里传与速不台传正相倒，速不台传先钦察，而斡罗思、阿速；曷思麦里传由西域诸城转战而北，先阿速而斡罗思而康里而后钦察。两传所述，正一时事而先后乃相反，然曷思麦里传先言帝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则征钦察究在先，曷思麦里徇西域诸城而北先至阿速。则阿速在钦察之南，疑即今之哈萨克，阿速与哈萨音亦相近也。然则钦察在斡罗思之西，阿速之北矣，寛田吉斯海当于西北远地求之，意者额纳泊，其即八赤蛮所逃乎。"

按，钦察（Qïpčaq），突厥部落，操北部方言，居于今乌拉尔、伏尔加两河下游之间，里海北岸草原，元代有多种译名。

〔1〕《考异》卷86：按元史载征钦察事，纪、志、传互异，此纪及宪宗纪，俱以八赤蛮为钦察之酋长。地理志：太宗甲午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即钦察、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亦命宪宗往焉。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傍，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擒八赤蛮。亦与本纪略同。而速不台传则云岁己卯，太祖十四年。大军至蟾河，与灭里吉遇，尽降其众。其部主霍都奔钦察，速不台追之，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癸未，太祖十八年。速不台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辗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乙未，太宗命诸王拔都西征八赤蛮，命速不台为先锋，与八赤蛮战，继又令统大军，遂虏八赤蛮妻子于宽田吉思海。八赤蛮逃入海中。然则钦察与八赤蛮，本是两部，速不台以太祖癸未平钦察，太宗乙未走八赤蛮，相距十有三年。而宪宗擒八赤蛮在丁酉岁，距钦察之平，盖已久矣。土土哈传，太祖征蔑里乞，即灭里吉。其主火都即霍都奔钦察，钦察国主亦纳思纳之。太祖命将往讨，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祖。而宪宗受命帅师，已叩

（注释〔1〕转下页）

夏四月，筑扫邻城[1]，作迦坚茶寒殿[2]。

(接上页注释[1])

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其叙被兵之状，与速不台传合，而酋长之名，彼此互异。且速不台平钦察之时，宪宗仅十六岁，初无受命帅师之事，而土土哈传并而为一，益不然矣。

《本证》卷1，证误1：案宪宗纪亦以八赤蛮为钦察酋长。《地理志》"钦察"作"钦叉"，事与纪同。考速不台传，败钦察在太祖己卯，平钦察在太祖癸未。其征八赤蛮，则在太宗乙未，距钦察之平已十有三年。此以八赤蛮为钦察酋长，误矣。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0)：详见布莱特施乃德(按，《中世纪研究》，上、下卷，伦敦，1888年[*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n Sources*, I u. II, London, 1888])，页310-312；伯希和《库蛮考》，页166；志费尼书(按，博伊尔英译本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Manchester, 1958)，页553正面；拉施都丁书，页58正面(按，其第2卷博伊尔英译本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New York und London, 1971)(Einzelheiten bei BRETSCHNEIDER, S. 310-312; PELLIOT, A propos des Comans, S. 166; JUVAINI, S. 553 f; RASHID, S. 58 f)。——《太宗纪》德译，页147。

蒙哥征钦察，获其酋长八赤蛮بجمان(Bajman)之事，除《宪宗纪》等汉文史料之外，波斯史家志费尼有详细记载，参见《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659-660，详见《宪宗纪》。

[1]《圣武亲征录》："丁酉，夏四月，筑扫邻城。"[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5)《辍耕录》"内八府宰相"条有云："埽邻者，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何秋涛：《元史类编》云在和林北七十余里。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1)：Sa'urin。从宫殿的蒙古语名称"Gegen chaγan"推断，两者均建于和林之此之湖边。试对照注(148)(按，指德译注)，《元史》，叶8，页38上。试对照博伊尔《窝阔台大汗的季节性居地》，页145-146(Sa'urin. Vom Namen des Palastes, mong. "Gegen chaγan" her zu schliessen, wurden beide, Sa'urin und der Palast, an den Seen nördlich von Qaraqorum [vgl. Anm. 148] errichtet. YS S.8, 38v. Vgl. BOYLE, *Seasonal Residences*, S. 145-146)。——《太宗纪》德译，页147。

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扫邻当为蒙文 sa'urin 的音译，有座位或驿站顿舍的意思。这里所谓"扫邻城"，应是大汗的春猎地行宫。参阅九年纪事"揭揭察哈"注。

[2]参阅九年纪事"揭揭察哈"注。

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1]。

秋八月[2]，命术虎乃[3]、刘中[4]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5]。

冬十月，猎于野马川[6]。幸龙庭，遂至行宫。

---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太宗九年"侍臣脱欢奏选室女，敕中书省发诏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问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备后宫使令。而脱欢传旨又欲遍行选刷，臣恐重扰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罢之。"

此事甚至传至西域，以致志费尼亦有记载："在千户……的部落中，出现谣言说有招括该部的少女去配人。因为给这个消息吓坏了，人们就把他们的闺女在族内婚配，有些他们实际上是送上男家。有关的消息一口传一口，传到皇帝耳中。他派一队异密到那里去，调查此事。查明属实后，他下诏指导七岁以上的少女都集中起来，当年许配人从夫家追回。四千名各有打动男人心弦处的星星般少女，就这样聚集一处。……首先他命令把那些异密之女和另的分开来，接着所有在场者奉命糟蹋她们。其中两个月儿般的少女毙命。至于剩下的纯洁少女，他让她们在斡耳朵前列队，那些品貌堪充下降的送往后宫，另一些则被赐给豹子和野兽的看管人。还有一些赏给宫廷的各类奴仆，再有的送至妓院和使臣馆舍侍候旅客。至于那些仍然剩下来的，有诏叫在场的人，不分蒙古人和穆斯林，可以把她们带走。而他们的父兄、亲属和丈夫，观看着，不能透气或出声。这是他的诏令严厉执行，他的军队顺从的一个绝对证明。"——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270。何高济已发现与《太宗纪》所记系同一事件，并指"左翼诸部"为斡亦剌部，见页276，注(66)。

〔2〕《庙学典礼》(《元代史料丛刊》，王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页9)所记应与此事有关：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圣旨道与呼图克、和塔拉、和坦、谔噜、博克达扎尔固齐官人每：自来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振。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材。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此上委令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征收课程所长官刘中，遍[行]诸路一同监试，仍将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试，专治一科为一经，或有能兼者，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其中选儒人，与各住处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者，随后照依先降条理，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准此。

〔3〕《本证》卷37，证名1：术忽乃，选举志一科目。按，术虎乃为聂思脱里教名，元代又常译写为月合乃等，今译为约翰。

〔4〕刘中，见前注。

〔5〕《圣武亲征录》："秋，八月，试汉儒，选擢除本贯职位。"

《元史》此处"得四千三十人"有误。据《元史》卷81《选举志》："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此次科举之事，《元史·选举志》与本卷记载相同，均在太宗九年，即1237年。但元好问撰《杨奂墓碑》载在戊戌年，即1238年。碑文见杨奂：《还山遗稿》附录，《适园丛书》本。参见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载于《黄时鉴文集》，中西书局，2010年，页5。

〔6〕〔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5)：定宗元年，猎黄羊于野马川。明《岷峨山人译语》："野马川在宣府西路膳房堡外。"

是冬，口温不花[1]等围光州，命张柔、巩彦晖[2]、史天泽攻下之。遂别攻蕲州，降随州，略地至黄州。宋惧请和，乃还。[3]

十年戊戌春，塔思[4]军至北峡关，宋将汪统制降。

〔1〕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次子。

〔2〕《元史》卷166有传。

〔3〕《元高丽纪事》(叶6)：八年至九年，攻拔归信城、金山城、金洞城。

〔4〕即木华黎子查剌温。

夏[1]，襄阳别将刘义叛，执游显等降宋。宋兵复取襄、樊。帝

〔1〕《元高丽纪事》(叶6)：十年戊戌五月十二日，降旨，宣谕高丽新降人赵玄习、李元佑等。时玄习辈率二千人迎军降，命东京安置，受洪福源节制，且降御前银牌，使玄习等佩之，以招来降户民。寻又有李君式等十二人来降，亦依玄习例抚慰之。且谕唐古，就活里察时磨里地，取洪福源族属十二人付之。

《大元马政记》(页4)：太宗皇帝十年戊戌六月二日，降圣旨：宣谕札鲁花赤胡都虎、塔鲁虎□、讹鲁不等节该。自今诸路，应有系官诸物，及诸投下宣赐丝线疋段，并经由燕京、宣德、西京经过。其三路铺头口，难以迭办。今验紧慢定立铺口数目，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通该旧户二百一十七户四分着马一匹；新户四百三十四户八分，着马一匹；旧户一百六十九户二分，着牛一头；新户三百三十八户四分，着牛一头。圣旨到日，仰即便差人，与各路差去人，一同前去所指路分，着紧催促验数，分付各路收管。见得以南路分马疋牛畜难得，今约量定立到马一匹，价银三十两；每牛一头，价二十两。仰各处皆验燕京，酌中时直，折纳轻赍疋段、沙罗、丝线、绢布等物，用铺头口转递交付，却令三路置库收贮。明附文历支销回易诸物。于迤北民户内，逐旋倒换头口用度。若各自愿计置头口分付者，听从民便。不得因而刁蹬抑勒，多要轻赍。除各路别给御宝文字外，据燕京路合得协济路分，开具下项。东平府路所管州县城，验户二十三万四千五户免征外，实征二十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五户。内有本路课税所从实勘当新旧户记，照依铺头口分例，另行科征送纳。总合着马七百八十八匹五分五厘，牛一千一十七头二分四厘。旧户一十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七户，合着马五百二十九匹一份五厘，牛六百八十一头八分。新户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八户，和着马二百五十九匹四分，牛三百三十五头四分四厘。民户二十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九户，重数户课税所户在内摽拨与宗王口温不花、中书吾图撒合里，并探马赤查剌温火儿赤一千七百五十八户，内民户一千七百一十二户，驱户四十六户。民户内，旧户八十一户，新户一千六百三十一户。宗王口温不花拨讫一百户，内旧户三户，新户九十七户。中书吾图撒里合里拨讫新户三百四十五户。秃赤怯里马赤拨讫新户六户。查剌温火儿赤件等回回大师拨讫新户三十户。讹可曹王拨讫新户一十户。罗伯成拨讫新户三户。夺活儿兀兰拨讫新户七户。查剌温火儿赤并已下出气力人拨讫一百八十五户。乞里□并已下出气力人拨讫三百三十六户。内旧户三十八户，新户二百九十八户。笑乃□并已下出气力人拨讫四百六十七户。内旧户二十七户，新户四百四十户。孛里海拔都拨讫一百户。课课不花拨讫五十五户。合旦拨讫一百一十六户，内旧户一十一户，新户一百五户。外驱户八十二户，回回户九十六户，打捕户二十户。关于上述《马政记》中括马数字问题，参见 Liu & Gong Haifeng, Policies of Acquiring Horses in Early Yuan: A Short Note on the Case of Dongping (1238), in Perde in Asien: Geschichte, Handel und Kultur (*Horses in Asia: History, Trade and Culture*) (《元初马匹的和买政策研究——以东平为中心》, herausegegeben von Bert G. Fragner, Ralph Kauz, Roderich Ptak, Angela Schottenhammer,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2009, pp. 83-85.

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筑图苏湖[1]城，作迎驾殿[2]。

秋八月，陈时可、高庆民[3]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4]。

十一年己亥春，复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皇子阔端军至自西川。[5]

秋七月，游显自宋逃归。以山东诸路灾，免其税粮。[6]

---

[1][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5)：揭揭察哈即前文迦坚茶寒殿所由命名也，此于泽畔再筑一城而名曰迎驾，则在中站可知。《地志》云："戊戌，营图苏湖迎驾殿，去和林城三十余里。"

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根据《世界征服者传》《史集》《元史》的记载认为：从汪吉东营地返和林，走的是南北向的路，图苏湖城似应在和林之南。危素《危太朴续集》卷7，《耶律希亮神通碑》记载希亮"生于和林城南四十里之秃忽思凉楼"。"秃忽思"当系"秃思忽"之误。罗洪先《广与图》于和林之南标有"秃思忽凉楼"，即此。所谓"凉楼"，是文人妄加"雅名"，实际上牛头不对马面。这个和林城南的秃思忽凉楼，应该就是上述的图苏湖城(迎驾殿)。只是《耶律希亮碑》所记的里数较《元史》和《史集》多一些。

[2]《圣武亲征录》："戊戌夏，筑秃思儿忽城。"

[3]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国维遗书》第1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20)：《送燕京高庆民行》。

[4]至于此月元与高丽往来，《元高丽纪事》(叶6)：十年戊戌"十二月二十四日，瞮遣其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等，奉表入朝。"

[5]《圣武亲征录》九年："冬十一月，[曲]赤(曲)、(阙)[阔]端等克西川。"

至于此月元与高丽往来，《元高丽纪事》(叶6)：十一年己亥四月，奉旨遣宝鼎僚属校尉黄贞允、义州别将朴希宝，从诏使先还。五月一日，降诏，征瞮入朝曰：前来颁降长生天之圣训去后，尔不为听从，为尔不行省悟，是以出军进讨，明致天罚。尔又不即迎军出降，并无出力供职之辞。乃敢窜诸海岛，苟延残喘。昔降宣谕，命汝亲身入朝，却令还国。此诏见在彼中，若能钦依元降诏旨，躬亲赴阙，所有一切法制宣谕了毕，即当班师。尔等违背诏书，辄来奏告，乞令军马回程，于理未应，此非尔等之罪也。如此诏谕，尔等或有违贰，我朝安能知之。上天其监之哉。十一日，诏告取洪福源族属。六月，瞮遣其礼宾卿卢演、礼宾少卿金谦，充进奉使副，奉表入朝。

[6]《元高丽纪事》(7)：十一年己亥"九月，宝鼎、彦琦，从诏使还国。十月十三日，降旨，宣谕瞮曰：据来具奏悉，云缅贡诚忱，辄中感戴，已具陈于前表。据回降宣谕，已令元使赍去。又奏先妣柳氏倾逝，仰瞻天阙，未有所诉。如有所奏，实能拜降出力。仰于庚子年亲身朝见，但有条画事件，至日省谕。如违元表，诬奏，我国焉能知，上天其监之。十二月十二日，瞮遣其新安工王佺，与宝鼎、彦琦等一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贡。"

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阿速蔑怯思[1]城，阅三月，拔之。

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2]买扑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3]

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4]充提领诸路课税所

〔1〕《本证》卷49，证名13：灭怯思，昔里钤部传。〔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5)：阿苏，《西北地附录》云阿速亦以水为名，今俄罗斯阿速海。《明史·外国传》："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不宜耕牧 。"又沙哈鲁在阿速西海岛中。又(页26)：蔑怯思城，《昔里钤部传》作灭怯思，《土土哈传》作麦怯斯，《拔都传》作麦各思，明艾儒略《职方外纪》有莫斯哥未亚国，此城当即其地。按，《明史》与《职方外纪》所云皆不确。

〔2〕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页28-29：太宗时代的奥都剌合蛮应与忽必烈时代派去波斯查计忽必烈在波斯的份子收入的奥都剌合蛮区别开来。据《史集·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页455，页522；汉译本，页307)、《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见德黑兰1959年刊本，页647；俄译本第2卷，页171-172；英译本，页270-271)，阿里不哥失败后，旭烈兀去世之前，朝廷与伊利汗国有一次极为重要的使臣往来，忽必烈派赤老温之孙撒礼答以及奥都剌合蛮去波斯，而伊利汗国派伯颜来华报聘。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第2卷的英译者博伊尔都认为忽必烈时代的奥都剌合蛮就是太宗旧臣、乃马真皇后摄政时受到重用的奥都剌合蛮。而《史集》(德黑兰刊本，第1册，页570；《史集》第2卷，俄译本，页120；英译本，页183)记载贵由汗即位后，下令将华北地区的行政权归牙老瓦赤，并处死了奥都剌合蛮，因此，忽必烈派到波斯会计大汗份子的奥都剌合蛮与太宗时代的奥都剌合蛮是两个人。

同氏："奥都剌合蛮，(‘Abd al-Rahmām)，‘Abd，阿拉伯文，译言奴隶、仆人；al，定冠词；Rahmām，意为仁慈的。‘Abd al-Rahmām，译言仁慈之仆。今写作阿卜杜·拉赫曼。刘敏中《南京路总管府事赵公神道碑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元刻本，卷7，页15)又译作奥都鲁哈蛮。——见拙文《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载于《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页186注。

〔3〕《元高丽纪事》(叶7)：十一年己亥"十二月十二日，瞰遣其新安工王佺，与宝鼎、彦琦等一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贡。"

〔4〕《本证》卷37，证名1：奥鲁剌合蛮、耶律楚材传。奥都剌、刘敏传。奥鲁合蛮、刘秉忠传。

官[1]。皇子贵由克西域[2]未下诸部,遣使奏捷。命张柔等八万户

[1]《圣武亲征录》"己亥。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剌合蛮主汉民财赋。"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页43):〔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据波伊勒英译本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部第34节《脱列哥那哈敦》:"有个叫法蒂玛的女人,她在脱列哥那哈敦手下获得巨大的权势,……她提拔奥都剌合蛮,把他派到契丹去代替马合木(即马合木牙老瓦赤)。"牙老瓦赤在1241年受命"主管汉民公事",出任燕京行省,但很快罢任。——参见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编》,载于《蒙古史研究》第3辑。奥都剌合蛮并非由于法蒂玛的关系才受任用,他在太宗末期就已主管中原地区课税事。但牙老瓦赤下台后,由他接替出任主管中原事物的燕京行省是有可能的。

李庭秀"丁酉(1237,太宗九年),兼权本路征收课税副官。戊戌(1238),升郎中,提控左右司。时公方四十,已兴怀止足。后二年(1240,太宗十二年),宣差提领诸路课税所,以公廉悉着,特授监榷平阳路征收课税官。"——同氏:《中书左右司郎中李公新阡表》,《矩庵集》卷5,四库本。这里提到的李秀庭的上级"宣差",当即奥都剌合蛮。

《耶律楚材神道碑》:"回鹘译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进用。公虽加奖借,终不能满望,即奔诣镇海,百计行间,首引回鹘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增至四万四千定。公曰:'虽取四十四万亦可得,不过严设法禁,阴夺民利耳。民穷为盗,非国之福。'而近侍左右。皆为所啗,上亦颇惑,众议欲令试行之。公反复争论,声色俱厉。上曰:'汝欲斗搏耶?'公力不能夺,乃太息曰:'扑买之利既兴,必有蹑迹而篡其后者,民之穷困将自此始。'于是政出多门矣"——苏天爵编:《元文类》,四部丛刊影元至正刊本,卷57;并见《中书耶律文正王》,《元名臣事略》卷5,中华书局标点本,页82,亦当指此事。

[2]〔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6),《耶律希亮传》云:"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云云。意当时克西域时所居与。

伐宋。[1]

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国初，令民代偿，民多亡命，至是罢之。[2]

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

---

〔1〕《元高丽纪事》(叶7-8)：十二年庚子三月，瞰遣右谏大夫赵修、合门祗候金城宝等，奉表贡献。五月，诏谕瞰曰：所奏事具悉，语皆不实。如果无虚诈，尔等若能依元奏之事，又何难见。止为合车、箚剌已死，奏此谄妄之语。知此事之人俱在，尔等所奏，先曾出力之事，我非童稚，岂能欺我哉！自先出力之事，我亦知矣。来章赞祝，更复何言。我国处正宣谕如此，依其所奏，悉能无二，固可嘉尚。若果无二心，迁出海岛民户，悉令见数。如差去使臣未到间，切勿令出。候使到日，然后出迁。令使臣一一点数，据谕去使臣(来)[未]到间，切勿令之出言。尔等勿谓不令出海，止是伺候使臣到日迁出，仍令一就点数民户毕，然后出海。据海内所有民舍，尽令烧毁。尔等必有再往之意，如再入海，必有拒敌之谋。若将民户数目隐匿，依大朝条例治罪。其民户见数，据合出秃鲁花人数，然后明降谕去。出海抚定之后，别无详细人使，继岁取发贡赋。如不出海，以大军攻取。又昌朔州民户来宾，尔等辄将家口杀掠。据擅行杀掠之人，岂非罪欤？将为首始谋万户、千户官员人等，仰捉拏发遣前来。尔等既称一国，一国之中，岂有此事。彼处被劫落后流移人数，尽数刷集分付。如将行劫之人，不行捉拏发遣。及将流移民户，故不起发，岂为出力供职之事耶？如尔等教令杀掠，故不捉拏。若不曾教令，必捉拏分付。着古欤之事，当时尔等特赖亏加下所违德愆，除已发罪讫，即目犹似亏加下出理。伐亏加下罪时，曾助多少军马。今后既为一国，凡有来宾人民，邀当匪当也。若将大国条画抗拒，必有叛背之意。迁出海岛，点数民户，出秃鲁花，捉拏有过之人，惟此四事谕去，何足多言。如能出海，数见户数，出秃鲁花。凡有条画，至是省谕，及汝弟佺口奏告，有兄瞰令奏：凡有皇帝圣训，必不违背。据奏过事目别录付去，汝当知之。如此宣谕，却行不出海岛来奏云，必不违背。如是却违前言，我国焉能知。上天其监之。攻拔昌州等处。

〔2〕《通制条格》(黄时鉴点校，《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页48)：庚子年十二月十八日，怀州刘海奏：王荣未反已前定女师哥为妇，不曾娶过。王荣反背，今将王荣男断与纯赤海，合无成亲。准奏。反背的人孩儿，怎生将有功的人女孩儿与得？刘海你不寻思有功的儿嫁与那甚么？

著为令。[1]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公为请于上，悉以官银代还，凡七万六千定。仍奏定，今后不以岁月远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为定制。"该神道碑与苏天爵《元名臣事略》置此事于丙申年（太宗八年，1236）。

《元史》卷152《王珍传》："岁庚子，入见太宗，授总帅本路军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于帝曰：'大名困于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

罢羊羔息之事，影响甚大，西域亦闻之。志费尼记："契丹国有一座叫太原府（*Tayanfu）的城市，该地的百姓提交一份申请说：'我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它将使我们遭到破产，而我们的债主正在要求偿还。倘若降旨叫我们的债主宽限我们一个时期，那么我们能够还步偿还他们，将不会破产流离。'合罕说：'如果我们叫他们的债主宽限他们，他们要蒙受巨大损失，但如我们置此事于不顾，百姓又将倾家荡产。'他因此命令出一个告示，在整个国内公布说，凡有债权者可提出契约，要么负债者可指出债主，他就可以从国库领取现金。'那从未关闭的国库大门，大大敞开，于是百姓们前去领取巴里失；很多人没有债务，装成债主和负债者，也领取巴里失；因此他们所得倍于所求。"——《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46。

此事发生的地点，志费尼写为طايمعو（Tāym'ū），英译者博伊尔校正为طاينفو（Tāynfū），并理解为"太原府"（见页272，注20）。何高济已经发现此事即本《太宗纪》所记羊羔儿息之事，并作评论：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志费尼说，在契丹国有个叫作ṬAYM'W的城市，该城的居民上书称，他们欠了八百八里失的债，请求下诏给债主，缓期归还。窝阔台说，如果叫债主缓期，那债主要受到损失，如果置之不理，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因此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诏令一下，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前去国库领取现金。这个故事，我们从《元史》中找得到若干条例证，例如，《太宗本纪》曾载录……。"

志费尼提到的城名ṬAYM'W，波伊勒把它订正为ṬAYNFW，即Tayanfu，山西的太原府。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M，拉施特的《史集》同。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Tai-min-fu，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页52，注[57]）。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D本）作ṬANMΓW，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Taminfu的讹误。从这些线索看，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不是山西的太原府，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按《元史》卷152《王珍传》载：'岁庚子（1240），入见太宗，……珍言于帝曰：大名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这里说的官司偿所借银，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译者序，页8-9。

西域人本息叠加的羊羔息，人皆知其害，但在元代并未因太宗的命令而绝迹。王盘：《史天泽神道碑》提到，宪宗时"兵火之余，民间生理贫弱，往往从西北贾人借贷，周岁辄出倍息，谓之羊羔利。稍积数年，则鬻妻卖子不能尽偿。公奏：乞令民间负债出息至倍则止。上从之，遂为定法。"

（注释[1]转下页）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猎于揭揭察哈之泽[1]。帝有疾，诏赦天下囚徒。[2]帝瘳。

秋，高丽国王王(綧)[瞮]以族子綧入质。

冬十月，命牙老瓦赤[3]主管汉民公事[4]。

十一月丁亥，大猎。庚寅，还至鈋铁𨱎胡兰山[5]。奥都剌合蛮

(接上页注释[1])

(《元文类》卷58)

《平章廉文正王》引廉希宪《家传》亦记宪宗时"富民贷钱民间，至本息相当，责入其本，又以其息为券，岁月责偿，号羊羔利。其征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胜其毒。公正其罪，虽岁月踰久，毋过本息对偿，余皆取券焚之。后着之令。"(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7)

〔1〕蒙语Gege(n)-chagha(n)的音译，意为"洁白"。

〔2〕《耶律楚材神道碑》记："辛丑(1241)春二月，上疾笃，脉绝。皇后不知所以，召公问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变屡见，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荧惑退舍之事，以为证。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顷之，上少苏，后以为奏，上不能言，颔之而已，赦发，脉复生。"

〔3〕《本证》卷37，证名1：牙剌瓦赤、宪宗纪元年。牙鲁瓦赤、世祖纪、刘敏、姚枢传。

〔4〕《圣武亲征录》："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

〔5〕〔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页26)：《宪宗纪》："诸王大会于阔帖兀阿阑，共推即位于斡难河。"此纪之鈋铁𨱎胡兰山，即斡难河之阔帖兀阿阑也。《辍耕录》："太宗崩于胡阑山。"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认为：讹铁钴胡兰山在《元史·宪宗纪》里作月帖古忽兰Ötegü qulan，意为老野马，也是从前克烈可汗的驻冬营帐所在地，1253年末卢勃鲁克所到的蒙哥汗营帐应即此地，其地理位置大约在翁金河上游。

进酒，[1]帝欢饮，极夜乃罢。[2]辛卯迟明，帝崩于行殿。[3]在位十

---

[1]前已提及，据《耶律楚材神道碑》，回回译史安天合依靠耶律楚材政敌镇海得用，并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太宗嗜饮贪杯与奥都剌合蛮有很大关系。奥都剌合蛮在任真定课税所长官时，曾向太宗进酒。据刘敏中《少中大夫同知南京路总管府事赵公墓道碑铭》记载：

"公讳珪，字君宝，世家弘州，后徙燕，遂为燕人焉。公资开敏刚正，未冠失父，与兄璧侍母避乱，迁魏，又迁长安。益长，辞母东游，过真定，寓神霄宫，掌教识其先世，怜之，留使从学，遂至于有立。始以真定课税所辟干靖海场盐官，市帛当送输京。众惮之，公独请行。既输，从领省奥都鲁哈蛮觐和林。一日，太宗方宴，缚领省出阃，直庐中，莫测所以罪。从者皆散匿，独公在侧。领省勉使去，竟弗动。翌日，内出酒一碗，敕领省饮。酒墨色，知赐死，领省伏饮，公从旁亦取饮。既移晷，静无所觉。敕使视之问曰：向酒汝所进，果何酒也？领省悟，对曰：臣所进尊白金，新制药淬，未久涉远，故酒败色渝，斯诚臣罪当死。帝悉其诚，释之。领省义公异常人，奏授领中书郎中以归。"——《中庵集》，卷7，元刻本，页15。此碑墓主名称元刻本与清钞本均无法看清。唯四库本十分清晰，且不称"墓道碑铭"，而称"神道碑铭"，见卷16。

因所进酒变质色黑，太宗盛怒，命将奥都剌合蛮缚帐中，并以所进酒赐死。后因奥都剌合蛮饮后并无不良反应，才释罪。

关于此人的进一步细节，见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中《两位奥都剌合蛮辨》一节，原文刊于《蒙古史研究》第2辑，1986年，收于氏著《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页25-27。

[2]太宗嗜饮曾遭耶律楚材劝阻。《耶律楚材神道碑》记："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与诸大臣酣饮。公数谏，不听。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铁为酒所蚀尚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耶？'上悦，赐以金帛，仍敕左右日进酒三钟而止。"

[3]《耶律楚材神道碑》记："冬十一月，上勿药已久。公以太一数推之，奏不宜畋猎。左右皆曰：'若不骑射，何以为乐？'猎五日而崩。"太宗丁亥（1241年12月7日）大猎，庚寅（12月10日）还，辛卯（12月11日）凌晨去世，前后合计确为五日。

三年[1],寿五十有六。葬起辇谷[2]。追謚英文皇帝,庙号太宗。

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称时治平。

(将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7辑,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院中心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韩儒林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集。)

---

[1]《圣武亲征录》:"十一月初七日,至地名月忒哥忽阑,病。次日崩,寿至五十六,在位一十二年。"此"月忒哥忽阑",即前文中提到之"讹铁钴胡兰山",《宪宗纪》中作"月帖古忽兰",原名为蒙古语Ötegü qulan,此言老野马。

[2]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总第97期,2010年3月20日,页11):据载,太祖成吉思汗以下蒙元诸帝均葬于此(其实太宗窝阔台和其子定宗贵由没有葬在这里)。学界对这个地名曾有过多种说法。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是指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南坡的某处谷地,这是综合了《史集》和《黑鞑事略》的记载得出的,就大范围而言基本正确;或以"起辇谷"为克鲁伦(Keluren)的音译,推论的方位大抵与此同。还有学者以"起辇谷"为汉语,意为"乘辇起程的山谷"。亦邻真在《起辇谷与古连勒古》(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又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747-753。)一文中,评论了前人对此地的各种说法,提出新说:"起辇谷"是音译名,就是《圣武亲征录》所载"曲邻居山"、《元朝秘史》(明初汉译本)作"古连勒古"(Gurelgu)的同名异译。其语言学、历史学的论证都十分精到,令人信服。《元朝秘史》多处记载到这个地名,使我们可以据以判断其方位。第89节载:(帖木真逃出泰赤兀人的囚禁后,溯斡难河上游支流乞沐儿合小河寻找母、弟)"在那里相会之后,便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阳的古连勒古之中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干的阔阔纳兀儿,扎下营盘"(明初音写"古连勒古""合剌只鲁干"均旁注"山名")。第94节、122节、129节、141节都记载有这两个地方,或注"山名",或注"地名"。在这里,帖木真被追随他的蒙古各氏族头领推举为"汗"(qan),订下盟约,并指派了佩弓箭、佩刀和管饮膳、马群,负责哨探等人员,建立起蒙古乞颜部贵族联盟,据有克鲁伦河上游各地,包括萨里川(今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间地)。可以说,古连勒古是蒙古乞颜氏和成吉思汗的始兴福地,徐霆所谓"相传忒木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应该是"兴于此,故死葬于此"。蒙古考古学家丕尔烈认为这个地名应是指东经109度/北纬48度、曾克尔河上游流域一片相当大的地段;亦邻真参照其说定为曾克尔满达勒一带(注释:亦邻真《起辇谷与古连勒古》)。综观《秘史》各节记事,其地应在"不儿罕山前(南)",是可以容纳众多牧民居住的水草丰富的原野,曾克尔满达勒一带位于肯特山南麓,原野宽广,符合"古连勒古"之地的条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所标"曲邻居山"(古连勒古)方位大体不误,似略偏北。作为成吉思汗及蒙元诸帝葬地的"起辇谷"来说,还要具备文献所载"平原"地形和能够挖掘较深墓穴的土层条件。总之,在曾克尔河中上游一带的肯特山南麓坡地寻找蒙元诸帝墓葬,方位应该大致不误。

4 《元史·百官志》武官正三品资阶订误

4.1 有关元武官资阶的主要史料

《元史》列传部分与元代碑传资料中有大量武将除授军职的记载。通常查核元武官资阶的主要资料是《元史》卷91《百官志七》。其文如下：

> 武散官三十四阶：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以上正二品。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以上从二品。昭武大将军，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以上正三品。安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以上从三品。广威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以上正四品。信武将军，显武将军，宣武将军，以上从四品。武节将军，武德将军，以上正五品。武义将军，武略将军，以上从五品。承信校尉，昭信校尉，以上正六品。忠武校尉，忠显校尉，以上从六品。忠勇校尉，忠翊校尉，以上正七品。修武校尉，敦武校尉，以上从七品。保义校尉，进义校尉，以上正八品。保义副尉，进义副尉，以上从八品。右武散官三十四阶，自龙虎卫上将军至进义副尉，由正二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1]

除上述《元史·百官志》的有关记载之外，还有两种成书早于《元史》的元代史料也记载了武官资阶的划分，其一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

〔2〕《元史》卷91《百官志》，中华书局，1976年，页2321-2322。

以后编成的《元典章》（参见表4-1），[1]其二为元末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参见表4-2）。[2]

表4-1 《元典章》文武官制资品

武资			文资			
仪同三司		开府 仪同三同	仪同三司		开府 仪同三司	
崇进		特进	崇进		特进	正一品
银青 光禄大夫		金紫 光禄大夫	银青 光禄大夫		金紫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从一品
骠骑卫 上将军	金吾卫 上将军	龙虎卫 上将军	资善大夫	资政大夫	资德大夫	正二品
镇国 上将军	辅国 上将军	奉国上将军	中奉大夫	通奉大夫	正奉大夫	从二品
昭勇 大将军(?)	昭毅 大将军	昭勇 大将军(?)	嘉议大夫	通议大夫	正议大夫	正三品
怀远 大将军	定远 大将军	安远 大将军	亚中大夫	中大夫	太中大夫	从三品
宣威将军		广威将军	中顺大夫	中宪大夫	中议大夫	正四品
显武将军		信武将军	朝列大夫	朝散大夫	朝请大夫	从四品
武德将军		武节将军	奉议大夫		奉政大夫	正五品
武毅		武略将军	奉训大夫		奉直大夫	从五品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承直郎		承德郎	正六品
忠武校尉		忠显校尉	儒林郎		承务郎	从六品
忠翊校尉		忠勇校尉	承事郎		文林郎	正七品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从仕郎		徵事郎	从七品
保义校尉		进义校尉	将仕郎		登仕郎	正八品
保义副尉		进义副尉	将仕佐郎		登仕佐郎	从八品
注初入仕官员						正九品

[1]《元典章》吏部卷之1《典章七·官制·资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元刊本，页175。

[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官制资品”，中华书局，1980年，页89。

表4-2《南村辍耕录》文武官制资品

武资			文资			
			金紫光禄大夫 崇进 开府仪同三司 银青光禄大夫 特进 仪同三司			正一品
			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从一品
骠骑卫上将军	金吾卫上将军	龙虎卫上将军	资善大夫	资政大夫	资德大夫	正二品
镇国上将军	辅国上将军	奉国上将军	中奉大夫	通奉大夫	正奉大夫	从二品
昭勇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昭武大将军	嘉议大夫	通议大夫	正议大夫	正三品
怀远大将军	定远大将军	安远大将军	亚中大夫	中大夫	太中大夫	从三品
明威将军	宣威将军	广威将军	中顺大夫	中宪大夫	中议大夫	正四品
宣武将军	显武将军	信武将军	朝列大夫	朝散大夫	朝请大夫	从四品
	武德将军	武节将军		奉议大夫	奉政大夫	正五品
	武略将军	武义将军		奉训大夫	奉直大夫	从五品
	昭信校尉	承信校尉		承直郎	承德郎	正六品
	忠显校尉	忠武校尉		承务郎	儒林郎	从六品
	忠翊校尉	忠勇校尉		承事郎	文林郎	正七品
	敦武校尉	修武校尉		从事郎	徵事郎	从七品
	进义校尉	保义校尉		将仕郎	登仕郎	正八品
	进义副尉	保义副尉		将仕佐郎	登仕佐郎	从八品

对比上述3种史料，可发现它们关于武官正三品资阶的记载有明显区别。《元史·百官志》记武官正三品从高到低资阶的排列顺序为昭武大将军、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1]《元典章·吏部》中武官正三品资阶从低到高排列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勇大将军。[2]该记载中“昭勇大将军”前后两见，不合情理，肯定有误；而昭武大将军衔未出现，两个“昭勇大将军”中应当有一个是昭武大将军，乃刻工雕版有误。《南村辍耕录》所记武职正三品资阶由低及高的排序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

〔1〕《元史》卷91《百官志》，页2321。

〔2〕《元典章》吏部卷1《典章七·官制·资品》，页175。

将军、昭武大将军。[1]

对比上述记载，可以发现三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南村辍耕录》与《元典章》中，昭毅大将军位序均在昭勇大将军之前，而在《元史》中则为其后。换而言之，在《南村辍耕录》与《元典章》中，昭勇大将军为正三品中之最低阶，昭毅大将军资阶居中；而在《元史·百官志》中，昭毅大将军为该品之最低阶，昭勇大将军资阶居中。此外，元武官正三品最高阶，在《元史·百官志》与《辍耕录·官制资品》中均为昭武大将军，而昭武大将军这个资衔在《元典章·吏部》却未出现。究竟孰是？

4.2　元武官资阶制的金代背景

元代武官资阶的基本制度与金朝有密切关系。查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千官品列》：

> 武官：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崇进。正二品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从二品光禄大夫、荣禄大夫。正三品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正四品昭武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勇大将军。从四品安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正五品广威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从五品信武将军、显武将军、宣武将军。正六品武德将军、武节将军。[2]从六品武义将军、武略将军。正七品承信校尉、昭信校尉。从七品忠武校尉、忠显校尉。正八品忠勇校尉、忠翊校尉。从八品修武校尉、敦武校尉。正九品保义校尉、进义校尉。从九品保义副尉、进义校尉。[3]

再查《金史·百官志》：

> 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自正三品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官制资品"，页89。

〔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4《千官品列》，中华书局，1986年，页498，校勘记34。"武德将军、武节将军"，《金史》卷55《百官志》武散官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此处武德将军置于武节将军之前，校勘者疑误。

〔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4《千官品列》，页490-491。

以下，阶与文资同：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从四品上曰安远大将军，中曰定远大将军，下曰怀远大将军。正五品上曰广威将军，中曰宣威将军，下曰明威将军。从五品上曰信武将军，中曰显武将军，下曰宣武将军。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从六品上曰武义将军，下曰武略将军。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从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显校尉。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下曰忠翊校尉。从八品上曰修武校尉，下曰敦武校尉。正九品上曰保义校尉，下曰进义校尉。从九品上曰保义副尉，下曰进义校尉。[1]

对比元、金官制，可以看出元武官资阶基本沿袭金制，但各品元制均较金制高出二级。故而本文上面所讨论的昭勇、昭毅与昭武大将军称谓乃源自金制，但其资阶在金代较元代低两级，为正四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制》所记金武官正四品的资阶从低到高排列均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武大将军。换而言之，昭勇大将军为该品最低阶，昭毅大将军资阶居中，而昭武大将军则资阶最高。从元武职品序承金制的角度讲，昭武、昭毅与昭勇三种武职的高低排序也应当与金代相同。

由此反观上引有关元代武官资阶的3种史料，可发现《南村辍耕录》中的排列恰与金代完全相同。

(1)《元典章·吏部》在武职正三品所列两个昭勇大将军中，第一个“昭勇大将军”当按《南村辍耕录》《元史·百官志》与《大金国志》《金史·百官志》的记载，确定为“昭武大将军”之讹，即正三品之最高阶为昭武大将军。

(2)依《南村辍耕录》《元典章·吏部》，以及《金史·百官志》与《大金国志》的记载，《元史·百官志》置“昭勇大将军”于“昭毅大将军”之前当误，元代武官正三品职衔从高到低的排序应当为：昭武大将军、昭毅大

[1]《金史》卷5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页1221-1222。

将军与昭勇大将军。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利用《元典章·吏部》《南村辍耕录》中有关武官品级的记载与《元史·百官制》相比较,特别是利用有关金史史料《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所记武资职官表的排序互相比勘,足以证明《元史·百官志》中有关武官正三品昭毅、昭勇与昭武大将军的排序有误。订讹工作可就此完成。

4.3 元正三品武官的除授实例

上述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与订讹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只能证明金代武官正四品与元代武官正三品资阶由低到高的制度规定顺序均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武大将军。而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元政府是否依此品序提升武官,即上述三种武官称号的品序差别是否真的反映元代武官的资阶高低,仍需史料证明。而要说明这一点,需翻检大量史料,从中查找元代武官晋升的实例,目前尚未见有学者涉及。幸而近年来出现各种检索工具,使笔者有可能从事这类探索。

笔者拟先论证昭勇大将军低于昭毅大将军,再证明昭武最高,以说明本文所订正的元武官正三品资阶排序,符合元代晋升武将的实例。

4.3.1 昭毅大将军与昭勇大将军品序孰高

下列7则史料中,昭毅大将军与昭勇大将军并见,兹罗列如下,可见其品序孰高:

(1)程钜夫《雪楼集》卷20《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记,至元二十四年(1287)乃颜叛乱,都水监罗璧:

> 给饷辽阳,浮海抵锦州小凌河广宁府十寨务,加昭勇大将军。又明年(1288)督漕至直谷,既输之仓。白潞河决,漂庐舍,突障塞,势益张,官吏凛凛。侯为方树栅筑堤捍之,仓以完。锡宴中书堂,升昭毅大将军,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1]

---

[1]程钜夫:《雪楼集》卷20《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清宣统庚戌(1910)五阳湖陶氏涉园影印明洪武刊本,叶7。《元史》卷166《罗璧传》(页3895)亦载其事,文字略同。

罗璧至元二十四年为昭勇大将军，后升为昭毅大将军。以下6则史料均出自《元史》。

(2)《按竺迩传》：

初，国宝将卒，以世荣幼，命弟国安袭其职。国安既袭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后以其兄国宝安边功，赐金虎符，进昭勇大将军。十五年，讨叛王吐鲁于六盘，获之，请解职授世荣。帝曰："人争而汝让，可以敦薄俗。"录其六盘功，进昭毅大将军、招讨使。[1]

这里国安也是从昭勇大将军晋升为昭毅大将军的。

(3)《苫彻拔都儿传》：

苫彻拔都儿，钦察人。初事太宗，掌牧马……十七年，率其子脱欢、孙麻兀入见。奏曰："臣老矣，幸主上怜之。"帝命以脱欢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佩金符；麻兀为滁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其后脱欢以征倭功授明威将军、滁州万户府达鲁花赤，升昭勇大将军、征行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佩三珠虎符。又以征爪哇功升昭毅大将军，镇守无为滁州万户府达鲁花赤。[2]

传主苫彻拔都儿之孙脱欢(Toγan)在从征日本前线脱险归来后，升昭勇大将军。在征爪哇回师后，又升为昭毅大将军。

(4)《塔出传》：

塔出，蒙古札剌儿氏。父札剌台(这位札剌台很可能就是高丽史料中的"车罗大"——引者注)，历事太祖、宪宗。岁甲寅，奉旨伐高丽，命桑吉、忽剌出诸王并听节制。其年，破高丽连城，举国遁入海岛。己未正月，高丽计穷，遂内附，札剌台之功居多。塔出以勋臣子，至元十七年授昭勇大将军、东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十八年，召见，赐钞六十锭，旌其廉勤。升昭毅大将军、开元等路宣慰使，改辽东宣慰使。[3]

[1]《元史》卷121《按竺迩传》，页2987。

[2]《元史》卷123《苫彻拔都儿传》，页3032。

[3]《元史》卷133《塔出传》，页3223。

这位札速亦儿人塔出以功臣子于至元十七年荫序为昭勇大将军，次年即晋升为昭毅大将军。

(5)《也罕的斤传》:

> 也罕的斤(Yaγan Tegin),[1]匣剌鲁人。[2]祖匣答儿密立(Haidar Melik),[3]以斡思坚(Özkend)国[4]哈剌鲁(Qarluq)军三千来归于太祖……十二年,入朝,赐对衣、玉束带、白金百两,加昭勇大将军、上万户,益兵万人。会围重庆,尽督马湖江两岸水陆军马。十四年,从围泸州,攻神臂门,先登拔之。从行枢密副使卜花攻重庆,屯佛图关,屡战有功,移屯堡子头,宋守将赵安开门降。重庆既平,复将其众,略地思州,得降将百余人,加昭毅大将军。[5]

哈剌鲁人也罕的斤至元十二年为昭勇大将军,两年后,即至元十四年加授为昭毅大将军。

(6)《移剌捏儿传》:

> 子元臣。元臣,别名哈剌哈孙……十四年,只儿瓦台叛,围应昌府,时皇女鲁国公主在围中。元臣以所部军驰击,只儿瓦台败走,追至鱼儿泺,擒之,公主赐赉甚厚,奏请暂留元臣镇应昌,以安反侧。居一岁,召至京师,迁明威将军、后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还镇应昌。又三岁,召还,加昭勇大将军。十九年,帝以所籍入权臣家妇赐之,元臣辞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叹不已。二十二年,进昭毅大将军,同佥江淮行枢密院事。[6]

契丹人移剌元臣至元十八年为昭勇大将军,二十二年进为昭毅大将军。

(7)《张万家奴传》:

---

〔1〕也罕的斤,当为突厥语 Yaγan Tegin。其中也罕(Yaγan),华言"大象",元代又音译为"养阿"等。的斤(Tegin),可汗之弟子。

〔2〕匣剌鲁,即哈剌鲁(Qarluq),唐译歌逻禄。

〔3〕匣答儿密立,当为阿拉伯文 Haidar Melik 的音译。此部哈剌鲁人当信奉伊斯兰教。

〔4〕斡思坚,其原名当为Özkend,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西端,元代又音译为讹迹刊。

〔5〕《元史》卷 133《也罕的斤传》,页 3226。

〔6〕《元史》卷 149《移剌捏儿传》,页 3531。

> 张万家奴，父札古带，事睿宗于潜邸……万家奴数从都元帅大答火鲁征讨，有功。中统二年(1261)，从都元帅纽璘入朝，授以父官。宋兵入成都，从行院阿脱击破之。至元四年，帅师会立眉、简二州。从也速答儿攻泸州，大败宋军，杀伤过半，俘四十余人以归。七年，率诸军城张广平，与宋人战，斩首三百余级，获都统一人。从攻重庆，破朝阳寨，围嘉定，栅平康、太和、怀远诸寨，分兵以守之，且日出师，水陆接战，功居多。而诸将攻泸州，往往失利，乃诣阙请自任以攻取之效，许之。遂率舟师百五十艘，自桃竹滩至折鱼滩，分守江面，谨风火，严号令，约日进攻。先据神臂门，为梯冲登城，杀二百余人，斩关而入，遂拔之，加昭勇大将军。会围重庆，将其众断马湖江，分兵水陆往来为游徼，加昭毅大将军。[1]

张万家奴在进攻四川之战中，先为昭勇大将军，后加授昭毅大将军。

这些将领均从昭勇大将军升序为昭毅大将军，足证昭毅大将军高于昭勇大将军，可见《元史·百官志》将昭勇大将军置于昭毅大将军之上有误。

4.3.2 昭武大将军为元武职正三品最高资阶

但仅据上述史料，只能证明在元代武官品序中昭毅大将军高于昭勇大将军，还不能证明元代武官正三品从低到高的排列顺序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武大将军。为论证这一点，还需查检更多史料。笔者通过搜寻发现，还有一些史料提及将领因功提升时，顺序经过了昭勇、昭毅与昭武三个序列，如：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曹南王碑》记至元十一年阿剌罕“取宋”事曰：

> 十一年取宋，大军渡江。阿剌罕以其师取鄂州，溯江陵下至荆口，所至郡县降。其军慰抚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将军，统其师发建康，道溧水、溧阳，指独松关抵杭州上方。道与宋将……具命为中书左丞相，行省事，统蒙古诸翼军马四十余万，往征之。师次明州，且渡海矣，殁焉。既殁，而子也速迭儿幼。拜降，也速迭儿之兄

〔1〕《元史》卷165《张万家奴传》，页3881。

也，袭世职为万户，总其军，后以功佥书江淮行枢密院事，进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领其先世万户军马。既殁，也速迭儿以元贞元年(1295)世其职，授昭勇大将军，左手蒙古军万户，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勋旧将帅之家，求其子孙之有功有能者，故于也速迭儿有加赉焉。命玉工刻白玉，为也速迭儿所署字，使以画文书、发号令于所部，使知其为上所尊信者。皇庆改元(1312)，赐白银五十两，金织文衣二袭。延祐三年(1316)覃恩加昭毅大将军。至治改元(1321)赐白金五十两，金织文衣二袭。泰定三年(1326)进昭武大将军，皆以万户总其军如故。[1]

据此，阿剌罕之子也速迭儿元贞元年为昭勇大将军，延祐三年晋为昭毅大将军。十年后，即泰定三年再升为昭武大将军。

许有壬《至正集》卷38《札拉尔公祠堂记》记：

至元五年召归，擢监本属兄札尔呼征南万户，战殁。丞相巴延(伯颜——引者注)奏公袭其职，征未下州郡，镇维扬。十五年，以昭勇大将军兼扬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官制分，遂复旧职。进昭毅大将军，又进昭武。[2]

这位札剌儿人顺序从昭勇大将军，升为昭毅大将军，再进为昭武大将军。

《元史·贾文备传》：

贾文备字仲武，祁州蒲阴人。父辅，仕金为祁州刺史……文备袭父千户职……至元二年，加昭勇大将军、真定路总管，兼府尹。六年，调卫辉路总管。七年，授西蜀成都统军，以疾不赴。八年，授宿州万户，寻改河南等路统军，围襄樊。九年，移蔡州，兼水陆漕运。宋兵时掠粮饷，文备败之，并夺其船。诏罢统军，文备入觐，赐弓矢、金鞍、锦衣、白金。十一年，复授万户、汉军都元帅，领刘整军，驻亳州。宋将夏贵知亳无备，盛引兵来袭，文备出奇邀击，大破

[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2《曹南王碑》，四部丛刊本，页2-4。

[2]许有壬：《至正集》卷38《札拉尔公祠堂记》，清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叶2。

之，帝赐金鞍、金织、文段、白金。丞相伯颜伐宋，文备领左翼诸军以从，抵郢州。宋筑二城夹江，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中，陈兵两岸，军不得进。文备泛舟，由沦河径出大江，攻武矶堡。乃从阿术先渡江，大军继之，遂取鄂、汉，以功赐白金，加昭毅大将军，守鄂州。十二年，从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趣湖南，至潭州城下。文备冒锋镝，炮伤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战愈急，宋臣李芾死之，转运判官钟蜚英等以城降。十三年，加昭武大将军，守潭州。[1]

汉军将领贾文备至元二年为昭勇大将军。至元十一年攻取鄂州后进为昭毅大将军。攻入江南后，于至元十三年加授为昭武大将军。

上述史料中的三位武将在晋升过程中，均先除授昭勇大将军，再进为昭毅大将军，后晋为昭武大将军。这些记载证明，元代武官正三品排序从低到高应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武大将军。《元史·百官志》所记武官正三品从高到低"昭武大将军、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的排序应改正为"昭武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勇大将军"。

（原刊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页174-181。）

〔1〕《元史》卷165《贾文备传》，页3869。

5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考

《元典章·吏部》卷1(《典章七》)的开头“官制资品职品”部分为一张表,[1]内容见表5-1:

表5-1 官制资品职品(《元典章》)

<table>
<tr><td colspan="3">武资</td><td colspan="3">文资</td><td></td></tr>
<tr><td colspan="2">仪同三司</td><td>开府仪同三同</td><td>仪同三司</td><td colspan="2">开府仪同三司</td><td rowspan="3">正一品</td></tr>
<tr><td colspan="2">崇进</td><td>特进</td><td>崇进</td><td colspan="2">特进</td></tr>
<tr><td colspan="2">银青荣禄大夫</td><td>金紫光禄大夫</td><td>银青荣禄大夫</td><td colspan="2">金紫光禄大夫</td></tr>
<tr><td>荣禄大夫</td><td></td><td>光禄大夫</td><td>荣禄大夫</td><td></td><td>光禄大夫</td><td>从一品</td></tr>
<tr><td>骠骑卫
上将军</td><td>金吾卫
上将军</td><td>龙虎卫上将军</td><td>资善大夫</td><td>资政大夫</td><td>资德大夫</td><td>正二品</td></tr>
<tr><td>镇国上将军</td><td>辅国上将军</td><td>奉国上将军</td><td>中奉大夫</td><td>通奉大夫</td><td>正奉大夫</td><td>从二品</td></tr>
<tr><td>昭勇大将军</td><td>昭毅大将军</td><td>昭勇大将军</td><td>嘉议大夫</td><td>通议大夫</td><td>正议大夫</td><td>正三品</td></tr>
<tr><td>怀远大将军</td><td>定远大将军</td><td>安远大将军</td><td>亚中大夫</td><td>中大夫</td><td>太中大夫</td><td>从三品</td></tr>
<tr><td>宣威将军</td><td></td><td>广威将军</td><td>中顺大夫</td><td>中宪大夫</td><td>中议大夫</td><td>正四品</td></tr>
<tr><td>显武将军</td><td></td><td>信武将军</td><td>朝列大夫</td><td>朝散大夫</td><td>朝请大夫</td><td>从四品</td></tr>
<tr><td>武德将军</td><td></td><td>武节将军</td><td>奉议大夫</td><td></td><td>奉政大夫</td><td>正五品</td></tr>
<tr><td>武毅将军</td><td></td><td>武略将军</td><td>奉训大夫</td><td></td><td>奉直大夫</td><td>从五品</td></tr>
<tr><td>承信校尉</td><td></td><td>昭信校尉</td><td>承直郎</td><td></td><td>承德郎</td><td>正六品</td></tr>
<tr><td>忠武校尉</td><td></td><td>忠显校尉</td><td>儒林郎</td><td></td><td>承务郎</td><td>从六品</td></tr>
<tr><td>忠翊校尉</td><td></td><td>忠勇校尉</td><td>承事郎</td><td></td><td>文林郎</td><td>正七品</td></tr>
</table>

〔1〕元典章》吏部卷1《典章七·官制·资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元刊本,页175。

续表 5-1

武资			文资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从仕郎		征事郎	从七品
保义校尉		进义校尉	将仕郎		登仕郎	正八品
保义副尉		进义副尉	将仕佐郎		登仕佐郎	从八品
注初入仕官员						正九品

《元典章》在文资与武资之后是“杂流”，包括司天、太医、内侍与教坊人员的资品，限于篇幅，这一部分在本文的讨论中从略。《元典章》中的这幅“官制资品职品”表，安徽大学张金铣教授新著《〈元典章〉校注》中未做专门研究，[1]而在陈高华等点校的《元典章》标点本中，曾据其他史料校正。[2]

5.1 《元典章》“官制资品职品”表中问题的研究思路

除上述《元典章》“官制资品职品”表以外，还有几种与之类似的元代文武散官资品表或史料，可视为原始材料，它们是：元末陶宗仪的《辍耕录》中的“大元官制”部分，个别版本《事林广记》中的元代官制表与《元史》卷91《百官志七》的有关记载。[3]如以它们互校，会发现其间有差异。这一问题并非研究元代文献者所独有。

既往研究断代文武官员资阶的学者，在对该朝代有关官员资阶的不同史料进行比较时，也常遇到类似问题。历史文献学对这类问题的

---

〔1〕张金铣：《〈元典章〉校注》（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卷），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1年，12月，见页185。

〔2〕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3月，见第1册，页189-192。

本文初稿2010年底曾在日本九州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上报告，承蒙该校中岛乐章教授与船田博士提问后修改。

〔3〕为叙述方便起见，在以下行文中，将上述《元典章》“官制资品职品”表、陶宗仪的《辍耕录》中的“大元官制”部分，元末版本《事林广记》中的元代官制表与《元史》卷91《百官志七》的有关记载，合称为“四种元代史料”。《元史》虽然成书于明初，但其《百官志》所据史料为元《经世大典》。

传统通常是,在校勘记中指出所处理史料与其他史料的异同。如:《金史·百官志》记金武散官资阶"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校订者韩世民、都兴智将此记载对照《大金国志》,出注曰:"《大金国志》卷34置'武德将军'于'武节将军'之前;与本书所记正好相反。"[1]未说明《金史·百官志》与《大金国志》所记孰正孰误。

而上述学者用以对照《金史·百官志》中有关文武散官资品记载的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其书卷34《千官品列》中有关武官"正六品武德将军、武节将军"的一段文字,《大金国志》的校订者崔文印出注云:"按《金史》卷55《百官志》:武散官'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此处将'武德'置于'武节'之前,似误。"[2]

若将崔文印先生的工作与韩世民、都兴智相较,可发现崔文印不但指出了《金史·百官志》与《大金国志》有关武散官正六品记载的相异处,且对正误有初步判断。但其判断并未把话说死,而是留有余地。

对照前人研究,如何在校订《元典章》有关官员品阶时,能在方法上更前进一步,是笔者从一开始就努力思考的问题。在进行本研究之前,笔者确定的思路如下:

本文在讨论上引《元典章》文武官员资阶列表时,拟先按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惯例,从查对元代有关文武官员资阶的资料入手。这一点从方法论上来说,与上述研究金代官制的诸位学者是共同的。

古代中国的官员品资有传承性,元代官制上承金制,下启明制。史料中有关元代官制记载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时代的区隔而不明之处,可通过与前朝(即金)[3]与后代(即明)的官制对比来求证正误。

历史上的官员资阶并非只反映在书面的制度上,也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有关元代官员品资的其他史料与大量有关元代除授实例的记

---

〔1〕韩世民、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页115。

〔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4《千官品列》,中华书局,1986年(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大金国志·千官品列》),页498,校勘记(34)。

〔3〕为叙述方便起见,在以下行文中,将上述《大金国志》卷34《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有关记载,合称为"金代资料"。虽然《大金国志》的作者宇文懋昭为南宋人,《金史》成书于元中期,但所据史料均为金代史料。

载，是论证官员资品高低的另一类重要史料。上述《元典章》文武官员资阶列表中存在的问题，在利用金朝与明代的官制资料校正之后，还可通过这类史料加以证实。

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笔者拟通过以下4个具体步骤考察上引《元典章》文武官员资阶列表：

步骤一：汇集前述与《元典章》类似的陶宗仪的《辍耕录》中的"大元官制"部分，个别版本《事林广记》中的元代官制资品表与《元史》卷91《百官志七》的有关记载，比较异同。

步骤二：筛选出上述资料记载相互有异者，剔除记载相同者。

步骤三：举证表明金、元、明3代官品传承关系的史料。以"步骤二"中所筛选出的4种元代资料记载相互有异者，较以金代史料，以订证《元典章》中的讹误。

步骤四：以其他元代史料及各种元人本传、家传、先世碑等资料中保存的有关官资品阶除授实例，佐证"步骤三"利用金代资料订证《元典章》的结果。在元代史料不足或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再佐证以明代资料。

5.2　有关元代文武官员资阶的其他3种史料

前已提及，除《元典章》之外，通常查核元武官资阶的主要资料是《元史》卷91《百官志七》、陶宗仪所撰《辍耕录》中的《大元官制》及宋陈元靓《事林广记》个别元末版本中所收的《大元官制》部分。[1]

---

[1]本文初稿在作为提交2011年初在日本九州大学举行的历史文献研究会议论文时，会前曾蒙九州大学船田善之博士指正。在初稿中笔者未使用《事林广记》中的有关记载。在讨论会上，承蒙九州大学船田博士指出此点。在本文最后定稿修改时，九州大学博士生于磊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博士生刘毓萱协助查核了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的元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和1998年影印的元后至正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其中刘毓萱向笔者提供有关影印件及录入文本。书此谨致谢意。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官制资品”有关文武官员资阶部分[1]如表5-2。

表5-2 文武官员资阶(《南村辍耕录》)

武资			文资			
			金紫光禄大夫 崇进 开府仪同三司 银青荣禄大夫 特进 仪同三司			正一品
			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从一品
骠骑卫上将军	金吾卫上将军	龙虎卫上将军	资善大夫	资政大夫	资德大夫	正二品
镇国上将军	辅国上将军	奉国上将军	中奉大夫	通奉大夫	正奉大夫	从二品
昭勇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昭武大将军	嘉议大夫	通议大夫	正议大夫	正三品
怀远大将军	定远大将军	安远大将军	亚中大夫	中大夫	太中大夫	从三品
明威将军	宣威将军	广威将军	中顺大夫	中宪大夫	中议大夫	正四品
宣武将军	显武将军	信武将军	朝列大夫	朝散大夫	朝请大夫	从四品
	武德将军	武节将军		奉议大夫	奉政大夫	正五品
	武略将军	武义将军		奉训大夫	奉直大夫	从五品
	昭信校尉	承信校尉		承直郎	承德郎	正六品
	忠显校尉	忠武校尉		承务郎	儒林郎	从六品
	忠翊校尉	忠勇校尉		承事郎	文林郎	正七品
	敦武校尉	修武校尉		从事郎	征事郎	从七品
	进义校尉	保义校尉		将仕郎	登仕郎	正八品
	进义副尉	保义副尉		将仕佐郎	登仕佐郎	从八品

《事林广记》本系宋人陈元靓所编,此书因为内容适合社会大众居家使用,不断有人刊行,内容续有增加。在元代的刊本中的增加内容,当为元人添入,其中有个别版本中发现有元代官制的内容,如后至正六年(1346)郑氏积诚堂刻本,其全名为《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分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上海涵芬楼景印吴县潘氏滂憙斋藏元刊本,四部丛刊三编,第5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1985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页89。

10集22年卷、细目52项，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1]现录其有关部分见表5-3，表5-4。

表5-3 文武官员资阶——文官(《事林广记》)

文资 正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	仪同三司	
	特进	崇进	
	金紫光禄大夫	银青光禄大夫	
从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正二品	资德大夫	资善大夫	资政大夫
从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正三品	正议大夫	通仪大夫	嘉议大夫
从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亚中大夫
正四品	中议大夫	中宪大夫	中顺大夫
从	朝请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正五品	奉政大夫	奉议大夫	
从	奉直大夫	奉训大夫	
正六品	承德郎	承直郎	
从	儒林郎	承务郎	
正七品	文林郎	承事郎	
从	征事郎	从仕郎	
正八品	登仕郎	将仕郎	
从	登仕佐郎	将仕佐郎	
正九品	注初入仕		

表5-4 文武官员资阶——武官(《事林广记》)

武资 正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	仪同三司	
	特进	崇进	
	金紫光禄大夫	银青荣禄大夫	
从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正二品	龙虎卫上将军	金吾卫上将军	骠骑卫上将军
从	奉国上将军	辅国上将军	镇国上将军
正三品	昭勇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昭武大将军

[1]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戊集，卷上，官制门，页118。

续表 5-4

<table>
<tr><td rowspan="3">武资</td><td rowspan="3">正一品</td><td colspan="3">开府仪同三司</td><td colspan="3">仪同三司</td></tr>
<tr><td colspan="6">特进　　崇进</td></tr>
<tr><td colspan="3">金紫光禄大夫</td><td colspan="3">银青荣禄大夫</td></tr>
<tr><td colspan="2">从</td><td colspan="2">安远大将军</td><td colspan="2">定远大将军</td><td colspan="2">怀远大将军</td></tr>
<tr><td colspan="2">正四品</td><td colspan="2">广威将军</td><td colspan="2">宣威将军</td><td colspan="2">明威将军</td></tr>
<tr><td colspan="2">从</td><td colspan="2">信武将军</td><td colspan="2">显武将军</td><td colspan="2">宣武将军</td></tr>
<tr><td colspan="2">正五品</td><td colspan="3">武节将军</td><td colspan="3">武德将军</td></tr>
<tr><td colspan="2">从</td><td colspan="3">武略将军</td><td colspan="3">武毅将军</td></tr>
<tr><td colspan="2">正六品</td><td colspan="3">昭信校尉</td><td colspan="3">承信校尉</td></tr>
<tr><td colspan="2">从</td><td colspan="3">忠显校尉</td><td colspan="3">忠武校尉</td></tr>
<tr><td colspan="2">正七品</td><td colspan="3">忠勇校尉</td><td colspan="3">忠翊校尉</td></tr>
<tr><td colspan="2">从</td><td colspan="3">敦武校尉</td><td colspan="3">修武校尉</td></tr>
<tr><td colspan="2">正八品</td><td colspan="3">进义校尉</td><td colspan="3">保义校尉</td></tr>
<tr><td colspan="2">从</td><td colspan="3">进义副尉</td><td colspan="3">保义副尉</td></tr>
<tr><td colspan="2">正九品</td><td colspan="6">注初入仕</td></tr>
</table>

《元史》卷91《百官志七》对元代文武散官未列表格，而以文字表述如下：

文散官四十二[阶]〔1〕：

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

特进，崇进，

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以上俱正一品。

光禄大夫，荣禄大夫，以上从一品。

资德大夫，资政大夫，资善大夫，以上正二品。

正奉大夫，通奉大夫，中奉大夫，以上从二品。

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嘉议大夫，以上正三品。

太中大夫，中大夫，亚中大夫，以上从三品，旧为少中，延祐改亚中。

中议大夫，中宪大夫，中顺大夫，以上正四品。

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列大夫，以上从四品。

〔1〕对照下文，此处或脱漏"阶"字。

奉政大夫，奉议大夫，以上正五品。

奉直大夫，奉训大夫，以上从五品。

承德郎，承直郎，以上正六品。

儒林郎，承务郎，以上从六品。

文林郎，承事郎，以上正七品。

征事郎，从事郎，以上从七品。

登仕郎，将仕郎，以上正八品。

登仕佐郎，将仕佐郎，以上从八品。

右文散官四十二阶，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一品至五品者服紫，六品至七品者服绯，八品至九品者服绿，武官以下皆如之。其官常对品，惟九品无散官，则但举其职而已，武官杂职亦如之。

武散官三十四阶：

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以上正二品。

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以上从二品。

昭武大将军，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以上正三品。

安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以上从三品。

广威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以上正四品。

信武将军，显武将军，宣武将军，以上从四品。

武节将军，武德将军，以上正五品。

武义将军，武略将军，以上从五品。

承信校尉，昭信校尉，以上正六品。

忠武校尉，忠显校尉，以上从六品。

忠勇校尉，忠翊校尉，以上正七品。

修武校尉，敦武校尉，以上从七品。

保义校尉，进义校尉，以上正八品。

保义副尉，进义副尉，以上从八品。

右武散官三十四阶，自龙虎卫上将军至进义副尉，由正二品至

从八品，其除授具前。[1]

5.3 《元典章》《辍耕录》《事林广记》与《元史》有关元代文武官员资品的记载

5.3.1 4种元代资料对照表

为方便对比上述4种史料，兹以《元典章》表为基础，将上引《事林广记》后至元年刊本、《元史》“百官志”与《辍耕录》中的内容补入，内容对照见表5-5至表5-11。

表5-5 正一品、从一品

武资		文资		
仪同三司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开府仪同三同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仪同三司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开府仪同三司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崇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特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崇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同。《辍耕录》作“特进”。	特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同。《辍耕录》作“崇进”。	正一品
银青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金紫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银青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金紫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1]《元史》卷91《百官志》，中华书局，1976年，页2321–2322。已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法夸尔曾将《元史·百官志》中的上述段落译为英文，并附简注，见David M. Farquha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 a Reference Guide*,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0,页24–27；他将“散官”译为honorary official titles。

续表 5-5

武资		文资		
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一品

表 5-6 正二品、从二品

武资			文资			
骠骑卫上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金吾卫上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龙虎卫上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资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资政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资德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二品
镇国上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辅国上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奉国上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中奉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通奉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奉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二品

表 5-7 正三品、从三品

武资			文资		
昭勇大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同,《元史·百官志》作"昭毅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同,《元史·百官志》作"昭勇大将军"。	昭勇大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昭武大将军"。	嘉议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通议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议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续表 5-7

武资			文资		
怀远大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定远大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安远大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亚中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同，《元史·百官志》下小字注"旧为少中，延祐改亚中"。	中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太中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表 5-8 正四品、从四品

武资			文资			
宣威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正四品末阶为"明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正四品为三阶，其中阶为"宣威将军"。	广威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中顺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中宪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中议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四品
显武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从四品末阶为"宣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从四品为三阶，其中阶为"显武将军"。	信武将军《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朝列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朝散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朝请大夫《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四品

表5-9 正五品、从五品

武资		文资		
武德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武节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奉议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奉政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五品
武毅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武略将军”。	武略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武义将军”。	奉训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奉直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五品

表5-10 正六品、从六品

武资		文资		
承信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昭信校尉”。	昭信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承信校尉”。	承直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承德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六品
忠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忠显校尉”。	忠显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忠武校尉”。	儒林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承务郎”。	承务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儒林郎”。	从六品

表5-11 正七品、从七品

武资		文资		
忠翊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忠勇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承事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文林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七品

续表 5-11

武资		文资		
修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敦武校尉"。	敦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修武校尉"。	从仕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从事郎"。	征事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七品

表 5-12 正八品、从八品、正九品

武资		文资		
保义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进义校尉"。	进义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保义校尉"。	将仕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登仕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八品
保义副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进义副尉"。	进义副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保义副尉"。	将仕佐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登仕佐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八品
注初入仕官员				正九品

5.3.2 4种元代资料的时代问题

我们知道，当洪武二年宋濂与王袆主持修《元史》时，《百官志》的部分主要抄自成书于至顺二年（1331）编成的《经世大典》，故而《辍耕录》的资料亦应出于此。而《元典章》所收文献基本为至治二年（1321）以前者，故其应另有来源。

元代文官从三品为三阶，分别为太中大夫、中大夫、亚中大夫，《元典章》《辍耕录》《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与《元史》4种资料均相同。唯

《元史》在其下阶"亚中大夫"正文之下，以小字注明："旧为少中，延祐改亚中"，即延祐年之前，文官从三品最低阶曾为"少中大夫"，此后改为"亚中大夫"。上述4种资料均未出现"少中大夫"，证明《元典章·吏部》文武官员资阶表与陶宗仪的《大元官制》《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及《元史·百官志》相关记述，所据均为延祐年之后的材料，惟《元史·百官志》肯定参照了延祐年以前的资料。

法夸尔在其《元史·百官志》译注中，未关注少中大夫改为亚中大夫的具体年代问题。[1]元人刘岳申《信都吴氏世德之碑》提到：

> 冀州之信都吴氏绎，字思可，既位三品，以其祖若考之封赠请会其事罢。上闻其母行年八十不，忍拂其孝情，延祐六年(1319)春三月制，特赠其祖伟亚中大夫、广平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以皇子宁王教，从故宣徽使太师伊彻察喇[2]见世祖皇帝，宿卫扈从五六阅年，大德元年授上舍监丞、迁宁司马、中书断事官、少中大夫、宁王傅。尚书省复中书省，皆断事官。仁宗皇帝才其为人，以其母老，授亚中大夫、汀州路总管，以厚禄养寔，皇庆之元年也，转阶大中、嘉议，历福、杭、吉三路，积官正议大夫，擢海道廉访使。[3]

碑主吴铎成宗大德年间官品为少中大夫，而仁宗于延祐六年(1319)封赠其祖父亚中大夫。足见延祐六年之前少中大夫已改为亚中大夫。元《秘书监志》还有如下记载：秘书监丞"张九畴延祐元年(1314)二月十七日以少中大夫上"。[4]而秘书太监，"乌马儿延祐六年正月十八日以亚中大夫上"。[5]这里张九畴延祐元年二月十七日以前尚为少中大夫，但乌马儿延祐六年已为亚中大夫，足见改少中大夫为亚中大夫之事在延祐元年

[1] David M. Farquha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 a Reference Guide*,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0，见页62，注(100)。

[2]即月赤察儿。

[3]刘岳申：《信都吴氏世德之碑》，《申斋集》，卷8，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清嘉庆年间杭州赵完伯从其家藏明初抄本传录本，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960年。

[4]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9，高荣盛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77。

[5]上引《秘书监志》，卷9，页167。

(1314)与延祐年(1319)之间。另外,据《至顺镇江志》中达鲁花赤兼管内农事"亦剌马丹回回人亚中大夫,延祐三年(1316)十一月二日至六年六月二日代"[1]的有关记载,回回人亦剌马丹(Ramadan)[2]延祐三年已为亚中大夫,故而笔者推测改少中大夫为亚中大夫之事,当在延祐元年(1314)至三年(1316)之间。

5.3.3 4种元代资料相关记载的差别

在上述《元典章·吏部》官员资阶表与《辍耕录·大元官制》《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与《元史·百官制》有关元代文武散官资品的比较中,凡《元典章》与另外3种元代史料记载一致者,视为无问题,即《元典章》记载正确;而相反如四种元代资料记载有相异者,则视为存疑,即《元典章》所记正确与否需要考证。

为醒目起见,兹略去前节比较表中相同者,仅录取4种元代资料记载有异者如下,见表5-13至表5-20。

表5-13 一品(文资)

文资		
崇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同。《辍耕录》作"特进"。	特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同。《辍耕录》作"崇进"。	正一品

正一品文官:分为二阶,在《元典章·吏部》《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与《元史·百官志》中高阶为特进,低阶为崇进,惟陶宗仪的《大元官制》相反,以"崇进"为高阶,以"特进"为低阶。

[1]脱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15,清道光22年刻本,收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并见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2]此名源于阿拉伯语ramazan"斋月"的波斯语读形式ramadan。汉语无舌颤音r-启首的音节,汉人发音时,在其前增元音i-,读为iramadan,故而音译为"亦剌马丹"。

表 5-14 一品(武资)

武资		
仪同三司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开府仪同三同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正一品
崇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特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银青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金紫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从一品

在武官一品资阶上,《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相同,武官正二品以上采纳文官一品资阶。即武官正一品从高到低分别为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特进、崇进、金紫光禄大夫与银青荣禄大夫;武官从一品亦采纳同级文官资阶,上曰光禄大夫,下曰荣禄大夫。

而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武官最高资阶为正二品,无从一品、正一品等级。

表 5-15 三品(武资)

武资			
昭勇大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同,《元史·百官志》作"昭毅大将军"。	昭毅大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同,《元史·百官志》作"昭勇大将军"。	昭勇大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昭武大将军"。	正三品

《元典章·吏部》文武官员资阶表与陶宗仪的《大元官制》《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及《元史·百官志》对关武资正三品中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与昭武大将军的排序有较大差别。已故美国学者法夸尔在其前述英译作品中,将武资正三品与从三品"大将军"衔译称 Marshal,但未关注《元史·百官志》武资正三品昭勇、昭毅、昭武三种大将军资阶排序

与其他史料之间的差别，沿袭《元史·百官志》有关正三品武资昭武大将军为高，昭勇大将军为中，昭毅大将军为低的说法。[1]笔者在《〈元史·百官志〉武官正三品资阶订误》一文中[2]已经将元武散官正三品排序从低到高订正为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武大将军。故本文在对武官正三品的问题上不再重复。

表5-16 四品(武资)

武资			
宣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正四品末阶为"明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正四品为三阶，其中阶为"宣威将军"。	广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四品
显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从四品末阶为"宣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从四品为三阶，其中阶为"显武将军"。	信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四品

正四品武官：《元典章·吏部》为二阶，即广威将军与宣威将军，但《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均分为三阶，在其最高阶广威将军之后的中阶均为"宣威将军"，低阶均为明威将军，即在《元典章·吏部》广威将军与宣威将军之后，均多最正四品最低阶"明威将军"。

从四品武官：《元典章·吏部》分为二阶，即信武将军与显武将军，但《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均分为三阶，在其最高阶信武将军之后的中阶均为"显武将军"，末阶为"宣武将军"，即在《元典章·吏部》信武将军与显武将军之后，均多出从四品最低阶"宣武将军"。

---

〔1〕David M. Farquha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 a Reference Guide*,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0, 见页26。

〔2〕载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页174–181。

表 5-17 五品(武资)

武资		
武德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武节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五品
武毅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武略将军"。	武略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武义将军"。	从五品

从五品武官:分为二阶。在《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武略将军,低阶为武毅将军。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写作"武义将军",低阶为"武略将军"。

表 5-18 六品

武资		文资		
承信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昭信校尉"。	昭信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承信校尉"。	承直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承德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正六品
忠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忠显校尉"。	忠显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忠武校尉"。	儒林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承务郎"。	承务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儒林郎"。	从六品

正六品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昭信校尉,低阶为承信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承信校尉",低阶均为"昭信校尉",即与《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正六品武官"昭信"为高,以"承信"为低相反,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以"承信"为高,以"昭信"为低。

从六品

(1)文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

高阶为承务郎，低阶为儒林郎。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儒林郎”，低阶均为“承务郎”，即与《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从六品文官以“承务郎”为高，以“儒林郎”为低；相反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以“儒林郎”为高，以“承务郎”为低。

（2）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忠显校尉，低阶为忠武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忠武校尉”，低阶均为“忠显校尉”，即与《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从六品武官以“忠显”为高，以“忠武”为低相反，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以“忠武”为高，以“忠显”为低。

表5-19 从七品

武资		文资		
修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敦武校尉”。	敦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修武校尉”。	从仕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均作“从事郎”。	征事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从七品

从七品

（1）文官：低阶《元典章·吏部》“从仕郎”中的“仕”，在《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为“事”。

（2）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敦武校尉，低阶为修武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修武校尉”，低阶均为“敦武校尉”，即与《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从七品武官以“敦武”为高，以“修武”为低相反，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以“修武”为高，以“敦武”为低。

表5-20 八品(武资)

武资		
保义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进义校尉"。	进义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保义校尉"。	正八品
保义副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进义副尉"。	进义副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保义副尉"。	从八品

正八品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进义校尉,低阶为保义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保义校尉",低阶均为"进义校尉",即与《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正八品武官以"进义"为高,以"保义"为低相反,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以"保义"为高,以"进义"为低。

从八品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进义副尉,低阶为保义副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保义副尉",低阶均为"进义副尉",即与《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正八品武官以"进义"为高,以"保义"为低相反,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以"保义"为高,以"进义"为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元代文武官员资阶的4种史料中,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有很大的一致性,而《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之间亦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5.4 中国古代文武官员资品的历史传承

5.4.1 元文武官制资阶的金代背景

中国古代官制有三个要素,即职务、勋衔与资品。职务所代表的是

权力,勋衔所体现的是功绩,而资品则代表在官场中的排序。中国历代文武官员的资品等级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多与其前朝曾经通行的文武官员资品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文武官资阶的基本制度与金朝有密切关系。

有关金代文武散官的资料主要是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笔者刻下可供参考的《大金国志》有崔文印校勘本,而《金史·百官志》则有韩世明、都兴智的《〈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1]此外,有关金武散官的资阶,王曾瑜的《金朝军制》也有研究。[2]兹先录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内容如下:

文官:

正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

从一品 特进、崇进

正二品 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

从二品 光禄大夫、荣禄大夫

正三品 资德大夫、资政大夫、资善大夫

从三品 正奉大夫、通奉大夫、中奉大夫

正四品 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嘉议大夫

从四品 大中大夫、中大夫、少中大夫

正五品 中议大夫、中宪大夫、中顺大夫

从五品 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列大夫

正六品 奉政大夫、奉议大夫

从六品 奉直大夫、奉训大夫

正七品 承德郎、承直郎

从七品 承务郎、儒林郎

正八品 文林郎、承事郎

从八品 从政郎、从仕郎

正九品 登仕郎、将仕郎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从九品将仕佐郎、登仕佐郎

从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将仕佐郎。此二阶，大定十四年创制。

武官：

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

从一品特进、崇进

正二品金紫光禄大夫、银青荣禄大夫

从二品光禄大夫、荣禄大夫

正三品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

从三品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

正四品昭武大将军、昭毅大将军、昭勇大将军

从四品安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

正五品广威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

从五品信武将军、显武将军、宣武将军

正六品武德将军、武节将军[1]

从六品武义将军、武略将军

正七品承信校尉、昭信校尉

从七品忠武校尉、忠显校尉

正八品忠勇校尉、忠翊校尉

从八品修武校尉、敦武校尉

正九品保义校尉、进义校尉

从九品保义副尉、进义副尉。[2]

再查《金史·百官志》：

文官九品，阶凡四十有二：

从一品上曰开府仪同三司，中曰仪同三司，中次曰特进，下曰

〔1〕《大金国志·千官品列》页498，校勘记(34)。“武德将军、武节将军”，《金史》卷55《百官志》武散官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此处武德将军置于武节将军之前，校勘者疑误。

〔2〕《大金国志·千官品列》，页489-491。

崇进。[1]

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禄大夫,下曰银青荣禄大夫。

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下曰荣禄大夫。

正三品上曰资德大夫,中曰资政大夫,下曰资善大夫。

从三品上曰正奉大夫,中曰通奉大夫,下曰中奉大夫。

正四品上曰正议大夫,中曰通议大夫,下曰嘉议大夫。

从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中曰中大夫,下曰少中大夫。

正五品上曰中议大夫,中曰中宪大夫,下曰中顺大夫。

从五品上曰朝请大夫[2],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旧曰奉德大夫,天德二年更[3]。

正六品上曰奉政大夫,下曰奉议大夫。

从六品上曰奉直大夫,下曰奉训大夫[4]。

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

从七品上曰承务郎,下曰儒林郎。

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

从八品上曰征事郎[5],下曰从仕郎。

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将仕郎。

从九品上曰登仕佐郎,下曰将仕佐郎。此二阶,大定十四年创制。

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自正三品

---

〔1〕"从一品上曰开府仪同三司,中曰仪同三司,中次曰特进,下曰崇进";《大金国志》卷34:"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崇进。"所记与此不同。——韩世明、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114,注(1)。

〔2〕《大金国志》卷34作"朝议大夫"。——韩世明、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页114-115,注(2)。

〔3〕"当是避海陵王天德年号,改奉德大夫为朝列大夫。"——韩世明、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页114-115,注(2)。

〔4〕《大金国志》卷34作"奉顺大夫"。——韩世明、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页115,注(3)。

〔5〕《大金国志》卷34作"从政郎"。——韩世明、都兴智:《〈金史〉之〈食货志〉与〈百官志〉校注》,页115,注(4)。

以下，阶与文资同：

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

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

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

从四品上曰安远大将军，中曰定远大将军，下曰怀远大将军。

正五品上曰广威将军，中曰宣威将军，下曰明威将军。

从五品上曰信武将军，中曰显武将军，下曰宣武将军。

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下曰武德将军。

从六品上曰武义将军，下曰武略将军。

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

从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显校尉。

正八品上曰忠勇校尉，下曰忠翊校尉。

从八品上曰修武校尉，下曰敦武校尉。

正九品上曰保义校尉，下曰进义校尉。

从九品上曰保义副尉，下曰进义副尉。[1]

上述《大金国志》与《金史》的校勘者对两中记录有异的部分，都采取互校之法，未指出孰正孰误。他们既未查核金代人物职官除授实例，亦未对照对比后代资料。

5.4.2 明代官品与元代的关系

记载明代官品的史料为数众多，如《大明会典》[2]《文武诸司衙门官制》[3]等，唯顾起元[4]的《说略》明确各品资的来历，并特别指出元、明两

[1]《金史》卷5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页1220-1222。

[2]〔明〕申时行、赵用贤等纂修：《大明会典》，文资见卷7，吏部6，诰敕，散官；武资见卷122，兵部5，诰敕，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明万历内府刻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

[3]〔明〕陶承庆校正、〔明〕叶时用增补：《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1，文官服色、武官服色条，明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4]顾起元（1565—1628），字太初，一作璘初、瞒初，号遁园居士，应天府江宁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除《说略》之外，还著有《金陵古金石考》《客座赘语》等。

代官品的继承关系。[1]故而此处录其记载,以见证元制:

国朝文资四十六阶:

第一阶,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是正一品加赠资。……

第二阶,特进、光禄大夫,是正一品升授资。

第三阶,特进、荣禄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资。荣禄因元旧资衔。

第四阶,光禄大夫、柱国,是从一品加赠资。

第五阶,光禄大夫,是从一品升授资。

第六阶,荣禄大夫,是从一品初授资。

第七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赠资。

第八阶,资政大夫,是正二品升授资。

第九阶,资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资。资德、资政、资善三衔,并因元旧制,惟正治上卿为新设。

第十阶,正奉大夫、正治卿,是从二品加赠资。

十一阶,通奉大夫,是从二品升授资。

十二阶,中奉大夫,是从二品初授资。正奉、通奉、中奉三衔,并因宋大观旧制。惟正治卿为新设。

十三阶,正议大夫、资治尹,是正三品加赠资。

十四阶,通议大夫,是正三品升授资。

十五阶,嘉议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资。正议、通议二衔,并因隋旧。嘉议则因元制,惟资治尹为新设。

十六阶,大中大夫、资治少尹,是从三品加赠资。

十七阶,大中大夫,是从三品升授资。

十八阶,亚中大夫,是从三品初授资。大中大夫,资衔并因唐制。亚中大夫则因元旧制资衔。惟资治少尹为新设。

十九阶,中议大夫、赞治尹,是正四品加赠资。

二十阶,中宪大夫,是正四品升授资。

二十一阶,中顺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资。中议、中宪、中顺资衔

[1]本文初稿在2011年初在日本九州大学举行的历史文献研究会议上报告后,曾蒙九州大学中岛乐章教授对引述顾起元记载问题专项提问,谨致谢意。

并同元旧制。惟赞治尹为新设。

二十二阶,朝请大夫、赞治少尹,是从四品加赠资。

二十三阶,朝议大夫,是从四品升授资。

二十四阶,朝列大夫,是从四品初授资。朝请、朝议、资衔并同隋旧。朝列则因元旧资衔。惟赞治少尹为新设。

二十五阶,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赠资。

二十六阶,奉政大夫,是正五品升授资。

二十七阶,奉议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资。奉政、奉议资衔,并因元旧。惟修正庶尹为新设。

二十八阶,奉直大夫、协正庶尹,是从五品加赠资。

二十九阶,奉直大夫,是从五品升授资。

三十阶,奉训大夫,是从五品初授资。奉直因宋旧资衔。奉训因元旧资衔。惟协正庶尹为新设。

三十一阶,承德郎,是正六品升授资,因元旧制。

三十二阶,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资,因宋旧衔。

三十三阶,儒林郎,是从六品升授,资因唐旧制衔。

三十四阶,承务郎,是从六品初授资,因宋旧衔。

三十五阶,文林郎,是正七品升授资,因唐旧衔。

三十六阶,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资,因隋旧制。

三十七阶,征仕郎,是从七品升授资,改隋征事之衔作征仕郎。

三十八阶,从仕郎,是从七品初授资,亦改从事之衔为从仕也。

三十九阶,修职郎,是正八品升授资。

四十阶,廸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资,并因宋旧衔。

四十一阶,修职佐郎,是从八品升授资。

四十二阶,廸功佐郎,是从八品初授资,并系新设。

四十三阶,登仕郎,是正九品升授资。

四十四阶,将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资,并因唐旧衔。

四十五阶,登仕佐郎,是从九品升授资。

四十六阶,将仕佐郎,是从九品初授资,因元旧衔。内上柱国

等皆勋级也。

武阶四十四,其正从一品六阶,并与文阶同。

正二品,初授骠骑将军,自汉霍去病始。唐、宋为从一品阶。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勋上护军,因元旧也。

从二品,初授镇国将军,升授定国将军,加授奉国将军、护军,皆元旧,止改辅国为定国。以上六阶,元皆有上字。

正三品,初授昭勇将军,升授昭义将军,加授昭武将军,上轻车都尉,皆元旧,止以升授为初授耳。昭武唐为校尉正六品上阶。

从三品,初授怀远将军,加授定远将军。宋正五上阶升授安远将军、轻车都尉,皆元旧也。上六阶元皆有大字。……

正四品,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加授广威将军、骑都尉,皆元旧。宣威,唐、宋从四品上阶。明威,唐、宋从四品下阶也。

从四品,初授宣武将军,升授显武将军,加授信武将军、骑都尉,皆元旧。

正五品,初授武德将军,升授武节将军,皆元旧,加骁骑尉。……

从五品,初授武略将军,升授武毅将军,皆元旧,加飞骑尉。

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升授承信校尉,皆元旧,加云骑尉。

从六品,初授忠显校尉,升授忠武校尉,皆元旧,加武骑尉。汉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梁丘贺为武骑郎。

正七品,初授忠翊校尉,升授忠勇校尉。

从七品,初授敦武校尉,升授修武校尉。

正八品,初授进义校尉,升授保义校尉。

从八品,初授进义副尉,升授保义副尉,皆元旧。[1]

5.4.3 金、元文武官制资阶对照

对比元代官制,可以看出元文武官资阶基本沿袭金制,但品级上元

〔1〕〔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代较金代普遍高出二级。兹将《大金国志》与《金史》的相应内容，填入上述《元典章》中存疑的部分，以资对比。

表5-21 一品(文资)

文资		
崇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同。《辍耕录》作"特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崇进为文官低阶。 《金史·百官志》：文官从一品下曰崇进。	特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同。《辍耕录》作"崇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特进文官为从一品高阶。 《金史·百官志》：文官从一品中次曰特进。	正一品

正一品文官：分为二阶，在《元典章·吏部》《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与《元史·百官志》中高阶为特进，低阶为崇进，惟陶宗仪的《大元官制》相反，以"崇进"为高阶，以"特进"为低阶。金代史料支持《元典章·吏部》《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与《元史·百官志》所记，支持特进为高，崇进为低，不支持陶宗仪的《大元官制》。

表5-22 一品(武资)

武资		
仪同三司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武官正一品低阶仪同三司。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从一品中曰仪同三司。	开府仪同三同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武官正一品高阶为开府仪同三司。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从一品上曰开府仪同三司。	正一品
崇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崇进为武官从一品低阶。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从一品下曰崇进。	特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特进为武官从一品高阶。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从一品中次曰特进。	

续表 5-22

武资		
银青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银青荣禄大夫为武官正二品低阶。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正二品下曰银青荣禄大夫。	金紫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金紫光禄大夫为武官正二品高阶。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正二品上曰金紫光禄大夫。	正一品
荣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荣禄大夫为武官从二品高阶。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从二品下曰荣禄大夫。	光禄大夫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无此。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光禄大夫为武官从二品高阶。 《金史·百官志》: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从二品上曰光禄大夫。	从一品

在武官一品资阶上,《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相同,武官正二品以上采纳文官一品资阶。而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武官最高资阶为正二品,无从一品、正一品等级。金代史料支持武官正二品以上采用文资的记载。

表 5-23 四品(武资)

武资			
宣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正四品末阶为“明威将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五品下曰明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正四品为三阶,其中阶为“宣威将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五品中曰宣威将军。	广威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五品上曰广威将军。	正四品

续表 5-23

武资			
显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从四品末阶为"宣武将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五品下曰宣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武官从四品为三阶,其中阶为"显武将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五品中曰显武将军。	信武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五品上曰信武将军。	从四品

正四品武官《元典章·吏部》为二阶,即高阶广威将军,低阶宣威将军的记载,不仅不同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将正四品武官分为三阶,其最高阶为广威将军,中阶为"宣威将军",低阶为明威将军的记载,亦未获金代资料支持。

金代资料不支持从四品武官《元典章·吏部》分为二阶,即高阶信武将军,低阶显武将军的记载,而同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将从四品武官分为三阶,其最高阶为信武将军,中阶为"显武将军",末阶为"宣武将军"的记载。

表 5-24 五品(武资)

武资		
武德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金史·百官志》:文官正六五品曰《金史·百官志》:武官正六品下曰武德将军。	武节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武官正六品上曰武德将军。 《金史·百官志》:武官正六品上曰武节将军。	正五品
武毅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武略将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六品下曰武略将军。	武略将军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武义将军"。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六品上曰武义将军。	从五品

正五品武官,元代四种资料在武节将军高于武德将军上无分歧。此点同于《金史·百官志》,唯《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以武德将军高于武节将军。

从五品武官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武略将军,低阶为武毅将军之说,未获金代资料支持。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为"武义将军",低阶为"武略将军"之说,获金代史料支持。

表5-25 正六品(武资)

武资	
承信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昭信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七品下曰昭信校尉。	昭信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承信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

正六品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昭信校尉,低阶为承信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承信校尉",低阶均为"昭信校尉"。金代资料不支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反而与《元史·百官志》《辍耕录》相同。

表5-26 从六品

武资		文资	
忠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忠显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七品下曰昭信校尉。	忠显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忠武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七品上曰忠武校尉。	儒林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承务郎"。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文官从七品下曰儒林郎。	承务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此处为"儒林郎"。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文官从七品上曰承务郎。

从六品

(1)文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承务郎,低阶为儒林郎。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儒林郎”,低阶均为“承务郎”。金代资料支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不支持《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有误。

(2)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忠显校尉,低阶为忠武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忠武校尉”,低阶均为“忠显校尉”。金代资料不支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而与《元史·百官志》《辍耕录》所记相同。

表5-27 从七品

武资		文资		
修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敦武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八品下曰敦武校尉。	敦武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修武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八品上曰修武校尉。	从仕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均作“从事郎”。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文官从八品下曰从仕郎。	征事郎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辍耕录》同。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文官从八品上曰从政郎。 《金史·百官志》:文官从八品上曰征事郎。	从七品

(1)本阶文官:低阶《元典章·吏部》“从仕郎”中的“仕”,在《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均为“事”,但金代资料均作“仕”,仍存疑。

(2)本阶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敦武校尉,低阶为修武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修武校尉”,低阶均为“敦武校尉”。金代史料不支持《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释疑见下。

表 5-28 八品(武资)

武资		
保义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进义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九品下曰进义校尉。	进义校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保义校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正九品上曰保义校尉。	正八品
保义副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进义副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九品下曰进义副尉。	进义副尉 《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同。 《元史·百官志》《辍耕录》作"保义副尉"。 《大金国志·千官品列》与《金史·百官志》:武官从九品上曰保义副尉。	从八品

正八品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进义校尉,低阶为保义校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保义校尉",低阶均为"进义校尉"。金代史料不支持《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释疑见下。

从八品武官:分为二阶。《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中,高阶为进义副尉,低阶为保义副尉。但在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中,高阶均为"保义副尉",低阶均为"进义副尉"。金代史料不支持《元典章·吏部》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释疑见下。

5.5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疑问的解决方法

——其他元代史料、元官品除授实例及明代的继承性的佐证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对照《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与《元史·百官志》显现的差异,有些可通过《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同《金史·百官志》的对比获得解决,有些在与金代资料对比后,仍有存疑之处。本论证的最后一步骤为,以其他元人记载及元

代官阶除授实例，证金元资料对比的结果。在元代史料不足或缺少直接证据时，引述前引明人顾起元的叙述，以资证明。

5.5.1 一品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表对照《辍耕录》与《元史·百官志》后产生的疑问在于，特进是否高于崇进以及武官有无二品以上资品问题。

(1)特进与崇进孰高？

《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元史·百官志》《大金国志·千官品列》同《金史·百官志》正一品资阶中，特进均高于崇进。唯有《辍耕录》表将崇进置于特进分别竖写，置崇进于特进之左。

元人赵天麟提到：

> 今国家立制，自王及国王、郡王、国公以下为爵；自特进、崇进，至将军、大夫、校尉、郎为阶；自正一至从九为品；掌典当行为职；各职所居为位；各位养廉之资为禄；各司赞佐行文之史为吏；其制亦以详矣。[1]

赵天麟将特进置于崇进之前，可证特进高于崇进。《元典章》所记无误。

(2)武官正二品以上品阶是否套用文资？

以上元平江人徐元瑞曾提到："散官谓无执掌者。自一品至九品，凡一十人等。开府以下，荣禄大夫，文武并同。"[2]此语正与前引《金史·百官志》中武散官凡仕至从二品以上至从一品者，皆用文资的记录相应。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部分记："武阶四十四。其正、从一品六阶并与文阶同。"[3]足见武将高资品者套用文资乃汉地旧例，《元典章》所记不误。

5.5.2 四品

四品：按《元典章》，正四品武资，高为广威将军。低为宣威将军；从

---

〔1〕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卷3，"削冗员"条，元刊本，北图藏本。

〔2〕徐元瑞：《吏学指南》，卷1，元刻本，北图藏本；并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明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无出版时间。

〔3〕〔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四品武资高为广威将军，低为宣威将军；均分为两级。但《辍耕录》与《元史·百官志》正四品武资从高到低分为广威将军、宣威将军与明威将军三级；从四品武资从高到低分为信武将军、显武将军与宣武将军三级。按《大金国志》与《金史》，应以《辍耕录》与《元史·百官志》为正，《元典章》为误，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1)正四品

乃蛮人屈出律后裔别的因的传记资料记他在灭宋之战中的功绩曰：

至元十三年(1276)授明威将军、信阳府达鲁花赤，佩金符。时信阳亦多虎，别的因至未久，一日以马裼置鞍上，出猎，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别的因以裼掷虎，虎搏裼据地而吼，别的因旋马视虎射之，虎立死。十六年(1279)，进宣威将军、常德路副达鲁花赤。会同知李明秀作乱，别的因请以单骑往招之，直抵贼垒。贼轻之，不设备。别的因谕以朝廷恩德，使为自新计。明秀素畏服，遂与俱来。别的因闻于朝，明秀伏诛，贼遂平。三十一年(1294)，进怀远大将军，迁池州路达鲁花赤。[1]

汉将李庭的仕途与别的因颇为相似：

(至元)十一年(1274)九月，从伯颜发襄阳，次郢州。郢在汉水东，宋人复于汉水西筑新郢，以遏我军。黄家湾有溪，通藤湖，至汉水数里。宋兵亦筑堡设守备焉。庭与刘国杰先登，拔之。遂荡舟而进攻沙洋新城，炮伤左胁，破其外堡，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乃苏。以功加明威将军，授益都新军万户。师次汉口，宋将夏贵锁战舰横截江面，军不得进。乃用庭及马福等计，由沙芜口入江。武矶堡四面皆水，庭决其水而攻之，大军渡江，武矶堡亦破，遂从阿术转战至鄂州，顺流而东。十二年(1275)春，与宋将孙虎臣战丁家洲，夺船二十余，宋军溃，以功加宣威将军。[2]

别的因与李庭均先授为明威将军，后进为宣威将军，可间接证明正

〔1〕《元史》卷122《抄思传》。

〔2〕《元史》卷162《李廷传》。

四品宣威将军之下，还有明威将军一级。

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部分记：“正四品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加授广威将军，骑都尉，皆元旧。”[1]

以上论证充分说明，正四品武官《元典章·吏部》为二阶，即高阶广威将军，低阶宣威将军有误。《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将正四品武官分为三阶，其最高阶为广威将军，中阶为“宣威将军”，低阶为明威将军是正确的。

(2)从四品

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记：“从四品，初授宣武将军，升授显武将军，加授信武将军，骑都尉，皆元旧。”[2]《至顺镇江志》提到：

> 罗璧，字仲玉，镇江人，弱冠从军，积官武翼大夫、利州路马步军副总管。至元十二年(1275)，率所部军行次江陵，归附，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十四年(1277)，平徽州剧贼，就领本州岛岛安抚司事，迁明威将军、管军总管，镇守金山。二十年(1283)奉朝命，创开杨村海道，运江南粟以实京师。[3]

罗璧系自从四品低阶宣武将军晋升为正四品低阶明威将军。以上论证足以说明，可见《元典章》从四品武资分两级有误，应以《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与《元史·百官志》所记三级为据，订正为从四品武资从高到低分为信武将军、显武将军与宣武将军三级。

---

〔1〕〔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2〕〔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3〕脱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19，仕进，土著，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收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并见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其事迹亦见《元史》卷166《罗璧传》：

“罗璧，字仲玉，镇江人，父大義为宋将。璧年十三而孤长，从朱祀孙入蜀，累官武翼大夫、利州西路马步军副总管。祀孙移荆湖，璧从之。至江陵，右丞阿里海牙领军下江陵，璧从祀孙降，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隶丞相阿朮麾下，招收淮军，讨歙寇有功，领本州岛安抚事。至元年从元帅张弘范定广南，赐金符，升明威将军，管军总管，镇金山，居四年海盗屏绝。从镇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两月而毕。至元十二年始运江南粮，而河运弗便。”

5.5.3 五品

正五品武职《元典章》《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与《元史》及《金史·百官志》所记一致，均以武节将军为高，武德将军为低，但《大金国志》相反，以武德将军高于武节将军。

从五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表置武略将军于武毅将军之前，但《辍耕录》与《元史》《大金国志》及《金史·百官志》与此相反，均以武毅将军高于武略将军，其中《辍耕录》与《元史》武毅将军均写为武义将军。究竟孰是?

(1)正五品

元将兀鲁台"至元八年(1271)授武略将军，佩银符。十年(1273)攻樊城有功，换金符，武德将军。十一年(1274)渡江有功，赏银三百两，改武节将军。十二年(1275)四月军至建安卒于军。"[1]他至元十年(1273)为武德将军，次年改武节将军。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记:"正五品初授武德将军，升授武节将军，皆元旧。"[2]

可见正五品高阶为武节，低阶为武德。《元典章》等所记不误，《金史》有误。

(2)从五品

武略低于武毅:

程钜夫《林国武宣公神道碑》:"至元四年(1267)略地荆南，至襄阳与宋师遇战，胜之。……授武略将军、新军千户，从丞相伯颜、丞相阿术破沙洋新城，……改武义将军。"[3]柳贯撰有《元故武略将军邓州新军万户府管军下千户赠武义将军飞骑尉追封静安县男靳公墓碑铭》[4]此二人前者先授武略将军，后进武义将军;后者生前为武略将军，逝后赠武义将军。

顾起元《说略》卷6"官仪"记:"从五品初授武略将军，升授武毅将

〔1〕《元史》卷120《兀鲁台传》。

〔2〕〔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3〕《程雪楼集》卷6，洪武刊本。

〔4〕柳贯:《柳待制集》，卷11，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至正刊本，四部丛刊。

军，皆元旧。”[1]可见《元典章》以武略高于武毅有误，应订正。

武毅多处写作武义：

虽然前引明人顾起元《说略》卷6“官仪”记“从五品，初授武略将军，升授武毅将军，皆元旧”，明确写为“武毅”，但元代文献中，仍有多处将武毅将军写为武义将军的例子，其中不乏出自元代著名文人手笔者。除上述柳贯与程钜夫所提及的两例“武义”将军之外，程钜夫所撰之《克烈君碑铭》提到，克烈人士希之父云都“世为炮手军千戸，自太宗以来破金伐宋皆有功，始屯闻喜之西薛莊，后徙鸣皋，家焉。至元中命君（士希）世官，将众从丞相伯颜南征，以渡江功赐白金三百两，授武义将军，佩金符，寻迁武德将军，进本军总管。”[2]

5.5.4 六品

（1）正六品

武资：

《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以昭信校尉高于承信校尉，但《辍耕录》《元史》《大金国志》与《金史》均相反。究竟孰是？

笔者未查到元代正六品武官除授实例。但顾起元《说略》卷6“官仪”记：“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升授承信校尉，皆元旧”[3]可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所记有误，应按《辍耕录》《元史》有关武资正六品的记载，改以昭信校尉为低，承信校尉为高。

（2）从六品

文资：

《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均以承务郎为高，儒林郎为次，同于《大金国志》与《金史》，但《辍耕录》《元史》则相反。究竟孰是？

查黄溍：《杨仲弘墓志》，其中记：

>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应诏，登延祐二年（1316）进士乙科，用有官例恩视第一人，授承务郎、饶州路同知浮

---

〔1〕〔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2〕程钜夫：《故炮手军总管克烈君碑铭》，《程雪楼集》卷6，洪武刊本。

〔3〕〔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梁州事，秩满迁儒林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1323)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1]

另，张养浩《监察御史韩君墓碣铭》记韩克昌曾"改承务郎、太常大乐署令。甫上，拜监察御史，进儒林郎。"[2]

元代官员除授实例与金代资料均证明，《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以文资从六品承务郎高于儒林郎有误，应按《辍耕录》《元史》所记，改儒林郎为高阶，承务郎为低阶。

从六品武资，《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均以忠显校尉为高，忠武校尉为低，但《辍耕录》《元史》《大金国志》与《金史》均相反。究竟孰是？

查元将哈八儿秃至元"十四年(1277)，升忠显校尉、管军总把，并领新附军五百人从宣慰唐兀台战于司空山，有功，命以其职兼都镇抚，俄选充侍卫亲军。十六年，授银符，忠武校尉，管军总把。"[3]而元将蔡珍的经历为：

> (中统)三年(1262)，从征李璮，后从镇襄阳，徇安庆，攻五河，所至有功。南方平，遂入备宿卫。十四年(1277)，授忠显校尉、管军总把，寻命权千户。是年冬扈驾驻黑城。珍遣兵士储刍藁、筑土室，军府赖其用。道遇涷者，必扶入密室温煦之，军粮必为撙节，不使顿绝，以致饥困。十五年(1278)，充本卫都镇抚。十七年(1280)，升忠武校尉、中卫亲军总把。[4]

而元将糵良辅"辛卯岁[5]，初官海漕，授进义副尉，佩银符，运漕百户。大德庚子[6]，换金符，转忠翊，为千夫长。再两迁至忠显校尉，松江

---

〔1〕《黄金华集》卷33，四部丛刊本。

〔2〕张养浩：《监察御史韩君墓碣铭》，《归田类稿》，卷13；《国朝文类》，卷55，上海涵芬楼影印元至正杭州西湖书院刊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3〕《元史》卷124《哈八儿秃传》。

〔4〕《元史》卷166《蔡珍传》。

〔5〕按，至元二十八年(1291)。

〔6〕按，大德四年(1300)。

等处运粮千户。"[1]

按元制忠翊校尉为武散官正七品低阶，其上为忠勇校尉，蘖良辅二迁至忠显校尉，可间接证明忠显校尉为从六品武资低阶，其上为忠武校尉。顾起元《说略》卷6"官仪"记："从六品初授忠显校尉，升授忠武校尉，皆元旧。"[2]

元代官员除授实例与金代资料均证明，《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以武资从六品忠显校尉高于忠武校尉有误，应按《辍耕录》《元史》所记，改忠武校尉为高阶，忠显校尉为低阶。

5.5.5 七品

(1)从七品

文资：《元典章》从七品文资从仕郎，此官阶写法与《大金国志》与《金史》同，其他三种元代史料《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辍耕录》与《元史》均作从事郎，究竟应写为"从仕郎"还是"从事郎"？

经查，元人写"从仕郎"与"从事郎"者均有。

从仕郎：

元末人陈基提到，王处士"少与弟钧同学于燕。至顺改元(1330)。钧举进士及第。终沈丘县尹。府君以钧贵，追赠从仕郎，真定路安平县尹。"[3]元人陈旅所撰之《贾治安墓志铭》提到"达生斗南当至元内附，时以才学选为峡州路儒学教授，仕至太湖县主簿，赠从仕郎、汴梁路开封县尹。"[4]此类例证极多，兹不一一列举。

从事郎：

胡只遹记夹谷昉仕历为："起身吏部掾，转补御史台掾，考满例得七品，欲便母养，愿降高从卑，授从事郎、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知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升征事郎、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司知事。"[5]黄溍在

[1]杨譓：《(至正)昆山郡志》，卷5，清宣统刻本，收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

[2][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3]陈基：《王处士墓志铭》，载于《夷白斋稿补遗》，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抄本景印，四部丛刊三编，第70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1985年。

[4]陈旅：《安雅堂集》，卷12，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60年。

[5]胡祗遹撰：《夹谷隐士墓志铭》，载于《紫山大全集》，卷18，四库本。

《张弘道》神道碑中提到:“会有诏行贡举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试。遂以延祐二年(1315)赐同进士出身,历将仕郎、庆元路鄞县丞,从事郎、池州路贵池县尹,承事郎、太平路总管府经历,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鈆山州事,命下弘道已卒。”[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文圭在《慈悟居士墓志铭》中,先将此衔写为从事郎,而后又写为从仕郎:“泰定丁卯[2]以从事郎、台州路黄岩州判官致其仕。会朝廷推恩,考赠从仕郎、大都路良乡县尹。”[3]

这里所提到的陈基、陈旅、胡只遹、黄溍与陆文圭均为元代著名文人,或原籍金统治区人,或原籍南宋统治区,其生活时代自元初迄元末,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由此可见,在整个元代,在中国南北相当大的范围内,从仕郎与从事郎两者并用。

武资:《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均以敦武校尉为高,修武校尉为低,但《辍耕录》《元史》《大金国志》与《金史》均相反。究竟孰是?

笔者未找到元代从七品武官除授实例。查顾起元《说略》卷6“官仪”记武官:“从七品初授敦武校尉,升授修武校尉……皆元旧。”[4]可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以敦武校尉高于修武校尉有误,应《辍耕录》《元史》《大金国志》与《金史》为准,改为以修武校尉为高,以敦武校尉为低。

5.5.6 八品

(1)正八品,武资分为二阶,即进义校尉与保义校尉:《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均以进义校尉为高,保义校尉为低,但陶宗仪的《大元官制》及《元史·百官志》及金代史料所记恰恰相反,究竟孰是?

笔者在文献中虽未直接检索到元代武官除授实例中有关保义校尉与进义校尉孰高的史料,但依据以下进义副尉低于保义副尉作逻辑判断,进义校尉也应高于保义校尉,详见下论。此正对应于顾起元《说略》

[1]黄溍:《张弘道墓志铭》,载于《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

[2]按,泰定四年(1327)年。

[3]陆文圭:《慈悟居士墓志铭》,载于《墙东类稿》,卷13,清光绪常州先哲遗书本。

[4][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卷6“官仪”记：“正八品初授进义校尉，升授保义校尉……皆元旧。”[1]

（2）从八品，武资分为二阶，即进义副尉与保义副尉：《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均以进义副尉高于保义副尉。但《辍耕录》《元史》《大金国志》与《金史》诸史料则相反，究竟孰是？

元人贡师泰：《福建等处盐运使司判官张君墓志铭》记墓主张君因“遣解马赴京师，当大暑行数千里，无一死损，归代，授进义副尉、大嵩场盐司丞。……历两考授保义副尉、江浙省富藏库使。”[2]

元人徐元瑞所编《吏学指南》，在言及元及武散官时称：“龙虎卫上将军以下，进义副尉以上，为武散官也。”[3]言外之意即：龙虎卫上将军为武资最高品，而进义副尉为武资最低品。这正对应顾起元《说略》卷6“官仪”记：“从八品初授进义副尉，升授保义副尉，皆元旧。”[4]

由此可证《元典章》与《事林广记》后至元刊本武资从八品以进义副尉高于保义副尉有误，应按《辍耕录》《元史》《大金国志》与《金史》所记，改为保义副尉高于进义副尉。

5.6 《元典章》中的错误问题
——代结语

元人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参政杨文献公”传中接近末尾处有一段：

> 尚书祝部会验，旧例内外自行移亲王、宰相不署姓，执政署姓，解亦不书名，实古礼尊贤严德之义。照得怀孟路总管杨少中，系前执政官，见申部文解书名，似或于礼未宜，乞依旧例止，书姓不书名，尚书省依。至元七年十月。《国朝典章》[5]

其后注明的《国朝典章》即《元典章》。此段文字在《元典章》中可以

[1]〔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2]贡师泰：《福建等处盐运使司判官张君墓志铭》，《玩斋集》，卷10，明嘉靖刻本。

[3]《吏学指南》，卷1，元刻本，北图藏本；并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明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无出版时间。

[4]〔明〕顾起元撰：《说略》，卷6，官仪，民国金陵丛书本。

[5]《元名臣事略》，卷10。

查得：

(执政官外任不书名)至元七年十月尚书礼部会验，旧例内处官司行移亲王宰相不署姓，执政官署姓，解亦不书名，实古礼尊贤贵德之义。照得怀孟路总管杨少中，曾任参知政事，系前职执政官。见申部文解书名，似或于礼未宜，有无照依旧例止署姓不书名，为此呈奉，尚书省札付准呈，仍就便移关各部，及遍行合属，照会施行。

这说明苏天爵在修《国朝名臣事略》时曾利用过《元典章》。此外元末人孔克齐也在其《至正直记》中提到过《元典章》，可见《元典章》在元中后期已经流传甚广。许多当代使用过《元典章》的学者都发现过《元典章》中的刊刻错误，包括元刊本在内。元人，包括像苏天爵这样的著名文人，对这些错误不可能视而不见。中国古代史籍的数量虽然堪称丰富，但并非所有史实都能找到文献记载，这可能是笔者迄今尚未见有元人对《元典章》中的内容提出过质疑的资料的原因。

(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

6 玉山草堂与3位《元史》编修者

《元史》是研究蒙元史的基本史料,记录此次修史过程的主要史料是主修者宋濂的《进〈元史〉表》与《〈元史〉目录后记》,其中后者记此事缘起曰:

>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匮之书悉输于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诏儒臣发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祎实为之总裁。明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1]

《元史》的主修者为宋濂与王祎,其他参与者的名字在《进〈元史〉表》被一一提及:"臣汪克宽、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凯、臣陈基、臣赵埙、臣曾鲁、臣赵汸、臣张文海、臣徐尊生、臣黄篪、臣傅恕、臣王锜、臣傅着、臣谢徽、臣高启"。[2]共十六人。此为编修《元史》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编修者们发现:"顺帝之时,史官职废,皆无《实录》可征",况往牒舛讹之已甚,而它书参考之无凭,虽竭忠勤,难逃踈漏。若自元统以后,则其载籍无存。[3]故而此次所完成之"《纪》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传》六十有三卷",[4]仅为十一朝之史。[5]

于是朱元璋"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国上之。"洪武三年春二月乙丑开局",开始了第二阶段工作,共完成"《纪》十,《表》二,《传》三十又六。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合前后二

[1]宋濂:《〈元史〉目录后记》,《宋学士文集》卷1,涵芬楼李氏藏明正德本影印,四部丛刊(以下版本信息略)。

[2]宋濂:《〈元史〉目录后记》。

[3]宋濂:《进〈元史〉表》,《宋学士文集》卷1。

[4]宋濂:《〈元史〉目录后记》。

[5]宋濂:《进〈元史〉表》。

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至秋七月丁亥书成”，又复上进。[1]至于第二阶段的参与者，宋濂录其名曰：“臣赵埙、臣朱右、臣贝琼、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张孟兼、臣高逊志、臣李懋、臣张宣、臣李汶、臣张简、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2]共15人。除宋濂本人与王祎始终其事之外，宋濂提及的31位与修学者中，赵埙两次参加工作，所以实际在两位主修者主持下参加编修的为30人。

《元史》的主修者宋濂与王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两位主修者为什么选择这30位学者参与其事，他们与两位主修者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交往？这些问题是笔者一直想知道的。

《元史》的主修人宋濂与王祎在《明史》中分别有传。其余参与编修《元史》的学者，多在《元史》卷285《文苑传一》中有简传。查考这些资料，可以部分地解答上面的问题。但仅据《明史》，我们仍然不感满足。

幸而在顾瑛所编著的《玉山名胜集》《玉山璞稿》与《草堂雅集》等诗文集中，可以查到3位《元史》的编修者，即王祎、陈基与张诚的踪迹，他们在元末曾造访昆山顾瑛的玉山佳处，并与顾瑛本人及其友人有过交往，他们之间唱和的诗作，为我们深入了解这几位《元史》作者在元末的活动提供了资料。本文节先从王祎开始探索。

6.1 至正十年王祎在玉山佳处

据顾瑛所录于立诗记，至正十年七月王祎曾路过昆山：

> 七月二十五日金华王子充过玉山，夜饮芝云堂上。酒酣赋诗。以丹、桂、五、枝、芳为韵，余得丹字。盖子充黄太史里人，又其高第门生也，挟所学由京师来，就乡试于南省，溯银河攀月桂，且有日，故予诗多，归美之。是日约元璞[3]、袁子英[4]不至，明日二公

[1]宋濂：《〈元史〉目录后记》。

[2]宋濂：《〈元史〉目录后记》。

[3]释良琦。

[4]袁华。

来，遂足韵写诗，次第于后。[1]

至正十年(1250)年为乡试之年，王祎为浙江义乌人，他所就试之“南省”即江浙行省。顾瑛知道他是黄溍的同乡，又是其高足，于七月二十五日晚在芝云堂设宴招待，同时邀约了于立、元璞与袁华一起来饮酒赋诗。估计是因为时近中秋的缘故，确定赋诗的引句为“丹桂五枝芳”，即五人应分别以丹、桂、五、枝、芳五字为韵赋诗。因但元璞与袁华两人因故未至，于是到席的三人于立、王祎与顾瑛分别先以前三字，即丹、桂、五三字为韵作诗。于立以“丹”字为韵首赋诗云：

良宵纵饮得清欢，政是霜枫叶半丹。入座幽花娇欲语，近人仙桂手堪攀。

佳期已在中秋节，爽气先生七月寒，明日金华南省去，蜚声应到五云端。

其次王祎“桂”字为韵接续：

玉山何岧峣，亭馆发佳气。雨过井上梧，风生石边桂。

芳樽侑娇歌，谑笑杂清议。论交不须多，对酒且成醉。

情文略细仪，理会忘外累。孤踪苦无常，良集讵云易。

未知今日欢，明年复何地。

综合此两人诗可知：至正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王祎从大都赴“南省”参加乡试，路过玉山。王祎其时生活漂泊不定。于立的诗句“明日金华南省去，蜚声应到五云端”表明，他对王祎即将参加的在“南省”的乡试的前景估计乐观。但王祎诗中“孤踪苦无常”，“未知今日欢，明年复何地”等句却说明，他对前途感觉渺茫。另外，他诗中“论交不须多”一句可能表明与顾瑛过去不太熟悉。

主人顾瑛以“五”字为韵作诗曰：

南州孟秋月，维日二十五。回风吹层霄，飞云过疏雨。

客从金华来，欵曲置樽俎。况有匡庐仙[2]，貌古心亦古。

襟期事萧散，笑傲忘宾主。哀弦发秦声，长眉善胡舞。

---

[1]顾瑛：《玉山名胜集》卷2；杨镰、叶爱欣整理本，卷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68-70。

[2]即于立。

秋辉能娱人，夜色满庭户。脩脩风叶鸣，泫泫露花吐。

春波杯中月，不照坟上土。缅怀琦龙门，扁舟下南浦。[1]

按顾瑛所记，次日袁华与元璞补作诗句。袁华诗中有“惆怅失佳期”，元璞则怨自己“偏怜杖策来何晚”[2]，他们都为未能与王祎见面而懊恼不已。

于立在其诗中有“明日金华南省去”一句，恰与顾瑛“明发大江舟，天阔孤鸿送”相对应，似乎七月二十五日宴后的次日，王祎便离玉山而去赴乡试，其实不然。两日后，即七月二十七日，王祎还为玉山佳处的可诗斋作记，其文曰：

吴郡昆山之西若干里有水曰界溪，界溪之上，是为顾君仲瑛之所居。其所居屋之西有别墅曰“玉山佳处”，清池密囿，敞堂奥馆，凡宾客遊适之所，咸极幽邃，玉山之前有室曰“可诗斋”，盖其间亭馆之一也，遂昌郑先生既为之铭，仲瑛复属予记之。昔周太师所掌六诗，盖以风、雅、颂为三经，赋、比、兴为三纬，以其用于宗庙者谓之颂，所以美功德[3]。用于朝廷者谓之雅，所以道政事；用于乡党

〔1〕此亦见顾瑛：《玉山璞稿》，清嘉庆宛委别藏本，杨镰整理本无此，中华书局，2008年版。此诗之后，另有一诗，曰：

凉风振林木，恻恻初寒动。肃客桃花源，张筵鸣玉洞。

落日照金樽，飞云栖画栋。谈玄味妙理，谑笑杂微讽。

取琴雪巢弹，共听金石弄。嘉会固难并，聚散恍春梦。

明发大江舟，天阔孤鸿送。

〔2〕顾瑛：《玉山名胜集》，卷2；杨镰、叶爱欣整理本，卷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68-70。袁华诗以“枝”字为韵：

窈窕玉山上，楼观何逶迤。丹葩曜阳林，金粟亚柔枝。

感兹节序迁，置酒乐芳时。桂酒湛华觞，兰烟度罘罳。

双歌声袅袅，屡舞醉僛僛。乐事古难并，惆怅失佳期。

何以慰所怀，载歌停云诗。

元璞以芳字为韵作诗：

芝草生香秋雨凉，风流宾客满高堂。祢衡彩笔题鹦鹉，子晋瑶笙吹凤皇。

玉洞暗泉流决决，青林微月散苍苍。偏怜杖策来何晚，落尽芙蓉菊已芳。

〔3〕《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1)：“所以美功德”，明万历刊本作“所以陈功德”。

邦国之间者谓之风，所以施教而行化焉。而其为是风、雅、颂者，则赋以直陈其事；比以即彼状此，兴以托物兴辞而已。此先儒君子经体纬用之说所由立也。自风、雅、颂之体坏，一变而为《离骚》，再变为五言，三变而为乐府之词，四变而为声律之格定，其间支分派别，[1]不可遽数[2]，固皆不能外乎三纬以为用。而昔之用以陈功德、道政事、施教而行化者，遂不复见于后世。哀怨淫佚，委靡浮薄，荡然无有温柔敦厚之意。甚而用于宗庙朝廷者，亦往往杂乎《桑间》《濮上》之音。《三百篇》之旨，圣人所以惩劝而兴起者，于是亦因以泯然矣。故尝谓：文章虽与时高下，然非《猗那》《清庙》，不得用于宗庙；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3]，不宜用于朝廷。非《关雎》《鹊巢》，不当用于乡党邦国之间。所以然者，诚以风、雅、颂而不本于三百篇不足以为诗也。呜呼，是岂可以易言乎？是故圣人之徒盖三千焉[4]，夫子以为可与言《诗》者惟子贡、子夏而已。则《诗》之不易言岂不信然乎？虽然子贡、子夏之可以言《诗》者[5]，夫子以其得《诗》之旨，而非予之所言也。仲瑛博学好古，尤潜心于诗，故予推本《三百篇》之大要，相与商榷之。仲瑛或以予言为然，则请姑书之以为记。至正十年七月庚辰[6]金华王祎子充记。[7]

可见七月二十五日顾瑛宴席上曾请王祎为其亭馆"可诗斋"为记，王祎两日后完成。王祎《可诗斋记》中提到的郑元祐所作之铭，收于《玉

[1]《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2)："声律之格定，其间支分派别"，清抄本26卷本作"声律之格，虽其间支分派别"，《四库全书》本作"而为声律之格，其间支分派别"。

[2]《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3)："不可遽数"，黄廷鉴校跋明抄本、清钞26卷本、《四库全书》本，均作"不可据数"。

[3]《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4)："皇皇者华"清抄26卷本、《四库全书》本，作"皇华"。

[4]《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5)："圣门之徒"，《四库全书》本"圣人之徒"。

[5]《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6)："可与言《诗》者"，《四库全书》本"可以言《诗》者"。

[6]至正十年七月庚辰，即七月二十七日，1350年8月30日。见洪金富编着：《辽宋金元五朝日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目录索引丛刊，2004年，页452。

[7]《玉山名胜集》卷4，杨镰、叶爱欣整理本，卷上，中华书局2008年版(以下版本信息略)，页126-128。标点笔者有更动。

山名胜集》。[1]其实二十七日之后，王祎仍然在玉山，顾瑛在芝云堂又一次设宴招待他，当时在场的袁华有诗《玉山宴集分韵得相字》记此事：

今日复何日，张燕芝云堂。西风度江汉，仰见征鸿翔。

坐中仙释侣，学道攻文章。飘飘鸾鹤姿，皎皎金玉相。

上客貌苍古，乃是李伯阳。忆别昆丘颠，十见木叶黄。

授经合沙俞，予则铁崖杨。俞杨同年生，健笔赋太常。

嗟我久濩落，遭漫笔砚荒。相逢玉山中，道旧热中肠。

忽闻郑与陆，乘月泛夜航。促席更秉烛，深杯送琼浆。

酒阑登雪巢，取琴弦清商。一弹别鹄操，再鼓凤求凰。

暮归亟就寝，后会知何乡。辟疆最多情，明发更引觞。

与子各尽醉，忧乐两相忘。[2]

至正庚寅秋七月廿九日，予与龙门山人良琦、会稽外史于立、金华王祎、东平赵元[3]，宴于顾瑛氏芝云堂。酒半，以古《乐府》分题以纪一时之雅集，诗不成者，罚酒二觥。予汝阳袁华也。[4]

此外，王祎还为玉山佳处中的绿波亭提过诗：

有美人兮，玉山之下。蹇好修兮，乐逍遥以容与。

采众芳兮中洲，洲有杜若兮有药在渚。[5]药为房兮杜老老，刻本作若为户[6]。

芳菲菲兮[7]袭予，羌独立兮其谁与处[8]。我怀美人兮欲往从之，水波深兮使我延伫。

---

[1]《玉山名胜集》卷4，杨镰、叶爱欣整理本，卷上，页128-129。标点笔者有更动。

[2]此诗亦收于顾瑛《玉山名胜集》，卷2（杨镰、叶爱欣整理本，卷上，页78-79），但未言及与王祎有关。

[3]此人待考。

[4]袁华：《可传集》，四库本。此跋文亦收于顾瑛《玉山名胜集》，卷2（杨镰、叶爱欣整理本，卷上，页110-111），但与前引诗未编在一起。

[5]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此句后多一句"秋风兮春雨"，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6]《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1）："药为房兮杜老为户"，明万历刊本作"药为房兮杜若为户"。

笔者注：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同于万历刊本，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7]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作"芳菲兮"，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8]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作"羌独立兮夫谁处"，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怀子兮，匪秋伊春。

水波兮孔深，涉波从子兮[1]，子宜我亲。遗我兮幽兰[2]，报子兮绿苹。

嗟夫人兮混浊，[3]非我与子夫谁与论。[4]愿岁晏兮为期，毋相忘兮水滨。[5]

其写作时间，亦应在至正十年七月下旬王祎在玉山佳处停留期间。足见王祎虽然过去与顾瑛不熟，但在昆山的交往中，两人建立了友谊。

《玉山名胜集》还收了一首顾盟所作《送王子充归金华》。顾盟为顾瑛的友人。[6]顾瑛所编《草堂雅集》在收入其诗时记云："顾盟，字仲赘，甬东人高才好学，馆于杞菊轩。"[7]其诗云：

春入长洲苑，东风已及时。苑中垂杨树，吹作黄金丝。

送君出春城，舣舟折柔枝。以此聊赠远，相别仍相期。

君归金华山，当逢牧羊儿。毋因入山去[8]，遂尔来迟迟。

杨柳飞花日，待君同赋诗。[9]

此诗既然收于《草堂雅集》，显然是顾盟客居杞菊轩时所作。在至正十年七月王祎赴江浙行省治所杭州参加乡试路过昆山时，所有史料

---

〔1〕《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校勘记(2)："涉波从子兮"，"波"，黄廷鉴校跋明抄本、清抄26卷本、《四库全书》均无。

笔者注：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此句作"涉波以往兮"。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2〕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此句作"遗我兮芳兰"。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3〕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此句作"嗟斯世兮混浊"。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4〕王祎：《题顾仲英绿波亭》此句作"非我与子兮夫谁与伦"。见《王忠文集》卷17，四库本。

〔5〕《玉山名胜集》卷5，杨镰、叶爱欣整理本，页297。此诗亦收于王祎：《王忠文集》卷17(参见四库本)，题为《题顾仲英绿波亭》，其字句差别，详见上注。

〔6〕顾盟也是丁鹤年之友。鹤年有诗《题顾仲赘先生南山遗稿后》，云：

玄豹无心守九关，日随雾雨隐南山。莫嗟遗鞹同羊犬，犹托文章见一班。

——《鹤年先生诗集》，丁生俊编注《丁鹤年诗辑注》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47。其文集《南山遗稿》笔者仅见于丁鹤年上述诗作提及。

〔7〕顾瑛辑：《草堂雅集》卷10，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848(四库本在卷12)。以下简称《草堂雅集》。

〔8〕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本校勘记(1)"毋因入山去"，鲍廷博校补本卷11作"母因入山去"。

〔9〕《草堂雅集》卷10，页856(四库本在卷12)。

均未提及顾盟，估计当时顾盟并在玉山。顾盟送王袆回金华诗的写作时代，王袆的一首《碧梧翠竹堂留别会稽外史》诗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会稽外史即于立。

梧竹含标接翠蕤，秋风又到桂花枝。玉山本是神仙宅，沧海空留汗漫期。

自昔太丘能下榻，平生子固不吟诗。牧羊归去金华里，从此令人贵梦思。[1]

笔者推测，王袆在乡试结束后回金华时又一次路过玉山，分别见到了顾盟与于立。

6.2 陈基、王袆与顾瑛的玉山草堂

陈基洪武二年开局修《元史》时，他成为编修者之一。《明史》卷285《文苑一》有《陈基》传：

陈基，字敬初，临海人。少与兄聚受业于义乌黄溍，从溍游京师，授经筵检讨。尝为人草谏章，力陈顺帝并后之失，顺帝欲罪之，引避归里。已，奉母入吴，参太尉张士诚军事。士诚称王，基独谏止，欲杀之，不果。吴平，召修《元史》，赐金而还。洪武三年冬卒。初，士诚与太祖相持，基在其幕府，书檄多指斥，及吴亡，吴臣多见诛，基独免。世所传《夷白集》，其指斥之文犹备列云。

顾瑛亦提到：

陈基，字敬初，台之临海人，明敏好学，受知于晋卿黄先生，明《春秋》。后以举子业无益于学，克志为古文诗章。同辈虽极力追之，不能及，名重于时。游京师，公卿争与之交[2]，而其德性慎重，事亲尤尽孝，望而知其为君子也。[3]

〔1〕《玉山名胜集》外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页428-429。校勘记(1)"从此令人贵梦思"，黄廷鉴校跋清抄本作"从此令人费梦思"。

〔2〕景元本卷11本句作"时之名公卿争与之交"，见校勘本。

〔3〕《草雅堂集》卷2，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103。

陈基之所以被选入《元史》编修班子，笔者原先考虑因为他与两位主修人宋濂与王祎均为黄溍的学生。查阅顾瑛所编著的《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与《玉山璞稿》后，发现陈基与王祎均与在玉山草堂会聚的元末江南诗人有关，这一点恐怕是过去的研究者未曾注意到的。

6.2.1 王祎与陈基

陈基与王祎不仅师出同门，且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友谊。据王祎记载，陈基“幼孤，事母尽孝。壮岁远游，所寓之室因名曰白云，著思亲也。”王祎专门为他写了《思亲赋》，其中“恐令名之不振，使先猷之弗舒。奉堂上之明命，离膝下之深娱。乃辞故里，乃游名区。荐绅是从，冠盖为徒。摛丽藻于淮浙，觐清光于皇都”[1]几句，所说的应当就是前引《明史》卷285《文苑一》所述“从溍游京师，授经筵检讨”，及顾瑛所记“游京师，公卿争与之交，而其德性慎重，事亲尤尽孝”之事。王祎写此赋时，当在顺帝朝，其时陈基应当尚未逃离大都。陈基也为王祎写过赋《别知赋送王子充》[2]，表达离别难舍之情。王祎还作有一首《至潮州梦陈敬初有作》，记两人的友情：

> 我行已到潮州城，想子河南尚驻程。千里相期终误约，一宵入梦始关情。
>
> 容颜喜见月梁照，才思多疑春草生。何日登临共携手，秋风还满白云京。[3]

诗中提到俩人曾相约会于某处，但王祎因故未能如约而至，在梦中希望再一次约会。陈基的一首诗《待王子充未至》，也许记的是同一件事：

> 屏迹去城关，幽栖向林阿。永怀同心友，褰衣起婆娑。
>
> 忆昨走京邑，弥年阻关河。结客燕赵间，颇复许悲歌。[4]

〔1〕《王忠文集》卷2，四库本。

〔2〕陈基：《夷白斋稿》卷1，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抄本景印，四部丛刊三编，第70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1985年。

〔3〕《王忠文集》卷2，四库本。

〔4〕按，此句在《四朝诗》中作“颇觉增悲歌”，见四库本，元诗，卷22，五言。

逸骥谢羁绁，冥鸿辞网罗。所念圣哲远，中心良匪它。

夏屋荫嘉木，芳池发新荷。须君此弭节，日夕共委他。[1]

(1)王祎与陈基的共同话题

吴兴"有楼曰清晖"，不但"金华王君子充记之以文"，陈基也写了一篇《清晖楼辞并序》。[2]至正十年七月，王祎造访顾瑛的玉山草堂时，陈基虽然不在那里，但玉山草堂仍然是他们的一个共同话题。前面提到，王祎造访玉山草堂时，为玉山佳处中的绿波亭提过诗。陈基亦有诗颂此亭：

眼明忽见此亭新，公子诗成思入神。坐爱碧波千顷绿，梦回芳草一池春。

每倾鹦鹉留佳客，欲采芙蓉寄远人。燕子不来秋已暮，倚阑无语独逡巡。[3]

上文曾提及，王祎在其所撰之《可诗斋记》中提到，此斋"遂昌郑先生既为之铭，仲瑛复属予记之"。这里的"遂昌郑先生"，即郑元祐，可见王祎与之相识。郑元祐是玉山草堂的常客。前文已提及，王祎至正十年(1350)七月二十五日首次造访玉山草堂的。就在此前四日，郑元祐也在此处。他记道：

至正十年龙集庚寅秋七月廿有一日，吴僧宣无言访顾仲瑛于玉山。时遂昌郑元祐先在焉。匡庐于立彦成，则仲瑛之客也，欸之春晖楼上，行酒对弈，已而觞咏于芝云堂。酒半兴洽，分冰、衡、玉、壶、悬、清、秋为韵，相与赋诗以纪一时邂逅之乐。仲瑛得壶字，诗先成。莒城赵善长作画以代诗，坐客不能成诗者各罚酒一觥。是日以冰、衡、玉、壶、悬、清、秋分韵赋诗，诗成者四人。

郑元祐得玉字。

开士枉遥驾，真人启华屋。话接尘尾素，酒倾麟壶绿。

远山横书幌，飞花动棋局。谷芳余荃蕙，夕阴在梧竹。

[1]陈基：《夷白斋稿》卷2。

[2]陈基：《夷白斋稿》卷11。

[3]《玉山名胜集》卷5。

双丝戛鹍弦，群书阕鱼目。迹异心匪殊，语契道难渎。

相逢固云暂，后会讵可卜。离怀渺烟水，遐音毋金玉。[1]

四日后王祎至此时，可能郑元祐已经离去。虽然在此后几日的宴席中，参加者名单中均无郑元祐之名。但王祎作《可诗斋记》时，提到郑元祐，足见他们曾经谈起过郑元祐数日前在玉山草堂的行迹。

郑元祐也是陈基的友人。陈基作《送郑同夫归豫章分题诗序》，曰：

余辱与郑文学同夫遇于吴之隐君子顾仲瑛氏所，以仲瑛素多宾客，而同夫与余相值，未暇问姓字、邑里、行李所从来。辄举酒为寿，献酬杂沓，亦不计年齿貌苍老，坐上坐，饮酣鼓舞，各以所长自适。于是吴与郯九成、沈自成、龙门琦上人、赤城金敬德、钱塘俞在明，皆以能诗，为仲瑛文字友。而九成素不善捉笔，作山水图辄烂漫奇诡，坐客啧啧称叹。同夫首为赋诗，仲瑛率众宾和之，而敬德起，行酒放歌，作庐山高亹亹，有梁楚间人气调。同夫欢甚，顾余曰：'吾自北方来，行数千里，亲旧疏数，固自有不同。然饮酒之乐，未有如今日。吾行且归矣，诸君能无乎？余然后乃知同夫为豫章人，尝登清江范公、蜀郡虞公、鄞城揭公之门，而余故人危君太朴、揭君伯坊、杨君季子、邹君鲁望、张君宣仲，皆其友也。嗟乎，余恨不及识范、虞二公，而幸尝获接揭公之下风，而听其余论，见其文章。九原不可复作，而其乡之士如同夫者，其文学才艺，一何似公之甚也。同夫归矣，太朴诸君子皆以其父兄师友之学，相继登台阁。顾余无似，日与仲瑛宾客啸傲三江五湖之上，以吴中山水分题得诗若干首，为同夫赠。余辱为之序。因以谢不敏于诸君云。[2]

此次郑元祐至少在至正九年与十年先后两次造访过玉山佳处，陈基与郑元祐在顾瑛处的相会，究竟是在何时，尚有待研究。郑元祐与陈基的友谊可以从他们的相互唱酬的诗作中得到证实。在郑元祐的诗文集《侨吴集》中可查得不少，如：

仲春六日，辱陈敬初诸君枉顾小饮敝楼，分得静字。

[1]《玉山名胜集》卷2。

[2]陈基：《夷白斋稿》卷23。亦收于《玉山名胜集》卷4。

葱肆不嗅荤，荜门惟习静。何此枉飞佩，诸君森相映。

方惭乏词锋，安知堕语阱。酒杯浅于脐，楼居小如磬。

敢云谐谑欢，遂忘跪跽敬。飞花落砚席，轻云拂麈柄。

舍坐或屡舞，分题各成咏。莫非江海士，行应丘园聘。

顾我拓飞蓬，更春不复盛。假如湛诚痴，何嫌宪非病，

相会苟不乐，明朝雪盈镜。〔1〕

郑元祐曾与陈基一同出游，在外一起吟诗唱和，如：

《附陈敬初同游和韵》

吴王閟玄宫，剑气在兹领。石留千人座，泉迸百尺井。

逮公今题墨，潭光并耿耿。雄章久变虎，强聒不闻黾。

荒荒短簿祠，犹复倚顽矿。石磴极高下，跻攀足力猛。

前瞻公留题，天葩笔下骋。仙语不求似，鬼诗空自哽。

譬之具区大，玻璃宁计顷。自公返奎躔，千岩秋月冷。

载惟翻经室，地古松日永。高标叹俱逝，今昔异风景。

人生非金石，何必形吊影。所愧愿学意，天高无从请。〔2〕

《游仙和陈敬初》

绿发飘萧礼上玄，明星遥隔绛河边。香销楚泽春风佩，愁入湘娥夜雨弦。

素手不将条脱赠，绮疏惟把步虚编。西神峰顶栖霞观，小驻鸾笙五百年。〔3〕

顾瑛所编《玉山名胜集》与《草堂雅集》中，收录的郑元祐与陈基唱和之作还有一些，兹不一一赘引。

(2)王祎与陈基的共同友人

对郑元祐与王祎、陈基三人间联系的探索，引向会聚于玉山草堂的文人中王祎与陈基的共同友人的问题。

---

〔1〕《侨吴集》卷1，明弘治九年(1496)张习刻本，〔清〕罗矩校并跋，〔清〕丁丙跋，卷1至7、10至12配清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2〕《侨吴集》卷1。

〔3〕《侨吴集》卷5。

陈基与郑元祐均为顾瑛玉山草堂雅集中重要成员。除了他在玉山留驻时写下的诗文外，他与顾瑛即便分处异处时，仍时互寄诗作。就在至正十年七月底，王祎离开玉山草堂后的次月，顾瑛与诸友人同行出游苏州天平山。陈基听说后，即赋诗寄赠：

至正十年秋八月，闻玉山隐君偕萧元泰、郑明德、于彦成、郑九成、琦元璞游天平。时余留笠泽，不得与此游，乃赋诗一首以寄。

玉山仙人溪上来，千树芙蓉锦绣开。每爱于郎偏好道，更怜郑掾最多才。

题诗有约龙门去，载酒应从郑谷回。好事相传作图画，也须着我坐莓苔。[1]

兹后，顾瑛亦步其原韵作答：

江上清秋八月来，江清照见芙蓉开。远公留客可无酒，于谷题诗最有才。

不教骑马云台去，更待扁舟剡曲回。谷口子真能健步，天池濯足坐苍苔。[2]

陈基与顾瑛之间唱和的诗作很多，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引述。据前引史料有王祎造访玉山草堂时，除堂主顾瑛之外，还遇到过于立，琦元璞、袁华、顾盟等人。这些人也是陈基的诗友。

这里先谈于立。顾瑛曾与于立、陈基等共游无锡，顾瑛先作《登惠山》一首：

对郭依山千古寺，穿云路径石崚嶒。殿前树落桫椤子，墙上花牵薜荔藤。

遗像俨存尝水庙，长廊亦有注茶僧。荒苔旧刻无人打，岩壑秋清尽日登。

寺门深据白云堆，殿脚参差见石台。一水暗从原底出，九龙青入雨中回。

鼠偷山果时时落，鼋触池萍队队开。此日登临绝惆怅，云林不

---

〔1〕袁华：《玉山纪游》，四库本。

〔2〕袁华：《玉山纪游》，四库本。

见酒船来。

于立与陈基均步其韵作诗。于立的诗句为：

秋水放船来野寺，寒岩古石路崚嶒。鹤栖云外三珠树，猿挂烟中百尺藤。

古殿金银黄面老，小龛香火白头僧。明朝城市多尘事，何日重来一再登。

前朝古寺倚崔嵬，快挟松风上古台。一勺灵泉通地远，九峰龙气抱天回。

清晖娱人不少住，黄土眯眼何当开。归舟剩载煎茶水，更带新诗入郭来。

而陈基的和诗为：

欲叩沙门大小乘，西风飞屩过崚嶒。空山金玉锵流水，绝壁龙蛇走乱藤。

一室香花同听法，百年云水不如僧。何时更整山翁屐，宝地相从不次登。

霜落枫林叶作堆，秋高萧寺客登台。排空列嶂千重合，出谷流泉百折回。

澒洞烟涛尘海阔，参差楼阁化城开。独怜万里关河雁，不寄天涯一字来。

此次出游在至正十一年秋，正是至正十二年修河民变的前一年。其大致情况，陈基在《游上方纪游诗并序》有记载：

玉山顾仲瑛甫由惠山还吴城，适匡庐先生于虚齐[1]来自越，而梁溪周履道与余皆在坐。仲瑛以第二泉煮日铸茶，饮客时秋且暮。仲瑛慨然有登山临水之思，乃相与泛舟，出阊阖门，过百花洲，转横塘至石湖，水光浮空，新月始生，山光水色与明河倒景相滉漾，樵歌水唱，远近相答，于是饮酒甚欢，遂舣舟新郭而宿焉。旦日由行春桥、观音岩，历楞伽山、宝积寺，肩舆而造上方。霜降气清，原墅澄旷，丹霞翠霭，出没有无。而荒台废苑，隐隐吴宫之旧有。顷

[1]即于立。

过横山，登聚远亭，吊故人陆征君墓，读金华先生黄公所制碑，假浴僧舍，回宝积，访金上人不遇而归，留连者二日，往返者数十里，所至各赋诗，总凡若干首。至正十一年九月五日颍川陈基序。[1]

袁华所编《玉山纪游》中，收录了此次出游中陈基、于立与顾瑛等人唱和的诗作。

元璞号龙门山人，又号龙门僧良琦，又作琦元璞，也是陈基的朋友。上文提到，至正十年(1350)王祎在玉山草堂所会友人中有，琦元璞。陈基在《玉山草堂分韵诗序》中提到，"予与玉山隐君别四三年"，玉山隐君即顾瑛。他听说顾瑛在此期间，时常与"会稽杨铁崖[2]、遂昌郑有道[3]、匡庐于炼师[4]、苕溪郯九成、吴僧琦元璞"有"诗酒之娱"，非常羡慕，而为自己这几年中为仕途而"遡河洛，上嵩华，历关陕，北游而客京师、度居庸，计其所跋涉，不啻万余里，方挈挈焉。触寒暑、犯霜露"，不能"持杯酒、濡翰墨。咏歌挥洒以厕诸君子之列"而深感遗憾。后来他归江南，在玉山停留旬日，得知会稽杨维桢已赴松江教书，郑元祐"隐居吴城天宫里"，"元璞亦归天平山之龙门"，而在玉山朝夕与陈基为侣者，"主则隐君(顾瑛)，客则练师(于立)也"。[5]

至正十一年于立回浙江，郑元祐、龙门僧良琦(元璞)与陈基作联句诗为之送行。其首句为郑元祐所作，其辞为："岁朝逢王春，雨雪暗吴下，行人当明发。祐[6]"，联诗最后亦由郑元祐结句"望望玉山阿，来期卜灯灺。祐"，[7]表达众人对玉山会聚的怀念。

再谈一下袁华。《昆山人物志》记："袁华，字子英，少颖悟不群，读书过目辄成诵。考究经史百氏，号为该博，善诗章乐府，杨铁崖称为才

---

[1]袁华：《玉山游记》，四库本。

[2]即杨维桢。

[3]即郑元祐。

[4]即于立。

[5]《夷白斋稿》，外集。此序《玉山名胜集》未收。

[6]佑，当为"祐"，以下同。

[7]《至正十一年正月一日遂昌郑元佑(按，即祐)、龙门僧良琦、临海陈基联句，送匡庐道士于彦成归越，兼简萧靖复、卢益修》，收于陈基：《夷白斋稿》卷11。此诗顾瑛未收。

子。洪武初为郡学训导。所著有《可传集》《耕学稿》。"[1]前已提及，袁华在其《可传集》中记录了至正十年七月二十九日顾瑛在玉山佳处的芝云堂中款待王袆时，及他们吟诗唱和的情景除他之外，还有良琦、于立与东平赵元。流传至今的袁华诗文集与他编辑的诗集除《可传集》之外，还有《耕学斋诗集》与《玉山纪游》。其中收录了不少前上提到的王袆的友人的诗作。如《耕学斋诗集》中有《答缪叔正见寄柬东琦元璞》：

阖闾城里连朝住，秋雨秋风过客稀。且泛征君彭泽菊，谁歌义士首阳薇。

清霜满野群鸟下，远水兼天一雁飞。忆共孤蓬娄水曲，行觞联句月中归。

空城落月噪饥鸦，殷地秋风动鼓笳。洗甲天河无壮士，驰车原隰有皇华。

人生扰扰投林鸟，岁事匆匆赴壑蛇，只许龙门看泉者，笑挥谈尘落空花。[2]

其所编的诗文集《玉山纪游》中收录了许多陈基、元璞、顾瑛等人出游的诗作。他与于立经常写诗酬答，于立的回家乡时，他曾专门作诗《送于彦成归越中》为之送行，诗曰：

枫桥明积雪，晓发剡溪舟。独鹤横江去，三山接海流。

绿尊倾乳酒，白发映霜鸥。天姥云门路，曾同上客游。[3]

至于顾盟的情况，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6.3 张简——王袆的友人

现存张简的略传有几种，最早者当属《草堂雅集》中对他的简介：

张简，字仲简，姑苏人，读书知古今，寄迹老子法，作诗淡雅，有

〔1〕《昆山人物志》卷3，文学，明嘉靖刻本，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

〔2〕袁华：《耕学斋诗集》卷10，清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3〕袁华：《耕学斋诗集》卷8。

陶、韦风。翰墨无俗气而暗合书法。隐居鸿山，凡经吴中，虽少会面，必写诗由铁崖寄焉。[1]

较详者为《明史》卷285《文苑一》中的《张简传》，其文云：

张简，字仲简，吴县人。初师张雨为道士，隐居鸿山。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荐修《元史》。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

《姑苏志》中亦有其小传：

张简，字仲简，郡人。初为黄冠师，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巾服。简通儒家书，尤工于诗，饶介自号华盖山樵。尝延诸文士赋诗，时高杨辈咸在，简诗第一，即席赠黄金一饼，有集若干卷，金华王伟(按，应为袆)为之序。[2]

除有关其诗文集的部分以外，其他内容一望可知基本沿袭《明史》。

上引《姑苏志》提到，张简"有集若干卷，金华王伟(按，应为袆)为之序。"据黄虞稷记载，张简的诗文集《白羊山樵集》[3]，应当就是此集。王袆的文集《王忠文集》中收有《张仲简诗序》，应当就是王袆为《白羊山樵集》所作之序。该序文称：

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达而在上者，莫不咏歌帝载，肆为瑰奇盛丽之词，以鸣国家之盛。其居山林间者，亦皆讴吟王化，有忧深思远之风，不徒留连光景而已。夫其达而在上，则人所共知。而山林之间，人有弗及知者，予独于仲简有征焉。仲简之诗，所谓温丽靖深，而类乎韦柳者也。后之人读其诗，非惟知其人，虽论其世可也。[4]

[1]《草堂雅集》卷8，页709。

[2]《姑苏志》卷54，四库本。

[3]《千顷堂书目》卷17。

[4]《王忠文集》卷5，四库本。

可见王袆对张简的诗评价很高。

王袆赴大都时，张简曾作诗送行，题目为《送王子充之京师》，诗文云：

凤阙嵯峨北斗边，马头遥觐极风烟。石林凿凿河流急，人海茫茫帝宇连。

国子先生询旧业，白云亲舍忆高年。匡时正用平生学，努力惟君发尚玄。[1]

张简与王袆之间的友谊为我们理解他为何被征召入编修《元史》的班子提供了有益的注解。

6.4 玉山草堂与大都、上都庙堂

——以至正二年(1342)马黎诺里贡天马事件为中心

陈基为求官曾离江南赴大都。《草堂雅集》中收有陆德源为送别陈基而作的《送陈敬初秀才北上》诗：

江南八月鸿雁飞，故人挟策游京师。为郎作簿虽可期，老怀与尔宁分违。

忆昨同舟风雨夕，胥江委蛇严滩白。紫阳之山千里隔，何曾笑我微官斥。

归来吴城又半年，揽袪结佩仍周旋。陈胶雷漆非偶然，拍肩笑语忘其颠。

秋风萧萧吹去舟，征衣蓐食还依刘。芙蓉照波生远愁，欲别未别难为留。

玉堂金阙有耆旧，草诏䌷书当在手。乘时荐剡如转丸，兀兀兔园非所守，子之行兮良不苟。[2]

此诗当写于至正二年(1242)之前。陈基所去的大都是蒙元世界帝国的政治中心。大都城里各色居民中，有信奉基督教的色目人。成宗

[1]《草堂雅集》卷8，页714-715。

[2]《草雅堂集》卷6，页664。

大德年罗马教廷专门派出长老孟德高维奴来大都传教。据他本人向教廷报告,他在大都停留期间,曾为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之子施行过洗礼,并为之起名为约翰。阔里吉思之子封赵王,名术安,应当就是此名的音译,足见孟德高维奴所述可信。孟得高维奴死后,大都城里再无基督教神职人员。阿速人福定特为此向教廷致信,要求再派教士来大都。于是教廷派马黎诺里为使,历时四年,终于入元。

马黎诺里至上都时,陈基适在彼处。当时欧洲被元人称为拂朗,即波斯语Franq的音译。教皇带给元顺帝的礼物是一匹骏马。拂朗向元廷献马在当时是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陈基写有《跋张彦辅画拂郎马图》专记此事:

> 至正壬午(1342),予客京师,而拂郎之马适至。其龙鬃凤臆,磊落而神骏者,既入天厩备法驾,而其绘以为图,传诸好事者,则永嘉周冰壶、道士张彦辅,并以待诏尚方,名重一时。然冰壶所作,识者固自有定论。至于彦辅,以其解衣盘礴之余,自出新意,不受羁绁,故其超逸之势,见于毫楮间者,往往尤为人所爱重,而四方万里亦识九重之天马矣。此卷乃其最得意者,俯仰八、九年。复于顾仲瑛氏处见之,追怀畴昔,重为增慨。韩文公有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吁。世岂惟无伯乐,或虽欲求,如彦辅之图,写俊骨亦不可复得。仲瑛其可不宝而玩之乎。[1]

西域的这种高脚秀颈骏马在当时除了称为"天马"之外,亦称为"大西马",又曰"脱必察"。顺帝命周冰壶、张彦辅绘图记事。张彦辅之画在当时为其最得意之作。不想八、九年之后,此图竟流传至顾阿瑛手中。陈基离开大都后,重回江南,在玉山草堂见此画,感慨万分。

马黎诺里代表教皇向元廷献马之事,在玉山雅集的文人中传为美谈。郭翼的《和李长吉马诗廿三首》,其中有几首曰:

> 神骏知无匹,骁腾绝域来。流沙一丈雪,夜拂白龙堆。
>
> 天子飞黄马,牵来赐近臣。玉阶新雨过,风滚落花尘。

〔1〕陈基:《夷白斋稿》,外集。

内厩玉花骢，斑斑歕肉鬃。奚官新浴罢，沙苑踏春风。

佛郎通上国，万里进龙媒。晓日开阊阖，虹光射玉台。

天马谁能驭，和鸾驾紫微。年年清暑去，霹雳逐龙飞。[1]

诗中所述“佛郎中通上国”，应当就是同一件事。顾瑛的另一位友人郭翼，[2]亦写过两首《天马诗》：

佛郎献马真龙种，六尺之高修倍之。图画当今属周朗，歌诗传昔敕奚斯。

空闻市骨千金直，不羡穷荒八骏驰。有客新来闻此事，与君何惜滞明时。

四年远涉流沙道，筋骨权奇旧肉鬃。晓秣龙堆寒飋雪，晚经月窟怒追风。

汉文千里知曾却，曹霸丹青貌不同。拂拭金鞍被来好，幸陪天廄玉花骢。[3]

吕诚并未亲见天马，他是看过天马的绘象后才写出颂诗的。这幅画应当就是张彦辅所绘。陆仁与秦约[4]也都写过《天马歌》。陆仁所作为：

于穆世祖肇王迹，受天之庆大命集。神寓鸿图大无及，功烈皇皇共开辟。

四方下上沛流泽，列圣相承纉丕绩。哲王嗣位建皇极，大臣弼辅尚禹稷。

礼乐制度靡有隙，六府孔修万姓怿。天子圣德于昭赫，念承皇祖心弗宅。

---

[1]《草堂雅集》卷11，页871-873。

[2]“字羲仲，姑苏之昆山人，明敏博学，不屑为举业，专志为古文，诗尤精悍。家贫，不肯干谒，以东郭先生故事，命其斋曰雪履。缙绅先生无不爱重之，人言娄东之能诗者，必曰东郭生云。”——《草堂雅集》卷11，页857。鲍廷博校补本卷9，景元刊本卷9与四库本卷9均无“家贫，不肯干谒，以东郭先生故事，命其斋曰雪履”几句，见校勘记(2)。

[3]《草堂雅集》卷11，页857。

[4]“秦约字文仲，淮海盐城人，居娄江。孝友先生，秦君德卿之子也。家传《诗经》之学，文行兼备，为乡闾所称。”——《草堂雅集》卷13，页1002。

日月同明天地廓，绝域穷陲归版籍。万国贡献岁靡息，琛瑶瑰异陋金锡。

岂须征讨费兵革，文怀远人尽臣服。至正壬午秋之日，天马西来佛郎国。

佛郎之国邈西域，流沙弥漫七海隔。浪波横天马横涉，马其犹龙弗颠踣。

东逾月窟过回纥，陆地不毛千里赤。太行雪积滑如石，电激雷奔走飙欻。

四年去国抵京邑，俯首阙廷拜匍匐。帝见远臣重怵惕，慰劳以酒赐以帛。

远臣牵马赤墀立，金羁络头朱汗滴。房星下垂光五色，肉鬃巍巍横虎脊。

崇尺者六修丈一，墨色如云踶两白。天闲骐驎俱骏骨，天马来时皆辟易。

骕骦屈產未足惜，大宛渥洼斯与敌。穆王八骏思游历，汉武穷兵不多得。

天马自来征有德，史臣图颂永无斁。再拜歌诗思仿佛，愿帝爱贤如爱物。

更诏山林访遗逸，昭明治化齐尧日。帝业永固保贞吉，天子万寿天降福。〔1〕

秦约所作为：

佛郎天马来西域，远进彤廷立仗侧。凤臆晶荧珠汗流，龙鬐绚烂朱幩色。

遂令豢养归八坊，喂之粱肉当倍常。横门春明官树好，朔漠风暄沙草长。

吉行惟日京城内，照路宝鞍黄帕盖。蹄截玉肪浮夜光，身被玄云得露彩。

圉官牵出自东华，敕赐金刀剪五花。骁腾有神谁貌得，意气倾

〔1〕《草堂雅集》卷15，页1089-1090。

人良可夸。

旗玉斧时巡狩，山回龙虎居庸口。追风駊騀去如云，駉駉万骑俱尘后。

皇恩旷荡海寓敷，梯航太平天子都。秦皇何如汉武世，无逸岂输王会图。

金河雪融净于洗，潾潾绿涨桃花水。莫教试浴向深渊，定逐苍龙九天起。[1]

陆仁与秦约均非依据图画写《天马歌》，而是至正二年(1342)见到教皇使臣马黎诺里及其所献天马后，受顺帝之命所作。据顾瑛说，秦约"尝过草堂，出所作"。顾瑛抄录了其诗。估计陆仁的天马颂诗也是这样收入《草堂雅集》的。

6.5 结语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宋濂与王祎是如何网罗编写《元史》的人员。

(1)师出黄溍的同门学人是选择之一。宋濂、王祎与陈基均为黄溍的门人。

(2)雅集于玉山草堂的学者，也是选择之一。张简并非受教于黄溍，他入选编修《元史》与他和王祎的私交有关。而玉山草堂正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平台。

会聚玉山草堂虽然远离大都，但它并非世外桃源，也未脱离元代社会。大都、上都政治中心中的国家大事，也是文人们闲谈的话题。教皇使节马黎诺里向元顺帝贡马之事，就是他们交谈的内容之一。

(本文原刊于中国元史研究会2011年阜阳会议论文集《皖北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2012年10月。)

[1]《草堂雅集》卷13，页1011–1012。

7 《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

札剌亦儿是成吉思汗及其先祖时代最重要的蒙古部落之一。它的名称在唐以前涉及漠北诸部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藏文和中古伊朗文史料中没有出现过。此部名从辽代始在史籍中露面,《辽史》称之为"阻卜札剌",这可能是因为此部在辽以前还不够强大的缘故,所以才在阻卜的名下出现。拉施都丁在《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中,集中地记载了他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此部的情况,所以说《札剌亦儿传》是现存有关这个部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治蒙元史者皆知《部族志》之重要。一个半世纪以前哀德蛮(Franz von Erdmann)曾将《部族志》译为德文,1841年在俄国喀山出版,题为《最古老的突厥、达怛及蒙古民族概况——按拉施都丁之叙述》(*Vollständige Übersicht der ältesten Türkischen, Tatarisch und Mongolischen Völkerstämme nach Raschid-ud-Din's Vorgange*)。1855年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Тру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出版了俄国学者贝勒津(И. Березин)的《部族志》俄译本(第5册),1861年又出版了他的《部族志》波斯文原文刊本(第7册)。多桑在写作他的《蒙古史》时,也大量地引述了《部族志》的内容。20世纪末我国元史学者洪钧出使欧洲,见到了贝勒津的工作成果,曾拟将《部族志》译为汉文。韩儒林师抗战初年羁留昆明期间,从中央研究院图书馆觅得拉施都丁《部族志》贝勒津波斯文刊本,托人抄录全文,悉心研读,随作札记数十则。以数年之功成《部族名称的研究》和《诸部人物的研究》两篇,不幸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部遗失。1986年《元史论丛》刊出的,是韩儒林师在昆明所作札记中有幸保存下来的

一部分，其中包括对札剌亦儿诸分枝的研究。

苏联学者利用《史集》的7种抄本，做了迄今最完善的集校工作。1952年，他们先出版了赫塔古罗夫的《部族志》新俄译本（即《史集》第1卷第1分册），1965年又于莫斯科出版了《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俄文教育的普及，我国学者多利用赫塔古罗夫的译本研究《部族志》。余大钧、周建奇经过多年努力，将《史集》蒙古史部分从俄文全文重译为汉文，使我国广大读者得见《部族志》全貌。

本文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1965年苏联《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的《札剌亦儿传》前半段（自开始至叙完拙赤塔儿马剌家族）以及部分波斯文本校勘记译为汉文，其目的在于为研究早期蒙古历史的学者，提供一个更为接近拉施都丁原著风貌的汉译本，并在注释中把笔者的一些浅见奉献给读者。由于希望尽量接近原文，译文不免显得有些生硬，望读者能够谅解。本文的波斯字拉丁字母转写取Steingass《波英字典》的注音体系，凡波斯文拼写的专有名词因字母缺失音点而不可读时，该字母以？号表示；如该字母因底座清晰，但音点缺失，则在其拉丁转写字母之后标注（?）；如该专有名词读音不能确定，则以一一对应的大写拉丁字表示其波斯文拼法。文中所做的注释，凡引自苏联集校本《史集》的注释和校勘记者，标示以原书页码。文中所用的各抄本略号，是合校本的略号：

B本，指苏联塔什干抄本，《史集》汉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称A本。

P本，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抄本，《史集》汉译本称S本。

T本，指列宁格勒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C本。

S本，指不列颠博物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L本。

J本，指德里兰博物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I本。

Č本，指巴黎国民图书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P本。

H本，指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亚洲诸民族研究所抄本，《史集》汉译本称B本。

Kh本，指贝勒津《部族志》刊本。

以上各种抄本的情况，见《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页19-22。

فصل دوّم در ذکر اقوامی از اتراک که ایشانرا این زمان مغول میگویند لکن در زمان قدیم هر یک قوم از ایشان علی الانفراد بلقبی و اسمی مخصوص بوده اند و هر یک علی حدّه سروری و امیری داشته و از هر یکی شعب و قبایل منشعب گشته مانند اقوام جلایر و اویرات و تاتار و غیر هم چنانک درین فصل مفصل می آید و یورت و مقام یاشان بمواضع معیّن بوده و صورت و لغت ایشان با شکال و لغات مغول ماننده چه در آن زمان شعبهٔ مغول قومی از اقوام اتراک بودند و این زمان بسبب دولت و عظمت و شوکت ایشان دیگر اقوام را جمله باین نام مخصوص گردانیده اند و حکایت اقوام مذکور برین نمط است کی در قلم می آید و الله الموفق

第二章

众突厥之诸部记载篇，即关于那些突厥人中的某些部落[1]的章节，现今人们称他们为蒙古人，而在古代他们中[2]每一个部落都曾分别有某个专门称号[3]和名称。而每一个都分别拥有某一位首领和某个异密。并且从每个[4][部落]都产生出许多支族[5]和部落，象同样也将要在此节中详述的札剌亦儿、斡亦剌忒和塔塔儿等诸部。他们的禹儿惕和驻地都曾在固定的地方。他们的脸型和语言与蒙古人的各种方言和长相相同。因为在那个时候，蒙古支系曾是众突厥诸部的一个部落。而此时，由于他们的高贵、伟大和强盛，使得其他诸部落一起[采用了]这个专门的名字。上述诸部的叙述按此方式，即如所记录的那样[进行]。真主成就万事。[6]

---

〔1〕原页129注(7)：اقوامی(aqwām-ī)“某些部落”，在S本中无不定词尾ی(-ī)，作 اقوام (aqwām)，意为“诸部”。

〔2〕原页129注(12)：H本增加 علیحده و (ʻalīhaddat wa)“单独的(阿拉伯语)以及”。

〔3〕原页129注(13)：بلقبی (bi-laqab-ī)“以某种称号”，在H本和Kh本中作 بلغتی (bi-lughat-ī)“以某种语言”。按，لغت (lughat)“语言、方言”。这个词一换，文义变为：“而在古代，他们中每一个部落都曾分别以不同的某种语言和名称著称”。似应取此。

〔4〕原页129注(17)：یکی(īk-ī)“某一个，一个”，在Kh本中无不定词尾ی(-ī)。按，意义变为“一个”。

〔5〕原页129注(18)：شعب(šuʻub)“许多支族”，在T、S和J本中带不定词尾ی(-ī)。按，意义变为“某些支族”。

〔6〕原页130注(5)：و الله الموفق(wa allah al-muwafaq)“成就万事的真主”，在J、H、处诸本中缺漏，而在T和S本中为السلام(al-salām)“祝福”(按，阿拉伯语)。

فصل جلایر

و شعب ایشان و بعضی حکایات کی بدان قوم تعلق دارد بیرون از آنچ در تاریخ جنککیز خان گفته آید

札剌亦儿部章

其诸分枝[1]以及除了在《成吉思汗纪》[2]中将要谈到的那些内容以外的有关于那个部落的一些记载。

این اقوام در قدیم الایام بسیار بوده اند و هر شعبه از یشان امیری و پیشوائی داشته و در عهد جنککیز خان و این زمان نیز امراء بسیار از ایشان در تران و ایران بوده اند و هستند و مقام بعضی در موضع اونن بوده

这些部落在古时候曾人数众多，他们的每一个分支都有某个首领和头人。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及甚至在当代，在图兰[3]和伊朗都曾经有并且现今仍然有众多的出自于他们的大臣。异密。[他们中]一部分[4]的居地曾在斡难之地。[5]

و روایت میگوند کی در زمان قدیم لشکر ختای آن بعضی را چنان قتل کرده اند کی اندکی توانستند جست چون گویحته می رفتند مونولون را کی خاتون دوتوم منن بود بکشته چنانچ در داستان او بیاید و دیگر اقوام جلایر ازیشان باز خواست کردند کی چرا برچنین حرکتی مذموم اقدام نمودند و بدان سبب بعضی از یشان را بقتل آوردند و بعضی دیگر اسیر و بنده قایدو خان پسر دوم دوتوم منن و فرزندان و خوایشان ایشان شدند و بمیراث از پدر بپدر بجنککیز خان رسیدند بدان واسطه آن قوم اتکو بغول وی بودند و بسیاری ازیشان در زمان او و اوروق او امیر و معتبر و محترم گسته اند هر یک بسببی چناک شرح آن داده شود

[1]原页130注(6)：šu'ub "诸分枝"，在H本中是qaum"部落"(按，阿拉伯语，单数)。

[2]原页130注(8)：Jinkkīz Khān"成吉思汗"一词之后，T、S、J、H、Kh诸本均增加wa dīgar tawārīkh"及其他诸纪传"。

[3]Tūrān，波斯人对今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传统称谓。

[4]原页130注(11)：b'az-ī"某一部分"，在H本中为wa b'az-ī mawz'i-ī īšān"以及他们居地中的一些"；在Kh本中为īšān，"他们"。

[5]原页130注(12)：Ūnān"斡难"，B本为WTN，S本为WT(?)Y(?)N，在H本中为WYN。按，这些异写均讹。

据说，在古代，契丹的军队曾对那部分人[1]如此地进行了屠杀，以致[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2]当他们逃窜时，杀害了土敦[3]咩捻[4]的哈屯莫拏伦，[5]正如在其的传纪中要叙述的那样。其他札剌亦儿诸部审问了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出这样可耻的行为？"[6]由于那个原因，人们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处死。另一部分人成了土敦咩捻的次[7]子海都(Qāydū)汗后裔们和亲属们的奴隶

---

[1]原页131注(2)：b'az"部分"，在H本和Kh本中为mawz'i"地方"；在J本中多出不定词尾-ī，作b'az-ī"某一部分"。按，这一部分即指居于斡难河流域的那一支札剌亦儿人。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1之一《太师鲁国忠武王碑》称"木华黎，札剌儿氏"，"生于子阿难水之东"(中华书局影印元元统年刊本)。《元史》卷119《木华黎传》亦云其先祖"世居阿难水东"。阿难水即斡难河。《史集》所提到的这一支札剌亦儿人，应该就是木华黎的祖辈。

[2]契丹人发动的这一次战役亦见于《史集·土敦蔑年纪》，其中说：居于怯绿连之边的札剌亦儿人共70古列延，7万帐。一次，契丹人渡怯绿连河进攻，这部分札剌亦儿人仅有70帐得以逃脱，溃入莫拿伦的居地(汉译本，页19；卡里米[Dr. Karmi]1959年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175)。《元史·太祖记》仅提到这群札剌亦儿人杀死莫拿伦及其诸子之事。把《史集》的这两段记载与汉文史料相比较，可知木华黎祖辈这一支札剌亦儿人驻牧于斡难河与怯绿连河之间，而辽军大约是从捕鱼儿海子一带出动的。

[3]原页131注(7)：dūtūm"土敦"，在T和H本中为dūtū；在S本中为watū；在J本中为dū。按，此四本均讹。土敦，唐代音译作吐屯。《太平广记》卷21引唐《御史台记》言："突厥谓御史为吐屯"，则土敦为监察之官。见韩儒林师《突厥官号考释》，载于《穹庐集》，页322、323。波斯文为什么拼作dūtūm，尚无满意的解释。

[4]原页131注(8)：Minin"咩捻"，S本为MTN，Kh本为MNYN。按，前者为讹写，后者是异写。menen，蒙古语，众多，广阔貌。

[5]Mūnūlūn"莫拏伦"，《元史·太祖纪》和《圣武亲征录》均作"莫拏伦"，与此同音。唯《元朝秘史》自成一家，作"那莫伦"。《元朝秘史》是蒙古朝廷必闍赤的作品。很难设想，他们会把自己的先祖妣的名字读颠倒。同时，蒙古文和波斯文都是拼音文字，书写时音节颠倒的情况虽然有，但并不多见。所以造成《史集》mūnūlūn拼法与《元朝秘史》"那莫伦"读音相左的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伊利汗国史臣方面。汉文书写方块字时，如果内容是他族音译专有名词，因在汉文中本身无意义，极易发生颠倒。

此外，《史集》mūnūlūn这个名称中连续出现三个合口长元音的拼法，似乎暗示它不是由蒙古文转写成波斯文，而是从汉语译名"莫拏伦"转写成波斯文的。由此观之，《史集》所据之"金册"，可能译自某种汉文资料，或者本身就是汉文的。参见亦邻真：《起辇谷及其他——〈元朝秘史〉札记数则》，载于《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亦邻真先生在正式发表的《起辇谷和古连勒古》一文中，未提及此观点。——原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后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747-753。

[6]原页131注(11)：在harakat-ī"某种行为"之前，H本和Kh本多出bad"坏的、恶的"一词。

[7]原页131注(17)：duwwum"第二"，T、S、H和Kh本缺漏。

和仆人。[1]并且作为父祖相承的遗产[2]传给了成吉思汗的父亲。由于那个原因那个[3]部落过去是他的斡脱古一孛斡勒。[4]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及其[5]兀鲁黑[6]时代[7]成了异密和贵人，每一个人都因某种理由，正如将要被解说的那样。

و میگویند یورت ایشان قدیما در قرقورم بوده است و ایشان را تعصب آنست کی شتران نر کور خان را کی پادشاه اویغور بوده روغن میداده اند بدان سبب نام ایشان بلاغه نهاده است

据说他们的禹儿惕自古以来[8]一直在哈剌和林。对他们来说，那样才是忠顺畏服，即不断向古儿汗——即畏兀儿的君主——

---

〔1〕《元朝秘史》第137节记，札剌亦儿部那颜帖列格秃伯颜之子古温兀阿（按，即孔温窟哇）和赤剌温孩亦赤（按，即忙哥撒儿之父赤老温恺赤），分别把自己的儿子模合里（按，即木华黎）等4人送给成吉思汗做奴仆之事，正反映了这支札剌亦儿人的世臣世仆地位。据《史集》（详见下文），木华黎出自札剌亦儿札阿惕部，而《元史》则记忙哥撒儿为察哈·札剌亦儿人。看来，在斡难、怯绿连之地被契丹人击败的7万帐札剌亦儿人中，至少包括这个札阿惕部。

〔2〕原页131注(20)：bi-mīrās"作为遗产"，在P本中为bi-manzilat"作为官职"，在H本中无介词bi-。

〔3〕原页131注(24)：ān"那个"，在S本中为az"从……"。按，如是，则意义略有改变："由于那个原因，他们曾是他的斡脱古一孛斡勒部落"。

〔4〕原页131注(26)：utikū，在T本和J本中拼作AWTKU，在S本中作AWDKU，在Kh本中作AWNKU。按，此字源于突厥语ōtikū，"老的"，除Kh本为T、J本的音点误置形式外，其余两种均为与突厥语原词ōtikū读音近似的异写形式。关于"斡脱古一孛兀勒"，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 traduit et annoté par Paul Pelliot et Louis Hambis)，1951年，来顿，页85，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e Persisch*)卷1，第40条；亦邻真：《关于十——十二世纪的孛斡勒》，《元史论丛》，第3辑。

〔5〕原页131注(31)：AW"他"，在H本中为缩写形式u。按，"他"指成吉思汗。

〔6〕原页131注(30)：ūrūgh"子孙，种子"（蒙古语），在H本中为urūq，在Kh本中为ūrūq。按，因系外来语，拼写不固定。

〔7〕原页131注(29)：zamān"时代"，H本无此字。按，如依H本则意义变为"在他及其兀鲁黑（子孙）那里"。

〔8〕qadīmā"自古以来"（阿拉伯语副词，应读作qadīman）。俄译者竟然未认出此字，误作地名，并译写作Кима(Kima)，意义全非。汉译者余大钧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俄译者的译写错误，并订正为q(a)dīmā，但仍当作地名，音译为"合迪马"。哈剌和林周围并无地名称为Кима(Kima)或qadima(合迪马)。正确理解波斯文原文中的qadīmā"自古以来"非常重要。它表明札剌亦儿人中有几支居住在哈剌和林川已有很长的历史。

的公驼贡奉油脂。[1]由于那个原因，他们的名称曾称为BLAQH。[2]

و اين اقوام جلاير ده شعبه بزرک اند کی هر یکی علی حده قومی بسیار شده اند بدين تفصيل و ترتيب

这些札剌亦儿诸部[3]有十[4]个大分枝。他们每一个都分别变

---

〔1〕按，畏兀儿古儿汗，笔者考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指漠北回鹘汗国的可汗。如此说成立，则是札剌亦儿的一些部落在公元840年以前已居于和林川，并臣属于回鹘人的重要证据；并说明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在蒙古高原蒙古化以前，蒙古高原的中部已有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第二，指畏兀儿的宗主西辽的皇帝古儿汗。笔者倾向于前者。

〔2〕此字俄译本取音译，德福书亦未收。笔者认为，拉施都丁在这里可能是在讲述札剌亦儿部名的词源，所以应仔细考虑BLAQH这个词的含义。如考虑BLAQH中含有字母Q，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应表示后元音（或阳性元音）词。如果我们设想起首字母B可能是Y之误，则使人联想起古突厥之yalɣa——"舔"（见《古突厥语词汇》(《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列宁格勒，1969年，页228；克劳森：《十三世纪之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Sir Gerh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 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牛津，1972年，页926。yalɣa-"舔"这个词，如果加上蒙古语复数附加成分-ir后，应变为yalɣair。由于某种方言的作用（参见韩儒林师《西北地理札记·乌鹆，Huiur及Hor》)，词中的颚音-q-软化为-y-，即yalɣair——yalayir，即"札剌亦儿"，其义意为"奉承者、拍马者"。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我们可作如下推论：札剌亦儿人至少分为两个集团，第一集团包括札阿惕部（可能还有其他札剌亦儿部落），他们自辽代至成吉思汗时代，一直居住在斡难河、怯绿连河流域，是成吉思汗祖辈的世仆。而另一个集团（可能包括朵郎吉惕等部），则原居于回鹘汗国牙帐附近的哈剌和林川一带。由于他们当年曾对回鹘可汗忠顺逢迎，遂得名yalayir，意为"舔，奉迎拍马"。

最初的札剌亦儿人应指第一部分。他们是一个操蒙古语的部落，突厥文《磨延啜碑》曾提到8世纪中叶九姓达怛(Toɣuz Tatar)在漠北与回鹘人的冲突，结果一半部众为回鹘葛勒可汗俘获。王延德经漠北合罗川（即应和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旧地时，亦听传说"达靼旧为回纥牧羊"。这一传说或与札剌亦儿人成为回鹘人属部的历史有关。回鹘人控制漠北时，其属下应有不少操蒙古语的部落，这支札剌亦儿人当为其中之一。

《史集》把札剌亦儿人划入迭列斤集团（见汉译本第1卷，第2册，页18）。根据拉施都丁的解释，迭列斤是源出于额儿古捏昆的蒙古人。上面提到的首先被称为札剌亦儿人的这个集团，既在唐代已经居于和林川，当然不可能属于拉施都丁前述意义上的迭列斤集团。因为当他们在哈剌和林川为回鹘可汗牧驼时，迭列斤集团尚未迁出额儿古捏昆。从分布地域上来分析，札剌亦儿人中真正属于迭列斤集团的，只能是以札阿惕为代表的几支。元明善所谓札剌亦儿。"亲连天家，世不婚姻"之说，应是札阿惕部与蒙古部关系的大致描述。故而我们可以设想，札阿惕部在迁出额儿古捏昆之后不久，就为与曾经是回鹘可汗臣仆的札剌亦儿人所合并，并接受了yalayir的名称。

〔3〕原页132注(7)：aqwām"诸部"（按，阿拉伯语，复数），在T、S、H和Kh诸本中为单数qawm。

〔4〕原页132注(8)：dah"十"，在T和S本中误作dar"门"，在H本中为haft"七"。按，从下面举出的部名数目来看dah"十"是正确的。

成了一个大[1]部落,如此区别和分类:

جات تو قراون قنكقساوت كومساوت اويات

نيلقان كوركين طولانكقيت تورى شنكقوت

〔1〕原页132注(13):bisiyār“许多的”,在T本和S本中为buzurk“大的”。按,足见这里bisiyār应译作“大”,或“人数众多的”。

札阿惕、[1]脱合剌温、[2]康合速惕、[3]忽母速惕、[4]兀牙惕、[5]

---

〔1〕原页132注(17)：jaāt"札阿惕"一，H本作hān，Kh本作jāyat。按，伯希和、韩百诗最先提出，jāat这个拼法来自蒙古语ja' an。《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云："忙哥撒儿，察哈札剌儿氏"。伯希和、韩百诗认为，"察哈札剌儿氏"应复原为čaqa(t) ĵalar，即《史集》之"札阿惕部"，他们还提出，此名称是蒙古语čaγan"白"的复数。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66。韩儒林师五十余年前只接触到《史集·部族志》的贝勒津刊本，故他取jāyat (jāit)这一拼法。见《韩儒林先生遗稿：读〈史集·部族志〉札记(部分)》，载《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页246，247。

〔2〕原页132注(18)：Tūq (a)raūn"脱合剌温"，P本和Kh本作ūf(?无音点)raūt，H本作tuq (a) raūn。按，《元朝秘史》节120提到札剌亦儿部的脱忽剌温氏三兄弟哈赤温·脱忽剌温、合剌孩·脱忽剌温和合阑勒歹·脱忽剌温。此脱忽剌温氏显系《部族志》之tūq (a) raūn。《黄金史》把这个名称拼作toγra' un，见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页137。

〔3〕原页132注(19)：Qunkq(a)sūt"康合速惕"，H本作Q(?)N(?)KN(?)SAWN；Kh本作qunkqāūt。按，韩儒林师在《读〈史集·部族志〉札记》中对此部未作说明。《元朝秘史》节239记1207年术赤派不合征"康合思"(Qangqas)等部。笔者怀疑这个康合速惕(Qunkq[a]sūt)是康合思(Qangqas)部名的复数形式的波斯文音写，或许"林木中百姓"中的一部分曾是札剌亦儿的属部。韩儒林师在《元代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中说："康合思，不详。《史集》亦未著录"(《穹庐集》，页342)。

〔4〕原页132注(20)：Kūmsaūt，P本作Kūmaūt，H本在此名第一个合口长元音-ū-之上未标合口符，在第二个合口长元音-ū-上则未标"海木宰"符号。按，韩儒林师在《读〈史集·部族志〉札记》中对此部未作说明。笔者对此部名称的来历以及与汉文史料所记的比勘问题有两种推测：

其一，《部族志》合校本之Kūmsaūt部似应读作Kūmusūt。其中的开口长元音符号-ā-只起阻止第四个字母-s-与倒数第二个字母-ū-连读的作用，而词末音节-ūt明显表示的是蒙古语复数。如考虑词首包含辅音k-，应为前列元音词的话，似应将此部名称之读音构拟为Kümüsüt。kümüs在突厥语中义为银，马奶酒。这个Kūmsaūt部的名称大概由kümüs加上蒙古语复数附加成份-üt构成。元代钦察大将土土哈的族人"掌刍牧之事，奉马湩以供御食。马湩尚黑者，国人谓黑为哈剌，故别号其人哈剌赤。——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收于《道园学古录》，卷23。

其二，如考虑词首辅音k-亦可能代表Q的话，则此部名的单数形式似可还原为Qumus。《辽史》卷2《太祖纪》载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三年九月西征，"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又"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同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胡母思山是10世纪时古回鹘城附近的地名，而山中的蕃部则以此山命名。一百余年后的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可见此部仍以山为名。在元代，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中提到，钦察大将创兀儿帅师至元末与西北诸王作战时，至"和林兀卑思之山"。周良霄认为"兀卑思"即"胡母思"。——见《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页246。如果把"胡母思"比附为我上面拟构的Qumus，则此Qunkq(a)sūt部是札剌亦儿人中居于哈剌和林地区的一支，曾经做过所谓回鹘古儿汗的臣民的，或许包括他们。

〔5〕原页132注(21)：Ūyāt，J本作ARYAT(ariyāt)。按，此部不见他书记载。韩儒林师的意见见《读〈史集·部族志〉札记》。

你勒罕、[1]古儿斤、[2]朵朗吉惕、[3]秃里、[4]和鲜骨兀惕。[5]

و از تمامت اقوام جلایر مشهورتر و بزرگتر در عهد جینککیز خان موقلی کویاک بوده از قوم جآت و تمامت لشگر دست چپ جینککیز خان او دانسته و فرزندان او را نیز لقب کویانک میگویند و معنی آن بزبان ختایی خان بزرگ باشد وقتی که جینککیز خان او را بموضعی که قراون حیدون میگویند با لشگر گذشته بود اهل ختای این لقت بر وی نهادند و پسر او بوغول کویانک در عهد اوکتای قاآن قایم مقام پدر بود و این لقب جینککیز خان بروی نهاد

---

〔1〕原页132注(22):Nilqān,T本作N(?)I(?)LQ(?)AN,S本作Bīlqān,H本作N(?)I(?)LQ(?)SAN。按,此部的勘同尚未解决,见韩儒林师:《读〈〈史集·部族志〉札记》,页247。

〔2〕原页132注(23):Kūrkīn,T、S和J本作Kūrkīr,H本作Kūk(?)r。按,韩儒林师认为此部落名称的"读、写均不能定"(见韩儒林师:《读〈〈史集·部族志〉札记》,页247)。笔者考虑,校勘文本中这个名称的后半部-kīn,应为表示蒙古语氏族名称后缀之-kin的波斯文转写,如主儿勤、那牙勤、迭列斤之类。这个部名的前半部kūr,似来自突厥语kür"勇敢的,无畏的"(见《古突厥语词汇》,页328,克劳森:《十三世纪之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页735)。《元朝秘史》第139节在谈到蒙古部主儿勤氏族时说,这些主儿勤百姓,之所以为主儿勤,因合不勒罕七子之长乃斡勤巴剌合黑,其子莎儿合秃之所以为主儿勤氏,因为他是合不勒诸子之长,专挑选有勇气者组成部落,这就是主儿勤氏之由来。由是观之,蒙古语之jür(主儿、禹儿、月儿、要儿、岳儿)可能与前述突厥语之kür有关。这样我们的推论就应当是:kürkin大概指札剌亦儿人中的"主儿勤"氏族。《元朝秘史》在第141节提到札木合被推举为古儿汗时,旁注"普皇帝"。如果古儿汗之gür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突厥词kür是同一个词的话,那么13世纪时蒙古人似乎只知道蒙古化的突厥语借词jür具有"勇敢"的意义,而并不明白它与其突厥语词源gür(kür)之间的意义联系。

〔3〕原页193注(24):Tūlānkqīt,H本作TWLAN(?)KQI(?)T。按,《元朝秘史》第26节有种名"朵笼吉儿歹"(Dolonggirdai),《圣武亲征录》有"朵朗吉札剌儿",《元史》卷1《太祖记》有"朵朗吉",即此部。见韩儒林师上引文页247,248;及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164,165。

〔4〕原页132注(25):Tūrī,H本作Būrī。按,韩儒林师认为此名"写、读难决"(见上引文)。《辽史》卷116《国语解》:"吐里,官名,与奚六部秃里同。吐、秃字讹"(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549)。秃里所代表的契丹语原字笔者未找到。但有一点值得考虑:以官号作为部名,且不加复数词尾的情况,在《元朝秘史》中实属罕见,所以我们宁愿设想另一种可能,即取H本Būri的写法。büri在突厥语中义为狼,此部或许得名于此。

〔5〕原页132注(26):Šankqūt,P,H和Kh本作Sankqūt,S本作Š(?)KQWT。韩儒林师在上引札记(页245)中云:"此分族他处均未见。惟《蒙古源流》著录了一个部族名Singqor(Schmidt本,页186末行;汉文译本为星和尔(《笺证》卷6,页4上),或者就是Sangqot的异写(蒙古部族名的多数用r或t非一定不易)。"笔者考虑,这个部落名称或许另有词源,即源于Senggüm,也就是"详稳",义为"详稳之部"。也许此部之某一代首领曾受辽封号"详稳"。王罕的儿子桑昆的名称也源于详稳,但《史集》拼作Sānkūn,《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可还原为Senggüm。

而在全体札剌亦儿诸部中，在成吉思汗时代，木华黎国王[1]是最著名、最伟大的，[他]出自札阿惕部。[2]他执掌成吉思汗的全部左冀军队。[3]人们也以国王的头衔称呼他的后裔们。其意义在契丹人的语言中应为"伟大的汗"。当成吉思汗派他带兵驻守在一个人们现今称之为哈剌温只敦[4]的地方时，契丹人给了他这个称号。[5]他的儿子孛鲁国王[6]在窝阔台合罕时代，是父亲的继承

〔1〕原页 133 注(1)：dar ʻahd-i Jīnkkīz Khān Mūqlī Kūyānk"在成吉思汗时代木华黎国王"，H 本中无此短语。按，这样，句子主语似为前句之鲜骨兀惕。Kūyānk，应为 kū(国)+ yānk(王)，gui-ong，试对照塔阳汗称号。

〔2〕原页 133 注(2)：Jaāt"札阿惕"，在 H 本中为 Jaāt būda"曾[出自]札阿惕部"，在 Kh 本中为 Jāyīt。

〔3〕《元朝秘史》节 206 旁译："木合黎国王左手的合剌温只敦枕的万户教管者，么道圣旨做了"。元永贞《东平王世家》亦记成吉思汗分封功臣时命木华黎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1。

〔4〕原页 133 注(6)，(7)：Hīdūn，T 本和 J 本作 Jīdūn，S 本作 HY(?)DWN。Qarāwūn hīdūn"哈剌温·黑敦"，H 本作 Qarāwūn HY(?)DWN。按，《元朝秘史》节 183 有哈剌温质教(Qara'un-ǰidun)，并见节 206，《圣武亲征录》有哈剌温只敦。俄译本取 T 本写法 Jīdūn 如是正确的。

〔5〕原页 133 注(8)：laqab"称号"，T、S 和 J 本均于其后增加宾格后置词-rā。按，木华黎，《黑鞑事略》作"暮花里国王"。《蒙鞑备录》说，蒙古"元勋乃彼太师国王。没黑肋者，小名也，中国人呼曰摩睺罗，彼诏诰则曰谋合理，南北之音轻重所讹也。"他是当时蒙古国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在内的十名主要统兵将帅之一。《元朝秘史》节 206 说，1206 年成吉思汗大封功臣时，已授予木华黎国王的"名分"。而据《东平王世家》，木华黎受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在丁丑年(1217)。《蒙鞑备录》称其头衔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省、太师国王。"他"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以下诸将"各有军马，皆听摩睺国王命令"。木华黎的"国王"称号和权势，使之具有"权皇帝"的地位。《蒙鞑备录》的作者曾"亲见其权皇帝摩睺(按，木华黎)国王"，他"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故曰权皇帝"。宋使见其"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并说成吉思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而木华黎"国王者，间有用银处，以此为别。"其鞍马带上的"黄金盘龙饰纹"，亦与成吉思汗一样。据《东平王世家》记载，木华黎为左手万户时，已"翊卫宸极，仪位一如诸侯王。"《世家》又记成吉思汗诏木华黎语曰下学："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元史》本传载成吉思汗赐木华黎大驾所建九脚大旗，并诏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1。

〔6〕原页 133 注(10)：Būghūl Kūyānk"孛鲁国王"，P 本作 B(?)WGh(?)WLKWY(?)ANK。按，孛鲁，即孛斡勒，义为奴仆。

人。成吉思汗赐予了他这个称号。[1]

و هنتون نویان کی امیری بزرگ از آن قوبیلای قاآن بوده او را با پسر خود نوموغان بجانب قایدو بلشگر فرستاد و سبب مخالفت سهزادگان او را گرفته اند و بقایدو سپرده و بعد از چندگاه اورا رها کرده چنانک شرح آن بیاید

安童那颜,[2]他曾是那位忽必烈合罕的一个大臣。[忽必烈]派他同自己的儿子那木罕[3]一起率军朝海都那里去,由于诸王们反对的缘故,人们抓获了他,交给了海都。而过了一些时候,[又]释放了他,正知将要叙述的那样。

و درین ولایت از قوم ایشان جاوقور امیر هزار بوده و برادرش اوموق و

在此国,出自其部落[4]的有札兀忽儿[5]他曾是千夫长,还有其兄弟兀木黑(Ūmūq)。

و در زمان جینککیز خان جوجی ترمله و برادر او جوجی جاورقای بوده اند و بواسطه ایشان میان جینککیز خان و تایجیوت جنگ افتاد بموجبی که ذکر آن خواهد آمد و جوجی ترمله مذکور را پنج پسر بوده اند قوتوقتو قوتوقدر قوندقای ایلکا ارلن

在成吉思汗时代,有拙赤塔儿马剌[6]和他的兄弟术赤札兀儿

[1]按此记载,孛鲁在成吉思汗时已得国王封号。《东平王世家》记丁丑年(1217),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时,"赐誓券:'子孙传国,世世无绝'"(《元名臣事略》,卷1之一)。此外,成吉思汗与孛鲁曾有直接接触。《元史》本传记成吉思汗西征时,孛鲁"入朝行在所",因西夏"蓄异图",诏孛鲁讨之。孛鲁于甲申年(1224)克银州。(标点本,页2936)。《史集》所云孛鲁自成吉思汗处得"国王"封号事如属实,则可能在此时。

[2]原页133注(11):Hantūn Nūyān"安童那颜",H本作Hītūn Bartān。

[3]原页133注(15):Nūmūghān"那木罕",在S本和Kh本中作Nūmūqān,H本作Nūb(?)ūqān。

[4]指札阿惕札剌亦儿部。

[5]原页134注(2):Jāwuqūr"札兀忽儿",T、S和J三本作čahār qawm"四部",H本为,jār qa-wm-and ka"有四部,他们……"。按,显然均讹误,上下文义不通。

[6]原页134注(5),(6):Jūjī"拙赤",H本作hūjī。按,H本此处字母J音点当脱落。Tarmala"塔儿马剌",S本作Barmala,此处起首辅音字母B-当系字母T-音点脱漏所致。关于拙赤答儿马剌事迹,见《元朝秘史》节128,及《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太祖纪》。

孩。[1]而由于他们的原因,在成吉思汗和泰赤兀惕氏之间[2]发生了战争,其原因将会叙述。上述术赤塔儿马剌有五个儿子:忽秃黑秃、[3]忽秃合答儿、[4]浑答海(Qūndaqāy)、亦鲁格、[5]阿儿兰。[6]

از فرزندان قوتوقتو در تومان آلدو القون امیر هزار [بوده و]

忽秃黑秃[7]的诸子中,阿勒浑[8][曾是]阿勒都[9]万户中的千户长。

فرزندان قوتوقدر پیش اوروغ جغتای بوده اند و از فرزندان او بولاودر نامی را براق با یلچی بحضرت اباقا خان فرستاد تا اسبان توبجاق بخواهد چون خبر آمدن براق بشنید اباقا خان فرمود تا او را بگرفتند و گفت بحیلت آمده بودی و دروغ گفتی او عرضه داشت کی چون بنده را میفرستادند ازین قضیه و عزیمت آنجا خبری نبود غرمان بنفاذ پیوست تا اورا در زندان تبریز محبوس کردند آنجا نماند و از فرزندان او دیلخی نامی هست بیش جیله می باشد

而忽秃合答儿之诸子,都曾在察合台兀鲁黑[10]那里。八剌

[1]原页134注(9):Jāwurqāy“札兀儿孩”,S本为Hāwurqāy。按,伯希和、韩百诗认为他就是《圣武亲征录》所记率“朵郎吉札剌儿部”来归之搠只钞鲁罕(《圣武亲征录译注》,页164),此事亦见《史集·成吉思汗纪》(汉译本,页118)。笔者认为术赤札兀儿孩与搠只钞鲁罕不是同一人,他们虽然都是札剌亦儿人,名字也相似,但搠只钞鲁罕乃朵朗吉氏,“十三翼之战”后才归降成吉思汗,而术赤札兀儿孩应为札阿惕氏,他们是成吉思汗家族的世仆,“十三翼之战”前已为成吉思汗家族牧马,二者区分甚明。

[2]原页134注(12):Tāyjiyūt“泰赤兀惕”,P本为TAY(?)HYWT,T本为NAY(?)JWT,S本为T(?)AY(?)HWT,H本为BAY(?)HYWT,J本为TAY(?)HBWT。按,均讹。

[3]原页134注(16):Qūtūqtū“忽秃黑秃”,B本和P本作Tūqtūqū(按,此为Qūtūqtū的倒读);T本作Qūtūqtūr;S本作Qūtūqūr;H本作QWT(?)WQT(?)W。

[4]原页134注(17):Qūtūqdar“忽秃答儿”,B本和P本作dūrwādar(按,原文标注元音符号),T本作qudūrqudūd,S本和J本作qudūrqudūr,H本作wudūdūr。

[5]原页134注(15):Īlkā“亦鲁格”,S本作Ī(?)LKA,Kh本作Īlkāy。

[6]原页134注(19):Arlan“阿儿兰”(按,原文标注元音符号),T,S和J本作Arkan,H本和Kh本作Arīn。

[7]原页134注(20):Qūtūqtū“忽秃黑秃”,B本和P本作QWT(?)WQT(?)W;T本和S本作Qūtūqtūr,H本作Qūtūqū。

[8]原页134注(22):Alqūn“阿勒浑”,T,H和Kh本作Aūlqūn,J本作Aūnqūn。

[9]原页134注(21):Āldū“阿勒都”,H和Kh本作Aka。

[10]兀鲁黑,突厥语,意为种子,在这里指氏族,即察合台汗国。

(Būrāq)曾从其诸子中派出一位名叫不剌兀答儿[1]的人,同也里只一起前往阿八哈汗处,目的是讨寻脱必察[2]种马匹。当听到了八剌到来的消息时,阿八哈汗命令人把他抓起来,并说:你过去怀着诡计而来,现在你又说谎。他解释道:当他们遣送奴才时,关于这一件事情[3]和[军队]出动,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有人]执行命令,把他囚禁在帖必里思的监狱中,[4]待[5]在那里。[6]而其诸子中

〔1〕原页135注(2):Būlāwudar“不剌兀答儿”;T本和S本作Yūlāwudar。

〔2〕原页135注(6):tūbjāq,P本作TWB(?)JAQ,T本作tūyhāq,S本作TWB(?)HAQ。《元朝秘史》第274节记窝阔台派搠儿马罕西征时提到:“阔勒温都儿(脚高)脱必察兀惕(西马每)”。这里提到的脱必察兀惕tobča'ut是tobičaq的蒙古语复数形式,它前面的定语形象地勾画出这种“西马”的体态:秀颈高脚。《常德西使记》云,报达国(按,阿巴斯王朝)所产阿拉伯名马曰“脱必察”,即此。在1820年出版之《加尔各达之察合台文词典》(*Calcuttaer Wörterbuch der Dschagataischen Sprach*)中收有 توبجاق (topjaq),称为ein fettes schönes Pferd(一种肥硕之良马),即此词(兹据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词典》,圣彼得堡,1893—1911年(B.B. Радлов, Опыть словаря Тюркскиф наречий,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von Dr. W. Radloff,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893—1911〕,第2册,页1230)。德福认为tūbčāq乃突厥语,指喂养良好的西方良种马,可能指土库曼或阿拉伯血统马,见《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chen,* Wiesbaden, Band II, 1965),威斯巴登,卷2,1965年,页601。在明《高昌馆课》中多次提及西域向明朝进贡“大西马”,在对应的畏兀儿文表文中,“大西马”topčaq,见胡振华、黄润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并见《高昌馆课》,页68,75,9,92,121,156。这显然就是《史集》提到的tūbjāq种马,即《西使记》所载之阿拉伯名马“脱必察”。

〔3〕原页135注(12):qaziya“事情”,J、H和Kh作qassa“故事、传说”。按,不剌兀答儿在这里辩解说,他动身前往伊利汗国内,时尚不知察合台汗国军队有西侵之事。

〔4〕原页135注(15):zandān“监狱”,H本和Kh本于其后增加dār al-Islām“伊斯兰之国”。按,义为在伊斯兰之国(即波斯)的监狱。

〔5〕原页135注(16):na-mānd“不待在……了”(按,一般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如取此拼法,则此言不剌兀答儿已不在帖必里思监狱),T,S和H本作bi-mānad“在……处”,“死于……处”。按,这样句子变为现在假定时。笔者取后者。

〔6〕整个这一段讲的是八剌入侵伊利汗国期间的事。不剌兀答儿待在伊利汗廷为察合台汗国寻求阿拉伯良种马时,适逢八剌的大军越阿母河南侵,阿八哈汗遂怀疑不剌兀答儿寻求骏马是借口,真正的使命是刺探军情,犹如当年苏武出使匈奴之故事。于是把他投入监狱。拉施都丁这里行文流杨,文义通顺,了解历史背景便不会有任何疑义。俄译者赫塔古罗夫不知道这段历史,误解为阿八哈听到的是八剌使臣到来的消息,竟然译作когда Абага-хан услышал известие о прихде [послов] Борака……(见俄译本,页94;汉译本,页151)。

有一个名叫的里只[1]的人,现在在只列[2]跟前。[3]

و پسر قوندقای قورجی بوغون شحنه گرجستان بود و پسر بوغون تیمور کی براه قورجی پیش شهزاده خربنده است

浑答海[4]之子豁儿赤[5]不浑曾是谷儿只地面(Gurjistān)的沙赫纳(Šahna)。不浑之子[是]帖木儿不花,他现在以豁儿赤的身份在诸王合儿班答[6]帐前。

و ایلکای نویان امیری بزرگ بود با هلاکو خان اینجا آمد و معروف و مشهور و او را ده پسر بوده

亦鲁格那颜曾是一位大臣,同旭烈兀汗一起来到此地。[他]名声卓著。他有十个儿子。

پسر اول طغان در ولایت مغولستان بماند و اینجا نیامد و این طوغان را دو پسر بودند کی بدین ملک آمدند قونجی و اوررم

长子脱欢(Ţughān)留在达达田地(walāyat-i Mughūlistān),没有来此地。这位脱欢[7]有两个儿子:浑只[8]和兀鲁木,[9]他们来到了此国。[10]

---

[1]原页135注(18):Dīlkhī,P、T和J本作Dīlīnjī,H本作BL'AY;Kh本作Dīljī。按,dilji在突厥语中义为"舌人、译人",故笔者取此写法,并音译作"的里只"。

[2]原页135注(22):Jīla"只列",P本和H本作HY(?)LH,J本作Hīla;Kh本作J(i)nka。按,只列可能指下文失乞秃儿之次子。

[3]原页135注(21):biš"较多地",P本和H本作??S。按,bīš在这里解释不通,当是介词pīš"在……跟前"的讹写。

[4]原页135注(23):Qūndaqāy"浑答海",H本作Qūndaghāy。

[5]原页135注(24):Qūrjī"豁儿赤",T本作Qūrjīn。按,豁儿赤是其的官号,意为"箭桶士"。

[6]Kharbanda"合儿班答",即后来的伊利汗完者都,拉施都丁写《史集》时为伊利汗国镇守呼罗珊之诸王。

[7]原页136注(11):Ţūghān"脱欢",T本作Ţughān。按,这里两位脱欢是同一个人,合校本未统一其名称,不妥。

[8]原页136注(12):Qūnjī"浑只",H本作?WN(?)HY。按,疑此人名称是汉语"公子"之音译。

[9]原页136注(13):Ūrūm"兀鲁木",H本作Urum。按,此人名字当来自Rūm"芦眉"(罗马,指拜占廷、东罗马帝国,或其都城康斯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蒙语无词首辅音r-,凡遇外族以r-启首之词,则习惯于其前重复词干主元音,如将Rus"罗斯",读为Orus"斡罗思""俄罗斯",故而将Rūm读为Ūrūm。

[10]Bad-īn milik"在此国""朝此国"。"此国"指波斯、伊利汗国。

پسر دوم شیکتور نویان و پسران او مهتر جینکتو دوم جیله سوم جیتو چهارم هندو و پنجام تکنه ششم اوقونا

次子势都儿[1]那颜。其诸子中，长曰成秃，[2]次曰只列。[3]第三子曰只秃，[4]第四子曰忻都(Hindū)，第五子曰帖乞乃，[5]第六子曰月忽乃。[6]

پسر سوم طوغان با جومقر بهم بود و دو پسر داشت کوتن و کونجک پسر کونجک ابو بکر نام امیر هزارست در خراسان پیش شهزاده خربنده می باشد

第三子托欢，[7]曾同术木忽儿在一起。[8]他有两个儿子：阔端[9]和宽彻。[10]宽彻的儿子名补白克[11]，现在是千户长，在呼罗

---

〔1〕原页136注(14)：Šīktūr，即应元代蒙古人常见的人名势都儿。T本作ŠY(?)KTWR，H本作Sinkūr，Kh本作Šīnktūr。俄译本取的是Kh本(贝勒津)的写法，不妥。

〔2〕原页136注(15)：Jīntū"成秃"，H本作HY(?)N(?)KNW。

〔3〕原页136往(16)：Jīla"只列"，H本作JY(?)LH。疑此名是Yila"移剌""耶律"的讹音。关于此人，见上。不剌兀答儿之子的里只与他在一起。

〔4〕原页136注(17)：Jītū"只秃"，H本作H(a)tū，Kh本作HY(?)TW。

〔5〕原页136注(18)：Tikna"帖克乃"，T本作Sikna，H本作?K?H。

〔6〕原页136注(19)：Aūqūnā (Ūqūnā)"月忽乃"，H本作Aqātū; Kh本作Aūqātū(Ūqātū)。

〔7〕原页136注(20)：Ţūghān"托欢"，T本和J本作Ţughān。H本于其后增加dar walāyat-i Mughūlistān"在达达田地"。按，按此描述，亦鲁格之第三子与长子同名。H本增加的这几个字很重要，有助于解决下一注解中所讨论的问题。

〔8〕bā-Jūmqur biham"同术木忽儿一起"，H本作B(?)A-HWMQ(?)R。按，俄译者大约因不知道Jūmqur是何人，无法解释bā-Jūmqur biham的意义，以至不能点断，把这个短语全部视为一个人名，汉译者蹈袭其误。其实单凭其中出现bā……b(a)h(a)m的结构，也可知俄译者必误读。bā是波斯语中极为常见的介词，义为"同……"，"以……"，"用……"。biham也是一个普通的波斯语副词，意为"共同、一起"。bā……biham译言"同……一起"，它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结构。bā与biham之间的Jūmqur才是人名。治蒙元史者很容易查到，Jūmqur乃旭烈兀之子术木忽儿的波斯文写法。关于他，可参见《史集》第2卷、第3卷中的记载，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48《宗室世系表第一》(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叶58，将此人写作"出木哈儿"；并见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来顿，1945年(Louis Hambis, *Les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 avec des notes supplementaires par Paul Pelliot*, Leiden, 1945)，页94，95之间表39，拉施都丁所记《旭烈兀之后裔》。旭烈兀西征时，术木忽儿并未随行，而是留在蒙古。所以说，他留在"达达田地"。

〔9〕原页136注22：Kūtan"阔端"，H本作Kūy，Kh本作kūn(a)n。

〔10〕原页136注23：Kūnjik"宽彻"，H本作KN(?)HY(?)K。

〔11〕Abū Bikr，译名从〔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

栅在诸王合儿班答[1]帐前。

پسر چهارم او ننكقيادای و پسر او ايتقون با كينكشو بهم

其第四子[是]囊家歹。[2]其子亦惕浑,[3]曾一直同轻漱在一起。[4]

پسر پنجم توقو و پسر او حسين

第五子秃忽[5]其子为忽辛。[6]

پسر ششم اقداش يازده ساله بود در جنگ بركه كشته شد

第六子阿黑答失,[7]他在别儿哥战争中被杀,[时]年十一岁。

پسر هفتم جلايرتای پسر او قرابوقا ملازم شهزاده بيری می باشد

第七子札剌亦儿台;[8]其子哈剌不花,现在是宗王口里[9]的随从。

پسر هشتم طوغان بوقا پسران او جلايرتای و يغلاوو و جلانجی

---

[1]原页136注(25):Kharbanda"合儿班答",P本作J(a)hand。

[2]原页137注(3):Nankqīyādāy"囊家歹",此名诸本拼法不一,如T本作T?K?QYADAY; J本作Nānkqīyārāy。H本作N(?)N(?)KQY(?)ADAY; Kh本为T?KQYADAY。

[3]原页137注(4):Aītqūn(按,应读为Ītqūn)"亦惕浑",J本作Aīt(?)qūn,H本作??QWN,Kh本为BTQWN。

[4]原页137注(5):bā-Kīnkšū biham"同轻漱在一起",H本作bā-L(a)īnksū biham"同L(a)nksū在一起";Kh本作bā-Līnkšū biham"同Līnkšū在一起"。按,三种异写形式的区别只在于Kīnkšū这个人名的不同写法。俄译者因不知Kīnkšū"轻漱"是何人,误解这个词组的含义,以至无法点断,把它全部当作一个人名。其实轻漱是术木忽儿的儿子,见《史集·旭烈兀传》,汉译本作勤疏。洪钧《阿八哈补传》译作钦助、景柱和景察。并见《蒙兀儿史记》卷148《宗室世系表第一》及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页94、95,表(39)。

[5]原页137注(7):Tūqū"秃忽",H本和Kh本作Qūtū。

[6]原页137注(8):Husein"忽辛",P本作HYN,T本和J本作HSN; H本作HY(?)N; T,J,H和Kh增写pisar-i ū Husein"其子忽辛"。按,此为衍文。

[7]Aqdāš"阿黑答失",自突厥语。aq"白"+taš"石",义为白石。

[8]此名意为"札剌亦儿人"(男子),这是此人主人对他的称谓。

[9]原页137注(12):?YRY"?里",T本作??RY,J本作Bīrī,H本作H(?)rī。此名因音点缺失,不可读。

第八子脱欢不花。[1]其诸子：札剌亦儿台、[2]牙黑剌兀[3]和只兰赤。[4]

پسر نهم اوروقتو سکورجی آباقا خان بود در جنگ روم با توقو بهم کشته شد و پسر او اقبال ملازم کیخاتو بود پادشاه اسلام او را بیاسش رسانید بعد از ثبوت گناه

第九子兀鲁黑秃，[5]曾是阿八哈汗的速古儿赤，[6]在芦眉[7]之战中同秃忽[8]一起被杀。其子阿黑巴勒(Aqbāl)曾是海合都(Kīkhātū)的随从。伊斯兰之王[9]在证实其罪行之后把他依札撒正法。

پسر دهم آقبوقا امیری بزرگ از آن کیخاتو بود بایدو او را بکشت پسران او جسین کورکان و مسایل و اودونجی اند

第十[10]子阿合不花(Aq Būqa)曾是那位海合[11]都的一位大臣。拜都将他处死了。其诸子是忽辛(Husein)驸马、木撒亦勒[12]和兀敦赤。[13]

ازین پسران ده گانه شیکتور و طوغان و طوغان بوقا هر سه از یک مادر بوده اند موکلون نام

---

[1]原页137注(14)：Ṭughān Būqā“脱欢不花”，H本与Kh本作Ṭughān Būghā；在T，S，J，H和Kh诸本中写作：Ṭufān Būqā pisaar-i dahum“秃番不花，第十子”。

[2]原页137注(15)：Jalāyīrtāy“札剌亦儿台”，H本作Jadāb(a)rtāy。

[3]原页137注(16)：Yaghlāwū“牙黑剌兀”，H本作Y(?)‘ALADWR，Kh本作Yaghlāghū。

[4]原页137注(17)：Jīlānjī“只兰只”，P本作Hīllānhī；H本作HY(?)LAN (?)HY。按，jilan在突厥语(北部方言/钦察方言)中义为蛇。Jīlānjī，此言蛇夫。

[5]原页137注(19)：Aūrūqtū (Ūrūqtū)“兀鲁黑秃”，P本作Ūruqtū；H本作AW?WQW?W，H本和Kh本写作pisar-i haštum“第八子”。按，此名似来自蒙古语“有子孙的”uruq-tu。

[6]原页137注(20)：Sukūrjī“速古儿赤”，T本作Sūkūrčī，H本作Šūkūrčī。关于这个名字，见《史集》第1卷第1册俄译本，页94注(汉译本，页152，注[10])。

[7]Rūm“芦眉”，来自“罗马”这个名称，指小亚半岛，或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8]原页137注(22)：Tūqū“秃忽”，H本和Kh本作Qūtū。

[9]Pādšāh-i Islām“伊斯兰之王”，指伊利汗合赞。

[10]原页138注(2)：dahum“第十”，T，S，J，H和Kh本作nuhum“第九”。

[11]原页138注(4)：Kīkhā“海合-”(按，海都都名字的前半部分)，T本和S本空白无字，H本增加khān“汗”。

[12]原页138注(7)：Mūsāy(?)īl“木撒亦勒”，T本作Mūsānīl“木撒你勒”，Kh本作Mūsāyil。

[13]原页138注(8)：Ūdūnjī“兀敦赤”，H本作Udūn(?)ji，S本作Ūdūn(?)hī。

在这十个儿子中，势都儿、[1]托欢和脱欢不花，[2]三人出自同一母亲，名木克伦。[3]

本文在注解《部族志·札剌亦儿传》时，与前人有若干意见不同之处，主要是：

(1)确定札剌亦儿部中的札阿惕部世居于斡难河、怯绿连河流域。《史集》称札剌亦儿属于迭列斤蒙古集团，可能指的是这一部分札剌亦儿人。

(2)《史集》土敦咩捻的哈屯Mūnūlūn的拼法与《元朝秘史》那莫伦的读法音节颠倒，支持亦邻真教授关于《史集》所据之《金册》乃某种汉文史册之译本的假说。

(3)赫塔古罗夫俄译本中哈剌和林之所谓Kima地方(即汉译本页149音译“合迪马”地方)，乃俄译者之误读。它不是地名，而是阿拉伯语副词，义为“自古以来”。

(4)赫塔古罗夫俄译本中音译的对札剌亦儿人的称呼BLAQH(即汉译本页149之必剌合)，应是拉施都丁时代蒙古人对札剌亦儿族名的词源解释。

(5)札剌亦儿人中的Qunkq(a)sūt氏，可能指依附于札剌亦儿的一部分康合思人。

(6)札剌亦儿人中的Kūmsāūt氏，有可能指辽代之胡母思山蕃。

(7)札剌亦儿人中的Kūrkīn氏，可能指其部落中的主儿勤氏。

(8)札剌亦儿人中的Tūri氏，似与辽官号吐里有关，或源于突厥语büri“狼”。

(9)札剌亦儿人中的Šankqūt氏，似来自辽官号“详稳”。

(10)拙赤塔儿马剌应出自札阿惕氏。其弟术赤札兀儿孩，应不是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考证的搠只钞鲁罕。

---

[1]原页135注(10)：Šīktūr“势都儿”，P本作Šiktūr；H本作si(?)n(?)kt(?)ūr，Kh本作Šinktūr；H本和丛本并增加Nūyān“那颜”。

[2]此三人分别为亦鲁格的次子、第三子和第八子，不包括长子脱欢。

[3]原页138注(14)：Mūklūn“木克伦”，H本作Tūklūn。

(11)不剌兀答儿赴伊利汗国所求之tūbjāq种马，即《元朝秘史》所描述的颈长脚高的"西马"、《西使记》之脱必察马和《高昌馆课》中之"大西马"。

(12)阿八哈因得知八剌入侵的消息(而不是听到八剌的使臣到来的消息)后，把不剌兀答儿投入监狱。

(13)俄译本所谓拙赤塔儿马剌之子亦鲁格之第三子"脱罕—巴术—马合儿巴合木"(见汉译本页152)的罕见的长名字，乃赫塔古罗夫之误读。其正确读法和意义应为："托欢同术木忽儿在一起"(术木忽儿为旭烈兀之子)。

(14)俄译本所谓拙赤塔儿马剌之子亦鲁格之第四子囊家歹(汉译本：滕乞牙带)之子"亦惕浑—巴勤—克莎别赫木"(见汉译本页152)的罕见的长名字，乃赫塔古罗夫之误读。其正确读法和释义应为："亦惕浑同轻漱在一起"(轻漱是旭烈兀子术木忽儿之子)。

(原刊于《蒙古史研究》，第4辑，1993年，页1-10〔笔名：皮路思〕，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8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

张锡彤、张广达先生翻译的苏俄巴托尔德教授的名著《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1]最近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是书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沈卫荣、李肖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笔者因忝列译丛编委会而有幸先睹。

张锡彤、张广达先生的翻译工作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据译者的序言中介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已经据《突厥斯坦》1928年英译本译出了汉文本的初稿。1964年,两位译者见到此书俄文本第2卷,发现其中有原英译本缺失的第5章,附录中的《论文答辩前的发言》及文献目录部分,遂决定依据新版俄文本补订汉文译文。1976年准备了译文第2稿后,又于1978年见到收有C.E.博斯沃思的《补注与订正》的英译本第3版,遂再次补译。同年底译者见到俄文原本《巴托尔德院士全集》第9卷所附地图后,译绘后收入译文。至此翻译工作才算基本完成。为便于读者查核原文,译者在汉译文页缘注明英译本与俄文原本的页数。其索引中的所有条目先用英文录出,再配以相应俄文和汉译。使用非常方便。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笔者有幸考入南京大学师从韩儒林教授学习元史,巴托尔德的名著《突厥斯坦》为必读书。其时笔者初

〔1〕学界惯例简称此书为《突厥斯坦》,本文从之。

习俄语，靠翻字典苦读，非常吃力。所以主要依靠的是其英译本。[1] 198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张锡彤、张广达先生出席。他们带来了论文《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2]据张广达先生在会上介绍，是书的翻译工作当时已经基本完成，但一直未能印行，学界期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突厥斯坦》是全世界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伊斯兰时代中亚历史文化的权威著作，书中所涉及的核心地域从中国西北直至包括独联体中亚五国及其周边地区在内的广义内陆亚洲地区；其主要时间跨度从8世纪至15世纪，达700年以上；所谈及的史料主要是阿拉伯文、波斯文与察合台文文献，也包括作者所知道的汉文与蒙文史料。虽然当代我国许多西北民族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此书，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认真读过者并不多，其汉译工作更非长期关注中古时代汉-伊斯兰历史文献比较学的专家不敢问津，故翻译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由于该书对我国学术界了解有关伊斯兰时代内陆亚洲的史料极为重要，也是提高我国中亚研究水平的必读书，因此其汉译本的问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8.1 《突厥斯坦》汉译本中的学术性附注

翻阅汉译后深感《突厥斯坦》的汉译工作既是翻译，也是学术研究。译者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集中体现在译者所增加的注记之中。译者在序言中说，“为了有所补充也偶然写出附注”，在印行时“括以弦月形括弧〖……〗以资区别”。[3]实际上作者所增的注记相当多，除了一些说明性的以外，学术性附注可大体可分为：

---

〔1〕此书翻译至今已近30年。此外学界常用者还有巴托尔德的其他著述的西欧文字译本，如：《中亚研究四种》米诺尔斯基英译本(V.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 by V. Minorsky, Leiden, 1956),《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亚突厥史》(W. Barthold,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Paris, 1945)等。

〔2〕刊于《元史论丛》,第1辑，元史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82年，页200-213。

〔3〕序言，页7。

8.1.1 纠正原文错误

《大唐西域记》的儒莲(Stan. Julien)法译本,误解《西域记》卷1记“窣利地区”的原文中“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等语,将其译为“居民刚刚有了若干历史记载,他们自上而下地阅读这些记载的文本,互相交换得自这些典籍的知识。就是这样,文献知识得以无间断地被保存下来。”巴托尔德据此称:“穆斯林征服以前,中亚有无历史著作,今已无从确知。7世纪中国旅行家玄奘说到有这类著作,可是这类著作甚至连标题也不曾流传下来。”译者出注说明“儒莲译文枝蔓失真,导致巴托尔德误以为依据玄奘的记述,当时中亚地区容或已有历史文献”。[1]

页81:针对巴托尔德的“十世纪时,帆延、喀布尔与哥疾宁合为一个省区,受一位土著王公的统治,帆延为其首府。今在从巴里黑前往帆延,通常取道于胡勒姆;但当日阿拉伯地理学家则注意另一条路,即溯巴里黑河上行,然后西折入于来自胡勒姆的大道。”译者针对“西折”出注云:“俄文本与英译本均作‘西折’,疑应作‘东折’。”

8.1.2 提供史料标题译文

巴托尔德所研究的领域是蒙古时代初期及其以前伊斯兰时代中亚的历史与文化。其著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涉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台突厥文的史料与文献。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当年巴托尔德在其原作中按西方学术规范,这些文献的标题多数以拉丁转写的形式出现。这对于掌握阿拉伯文、波斯文并了解其转写规则的专家和读者来说,可以通过拉丁转写字方便地复原原文,换而言之并不构成阅读障碍。但我国从事西北地区历史研究的学者多数不具备这种学术素养,如对穆斯林史料采取拉丁字原文照录的方式,译文的可读性将大大下降。因此译者在注记中对许多常用的史料,在录写拉丁转写标题的同时,还将其意义译为汉语。如比鲁尼(Bīrūnī)的著作 Athār ul-Bākiya,

[1]译文页1及同页注(1)。

译者补入汉译《过去世代的遗迹》。[1]这种例子在书中举不胜举。

8.1.3 评述原作者的某些观点

巴托尔德在谈及萨曼王朝(Samanids)的史学时,提到该王朝的韦齐尔[2]巴勒阿米在回历963年(352)将塔巴里(Tabarī)[3]的编年史译为波斯文。并评论道:"在塔巴里的阿拉伯文原作刊印之后,巴勒阿米书事实上已无史学价值可言。"在原著与译文之间,尽可能选择原著当然是史家的准则。但巴勒阿米当年翻译塔巴里编年史时,所据原文不同于当今常用文本,而且巴勒阿米在翻译过程中,时有增加。因此其波斯文本并非简单的翻译。对此译者出注:"巴托尔德这样全盘否定巴勒阿米译本的价值,今日看来,似有未当。巴勒阿米曾保全了塔巴里书今日已失传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若干史料,因此在他的译本中一些记述不见于今塔巴里书之莱顿印本。"[4]

8.1.4 提供最新的研究与出版等学术信息

《突厥斯坦》虽然是公认的权威著述,但也毕竟是一百余年前的作品。在学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自我设限于巴托尔德所用文献当然是不可取的,继承作者勤于探索的传统才是真谛。比如,译者在史料部分对原作所述引许多穆斯林史料的新近研究与出版情况做出补充。如译到作者有关《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时,补充道:"V.米诺尔斯基的英文译文经C.E.博斯沃思增订,于1970年在伦敦印做了第二版。"[5]又如,在有关阿拉伯学者亚库特的学者传记辞书的马戈利乌思(D.S. Margoliouth)教授校订本,译者在附注中补充道:"按,此书之马戈利乌思校订本共七卷,已全部出齐",并给出全部刊行年份。

故而此汉译本比一般即使忠实于原文的译文的所提供的研究信息

---

〔1〕译文页1及同页注(2)。

〔2〕Vazir,明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人物门"音译为"卧即儿",意为"臣"。

〔3〕受条件限制,本文在录入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转写字时,不得不略去字母上下添加的音点,以下不另作声明。读者在使用时,敬请注意核对原文。

〔4〕译文页12及同页注(4)。

〔5〕译文页16及同页注(5)。

也要多得多。对于读者来说,在了解了原著的同时也补充与更新了知识。

8.2 《突厥斯坦》汉译本中有改进余地之处

同样是因为《突厥斯坦》原著所述历史错综复杂,以及涉及语言文字多,地理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翻译难度高的缘故,笔者在阅读中感觉译文中个别地方或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兹举数例说明:

8.2.1 "河中与河中府"

译文中对乌浒水/阿母河外之地(Transoxania,阿拉伯语Мавераннахр)均按许多学者的惯例译为"河中"或"河中府"(参见索引)。

"河中"或"河中府"这个词使用最多的是耶律楚材,他在《西游录》中提到寻思干(Semizkent)[1]时说"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他随成吉思汗西征时在中亚写了许多诗,其中《赠蒲察元帅七首》之一提到他曾访问过管辖蒲华(Bukhara,不花剌)的女真人蒲察元帅说:"闲骑白马思无穷,来访西城太守绿发翁。元老规模妙天下,锦城风景压河中"。耶律楚材时居寻思干,此城位于蒲华(不花剌)之东,故称蒲华曰"西城",又称为"锦城"(其第二首诗中有"莫教辜负锦城春"句)。[2]楚材认为不花剌的风光超过寻思干,所以说"锦城风景压河中","河中"即寻思干。

耶律楚材《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之一有"幽人呼我出东城"一句,"东城"即指寻思干,相对于西城,即蒲华。其四有句"河中二月好踏青",共五有句"二月河中草木青",其六有句"归来不识河中道"。这里的"河中"即上文之"东城",即寻思干。

楚材还写有《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和《河中游西园四首》。后者之一有"且著新诗芳酒,西园佳处送残春"。其三有句"闲步西园试一巡",[3]可见"河中"指寻思干,城中有"西园"。

---

〔1〕突厥语"肥城",又音译为"邪迷思干""薛迷思贤"等,即撒麻耳干(Samarqand)。

〔2〕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91。

〔3〕同上书,页95-100。

寻思干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郊阿伏拉西亚卜(Afrasiyab)遗址,恰为两条河所围绕,这应当是它在西辽时代被称为"河中府"的原因。因此"河中"在西辽—蒙元时代,并非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农耕区,而专指寻思干城及其辖区。而英语Transoxania/阿拉伯语Мавераннахр在古代汉文文献中并无对应词,窃以为以译为乌浒水外之地/阿母河以北之地为宜。

8.2.2 两条水渠的名称

译文页132注9"布哈拉方言称阿里克(ariq,水渠)为卡姆,参看我写的Орошение页29。西特尼亚科夫斯基将Kām-i Zar与Ju-i Zar译为'大泽尔与小泽尔',由此可知,方言中卡姆一词系指大于波斯语中称为术(Ju)或术伊(Juy)之渠道而言,参看我写的Орошение,页120。"

此段注文中Zar意为金色,Kām系指干渠或主水渠,而Ju或Juy则为普通水渠。故Kām-i Zar意为"金色干渠",而Ju-i Zar则可译为"金色支渠"。另外,Juy见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地理门"本田实信编号第42词"جوى(jūy),河,卓衣"[1]。此字亦见于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地理门"本田氏编号第1058词"河,卓亦"。[2] جوى(jūy)作为复合词组成部分亦见于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地理门"本田氏编号第69词"جويچه(jūycha),沟,桌衣彻。";及第72词"لبجوى(lab-i jūy),岸,勒必·卓衣。"[3]

8.2.3 养尼肯特与养夷

页206译文第9行:"扫兰以下,锡尔河流入古斯人占有的草原。养尼肯特位于距锡尔河口二日程、离河1法尔萨赫处。养尼肯特意为'新城',阿拉伯人称之为al-Qaryal al-Hadītha,波斯人称为Dih-i Naw,文献中亦常称之为谢赫尔肯特,这一名称有时也出现在钱币上。"

---

〔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册,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页467。《回回馆译语》"巴黎本"在"河"字右侧,有无名学者标音ho,其下拉丁文释义为fluvius minor(小河)。在汉字音译"卓衣"之上标音为tchouo y。无名法国学者的译意"小河"与波斯文意同。

〔2〕《回回馆译语》,页607。

〔3〕《回回馆译语》,页469。

这里的养尼肯特(Yanikand),即"新城",就是明陈诚所描述之养夷(Yängi Shahr)。突厥语yängi(南部突厥语,即乌古思语作yeni),意为"新";明会同馆本《委兀儿译语》"通用门"中之"新,阳",[1]即此字。shahr为波斯语,此言城;明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地理门"中"城,舍黑儿",即此。而Dih-i Naw为波斯/塔吉克语,意为"新村"。其中之dih意为"村庄",而naw则译言"新的"。

8.2.4 牛乳城

页207译文第2段第9行:"锡尔河左岸属于法拉卜的城镇有休特肯德与韦西史。"同页注(5)为"我们在这里依据图曼斯基抄本(Hudūd al-'Ālam,页24b),采取了Sutkand这一读音,意为'牛乳城'……"。

süt,突厥语意为"乳",并非专指牛乳。故以译为"乳城"为优。赛里木湖蒙元时代突厥人称为sütkül,意为"乳湖",《海屯国王东行记》曾提及之。

8.2.5 巴耳赤刊与巴儿真

页208译文倒数第1行提到术赤西征时的"巴尔钦利格肯特"。同页注(7)为:"普朗·迦尔宾书中(Beazley刊本,页76,110,152);(Мален译本,页24,51)作巴尔钦(Barchin),契拉科斯书中作帕尔钦(Parchin),术赤朝钱币上作Bārjīn(Лерх,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оездка,页10-11)。中国转写作Ba-eulh-chi-li-han, Ba-eulh-chen(Schefer, Chrestomathie persane, II,页167);布雷特施奈德书(《中古东亚史料考证》,II,页95与地图)作Ba-eh-chi-li-han,在穆斯林史料中亦简作Bārjikand……"。

这里注文中提到的Ba-eulh-chi-li-han/Ba-eh-chi-li-han/Bārjikand即《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之"巴耳赤刊"。而译文中提到的巴尔钦(Barchin)/帕尔钦(Parchin)/Bārjīn乃《元史》卷1《太祖纪》中记述成吉思汗西征时所提到的"巴儿真"。

8.2.6 阿比韦尔德/八瓦耳/巴瓦儿的

译文页288注(5)"马克迪西(BGA,Ⅲ,页300、340)仅将你沙不儿

[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册,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无出版年代,页603。

的《金库》这个词用来指你沙不儿附近的三个最富饶的城镇，即徒思、奈萨与阿比韦尔德”。此译名还出现于译文多处（见索引页685）。

阿比韦尔德（Abiward）即《元史》中之“八瓦耳”。《元史·阿剌瓦而思传》提到：“阿剌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仕其国为千夫长。太祖征西域，驻跸八瓦耳之地，阿剌瓦而思率其部典来降。”[1]同书卷63《西北地附录》作“巴瓦儿的”。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已收。[2]

8.2.7 库奇卡尔/科查尔/火赤哈儿

页371译文第2段提到的“伊金奇·本·库奇卡尔”，即同页注(6)中提到的“花拉子模沙埃金奇·本·科查尔(Ekinchi b. Qochar)”中的埃金奇(Ekinchi)/库奇卡尔为突厥语äkin-či，此言农夫，而其中之äkin意为谷物、粮食。此人名称中的库奇卡尔/科查尔(Qochar)元代音译为“火赤哈儿”，元世祖时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与之同名，见于虞集所撰之《高昌王世勋碑》或《元史·巴儿术阿而忒的斤传》，其意为公羊。

8.2.8 巴里失/锭

译文页396第2段第6-7行“最初，巴勒契奇竟敢为其原值10—20第纳尔的织物索价3金巴里失(bālish)。”同页注5“关于巴利什的价值，诸说不一；参照拉施都丁，Quatremère刊本，页320；术兹贾尼书，Raverty译本，II，页1110，注(6)。据加特麦尔所引术外尼的记述，1巴力什在当时值75第纳尔。”又页702索引“bālish，бальш，巴利什（钱币名）”。

bālish在波斯语中意为“枕头”。“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衣服门”（本田实信编号第539词）有“بالش(bālish)，枕，把力石”；会同馆本《回回译语》“器用门”（本田实信编号第1336词）之“枕，巴力失”即此。因中国银锭形似枕头，故在蒙元时代又特指金、银锭。元代波斯文史料言及金银时，常以“把力石”为单位。一“把力石”银子，相当于汉文中一锭银子（50两）。

---

[1]《元史》卷123《阿剌瓦而思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026。

[2]中华书局，1980年，页13。

8.2.9 花剌子模母后

译文页386第2段第2–3行：花剌子模沙“伊勒–阿尔斯兰病卒后，幼子苏勒坦–沙赖其母图尔坎之助得登沙位……”。同页注(2)：“图尔坎(Turkān)一词，常见于突厥族女王的名字中，并非专有名词，意为‘女王、夫人’……”。

此字可音译为“帖里蹇”，辽皇后号。元太宗窝阔台乃蛮真皇后脱烈哥那(Töregene)应源于此。

8.2.10 丞相

译文页538第2段第3–4行：“钦桑太傅(显然是中国人)与不花–努沙系撒马儿罕与布哈拉的长官。”并见页716索引。

本段中钦桑太傅(Ching Sang Tai Fu)当为汉文头衔丞相大夫/丞相太傅。Jingsang/Chingsang/丞相的称号在蒙元时代传入西域，在13—14世纪的波斯文献中很常见。

8.2.11 《世界征服者传》、黑沙漠

页471注(4)“依照Ta'rīkh-i Jahān-gushāy校订者的意见，正确的读音为Qarāqūm(哈剌库木)”。注中所提到的Ta'rīkh-i Jahān-gushāy即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传》的波斯文书名标题。Qarāqūm突厥语Qara qum，意为“黑沙漠”，即今土库曼斯坦之卡拉库姆沙漠。Qara，突厥语译言黑色；qum，突厥语意为沙漠。此字元代译音不定，如元定宗贵由死于“忽木升吉儿”，《元史》作“横相乙儿”，[1]《辍耕录》卷1《列圣授受正统》写为“胡眉斜杨吉儿”；[2]皆为突厥语Qum sängir“沙岬”的音译；而元世祖中统年耶律希亮避兵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浑八升”，则为突厥语Qum bashi“沙漠头”的音译。上述诸地名中的“忽木”“横”“胡眉”和“浑”均为突厥语qum“浑”的音译字。

8.2.12 阿难达与东干人

页492：巴托尔德引志费尼的记载说，蒙古军攻下花剌子模都城后，

[1]《元史》卷2《定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9。

[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页9。

俘工匠达10万余名,“这些人被迁往‘东方’,在那里结成数目甚多的居民点”。此页注(3)曰:“这些迁往‘东方’的花剌子模人有可能是东干人的祖先,也许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东干人信仰了伊斯兰教……此处征了拉施都丁关于王子阿楠达与其军队……”。这里提到的“东干人”指中亚操突厥语民族对我国回族/回回人的称谓。但当代“东干”在汉语中一般专指清同治年“回乱”中被清军击败后逃入俄境在那里定居下来的回族起义军后裔,故以译为“回回”或“回族”为宜。

另外这一段文字中的“王子阿楠达”应为安西王忙哥剌之子阿难达,至元十七年(1280)袭封。大德十一年元成宗去世后在参与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败被诛。[1]

8.2.13 关于勘同与译音用字问题

《突厥斯坦》翻译的难度之一是专有名词的译音问题。其难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寻找同时代汉文文献中提及者,即所谓“勘同”;其二是同时代汉文史料中未出现者如何译。两位译者在序言中提及:“我们深知译本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错误。最显著的是有些人名、地名和若干类似术语的名词,我们翻译得不够恰当,会让读者感觉欠缺。”“地名的翻译同样是困难重重。”“人名、地名以外,还有些类似术语的专门性名词译起来也很困难。”“有些旧译名久已无人理睬,势将永远作废,如阿剌必已被阿拉伯代替,剌合蛮已被拉合曼代替,可以肯定其决不会东山再起。……”[2]

译者之一张广达教授译者在序言之首便谈及译音之难:“翻译此书,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处理译名。自从冯承钧先生(1887—1946)在《多桑蒙古史》的译序中提出‘名从主人’的原则以来,学界翕然相从,没有异议。韩儒林先生(1903—1983)有关蒙元和西北史地的论著严格讲求审音和勘同;翁师独健(1906—1986)撰《斡脱考》、邵师循正(1909—1973)译释剌失德丁《集史》蒙元诸汗纪,无一处不精心考究时代的读音与用字。以上各位先生在知道家父从事本书的翻译工作时,均直接间

〔1〕《元史》卷108《诸王表》,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735。

〔2〕见页14-17。

接嘱咐在译名上多下功夫。邵师和冯家升先生(1904—1970)进而叮嘱注意唐代译例与蒙元时代译例的差异。邵师甚至提示,穆斯林作家的名字也最好依其原籍而区别阿拉伯语、波斯语和阿尔泰语系的不同读法。"

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感到,《突厥斯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术语,远远超出了唐—元时期文献所提供的译例和用字范围。而"《元史》和元人文集之外,其他诸如《元朝[蒙古秘史]》《华夷译语》所提供的译例和用字在翻译穆斯林名词时也有很大局限。"同时译者认为"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似乎不宜模仿当时,再把'哈桑'一律译做'阿三'"。为此,他们又征求了马坚与纳忠两教授的意见。马坚教授的意见是"在经过比定确为一人的情况下,采用蒙元时期的译法当然可以,否则难免制造假古董和张冠李戴之嫌"。译者因此陷于两难境地。[1]

内陆亚洲研究专有名词的译音用字,是困扰学术界的老问题。上述两位译者所提及的韩儒林师、邵循正教授、翁独健师与冯家升先生,均为我国现代内陆亚洲研究的先驱。而冯承钧先生则是当时向我国学术界介绍法国亚洲学研究的主要人物。他们所代表的主要是专业研究者的意见,即认为《突厥斯坦》的读者多数是学术界同仁。马坚先生的意见所代表的是多数国内外国文学翻译者的意见,其翻译作品的读者群为普通大众。

作为专业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不同文字史料之间所记史实异同的比较问题,非常需要确定汉文史料与非汉文史料中相关专业名词的对应关系。因此不同时代汉字音写非汉族语汇的规律与译例,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代与元代的外来名词译音,对于解决尚未确定的不同文字史料之间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而决非刻意制造假古董。这就是为什么从冯承钧、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与冯家升先生不约而同地希望《突厥斯坦》的译文能够遵循传统译法。找到存在严格对应关系,甚至还应考虑突厥语与蒙古语元音和谐律在译名中的体现问题。

"审音与勘同"是当代内陆亚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清乾隆

[1]见页19-20。

年训诂学发展起来。训诂中有假借之说,即音近而互训。如《庄子·至乐》“俄而柳生其左肘”。这里“柳”即“瘤”。也就是说将汉字置于另一个同音字的语境之下来观察,寻求词义与读音之间的联系,进而求解古人文意。这种分析方法与理工科运用现代的分析手段观察材料很接近。那么现代学术界有没有类似的方法出现呢?笔者以为有,“审音与勘同”(phonetic re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non-mother tongue historical terms kept in different sources)为其中之一。所谓“审音勘同”就是将文献中的音译外来词,按它所使用的时代的语音复原,继而与它所源出的语言原词比较。

可见,使用“审音勘同”方法来研究古籍中有关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的记载,如同将这些文献比作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物质材料,将这些材料置于科学仪器之下观察,所看到的当然比肉眼要多,要深刻。“审音勘同”的要旨就是,透过记载音译外来词或术语的汉字,探求其所内含的过去时代的信息。此研究文法19世纪末首创于法国汉学界,20世纪30年代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从此原则出发,似乎还应考虑《突厥斯坦》的译文中的专有名词与流传较广的已译作品的协调,以免初学者产生误解与混乱。如本译文中的“赤因帖木儿”[1]在《多桑蒙古史》《世界征服者传》中均译为“真帖木儿”。如不加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可能不知道“赤因帖木儿”与“真帖木儿”是同一人。

而马坚教授的意见主要代表了外国文学翻译界的意见,因其译作的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这两种意见本无正误之分。学术翻译虽然包含研究原作学术思想的成分,其主要目的是介绍异族学者的成果,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毕竟不同,故而笔者虽然提及对某些译名的处理意见,其目的只是出于商榷,并不能以此来苛求译者。

由于教育体制的限制,我国研究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的学者多未接受过穆斯林语言文字与突厥语言学的训练;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与突厥语学界的同仁则史学素养稍缺。因此我国中古时代内陆亚洲研究者

---

〔1〕索引中指出:此名见于原文页415、457、465、475。

对与汉文史料几乎同样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多数依赖翻译了解：或通过英译，或通过汉译。而迄今译为汉文的穆斯林史地著述不过数种，如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忽尔达兹贝的《道里与诸国志》、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的《史集》和华涛教授翻译的《苏拉赫字典补篇》等。因此巴托尔德的《突厥斯坦》所提供的穆斯林史学的知识对提高我国学界的水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突厥斯坦》译文严谨，反映了译者认真的学风与批判的思维，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巴托尔德原作，也包括译者多年积累的学识。这表明专家翻译的作品与一般译者的译作之间有根本的不同。阅读它是享受，也是学习。

（原刊于《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页102-109。）

9 哈沙尼和他的《完者都史》

波斯史籍对于研究元史和早期蒙古史的重要意义是学者们所熟知的。然而近三十余年来,由于条件的限制,我国蒙古史学界对国外收集整理有关蒙古史的波斯史籍的情况不很了解,以致长期以来只限于利用已译为英文、俄文的《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这两部波斯史料,从利用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应该说是有缺憾的。近年来国外学者很重视从上述两部史籍以外的波斯史籍中去挖掘新史料,以与汉文记载对照研究。哈沙尼的《完者都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完者都史》的全名为《世界及宗教之拯救者、赛夷、国王、谟罕默德、塔牙卜剌麻儿合歹完者都算端史》,较常见的刊行本是伊朗学者马辛·罕伯利女士(Mahin Hambli)1969年出版于德黑兰的校刊本。校刊者罕伯利是伊朗著名学者,曾求学于欧美,专攻中亚史。

《完者都史》的作者是哈沙尼(全名为不哈思木·乌巴都剌·本阿里·谟罕默德·哈沙尼),其生平经历目前尚不清楚,只知逝死于回历738年(1337—1338),据书中可以推测他是伊利汗不赛因(Abū Sa'īd)算端宫廷中的必阇赤,曾在伊利汗朝著名史家拉施都丁的组织下从事过史料的搜集、准备工作,并可能参加了《史集》中某些章节的撰写。除了《完者都史》之外,学者们考定,还有两部书出自哈沙尼手笔。其中之一是《历史精华》,原抄本藏于柏林图书馆,另一本是《宝石新娘》,伊朗前几年出版了此书。

拉施都丁的《史集》记事止于合赞(Qazan)汗,相当于元成宗初年,而哈沙尼的《完者都史》则记载了合赞汗至不赛因汗之间的历史(回历703—716年,相当于1304—1316)。在伊利汗朝历史上,它确实是《史集》的续篇。所以已故奥地利蒙古史学者卡尔·扬(Karl Jahn)曾说,在

迄今尚未出版的有关蒙古史的波斯史籍中,《完者都史》是极为重要的一部。[1]此书目前世界上只发现了两个抄本。其一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亚索菲亚图书馆(MS3019,页135a–240b),抄写日期距书中记事时代相当近,末叶题署为回历752年(1351—1352),抄录者为阿合马·本·忽辛·本撒塔黑,字体细小而清晰,属于纳思塔里黑(Nastaliq)体,抄本没有任何说明。至于这个抄本是如何到伊斯坦布尔的,目前尚不清楚。学者们推测或许是在回历920年(1514)奥斯曼帝国算端塞里姆占领帖必力思城时,将它与其他档案文献一起掠至伊斯坦布尔的。另一个抄本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只是前一个抄本的誊抄本,抄写者为19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查理·谢菲尔(Charles Schefer),[2]其重要性远逊于前一抄本。

在文风上《完者都史》与其他波斯史书有显著的区别,它没有人们在《世界征服者史》和《瓦撒夫史》所习见的那种华丽的辞藻,行文质朴无华;也不像《史集》那样对人名、地名进行仔细推敲。《完者都史》像是一些未经修饰的原始文献或笔记的简单拼合,日期和人名、地名拼写讹误很多(当然有些错误或许应归咎于抄录者),写成以后很明显未经仔细修改。这一点从历史研究和文献校刊的角度来看,为学者们提供了很难得的素材。

《完者都史》中的许多记载,对于研究元代中期西北地区的历史是极为宝贵的。例如《月赤察儿勋德碑》和《元史·博尔忽传》曾记都哇向元成宗请和之事,但元廷与都哇之间如何达成协议,及元廷与西北诸王之间约和的协议的具体内容,均不清楚。而《完者都史》恰也记录了这一事件。该书中说:都哇向忽必烈合罕之子忙哥剌之子诸王阿难答致信,通过他向元成宗铁穆耳表示臣服之意,并言明海都死后,他已无意继续与朝廷对抗。阿难答时卓帐于哈剌和林一带,接信后立即向成宗奏报。朝廷闻讯,对都哇大加赞赏,成宗降旨,许都哇以海都所占据的

[1]卡尔·扬(Karl Jahn):《伊朗的蒙古人史研究的补充史材》,载于《阿尔泰文明综览》,1963年。

[2]布洛谢(E.Blochet):《拉施都丁蒙古人史引言》,1910年,页113。

突厥斯坦诸地。[1]

对照汉、波斯文史籍的记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元廷利用海都死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间的实力对比的变化,及它们之间产生的裂痕,抓住时机,拉拢都哇,目的是借都哇之力来达到削弱乃至消灭窝阔台汗国的目的。这一点后来果然实现了。

又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元仁宗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发生了一次战争。有关这次战争的汉文记载集中在《句容郡王世绩碑》《元史·土土哈传》以及袁桷的《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但汉文史料对战争的起因和具体经过却语焉不详。《完者都史》的记载正好弥补了这一点,特别是书中提到了一位元廷的驻边大将 Tūghajī Jinksank,在这次战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上述汉文史书中却偏偏未提及此人。对照其他汉文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这位 Tūghajī Jinksank 就是脱火赤承相。据《完者都史》记载,他是拥兵12万的重臣,其父名曰不花(Boqa)元帅。此外,此书还提到钦察人土土哈之子床兀儿和其他一些延祐年间驻边大将的名字,及其驻地及驻军人数。[2]

值得注意的是,《史集》的前半部分因与《元史·太祖本纪》和《圣武亲征录》同源,利用这3种史料参照其他书籍的记载互校,是20世纪末以来发展起来的蒙古国早期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完者都史》与同时代的汉文史籍则是分别独立写成的,其资料各有出处。这既为比较研究工作增加了困难,同时也为我们提示了一个新的领域。

近二十年来,国外整理出版的有关蒙古史的波斯史籍为数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言及。我国蒙古史学界应对这些史书的收集工作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动向,给予足够重视,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迎头赶上去。

(原刊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3、4期,页103-104,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完者都史》,1969年德黑兰刊本,页33。

[2]《完者都史》,页202-203。

10 评罕伯莉校勘本《完者都史》

20世纪以来，欧洲蒙元史学界对波斯史籍中蒙古历史的史料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志费尼书和拉施都丁书上。上述两部波斯古籍对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可惜其编写年代都在十四世纪初叶以前。各国蒙古史学者们一直期待着更多有关蒙元史的波斯古籍整理问世。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王家书籍出版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for Book Publication）所实施的"波斯文献丛书"（Majmū'-i mutūn-i fārsī）出版规划，使这一愿望逐渐变为现实。该系列出版第40号是1969年问世的由伊朗学者玛辛·罕伯莉（Mahīn-i Hamblī）女士校勘的波斯史家哈沙尼的著作《完者都史》（Qāšānī, Tārīkh-i Ūljāītū），[1]该书目前尚无任何欧洲文字和日文译本。哈沙尼仕于伊利汗合儿班答（完者都）宫廷，死于伊斯兰太阴历738年。校勘者玛辛·罕伯莉女士，根据书中夹页所附传略介绍，于1955年毕业于伊朗德黑兰大学，曾就读于伦敦大学恒宁教授门下，又曾求学于英国剑桥、土耳其安卡拉和印度德里等地[2]。是伊朗当代知名学者，目前在美国。

在可用来与汉文史籍进行对比研究的有关元中朝历史的波斯文献中，《完者都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把它看作《史集》的续篇。多桑、巴托尔德等人在其研究中都使用过它。据本书前言介绍，这部文献当今只有两个抄本，其一是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亚索菲亚图书馆（Ayasofya kütüphanası）的编号为抄本3019（Ms.3019）的藏品，该文献页

[1] *The History of Uljaiu*, by Abu'l Qāsem Ibn 'Alī Ibn Mohammad al-Qāshānī, edited by Mahin Hambly, Tehran, 1969。

[2] 关于哈沙尼其人及玛辛·罕伯莉的进一步情况，参见拙文《哈沙尼和他的〈完者都史〉》，载于《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85年，第3、4合期。

135a-240b 标题为《宗教之拯救者完者都算端阿合马史》(*Tārīkh-i Ghiyāṣ al-Dīn-i Ūljāītū Ṣultān-i Ahmad*),抄录日期距书中记事时代相当近,末叶题署伊斯兰太阳历752年(1351—1352)。另一抄本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Bibliotéque Nationale),编号抄本波斯文增补1419(Ms. Suppl Persan 1419)。它是前一抄本的誊抄件,不能视为独立的抄本。所以说《完者都史》实际上只有孤本传世,这就大大增加了校勘工作的难度。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伊利汗朝是蒙古入侵波斯后建立的王朝,这一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当时特有的源于突厥语、蒙古语甚至汉语的词汇。由于波斯文使用阿拉伯文字母,音点极易讹误。音点一错便面目全非。因此校读这些文献对当代伊朗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罕伯莉校刊本《完者都史》的出版,使这一部有珍贵价值,因长期藏于书库而世人难以得见的史籍,变得易于为学者利用,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该书对中国蒙元史研究者最为有用的地方,在于它保存了许多有关元与西北诸王交往的史实。例如:都哇遣使至安西王阿难答处求罢兵约和,窝阔台、察台台两汗国在海都死后联盟的破裂和窝阔台汗国的灭亡,大德十年也儿的石河之战,明里帖木儿佐阿难答入朝争位以及元仁宗延祐年间元西北戍边军队与也先不花的战事等,都可与汉文记载一一对照。哈沙尼是一位认真的史臣,全书撰写体例有似于我国正史中的《本纪》部分,逐年逐月记载,时而追溯往事,条理清晰。《完者都史》写于与中国相距万里之外的波斯,其时元朝与伊利汗国已各自立国五六十年。令人吃惊的是,书中所记史事中,有许多竟能对应于当时汉籍所载,这反映有元一代中央政府与宗藩属土伊利汗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诚然哈沙尼亦有笔误,如校勘本页175,在前文已经提到元成宗铁穆耳去世以后,又说当朝皇帝是铁穆耳。不过这样的情况在书中只是个别的现象。

我们根据自己阅读所见,评价罕伯莉女士的校刊成果,主要是采用前辈学者校订蒙古时代波斯史籍和一般校勘蒙古史料的标准,并参照了这套《丛书》总编者提出的校勘要求。《完者都史》校勘本上所附"波斯

文献丛书”总编辑前言的最后所申明的要求是，丛书附有解释性的注释等部分，使读者易于理解，并且不必求助于其他史料就能直接利用这些文献。应该说校勘要求是十分具体而明确的。在阅读罕伯莉女士的校勘本时，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与前辈学者对波斯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相比较。当前使用的最广泛的蒙古时代波斯史籍的校勘文本是“吉布丛书”(E. F. W. Gibb Memorial Series)中可疾维尼(Qazwīnī)校订的《世界征服者史》和苏联学者阿里札德(A. A. Али-Заде)、维尔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вский)，彼谢列娃(Е. М. Пешерева)、斯米尔诺娃(О. И. Смирнова)和罗马斯凯维奇(А. А. Ромаскевич)等人校勘的《史集》。《史集》有许多抄本传世，苏联合校本的上述校勘者们花了很大的心血，逐字逐句地核对，但解释性的附注不多，可以说与罕伯莉的校勘工作基本上没有可比性。可疾维尼校勘《世界征服者史》时，使用了巴黎国民图书馆内收藏的7种抄本，除逐字逐句校读外，还常根据其他史籍的相应记载对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做出必要的诠释，说明自己在诸抄本的核对中决定取舍的理由。例如他在校读志费尼有关巴歹(Bādāī)和乞失里黑(Kišlik——按从汉译名称判断，该词应为刚性元音词，原名应为Qïšlïγ)从王罕处逃奔成吉思汗的记载时，根据《史集》的相应记载，怀疑志费尼所记乞失里黑的名字KLK应为ǨLK或KSLK。[1]又如在页69注(2)中，他写下决定取地名QRAQM拼法而舍弃QRAQRWM拼法的理由等等，这种例子很多。

当然罕伯莉的情况与可疾维尼有很大的区别。《完者都史》没有数种抄本可充校勘依据。在波斯文前言中，她坦率地说出自己工作的艰辛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受制于条件而产生的失误理应为人谅解。我们上面举出的可疾维尼校勘的两则例子，意在说明校读工作除了利用不同抄奉互相比勘之外，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罕伯莉女士的校勘成果，评论其得失，则不应视为对校勘者的苛求。

《完者都史》原件抄写极为草率，音点误置或漏置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有大量的现代伊朗人所不熟悉的古代中亚的地名和源于突厥

[1]E. F. W. Gibb Memorial Series, vol. xvi, *The Ta' rīkh-I-Jahān-Gushā*, p.27.

语、蒙古语的人名,校读困难。罕伯莉认为在只有一个抄本可循的情况下,校正这些名词的拼法,或从数种不同的拼法中决定取舍几乎不可能,只好采取原文照录,并在索引中分别登录的办法。

从历史文献校勘的角度看,利用不同刊本与抄本之间比对的确是其主要方法。但这并不说舍此之外别无他法。对于记录他族语言的术语,可利用语言学知识校订;对于人物、职官与年代等,可从史实考订的方法入手等。因此《完者都史》中的有些人名、地名并非无从校订。以地名为例,页203在列数延祐年间元朝西北戍军的将领及其驻地名称时提到:"在Tūbūṣ之地驻扎着忙古带(Mughūltāī)之子章台(Jāntāī)。"这里出现的Tūbūṣ这个地名中的ṣ显然是字母t音点误置所致。章台所驻兵之Tūbūṣ,应该是吐蕃,其正确拼法应为Tūbūt。连这样常见的普通地名都不附注释或校正,以明显错误的形式刊印出来,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再如,页202在述及元军边将脱火赤丞相时,称其冬营地和夏营地分别在Yīstūn Mūrān和Fūtāq;治蒙古史的学者一眼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名应是元代汉文史料上出现的野孙漠连和火孛(霍博)之地。这里长期是窝阔台家族的禹儿惕,当是在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并入元政府直辖地的,故而应分别订正为Yīsūn Mūrān(蒙古语,此言"九河")和Qūbāq。哈沙尼多次(页39、40、147和150等)提到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Qunās。这个地方志费尼也提到过,拼法与此同。但《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者波义耳(J. A. Boyle)根据可失哈里《突厥语大辞典》所给出的Quyās一词的原意"城镇"以及对巴尔思罕(Barskhan以东,亦列河(今伊犁河)上源一带的一个名为Quyās的地方的描述,认为Qunās中的-n-乃字母-y-音点误置所致,并把它校正为Quyās。[1]波义耳的著作出版于1958年,按理说,罕伯莉在校订哈沙尼书时,即使照录Qunās一类的地名,也应该给出几句说明,这样才符合这套"波斯文献丛书"总编辑在前言中提出的使读者不必求助于其他史料,而能直接利用这些文献的要求。

《完者都史》有许多人名、地名以不同的拼法前后重出。其中有些

〔1〕John Andrew,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p.29,注释。

拼法虽异，但读音大致相同，有似于我国史籍中音译他族词汇时，因择字不一致而产生的同名异译现象。罕伯莉虽然在序言中说明，她采取照录各种异写，并分别收录在索引中的作法，但实际上她也采取了补救措施，在索引中注出了一些人名，地名的不同拼写形式。不过总的看来，她这一项工作还差得很远，许多一望而知的同名异写都未做任何交代。例如书中都哇之子怯别的两种不同拼法 Kibik 和 Kūbik，海都之子斡鲁思的两种拼法 Ūrus 和 Urus 等不一而足。尤其是页 147 叙述不里之子月鲁反对塔里忽排斥都哇诸子而被杀的一段中，校勘者对上下仅隔数行的月鲁的名字的两种拼法 Ūrūk 和 Ūruk，竟不对读者做任何说明。不熟悉元代西北地区历史的读者可能会误认为上述 Ūrūk 和 Uruk 是两个人。

波斯文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源于阿拉美字母（Aramaic Scripts），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字母的“底座”（英文称 base，即基本形状），数量有限，主要依靠在“底座”上或下增写数目不同的音点来形成不同的字母，且其书写法规定先写“底座”后加音点。而中古时代的中亚与西亚因无印刷术，文献的传承主要依靠手抄，这样音点误置、增置或漏置的现象很普遍。此外，大部分“底座”的笔画中，都包含“牙”（波斯人称为 dandān）的因素，而手抄过程中，增写或漏写“牙”的现象也较常见，使一个字母变为另一个字母，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波斯文献中除了上述所谓“同名异译”现象以外，因音点误置、增置或漏性，同一名词的读音有可能迥异。罕伯莉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辨析工作。例如页 164 中提到的也先不花之子 Īrkū，在页 208 中却拼作 Trkū。罕伯莉在页 251 注(188)中，专门就此做了说明，并拟测这个名字的正确拼法可能为 Brka 或 Brkū，但未提到前面出现的 Īrkū 这个人名。遗憾的是，书中多数因音点错误而异读的名词没有这种辨同说明。当然对不通突厥语或蒙古语的伊朗人来说，从讹误的他族人名、地名中求正确拼法确实很困难。但作为古籍校勘者，总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多下一些功夫，为读者免去不必要的麻烦。这类问题书中很多，几乎随处可见。如元朝驻边大将床兀儿的名字，在页 202 和页 207 中，都正确地拼作 Jūnqūr，而

在页206、页207中却成了Jūīqūr。后者词中的字母-ī-显系字母-n-音点误置而成。床兀儿的父亲元朝大将土土哈的名字，在页202中正确地拼作Tūtghāq，但在页206中，却变成了Tūnqāq。尤其是上述两处都提到床兀儿是土土哈的儿子，仅据这一点，即使不识汉文，也可以确定Tūtghāq与Tūnqāq是同一个人。解决这个名字的两种不同拼法的两个关键波斯文字母t和n之间在词中位置的区别，恰恰只在于音点的数量和位置的不同上。撇开汉籍不说，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的名字，除《完者都史》以外，也见于拉施都丁的《史集》。前面已经提到，学者们常把《完者都史》称为《史集》的续篇，校订《完者都史》时参照《史集》，应该说是起码的要求。但罕伯莉的校勘本中却基本上反映不出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完者都史》提到了一位重要的窝阔台系宗王，他在都哇废察八儿之后得立为窝阔台兀鲁思之汗，后来又同察八儿一起投奔元朝，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汉籍记载此事。这位宗王的名字，以三种不同拼法在书中一再出现；Abkjār，Yābkār和Bābkjār。对于如此重要的歧异，罕伯莉竟未置一词。她还专门在页149给Bābkjār的名字加上了“《 》”符号，使读者莫名其妙。对照《史集》，可知这位宗王就是海都之子仰吉察儿（Yangichar），其拼法并非不能校订。

罕伯莉的校勘本中除了令人头痛的人名、地名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明显地暴露了校勘者的蒙古史学术修养的不足。如页147在叙述都哇死去，旁系宗王塔里忽（校勘本作Nālīqū，应为Tūlīqī）夺得察合台汗国王位后，有以下3段文字：Urūgh-i duwā ba makān-i ū mankūb wa makhzūl wa sar-i kūfta šudand，意为“都哇氏族因他（按，指塔里忽）的即位而遭受不幸和屈辱”；数行之后复有：az urūgh-i duwā andīšamand šud，“他打都哇氏族的主意”和“urūqh-i duwā rā bikulī bar andāzīm，“我们铲除都哇氏族”。这3句话中都有urūgh-i duwū这个词组。urūgh是源于突厥语的蒙古语词汇，译言种子、子孙，在《元朝秘史》中作“兀鲁黑”。在罕伯莉书后所附《突厥语、蒙古语词汇表》中，可以找到它，其释义为“家族，家庭”（khāniwāda），[1]但在上述3个句子中，罕伯莉却令人

〔1〕《完者都史》校勘本，页253。

不解地把 urūgh-i duwā即“都哇家族”理解为一个人的名字，并把它作为人名在人名、地名索引中列出来，完全错了。

校勘者不熟悉蒙古历史，影响她正确地理解哈沙尼原意的现象也时有出现。页 39 中的一句话 čūn ṭughājī wa lamghūlī ka ibn-i ‘amm-i duwā bud[and] ba duwā paiwast[and]，“当脱火赤和都哇叔伯之子喃木忽里向都哇前进时”。方括号内的-and 为波斯语动词第三人称复数词尾，是罕伯莉为了理顺句子语法而加上的，原句两个动词都是第三人称单数过去时。按，脱火赤并非宗王，喃木忽里(Lamghūlī)是都哇的堂兄弟。ka ibn-i ‘amm-i duwā bud(他是都哇叔伯之子)是一个定语从句，只修饰 Lamghūlī“喃木忽里”一个人，原作者哈沙尼用 bud(第三人称单数过去时)是完全正确的。校勘者不了解蒙古宗王之间的血缘关系谱，结果改对为错。但第二个动 paiwast(前进)改为第三人称复数过去时，看来有一定道理。上述短句并不能说就此已经理顺。Lamghūlī“喃木忽里”在本书页 203 中称之为Čūpān之子，驻于哈迷里；在页 38 中则称之为 Jūbāī之子。Lamghūlī“喃木忽里”之词首辅音 L-显然是字母 N 的讹误。Čūpān 就是 Jūbāī，即阿鲁忽之子术伯，两种拼法之间的歧异也是音点变化所致。在《贵显世系》(Mu‘azzaz al-Ansāb)等波斯史籍中，有术伯家族出自察台台的世传。[1]研究过帖木儿帝国史的罕伯莉，如了解其内容，就不致把动词人称形式改错。

《完者都史》如同其他波斯古籍一样，原手稿并无标点，罕伯莉女士校勘时断句并作标点，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可惜因不熟悉元代中亚历史，导致了一些不应有的标点错误。例如页 147，在述察台台之子合答海(Qadāqay)之子塔里忽，及其母起儿漫鲁克纳丁算端之女帖里蹇(Tirkān)之后，接下述阿里·斡兀立(‘Alī Ughlī)之前，应置句号，逗号误。页 150 述怯别因功受封阿母河以北之地后，接下述伊利汗完者都遣使罗马，两者之间应置句号，逗号误。

〔1〕参见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イとその系谱——元明史料と“ムイッズ— アンセブ”の比较通じて》(杉山正明:《豳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与〈贵显〉世系之比较》)，载《史林》，1982年，卷 65，第 1 号。特克希汉文节译，载《资料与情报》，1982 年，第 3 期。

校刊本页253-255是一个简短的源于突厥语或蒙古语的词汇附表,确实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但其中也收录了一些并非源于突厥语或蒙古语的词汇。例如页254表中的ṭāīšī(在页203正文中又作tāīšī),应为汉语"太师"的音译。页255表中Linkjī应为汉文"令旨"的音译。哈沙尼的原话为:Yarlīgh az ān qāān bāšad wa farmān-i pisarān rā linkjī gūyand, ya'nī farmān-i pisarān,"札里黑(按,即圣旨)应出自合罕,而人们应称诸子的命令为linkji,意为诸子的命令"。在元代,蒙古皇帝的命令称为札里黑即圣旨,后妃的命令称为懿旨,而诸王的命令则称为令旨,正与哈沙尼的话对应。[1]

哈沙尼叙事时,习惯先述伊斯兰太阴历年月,再补充以相应的十二生肖纪年(即所谓突厥蒙古纪年),上述附表中罗列了一些突厥语、蒙古语的生肖名称,奇怪的是并未将十二生肖列全。页174中记事系年为伊斯兰太阳历715年6月,并称相当于蒙古人纪年之lūīyil,即龙年。这个源于汉语的突厥、蒙古词lūī或许是罕伯莉不识的缘故,未列入表中。

罕伯莉校勘本中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错误,如果出版者细心核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页33"在Sābīa峡谷和哈剌和林之边拥有禹儿惕的诸王阿难答"一句中的Sābīa这个地名在页35中却排作Sūība。查索引中并无Sūība,而在Sūība条中说它见于页33,35两页,足见原稿中这个词在上述两处都写作Sūība。再则,哈沙尼在页53中说都哇死于伊斯兰太阴历760年,相当于qūs yil saksīnīnj āi。qūs,阿拉伯黄道十二官之九,指人马座,在历法中指九月。Yil,突厥语,译言"年"。saksīnīnj,突厥语säkizinč,译言"第八"。āi,突厥语,译言"月亮""月份"。由此观之,列为阿拉伯的黄道十二官之九的qūs这个词在这里很不协调。再按哈沙尼叙事顺序,接在伊斯兰太阴历之后的,应是突厥蒙古历,qūs应为某一生肖的名称的讹误。查与此年相应的是羊年,而波斯文中突厥/蒙古

〔1〕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chen*, Band IV, Wiesbaden, 1975(〔德〕格尔哈尔德·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卷4,威斯巴登,1975年),页306引述Berger女士的博士论文,认为linggī可能是I.M. Očanin的《汉俄词典》(Kitajcko-russkij clovar, Mockva, 1955, 2 Bde)页2095之"令敕",误。

历之羊年写作qūī yil。上文的qūs显然是qūī之误。像这样因字形相近而讹的现象也见于页207。其中第12行之Ištighāl应为Istighāl"点燃"之误,经校正后与紧接于其后的Iltihāb"燃烧"恰好构成排比,否则说不通。

19世纪末叶以来的90余年中,我国元史学者的最明显的进步之一,就是所使用的资料从过去数百年中仅限于汉文史籍,发展到利用汉籍以外的蒙、藏、阿拉伯、波斯文和拉丁文史料,借以与汉文记载相对照。在为数众多的非汉文史料中,目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的,是波斯文史籍。由于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只限于利用已被译成俄文和英文的《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正因为如此,了解国外收集整理有关蒙古史的波斯史籍的进展情况,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此外,评论罕伯莉女士校勘《完者都史》的得失,又启示了我们:语言知识对蒙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未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减退。尤其在校订某些波斯古籍时,对汉文史料的熟悉程度,几乎可以决定校勘的水平。

应当指出的是,《完者都史》的校勘虽然存在上述缺陷,仍不失为一项重要学术价值的工作。就目前而言,对多数从事利用波斯史籍与他种文字史籍进行对比研究的学者来说,这几乎是无可替代的本子。就是在将来,在《完者都史》的原抄件影印出版,或被译成他种文字流传开来的时候,玛辛·罕伯莉为校勘这部史书曾经付出的辛劳,也将受到学者们的尊重。

后记:笔者1987年7月至1988年6月应邀在当时西德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文化研究所(Seminar fü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做研究时,在图书馆中寻得伊朗德黑兰人Maryam Parvisi-Berge女士于1968年提交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打印稿《哈沙尼有关伊利汗完者都的编年史(1304—1316),原文及评注翻译》(*Die Chronik des Qāšānī über den Ilchan Ölğāitü*〔1304—1316〕, *Edition und Kommentierte Übersetzung*)。Maryam女士几乎与罕伯莉女士同时开始了对《完者都史》的研究工作,并先于罕伯莉一年完成。到目前为止,《完者都史》只有这两个校正本,而Maryam女士的德文译本则是海内唯一的欧洲文字译本。Maryam受过良好的东方学研究训练,她

的校勘比罕伯莉好得多。尽管她的德文翻译离蒙古史学者通常所期望的逐字逐句，忠实于原文的要求尚有距离，但她毕竟解读了许多如本文所提到的令人头痛的因音点误置、漏置和同名异写而造成的难以认读的专门名词。应该说，当今研究14世纪初叶中国史、伊朗史的学者，不可不读此书。惜其著作未能正式出版，所以其工作即使在欧、美、日本的蒙古、中亚史学界也罕为人知。笔者已将此打印稿复制携回，以待将来做进一步研究。

（原刊于《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11月〔笔名“皮路斯”〕，页284-290。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专题研究编

11 辽与漠北诸部
——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10世纪初契丹人崛起于北方。在南下压迫唐亡后立国于华北的"五代"小朝廷的同时,辽人的势力迅速向西域发展。天赞三年(924)九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兵西征,兵至斡儿寒河(今鄂尔浑河)中游的古回鹘城,征服的诸部中有"胡母思山蕃"〔1〕一种。

13世纪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其著作《史集》中提到了札剌亦儿人自古居于和林川,曾为回鹘牧驼。在他列举札剌亦儿的十个部落中,第四个在苏联1965年波斯文合校本中写为 كومساوت (Kūmsāūt)。〔2〕此名语尾之 وت (-ūt)显系蒙古语复数,其原名似可拟构为Qumusun/Qumus。此部很可能就是上述居于古回鹘城附近,曾为辽所征服的"胡母思山诸蕃部"。胡母思很可能是Qumus的音译。

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大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3〕这里的"忽母思",当为"胡母思"的异译。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钦察大将床兀儿在漠北与叛王作战时,曾至"和林兀卑思之山"。〔4〕周良霄先生已经指出,上述辽代之可敦城附近之"忽母思""胡母思"与元代和林附近的"兀卑思"应为同一名称的异译。〔5〕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

---

〔1〕《辽史》卷2《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版本信息略),页20。

〔2〕在P本与H本中此部写法有不同。参见拙文:《(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载于《蒙古史研究》,第4辑,页5;此文已收入本书。《史集》汉译本将此部音译为"弘合撒兀惕",见《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149。

〔3〕《辽史》卷30《天祚皇帝四》,页255。

〔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4,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391。

〔5〕关于"胡母思""忽母思"与"兀卑思"的勘同,参见周良霄:《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页246。

想，这里所提到的“兀卑思”，应即上述波斯史料所记之كومساوت (Kūmsāūt)。此部之名应得之于和林附近的胡母思山。كومساوت (Kūmsāūt)的拼法和“胡母思”和“忽母思”的音译，显示其当时读法近于《元朝秘史》所反映的蒙古语语音，即词首元音出现摩擦音H-。而“兀卑思”的译法，则反映这一名称词首摩擦音H-的脱落。

我国蒙古学界通常认为，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之前，漠北高原为以突厥、回鹘与辖戛思等操突厥语民族占据。而在回鹘西迁以后，操蒙古语诸部才从大兴安岭地区西迁蒙古高原。而如果我们前面有关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与拉施都丁《部族志》中所记札亦儿人的分部之一 كومساوت (Kūmsāūt)能够成立的话，则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是早期札剌亦儿人的一支。而他们臣服回鹘汗国的传说证明，早在公回鹘汗国灭亡之前，就已经有操蒙古语的游牧民散居于漠北高原的中部。因此，840年以后迁出大兴安岭的历史，并非属于全体蒙古人，而应当是以蒙兀室韦为代表的一批操蒙古语部落，而札剌亦儿人，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则不属于此列。10世纪王延德出使高昌时，途经漠北合罗川(哈剌和林平原)唐回鹘公主旧居时，曾普听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这些为回纥牧牛的达靼人，如果指的就是后来的塔塔儿部的话，它们也不属于840年以后迁出大兴安岭者。

耶律阿保机所率之契丹军从古回鹘城一路西进，越金山而南，大约至今新疆阿勒泰市境。之后，“逾流沙”，即今阿勒泰与阜康市之间的准噶尔沙漠东境，于同年攻取北庭附近的“可汗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1]此次西征使西迁后的高昌回鹘成为辽的属部。

阻卜为辽代活跃于漠北的重要游牧部落之一。开泰元年(1012)辽将耶律化哥受命西征阻卜，取得胜利。耶律化哥还师后，阻卜复叛，留守漠北西境的辽军败绩。辽廷再命耶律化哥西征。耶律化哥率领的辽军一直推进到“翼只水”，在道经“白拔烈城”的途中与“阿萨兰回鹘”相遇，复败之。事后发现，“阿萨兰回鹘”为辽之属部。耶律化哥因此获

〔1〕《辽史》卷1《太祖纪》，页19–21。

罪。[1]开泰元年，辽太师阿底里在漠北抚治失政，当地阻卜部落叛变，将辽军围于鄂尔浑河流的镇州、斡鲁朵城等几座孤城中。耶律化哥受命援救，击败阻卜。[2]平乱之后，耶律化哥回师，但次年(1013)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不久辽廷命化哥再次出兵，"至安真河，大破而还"。[3]此次击破的是阻卜酋长"乌狼"的部众。[4]

最早注意阻卜问题的学者是高宝铨，他在《元秘史李注补正》中在注塔塔儿部史事时，猜测辽《金史》中的阻卜可能是鞑靼的异称。他的假设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重视。[5]继而王国维就此做出了重要研究。12—13世纪称雄于漠北的蒙古—达旦在宋、辽、金文献中并不常见，这与它们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他根据三点证据，推测辽金时代之阻卜即达旦。

其一为《辽史》中有关开泰元年(1012)事件的两则记载的差别，即《耶律世良传》称兵围镇州城的是达旦，而《萧图玉传》则称围城系阻卜所为，可见阻卜即达旦。

其二，《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6)契丹降官报告，辽齐王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使西捍塔靼，与《辽史·圣宗纪》提到的统和十二年至十五年(994—997)辽兵西征阻卜，为同一事。由此推断达旦即阻卜。

其三，《元朝秘史》所记之金承安元年(1196)著名的斡里札河之战，金丞相完颜襄征讨塔塔儿，克烈部王罕与蒙古部铁木真出兵助战获大胜。而《金史·夹谷清臣传》在记述此事时，将塔塔儿部称为北阻卜。[6]尽管有一些学者反对王国维的考订，[7]但多数学者接受了他蒙古—达

[1]《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页1381-1382；并见同书卷15《圣宗纪》，页174。

[2]《辽史》卷93《萧图玉传》，页1378。

[3]《辽史》卷94《耶律世良传》，页1385-1386。

[4]《辽史》卷15《圣宗纪》，页172-174。

[5]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载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52年，页377-387。

[6]王国维：《鞑靼考》，载于《观堂集林》卷14，中华书局影印本，1999年，页635-638。

[7]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辨》，载于《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期，1931年，页1-10；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载于《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年，页296-301。

旦部落在辽金时代称为阻卜的结论。

王国维并不满足于将阻卜考定为达旦的结论,他感到阻卜之名的来源难寻,故提出假说,即阻卜为达旦之倒误。[1]其实王国维并非第一位寻找"阻卜"名称语源的人。

乾隆四十六年(1781)敕撰的《辽史语解》卷3第3叶把"阻卜"改为"准布",认为即满语djombu,释为"提醒"。而同年奉敕撰修的《金史语解》卷2第5叶有关阻卜的解释同此。《辽史语解》还把阻卜的异译"术不姑"改为"珠巴克"(djubag),释为"流水窟"。

沈曾植在《元朝秘史补注》卷3第3叶《秘史》104节"豁儿豁纳主不儿"句下注曰:札布葛,译言流沙,简言阻卜。民国年初,屠寄之《蒙兀儿史记》卷20《王军传》将阻卜比定为蒙古语"哲别",意为箭。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阻卜的语源是chubu,意为"流动"。

王国维之前有关阻卜语源的各种假说尚未引起世人注意,而王国维的假说一出,许多涉及此领域的学者纷纷举出证据据理反对。三十年代方壮猷提出,阻卜当为托拔苗裔,此名源于满语cab或cob,意为"高峰突出"。王静如认为阻卜为藏语Sog-po之转写。五十年代岑仲勉提出阻卜系《史集》"部族志"所述札剌亦儿十部中之Jate与Buri两部的合称。上述各种勘同均较牵强。[2]

余大均对阻卜问题做了专门研究。他先据中古汉语读音及元音和谐律,将阻卜的音值拟为djübü,djübügü,djibügü,chübü,shübügü等,但在突厥、满、蒙语中并未发现读音相符及语义结合史实可获合理解释的词语。他继而认为唐、宋、元、明时代,以汉字转译西北民族词语时,尾辅音-g,-k,-gh,-kh,-h,-z,-d,-t等常略而不译,他举出的诸例中有葛逻禄,他认为此名在音译中省略了原字kharlukh的尾音-kh;回纥、回鹘在

[1]上引王国维:《鞑靼考》,载于《观堂集林》,见页642。

[2]上述诸说详见余大均:《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页27-36。国内有关阻卜和达旦问题的重要研究,多已收入徐屏与贾敬颜先生所编之《辽金时代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84年,可备查。

原字Uighur的音译中省略了语尾-r。[1]故他在自己拟构的音值之后，试加-g,-z,-t等尾辅音，添加之后，但在突厥、满、蒙语中仍未发现读音相符及语义结合史实可获合理解释的词语。他又在上述自己拟构的音值之后，试加-r尾辅音，发现《元朝秘史》和《史集》中有“主不儿”(Jubur)意为川、原野，草原。他结合12—13世纪的蒙古人分为草原与森林两大类的事实，认为“主不儿”即阻卜，指蒙古游牧民。[2]

在反驳王国维关于“阻卜”源于“鞑靼”两字倒误的过程中，多数学者已经证明，阻卜是当时实际被使用的名称，“阻卜”又有“术不姑”“直不姑”“直不古”“术保”等异译。而余大钧假说的根本弱点是，他不能找出一些部落被泛指为“主不儿”，也不能举出哪怕是一个部落名叫“主不儿”。

穆斯林史料中提到了一个部落名Yabaqu。在《突厥语大辞典》中，Yabaqu这个部落被提到了数次。作者在述及关于突厥人的分类时写道：“我(按，指作者可失哈里)勾勒出东方世界他们每个部落的地理位置。他们将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被列举出来，包括异教徒和穆斯林，从最靠拂林(Rum)的开始列举。首先是佩奇内克(Bächänäk，按，即Bäčänäk)，然后是钦察(Qifchaq，按，即Qïfčaγ)，然后是乌古思(Oghuz)，然后是寄蔑(Yemek，按，指Kämäk)，然后是巴只吉惕(Bashghirt)，然后是拔悉密(Yasmil，按，即Bašmïl，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所有的起首辅音B-都写作Y-)，然后是(Qay，奚?)，然后是Yabaqu，然后是达旦(Tatar)，然后是辖戛斯(Qirqiz)，后者距秦(Sin，按，指中国)最近。”[3]在这里Yabaqu被置于Qay(奚?)与达旦之间。在另一处，当作者提及亦马儿

〔1〕此说不能成立，上述两词“葛逻禄”(Kharlukh，Qarluq)和“回纥”(回鹘，Uighur，Uygur)的音译中，其尾音-kh与-r并未省略。“葛逻禄”的“禄”字乃以-k收声的入声字。而“回纥”和“回鹘”的“纥”与“鹘”字，均为-t收声的入声字，在音译时以其尾音-t对应原名Uighur/Uygur的语尾-r。

〔2〕余大均：《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页27-36。

〔3〕《突厥语大辞典》(Diwan Lughat at-Turk)，英译本(Mahmud al-Kashgh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 & tr. by Robert Dankoff，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卷1，1982年，页82。

河(Yamar)[1]时说,它是"Yabaqu草原上的一条大河"。[2]亦马儿河为今鄂毕河上中游的古称。可见在哈剌汗朝时代Yabaqu草原这个名称指今东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阿勒泰边区。

可失哈里提到了Yabaqu部的一位首领名Budrach,说他在别乞赤—阿儿斯兰—的斤(Bäkäch Arslan Tegin)时代落入穆斯林手中。[3]作者在《突厥语大辞典》中曾数次提及哈剌汗朝与Yabaqu部的战斗。可失哈里在解说bökä(大龙)这个词时,举出了一个专有名词yetti bashligh yel bökä"一种七首之龙"。作者说,这个名词用于武士的名称,例如Yabaqu的首领称为Bökä Budrach。当哈齐—阿儿斯兰—的斤率四万穆斯林与他们遭遇时,在Bökä Budrach统帅下的异教徒达70万众。[4]大概此次与Yabaqu的胜利对哈剌汗朝非常重要,故而可失哈里还记录了一首与Yabaqu战斗的战歌,歌词中有誓取Bökä Budrach之血的唱词。作者还记录了一首在与Yabaqu部战斗时,诸部请求哈剌汗朝援助的歌谣,称其属部写下了效忠的盟约,决不反对国王,于是拔悉密部与处密部均出兵与他们一起作战,故而哈剌汗朝的可汗取得了胜利并俘获了对手。[5]足见在11世纪Yabaqu为漠北西部一个实力强大的部落。

可失哈里在论及游牧突厥诸部的语言时写道:"在游牧民中,有处密(Chömül)——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急促不清的语音,但他们也懂突厥语;Qay(奚?)、Yabaqu,达旦(Tatar)和拔悉密(Basmil)他们每一组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也很了解突厥语"。[6]可见Yabaqu不是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他又说Yabaqu与咽蔑(Yaghma,按即Yaɣma)、独西(Tuxsi,按即Tuxsï)、钦察(Qifchaq)、达旦(Tatar)、(Qay,奚?)、处密

[1]今鄂毕河上中游的称呼。参见笔者拙文《失必儿与亦必儿》,载于《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页62-74。

[2]《突厥语大辞典》,英译本,卷2,1982年,页161。

[3]《突厥语大辞典》,卷1,页340。

[4]《突厥语大辞典》,卷2,页268。

[5]《突厥语大辞典》,卷2,页330。

[6]《突厥语大辞典》,卷1,页344。

(Chömül)和乌古斯(Oghuz)诸部在发音时,都一致将阿拉伯语带点的ḍāl字母读作yā。[1]

除了可失哈里之外,还有一些穆斯林史料提及Yabaqu。例如成书于982年无名氏所著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在提及乌兹根(Uzgand)时,作者说有两条河流经其边境,其中一条称为Yabaqu。[2]葛尔迪齐还讲述了一则葛逻禄与Yabaqu的关系的传说,此传说中葛逻禄与Yabaqu均被视为人名。[3]

在上述穆斯林文献有关Yabaqu的记载中,以《突厥语大辞典》最有价值。其作者可失哈里的母语为东部突厥语。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破亡后,漠北沦入黠戛斯人的手中。黠戛斯人所操为北部突厥语,回鹘所操为东部突厥语。这两大突厥语有许多区别,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凡东部突厥语中词首为半元音y-的词,在北方突厥语的各种方言中,其起首的半元音y-或转变为浊辅音-j,或转变为浊辅音z-,或为ж-。黠戛斯人在漠北的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文化上却有重大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高原的语言面貌。在黠戛斯人的影响下,进入契丹-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按,东部突厥语读法)的起首半元音y-,均变为j-。或z-。故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中已经提出,Yabaqu即阻卜。[4]

具体而言,Yabaqu这个部名,在颚辅音较重的契丹人口中,[5]应发音为Jabaqu或Zabaqu,这应是“术不姑”“直不古”等译名的来历。而在蒙古人的各种方言中,词中的颚辅音-q-或-γ-均消失,颚辅音前后的元音相合成长元音,故读音应为Jaba'u,这应当是“阻卜”“术保”等诸种译音的来历。

从上引《突厥语大辞典》等穆斯林史料记载看,Yabaqu曾是一个实

〔1〕《突厥语大辞典》,卷1,页85。

〔2〕《世界境域志》英译本:Hudūd al-'Ālām, *The Region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982 A.D., tr. and exlanined by V. Minorsky, London, 1970, p.116。

〔3〕马尔丁奈兹:《葛尔迪齐书中有关突厥人的两章》,A.P.Martinez, *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卷2,1982, 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 pp.118-119。

〔4〕参见拙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37。

〔5〕试比较“粘八葛”与“乃蛮”。

力强大的部落。北亚草原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强大游牧部落兼并周边诸部，并使自己的名称变为所有属部的共名。例如：匈奴从虚连居提氏家族的名称，变成称雄大漠南北强大游牧帝国的名字；突厥从一个阿史那家族所出部落的专名，变成许多操突厥语民族的共名；鞑靼原为居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塔塔儿部的专门名称，后来变成11世纪以后许多草原部落的泛称；蒙古从成吉思汗所出部落的专名，变成大漠南北操同样语言诸部的共名等。Yabaqu变为漠北许多游牧部落的泛称，也应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辽金时代阻卜诸部曾在漠北广为分布。《辽史》引萧韩家奴奏言称“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1]耶律化哥第二次西征时，阻卜军队占据的“翼只水”，学者们多把它比为也儿的石河（Irdiš，今额尔齐斯河）。古代蒙古语中许多词借自突厥语。突厥语词中含有辅音-d-的，在蒙古语中往往变为-j-，如突厥语idi“主人”[2]在蒙古语中的相应词是ejen“额真”，译言“主人”。如是观之，“翼只水”应为操蒙古语的契丹人或阻卜人对也儿的石河的称呼。

耶律化哥在涉翼只水之后所途经之“白拔烈”即元代之“白八里”，其突厥语原名应为Ber-balïq。ber此言“一”，balïq意为“域”，所以在元代又意译为独山城。辽军在这里击败的“阿萨兰回鹘”中的“阿萨兰”即突厥语arslan“狮子”的音译。“狮子王”是高昌回鹘君主的传统称号。耶律化哥所败之“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从上述地名、部名可以看出耶律化哥西征时所行路线，基本上与一个世纪前辽太祖阿保机西征时相似，可见在耶律阿保机西征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漠北高原一直为契丹人所控制。

契丹人对漠北的控制虽然扩大了疆土，但也极大地消耗了辽朝的实力。辽初戍边士卒从富家中选征。辽制戍边须自备粮草。自辽本土至漠北中心距离遥远，需行数月。及戍兵至屯所，所携财粮已耗其半，

[1]《辽史》卷103《文学·萧韩家奴》，页1447。

[2]试比较金元时代畏兀儿君主的称号Idi-qut“幸福之主”中的idi-。

承运粮草的牛畜多有去无还。如无丁之家遇征，只能以加倍之值雇佣他人代戍。但常有代戍者在赴边途中逃亡。

《辽史》引述了萧韩家奴对辽廷耗费巨资经营漠北的做法有忧虑之辞。萧韩家奴认为，最重之役莫过于西戍。他认为在可敦城设守，虽然开境千里，但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渐殚。他提出国家"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胜言者"，认为漠北之地"得不为益，舍不为损"。[1]

萧韩家奴的意见虽似雄辩，但辽政府并未采纳。耶律化哥等人在镇州及今额尔齐斯河的远征，说明辽廷认识到漠北之地对辽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北族入居中原建立王朝者不在少数，只有两次在王朝末年重回北方，负隅长期抵抗。其一为辽末，当金夺取辽的大部分领土之后，在漠北属部的支持下，辽宗室耶律大石建立了西辽。其二为元末，当明军攻人大都，元残余势力退居漠北，与明对峙。研究辽代漠北历史时，不可不注意此点。

（原刊于《欧亚学刊》第3辑，2002年，中华书局，页210-216。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辽史》卷103《文学·萧韩家奴》，页1446-1447。

12 读《定宗征拔都》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刊载了杨志玖先生1943年4月的一篇旧作《定宗征拔都》。该文对岑仲勉先生1935年写的《蒙古史札记》“(五)定宗征把秃”[1]一节的论点提出异议。

岑文将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之“把秃”[2]一词释为阿巴斯朝哈里发所居之“报达”城。杨先生认为,“把秃”应该是术赤之子拔都。杨先生的文章写出后,岑先生提出几点反驳。[3]为此,杨先生1943年又写了《与岑先生之商榷》一文,[4]对岑先生的论点逐点辩驳,分析得十分透彻。我很赞成杨先生的意见。此外,我注意到岑仲勉先生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定宗征拔都”一事。在此问题上,杨先生当年因条件所限,未能引据更多的材料。[5]本文打算综合笔者所见中外史料,对《定宗拔都》一文做一点补充。

岑先生说,“谓定宗有征拔都一事,无非袁桷文‘定宗皇帝征把秃王’一句引起,……使把秃即拔都,何以西史于定宗主动方面都无此词。此中西比勘而知其不确者一。(以下略)”[6]

然而定宗征拔都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我们知道,窝阔台死后,先由脱列哥那皇后执政,然后召集忽里勒台大会,讨论选立新汗。拔都

---

〔1〕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页480-481。

〔2〕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有语:“拜住不敢他引古事为比,维昔定宗皇帝征把秃王,有灭国真薛禅使者谏罢征。”见《清容居士集》卷34,四部丛刊初编缩本,75,页513-514。

〔3〕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404-406,附录(二)岑先生来论。

〔4〕《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406-409,附录(三)与岑先生之商榷。

〔5〕杨先生和岑先生的文章都提到国外著名学者多桑、巴托尔德、格鲁赛等人对“定宗征拔都”一事的叙述,这几位学者都认为定宗有征拔都之事。然而霍握思(Howorth)不加肯定。见*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I,1876年伦敦版,页165。

〔6〕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405,附录(二)岑先生来论。

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出席。到会的诸王大臣们同意将汗位保留在窝阔台家族里。窝阔台家族里当时有三位主要的竞争者。一是窝阔台之子阔端；二是阔出之子，窝阔台之孙失烈门；三是贵由。诸王和大臣们讨论结果，决定立贵由为大汗。

贵由的即位，使他从窝阔台封地的主人变成全蒙古的大汗。于是他以大汗的身份行事，对当时蒙古朝廷的直辖地，如华北、阿母河以北地区、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西亚和临近印度之地的统治机构进行调整。太宗死后，蒙古帝国出现分裂的端倪，各地的诸王们和大臣们自行其是，政出多门，贵由以维护约孙和札萨为由，将发牌子的权力收回，只对拖雷妃唆鲁禾帖尼例外。

贵由对诸王份地的事务，也以大汗的身份加以干预。术外尼书记载说，"窝阔台逝后不久，察合台也逝去，根据窝阔台和察合台生前的意愿，其孙哈剌斡兀立(Qara Oghul) 继立，而察合台之子也速没有干预其事，[1]诊但贵由与也速相友善，乃出面过问曰：'有其子岂能立其孙？'遂立也速为察合台封地之主，并在各方面增强他的力量。"[2]

至于贵由对拔都有什么打算，《元史》、术外尼书和拉施笃丁书都写得不清楚。《元史》记载得很太简单，仅"[定宗二年]秋，西巡。八月，命野里知吉带率搠思蛮部兵征西"[3]一句话。此事在术外尼书记载略详，拉施笃丁书中关于野里知吉带西征的那段文字基本上是抄术外尼。术外尼曰："对西方，他(贵由) 派去了野里知吉带(Eljigitei) 和一支大军。他下令诸王位下每十人须签发两名归野里知吉带统辖，当地所有丁男都须从军随行，回回人(Taziks) 每十人应签发两名出征，他们首先应攻击异教徒。他们相约，贵由本人应当随后去。贵由除了将所有的军队和归附的人民置于野里知吉带统率之下以外，还特意将鲁迷(Rum——按今小亚半岛)，谷儿只(按今格鲁吉亚的波斯文名称 Gur-

[1]拉施笃丁记曰："而其子也速蒙哥却不得允许干预其事。"见《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版，页183。哈剌斡兀立(Qara Oghul)在突厥语中意为"黑小子""黑小伙"。

[2]见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波义耳英译本，页255。

[3]《元史》卷2《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9。

jistān之音译)、阿勒颇、毛夕里和Takavot的事务委付于野里知吉带,这样可以排除任何人的干涉,并且当地的算端和长官可以对他承担交纳贡赋的义务。"[1]仅从这两段文字,还很难看出贵由此举与拔都有什么关系。然而,野里知吉带所去之地,正是术赤封土的西南界。术外尼说:"对于长子术赤,他(成吉思汗)将自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面直到最遥远的撒克森(Saqsīn)和不里阿耳以及在那个方向上蒙古马蹄所能及的一切地方,都分给了术赤。"[2]乌马里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将钦察草原(Dašta-i Qïbĵaq)及其附属地面挑选出来,再加上阿兰、帖必力思、哈马丹和蔑剌合之地一起授给了术赤。"[3]拔都既然将这些地方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不容许别人,尤其是贵由来染指。

其后贵由准备对拔都动武。贵由与拔都积怨由来已久,杨志玖先生已经指出,"《元朝秘史》载巴秃(即拔都)于收捕乞卜察(即钦察)等部后,会诸王做筵席,他的自以年长,'先吃了一、二盏',古余克(即贵由)怒,詈之为'带弓箭的妇人',欲以柴击其胸,此当系二人起衅之由。故定宗即位时,拔都托故不赴大会。积怨愈深,猜忌愈烈。"[4]

术外尼书没有记载贵由出征拔都的理由。除了记载贵由与野里知吉带相约,贵由本人随后西征外(见前引《世界征服者传》文),术外尼仅记载说:"离开了国都,带着最可畏的军队和大批人马前往西方国度。当他到达忽木升吉儿(Qum-Sengir)边境之地,离开别十八里一周路程时,他的天数已尽,无法再离开其地一步。"[5]此时,拔都已东进到阿拉套山一带。对于这一场即将爆发的冲突,《元史》失载,仅记下了"三年

[1]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波义耳英译本,页257。

[2]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页42。

[3]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来西阿拉伯文及德文翻译合璧本:《蒙古世界帝国》,1968年(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Al-'Umari'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alik al-absar fi mamlik al-amsar*, übersetzt von Klaus Lech, Wiesbaden, 1968),德译,页100。

[4]参见杨志玖:《定宗征拔都》,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401。

[5]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波义耳英译本,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年(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 by John Andrew Boyl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页261。关于拔都此时所在地点,可参见此书页263、267、557。

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1]这几个字。当然，《元史》和术外尼书关于贵由死去的地点是一致的。

拉施笃丁书对于这件事提到好几次，记述得也较为详细。拉施笃丁在《拖雷汗纪》中记载说：拔都是诸王之长，他借口痛风病拒不参加选立贵由的忽里勒台。"贵由为此举所恼，心中盘算着诡计对付拔都。他借口叶密立的气候对他病体有利，出发前往那个方向。唆鲁禾帖尼别吉由于知道他的打算，秘密地传出消息，并警告拔都。"[2]

拉施笃丁在《贵由汗纪》中又记载说："当新的一年来临时，他（贵由）说：'叶密立的空气于我身体有好处，那里的水亦于我病有益。'于是他率领尽可能多的可畏的武力和大批人马，前往西方国度。……这时唆鲁禾帖尼别吉——她是个有知识极聪明的妇女——认识到他（贵由）匆忙地踏上征程是怀有恶意的。她秘密地派出一名信使到拔都那里说：'做好准备，贵由已率领一支大军到这个地方来了。'拔都十分感激，并准备与之作战。然而当他（贵由汗）到达撒马儿罕边境，离别十八里一周路程时，他的天数已尽，无法再离开其地一步，他逝去了。"[3]

拉施笃丁在《术赤汗纪》中还写道：拔都故意缓慢地东进，这样他还未来得及到达忽里勒台大会，到会诸王已经决定将大汗之位授予贵由汗。"贵由苦于一种慢性病的折磨，他借口他父亲（窝阔台）授予他的禹儿惕（yürt）的水土于其病体有利，率领一支大军前往叶密立霍只（Emil-Qočin）[4]之地。当他接近这一地区时，拔都发觉了。由于术赤汗和拖雷汗之间以及两个家族之间自成吉思汗时代就有着友好的关系，拖雷汗之长妻唆鲁禾帖尼别吉传信[给拔都]，[告诉他]贵由汗的西行带有某种阴谋。于是，他（拔都）更加不安，警惕地等待贵由汗的到

〔1〕《元史》卷2《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9。

〔2〕拉施笃丁《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tr. by J. A. Boy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页170。

〔3〕同上书，页185，撒马儿罕（Samarqand）为忽木升吉儿（Qum Sengir）之误。见该书页121，注（95）。

〔4〕Emil-Qoči，波义耳认为可与《元史》卷121《速不台传》的"也迷里霍只"勘同，此处从波义耳之勘同，译写为叶密立霍只。

来。当后者(贵由)到达撒马儿罕,离别十八里一周路程时,他死于折磨了自己多年的那种病,时为回历640年(1242—1243)。[1]

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乌马里的说法与和拉施笃丁有些不同。其书云:"继承成吉思汗汗位的窝阔台死后,其子贵由继立。贵由为人奸邪狡猾,刚愎自用,专权且粗暴无礼。他在成吉思汗的国家实行专制统治。为了对付拔都,夺取其土地,他向阿兰及其附近的拔都份地派去一位名叫野里知吉带的大异密,带有逮捕当地长官的命令。当地长官上书拔都,要求依靠他的部下进行抵抗。然而窝阔台之子贵由的使臣野里知吉带提前到达,下令进行逮捕,为了便于将他们带到贵由那里,他给这些被捕的长官套上枷锁。就在这时,传来了拔都的命令,以同样的方式对付野里知吉带。被捕长官们的随从因而奋起反抗,打碎他们的枷锁,抓住野里知吉带,把他缚送到拔都廷帐。在那里,他们把野里知吉带送进(一釜水)中煮死。

当使臣之死的沉痛消息传到贵由那里后,他出动了60万骑兵,两人(拔都和贵由)互相推进,以进行一场血战,将对方毁灭。在双方相距十日程的地方,贵由(突然)死去,这消息惊动四方。诸王们和异密们一致协议与拔都结盟。他们致信拔都,通报了贵由之死的消息,并告诉他,他现在可以登上空缺的大汗宝座,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拔都则说,他无意要求大汗之位,而应推举拖雷之子蒙哥汗(为合罕)。"[2]

这里应指出,乌马里关于野里知吉带之死的说法与各书不同。术外尼在贵由死后在塔剌思还曾亲眼见过野里知吉带,[3]则野里知吉带当死于蒙哥即位之后。术外尼又说,蒙哥即位后,命合丹豁儿赤(Ghadaqan Qorchi)将野里知吉带逮捕,送往拔都处处死。[4]拉施笃丁说,蒙

[1]拉施笃丁《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义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120-121。此处拉施笃丁纪年有误。贵由逝死于1248年春,参阅同上书页121,注(96)。

[2]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载于克劳斯·莱西德译本《蒙古世界帝国》,页100-101。这段史料杰克逊已经提到。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于《中亚杂志》1978年第3-4期,页200。但杰克逊未将这段史料全文引出。说贵由出动60万人,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

[3]参阅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波义耳英译本,页512。

[4]术外尼:《世界征服者传》,页590。何高济汉译本译作"葛答罕火儿赤",见汉译本,页693。

哥即位后，野里知吉带的两个儿子因唆使窝阔台系诸王谋反事泄，被用嘴里塞满石头的办法处死，他们的父亲也被送到拔都处，遭到与他儿子同样的下场。[1]《元史》的记载与术外尼书和拉施笃丁书大致相同："[宪宗元年]冬，以宴知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籍其家。"[2]这里《宪宗纪》中的"宴知吉带"即前文之野里知吉带，而受命诛之的"合丹"即术外尼书中之"合丹豁儿赤(Ghadaqan Qorchi)"。鲁不鲁克的叙述杨志玖先生已经提到，[3]此处不再赘引。

综上所述，可知定宗实有征拔都之举。袁桷的《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也说明，元人确知其事。惜"谏罢征"的灭国真薛禅使者事迹于今已无从考证。

（原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页63-66。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拉施笃丁《史集》第2卷，波义耳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12-213。

[2]《元史》卷3《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45。杰克逊已经注意到乌马里和其他各书对野里知吉带之死的不同说法，见《蒙古帝国的瓦解》，注(55)。《多桑蒙古史》取术外尼和拉施笃丁的说法，见该书冯承钧汉译本上册，页265。

[3]杨志玖：《附录(三)与岑先生之商榷》，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407。

13 关于马薛里吉思

许多学者在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迹时，都注意到《至顺镇江志》卷9所收梁相所撰《大兴国寺记》[1]中提到的马薛里吉思，并注意到马可波罗有关镇江的描述与《大兴国寺记》所记之间“惊人的一致”，[2]以此作为马可波罗曾经来华的确证之一。法国学者伯希和在其著作《马可波罗注》中撰有条目“马薛里吉思”，[3]专门介绍了此人。

马可波罗在谈及镇江时提到，1278年马薛里吉思在那里建了3所聂思脱里寺。据梁相记载，马薛里吉思至元十四年(1277)受命任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后，[4]于至元十八年(1281)将自己在铁瓮门夹巷的宅舍捐出，首建“八世忽木剌”，华言称“大兴国寺”。穆勒(穆阿德)已经注意到《至顺镇江志》提到位于夹道巷的大兴国寺，原为提刑赵某宅。[5]

梁相接着提到，马薛里吉思继而得西津竖土山地，并建“答石忽[木]剌”(华言“云山寺”)和“都打吾儿忽木剌”(华言“聚明山寺”)，并称得西津竖土山地建两寺的时间在至元十六年(1279)。笔者以为，既然

---

〔1〕中华书局影印本《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页819。最早注意到《大兴国寺记》的是俄国人帕拉丢斯(Palladius)。见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页166。穆尔，其汉名为穆阿德，此承蔡美彪先生提示。

〔2〕朱江：《从〈马可波罗游记〉联想到的几点》，载于《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见页62。

〔3〕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73, pp.774-776.

〔4〕据梁相记载，马薛里吉思至元十四年(1277)受命为镇江府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见页9)。而《至顺镇江志》卷15(见页6)及卷12(见页12)记马薛里吉思于至元十五年到任。按元制，路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仅达鲁花赤一员，并无副达鲁花赤。见《元史》卷91《百官志》，标点本，页316。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文讨论。

〔5〕《至顺镇江志》卷12，页5；《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82。

建于至元十八年(1281)的“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为首建之寺,则“答石忽木剌云山寺”与“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的建造当在至元十八年之后。“大兴国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当即马可波罗所见之三寺。

本文拟先专注于马薛里吉思的民族背景,继而讨论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

13.1 马薛里吉思的民族背景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撒麻耳干基督教的描述

关于马薛里吉思的家庭背景,《大兴国寺》有较详细的介绍,称:其祖父名“可里吉思”,[1]父名灭里。[2]其外祖名撒必,[3]是当地的“大医”,当为有名的医生。成吉思汗西征时攻入撒麻耳干,其子也可那颜(按,即拖雷)染病,马薛里吉思的外祖撒必以诸香果煎就的舍里八(šarbat,即果味饮料或糖浆)治愈其症,因而受命为御位舍里八赤,专为皇家煎造舍里八。

笔者注意到,马薛里吉思有强烈的突厥语背景。马薛里吉思以突厥语薛迷思贤(Semiz Kent)称呼其故土撒麻耳干(Samarqand)。薛迷思贤即《辽史》卷30《天祚帝纪》记耶律大石西征时所至之寻思干,又译作斜迷思干。“薛迷思”(semiz),乃突厥语,译言“肥”。薛迷思贤,此言“肥城”。[4]

《大兴国寺记》提到马薛里吉思共建了的7所十字寺:

---

〔1〕其原名当为Kürgis,此名是基督徒常用的名字,又译作“阔里吉思”“阔儿吉思”等,今习称乔治,格奥尔基等。

〔2〕穆阿德认为,“灭里”为基督教名Mares的音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68)。“灭里”在元代常为闪含语(包括阿拉伯语)Malik“王”的音译,并曾考虑以此当之。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碑之功德主为“王舍城”,即元代之巴里黑(Balkh)人尹斯(Yazedbuzid),其父名“珉礼”,叙利亚语作Milis(试参见拙著:《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00)。将“灭里”视为Milis之元代音译,似更优。

〔3〕此名未见有人讨论。基督教徒有名Sabrish者,或与此同名。

〔4〕耶律楚材记:“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见向达校注:《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3。

(1)首于至元十八年(1281)在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忽木剌"为叙利亚语umra的音译,即寺院。"八世"很可能是突厥语baš,[1]译言"首""头"。《高昌馆杂字》"身体门""头"字音译为"把失"。[2]故其原名很可能是Baš Umrasï,意为"首寺""头寺"或"源寺"。[3]如此说成立,则其原名的意义"首寺"与汉译"大兴国寺"意义不相符。

(2)于西津竖土山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答石"当为南部突厥语daš的音译,意为"石"。[4]在东部突厥语中作taš,《高昌馆杂字》"地理门"音译为"塔失"。[5]故此寺原名很可能是Daš Umrasï,意为"石寺",与汉译"云山寺"意义大致相当。

(3)于西津竖土山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都打吾儿"穆阿德末作解释,词源待考。

(4)于丹徒县斤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打雷"穆阿德未做解释。笔者疑为南部突厥语daluy"海"的音译。东部突厥语作taluy,《高昌馆杂字》"地理门"中"海"音译为"塔雷",[6]当即此。如此说成立,则此寺的原名可能是Daluy Umrasï,译言"海寺"。"四渎"为古人对四条人海的大河,即江、河、淮、济的称呼。"打雷忽木剌"(海寺)的意义大略与"四渎安寺"意义相当。

(5)于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的廉海牙",穆阿德未做解释。"的廉"词源不明,待考。[7]笔者以为"海牙"似为突厥语qaya的音译,意为悬崖。元西北诸王海都的分地为海押立(Qayalïγ),此言"多崖之地"。明陈诚使西域时经过"沙鹿海牙"。"沙鹿"即帖木儿之

[1]穆阿德:《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72,注(13)。

[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书目文献出版社,页438。

[3]本文初刊时,所拟马薛里吉思所建寺院的突厥语原名时,均未有泛指属格结构第三人称所有格词尾(undefinited genetive construction, third person singular)-si或-sï。此系本次修改时添加,以下各寺同。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另一篇有关马薛里吉思的文章中讨论。

[4]穆阿德:《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72,注(13)。

[5]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本,页419。木华黎后裔查剌温国王,又名塔思。"塔思"即突厥语taš,系此人的突厥语名称,与其蒙古语名称查剌温"石"的意义相同。

[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从刊影印本,页418。

[7]笔者在近期将另撰发表论文讨论这个音译词。

子沙哈鲁(Šāhrukh),此城建于忽阐河(锡尔河)畔悬崖之上,故名沙鹿海牙(Šāhrukh Qaya)。[1]高安寺建于登云门外黄山之上,其原名中的'海牙"(qaya,山崖)恰与其地理位置相当。

(6)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马里"当为叙利亚语Mar的音译,此言"圣",与"马薛里吉思"名字中的"马"音译的是同一个词。"结瓦里吉思"似为人名Kürgis的叙利亚语读法Giwargis之音译,即前文所提及的阔里吉思,[2]今泽作乔治。"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剌"还原为突厥语名称似应为Mar Giwargis Umrasï,此言"圣乔治教堂"。如此说成立,则其突厥语原名"圣乔治寺"与汉名"甘泉寺"意义不相符。

(7)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样宜"当为突厥语yängi的音译,此曰"新"。[3]《高昌馆杂字》"地理门"中有"yangi,新,养吉"。[4]元中期以后,塔剌思由四座小镇组成,其中一仍称为Yängi,意为"新",即此"样宜",故而明初亲自途经过塔剌思的陈诚称此地名为"养夷"。[5]宋元时代畏兀儿五城之一为"仰吉八里"(Yängi m 由 Balïγ),意为"新城"。"样宜忽木剌",其原名可能是Yängi Umra,意为"新礼拜堂"。如此说成立,则其突厥语原名与汉名"大普兴寺"意义不符。

除了马薛里吉思所建7寺之外,镇江通吴门外福田山的大法兴寺,也是一所也里可温寺。[6]此外,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1295)有一位安

---

[1]陈诚:《西域番国志》记云:沙鹿海牙"城筑小岗上　西北临山与河",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第1集,见页13。笔者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历此故址。

[2]穆阿德:《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72,注(13)。

[3]穆阿德:《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72,注(13)。

[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从刊影印本,页418。

[5]见陈城:《西域番国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第1集,见页15。笔者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至此地。旧址在今塔拉斯(Talas,苏联时代称江布尔)城东约十公里处。

[6]《至顺镇江志》,卷9,中华书局影印本,宋元方志丛刊,页18。

马吉思又建了一所大光明寺。[1]它是否是也里可温寺,穆阿德未敢断言。[2]笔者注意到,《至顺镇江志》在列举元代侨寓镇江的外来士人时,记录了一位也里可温教徒安马里忽思。[3]他是否就是上面提到的安马吉思,尚待研究。如是,则此大光明寺也是一所十字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Mar Sargis的汉译名称"马薛里吉思",显现出明显的元音和谐律痕迹。前述《至顺镇江志》中有关马薛里吉思的记载中所提及的番语词汇,都显现出他的母语可能是突厥语。19世纪末在前俄属突厥斯坦七河地区,即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附近碎叶及裴罗将军故城遗址中,发现的聂思脱里教墓地中,有大量以叙利亚字拼写的突厥语铭文墓碑。这说明,当时中亚的聂思脱里教社团中有大量操突厥语人口。

上述资料不仅反映出马薛里吉思的家族很可能属于撒麻耳干操突厥语的也里可温族群,也表现出当时镇江的也里可温人口中,以操突厥语者为主。

梁相在撰写《大兴国寺记》时,曾询问镇江当地的也里可温教徒,得知"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即聂思脱里行教之地有12所大教堂。其中一所的大殿有四柱高40尺,皆巨木,一柱虚悬尺余。而马可波罗所述撒麻耳干时提到,彼处有一所巨大的"圣术安"教堂,因回回教徒强行索回建殿柱础石,造成殿中一柱空悬。上述《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与《大兴国寺记》所述有明显相似之处、笔音据此提出上述两则记载应有同一来源。[4]马可波罗在扬州时,肯定与时在镇江的马薛里吉思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交谈过有关撒麻耳干聂思脱里教的情况。马可波罗归国后在狱中口述自己的经历时,有关撒麻耳干的圣乔治教堂的内容,至少有部分内容可能源于他从马薛里吉思那里所听说的故事。这才能解释《马可波罗游记》与《至顺镇江志》这两种成书时代不同,成书地点相距万里

〔1〕《至顺镇江志》,卷9,页9。

〔2〕穆阿德:《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72-173,注(17)。

〔3〕上引《至顺镇江志》,卷19,页11。

〔4〕参见拙文:《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载于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页69。

之遥，似乎毫不相干的史料，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会如此相似。

13.2 侵夺佛寺田产

《大兴国寺记》称：马薛里吉思以建寺表现忠君爱国之心，完泽丞相将其事迹奏报，获"玺书护持"，朝廷还拨赐江南官田30顷，后来又添置浙西民田34顷，以为上述7寺之供养。

如果仅据上述《至顺镇江志》的记载，马薛里吉思在江南修建也里可温寺似为其个人的行为，但实际上马薛里吉思与朝中高官司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马薛里吉思曾向爱薛报告，说他在江南以己资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真金和"太后"[1]建有也里可温寺。作为新建7所也里可温寺供养的田产，除了官田之外，还有他自己购置的田地。上述马薛里吉思致爱薛报告中提到的"官田"，相当于梁相提到的完泽丞相从江南官田中所拨赐的30顷，而他自行添置的田地，则相当于梁相所提到的"益置"的34顷田产。

马薛里吉思向爱薛请求，希望他与朝中有关衙门协商，免除他在江南的也里可温寺供养官田与私田的官租。爱薛遂向中书省提出报告。元贞元年(1295)，中书省为此向元成宗铁穆耳奏报。经过合议，中书省认为其他各教寺院均须纳粮，也里可温寺不能例外，否定了爱薛的提议，并得到成宗的批准。[2]

拂林人爱薛是元代最著名的也里可温教徒之一。他入朝后，以精通星历、医术受到信任，创京师医药院。后改为广惠司，仍由爱薛管领。仁慈是基督教的主要口号之一。《约翰福音》提到，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就多次为人治病，甚至将一位患眼疾长达38年之久的患者治好。[3]虽然在职守上，"广惠司者，回回之为医者隶焉"，但实际上却有

[1]此"太后"是否指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唆鲁禾帖尼，待考。

[2]《通制条格》，卷29"商税地税"元贞元年条，黄时鉴点校本，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331。

[3]*The New English Bible*, John 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新英语圣经》，《约翰福音》第9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pp.124-125.

不少聂思脱里教医生在其中工作,可见这里的“回回”是广义的,大致相当于“西域”。元统元年(1333)刚合剌咱庆王,因坠马而“两眼黑睛俱无,而舌出至胸,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也里可温人聂只儿尝识此症,以外科手术治愈之。[1]马薛里吉思的外祖以医术受到蒙古皇室的信宠,世传制舍里八(Šarbat)即果汁饮料煎造之法。世祖有疾时,饮服他制出的舍里八常有验。故至元初曾降金牌命专职负责煎制舍里八,我们虽在史料中尚未发现马薛里吉思在广惠寺中任职的记载,但他在赴镇江任职前与爱薛所领导的广惠司的关系必定密切。当时他在工作上,很可能直接隶属于爱薛。

爱薛来自西域,且为世祖心腹,至元二十年(1283)曾奉诏副博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历时两年归国。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设崇福司,以爱薛为崇福司使。司使为从二品职,其职掌就是负责天下十字寺。[2]爱薛为马薛里吉思与朝中有关部门联系减免赋税事宜时,正在崇福院任职。

向朝廷报告马薛里吉思在江南创建也里可温寺的完泽丞相,在《国朝名臣事略》中有传。据此传,完泽为土别燕氏,父线真,曾于中统四年(1263)任中书右承相。完泽17岁时以大臣子入选东宫。地位逐渐升迁,自至元二十八年(1291)起,为中书右丞相,居相位为时达13年之久,大德七年(1303)病逝,时58岁。[3]土别燕(Tübe gen)氏见于《史集》之《部族志》,为克烈之一族。[4]克烈为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游牧部落。由此可推测完泽丞相很可能也有聂思脱里教的背景;这可能是他支持马薛里吉思的背景之一。换而言之,爱薛与完泽可能曾是马薛里吉思在朝中的靠山。

---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9,“奇疾”,中华书局,1980年,页109。

〔2〕《元史》卷89《百官志》,页2273。

〔3〕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4之一。《丞相兴元忠宪王》,中华书局,姚景安点校本,1996年,页53-54;并见《元史》卷130《完泽传》,中书局点校本,页3174。其任中书农丞相的时间见《元史》卷112《宰相表》,页2806。

〔4〕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载于《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6年,页1-23。

马薛里吉思究竟在镇江生活了多久,史无明文。《通制条格》中保存的上述记载和完泽丞相在位年代的资料,似说明他至少在至元末至成宗初年间仍在镇江,并关心着自己在江南所建的几所教堂。

梁相称,马薛里吉思“连兴土木,秋毫无犯于民。”梁相撰《大兴国寺记》系受命而作,其中的话语未可全信。尽管如此,透过梁相的描述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他在镇江任职副达鲁花赤期间和辞官以后,不但专心建造十字寺,而且还利用手中权力的影响,扩大也里可温的势力。用梁相的话来说:就是“家之人门受戒备,悉为也里可温”。因此他在也里可温与其他宗教发生矛盾时,难免做出一些偏袒聂思脱里教,欺压其他宗教的事情。其中较为典型者,当数他侵占金山寺所属田地,建造答石忽木剌云山寺和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之事。潘昂霄指责道:“至元十六年(1279),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绾监郡符,势甚张。掇危蜂秀绝之所,库其颠,祠彼教,曰银山寺。”银山寺为云山寺与聚明山寺的合称。此外,马薛里吉思还将云山、聚明两寺之间的土地辟为也里可温教徒的墓区。[1]

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侵占佛寺田产建也里可温寺院与墓区的行动,招致当地佛教徒的不满。继大德七年(1303)年完泽丞相去世后,另一位在朝中最有势力的也里可温教徒爱薛也于至大元年(1308)辞世。这时朝中也许再也没有人能保护马薛里吉思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武宗即位后,镇江的也里可温教突然遭到打击的原因。

至大四年(1311),武宗遣宣政院断事官泼闾等赴镇江传谕圣旨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拆毁十字[寺]”。还要求“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数月后,朝廷专使至镇江,指出“金山外道也里可温,依势修盖十字寺。即拆除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朝廷派出曾在北京建造白塔寺的工匠刘高,负责将云山与聚明山一寺改造为佛寺。[2]从上面提到的“拆除所塑”四个字来看,马薛里吉思所建的教堂内是塑有耶稣像的。

---

〔1〕梁相:“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潘昂宵记:“营隙为侪类葬区。”

〔2〕《至顺镇江志》卷9,页24。

元代文献中记载了许多教派之间的斗争，例如释道之争、伊斯兰教与聂斯脱里教之争等，但较少学者注意到聂思脱里教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至顺镇江志》中有关马薛里吉思依势侵占金山寺田产建也里可温寺的资料，为此两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例证。

13.3 样宜忽木剌、主鹘人与荐桥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马薛里吉思在杭州荐桥所建十字寺“样宜忽木剌”。这所十字寺至明初尚存。据田汝成的记载，“十方寺”的旧址”，[1]在荐桥东，“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吏部侍郎谢丕将其改建为“三太傅祠”，以奉祭谢氏的三位先人。[2]这里提到的所谓“元僧也里可温”，即指马薛里吉思。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同意穆阿德的假设，即“样宜忽木剌”是一个突厥语名称，意为“新寺”。马薛里吉思选择在荐桥建寺，必是因为此处为也里可温教徒聚居区。揣测“新寺”这个名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这里的也里可温教徒可能原先已建有一所教堂。也许在马薛里吉思的寺院建造起来以后被称为“老寺”，为俗称。这样考虑马薛里吉思之所以把他所建的教堂称为“样宜忽木剌”，即新寺才合理。

马可波罗肯定也访问过荐桥一带。许多学者注意到，马可波罗在杭州曾见到过一所教堂，并把它比作为马薛里吉思所建的“样宜忽木剌”。[3]如果我们上述有关元代杭州存在两所也里可温寺的假设能成立，则应考虑马可波罗所见的教堂，究竟是杭州原先就业已存在的教堂，还是马薛里吉思所建的“样宜忽木剌”的问题。

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访问过杭州。据他称杭州的第二城是犹太人、也里可温人和崇敬太阳的突厥人的聚居区。[4]他所描述

[1]“十方寺”当为“十字寺”的讹误。

[2]《西湖游览志》卷16，明嘉靖刻本。

[3]例如马文宽、李兰琴合撰：《马可波罗与宗教》，刊于《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194。

[4]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56-557。

的杭州城的“第二城”应当就是荐桥以西一带。据白图泰自述,他到达杭州时,当地的回回人首领,包括哈的赫伦丁、摄思廉及来自密思而(埃及)的回回人伊本·安法尼携其子均出城迎接。故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白图泰当年很可能是在杭州城东的钱塘江的码头登岸。在这里受到回回人首领的迎接,然后循荐桥门(即崇新门)入城,到达荐桥以东城区。旧时杭州坊巷间以墙分限,这在马可波罗眼中可能被视为杭州城中之城。荐桥地区大约有一座门楼,白图泰称之为“犹太人之门”。《白图泰游记》所提及的杭州的第二区的东界应起于东河,止于荐桥所跨之中河。而东河以东直至荐桥门(即崇新门)当为第一区。

荐桥东西一带当时是各种外来民族的居地:从伊本·白图泰的记载可知,这里还有犹太人。白图泰并非第一位提及元代居杭的犹太人的作者。杨瑀提到,至元间处州所产甘蔗均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宦皆主鹘回回富商也”。主鹘回回即犹太人。“一次有人从这些主鹘富商那里购砂糖10斤,被索银数十倍于官价”。〔1〕这些在杭州砂糖局为宦的主鹘人,很可能就生活在荐桥东一带。

这些犹太人在杭州生活了几个世纪。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万历三十三年(1605)六月下旬,有一位来自开封的中国犹太人艾田,来到北京赶考,听说北京有一位外国夫子,信奉唯一的真神,遂前往拜见利玛窦。据利玛窦描述,艾田的外貌完全不像一般的中国人。艾田除向利玛窦介绍了开封的犹太人以外,还提到杭州的犹太人比开封还要多,那里也有祝虎院,即犹太寺。〔2〕这些杭州的犹太人当是元代在杭州砂糖局做官的主鹘人的后裔,他们在元亡后继续在那里生活了200多年。〔3〕

荐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古老地区。宋乾道(1165—1173)《临安志》和淳祐(1241—1252)《临安志》两书在记临安坊巷时,于“右三厢”中都

〔1〕《山居新话》,《癸辛杂识》外八种,四库笔记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1040-1347。

〔2〕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7年,页115-117。

〔3〕参见拙文:《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刊于《元史论丛》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08。

提到"昌乐坊，荐桥巷"，上述两志在同卷"桥梁"一节中，亦均提到这座"荐桥"。〔1〕《咸淳临安志》卷1中，有"京城图"，图中城东崇新门内绘有"荐桥"。〔2〕这座崇新门大约是因为正对荐桥的缘故，故"俗呼荐桥门"。〔3〕荐桥所跨之河入"盐桥运河"，此运河与杭州东城墙相平行。《淳祐临安志》提到："盐桥运河，南自碧波亭、州桥、通江桥与保安水门里横河，过望仙桥晰、柴垛桥、荐桥、丰乐桥、盐桥、仙林寺桥、西桥、梅家桥，出天宗水门。"〔4〕"可见荐桥左为柴垛桥，右为丰乐桥。但在上述"京城图"中，"荐桥"之北绘出丰乐桥，但在荐桥南却无柴垛桥，而代之以"新宫桥"，恰处于望仙桥与荐桥之间，相当于柴垛桥的位置。〔5〕

荐桥一带曾有贵人的宅邸。《咸淳临安志》在"诸后宅"一节中，提到"显仁韦太后宅，在荐桥东。咸淳五年(1269)十月，朝廷以中兴母后之家恩，例视开国昭宪杜太后，拨降钱米，令临安府重修家庙。宪节邢皇后宅，在荐桥南"。〔6〕在《咸淳临安志》卷1"京城图"中，"荐桥"之东，祟新门内路南标有"成穆皇后宅"利"成萧皂后宅"。〔7〕

南宋末，荐桥一带变得更为热闹。在《咸淳临安志》的"坊巷"一节中，在"右一厢"中提到"富乐坊荐桥西"；在"右二厢"中提到"新开南巷，荐桥富乐坊对"；在"右三厢"中提到"西巷坊。并在荐桥东而南，俗呼上中沙巷"。〔8〕在"桥道"一节中，记有"荐桥，富乐坊东"。〔9〕可见此时荐桥一带是右一厢、右二厢和右三厢的交接处。同时荐桥附近还有数个官属库场。如在"官寺四"中提到，荐桥北有回易库，在荐桥门外有船场和架阁库。在上述右三厢"西巷坊"，即荐桥东之上中沙巷内有柴

〔1〕宋元方志丛刊，册4，《乾道临安志》卷2，叶17-18；《淳祐临安志》卷7，叶5、叶8；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

〔2〕《咸淳临安志》卷1，页3354。

〔3〕上引《淳祐临安志》卷5，叶2；《咸淳临安志》卷18，页4。

〔4〕上引《淳祐临安志》卷10，叶22。

〔5〕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叶5-6。

〔6〕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0，叶5。

〔7〕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叶5-6。

〔8〕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9，叶12-12。

〔9〕上引《咸淳临安志》卷21，叶2。

场。[1]此外，荐桥门里，即祟新门里，有福田宫，旧名彤云。熙宁十年(1077)，神宗改赐梵严观。[2]

13.4 杭州的回回人

荐桥东被马薛里吉思选中作为建造也里可温寺的地点，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繁华和热闹，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多种外来民族混居的地区。虽然明人记载，靖康年女真军攻人开封，北宋灭亡。赵构在江南称帝，许多原先居于中原的西域人随宋室南迁，定居杭州。[3]但明人还记载，元时内附者，“杭州尤伙，号色目种”。[4]那里除了也里可温、犹太人(主鹘)之外，还有畏兀儿人，《万历杭州府志》就提到杭州有畏吾儿寺。[5]此外，这里最引人注意的外来居民当属回回人，他们的风俗引起了周围各坊汉族居民的好奇。

陶宗仪记道：“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回回婚俗与汉地不同，“虽叔伯姊妹，有所不顾。”一次荐桥的回回人举行婚礼，引来大批当地居民围观，不少人甚至攀墙上屋，以至压塌屋顶，造成新婚夫妇和宾客悉被压死的惨剧。当地人王梅谷曾作打油诗，题为《嘲回回》记此事：

宾主满堂欢，闾间里盈门看。

洞房忽崩摧，喜乐成祸患。

“压落瓦”，碎兮，“倒落沙”泥。

“别都钉”折兮，“木屑飞”扬。

---

[1]《咸淳临安志》，卷55，叶6、9、12：在同书卷1所附“京城图”中，回易库在荐桥西的北面。

[2]《咸淳临安志》，卷75，叶13。

[3]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8，叶7a。田汝成所谓靖康之乱中，开封的西域人随宋室南迁之说很可疑。那里的犹太人一直生存着，在金初还建有祝虎院。与宋代的资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元代杭州有关西域人的记载突然大量增加。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8，叶7a。

[5]《万历杭州府志》，卷97，寺观1。中国方志丛刊，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万历七年刊本景印，1983，原件存台湾故宫博物院，见页5378。

……

压倒“象鼻”蹋，不见“猫睛”亮。

呜呼！守白头未及一朝。贪黄花却在半晌。

移厨“聚景园”中，歇马飞来峰上。

“阿剌”一声绝无闻，衰哉树倒猢狲散。

陶宗仪还特别注明：“阿老瓦、倒剌沙、别都丁、木偰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即以“压落瓦”为“阿老瓦”（‘Ala al-Dīn?）的谐音，以“倒落沙”为“倒剌沙”（Daulat-i Šāh）的谐音，以“别都钉”为“别都丁”（Badr al-Dīn），以“木屑飞为“木偰飞”（Mustafī）的谐音，说明在这次事件中，死了不少回回人。陶宗仪还注明“象鼻、猫睛”，指回回人的相貌，可见元代回回人尚保持西域人高鼻深目的体质特征。陶宗仪又说，“阿剌”指其语言。笔者以为或许是“‘Allāh”，即“安拉”（真主）的音译。而“聚景园”则是回回墓地的名称。[1]

荐桥一带因历来为回回人聚居之处，故其附近的一些地名亦带有回回人的烙印。据田汝成记载：“忠孝巷，俗称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桥。”[2]中沙巷为宋时俗称，当时登录的正式名称为“西荅巷”，称“在荐桥东而南”。[3]其北面的“回回新桥”今杭州有重建者。

除了荐桥之外，杭州其他地方也有回回人居住。宋末元初曾居杭州的周密，与那里的回回人有接触。据他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与至元二十九年底（1292），曾两次有大“海鳅”死于浙江海边（似为鲸搁浅而死）。至元十九年搁浅而死的“海锹”体长“十余丈”，当地青年皆以梯爬至“海鳅”背上，割肉而食之。不久发生大火，时人以为“海鳅”为显示灾祸征兆之妖。至元二十九年搁浅的那条“海鳅”更大。搁浅之后两日，在“天井巷回回大师家”中发生火灾，殃及数千家及江浙行省的开元宫”。[4]“海鳅”在钱塘江中搁浅而死之事，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记

〔1〕《南村辍耕录》卷28，“嘲回回”条。

〔2〕《西湖游览志》卷14，叶7a。

〔3〕上引《咸淳临安志》卷9，叶13。

〔4〕上引《癸辛杂识》续集上，中华书局，1997年，页155。

载。马可波罗说，当伯颜进军杭州时，宋天子(Facfur)[1]仓皇越钱塘江出逃。其时江水干涸。后来在干河道上发现一条大"鱼"，几乎有100步长。后来马可波罗在杭州的一个佛寺中还见过这条"鱼"的骨架。从时间上看，马可波罗所记的这次"大鱼"搁浅，与上述两次均不符合。周密所记的两次均有明确的年代，可靠性较高；而马可波罗则是听人所述。笔者推测，马可波罗所述的也许是指至元十九年(1282)那次鲸鱼搁浅事件。

至元二十九年(1292)发生火灾的天井巷是杭州古地名。《乾道临安志》中提到"通浙坊，天井巷"。[2]《咸淳临安志》"坊巷"一节中提到"和丰坊，天井巷相对"，"天井坊，天井巷，旧名通浙坊。"[3]。《咸淳临安志》"坊巷"一节又提到"天井巷，旧名通浙坊。稍西为龙舌头"。[4]回回人素有聚居的习俗，故当有其他回回人居于天井巷一带。周密还提到了回回历，[5]这说明他与随元军来杭的回回人有较密切的关系。

据明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碑》记载，礼拜寺"在文锦坊之南，东向屹立"，"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1281)。"据康熙九年(1670)《真教寺碑》记载，"元辛巳(1281)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6]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有专节记载此真教寺，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田汝成描述色目人的相貌和习俗曰：其人"隆准深眸，不啖豕肉。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诵经持斋，归于清净。推其酋长统之，号曰'满拉'。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只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扃鐍森固，罕得阑入者，俗称礼拜寺。"[7]综上所述，可大致推测阿老丁于至元十八年

---

〔1〕Facfur源自粟特语，义为"天子"。

〔2〕上引《乾道临安志》卷2，叶15。

〔3〕上引《淳祐临安志》卷7，叶1。

〔4〕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9，叶10。

〔5〕上引《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人闰月"，中华书局，1997年，页155。周密对回历的描述并不完全正确。

〔6〕刘致平：《中国伊斯兰建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0，注(1)—注(5)。

〔7〕上引《西湖游览志》卷18，"真教寺"条，叶7a。

(1281)抵杭州,而建寺则在30余年后的仁宗朝。阿老丁很可能就居住在天井巷,即至元二十九年失火之处。

元木白图泰访问杭州时,先进入所谓"第二城",即上述荐桥所跨之中河以东至东河之间的坊巷,第三日才进入了一个所谓"第三城"的地区:据他描述,穆斯林们住此城内,城市美丽,市衔布局如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白图泰到达时正值晌礼时分。宣礼声闻远近,白图泰下榻于密昔而人伊本—安法尼家族舍中。伊本—安法尼为当地富贾。他说,这个家族有一小寺。这里还有许多苏非徒和其他穆斯林。附近还有一所大寺。这个所谓杭州的"第三城"应当就是今天杭州中河以西,包括今"南宋御街"、凤凰寺等在内的繁华市区。

《咸淳临安志》卷1所附杭州图中标出了"天井巷"的地名,其东为"秘书省",正是周密所提到至元二十八年大火所殃及的"行省"。而白图泰遇到的这位伊本—安法尼很可能是一位与周密提到的宅院起火的"回回大师"关系密切的人物。白图泰抵杭州城外时,出迎的人中有当地的"摄思廉"(Šeikh al-Islām)。"回回大师"这个称号似与上述"摄思廉"有某种关系。这位回回大师的宅院当与清真大寺相去不远,其周围当有许多回回人。

13.5 聚景园

聚景园是南宋名园。《乾道临安志》提及"聚景园在清波门外"。[1]《咸淳临安志》则描述:"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皇帝致养,北宫拓埔西湖之东,又斥浮屠之庐九以附益之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为水门。亭宇皆孝宗皇帝御扁。尝恭请两宫临幸。光宗皇帝奉三宫,宁宗皇帝奉成肃皇太后,亦皆同幸。岁久芜圮,今老屋仅存者,堂曰槛远亭,曰花光,又有亭植红梅,有桥曰柳浪,曰学士,皆粗见大概。惟夹老松益婆娑,每盛夏,芙蓉弥望,游人舣舫绕堤外,守者培

〔1〕上引《乾道临安志》卷1,叶7。

桑蔚果,有力本之意焉。”[1]同时还收录了几首文人描述聚景园的诗句:如杨万里的《驾幸聚景园》诗,中有“五色日华销积霭,三春花草殿余芳”句。[2]此诗全名为《积雨新晴驾幸聚景园拟口号》[3]此外还录任希夷的《聚景园宴集》中有句“晚排阊阖披云雾,身摄仙踪游禁宇。如知天山自清凉,不信人间有炎暑”诗句。[4]该志还提到,“在清波门外聚景园前”有灵应堂。[5]上述诗作反映出当日聚景园当年风光的美丽。

而高似孙的《聚景园》“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6]诗句,则表现出宋末这里荒芜的景象。宋代曾在聚景园开渠导湖水灌溉,日久淤塞,后曾修治。[7]

入元后,周密曾观察过来杭的回回人的生活。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他亲睹回回丧礼,他记道“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潜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踞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干,用苎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敛。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秽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卓子[8]坎上,四日一祀以饭,四十日而止。”

周密还专门提到了聚景园,说逝者之“棺即日便出瘗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送葬者皆号哭,声震远近”。出棺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葬礼上还有“群回颂经”。三日后,富户多杀牛马,遗赠回回乡亲。[9]

从上引宋代杭州方志的记载看,“聚景园”成为问回人墓地是元灭

[1]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3,叶20-21。

[2]上引《咸淳临安志》卷5,叶28-29。

[3][宋]杨万里撰:《诚斋集》卷20,四部丛刊景宋写本。

[4]上引《咸淳临安志》卷5,叶28-29。

[5]上引《咸淳临安志》卷75,叶14。

[6]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5,叶30。此诗句为《梦梁录》《两宋名贤小集》等收录。

[7]同上引《咸淳临安志》卷33,叶5、叶8。

[8]即桌子。

[9]《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送终”条,中华书局,1997年,页143。问书周密还注意到回回历法与汉地不同,见同书“别集上”,“回回无闰月”条,页254。

宋后之事。周密的记载显示，元代聚景园尚不是回回“公墓”，似为私人所有。这里有一位墓园“园主”。回回人善经营，在占有聚景园之后的数十年间，墓园管理有序。“赁地有常价”，建墓“所用砖灰，园主皆有之”，逝者家人只需“以钞市之”。

聚景园回回墓地一直保存到清代。清徐逢吉《清波小志聚景园》记曰：“今则为番回埋骨之地。”同书“柳浪闻莺”条记载：“柳浪港在聚景园后”，“左右皆番回冢墓”。

聚景园今地当为今杭州清波门外柳浪闻莺一带，是西湖风景最胜处。据鲍志成先生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在聚景园曾出土过回民墓碑1万余方，惜在“文化大革命”中悉遭破坏。仅有70余方阿拉伯文墓碑的拓片被保留下来。”〔1〕

明田汝成提到，当时的“保信巷，一名保宁巷，南通‘回回坟’”。〔2〕“保信巷”也是宋时地名，位于里仁坊北，“俗呼剪刀股巷”。〔3〕这里距清波门外聚景园尚远，故其南的“回回坟”可能是另一处穆斯林墓葬区，亦有可能是元时也里可温或术忽人的墓葬区。

（原刊于《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2001年，页14-23。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鲍志成先生在2000年8月天津举行的马可波罗学术讨论会上，曾向笔者出示了他所收藏的数十幅阿拉伯文墓碑拓片照片。

〔2〕上引《西湖游览志》卷14，叶8a。

〔3〕上引《咸淳临安志》卷19，叶11。

14 《大兴国寺记》的作者梁相其人

中外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与元代聂思脱里教的学者，多在其著述提到马可波罗在扬州时的友人，镇江路的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Mar Särgis）。有关此人最集中的史料是《大兴国寺记》，其全文已佚，但其详义保留在《至顺镇江志》中。根据此志文，我们知道，马薛里吉思是薛迷思贤人，也里可温教徒。在镇江期间，曾利用职权在当地修建了6所教堂，另外还在杭州建了一所。《大兴国寺记》的作者是时任镇江路儒学教授的梁相。关于此人的来历，笔者见闻范围内，尚未见有论著提及，故以平时扒梳史料为据，草成此文，以求教方家。

14.1 就任镇江儒学教授的时间

《至顺镇江志》记梁相为儒学教授。同书卷17"教授"条收有镇江教授韩祺所作《题名记》，曰：

> 至顺三年（1332）四月教授韩祺作题名记，曰：学校设官有教焉，所以尊经而明圣人之道有养焉，所以育才而为国家之用，岂徒历资格求仕进云尔哉！京口学官题名，始宋庆元至德祐。国朝混一区宇近六十年而阙焉不载。祺[1]叨领学事三载，考文献而得其详，乃以姓名、岁月寿诸石，以俟夫后之来者，有曰：某也食焉而怠其事，某也忠焉而尽厥职，庶有劝于观感之间云。
>
> 涂幼度字移愚，龙兴人，咸淳甲戌至，至元十四年改除。盛际字舜咨，杭州人，至元十四年至。林桂发字德馨，杭州人，将仕郎，至元十五年至。荀籍淮安人，至元二十三年至。昌士气字养浩，宁

[1]即韩祺。

国人,宋进士,至元二十六年至。徐硕字德甫,嘉兴人,至元二十九年至。黄一龙永嘉人,元贞元年至。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顾岩寿字子静,镇江人大德五年十二月至。[1]

据此记载,梁相的字为必大,杭州人。其至镇江就任儒学教授的时间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而其继任者顾岩寿接任的时间为大德五年十二月。查大德二年十二月始于1299年1月4日,终于同年2月2日。大德五年十二月始于1302年1月4日,终于同年1月29日。所以说梁相在镇江任儒学教授学三年的时间为1299年初至1302年初。《大兴国寺记》亦应写于此间。

14.2 参与月泉吟社活动

——宋遗民的立场

宋亡后,原来的官僚体制瓦解,许多士人失去官职。其中不少人因无官职而变得清闲。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地区有宋遗民组织起诗社,其

〔1〕《至顺镇江志》,卷17。

中著名者为“月泉吟社”，其发起者为吴渭。黄灏《月泉吟社序》[1]对此记曰：

浦江吴渭，字清翁，号潜斋。宋时尝为义乌令，元初退食于吴

[1]有关吴渭发起的月泉吟社，可查得以下几则史料：

〔明〕高儒(藏并撰)《百川书志》：“《月泉吟社》一卷，故宋浦阳盟诗，潜斋吴渭清翁着集立社，开科誓盟拔萃，往复编章，共成胜集也。”——卷19集，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明〕徐树丕撰《识小录》：“月泉吟社丧乱之后，朋友之欢断绝几十年矣。乙未(1295)春日，同社李灌溪、姚文初倡为假年聚。聚者避此日社事之滥也。假年者，取学易之意。自非五十者不得人，于是聚三十年文章。坛坫之友，仅得二十余人。每聚拟四题。八月一题，为月泉吟社乃无。初丙戌(1286)、丁亥(1287)间，隐逸诸君各赋田园杂兴五、七言诗也。其主者为吴溪吴渭，号潜溪，字清翁，在宋曾为义乌令，因鼎革退食于家。而方韶父、谢翱羽、吴思齐俱自远来，为之评较，赏揭社中。一时来投诗者三千七百人，选中二百七十人，而刻诗者仅六十人。其六十人各赏缣墨笔有差，有四六启送，并谢启真，一时嘉话，今人不逮古人，自不必言，而一段好事风流，亦不复见矣。”——卷3，民国涵芬楼秘籍影稿本。

〔明〕李诩撰《戒庵老人漫笔》：“胜国季年，东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诗社，聘有诗名者为主试，如科举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吴公渭以故宋义乌知县，解组家食，延致乡遗老方公凤、谢公翱、吴公思齐主于家，开社命题，鉴别高下，榜示褒赏，诚一时之胜举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稽考云。月泉吟社，浦阳盟诗，潜斋吴渭清翁。本社预于小春月望命题，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请诸处吟社，用好纸楷书，以便誊副，而免于差舛，明书州里姓号，以便供赏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来(问)[向?]浦江县西地名，前吴吴知县渭对面交卷，守回标照应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月泉吴渭拜手书，时元之前至元二十四年也。”——卷6，明万历三十四年李铨前书楼刻藏说小萃十集本，〔清〕唐翰题，李葆恂、吴重熹跋。

溪，延致乡遗老方韶父[1]与闽谢皋羽、[2]吴思齐[3]主于家，始作月

[1]方韶父为宋元之际著名文士，与当时许多文人有唱和。[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中有其小传《容洲文学方韶父凤》："方凤，字韶父浦江人，有异材，遍交海内知名士。以族子任试国子监，举礼部，不中第。后以特恩授客州文学。未几宋亡，凤遂绝意仕，进益肆为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过东瓯海上，悼天堑之不守，顾翠华以无从，顾盻徘徊，老泪如霰。凤善诗，通毛郑二家言，晚遂一发于咏歌，音调凄切，不胜黍离之悲。临没嘱其子樗曰：'吾死可题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宋末文弊，凤颇厌之。尝谓学看曰：文章必真实中正，方能不朽，否则当与东华尘土俱尽。所著诗三千余篇，曰《存雅堂稿》，行于世。"——卷43，风节，明天启元年徐氏光碧堂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宋濂《浦阳人物记》所记稍详："方凤一名景山，字韶父……凤有异材，常出游杭都，尽交海内知名士。将作监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试国子监举，上礼部，不中第。主合门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与丞相陈宜中为亲舅弟，凤因得见宜中，三以策告，宜中虽不能听，将奏补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寝。后以特恩授容州文学，未几宋亡，凤自是无仕志，益肆为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过东瓯海上，类皆悼天堑不守，翠华无从，顾盻徘澶，老泪如霰。一日复游杭，有人自海上来，见凤伏地泣，起相抱持。凤问故，则曰予大登也，自从陈丞相乞师南海，不得还，遂为暹国臣。暹盖古者文单盘越属国，泛大海至泉南始达岸。今为其奉使上国，重过丞相故府，无一人一马可识，不意复得见先生也。言讫泣下，凤亦泣，因欲俱，行人劝止之。凤善诗，通毛、郑二家言，晚遂一发于咏歌，音调凄凉，深于古今之感，临没犹(属)[嘱]其子樗题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凤颇厌之，尝谓学者曰：文章必真实中正，方可传，他则腐烂漫漶，当与东华尘土俱尽已，而言果验。性不喜佛老，读唐傅奕　壮其为人自摭奕后辟异教者数十事，以拟高识篇，题之曰正人心书，尚未完。他所著诗三千余篇，曰《存雅堂稿》。樗字寿父，亦精于诗，无愧于凤云。"——卷下，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2]徐燏《高贤传》："谢翱，字皋羽，福安人，咸淳初试进士，不第。作《宋祖铙歌曲》，上太常乐工习之，至今传其词。尝参文信国军事。及宋亡，信国被执死，挟酒登钓台设信国主，再拜伏酹，恸者三，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然其志汗漫超越，独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门、候潮、沃洲、天姥、野霞、碧鸡、四明、金华，所至即造游，昼夜吟诗不休。直遡唐风，精炼奇警，不作宋人陈言。文尤峭劲有法。当其执笔时，瞑目遐思身俱，天地俱忘，曰：'用志不分。鬼神将避之。'故思益苦，而句益工。尝与邓牧、方凤为、方外友，扁会所曰'汐社'，期晚而信也。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略如科举之法。浦江潜斋吴渭月泉吟社，实翱为考官，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首取杭清吟社。罗公福乃闽三山人，其诗名见重于时，如此年四十七卒，无子，葬白云村许剑之地，以诗文稿殉。杨太史用修称其诗如长吉复生，真实录也。后人并严羽目，为严谢两先生云。"——[宋]谢翱撰：《晞发集》卷10，明万历四十六年郭鸣琳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董应举《祭谢皋羽文》：万历甲寅秋八月初五日，乡晚生董某以赴吏部稽勋司郎中之任，便道严滩拜严先生祠下。问于土人，得吾乡皋羽谢先生葬处，敬飞棹上谒。呜呼！先生故宋长溪一布衣也，痛胡元沦覆宗国，勉应丞相，辟为佐军谋。丞相败而宋亡矣，先生哭至死。某读先生集，以为夷齐三千载下，惟先生一人耳。先生葬处名白云源与钓台对峙。严先生善钓，先生善哭，其节义亦相敌。严先生遭光武，汉至复完，故可以钓。先生遭宋季，社稷已屋麦秀之，悲怆于心目，故不得不哭。哭悲而钓乐，亦其时然也。先生为宗国死，为故人死，死则死耳，骨则千载犹存。丞相柴市，先生云源，忠魂义魄贯日月而凌宇宙矣。"——[宋]谢翱撰：《晞发集》卷10，明万历四十六年郭鸣琳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3]宋濂说："思齐则陈亮外曾孙"。——《浦阳人物记》卷下，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泉吟社，四方吟士从之。三子者乃为其评较揭赏云。又送诗赏小札序。月泉社吴清翁盟诗预于丙戌(1286，至元二十三年)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1287，至元二十四年)正月望日牧卷月终结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公服罗一缣七丈，笔五贴，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罗一缣六丈，笔四贴，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罗一缣五丈，笔三贴，墨三笏。第四名止第十名。春衫罗一缣，笔二贴，墨二笏。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缣，笔一贴，墨一笏。第二十一名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缣，笔一贴。第三十一名止五十名，各笔一贴，墨一笏，吟笺二沓。[1]

这里说的是，原宋义乌县令吴渭延请乡人方韶夫与福建人谢皋羽、吴思齐至其家，建立了月泉吟社，征集亡宋士人的诗作，举行赛诗活动，诗作要求以春日田园杂兴为主题。宋遗民闻讯后，纷纷贡献诗作。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诗社共收到诗作2700余卷。吴渭邀请方韶父、谢皋羽、吴思齐3人，花费一个半月的时间来评判诗作质量的高低。他们3人从收到的作品中选出280人评为优秀，可见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在中奖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梁相先托名高宇参加赛诗，被评选为第3名。其入选的诗作为：

“膏雨初晴布谷啼，村村景物正熙熙。谁知农圃无穷乐，自与莺花有旧期。

彭泽归来惟种柳，石湖老去最能诗。桃红李白新秧绿，问着东风总不知。”[2]

担任评判的方韶父、谢皋羽、吴思齐3人评曰“前联妙于纽合，后联引陶范，不为事缚，句法更高。末借言杂兴的是老手。”[3]按照诗社发起人吴渭的约定，第3名获得的奖品为“公服罗一缣五丈，笔三贴，墨三笏。”值得注意的是，梁相在递交了自己的作品之后，并未坐等评判，而

[1]〔清〕厉鹗撰：《宋诗纪事》卷81，四库本。

[2]〔宋〕吴渭撰：《月泉吟社》，四库本。

[3]〔宋〕吴渭撰：《月泉吟社》，四库本。

是再次化名魏子又提交了一次诗作,曰:

"麦畴连草色,蔬径带芜痕。布谷叫残雨,杏花开半村。

吾生老农圃,世事付儿孙。但遇芳菲景,高歌酒满尊。"[1]

上述3位文人对此诗的评语是:"前四句咏题,后乃述意。末二句亦不离春兴,格韵甚高,五言中未易多得。"此次提交的诗作也被评为优秀,因而排名第13。按上述诗社发起人的约定,名次在第11名至第20名之彰者,可获"深衣布一缣,笔一贴,墨一笏"。由此可知梁相有相当高的文才。

梁相化名向诗社提供诗作之事,曾引起过后人的怀疑。清人全祖望在其《跋月泉吟社后》中提到:"其间有可疑者:第三名高宇为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会梁必大。"[2]如果说参加月泉吟社活动时梁相还与那些拒不仕元的亡宋士人一起持抵制元朝的立场的话,那么就任镇江路镇江儒学教授则表明他已经放弃这一立场。那么,梁相为何要放弃拒元的立场呢?

14.3 在江西庐山的踪迹
——镇江儒学教授之前的任职经历

有迹象表明,后来梁必大离开浙江,前往江西。在此期间,他曾与宋遗民徐瑞[3]一起出游芝山寺,并登临五峰亭。芝山寺位于今江西省波阳县城西部北廓之芝山主峰,建于唐代龙朔年(661—663),以饶州刺

[1]〔宋〕吴渭撰:《月泉吟社》,四库本。

[2]〔清〕全祖望撰:《鲒埼亭集外编》卷34,清嘉庆十六年刻本,〔清〕臧镛批点,缪荃孙录,〔清〕严元照校并记,现藏上海图书馆。

[3]〔元〕徐瑞松《巢漫稿》1:"公讳瑞,字山玉,松巢其号也。……公生于宋宝祐甲寅(1254?)十二月(1254年12月21日—1255年1月21日)。咸淳间(1265—1274)曾如杭应举,不第。遂以科举之习,功名之念,夺人清思,不复认以为真。曾作《自省诗》。今以家传所载考之,盖伤宋之亡于帝昺也。迨元延祐丁已(1317)以公经明行修,推为本邑书院山长。未几,归隐于家,巢居松下,花晨月夕,随所赋逐年笔记之。时来郡城,则与三五诗友觥筹交错于东湖、芝山之间,更相唱和,亦无虚日。所著则《松巢漫稿》,卒年七十一。"——见〔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6,四库本。〔元〕吴存:《乐庵遗稿》收有《祭徐松巢》,见《鄱阳五家集》卷5。

史在此采集灵芝草而得名，今为庐山诸景之一。五峰，即今之庐山五老峰。徐瑞松记道：

壬辰[1]社日，芳洲[2]领客梁必大、汤景文、[3]吴德昭、[4]吴仲

---

〔1〕1292年，即至元二十八年。此时间与以下所引〔元〕徐瑞松《巢漫稿》中"故友汤景文别六年"恰相对应。

〔2〕即黎廷瑞。〔宋〕马廷鸾《题芳洲诗集》："芳洲黎君，先朝名进士也。既屈于时，益昌其诗。古诗近陈子昂感遇，绝句可杂半山诗。"——《碧梧玩芳集》，卷24，民国豫章丛书本。

〔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记："公讳廷瑞，字祥仲，生而颖拔，日诵数千言，即了大义。少长闻乐平谨斋吴公中守、准轩吴公中行，以双峯饶子之学讲道于龙湖，公蹑屩从之，深契旨要，由是为文，一宿于理。咸淳庚午(1270)……刑部侍郎方公逢辰，殿中侍御史曾公渊子，见公所为文，贯穿出入，沈鬱典据，意必老于场屋者，及谒谢使之年，曰：某甲生二十又二年矣，皆叹息久之。绍陵亲　，赐同进士出身，授廸功郎，肇庆府司法参军，需次未上。癸酉(1273)丁外艰，家贫资束脯以给葬，服平将调，玉改鼎移，幽居十稔，以文墨自娱，种梅艺菊，雅意丘壑。而北方士大夫之来南者，闻公名莫不愿见。既见，欢如平生。竹庵奥屯公希鲁，疏斋卢公挚，竹居姚公炖廉问之，日以歌诗乐府相唱答。竹庵巡行郡属，必与公同行，所至击强锄奸，如雷霆风雨，咸谓神明，公盖有力焉。至元丙戌(1286)，按察副使五善王公懋至番，会郡博士久疾不任职，诸生以请。王公檄公摄教事。公始出，受事宾礼，耆英激扬，后进佩衿，爼豆彬彬，有承平风。时有以学校羡利言于朝者，上命有司程出内吏，率刻急析及秋毫，列郡文学至破产以偿不给.公独从容酬应，不辱色辞。多士困于役，公每至公府，力争之，不申其说不止。自丙戌(1286)至庚寅(1290)，凡五载，改创采芹宫、爱莲亭，葺尊经阁不一事。尝种竹阁下，纪之以诗。比代去绿色猗猗光照几席。公于是有遗爱矣。异时右辖五峰燕公公楠，知公最深，以公姓名剡上。公语其人曰：阿婆老矣，吾菽水温清，惟日不足，而暇从人间事乎，卒不报。始治第于先庐之南，虚中堂以奉春晖。晚取居易俟命之义，更号俟庵。弹琴著书，高歌永啸，洞视今古，意气浩然。自赋闲居三乐，曰读书，曰会友，曰游山。其言淡而不厌，净而不污，趣尚远矣。太夫人终，公哀瘠殊甚，饘粥未食，焦劳旦暮。逮葬，须发顿白。公生平倜傥豪逸，雅慕李太白、杜牧之为人。所友皆四方名胜士，居家常致千里外客。客至，不问家有无，必延欵，弥日谈笑竟夕。有急赴之，必为尽力。无德色或负之，亦终身不复言。为文必黜百家，崇孔氏。以韩子为宗，尤酷嗜欧阳子。不用奇字生语，而幽然之光，苍然之色，绝出笔墨畦径外。诗尤神解，自成一家，驰骋唐宋以还，深入陶谢之室，气韵雄浑，趣味深永，盖不独专美一时矣。至大元年戊申(1308)夏，公卒。余干养吾李先生谨思，以书语吴仲退曰：悲哉！辛未(1271)以后，出语天拔，不烦　削，而自合有如斯人者乎！胡文友愕有诗曰：鄱阳四月十一日，优钵昙花枯一株。二公之叹，盖皆为斯文叹也。"——卷1，〔宋〕黎廷瑞《芳洲集》1。

〔3〕〔元〕李存《逢原汤先生哀辞》记：

"先生讳深，字造道，一字景文，姓汤氏，世为番易安仁人。宋尚书文清公汉，其从兄也。入国朝，故家多零替，先生独力学，支拄倾压，书无所不读，尤长于诗歌。不务为葩华弄玩，倨怪隅角，往往肆而严，槁而腴，人读之多淡口不好也。唯同郡黎君仲祥，首称赏之，以为必传。尝一游京师，历燕赵齐鲁之墟，然卒无相知者，遂教授乡里，未尝一漫迹城市。虽贫，气度恒恢如也。姻友

（注释〔3-5〕转下页）

退、[1]李思宣、[2]周南翁[3]游芝山寺，登五峰亭，瑞在其间。羽士洪和、叟方君用载酒来会。以“云飞江外去，花落入城来”分韵赋诗，瑞得江字。[4]

按其所记，梁必大在江西也参加了一个诗社，并有固定的“社日”，即活动日。此次游庐山便是梁必大在该社“社日”中，与诗社诸友共同组织的一次郊游。参加此次郊游的各位文人在五老峰亭各按所分得的韵作诗。梁相在此次社日的诗作已经不存，而我们可知的是徐瑞分得的江字韵，作诗如下：

(接上页注释〔3-5〕)

过，从必百计具酒食，与尽欢乃已。见童子，亦渠渠谨至。人有不善，心屏之如秽污。晚乃甚好方士者术，为符咒。人有患难，若已有之。至大元年(1308)九月，得肺气病，存往候先生喜整巾衣杖而出，抱桉谓存曰：‘闻子好古文，吾志之心久矣。今病不可以论，幸而好，当与子细熟之，越七日竟卒。”——《俟庵集》卷23，李存：《俟庵集》，明永乐三年李光刻本。

〔元〕徐瑞松《巢漫稿》：“故友汤景文别六年，乃十月廿一寻我松下。临别见赠，次韵奉答。丁酉(1297)。汤名琛，东涧公从弟。占气频翘首，青牛忽度关。相看双眼碧，剧论寸心丹。时俗容迟钝，交情见往还。盟言天为听，万一莫辞难。景文与瑞有读书山间，寻真方外之约。”见〔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7，四库本。其中“别六年”语与前引徐瑞松“壬辰(1292)社日”众人共游五老峰可相映证。

〔4〕此人待考。

〔5〕危素《吴仲退先生墓表》：“先生讳存仲退其字也……生于宝祐五年(1253)二月。少力学，有卓识，以童子试有司。乡先生吴公中行、李公谨思，皆折行辈交，俊声四驰。国初部使者姚公燧、卢公热、奥屯公希鲁行郡至番，□勉之出仕，而先生不答。延祐初设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请试，先生固辞。已而县牒上府，无先生名。太守□公桓怪之，曰：‘无吴先生名，何耶？’知事刘衍往见，谕太守意，强起先生，卒以尚书中选，年五十有九矣。试礼部不利，诸公贵人，交章荐用，先生以即日去国。寻以恩授饶州路儒学正，恥任不及代而归，啸歌月湾溪上。自□月湾渔者，调宁国路儒学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老不欲往，请者狎至，乃往。宪使李公元成，公往一见，喜得师，尊礼极至。未几，告引年，不许，乃大尽。吴某致仕于门，去之。明年，授将仕左郎，饶州路番易县主簿致仕。又七年，江西行省乡试，聘为主文。至元五年(1339?)九月某日终于家，春秋八十有五，葬以至正五年(1345?)有二月。”——《危学士全集》卷12，志铭，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1〕元人戴表元为李思宣写过墓志，其中曰：“君讳洙，字思宣。李氏饶浮梁人……当至元甲午(三十一年，1294)，以荐上江浙中书行署，板授饶学正。又四年，考满诣吏部格，当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1299?)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 戴表元：《李思宣墓志铭》，《剡源集》卷17，墓表墓碣，四部丛刊景明本。

〔2〕周南翁，元代著名文人。

〔3〕〔元〕徐瑞松：《巢漫稿》3，兹据〔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8，四库本。

昔我落城市，日厌尘满腔。携书归故山，三年师老庞。

兴来复此游，名胜萃一邦。东风三日雨，孤吟倚篷窗。

晴天淡新碧，扶藜度危矼。同袍二三子，声应不待撞。

意行得古寺，共寻葛藤桩。天风鸣佩环，冉冉白鹤双。

坐看庐山云，大醑倾酒缸。欲去复裴徊，返照明春江。[1]

黎廷瑞也提到了一次与梁必大一起出游芝山五峰亭，他所记录的同游者中，有名徐山玉者，即前述之徐瑞松，其余五人汤景文、吴昭德、吴仲退、李思宣、周南翁均出现在前述徐瑞的诗序中，同游者完全相同，可见两人所记的是同一次社日出游。其所记如下：

春社同梁必大、汤景文、徐山玉、吴昭德、吴仲退、李思宣、周南翁饮芝山五峯亭。二羽士来会，以范文正公"云飞过江去，花落大城东"分韵得云字。[2]

由此可知，梁必大参加的诗社名曰"春社"，在诸人分韵时，黎廷瑞分得"云"字韵，他所作诗为：

戊雨敷雉甲，午晴沉幽薰。时迈足永慨，景舒聊暂忻。

联展得英彦，携壶出尘氛。亦有丹丘客，共眺青山云。

芝空石磊磊，华落川沄沄。代远吊残栢，吅劳念遗枌。

吾生竟何如，兹饮又及曛。萍流岂易合，星聚还当分。

深忧怆范老，长谣唁庐君。邂逅有千载，宁无感斯文。[3]

值得注意的是黎廷瑞还有一首诗，题为《送梁必大归杭省亲》。"省亲"说明梁必大在江西系因出任"文学椽"之职，其文曰：

楚水送梁子也。梁子为楚文学椽，[4]将归觐亲，其友念别，故作是诗以送之。

悠悠楚水，霭霭吴云。孰作之合，胡然而分。

岂无良朋，我独子忻。于穆令德，有粲其文。

[1]〔元〕徐瑞松：《巢漫稿》3，兹据〔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8，四库本。

[2]〔宋〕黎廷瑞：《芳洲集》，兹据〔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2，四库本。

[3]〔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2，四库本。

[4]汉代郡国置文学椽，唐于郡置经学博士，此处指元儒学教授。

吴云霭霭，楚水悠悠。眷念庭闱，道阻且修。

为贫而仕，匪食孰求。曷不偕来，以解尔忧。

瞻彼日月，有望有弦。慨彼中年，别友实难。

有芹于池，有芝于山。式遄其归，勿远其还。[1]

其中“为贫而仕，匪食孰求”一句透露出宋亡后梁必大身陷窘境，不得已而为稻粱谋，选择仕元。联系到曾两次化名向月吟诗社投寄诗稿参加赛诗，我们推测他有可能不仅仅是为文人雅兴，而是为社主所设丰厚奖品所吸引。根据黎廷瑞的诗《梁必大归自燕山有诗问讯以诗答之》，梁相在江西任职期间，或任职之后，还曾赴大都，其诗云：

折柳空惊岁月徂，寄梅欲忆雪霜余。君看天上烟花绕，我伴山中木石俱。

婚媾骎骎难辨老，友朋往往不如初。极思一见论心事，城府年来迹渐疏。[2]

从他“我伴山中木石俱”的诗句看，黎廷瑞一直未仕元，但他却对已经仕元，且有机会赴燕京“看天上烟花绕”的梁相保持着友谊，“极思一见论心事”。

从时间上判断，在江西任儒学教授一职当在他赴镇江就职之前，因此，镇江路儒学教授并非梁相出任的第一个元职。

14.4 在镇江任职期间的活动与思想

大德二年至五年梁相在任期间，曾有一次友人同游金山与焦山，并有诗歌唱和。梁相所作之《金焦行》，据笔者见闻所及，业已不存，但其他友人的和诗有几首传世。如张道元的《金焦行次梁必大韵》：

二山砥柱江流中，下有水府之幽宫。巨灵设此天险重，怒涛欲起两伏龙。

山光对面山淡浓，朝暮云起相过从。钟声两样飘江风，撞惊大

[1]〔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1，四库本。

[2]〔清〕史简编：《鄱阳五家集》卷2，四库本。

梦醒尘胸。

海门茫茫直其东，江山第一丽且雄。六朝形胜留遗踪，天荒地老代不同。

登临此地阅几翁，公独硬语盘高穹。

长江滔滔去不已，千古名山占萧寺。白发印公心水止，嗟予劳生竟何似。

入门平地风波起，谁能钓舟烟波里。千年间限铁台址，不如流芳向文字。

州县之职徒劳耳，丈夫封侯待时至。以道事人直如矢，岂但?歌化州里。

人兮山兮有如此，我愿学者梁夫子。[1]

从“州县之职徒劳耳，丈夫封侯待时至”可了解到，梁相与其友人都认为镇江儒学教授这类“州县之职”不过是“徒劳”而已，他们在同游中甚至还言及政治抱负，希望有“封侯”之日。参加此次出游的友人中还有费震，他所作的和诗《次梁必大金焦行》为：

太仓一米粱魏中，梵王坐处如天宫。砗磲玛瑙珊瑚重，护法更有诸天龙。

醍醐浮香甘露浓，我欲问讯当何从。惟有一席西津风，快哉八九云梦胸。

海门直指扶桑东，金鳌两角争豪雄。蒜山房客送墨踪，妙高千偈佛印同。

衲衣玉带知何在，至今诗句撑苍穹。

江山如画人往已，云霾浪打寺复寺。华阳真逸曾至止，鹤铭笔法兰亭似。

老纶败壁扶不起，沙户祈蚕修竹里。处士蜗牛空旧址，留得名山作焦字。

年来俗事怕到耳，神尻气舆随所至。从渠乌兔走如矢，白云之乡吾故里。

〔1〕〔清〕厉鹗撰：《宋诗纪事》卷60，四库本。此诗录自《金山志略》。

桑榆斥鷃安识此，大鹏逍遥问庄子。[1]

此诗中"桑榆斥鷃安识此，大鹏逍遥问庄子"一名，表明梁相虽然任职不过儒学教授，但却不满足于此，仍暗怀抱负。还有一位文人金遁初，其诗作《金山行次梁必大韵》说明他也参加此次出游。其诗云：

江吞淮楚通吴中，深有万丈天吴宫。珠楼贝阙知几重，鱼首人面赤如龙。

紫云赫奕青霞浓，天地下降百神从。蛟鲸无端怒生风，敕移三山填其胸。

日缠月纬分西东，戴鳌方知策强雄。马尘辙迹绝游踪，仙境真与蓬莱同。

千涛万浪插两峰，屹然对拱摩层穹。

金山蜿蜒势未已，焦山萦回藏古寺。大觉仙所庐圣止，人间尽图那得似。

镜铜摩青鸟飞起，浮屠倒影澄波里。六朝陵阙存故址，百战功名数衍字。

相去清风片□[帆][2]耳，此身未游心已至。君诗到手破的矢，我诗刻画惭下里。

三分之句岂辩此，举杯一酹问苏子。[3]

清代陈衍在《元诗纪事》中提到"梁相，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末官

[1][清]厉鹗撰:《宋诗纪事》卷60，四库本。此诗录自《金山志略》。

[2]据[清]厉鹗《宋诗纪事》卷60所录诗文补，四库本。

[3][明]张莱撰:《京口三山志》，卷6，明正德七年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宋诗记事》从《金山志》中抄录此诗的文本与此略有变化：

江春淮水通吴中，深有万丈天吴官。珠楼贝阙知几重，鱼身人面赤如龙。

紫云赫奕青霞浓，天帝下降百神从。鲛鲸无端怒生风，敕移三山填其胸。

日躔月纬分西东，戴鳌方知策强雄。马尘辙迹绝游踪，仙境直与蓬莱同。

千涛万浪插两峰，屹然对拱摩层穹。

金山蜿蜒势未已，焦山萦回藏古寺。大觉仙圣所庐止，人间画图那得似。

镜铜摩青鸟飞起，浮图倒影澄波里。六朝陵阙存故址，百战功名数行字。

相去清风半帆耳，此身未游心已至。君诗到手破的矢，我诗刻画惭下里。

三分之句岂办此，举杯一酹问苏子。

绍兴路儒学教授。”[1]可见他结束在镇江的任事后，到了绍兴。

梁相与吴澄有交往，吴澄曾写送别诗：

《送梁必大知事之婺州》

一见何仓卒，相闻已岁年。东州文献后，南国俊髦先。

士诧苏湖教，郡须岑范贤。赞谋倘余暇，为访牧羊仙[2]

可见梁相后来又到了婺州。

（原刊于《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页830–837。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1]〔清〕陈衍辑：《元诗纪事》卷5，清光绪铅印本，现藏浙江图书馆。

[2]《吴文正公集》，卷93，四库本。

15 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

阿合马被列为奸臣。明洪武初宋濂等受命编《元史》时,据“古之为史者,善恶备书,所以示劝惩”的原则,拟“仿孔子修《春秋》,于乱臣贼子之事,无不具载”例,为“戒为恶者,使知所惧而不敢肆焉”。他们修《元史》时所据“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臣逐“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1]将所汇集的《阿合马传》列于《奸臣传》中。

《元史·阿合马传》云:“阿合马,回纥人也。不知其所进。”[2]可见明初宋濂等修《元史》时,所据之史料已无阿合马身世的记载,故一般研究阿合马的论文多只提及他仕进以后的经历。阿合马是元初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除汉籍以外,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中也提到过他。这些记载成为本研究的基础。

据《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记载,阿合马(Ahmad)是中亚费纳克忒城(Fīnākat)人。[3] Fīnākat又写作Bīnākat、Binkat,帖木儿在位时代为纪念其子沙哈鲁(Šāhrukh)诞生,改名为沙鹿海牙(Šāhrukhqaya),意为“沙哈鲁峭崖”。沙哈鲁为帖木儿之子。其废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首

〔1〕《元史》卷205《奸臣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4557。

〔2〕《元史》卷205《阿合马传》,页4557。百衲本称“阿合马回纥人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及《世祖纪》中的几条记载,将“回纥”改为“回回”。

〔3〕拉施都丁:《史集》第2卷,马辛,卡里米博士德黑兰排印本(Rašīd al-Dīn, *Jāmi' al-Tawārīkh*, jild-i duwum, ed. M. Karīmī, Tehrān),页649(北京图书馆有藏本,藏书号01205);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2卷,1985年,商务印书馆,页340。

都塔什干(Tāškent)之西。[1]

阿合马早年侍于宏吉剌部按陈那颜府邸。[2]成吉思汗西征时，按陈那颜曾随军出征，"取回纥寻思干城"。[3]至于按陈那颜所部是否参与夺取阿合马故土费纳克忒城之战，史无明文。据波斯史家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于围攻讹答剌(Otrar)之时，分兵进攻费纳克忒，领军的将领是八邻部阿剌黑那颜(AIq Noyan)，晃忽坛族速克秃(Süyiketü)，与速勒都思部塔海(Taqay，按此名似可校正为Noqay)。[4]如果阿合马或其家族适在费那克忒，他可能就是在此时为蒙古军所俘获的。因此，阿合马(或其父辈)可能是作为花剌子模回回军队的战俘被分配给宏吉剌部的。

据拉施都丁记载，在察必嫁给忽必烈时，阿合马成为其斡耳朵中的侍从。[5]由此可见，阿合马是察必哈屯的从嫁人口。这一点对了解阿合马的身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本文的核心。

---

〔1〕该城遗址位于一片高台之上，锡尔河(Sīr Dariyā古称忽阐河)流经高台之下。河水的冲刷已使故城部分遗址塌入水中。遗址现存面积为400公顷。笔者1991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随团至其地。对于此城，明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记曰："沙鹿海牙城在撒马儿罕之东，相去五百余里，城筑小岗上，西北临山与河，河名火站(按，此小岗即城名"沙鹿海牙"中之"海牙"意为"峭崖"的来历。此城所临之火站河，即元时之忽阐河 Khujiand Dariyā)，水势冲急，架浮梁以过渡，亦有小舟，南边山近，三面平川，域广十数里，人烟繁庶，依崖而居。园林广茂"。见周连宽校注本，中华书局，页91-92。陈诚西使时曾"分人去沙鹿黑叶"，即沙鹿海牙"。参见周连宽校注本，中华书局，页44。

〔2〕《元史》卷118《特薛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15。

〔3〕拉施都丁：《史集》第2卷，马辛·卡里米博士德黑兰排印本，649页：dar waqt-i ka Čābūy Khātūn hanūz dar khāna-ye pidar bud Amīr Ahmad pīš-i īšān qurbatī dāšt "当察必哈屯还在父亲家中时阿合马就服务于其跟前。"——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2卷，页340。据《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记载，察必哈屯是宏吉剌部阿勒赤那颜之女——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2卷，页282；同样据《元史》卷114《后妃传》，察必皇后为宏吉剌部按陈那颜之女——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871。阿勒赤即按陈。

〔4〕见阿塔·马立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Atā Malik Juwainī, *Tārīkh-i Jahāngušā*)，何高济汉文译本(据J.A. Boyle英译本重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11，注(2)。

〔5〕拉施都丁：《史集》第2卷，马辛·卡里米博士德黑兰排印本，649页：wa čūn ū khātūn-i Qā'ān šud mulāzim-i urdū-yi ū mī-būd. "当她成为合罕的哈屯时，他一直是其斡耳朵的侍从。"——参见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2卷，页340。

15.1 贵族妇女的私属人口

蒙古及帖木儿时代，波斯文史料在描述草原贵族的附属人口时，经常提到一种被称为额兀·斡兀阑(ev-oγlan)的人。对于额兀·斡兀阑(ev-oγlan)，韩儒林师注曰："突厥语oghul，元代音译为斡兀立，意为男孩、男仆从。其复数形式为oghlan。波斯史家再加其本族语之复数词尾-an，即成oghlanan。"[1]换句话说，ev-oγlan为突厥语。ev，译言屋、室、宫室：oγlan，斡兀立(oγul)之古突厥语复数形式。ev-oγlan，若直译可训为"家中男孩"。

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德福在其著作《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分》中，将他所见波斯史料中出现的ev oγlan的史文辑了出来，选用史料面宽，引述规范，便于学者查找。[2]他根据所辑之史料，认为ev oγlan是贵族妇女的附属人口："ev oghlan，'王室内务方面的仆人，特别指定为汗之妃(哈屯)服务'……察合台语ev oghlani，也意为'家里的听差人'"。今摘其所录有关段落如下，以为进一步论述之基础：

> 在《史集》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本[3]页123有：az ēv ōghlānāni hātūni buzurgi Chingīz hān Börtä fūgīn īlangīz bavurchi(成吉思汗的大哈屯孛儿帖旭真的诸ev oghlan中有Ilangiz宝儿赤)。[4]

---

〔1〕韩儒林师：《成吉思汗十三翼考》，原载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期；收于韩儒林师：《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见页3-4。

〔2〕参见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unter besonderer berucksichtigung älterer Neupersischer Geschichtsquellen, vor allem der Mongolen- und Timuridenzeit*,Wiesbaden, 1965(格尔哈尔德·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份——特别注重于古时首先是蒙古时代与帖木儿朝时代新波斯语史料》，卷2，页226-227)，第675条。惜其所辑资料不够全，如后面将要提及的"十三翼之战"中之第一翼中的ev oγlan，八剌之妃那海哈屯之ev oγlan等，均未辑入。详见后。

〔3〕Труты Восточнов Отделе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о，圣彼得堡，1861年，卷7。按，即《部族志》。

〔4〕兹据波斯文译出。德福教授此句德文译为："Ilangiz宝儿赤属于成吉思汗大哈屯孛儿帖旭真的宫庭侍从"。

同书页151有：Shahse az ēv ōghlānāni hātūni Chaghatāi（察合台的哈屯的诸ēv ōghlān中的某人）。

同书页281有：ēv ōghlānāni Öljäi hātūn（完者哈屯的诸ēv ōghlān）。

在《合赞汗史》中提到，ēv ōghlānān对斡耳朵、公主（havātīn）处的每日饮食的分配负责——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贪污。

上述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德福教授关于ev-oγlan是一种与贵族女眷有密切关系的侍仆的看法是慧眼独具的。但德福并不满足于上述发现，他进一步在蒙吉语文献中寻找ev oγlan的对应词，并提出它可能是蒙古语汇gerün kö'ün（格仑可温，怯怜口）的突厥语翻译。他在《元朝秘史》232节中找出以下句子：

再 太祖 皇帝 说 宫里的官名

巴撒 成吉思合罕 呜古列论 斡儿朵因 扯儿宾

中中 舌 舌

Basa Chingis Qaγan ügülerün Ordo-jin cherbin

女行 家人每 放骆驼的行 放牛的行 宿卫

斡乞的 格仑可兀惕 帖篾额赤泥 忽客赤泥 客卜帖兀勒

舌

ökidi ger-ün kögüd temegechin-i hügechin-i kebtegül

知料着 官的房子 车子行收拾着”。[1]

把撒阿剌周 斡儿朵因格儿 帖儿格泥 阿撒剌秃孩

舌 舌 舌 舌 中

basa γalazu ordu-jin ger tergen-iasaratu γai

其后总译为：“成吉思再说，内里的扯儿必官，并放头口的、宿卫的知料着；内里的房子、车辆……只问他要”。意即，“成吉思汗再命令道：宫由里的女性侍从官（扯儿宾）、家人们（怯怜口每）、牧驼人、牧牛人由

［1］拉丁字转写据《元朝秘史》乌兰巴托刊印本，页665-667。

宿卫管理……。"

在上引《秘史》的句子中,虽然怯怜口(家人)与女侍从并列,但并看不出他们与贵族女眷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关系。笔者以为,德福关于ev-oghlan可能是突厥语中"怯怜口"这个蒙古词的对应词的看法根据是不充分的。怯怜口是诸王、贵戚的私属人口,其意义较之专为贵族女眷服务的ev-oghlan要更为广泛一些。但德福关于ev oghlan是后妃私属人口的解释是有启发意义的。下面再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15.2 从嫁人

在《史集·部族志》有关那牙勤、兀鲁兀惕和忙兀部的记载中,拉施都丁提到过一件重要的事情,即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妃子、克烈部贵族札合绀孛的女儿亦巴合(abiqa)别姬赐给自己的怯薛怯台那颜。《部族志》在描述此事时提到:

dar ūrdū khātūnī būda, Ebiqa biki nām, dukhtar-i Jākambū. wa bā khātūn gufta kī 'man paiwasta bā tū nīk būda-am wa az tū hič badī wa khiyānī na-dīda-am. īn dum khwābī dīdam wa khudā-i ta'ālī farmūd kī tu-rā ba-bakhšam bāyad. kī dil-i bad na-kunī'. wa āwāz dāda kī 'dar bīrūn kīst?' Kihtī Nūyān ka dar Kizīk būd jawāb dāda kī 'man-am'.ū-rā ba-andarūn khwānda wa gufta kī 'īn khātūn-rā ba-tū ba-bakhšīd-am. ū-rā bas-tān.' Kihtī az ān qaziyah ba-ghāyat tarsīda ast. Jīnkkīz Khān ū-rā tasllī dāda wa gufta ki 'ma-tars! ka īn sukhan-i rāst mī-gū-īm.' wa ba khātūn gufta kī 'īk bāwarjī nam-i ū...... wa fulān kāsa-yi zarrīn ka man ba-dān qimīz mī-khūrd-am jihat yādgār ba-man ba-guzār'. wa bāqī-yi tamāmat: urdū wa ev-oghlānān wa kheil wa khašam wa khazā-in wa galla wa rama tamāmat ba-khātūn dād wa ū-rā ba-Kihtī Nūyān bakhšīd.[1]在斡耳朵里曾有一位哈屯,名亦巴合别姬,乃札绀不之女。他对[这位]哈屯

[1]《史集》第1卷第1册,莫斯科波斯文合校本,页516-517;汉译本,页305。

曾说道："我与你始终很好，且自你那里什么坏事也未见过。长生天（khudā-yi ta'ā lī）下旨道：应将你送人。你不要生气。"他呼道："是谁在外[值守]？"在怯薛中的怯台那颜回答道："是我。"[他]把他叫进[屋]并说："我把这位哈屯送给你。她对你足够了（ū-rā bas-tān）。"怯台对此事非常恐惧。成吉思汗安慰他道："别害怕！我说的这些是真话。"[他]对哈屯说："把一位名曰……的宝儿赤和我用来喝马奶酒的那只金杯子为作为纪念留下来吧！"余下的一切：斡耳朵、ev-oghlan们、[1]家人们和奴仆、财物、马群和畜群全部给了哈屯，并将她赐给了怯台那颜。

据拉施都丁上述记载，随同亦巴合别姬改嫁到兀鲁兀忒部怯台那颜家中的，有族人、ev oghlan、属下、奴仆等等。俄译者在页下注中说，在《史集》俄译本第4卷（注释）中对此词有解释，惜手中无此书，无从查证。同一件事，在《成吉思汗纪》中的记载为："在某一个晚上，他（成吉思汗）忽然做了梦，于是把她（亦巴合哈敦[2]16）给了一个当晚在怯薛中的兀鲁兀惕部的异密怯台那颜，并连同"她所拥有的所有族人、ev-oghlan们、侍从、畜群和金银财宝，除了一个厨子及他喝马奶的一只金碗被他留作纪念外，全部同那位哈屯一起赐给了上述那位大臣"。[3]

同一事件在《元朝秘史》第208节中亦有记载，其文曰：

太祖 皇帝 夫人名行 人名行 恩赐着 与时……

成吉思 合罕 亦巴(合)别乞宜 主儿扯歹耶 莎余儿合周 斡古仑……

中　　　　中　　　　中　　　　舌

舌

Chingis Qaγan Ibaγa Beki-jiZürchedei-(j)e sojurγazu ögürün……

[1]余大钧汉译本译为"侍从"。

[2]按，汉译本音译为阿必合别姬。

[3]《史集》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226–227：nāgāh šabī khwābi dīd wa ū-rā ba-amīrī ka ān-šab dar Kizīk būd bakhshīd, nam-i ū Kihtī nūyān az qawm-i Urūt ba tamāmat-i kheil wa khašam wa taba' wa ev-oghlānān wa galla wa rama wa daqina wa khazina ka dāšt, ela īk Bāwarji wa īk kasa-ye zarrīn ka az an qimīz mī-khūrad, ka ān har dū jihat-i yādkār bāz girift wa bāqī-ra tamāmat bā-khātūn ba-ham ba-amīr mazkūr bakhshīd. 并见汉译本，第1卷第2册，汉译本，页90。

再太祖 皇帝 夫人名行 说: ‘人名
巴撒 成吉思合罕 亦巴合答 呜诂列论 扎合敢不
中 中 中 舌 中
Basa Chingis Qaγan Ibaγa-daügülerünZhaqaγambu

父行 你的 你行 二 百(每) 从嫁(每)你行
额赤格 赤讷 赤马答 豁牙儿札兀惕 媵哲思 赤马答
中 舌
echige chino chima-da qojar zhaγud inzhes chima-da

人名 厨子 人名 厨子 两个 与者
阿失黑帖木儿 保兀儿赤 阿勒赤黑 保兀儿赤 豁牙儿 斡克抽
舌 舌 舌 中舌
Ashjγ -Temür baγulchi Alchjγ baγulchi qojar ögchü

有来 如今 种名 百姓里 你 去时
不列额 额朵额 兀鲁兀惕 亦儿坚突儿 赤 斡者仑
舌 舌 舌 舌
bülege edböge Uruγud irgen-dür chi odurun

遗念 自的行 我行 从嫁(每)自的行 人名
格里耶昔颜 纳答 媵者薛扯延 阿失黑帖木儿
舌 舌
gerje-s(i)-jen na-da inzhes-eche-gen Ashiγ -Temür

厨子自的行 一 百行 与着去’ 说着 要了。[1]
保兀儿赤颜 你刊 札兀泥 斡克抽斡惕 客额周 阿不阿
舌

[1]拉丁字转写据《元朝秘史》乌兰巴托刊印本,页582–585。

bayulchi-jan nigen zhayun ögchü od kegezhüu abuya

其总译为:“遂将夫人亦巴合赐与主儿扯歹……你父札合敢不,当初教厨子阿失黑帖木儿等引二百人。与你做从嫁有来。你如今去时,留阿失黑帖木儿等一百人作遗念。”意即:“成吉思汗将亦巴合别吉恩赐给主儿扯歹,……成吉思汗又对亦巴合说:你父亲札合敢不赐给你的二百从嫁人(媵哲思),以及阿失黑帖木、阿勒赤黑两位厨子。如今你要去兀鲁兀惕部,在你的从嫁人中把阿失黑帖木儿厨子和一百人留下给我以为纪念。”

对比上述《史集》与《元朝秘史》,可以知道拉施都丁中提到的怯台那颜(Kihtī Nūyān),即《元朝秘史》的主儿扯歹。[1]在对《史集》的上述两段记载与《元朝秘史》的描述进行对比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秘史》提到成吉思汗在把亦巴合别姬送给兀鲁兀惕部的怯台那颜时,他从亦巴合的“媵哲”(旁注“从嫁”)中留下了一百名仆人及一名厨师。亦巴合别姬并非蒙古、克烈两族联姻时嫁给成吉思汗的,而是在克烈部战败时被蒙古部俘获后归为成吉思汗所有,因此当然谈不上什么陪嫁的问题。但她身边有一批人是克烈部札合敢不的属下则无疑问。这些人在克烈部败亡前,札合敢不已经赐给其女儿,是亦巴合私属人口。亦巴合别姬嫁给成吉思汗后,她的私属人口一直跟随着她。《部族志》中提到成吉思汗对亦巴合别姬说:“给我留下一个叫……的厨子”。这个缺名的厨子应当就是《元朝秘史》中提到的阿失黑帖木儿。

除了上述《史集》与《元朝秘史》中的记载之外,亦巴合别姬被成吉思汗转赐给怯台那颜之事,在《元史·术赤台传》中亦有记载。该传记术赤台受赐亦巴合别姬事曰:“术赤台始从征怯烈亦,自罕哈启行,历班真海子,间关万里,每遇战阵,必为先锋。帝尝论之曰;‘联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赐嫔御木[亦]八哈别吉、引者思百,俾统兀鲁兀四千人,世

[1]见节207。

世无替。子怯台，材武过人。"[1]这里也提到，亦巴合别姬带引者思百人至兀鲁兀族。

蒙古语"引者"(inje)，复数"媵哲思"(injes)，意为"从嫁人"。从《史集》与《元朝秘史》节208和《元史·术赤台传》的上述记载看，他们当然不是成吉思汗在让亦巴合别吉改嫁怯台时送给她的嫁妆，而是亦巴合在其娘家时就已经拥有的私属人口。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亦巴合改嫁的例证说明，波斯史籍所提到的蒙古贵族女眷的私属人口ev oγlan与《元朝秘史》与《元史·怯台传》中的"媵哲思"，也即"从嫁人"是对应的。这些材料的对比研究对确定ev oγlan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有决定性的意义。

换句话说，ev oγlan不仅如同德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是为后妃或贵族妇女服务的男性仆人和她们的私属人口，更准确地说，是贵族女子和后妃出嫁时从娘家带入夫家，为自己服务的私属人口。前述成吉思汗从亦巴合身边仆从中留下的宝儿赤(厨子)，也是她的"从嫁人"中的一位。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注意到德福教授所引述的撒麻耳干地(Maulana Kamal ad-Din 'Abd ar-Razzaqi Samarqandi)成书于1471年的Matla' Sa'dain va majma' Ibrain[2]页29中的记载："encuyan va ev oghlanan"时，我们会发现德福教授对此句的翻译：die Domänendiener und Pagen(在国有土地上做事的人们和ev oghlan们)[3]是不确切的。此语的逐字对译(即直译)应当是："媵者思(从嫁人)们与ev oghlan们"。而实际上，如上所述，"媵者思"就是ev oghlan，也即"从嫁人"。因此Samarqandi在这里只是将蒙古语的"媵者思"与其突厥语的对应词ev oγlan重复相提罢了。

阿合马的身份应当就是这种在蒙古语称为"滕哲"(引者)，突厥-波斯语称为额兀·斡兀阑(ev-oγlan)的从嫁人。贵族女子出嫁时，携从嫁

[1]《元史》卷120《术赤台传》，标点本，页2962。术赤台所受赐之"木巴合别吉"，伯希和和韩百诗已校为亦巴哈，并注意到，拉施都丁把术赤台(即主儿扯歹)与其子怯台(Kehetei)相混的错误。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236-237。

[2]M.Safi'出版，拉合尔，回历1360h/8h(1941—1948)，两卷本，见页29。

[3]见上引德福书，卷2，页226-227，词条675，ev oghlan。

人入夫家古已有之。《辽史》记载贵族投下军州时提到了4处以下嫁公主的从嫁人口建成的城镇：

"徽州，宣德军，节度，景宗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媵臣万户，在宜州之北二百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里。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户一万。"[1]今辽宁阜新八家子村城子洼古城，或为其遗址。[2]

"成州，长庆军，节度，圣宗女晋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在宜州北一百六十里，因建州城。北至上京七百四十里。户四千。"[3]"成州，兴府军，节度，晋国长公主以媵户置，军曰长庆，隶上京。复改军名，统县一：同昌县。"[4]晋国公主粘米，其名又作粘米衮。《辽史》记，辽圣宗统和七年(989)秋七月"庚子，诏谕驸马萧鉏不，公主粘米衮"。[5]金章宗明昌元年(1191)春二月，金人王寂曾路过此地，他记道："乙巳，次同昌，旧名成州，长庆军节度使始建于辽圣宗女晋国公主粘米以从嫁户置城郭市肆，故世传公主成州者也。"[6]其遗址在今辽宁阜新西北25公里的红帽子村古城，该地曾出土金同昌县里堠碑，证明其地为金代同昌县，即辽之成州。[7]

"懿州，广顺军，节度，圣宗女燕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在显州东北二百里，因建州城。西北至上京八百里。户四千。"[8]"懿州，宁昌军，节度，太平三年越国公主以媵臣户置。初曰庆懿

[1]《辽史》卷37《地理志一》，页448。

[2]罗显明：《辽代徽州城址考》，载于《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

[3]《辽史》卷37《地理志一》，页449。

[4]《辽史》卷39《地理志二》，页486。

[5]《辽史》卷17《圣宗纪》，页201。

[6]〔金〕王寂撰：《辽东行部志》1卷，〔清〕光绪丁氏竹书堂抄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

[7]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第6章《辽朝统治时期的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页302。

[8]《辽史》卷37《地理志一》，页448。

军，更曰广顺军，隶上京。清宁七年，宣懿皇后进入，改今名"[1]金章宗明昌元年(1191)春二月，金人王寂曾路过此地，他记道："己酉……是日宿懿州宝严寺。懿州宁昌军节度使，古辽西郡柳城之域，辽圣宗女燕国长公主初古所建。公主纳国舅萧孝惠以从嫁户置立城市，遂为州焉，旧名广顺军。"[2]其遗址在今辽宁阜新东北54公里的塔营子村古城，该地曾出土元《懿州城南学田碑》。辽金元三代懿州均在此地。[3]

"渭州，高阳军，节度，驸马都尉萧昌裔建。尚秦国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以所赐媵臣建。州城显州东北二百五十里。辽制皇子嫡生者，其女与帝女同。户一千。"[4]此城在今辽宁彰武县东北太平庄。[5]

蒙古曾为辽属部，由此推测，蒙古语中的inje"引者"当从契丹传入，其祖源当为汉语"媵者"。

15.3 战时出征——从嫁人的义务

当蒙古贵族女子嫁入夫家后，其从嫁人(媵哲思)在夫家部落中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发现，在战时部落动员自己的成员组成军队时，部落

[1]《辽史》卷38《地理志二》，页474。张修桂等《〈辽史〉地理志汇释》，《满洲源流考》卷22"懿州"条注："《辽史》有两懿州，一载东京道，一载上京道，据史：'初曰庆懿军，更曰广顺军，隶上京'。实则一州也。"《李考》(笔者按，[清]李慎儒撰：《〈辽史·地理志〉考》，《二十五史补编本》)："案上京道亦有懿州，与此懿州实一地也。"《冯校》(笔者按，冯家升撰：《辽金史〈地理志〉互校》，载于《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4期)："按《地志》有两懿州，一在上京，一在东京，'初曰庆懿军，更曰广顺军，隶上京'。何时复隶东京，史上言，陋矣！"《汇编》(笔者按，《〈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编(东北卷)》，谭其骧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页152-153)："日人箭内亘认为：辽仅有一懿州，而以之分属于上京、东京两道，是《辽史》之误。志文在东京道懿州五明言'隶上京'，又在上京道懿州下记'西北至上京八百里'，不言至东京里到。由此可知以懿州属上京为妥。(《满洲历史地理》页275)。"——正史地理志丛刊，主编谭其骧，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24(笔者对标点有更动，引用时请核对)。

[2]上引王寂《辽东行部志》。

[3]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第6章《辽朝统治时期的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页302。

[4]《辽史》卷37《地理志一》，页448。

[5]参见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第6章《辽朝统治时期的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页302。

贵族娶亲时，新妇从娘家带入的从嫁人，也被动员成为夫家部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波斯文史料在多处提到这一点。拉施都丁在记“十三翼之战”时，[1]在述成吉思汗第一翼的组成时提到：“第一[翼]，成吉思汗之母月伦额客、族人、从人、亲属、宫帐中之从嫁人(ev-oghlānān)，及她的私属人口。”[2]在此战中，上引成吉思汗之母所率之第一翼将士，当系月伦从其娘家宏吉剌部斡罗忽纳惕族带来的人口。成吉思汗把这一部分人编入战斗序列，可以说已经动用了一切他所能动用的力量。

从蒙古高原移居西域的蒙古人，一直保持着原有的部落组织。贵族已婚妇女如同在蒙古高原时代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从娘家带来的私属人口。这些私属人口中的男丁平时为使主劳作，而在战时则有义务随使主出师。据《史集》记载，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之后，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Boraq)在窝阔台家族的支持下，渡阿母河向伊利汗国发动战争。此次入侵失败后，八剌汗溃回阿母河以北地区。其哈屯那海(No-qai Khatun)从自己的ev-oghlan即媵哲思(从嫁人)中抽出人力、物资向八剌的军队补给。[3]这也说明，八剌在察合台兀鲁思已经失去权威，其妃那海哈屯其时毫无支配与指挥察合台兀鲁思内人力、物力的权力，她所用调用的只不过是自己私属的人员与物资。

从嫁人制度在西域蒙古人中保持了很长的时间，直至帖木儿时代

---

〔1〕“十三翼之战”即成吉思汗早年为争夺尼鲁温蒙古各族领导权，与自己的近亲泰赤乌氏贵族之间进行一次的战斗。

〔2〕《史集》德黑兰刊本，页243，波斯文原文为：awwal mādar-i Čingīz Khān Ulūn Ika wa aquwām wa atabā'， az khwīšān wa ev-oghlānān-i Urdū wa khadam wa kišānī ka bar waī makhsūs wa mansūb būdand。汉译本译文见第1卷第2册，页112；这里“宫帐中之从嫁人”(ev-oghlānān-i Urdū)被译成“斡耳朵里的侍臣”。已故儒林师的译文见《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载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1卷1期，收于《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参见页4。本段史料韩师所据布洛晒波斯文刊本与笔者所据德黑兰刊本之间有细微差别，试对比拉丁字译写。

〔3〕《史集》第3卷(jild-i siwum)，苏联巴库1958年波斯文合校本，页133：az asb wa silāh wa khūrdanī wa pūšīdanī ān-jā dāšt bar dast-i ev-oghlānān pīš bāz firistād. “派出彼处从嫁人手中(bar dast-i ev-oghlānān)所有的马匹、武器、食品及衣服”；并见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761；汉译本，页131作：“[她]先带着侍从送来了她那里的所有武器、食物和衣服。”这里的“侍从”所对应的波斯文原文即ev-oghlan(从嫁人)。那海哈屯，波斯文拼作Nūkā Khātūn，汉译本译为“那客”。其族属不明，待查。

的波斯史籍中还时常提及。在德福教授所引录的有关ev-oghlan(从嫁人)的元以后的波斯史料中,有如下几则:在成书于约1412年之《木阴历史选》欧班夫人波斯文校勘本页204中有:bā gurōhē ev oghlānān……。basar mē-bard"他带着一定数量的从嫁人口消磨岁月"。同书页327有:tūmānāti ev-oghlānān-rā dar muqābalayi qalb bidāsht"他掌握着一土绵的从嫁人对着中央"。匿只木丁·沙米的《武功记》[1]中有:"Amīr Husain……bā gurōhē ev oghlānāni qadīmi hvad"迷里忽辛带着自己的一群老从嫁人。"[2]

从嫁人原本是贵族妇女的私属人口,但在这里他们被视为贵族本人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比对前引成吉思汗在命其妃亦巴合哈屯改嫁时,希望从她的从嫁人中留下阿失黑帖木儿和一百从人时,尚需要征求亦巴合别姬的同意的记载;中统一至元时察合台兀鲁思西征伊利汗国,争夺阿母河以南之地时,八剌罕所统诸军中,未包括其妃那海哈屯的从嫁人,由此推测,帖木儿时代中亚蒙古人中的从嫁人口与贵族家庭中的男性使主关系也许变得更为密切了。

15.4 从嫁人的妻室与侍妾

蒙古时期游牧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奴隶",他们处于蒙古社会底层。但他们的身份并不完全一致。从嫁人(ev-oγlan)在主人家中是奴仆,但他们有自己的家室,可以娶妻生子。他们的妻子也是奴隶,必须在斡儿朵中为主人服务。以成吉思汗二太子察合台之子抹土干为例,

[1]《帖木儿征服史》(Nizam al-Din Abd al-Wasi Sami, *Histoire des conquêtes de Tamerlan intitulée Zafarnama* : par Nizamuddin Sami : Avec des additions empruntées au Zubdatu-t-tawarih-i Baysunguri de Hafiz-i Abru, édition critique par Félix Tauer, 1937, Praha, *Monografie Archivu orientálniho, 5*)。

[2]以上引自格尔哈尔德·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份——特别注重于古时首先是蒙古时代与帖木儿朝时代新波斯语史料》,卷3,1965年,页227,第675条。这里所引述的波斯文原文的拉丁字转写直接录自上引德福书,仅在个别地方(如上述《武功记》中的tūmānāti)略有调整。

其次子不里的母亲，就是一名抹土干帐中的从嫁人(ev oγlan)的妻子，后为抹土干占有。《史集》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据说，他(笔者按，指不里)出身的情况是这样的。过去有一种习俗，把家仆、侍臣们(ev-oγlan，笔者按，即从嫁人)妻子们召集到大帐(urdū-hā，笔者按意为即诸宫帐)中干活。有一次，木秃坚(笔者按，即抹土干)来到大帐中，看见有许多妇女。他把其中一个有姿色的妇女带到一个角落里交媾。他想到她可能怀孕。于是他吩咐把她与丈夫分开。她果然怀了孕，并生下了不里，这以后她又被还给了她的丈夫。"[1]由此可见，从嫁人在使主帐中的地位是很低的。他们本人要终生为后妃服务，而其妻子也要经常集中起来为主人劳作，而且可能成为男性使主的玩物。在他们的妻子被蹂躏怀孕之后，为确保孩子的血统纯洁，使主竟可以下令将她们与自己的丈夫分离，直到为主人生下孩子。生下孩子后，她们的地位并未改变，仍然是奴隶的身份。孩子作为贵族的骨血被留在使主帐中抚养，而生身母亲则被送回到原夫身边。这个例子是从嫁人之妻是主人的劳作、泄欲与生育的工具的典型证据。

从嫁人既然是贵族姑娘出嫁时从娘家带入夫家的私属人口，当然除了男子之外，亦有女子。笔者所见范围内有关女从嫁人的资料很少，目前只在《元朝秘史》中找到一条：

那　人名　勇士的　母　的　从嫁　来了的
帖列　合必赤　把秃仑　额客因　引者　亦列克薛泥
舌　中　舌　舌
tere Qabichi-Baghatur-un eke-jin inje iregsen-i

人名　做妾者　有来　一个　儿子　生了　儿名
孛端察儿　塔塔周　不列额　你刊　可温　脱列罢　沼兀列歹
舌　舌　舌
Bodonchar tataju bülege nigen kögün tölebe Jegüredei
名字有的

[1]《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61。

捏列秃

neretü

有来　儿名　在前　以竿悬肉祭天 入　有来

不列额 沼兀列歹 兀里答 主格黎突儿　斡栾 不列额

舌　　舌　　　　　舌　　舌

bülege Jegüredei urida jügeli-dür oron bülege[1]

其意为"那位随合必赤·把阿秃儿的母亲从嫁来的[妇]人,被孛端察儿收为妾。她生了个儿子,名沼兀列歹。从前沼兀列歹曾参加以肉悬竿祭天的仪式。"孛端察儿为成吉思汗九世祖,可见蒙古贵族女子出嫁时带有从嫁人古已有之。而从嫁女子随贵族女子来到夫家后,也往往成为男主人的妾,她们所生后裔被视为主家的骨肉和氏族成员。《秘史》中专门言及他们可以参与祭天,反证了他们也许不能参加夫家部落贵族的所有重要活动。他们与男主人正妻所生诸子后裔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

依据从嫁姑娘与从嫁人之妻为男主人所生的孩子均被列入主人的氏族这一点,她们之间似乎没有区别。但从嫁姑娘被男主人占有后,是男主人的妾,也是其家庭成员;而从嫁人之妻则永远也不能成为男主人家庭中的一员,即使为男主人生了孩子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及。这恐怕是从嫁姑娘与从嫁人之妻的主要区别之一。苏联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研究蒙古古代社会时,注意到从嫁人这个社会阶层,并将他们列入草原社会中的从属人口中的一种。[2]

---

〔1〕《元朝秘史》,第43节。

〔2〕B.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Монольский кочевой феодализ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Ленинград, 1934(B.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汉译本,征求意见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页88).

15.5　真金——阿合马的使主

从嫁人原本是北亚游牧社会底层——奴隶的一种。在成吉思汗征金与征西夏及蒙古西征以后，蒙古统治区扩及农耕地区，被掳掠的人口成为奴隶的重要来源。阿合马如同许多汉、回回被掠人口一样，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沦为蒙古贵族的奴隶的。据《元史》卷205《阿合马传》，[1]其仕进之途为：

中统三年(1262)，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司财赋之任。[2]次年(1263)，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3]开平城筑于宪宗朝晚期。阿合马很可能在忽必烈为诸王时就在其斡耳朵中执事，熟悉开平。

至元元年(1264)八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升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4]三年(1266)正月，立制国用使司，[5]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七年(1270)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为尚书省平章省事。九年(1272)，并尚书省入中书省，为中书平章政事。十九年

---

〔1〕中华书局点校本，页4557。

〔2〕苏天爵《礼部题名记》："我国家自世祖皇帝始建中书，统左右部。未几分部为四，又分为六"。(《滋溪文稿》卷2，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页16)。据《世祖纪》中统三年十月"乙亥，分中书左右部"。——《元史》卷5，标点本，页88。

与阿合马同时出任中书左右部的还有回回人阿里伯，据柳贯记载："中统初元，即佩符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受任之专，群臣莫并及。"(《阿里伯谥忠节》，《柳待制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景元本)。而其同事还有燕人赵君宝，据刘敏中《少中大夫同知南京路总管府事赵公墓道碑铭》记：赵君宝中统"三年擢领中书左右部参议"。——《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元刻本，卷7，页15。

〔3〕开平府设于中统元年(1260)，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改上都路。则阿合马任同知当在五月之前。后来任上都路达鲁花赤和总管者，均为原开平府达鲁花赤兀良吉带与原开平府总管董铨，他们应当都是阿合马当时的同事。

〔4〕中书平章政事"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中书平章政事为从一品，此职设于中统元年(1260)。——见《元史》，卷85《百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121。元制，荣禄大夫为文官从一品最低阶。——《元史》卷91《百官志》，标点本，页2319。

〔5〕据元人陈祐记载"通漕运，谨出纳，充府库，实仓廪，百姓富饶，国用丰备，此制国用之职也。"——陈祐：《三本书(至元五年十月上)》，《元文类》卷14，清光绪刻本，叶6。

(1282)三月被杀。阿合马以奴隶——从嫁人的身份,自至元初入中书,在不长的时间内获得高位,成为元世祖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与史天泽、许衡等一般汉臣相抗,而且不把“大根脚”出身的安童放在眼里,〔1〕盖因他是元世祖的家奴。

阿合马虽然身居高位近二十年,但他在忽必烈及其家人眼中家奴的身份仍未改变。元世祖变更太宗时以相臣为中书令的旧例,改以皇子真金兼之。〔2〕据《裕宗传》记载,真金受命为中书令事在中统三年(1262)。真金为察必哈屯所生,〔3〕是阿合马的使主。至元初,真金“每月必再至中书”。至元十年,真金被立为太子。〔4〕这样真金不仅在世祖家中是阿马的使主,被授予中书令后,在政治上也是阿合马的上司。据拉施都丁记载,真金对阿合马没有好感,曾用弓打伤了他的脸。当阿合马见到世祖时,世祖见伤问其缘由,阿合马竟不敢言明,称为马所踢。还有一次,真金甚至当着世祖的面,以拳击打阿合马。〔5〕阿合马虽然骄横,但在使主面前却是奴仆。《元史》也提到,“时阿合马擅国更柄,太子恶其奸,未尝少假颜色。”时人“知阿合马所里惮者,独太子尔”。〔6〕

察必皇后逝于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7〕阿合马被杀恰在次年。这两个事件发生时间先后的衔接,应当不是偶然的。察必皇后逝世之后,阿合马失去保护伞。至元十九午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从”。阿合马的政敌王著、高和尚利用阿合马对真金的畏惧,于戊寅日“诈称皇

〔1〕安童为成吉思汗札剌亦儿老奴木华黎三世孙,其母为世祖察必皇后之姊。

〔2〕《元史》卷85《百官志》,页2121。

〔3〕《史集》第2卷汉译本:“被称作太后的大哈屯所生。但有些人说,她就是察必哈敦。太后为其尊号。这位哈屯出自弘吉剌惕部。‘太后’意为合罕之母。”

另据《元史》卷115《裕宗传》,真金为世祖嫡子,生母昭睿顺圣皇后(笔者按,察必),宏吉烈氏。——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888。据卷114《后妃传》:“昭睿顺圣皇后,名察必,济宁忠王按陈之女也。生裕宗。”——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871。

〔4〕上引《元史》卷115《裕宗纪》,页2888-2889。

〔5〕《史集》卷2,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649;汉译本,页340-341。

〔6〕上引《元史·裕宗传》,页2890。

〔7〕上引《元史·裕宗传》,页2890。同书卷114《后妃传》百衲本称察必皇后之逝年为至元十四年(1277)。中华书局点校本据道光本与上引卷115《裕宗传》改为十八年。——见点校本,页2883,校勘记(7)。

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王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王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伪太子夜二更"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脑,立毙。"[1]

阿合马死后之初,"世祖犹不深知其奸,令中书毋问其妻子。"凡参与谋杀者皆被处死。但阿合马之死毕竟使元统治中枢的政治风向发生变化。世祖"尽得其(按,阿合马)罪恶"[2]后,叱骂阿合马是"奴才"。[3]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中阿合马的妻子的名字。《元史·阿合马传》中提到;"其妾有名引住者"。[4]"波斯文史料亦称阿合马之妻是Inčū哈屯,[5]即引者哈屯。"引者"即"滕哲"。如前所述,乃突厥-波斯语ev-oγlan在蒙古语的对应词,意为"从嫁人"。这些可能都不是她的真名,只表明她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她在察必皇后身边时,人们就这样称呼她。阿合马本是察必皇后的从嫁人,因此其使主也称呼其妻为"从嫁人"之妻。

15.6 几位宏吉剌部的从嫁人

元代贵族女子的从嫁人涉入政治后获取高位者,并不限于阿合马。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位。据元人揭傒斯记载,"太祖建帝号之八年(1213)",即成吉思汗征金时,元人吕天祺(字吉卿)之曾祖父曾任金监军的吕元,"以其众北归,从光献皇后(成吉思汗妻孛儿帖)弟(应即按

---

〔1〕上引《元史》卷205《阿合马传》,页563。关于阿合马被杀经过的有关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集》及《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之间的异同比较问题,参见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352-360;蔡美彪:《拉施特〈史集〉所记阿合马案释疑》,载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及毛海明《张易史事新证》(提交2012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研讨会论文)。

〔2〕上引《元史》卷205《阿合马传》,见4564。

〔3〕《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90。世祖斥骂阿合马的话在波斯文原文中记录为banda"奴隶"。

〔4〕上引《元史·阿合马传》,见页4564。

〔5〕《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5-346。

陈)入事上。""光献皇后"即成吉思汗长后孛儿帖,其弟即宏吉剌氏贵族德薛禅之子按陈驸马。

吕元投降蒙后,究竟处境如何?从揭傒斯称吕天祺之祖父"惠坚,及夫人董氏,以顺圣皇后(察必皇后)媵臣为皇子北安王保傅"[1]一段文字可知,吕元降蒙后,成了宏吉剌部的属民,在按陈那颜家族的统辖生活了二十余年。至按陈之女察必嫁给忽必烈时,吕天祺的祖父吕惠坚与祖母董氏,均成为察必皇后的从嫁人,从宏吉剌部来到忽必烈帐中。察必皇后生下皇子那木罕后,吕惠坚与其妻董氏又成为那木罕的"保傅"。

忽必烈夺得皇位后,从诸王变成蒙元王朝的主宰,其家臣也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吕惠坚与其妻董氏虽然是皇子那木罕的"保傅",但其子吕合剌却仍留在忽必烈身边。吕合剌聪明多智,任"金玉局使"时,因该局初建,上奏要求释放所获宋人中工于机巧者,编入局中,"世守其业"。据元《经世大典》记,"玉工:中统二年(1261),勑徙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码碯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立金玉局。"[2]可见上述揭傒斯所记是中统年或至元初年事。吕合剌曾"历工部侍郎、尚书、将作使、中书参知政事,拜大司徒。"逝后被追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吕天祺"兄天麟、天祐皆至大司徒。"据陶宗仪:"大司徒领异样金玉人匠总管府"[3]可知吕合剌之长子、次子均曾执掌"异样金玉人匠总管府"。上引元《经世大典》的文字又提到,设于中统二年的"金玉局","至元十一年(1274),升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掌造玉玺章,御用金玉、珠宝、衣冠、束带、器用、几榻及后宫首饰。凡赐赉,须上命然后制之。"[4]前引《辍耕录》的记载中还提到,将作院之下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5]这个机构与前面提到的大司徒所领"异样金玉人匠总管府"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揭文安公全集卷之13。

[2]《元文类》42,工典,玉工条,上海涵芬楼影印元至正杭州西湖书院刊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见页262。

[4]上引《元文类》,42,工典,玉工条。

[5]上引《南村辍耕录》,见页261。

至元二十九，吕合剌携子天祺入见世祖。当时吕合剌正在选拔将作院官吏，世祖表示天祺可入将作院。前已言及，陶宗仪提到将作院之下有“异样等局总管府”。有可能元世祖希望吕天祺在将作院中该“异样等局总管府”任职。据揭傒斯记载，吕合剌未同意世祖的建议，因而吕天祺被授予“奉训大夫、同知异样总管府事。”他所任职的“异样总管府”，应当就是前述陶宗仪所记将作院中的“异样等局总管府”。查元官制，奉训大夫为从五品资。[1]吕天祺以察必皇后从嫁人之孙的身份，一入仕就获从五品，可见从嫁人在忽必烈心目中是可信赖的心腹。吕氏家族所负责的“异样总管府”中的异样，当指各式各样的意思，在元代未引起过误解，但明后期内距元时久，已有汉人不理解，茅元仪称“元官制有异样总管府总管，虽夷狄不足论，然时已主中国矣，足发一笑也。”[2]

成宗时，吕天祺从秘书监升任将作使，成宗时自秘书监晋升为将作使，再进为集贤侍读学士，迁大都留守兼少府。查迁大都留守兼少府主要负责管理泥瓦及铁木工作，也是董理工作的职务。在任职期间他“非上(共)[供]必节，虽权贵莫敢干以私。”换而言之，只有皇家用品才不计成本，其余则必厉行节约。继而他在“至大之末，擢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使”，“改礼部尚书“，“后四年，用为寿福院使”。查此职掌察供钱粮之事。吕天祺在官场阶拾级而上，仁宗四年，[3]“上拜集贤大学士，与闻国政，自奉训大夫至是，六迁为荣禄大夫”。查元官制，荣禄大夫为从一品衔。墓志铭称他“每议论，朝廷之上慷慨切直，不为诡随，大臣多不便之”。他之所以敢于直言，恐怕是因为有察必皇后媵臣后裔的身份。文宗时，吕天祺出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妻曹氏为“大都人匠总府达鲁花赤”及“同知异样总管府事”之女。

从成吉思汗征金时吕元降蒙，至吕天祺时，其家族服务蒙元已达120年以上，世代承担的多是教养皇子、工杂匠作、察供钱粮之类服务

[1]刘迎胜：《〈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考》，载于南京大学《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

[2]《暇老斋杂记》卷30，清光绪李文田家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3]元仁宗有皇庆、延祐两个年号。皇庆只有二年，故仁宗四年当指延祐四年(1316)。

性、事务性的管理职务，而其孙灵童在顺帝时为宿卫。可见尽管在常人眼中，其家族已经十分显赫，但其成员是忽必烈家族奴仆人员的身份一直不变。他们随察必皇后从宏吉剌部来到忽必烈帐中后，与宏吉剌部再无关系。

除了阿合马和上述吕氏之外，蒙元时代另一位兼具从嫁人-重臣身份，而又留下较为翔实资料的是张应瑞之子张住童。从个人的经历这个角度看，张住童与前述吕氏、阿合马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人原先都是宏吉剌忒部贵族的家奴，也都在宏吉剌忒部贵族女子出嫁时作为从嫁人成为宏吉剌忒部的姑娘的私属人口。察必嫁给了忽必烈，成为皇后；而张住童的使主则为元文宗皇后。因为这一点，他们皆成为高官。

有关张应瑞家族最重要的资料为蒙汉合璧的《张应瑞先茔碑》，据清道光十年(1830)所编《承德府志》，此牌立于今赤峰东北方约160里一处名为"国公坟"的地方。碑文作者为尚师简、张起巖，书写者巎巎，而镌刻者为许师敬。此碑文初收于《承德府志》，后又收于修订后的《畿辅通志》之中。1935年日本《东洋史研究》刊登了此碑的照片，介绍其发现地、碑名、大小尺寸以及1935年羽田满洲考察队成员发现的此碑的蒙古文碑文。同刊同期还刊出了日本学者羽田亨有关此碑蒙古文碑文的简介。1936年出版的《满洲金石志稿》与次年出版的《满洲金石志》中，此碑的汉文碑文也被收录。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柯立甫1950年发表了题为《1335年有关张应瑞的汉-蒙合璧碑铭》的论文，对其作了详尽的研究，包括引言、汉文碑文英译、注释；蒙文碑文英译及注释，并将其汉、蒙两种碑文的拓片影印刊出，便于研究者使用。[1]

尚师简，未见柯立甫论及。尚师简为元代著名文人，欧阳玄去世后，其神道碑的篆额人就是他，据苏天爵记载，元统三年(后至元改元之前)为"奎章阁供奉学士"，[2]而据张应瑞碑，后至元元年(1335)时为奎

〔1〕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udies*, V01.13, June 1950, Number l and 2, pp.1-131。

〔2〕《礼部员外郎王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13，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页208。

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中奉大夫兼经筵官。[1]同年所立之许衡的神道碑的篆额者也是他。[2]

张起巖柯立甫亦未讨论。他是前面提到的欧阳玄神道碑的撰写者，后至元元年(1335)时为奎章阁侍讲学士、通奉大夫、知制诰同国史知经筵事。[3]而据《蛟峰先生阡表》之后的题录，后至正十年(1350)时，他的职衔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4]有关此人的资料尚有一些，因超出本课题的范围，留待今后再详论。

据《张应瑞先茔碑》记载，张应瑞为全宁人，祖父张仲贤。其父张伯祥为宏吉剌部那颜纳臣[5]收入怯薛。张应瑞7岁时被纳臣收养，及长侍于纳臣帐前。纳臣死后，张应瑞继续为其子斡罗臣那颜[6]服务。斡罗臣之弟只儿瓦台叛乱时，张应瑞被叛军带走，受尽折磨。[7]斡罗臣死后，张应瑞伺机逃归，[8]继续侍于其两位嗣位人。[9]后帖木儿长子谛瓦八剌[10]为宏吉剌部之长，并尚“武宗皇帝妹”。按《元史·公主表》与《特薛传》记载，这位下嫁宏吉剌部谛瓦八剌那颜的“武宗皇帝妹”是祥哥剌吉公主。[11]

元成宗逝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后卜鲁罕与诸王阿难答

---

〔1〕《元敕赐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欧阳公神道碑铭有序》，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6附录，涵芬楼刊本。

〔2〕〔明〕刘昌编:《中州名贤文表》卷6《许衡神道碑》，四库本。

〔3〕上引《元敕赐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欧阳公神道碑铭有序》，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6附录，涵芬楼刊本。

〔4〕〔宋〕方逢辰撰:《蛟峰方先生集》外集卷3，明活字印本。

〔5〕据《元史》卷109《公主表·鲁国公主位》，纳臣尚元太祖成吉思汗孙女薛只干，见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758。

〔6〕斡罗臣那颜初尚完泽公主。完泽公主去世后，继尚元世祖忽必烈之女囊家真公主。见上引《元史·公主表》，页2758。

〔7〕此碑的蒙古文碑文说张应瑞在被俘后为剑所伤。见柯立甫文，页95。

〔8〕蒙古文碑文说张应瑞杀死了他的看守。见柯立甫文，页96。

〔9〕纳臣的继位人的名字在碑文中没有出现。按《元史》卷118《特薛禅传》记载，先后继纳臣主宏吉剌部的是其弟帖木儿与蛮子台，见页2916。囊家真公主在斡罗臣去世后，先后适其弟帖木儿与蛮子台。

〔10〕即《元史》卷118《特薛禅传》中提到的硼阿不剌。

〔11〕《元史》卷109，页2758；上引《特薛禅传》，页2917。

相勾结，谋掌权力。时海山在按台山统兵，接讯后于三月迅速返回和林，“诸王勋戚毕会”。海山在漠北与海都、都哇作战时，宏吉剌部那颜蛮子台适在军中，[1]故宏吉剌部当为海山争夺帝位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对照《特薛禅传》，发现谛瓦八剌之继位为宏吉剌部部长与尚祥哥剌吉公主之时，适为大德十一年(1307)三月，即海山在和林大会诸王贵戚之时。而据《张应瑞先茔碑》记载，祥哥剌吉公主为武宗海山之妹。由此可以推知，参加和林集会的“诸王勋戚”中应当就有谛瓦八剌。大德十一年五月，武宗海山即帝位于上都。而谛瓦八剌在三月受命继位为宏吉剌部部长与受赐武宗之妹祥哥剌吉公主，夫妇俩分别于同年六月受封为鲁王和鲁国大长公主[2]的原因，应当就是谛瓦八剌支持了海山的即位。

据《特薛禅传》记载，皇庆间祥哥剌吉继而被加封为“皇姊大长公主”；而天历间，又加封号为“皇姑”大长公主。[3]皇庆(1312—1313)为元仁宗年号。仁宗为武宗海山弟，祥哥剌吉年纪当在海山与仁宗之间，故号“皇姊”。而天历(1328—1329)为元文宗年号。文宗为海山之子，故祥哥剌吉剌号为“皇姑”。《张应瑞先茔碑》提到，张住童因“谦抑廉谨，静而寡言。及临事，剖析曲当”，深受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器重。《先茔碑》第24行说，张住童因忠诚而被命名为“媵臣”。其使主为“太主”之女“赞天开圣仁寿徽懿宣昭皇太后”。

查《元史·顺帝纪》，此“赞天开圣仁寿徽懿宣昭皇太后”的称号，乃顺帝即位后封授给文宗皇后的。[4]而《元史·后妃表》则指出：文宗的“卜答失里皇后，弘吉剌氏，鲁国公主桑哥吉剌女也。天历元年(1328)立为皇后，二年授宝册，至顺三年(1332)尊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元统元年(1333)又尊为太皇太后，仍称制。至元六年(1346)黜太皇太后之号，徙东安州，卒徙所”。[5]这里提到的“鲁国公主桑哥吉剌”当为“桑哥剌

[1]《元史》卷22《武宗纪》，页478。

[2]上引《元史·武宗纪》，页481；上引《特薛禅传》，页2917。

[3]上引《元史·特薛禅传》，页2917。

[4]《元史》卷38《顺帝纪》，页824。

[5]《元史》卷108《后妃表》，页2700。

吉"之倒误。"桑哥剌吉"即上述武宗之妹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特薛禅传》也有记载:"文宗皇后,讳不答失里,碉阿不剌鲁王之女。"[1]故《先茔碑》中提到的张住童的太主,应为谛瓦八剌。至顺虽然为元文宗年号,但文宗逝于至顺三年(1332),继位者为元文宗之侄、明宗次子懿怜质班,卜答失里被封为皇太后因缘于此。

文宗即位后,对自己的岳母卜答失里皇后所出之鲁国大长公主大加赏赐。天历二年(1329)正月,文宗"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二万锭营宅第";五月"复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二万锭,以构居第"。[2]查文宗朝一般疏支诸王岁赐少者只数百锭,多者数千锭。文宗对祥哥剌吉这样无节制地赏赐,为其营建宅第,私其皇后母家之心显而易见,卜答失里皇后肯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正说明了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与武宗、仁宗的兄妹至亲关系,及不答失里皇后在文宗朝及其以后时代的重要地位。张住童后来的地位超出了元代一般的公主的从嫁人,当因为此。从《先茔碑》提到,张住童在两都之战时,受文宗命出使宏吉剌部,归途中被俘,押至上都,以计获脱看,张住童此时已随不答失里来到文宗宫廷。在两都构兵之时,文宗派他出使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不答失里的娘家宏吉剌部的支持。此段叙事虽置于张住童为媵臣之前,不过是倒叙而已。

《先茔碑》提到,张住童随鲁王女出嫁之后被授予"集贤侍讲学士"。《文宗纪》中天历二年(1329)正月"皇后媵臣张住童等七人,授集贤侍讲学士等官"[3]的记载,证明《先茔碑》所言不伪。从张应端之父张伯祥忠心服务于纳臣,在纳臣病重的三年间,日夜守护在侧;张应瑞在斡罗臣被胁裹入叛军时,随主入虎口,历九死一生之险;而张住童在天历之乱时,冒险从大都出发出使鲁王驻地,归途中先被俘,后又逃脱看,他们一家可以说是宏吉剌部最忠实的奴仆。由此可知,作为媵者随嫁的人,一般也是使主最可信赖的奴隶。这一点对我们理解阿合马在朝中

〔1〕上引《元史·特薛禅传》,页2919。

〔2〕《元史》卷33《文宗纪》,页727、734。

〔3〕上引《元史·文宗纪》,页728。

虽有诸多汉蒙大臣反对，仍长期受到信用的历史是极有帮助的。

15.7 近臣——权臣

阿合马以“从嫁人”——世祖家奴的身份入仕，进入世祖朝的政治中枢的经历，使我们对“奴隶”的概念产生兴趣。把“奴隶”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勾勒出“奴隶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史学员重要的成绩之一。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介入史学，按“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五阶段论”的概念来重新解释历史的浪潮，使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讨论中，与本研究有关的便是“奴隶”与“奴隶社会”的问题。

关于“奴隶社会”，国内学术界的讨论集中在奴隶制形态的历史地位，即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是“特例”还是“通例”的问题，和中国奴隶制与原始公社制的分期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观察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1]或从历史文献中寻找有关“奴隶”的记载。此外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许多讨论者所引以为据的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列记载：“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其实马克思并未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何指，且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也不再使用。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应当如何解释？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史学领域的学者为此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在这场讨论中，在20世纪50—60年代，以日知、吴泽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奴隶制”，获得了多数参与讨论者的支持。“文革”结束以后，讨论重起，但不久冷寂下来。[2]亚洲面积之辽阔，

〔1〕《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6-37。

〔2〕张持平：《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刘学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争》；唐晓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均收于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参见页117-123；页52-57；页601-608。

人口之繁盛,民族之众多,历史之悠久,远逾经典作家们所生活的欧洲。实际上亚洲古代并无一致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而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命题,是在学术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提出的。今日回顾,这些讨论多未研究具体问题,脱离史学研究的传统与主流,其成为过去是必然的。

有关"奴隶制"的讨论也被带入亚洲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马长寿先生发表《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1〕提出匈奴实行是家族奴隶制与部落制。在马长寿先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还有欧阳熙的《匈奴社会的发展》与林干的《匈奴社会制度初探》,〔2〕及同一作者的《匈奴通史》的有关章节,〔3〕和《突厥社会制度初探》一文;〔4〕张正明有关契丹社会的奴隶的描述,〔5〕及《满族简史》〔6〕等。这些研究虽然是以某种固化的理论来观察史料中的记载,仍带有削足适履的色彩,但较前述的研究毕竟是较为具体的。

苏俄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去世后三年出版的《蒙古社会制度史》〔7〕中的蒙古家臣制一节,对12世纪蒙古游牧社会的奴隶问题,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已故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的论文《关于十——十二世纪的孛斡勒》,〔8〕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基础上,对元以前蒙古游牧

〔1〕原载于《历史研究》,1954年10月第5期;收于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页227-250。此文在1962年曾经作者修改。

〔2〕欧阳熙文原载于《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10月第4期;林干的论文1962年宣读于内蒙古第一届历史科学讨论会,1964年冬修订;两文均收于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1919—1979)》,中华书局,1983年,页251-321。

〔3〕"匈奴氏族组织及其向奴隶制社会的发展"与"匈奴奴隶政权的建立"两节,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8-32。

〔4〕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收于内蒙古大学学报丛刊《蒙古史论文选集》卷5,1983年,页195-219。

〔5〕张正明:《契丹史略》"奴隶"一节,中华书局,1979年,页123-125。

〔6〕《满族简史》编写组编,中华书局,1979年,"女真人的社会面貌"一节,页18-23。

〔7〕刘荣焌汉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征求意见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1978年。

〔8〕原载于《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收于《亦邻真蒙古学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700-712。

部落的家奴问题作为迄今最为杰出的研究。亦邻真指出,《元朝秘史》中的孛斡勒(bohol)旁译为“奴婢”,在现代蒙古科学文献中指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作为奴隶主动产的劳动者,即“说话的工具”。亦邻真尖锐地指出,有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今训古,把元以前蒙古社会的孛斡勒笼统地当作奴隶,甚至得出奴隶社会的结论。亦邻真详细研究了《元朝秘史》和波斯文《史集》中有关资料,指出:孛斡勒的身份是世袭的,是属于个体家庭和个人的;孛斡勒向那颜尽各种义务的责任,如为主人牧马、宰牛、制湩酪、随征和参加围猎等无偿劳动,但不是“说话的工具”。他赞成符拉基米尔佐夫有关孛斡勒不是奴隶、拥有自己的财产,如毡帐、车辆与牲畜,享有一定的个人自由,劳动成果并非全部归于主人的意见。亦邻真还根据在后至元四年(1336)所立蒙汉合璧竹温台神道碑中,与汉文碑文中,同汉文“与元勋世臣等”相对应的蒙古文碑文是ötögü bohod-un uruq(斡脱古·孛斡勒的子孙)和《宪台通纪》中《加脱欢答剌罕大夫散官》中的“老奴婢根脚”“不比别个的有”一语为据,不同意把《元朝秘史》中的斡脱古·孛斡勒(老奴仆)训解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提出斡脱古。孛斡勒是蒙古汗廷之下的新兴贵族的新说。

笔者以为亦邻真教授的意见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蒙古游牧社会早期的“从嫁人”,应当主要是贵族妇女娘家人的孛斡勒,其来源多为草原战争的掳掠人口。贵族与孛斡勒分别属于草原等级社会的两端。当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使他们的统治权扩及城郭农耕地区时,被掠人口的成分也随之发生改变。阿合马就是这些改变了成分的被掠人口中的一员。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事远征使大片农耕廓地区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蒙古统治者及其从属人口也作为征服者移入农耕城郭地区。当主-奴身份分明的那颜—孛斡勒,即使主-奴仆二元结构的草原社会,被整体搬入汉地以后,这种二元结构图便呈现出多彩的效果。

“从嫁人”原本是孛斡勒的一部分,在蒙古统治伸及汉地之后,“从嫁人”中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与许多其他斡脱古·孛斡勒一样,作为使最为信任的近臣,被蒙古统治者委以各种重任,其本身也成为统治阶

层的一部分。

阿合马的身份是复杂的。他既是身居高位的大臣，又是察必皇后的从嫁人——世祖的家奴，他还是回回人-色目人一分子。在元代的种族等级社会里，色目人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国族，被视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但鲜有研究关注在这个种族等级制度之下，色目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其实不仅阿合马在成为重臣之后仍一直被世祖视为奴仆，回回人在蒙古统治者眼中也是奴仆。至元十六年(1279)一些来自八里灰田地[1]的回回人因拒食站户所备饭食，羊非自宰不可，沿路骚扰贫苦百姓，惊动世祖。《元典章》中保留的当时廷臣与世祖讨论此事的记载提到，成吉思汗曾因回回人不食蒙古人之食，而叱之曰："彼，吾奴也"，此语似乎给人以回回人是蒙古人的奴仆的概念。阿合马身份的揭示也许对此研究有益。

笔者在2002年8月于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蒙元史讨论会上宣读此文时，萧启庆教授等人向笔者建议在研究从嫁人的身份时，应参考张应瑞家族的情况。基于上述建议，本文在修订时增加了第7节的内容。书此谨致谢意。

2002年5月写于南京大学

2002年11月改于南京大学

（原刊于《元史论丛》，第9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页136-150。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即蒙古巴儿忽惕部居地，位于今色楞格河下游、贝加尔湖地区。

16　时代的见证
——凤凰寺与元代杭州的色目人

宋室南迁杭州后，更名临安。临安地处经济在当时最为发达的江南，且位于西湖之畔，群山环抱，环境优美。南宋定都于临安后，风俗奢靡，引起有识官僚的警觉。陈造曾为此进言：

> "古者为国三十年，当有九年之蓄。今渡江六十余年，而仅足不余，公私赘赘，其弊安在！今天下疆土不及祖宗盛时十五，而弥文浮费，乃过于祖宗时。夫贫富之理最易晓也。譬之富家，当田宅全盛，僮仆办集之时，岁入若干，其出若干，孰计而谨守之，然后其主得以雍容优游接宾客而施惠利，以结乡里之心，而家不失富。一旦家道半退，则吾亦当据其半而杀其所出，不然穷匮可立待。今日如半退之家，其用财犹不肯减全盛时，而所费或加侈焉。"[1]

除官场之外，奢靡之风也在士人间流行。宋人吴自牧就提到："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2]经过南宋政权的一个多世纪的经营，临安至宋末已经发展成当时世界最为繁华的城市。

蒙古军夺取长江中下游后，迫近临安，宋皇室见大势已去，献城投降。由于未经战火，临安城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社会生活亦未发生大的动荡。宋遗民汪元量有长诗记当时的情景："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城依旧使铜钱。"[3]有元一代，杭州虽然只是江浙行省的驻地，但由于是亡宋故都，其繁华程度不减大都，但较之宋时，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居民成分。

---

[1]〔宋〕陈造撰：《罪言》，《江湖长翁文集》卷24，明万历四十六年李之藻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2]《梦粱录》卷4，清学津讨原本。

[3]《醉歌》，载于《水云集》，清光绪武林往哲遗著本。

前人研究对入元后，各族人移居杭州有过精彩论述。[1]今存凤凰寺的阿拉伯/波斯文墓志，是当日杭州多元文化社会存在的物证。

16.1 凤凰寺所存墓志状况及前人研究

现存杭州凤凰寺的阿拉伯文墓志，原先均立于西湖畔的回民公墓，旧称"回回坟"。"墓地面积八十亩。"[2]而据参加回回坟迁移工作的回民老人马钟琪、杨金华介绍，回回坟在清波门、涌金门外，由柳浪闻莺、儿童公园从北往南，一直延续到玉皇山脚下这样一个庞大的区域内，面积超过百亩。[3]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册102，宗教条）明代，回回坟的北边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名西湖礼拜寺，[4]通称西湖小寺，主要协办回回殡葬事宜。

清末民初杭州拆城，在城墙下出土古墓三冢。据阿拉伯文碑记，系中亚西亚波斯人卜哈提亚氏（Bakhtiyār）及二从者之墓葬。当时邑绅人士改奠建墓园于清波门湖马路（现南山路）清波街口。穆民尊呼"筛海坟""爸爸坟"，世代瞻拜。[5]其中之一的碑石，即后来为学者们反复提及的回历730年（1329—1330）墓志。

据笔者见闻所及，清末民国我国回族著名经师杨敬修先生，是最早关注杭州伊斯兰教碑志的人。杨敬修（1870—1952），字仲明，号秀真，经名萨里哈，世称"杨才子"。清同治九年（1870）出生于河北盐山（今黄骅市）东段儿庄。少年时进清真寺当"海里发"（按，经学生，今通常译为"哈里发"），在沧州名师李正光的熏陶和勉励下，汉文水平大进，曾考中

---

〔1〕参见陈得芝：《"从销金锅儿"到民族熔炉——元代杭州与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变》，载于李治安、宋涛主编：《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2012年。

〔2〕丁瑞华：《杭州凤凰寺与回民生活》，兹据郭成美文《杭州回回坟考》，载于《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见页15。

〔3〕郭成美：《杭州回回坟考》，载于《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见页15。

〔4〕《重修浙江通志稿》，册102，"宗教"条。

〔5〕张文辉：《回回先贤卜哈提亚氏古墓园变迁始末》，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杭州文史资料》第23辑，1999年12月。

秀才。后迁北京,曾于1947年8月在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印所译之《〈古兰经〉大义》,以译文古雅著称。逝于1952年。[1]上海伊斯兰教协会所藏民国十年(1921)8月上海清真董事会案卷元册中,收入他所译杭州的一通阿拉伯文墓志,其文如下:

教旅卜合提亚儿墓志铭

某官卜合提亚儿者,中亚卜哈剌人。自其祖欧墨儿仕显,世为名族。父艾卜白克为官时,最喜汲引士类,扶持微弱,德施烂然,卓著声称。卜氏素性好善,颇有父祖风。恒栖牲己身,急人之难。施行异地者,多赖其口口自慰离思。以故所在相率为之感羡而翼戴之。询所谓元宗克家子也。既来华,驻杭,王积昭然可继,实垂光大之统,饮水思源,是在吾人。公生00年,若干岁于是卒而葬诸西城垣下。时我穆圣迁坛七百卅年绍蛙来(斋后月名)之二十二日,即元帝0年0月0日。铭曰:

伊何人暂,在彼天方,厌弃尘世,乐归帝乡。浮生一梦,长流古芳,前不朽兮,后克昌宅。安其仁顶,圆其光口,永命兮,托主护以无疆,谁谓潜德终幽兮,载奕世竞,相得而益彰。经云:除真宰,凡物皆毁兮。春思潜涕觉中情其不自己者,徒令悲感而共伤。[2]

此后提及卜合提亚儿墓志的者渐多,盖因1927年拆除清波门至涌金门至钱塘门沿西湖东岸岸边构筑的古城墙时,这三座回回墓再度被迁有关。据张文辉先生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史料汇编》谓"杭州工务处拆城筑造环湖马路时曾于清波门城墙之下,掘出古墓三座,碑楔大方,上镌阿拉伯文字,刊刻高古,鲜能辨认。据回教经师考译其文,系为唐、宋时代该教先贤等墓,后来将墓迁此保存。"经查考卜哈提亚氏清波门墓园原始档案(档案登记表编号000089地形图编号3-101-C;地籍图幅号1125。利用效果:原凤凰寺坟地。)与清波门卜氏墓园现存回

[1]林松:《字斟句酌推敲细,典雅凝重功力深——读杨敬修(仲明)译本〈古兰经大义〉》,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1991年,第3期。

[2]民国10年(1921)8月上海清真董事会案卷,现藏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兹据郭成美、郭群美:《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载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见页27-28。

教凤凰寺所立界石相符。[1]郭成美先生亦有类似描述：

> 这三座坟墓是民国时拆杭州城墙发现的。迁移到清波门北面转角处。该墓一穴三坟，一大二小，均为青石砌造。"外围以铁栏，石棺堆立，花纹极细，古意盎然。"[2]四周种植松柏，起半圆围墙，青石板铺地，整个坟墓颇为古老别致，壮丽美观。宁夏马福祥曾捐金修建该墓，并勒石题词。碑文云："杭州拆城时出古墓三冢。据阿拉伯文碑，为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及二从者之墓。当道拨清波门外隙地付邑绅改葬。丁卯夏余游西湖，为捐金以落其成。九月偕内子书诚重来敬题三绝，付金敬秋刊之石，以志景仰。陇右马福祥拜记。"丁卯夏，当指民国16年，公元1927年。所题三绝名"题天方先哲卜合提亚氏墓"，曰"临安自古繁华地，南渡君臣一瞬间，七百年来王气歇，独留荒冢对青山。穆教千年万化宗，宣扬经典肆东封，清波门外西湖路，却胜骊山几万重。天方先哲留三冢，其产出自中亚西，阿剌伯文传姓字，不烦冥漠为君题。"卜合提亚氏墓后迁至留下"文革"期间，被附近农民拆毁，马福祥碑及其所言阿拉伯文碑均不复见。[3]

另一位早年关注杭州阿拉伯文碑铭的重要学者是白寿彝教授，他曾撰题为《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短文，刊于《禹贡》杂志，1936年号。其文曰："近年杭州拆城，城下发现阿拉伯文及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其总数至少当在百件以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近在杭州凤凰寺得其阿拉伯文碑拓片十四幅，其中有图案一，碑头一，碑文重复者一，实计共碑文十一幅。十一幅中有年月可循者仅两幅。此幅所记年月，系回历707年11月20日，碑文不甚可解。后幅记有回历730年10月21日时期，已经马志祥先生译出，今刊其译文于其碑拓片之后。杭州此项发现，关系于中国回教史之

[1]上引《回回先贤卜哈提亚氏古墓园变迁始末》，载于《杭州文史资料》第23辑，1999年12月。

[2]白云居士：《游杭快览》，兹据郭成美：《杭州回回坟考》，载于《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见页18-19。

[3]郭成美：《杭州回回坟考》，载于《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见页18-19。

研究者甚大，惜吾人对此事之经过，知之不详，而所得之拓片，数量亦嫌过少。此二拓片问世后，甚甚望教内外贤达，多多赐教也。"[1]文后附有马志祥先生的汉文译文。

这两方墓志分别被研究者郭成美与郭君美先生简称为"707年碑"与"730年碑"。至于仙鹤寺中这批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的来历，郭成美考有专门调查，曰：1953年5月，因建设西湖风景区的需要，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迁移"回回坟"，但这里大量的是清代以前的墓葬，无人认领，由凤凰寺负责遗骨与墓碑的收集处理。遗骨用白布包起，放在一个长1米，宽半米的木箱里。有名字的，写个木牌钉在箱子上，统一埋在留下回族公墓中。挖出的石板按质分类。甲类为完整的，且朵头（横头）刻有阿拉伯文者；乙类为整副者；丙类，为较次者；丁类为零碎者。凡配成套的墓石，皆有编号。地势较高的墓迁出后，在民工挖土加高湖心亭、阮墩、平湖秋月等处堤坝时，结果发现了一层又一层的坟墓。尔后，在其他地方探测，也均发现已完成迁坟的土层之下还有墓，一般两个墓中间，隔二三十公分的土。在迁墓前，有关部门曾估计回回坟有两千多个墓，但实际挖出一万个，且其下还有。当时，因经费限制，加以墓深难寻，和古墓宜静不宜动的观念，于是决定不再深挖寻找。整个迁墓过程从1953年5月至10月历时半年，共发现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大小五六十块，运往凤凰寺保存，后遗失不少。[2]此后的情况，郭成美、郭群美有记述：

> 据杭州凤凰寺寺管会原负责人冯金良先生和浙江考古专家王士伦研究员介绍，杭州出土的阿拉伯文古墓碑，以前散落在凤凰寺各个角落，特别是寺后的几间屋子，堆放着废旧物资，不少墓碑混在里面。1974年，他们将这些碑石收集起来，进行整理修补，在寺北侧建造碑廊，存放碑石。碑廊内存有墓碑19方：前排上下各7

[1]白寿彝：《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载于《禹贡》1936年第5卷第11期。兹据郭成美、郭群美：《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载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见页26。

[2]见上引《杭州回回坟考》，载于《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4期，页18。

方，计14方，后墙上砌入5方。另有1方裸露在碑廊外。凤凰寺现共存阿拉伯文墓碑20方。707年碑即碑廊前排上面左数第1方，730年碑即前排下面左数第4方。730年碑铭比白寿彝教授1936年发表的那幅拓片（二），少最后一行文字，被修复的水泥糊住了。[1]

当代对这些碑铭做过研究的，主要是浙江嘉兴市食品公司的郭成美，其父为嘉兴清真寺阿訇郭清心先生。[2]他曾与郭群美先生合撰《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载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并刊《中国穆斯林》，1993年，第5期）；二氏还有《杭州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墓碑考》（载于《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此外郭成美先生还独撰《浙江回族伊斯兰教碑刻概述》（载于《回族研究》，2006年，第3期）。而上海外国语大学程彤副教授亦发表了《杭州凤凰寺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兼谈元代穆斯林在杭州的足迹》（载于《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1期）。凤凰寺的这些碑刻为六七百年前遗物，它们虽然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并非出自中亚及近东本土，而是在距离伊斯兰文化中心区万里之外的中国书写制成的，其书法不但古奥，且字体与表述与中亚、近东的石刻文字有明显差异。

国际学术界对古碑铭或古抄卷释读成果有共同的学术规范，即通常：应在成果中附有原始资料；原文换写；拉丁转写；详细注释。如果碑文或抄卷与撰写研究成果属于不同语言，还应加上以通用学术语言撰写的碑文的翻译。发表的就本研究而言：这里的原始资料应是尽可能清晰的碑文照片或拓片，并说明其出处，借以表明研究所据资料的可靠性。

原文换写是指研究者要提供有关碑文或抄卷原文的印刷体或正楷手写的文本，以示研究者对原文的认读结果。

拉丁转写是将穆斯林语言碑铭或抄卷原文逐字转为拉丁字母。由

[1]郭成美、郭群美：《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载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见页26。

[2]郭成美：《启蒙老师马寿千》，载于《中国穆斯林》，2008年，第2期。

于以阿拉伯/波斯文为代表的中古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均有不写元音的现象，因此同形异义词很常见，释读中对词汇中所含元音理解不同，句子意义也会不同。特别是波斯文含有表示修饰关系但不拼写的“耶札菲”结构，对“耶札菲”的有否理解不同，断句就不同，附加拉丁转写可说明研究者的断句结果。

详注则介绍研究者在释读过程中的思考内容和释疑。

对照这些要求，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的已公开发表几则研究成果，均未提供阿拉伯/波斯文碑文的“换写”（即校正文本），亦未提供碑文的拉丁转写与详细注释，不但影响其可信度，且无法列入规范的学术成果。这说明，我国伊斯兰学界目前尚未掌握独立释读与研究古代阿拉伯/波斯碑铭的能力与规范。其实在当代世界上，能独立从事此项研究者，也是屈可数的。

2009年笔者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The Binghamton）分校参加有关元史研究国际会议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 University，简称SOAS）大学的兰天浪博士（George Lane）提交了利用凤凰寺阿拉伯文碑铭研究元代杭州社会的论文。兹后，笔者向当时重建之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之姚大力教授推荐，将其文与兰天浪博士的同事亚历山大·莫顿（Alexander H，Morton）先生有关凤凰寺碑铭的初步研究的汉译文，共同发表于该院新创之《清华元史》发刊号。[1]

2010年11月杭州政协文史委主办的“元代杭州研究论坛”时，兰天浪博士与莫顿先生均前来出席，使笔者得以认识莫顿先生。莫顿先生时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学系讲师，自幼在伊朗长大，酷爱波斯文化与历史，长期研究中近东的伊斯兰碑铭，是当代西方最优秀的伊斯兰碑铭专家之一。在《清华元史》中发表的研究证明，他是担当此项研究的合适人选。在会议期间，莫顿先生在杭期间与杭州文史研究会达

[1]乔治·兰恩撰，刘毓萱、刘迎胜译：《关于元代的杭州凤凰寺》，载于《清华元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41–192；亚历山大·莫顿撰，刘毓萱、刘迎胜译：《元代杭州凤凰寺回回墓碑考》，载于《清华元史》第1辑，页193–214。

成合作协议,着手释读这些碑铭,并由兰天浪博士将其已经基本完成的碑文的释读、阿拉伯/波斯文“换写”,拉丁转写及英译原稿交由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学者核对并译为中文。参加此项工作的学者有正在北京大学访问的伊朗德黑兰大学乌苏吉(Vosougi)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系王一丹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党宝海副教授,中央编译局翻译周思成先生。这是一支很好的研究团队。

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波斯文墓碑的释读,使我们有机会通过元代遗物对证传世文献,来考察元代居杭的色目人团体。

16.2 元代杭州的回回人

16.2.1 八间房、回回大师、真教寺与聚景园

入元之前,杭州有无大量的西域人存在?据明人记载,靖康年女真军攻入开封,北宋灭亡。赵构在江南称帝,许多原先居于中原的西域人随宋室南迁,定居杭州。[2]这一记载十分可疑。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就未迁至江南。而元代回回人在杭州的墓地聚景园,在南宋时尚为皇家园苑,足见这些回回人是在伯颜克临安后才迁入此地的。此外,现存凤凰寺的回回人墓碑所载明的墓主逝年,也没有一方是在宋积年之内。

元末陶宗仪记道:“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回回婚俗与汉地不同,“虽叔伯姊妹,有所不顾。”一次荐桥的回回人举行婚礼,引来大批当地居民围观,不少人甚至攀墙上屋,以至压塌屋顶,造成新婚夫妇和宾客悉被压死的惨剧。当地人王梅

[1]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8,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叶7a。

谷[1]曾作打油诗题为《嘲回回》记此事：

宾主满堂欢，闾里盈门看。洞房忽崩摧，喜乐成祸患。

“押落瓦”碎兮，“倒落沙”泥。“别都钉”折兮，“木屑飞”扬。

……

压倒“象鼻”蹋，不见“猫睛”亮。呜呼！守白头未及一朝，赏黄花却在半晌。

移厨“聚景园”中，歇马飞来峰上。“阿剌”一声绝无闻，哀哉树倒猢狲散。

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杭州本地人对回回人的风俗非常好好奇，足见他们定居于此的时间并不长。陶宗仪还特别注明：“阿老瓦、倒剌沙、别都丁，木偰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这里提到的“压落瓦”，或为阿拉伯语“阿老丁”（‘Alā al-Dīn——按，此名意为“宗教之高贵）的缩音，或突厥语“牙剌瓦赤”（Yalawači——意为“使臣”）的音译；“倒落沙”应为阿拉伯-波斯语混合词“倒剌沙”（Daulat Šāh——意为“国王之福”）的译音；“别都钉”当为阿拉伯语“别都鲁丁”（Badr al-Dīn）的译音；而“木屑飞”显然是“木偰飞”（Muṣṭafā）的波斯语读法的译音。这些都是当时杭人已经很熟悉回回人的名字，所以才能作为隐语用在诗句中。陶宗仪记载，在灾难发生时，回回人大呼“阿剌”，当为阿拉伯语‘Allāh，指“真主”，今译称“安拉”。

至于“象鼻”和“猫睛”，陶宗仪特别注明，指回回人的相貌。说明杭人对回回人的长相也很关注。元代初入华回回人多来自西域，在人种上与汉人、南人有较大区别。高鼻深目是他们面貌的重要特征。宋人在与北族的对峙与交往中，接触到回回人。宋人注意到，“回纥皆长髯高鼻，以疋帛缠头，散披其服。”[2]文天祥在被元军俘获后，曾写了一首

---

〔1〕〔宋〕何梦桂撰：《潜斋先生文集》卷7中有《王梅谷诗序》，当即此人所作。——明刻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

〔2〕〔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6，元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陈均撰：《宋九朝编年备要》卷30记“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春正月朔，命亲王二人如虏营贺正，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同虏使八人来。”随后即述此段，仅称“旧制”，未说明系北宋时事，取自《东京梦华录》，见宋绍定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汇编》卷74亦同（清许涵度校刻本）。

题为《命里》的诗,记述他初遇回回人时的印象:

> 翌日早,铁木儿自驾一舟来,令命里千户捽予上船,凶焰吓人,见者莫不流涕。命里,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回回人也。"熊罴十万建行台,单骑谁教免胄来。一日捉将沙漠去,遭逢碧眼老回回。"[1]

这里的"命里",是文天祥所见到的千户的名字,应为阿拉伯语 Malik"王"的音译。文天祥说他"高鼻深目",胡须浓密,还说他的眼睛是"碧"色的。

元人吴昌龄在其《西游记·回回迎僧》中,称:"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睛、眼睛凹进去,鼻子、鼻子长出来"。[2]这一段戏谑文字在其他杂剧中曾反复使用,但字句有时略有变化。[3]所谓"把清斋"是指回回人按伊斯兰教规,在斋月中把斋的习俗(在此月中,自日出至日落不饮不食),与其生理长相联系起来,说回回人斋月白日不进食及不饮水而消瘦,造成鼻高眼凹的现象。元曲家"沐仲易西域人","自赋'大鼻子'《哨遍》。"[4]这里"大鼻子"当为沐仲易的绰号,体现其面目特征。

明汤显祖在《紫钗记》第30出中描述扮相回回的演员出场,亦自言道:"大河西回回粉面大鼻胡须上",其唱词中有句"骨碌碌眼凹儿滴不出胡桐半泪"。[5]这番自白也提到回回人"大鼻"与"眼凹"。田汝成描述色目人的相貌和习俗时曰:其人"隆准深眸。不啖豕肉。"[6]可见,宋

---

[1][宋]文天祥撰:《文山先生全集》卷13,别集,四部丛刊景明本。

[2][明]止云居士编《万壑清音》,白云山人校,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卷4,第1册,页269-273。

[3]如在另一则剧本中,其唱词是:"回回、回回把清斋,饿得、饿得叫奶奶。眼睛、眼睛洼进去,鼻子、鼻子堆出来"。——[清]玩花主人:《缀白裘》9集,卷1;参见吴建伟编《回回旧事类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32。

[4][明]钟嗣成等:《录鬼簿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与钟嗣成等:《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2卷;吕天成:《曲品》,2卷;高奕:《传奇品》,2卷合刊),页109。"哨遍",曲调名,音调高古。关于沐仲易,可参见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乙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见页85-86。

[5][清]玩花主人:《缀白裘》9集,卷1;参见吴建伟编《回回旧事类记》,页531-532。

[6]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8,叶7a"真教寺"条。

元明时期,江南汉人是可以从相貌上明显地区分出回回人的。

荐桥一带因历来为回回人聚居之处,故其附近的一些地名亦带有回回人的烙印。据田汝成记载,"忠孝巷,俗称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桥。"〔1〕中沙巷为宋时俗称,当时登录的正式名称为"西苍巷",称"在荐桥东而南"。其北面的"回回新桥"今尚存。

宋遗民周密的《癸辛杂识》中有《海鳅兆火》条,记:

> 壬午岁(至元十九年,1282),忽有海鳅,长十余丈,阁于浙江潮沙之上。恶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脔割而食之。未几大火,人以为此鳅之示妖,其说无根。辛卯岁十二月二十二三间(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1月13日),又有海鳅复大于前者,死于浙江亭之沙上。于是哄传将有火灾。然越二日,于二十四日之夜,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行省开元宫尽在煨烬中,凡毁数千家,然则谥传有时可信也。此欠考耳。此即出于《五行志》中,云:海鱼临市,必主火灾。行省,即宋秘书省,畜书并板甚多。故时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2〕

至元二十九年(1291)发生火灾的天井巷是南宋临安的重要地方。李心传在记南宋秘书省时曰:"秘书省在天井巷东,绍兴十三年(1143)创,以殿前司寨为之。"〔3〕除秘书省之外,宋时还有一些重要机关在此,如"勅令所,旧在天井巷,寻徙于朝天门之南",后"复徙于天井巷之南。"此外,太常寺也设于此。〔4〕元郑元祐在《古墙行》中提到,"某童时侍先人到杭,访诸故家,其数至则循王府也。府在省西天井巷,其北则油车巷也,宋诸王子孙居之者如蜂房。"〔5〕可见这里在南宋时,是临安的高级机关亲贵府邸的集中区。回回大师居于此,说明宋亡后,因江山易帜,

〔1〕《西湖游览志》卷18,叶7a"真教寺"条。

〔2〕四库本;并见吴金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

〔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现藏上海图书馆。

〔4〕〔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1,清影宋抄本;并见乾道《临安志》,卷1,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

〔5〕《侨吴集》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这里的豪宅落到回回人中。

据明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碑》记载,礼拜寺"在文锦坊之南,东向屹立","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128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有专节记载此真教寺,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Alā al-Dīn)所建。"这里提到的"回回大师阿老丁"与周密所记至元年间宅于天井巷的"回回大师"未必是同一人。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与丁鹤年之祖同名,但这不过是信奉伊斯兰教男子常见的名称,且从时间上推算,两人亦不可能是同一人。

聚景园是宋代才在杭州出现的地名,这里是宋孝宗所建皇家花苑。入元后,开始出现聚景园有回回墓葬的记载。说逝者之"棺即日便出瘗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嫠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送葬者皆号哭,声振远近。出棺时,富者则使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则无此"葬礼上还有"群回颂经"。三日后,富户多杀牛马遗赠回回乡亲。[1]

元人尹廷高有诗:《右柳浪闻莺》,其题注为"在聚景园,今为回回坟。"[2]陶宗仪也说:"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3]

从宋元史料看,"聚景园"在宋末,虽然已经破败,但其南宋皇家园苑的地位并未有变,乃处于政府管辖之下,从未有回回墓地之说。这里成为回回人墓地是宋亡后之事。

16.2.2 居杭回回人

明钟嗣成在记述元明词曲家时,提到"赛景初,西域人,大父故元中书左丞,考浙省平章政事。公天(姓)[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巎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源嘉之。后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宾)[滨]。"[4]

---

〔1〕《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送终"条,吴金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页143。

〔2〕〔元〕尹廷高撰:《玉井樵唱》卷上,四库本。

〔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

〔4〕《录鬼簿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与钟嗣成等:《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2卷;吕天成:《曲品》,2卷;高奕:《传奇品》,2卷合刊),页109。

文中提到的赛景初大父，即祖父，曾任中书左丞，当指赛典赤之孙长子纳速剌丁。纳速剌丁至元二十九年逝后，被追授予中书左丞；而其曾任“浙省平章政事”父亲，则为纳速剌丁次子乌马儿。关于乌马儿与赛景初的情况，已在有关丁鹤年的研究中作了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录鬼簿》除赛景初之外，还提到几位在杭的西域人，如“丁野夫，西域人，故元西监生，羡钱塘山水之胜，因而家焉。动作有文，衣冠清楚，善丹青小景，皆取诗意，套数小令极多，隐语亦佳，驰名寰海。《俊憨子赏西湖》月夜赏西湖，《清风领》写尽清风领，《浙江亭》游赏浙江亭，鸾栖凤碧梧堂双鸾栖凤。”[1]

丁野夫所就读之“西监”，即回回国子监，[2]可见他是回回人。《图绘宝鉴》提到丁野夫善画，称“丁野夫，回纥人，画山水人物，学马远、夏珪，笔法颇类。”[3]

元末明初人平显，是丁野夫的友人，有诗《题丁野夫画》，曰：

> 胡丁已殁四十载，化鹤来归知是非。郭外梅村更地主，笔端松石见天机。
>
> 一时好手不可遇，千古赏音如此稀。长忆西湖旧游处，画船清雨白鸥飞。[4]

在〔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所录诗中，诗中首句“胡丁已殁四十载“作”野夫已殁四十载”。[5]可见丁野夫因为是西域人，在友人中被戏称为”胡丁“。孙楷第根据诗中“郭外梅村更地主”，及平显的《题丁野夫梅村卷》诗[6]和另一首中“梅已成薪屋已摧，昨过城南旧基址”的诗句，[7]判断丁野夫在元末居于杭州南城的梅村。[8]而平显所题诗的这

〔1〕《录鬼簿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与钟嗣成等：《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2卷；吕天成：《曲品》，2卷；高奕：《传奇品》，2卷合刊），页103。

〔2〕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乙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见页87。

〔3〕夏文彦：《图绘宝鉴》卷5，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本。

〔4〕〔明〕平显撰：《松雨轩诗集》卷6，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5〕卷330，四库本。

〔6〕《松雨轩诗集》卷7，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7〕《松雨轩诗集》卷8，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8〕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乙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见页88。

幅丁野夫画，主题是杭州西湖。

嘉靖《仁和县志》提到丁野夫“后居仁和”。仁和在今杭州。此史料还提到明时仁和的一位画家丁锡“字佑之，号西坞，其先西域人，或谓丁野夫之后，卜居仁和百福巷南，自幼性巧，喜为画，遇纸辄挥，似不经意，即成景像，人已夸羡。初学戴进，乃静庵得意门下。后无常师。”[1]

又如“虎伯恭，西域人，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交爱日，以考经行史为事，发明性理之学。诗学韦柳，字法献羲，至于乐府、隐语靡不究意，与余为忘年交，不时买舟载酒，作湖山之遊，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称云。”[2]

元代移居杭州的回回人中，除了官员、商贾与宗教界以外，甚至还有一些杂耍马戏的艺人。元人王冕(1287—1359)有诗《花驴儿》，他自解其题曰：“戊寅岁(按，后至元四年，1338)，杭州有回回人牧花驴儿，能解人意，且能省识回人语言，人多观之，回人以此多获利焉。”其诗曰：

> 花驴儿，渡江踏动江南土，正值江南无马时，驴儿得志雄威武，况是能解花门语。江南淫雨二百日，洪涛巨浪掀天舞。麻麦烂死秧苗无，百姓吞声苦饥苦，驴儿啖粟恬如故。江南子弟不晓事，掷金驰逐争先睹。夸渠省得人语言，纵使能言亦何补。花驴儿，乃奇遇。昨朝方上评事听，今日又登丞相府。哮吼纵横谁敢侮，老夫平生不信怪，见此怪事欲呕吐。归来十日不食饭，抛腕攒眉泪如雨。[3]

诗中提到的“花驴”，当为斑马。有回回人以“花驴”懂得驯词者的语言为卖点，吸引杭人花钱观看。元人曹伯启遇见过海外贡使运送“花驴”赴京，并曾以“海外贡花驴过”为题写了四首有关贡献花驴之事，诗云：

> 当年老鹤快乘轩，犹逊花驴食万钱。昨夜灯前成独笑，痴儿方

---

[1]〔明〕沈朝宣纂修：(嘉靖)《仁和县志》卷10，清光绪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编本，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2]《录鬼簿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与钟嗣成等：《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2卷；吕天成：《曲品》，2卷；高奕：《传奇品》，2卷合刊)，页109。

[3]王冕：《竹斋集》卷2，清光绪邵武徐氏丛书本。

诵旅獒篇。

航海梯山事可疑,眼前今日看瑰奇。布韦且莫怀孤愤,秋菊春兰自一时。

天地精英及海隅,兽毛文彩号花驴。同来使者如乌鬼,还责中原礼法疎。

行台飞檄敬来王,多少饥膏委路傍。忽见狂人鞭老骥,眼睁成滴背成疮。[1]

他了解到这种"梯山航海"运至元境的动物身带文彩,护送的使臣肤色很深,还知道运输这种动物的过程中,每日饲料就需"万钱"。《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马八儿国进花驴二。"[2]世祖朝末期,曹伯启适为壮岁,他所遇见的或许就是这次进贡。

花驴又称为"花福禄",或"福禄"的动物。明人戴冠曾提到,"福禄似驴而花纹可爱,出忽鲁谟斯等国。"[3]《皇明象胥录》在记位于东非索马里一带的卜剌哇时,提到"花福禄状如花驴,永乐中尝遣使朝贡"。[4]明人田艺蘅还特别记载,"福禄,番人本名福俚,状如驴骡,花纹黑白交错,莹净可爱,异他兽,出忽鲁谟斯等国,《王会图》所不载者。"[5]从上述作者所描述的体态上看,这种"花驴"应当是斑马。

16.3 居杭的其他各族人士

16.3.1 样宜忽木剌与迈里古思

《至顺镇江志》提到,薛迷思贤(Sämiz Kent——突厥语,此言"肥城",即撒麻耳干 Samarqand)人马薛里吉思(Mar Särgis)在杭州荐桥所建十字寺"样宜忽木剌"。穆阿德多年前已经指出,"样宜"当为突厥语

[1]曹伯启撰:《曹文贞诗集》卷8,七言绝句,至元四年曹复亨刊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2]《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9。

[3][明]戴冠撰:《濯缨亭笔记》卷9,明嘉靖二十六年华察刻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

[4]明崇贞刻本,卷5。

[5][明]田艺蘅撰:《留青日札》卷29,明万历三十七年徐懋升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yängi的音译，此曰“新”。[1]《高昌馆杂字》“地理门”中有“新，yängi，养吉”。[2]元中期以后，塔剌思由四座小镇组城，其中一座称为yängi，意为“新”，所以明代陈诚使西域记录中称塔剌思为“养夷”。[3]宋元时代畏兀儿五城中有“仰吉八里”（Yängi Balïq），意为“新城”。“样宜忽木剌”，中的“忽木剌”，乃叙利亚文umra的音译，意为寺院。这里“样宜忽木剌”（Yängi Umra）“新寺”的意义与其汉名“大普兴寺”不符。

“样宜忽木剌”既然在突厥语中意为“新寺”，或许意味着此处原先还有一所也里可温教堂，也许在马薛里吉思称之为“老寺”。元末活跃于浙江的有一位西夏人迈里古思，其名称可复原为基督教名Markus（今译为“马可”）。按戴良的记载，他是武威人，汉姓吴氏。[4]值得注意的是，其曾祖、祖的名称也是基督教名。据《故忠勇西夏侯迈公墓铭》记：“君讳迈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也。曾祖月忽难（Yehuna——今译为“约翰”）祖也失迷（Jesev——今译为“约瑟夫”），俱不仕，父别古思，官于杭，生君。”[5]可见迈里古思出自河西的基督教家族。

---

〔1〕见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页172，注(13)。穆尔汉名为穆阿德，此承蔡美彪先生相告。

〔2〕北京图书馆善本丛刊，6，书目文献出版社，页6。

〔3〕《西域番国志》，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图书第1集，叶15。

〔4〕《迈院判哀诗序》，《九灵山房集》卷13，四部丛刊景明正统本。马可波罗曾记甘州有基督教，但他未经过武威。

〔5〕《东维子文集》卷24，四部丛刊景旧抄本。据陶宗仪记载，迈里古思后来居松江，见《辍耕录》卷10“迈里古思”条。王逢有诗题《寄迈善卿宪幕》，《梧溪集》卷3，元至正、明洪武间刻景泰七年陈敏政重修本，清陆贻典校并跋，卷1至4及他卷缺叶配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元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并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刊本，1985年。

元人邵亨贞撰有《进士吴善卿赴黟县教谕醵赆序》（《野处集》卷2，四库本），当是迈里古思中进士以后所作。

元末明初人袁凯的《海叟集》中有诗《席上怀吴善卿》（卷2，明万历三十七年张所望刻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以下同）、《马氏西园宴别吴进士善卿》（卷3），均为迈里古思而作。这两首诗均收入〔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287。

入明后与宋濂一起主修《元史》的王袆在元末也与他有交往。王袆曾作《丁酉(1357)五月六日吴善卿宴诸公越城外唐氏别墅，分得轻字》与《陪善卿枢密诸公看潮得流字》（《王忠文集》卷2，四库本），均为与之唱和之作。

这个家族既为也里可温教徒,居杭时应当有机会参加当地"十字寺"中的宗教活动。如果元时杭州有新、旧两所基督教堂,他们应当为哪个教堂的教众呢?笔者注意到,马薛里吉思以突厥语薛迷思贤(Sämiz Kent"肥城")称谓自己的家乡,而不用知名度更广的撒麻耳干(Samarqand);他所建的七所教堂的番名均有突厥语名,包括上述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而他本人的汉字写为"马薛里吉思"(Mar Särgis),而未写为"马撒里吉思"(Mar Sargis),反映出其名称是按突厥语元音和谐律含前元音的词发音的。因此,他所建的"样宜忽木剌"(新寺),应当是一所使用突厥语的聂思脱里教徒们活动的场所。

再回过头来看西夏人迈里古思,其名称虽然可还原为基督教名Markus,但"迈里古思"的汉字写法,说明此名也是按突厥语元音和谐律含前元音的词发音的,更准确地说,其名称应当还原为Markus的突厥语读法(Märgüs)。因而从这一角度判断,即使元时杭州有两所基督教堂,对迈里古思家庭吸引力更大的应当是马薛里吉思所建的"样宜忽木剌"(新寺/大普兴寺)。换句话说,迈里古思家族很可能是这所教堂的教众,甚至其家有可能就在荐桥附近。

据陶宗仪记载,至正十二年(1252),杭州被起义军攻破,因之被元廷罢免的官员中有"月忽难",[1]可见至元末杭州尚有基督教徒。这所十字寺至明初尚存。据田汝成的记载,"十方寺"[2]的旧址,在荐桥东,"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吏部侍郎谢丕将其改建为"三太傅祠",以奉祭谢氏的三位先人。[3]这里提到的所谓"元僧也里可温"即上述马薛里吉思。

16.3.2 主鹘人

从伊本·白图泰的记载可知,这里还有犹太人。白图泰并非第一位提及元代居杭的犹太人的作者。杨瑀提到,至元间处州所产甘蔗均供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宦皆主鹘回回富商也"。主鹘回回即犹太

〔1〕《辍耕录》卷14"萧景茂"条。

〔2〕"十方寺"当为"十字寺"之误。

〔3〕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16,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叶11b。

人。一次有人从这些主鹘富商那里购砂糖10斤，被索银数十倍于官价。[1]这些在杭州砂糖局为宦的主鹘人，很可能就生活在荐桥一带。

这些犹太人在杭州生活了几个世纪。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万历三十三年(1605)6月下旬，有一位来自开封的中国犹太人艾田来到北京赶考，听说北京有一位外国夫子，信奉唯一的真神，遂前往拜见利玛窦。据利玛窦描述，艾田的外貌完全不像一般的中国人。艾田除向利玛窦介绍了开封的犹太人以外，还提到杭州的犹太人比开封还要多，那里也有祝虎院，即犹太寺。[2]这些杭州的犹太人当是元代在杭州砂糖局做官的主鹘人的后裔，他们在元亡后继续在那里生活了200多年。[3]

认真剖析凤凰寺所存的这一批伊斯兰墓碑，将它们置于元代杭州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中观察，可以帮助我们窥视到杭州历史上这一非常重要的一时期的面貌。莫顿先生利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所做的解读，是极为可贵的。希望中国的同事们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下去。

(本文收入李范文先生祝寿文集，待刊。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1]《山居新语》，余大钧点校，中华书局，与《玉堂嘉话》合刊本，2006年。

[2]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7年，页115-117。

[3]参见拙文《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载于《元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08。

17 丁鹤年及其家族杂考

丁鹤年为元末明初著名回回诗人,他的族兄吉雅谟丁与其兄爱理沙也是高度汉化的回回士人。有关丁鹤年最重要的史料为元末文人戴良的《高士传》[1]与乌斯道的《丁孝子传》[2]。《明史》卷386《文苑》中有《丁鹤年传》,但并非独立史料,乃据上述《高士传》《丁孝子传》与其他史料写成。

17.1 有关其先辈的考察

丁鹤年原籍西域何地,其先祖何时进入中原,恐怕丁鹤年本人也已不清楚了。元末时,其家族的历史只能上溯四代,即可上推至忽必烈时代。

据《高士传》,其曾祖名阿老丁('Alā al-Dīn),而曾祖之弟名乌马儿('Umar),两人均为回回巨商。《高士传》说,"当世祖皇帝徇地西土,军饷不继,遂杖策军门,尽以其资归焉。"所谓"世祖皇帝徇地西土",当指宪宗朝忽必烈受命西征大理事。估计他们因之成了忽必烈的家奴,因此丁鹤年祖父苫思丁(Šams al-Dīn)才会成为晋王甘麻剌的从官。《高士传》继而言,此后"乌马儿擢某道宣慰使。其后招降吐蕃有大功,遂自宣慰拜甘肃行中书左丞。[3]"没有任何史料提及乌马儿在哪一处宣慰司任宣慰使,但从乌马儿后来因招降吐蕃有功,擢升为甘肃行中书左丞

[1]收于戴良的文集《九灵山房集》卷19,上海涵芬楼借印罟里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正统间戴统刊本,四部丛刊,第243。鹤年《寄九灵先生诗》有"万言椽笔今无用,闲向林泉纪逸民"之句,并自注"先生尝为予作传"。可见鹤年曾亲见此传,故而有很高的可信性。

[2]收于明乌斯道:《春草斋集》卷7,民国四明丛书本。

[3]笔者在元明文献中搜检过元初曾任甘肃行省左丞者,未见有名乌马儿者。

看，其所任职的宣慰司应为处地西北，当与吐蕃为邻。查元代文献中宣慰吐蕃有关的史料有以下几则：

（1）至元"六年，以河州属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史》卷60《地理志》。

（2）探黄河源。此事在元人王喜所撰之《治河图略》中所收之《河源之图》有记载：

臣按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余泓，蹑高山下瞰，灿若列星，故名火敦，即星宿海也东汇于泽，又东为齐必勒；一水西来，名赤里出；一水南来，名忽兰；一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名脱可尼，是为黄河。又东歧为九渡，尚清，浅可涉。又东五百里，始浑浊奔悍，又三千里，合二水，折西，经乞里塔昆仑山之阴，四时积雪。又北东至贵德州，隶河州吐蕃等处宣慰司所辖。然后抵积石，与《禹贡》导积石者合，上去星宿海盖六千七百余里。此据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遣招讨使笃什亲历而言。臣所以并纪此图，以知河源之远，宜其末流之盛大而难制也。[1]

（3）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中有关至元十二年（1275），因北庭与火州为西北诸王所占，畏兀儿人在纽林的率领下内迁至甘肃。后来"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焉。会吐蕃脱思麻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领本部探马赤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贼用敛迹，其民以安。武宗皇帝召还，嗣为亦都护。"[2]

再联系乌马儿与其兄阿老丁最初加入忽必烈阵营是在他经吐蕃东

---

[1]［元］王喜撰：《治河图略》，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张海鹏刻墨海金壶一百十五种本，现藏北京图书馆。试比较《元史》卷63《地理志》中的记载：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各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临川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今取二家之书考定其说，有不同者附注于下。"——《元史》卷63《地理志·河源附录》。

[2]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并见《元史》卷122《巴而术阿儿忒的斤传》中有的相应部分。

境南下，征大理之时。因此笔者推测，乌马儿参与招降吐蕃后，其所官之宣慰司有可能是上文中提到的河州吐蕃宣慰司，此后除授甘肃行省官才合理。唯其招降吐蕃事，是与至元十七年笃什（都实）探河源事有关，还是与后来纽林的斤镇吐蕃宣慰司有关，待考。

据《高士传》，丁鹤年祖父名苫思丁（Šams al-Dīn），是穆斯林男子常用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教门之太阳”，在元代常音译为赡思丁，或瞻思丁。《高士传说》他“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笔者曾试图查证丁鹤年家族在临江时的实情，并为此搜检元代曾任临江路达鲁花赤者有关的史料，迄今检得三则。其一为明隆庆《松江府志》：“［元］临江路达鲁花赤：哈剌台（Qaratai）、木八剌（Mubārak）。”[1]文中所提到的两位曾任本路达鲁花赤者哈剌台（Qaratai）与木八剌（Mubārak），其中之木八剌（Mubārak）显然是回回人。崇祯《清江县志》在提及清江县学田时记曰：

［学田］宋代未详。元至正八年（1348），临江路达鲁花赤木八剌以县学岁计缺，乃计路学撙节赢钞，命县尹张悦遂、照磨邓椿，察民田之愿鬻者，优直售之。会木八剌卒，知事芊沂继其事，于是田入学者百有六十亩。[2]

同书同卷，在记当地的书院时，又提到：

［清江书院］在县治东，宋直秘阁张洽建。元至正八年（1348），临江路达鲁花赤木八剌、县尹张悦遂增置学田一百六十亩。见赵浚明《县学买田记》。

由此可知，木八剌至正八年（1348）在临江路，其时已为元末，故他不可能与丁鹤年祖父苫思丁（Šams al-Dīn）有什么直接关系。崇祯《清江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了一首刘永之的诗《奉答定使君巡城诗》，在标题之下以小字注“定为临江路达鲁花赤”。[3]刘永之为元末明初文人，[4]故而这位答定也是元末出任临江达鲁花赤的。由此我们知道了

[1]［明］管大勋、刘松纂修：（隆庆）《临江府志》卷5，明隆庆刻本，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2]［明］秦镛纂修：（崇祯）《清江县志》卷3，明崇祯刻本。

[3]［明］秦镛纂修：（崇祯）《清江县志》卷9。

[4]［明］秦镛纂修：（崇祯）《清江县志》卷8“人物志”中。

三位在元代曾任临江路的达鲁花赤者,惟并无名苫思丁者。

《高士传》称丁鹤年之父名职马禄丁(Jamāl al-Dīn),也是穆斯林男子常用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教门之美",在元代常音译为札马鲁丁,或札马剌丁、哲马鲁丁等。他进入官场较晚,"年四十,始应野怜真丞相辟主临川县簿,以治行高等,升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为筑'种德之堂'[1],请曰:'吾县盖公之桐乡,愿留居毋去。'武昌公亦爱其土俗异他处,遂家焉。"

据《元史》,至正九年,有亦怜真班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此人至正十二年又为江西行省左丞相。[2]《高士传》中提到的提携职马鲁丁的野怜真丞相,是否即此亦怜真班,待考。笔者曾试图在元代史料中查找有关元代任临川县簿者、武昌县达鲁花赤者及武昌"种德之堂"的资料,以图进一步确定职马鲁丁的情况,但未有收获。

17.2 丁鹤年身世与家庭的疑点

17.2.1 姓氏来源

回回人冠汉姓之风始于元后期。明人徐象梅(约1596年前后在世)撰:《两浙名贤录》在记录丁鹤年时说,其"先西域人,父职马禄丁徙居武昌,鹤年因以丁为氏"。[3]与徐象梅大致同时代的蒋一葵在言及丁鹤年时亦说,"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国,鹤年因以丁为姓。"[4]故而鹤年以丁为姓,当取自其父之名职马禄丁(Jamāl al-Dīn)的最后一个字"丁"。"丁"(Dīn)为波斯语,意为"宗教",阿拉伯语借用此字。元代回回

[1]种德堂在宋元明时广泛存在,其作用是倡导祖先的德行,鼓励后世子孙继承先辈精神。如曹伯启《蔡茂先御史种德堂》诗云:

人间种德如种树,培植日久生辉光。吾侪未达感应理,直以风水萦肝肠。

夫君善庆目所击,声誉赫奕家弥昌。要将成绩示来裔,特书二字名高堂。——《曹文贞诗集》,卷2,至元四年曹复亨刊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2]《元史》卷42《顺帝纪》。

[3][明]徐象梅撰:《两浙名贤录》卷54"贤寓"。

[4][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纪》卷77。

人名中以“丁”为尾音者甚多,故而回回人中的“丁姓”并非出自同一姓祖。汉字“丁”为后鼻音字,而其所对应之波斯语原字Dīn却无后鼻音,足见当今我国西北地区“回腔”前后鼻音不分的现象来渊源甚古。

蒋一葵还说,“丁鹤年,字鹤年。”[1]后人多取此说,如清初顾嗣立所编之《元诗选》在介绍丁鹤年时,称“鹤年,以字行,一字永庚,西域人也。”[2]按此说法,鹤年与永庚均为其字。鹤年应有本名,即回回名,但未见史料提及。

按《高士传》的记载,鹤年在兄弟姊妹中年齿最幼。他至少有一位姐姐,名丁月娥,也冠丁姓。现存有关她最早的资料为明王圻所撰之《续文献通考》,其中云:

> 丁氏,名月娥,西域人军职马禄丁之女,归芜湖葛家。已而南北兵起,僦居郡中。无何,沔寇奄至,城失守,月娥慨然曰:“吾簪缨家女,何忍见犬豕耶!”即抱所生女赴水死。婢媵凡九人,皆争入水,无后者。[3]

清初修《明史》时,丁月娥的事迹被收入《列女传》,其资料也更为详尽:

> 月娥西域人职马禄丁女,芜湖葛通甫妻。少聪慧,通经史义。入葛门,长姒卢服其德,率诸妇、诸女受教。太祖渡江六年,汉兵东下,郡邑恂甚。卢曰:太平有城郭可恃,使月娥率诸妇、诸女避郡中。未几城陷,寇兵肆掠,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诸妇、诸女咸惊愕曰:“姆死义,我侪可幸生乎!”亦相与投水中,凡九人。郡人于故居之南黄池里作巨穴同葬,题曰:十女墓。[4]

17.2.2 诸兄

丁鹤年兄长中最著名者为爱理沙,其名大致可还原为‘Alī al-Rizā,

---

[1]〔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纪》卷77。

[2]《元诗选》,初集,卷63,中华书局,2002年。清末陈衍所辑《元诗纪事》中照录此说,见卷11,清光绪铅印本。

[3]〔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75《节义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明史》卷394《列女传》。同赴死诸女称月娥为“姆”,乃指女师。

为元末回回著名士人。明末人蒋一葵称其为鹤年次兄,[1]清初钱谦益与顾嗣立均沿袭之。[2]此说恐不确,鹤年次兄应另有其人。《元史·顺帝纪》提到,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丁丑,徐寿辉伪将倪文俊复陷沔阳府。威顺王宽彻普化(Künjäk Buqa)令王子报恩奴等同湖南元帅阿思蓝(Arslan)[3]水陆并进讨之。至汉川,水浅,文俊用火筏烧船,报恩奴遇害。"[4]同年六月,明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元廷调动各路军马进攻红巾,其中命"章佩监丞普颜帖木儿、翰林修撰烈瞻招谕沔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等助之。"[5]《元史·顺帝纪》提到的翰林修撰烈瞻,即鹤年之兄烈瞻,鹤年自述为其"仲兄",在《哭阵亡仲兄烈瞻万户》诗中,鹤年写道:

独骑铁马突重围,斩将搴旗疾似飞。金虎分符开幕府,玉龙横剑卫邦畿。

委身徇国心方尽,裹革还乡愿竟违。病卧沧江怜弱弟,看云徒有泪沾衣。[6]

前述至正十五年正月烈瞻奉诏招谕沔阳后不久,当即战死。鹤年闻噩耗时,已避兵镇江。"仲"在兄弟排行中居次,故而烈瞻应为鹤年次兄,爱理沙应再居其次。

鹤年有两首诗提及一位"应奉兄",其中一首题为《寄胡敬文县尹胡遂初真人海上漕舟北还,得应奉兄家书,云湖广亲(旧)[朋]兵后仅余二公,感而赋诗以寄》,云:

湖北衣冠霭士林,十年兵革尽消沉。昆冈火后余双璧,锦里书

---

[1]"次兄爱理沙丁,字允中"。——《尧山堂外纪》卷77。

[2]"爱理沙,鹤年之次兄,字允中"。——[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6,补诗,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应奉阿里沙,阿里沙,字允中,鹤年之次兄"。——《元诗选》,初集,卷63,中华书局,2002年。

[3]《元史本证》卷40,证名4:阿思兰,余阙传。

[4]《元史》卷44《顺帝纪》。

[5]《元史》卷44《顺帝纪》。

[6]《鹤年先生诗集·哀思集》,清光绪十四年董金鉴活字印琳琅秘室丛书本,傅增湘校补并跋,现藏北京图书馆。丁生俊先生已经确定《元史·顺帝纪》中之翰林修撰烈瞻,即鹤年仲兄,参见丁生俊编注:《丁鹤年诗辑注》,中国回族古籍丛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43。

回抵万金。

凫舄趋朝天阙近，霓裳度曲月宫深。谁知海上垂纶者，去国长悬万里心。[1]

诗中所提到的鹤年友人县尹胡敬文笔者未能找到进一步资料。序言称“真人海上漕舟北还，得应奉兄家书，湖广亲(旧)[朋]兵后仅余二公”。足见“应奉兄”当时人在大都，但对湖北的时局消息非常关心。他利用友人乘海漕船南还之便，顺捎家书给鹤年。其时鹤年应在镇江。清初钱谦益与顾嗣立在言及爱理沙时，均称他进士及第后，仕翰林应奉文字。故而丁鹤年诗中所提及的应奉兄，即爱理沙。

爱理沙至正中参试登科，有很高的文学修养。鹤年避乱浙东后，与友人戴良密切往来的消息，爱理沙亦有所闻。爱理沙有诗题戴良的《九灵山房图》，曰：

梦里家山十载违，丹青只尺是耶非。墨池新水春还满，书间[2]浮云晚更飞。

张翰见机先引去，管宁避乱久忘归。人生若解幽栖意，处处林丘有蕨薇。[3]

爱理沙所任职之翰林应奉文字，即翰林国史院中的应奉翰林文字，该院设此职五员，品资为从七品。[4]翰林国史院为正二品，故而应奉文字并非显宦，只是下级佐僚。

丁鹤年另一首提到“应奉兄”，即爱理沙的诗是《读应奉兄登科记，怆然伤怀，因成八韵》，诗云：

射策彤庭被宠荣，遗编三复若为情。重伤赵璧经时毁，翻恨隋

---

[1]《鹤年先生诗集·海巢集》。此诗尚有另一版本：

“《寄胡敬文县尹胡遂初真人时二公皆在京师》

全楚英材集士林，十年兵革尽消沉。昆冈火后余双璧，锦里书回抵万金。

凫舄趍朝天阙近，霓裳展曲月宫深。谁知海上垂纶者，去国长悬万里心。”——[明]孙原理辑：《元音》卷12。

[2]此句中之“间”字，在[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中作“阁”，见甲集前编，卷6。

[3][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纪》卷77。

[4]《元史》卷87《百官志》。

珠彻夜明。

洪范有书传太乙，佳城无郭葬长庚。青云路断甘沦没，碧海尘飞苦变更。

自信为臣当委质，谁能向贼更求生。家贫寡弱遗妻子，道远存亡隔弟兄。

一旦音容成永诀，十年涕泪镇交横。茫茫原隰无求处，独立长风送雁声。[1]

其中"佳城无郭葬长庚"，"家贫寡弱遗妻子，道远存亡隔弟兄。一旦音容成永诀，十年涕泪镇交横中"等句，说明此诗作于爱理沙死后。而诗中"谁能向贼更求生"一句则表明爱理沙死于兵乱。

此外，鹤年还有一首题为《送四兄往杭后寄》的诗：

临别强言笑[2]，独归情转哀。离魂凄欲断，孤抱郁难开。

太守堤边柳，征君宅畔梅。过逢如见忆，烦寄一枝来。[3]

爱理沙仕宦后未至江南，故此"四兄"或指其另一位兄长，究竟是谁，待考。

综前所述，细究现存文献中所记丁鹤年兄弟姊妹的史料，可以发现，在已知职马禄丁诸子女，即丁鹤年的姊妹中，仅有鹤年与其姐月娥不但冠"丁"姓，且其名字也完全是汉式的。爱理沙虽然汉文化修养很高，且有字"允中"，却未见冠丁姓。其仲兄烈瞻亦未见冠丁姓。且此两人均以回回名行于世，这是什么原因？

17.2.3 职马禄丁诸妻

17.2.3.1 长妻——咸阳王府的千金说

职马禄丁的长妻并非丁鹤年的生母。在《高士传》中，其父的正妻称为母夫人。该传称，徐寿辉军进攻武昌时，鹤年时年十八，"奉母夫人以行"，这位母夫人并非鹤年生母，当为职马禄丁正妻。

《高士传》在描述此前不久职马禄丁的家庭时提到，鹤年"诸兄皆官

[1]《鹤年先生诗集·哀思集》。

[2]丁生俊校注本此句作"临别强笑言"，见《丁鹤年诗辑注》，页16。

[3]《鹤年先生诗集·海巢集》。

千里外，无他兄弟备养”。这里提到的“诸兄”，大概就是指这位正妻所生诸子。职马禄丁去世后，其家庭当由这位正妻，即鹤年的母夫人主持。笔者推测，“母夫人”之所以派鹤年护送自己出逃，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鹤年生母为汉人，故而鹤年的体质特征不易被辨识为色目人。

二是，鹤年汉化程度深，逃亡沿途便于与外界沟通。

三是，鹤年为“庶出”，有义务侍奉“母夫人”。

鹤年与“母夫人”他们一行花费“三阅月始达镇江”。《高士传》所描述的途中“菽水不给，虽佣贩贱业，骑射卑軄，皆趍为之不问”，透露出逃亡的经历的确非常艰难，耗尽所有盘缠，鹤年不得不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从事各种卑贱职业，以供奉“母夫人”，护送其安抵镇江。后来鹤年奉“母夫人”居镇江数年，直至其逝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在职马禄丁正妻面前地位的低下。那么，这位“母夫人”是谁？笔者迄今未见有文论及。

丁鹤年有好几位表兄。表兄即母亲兄弟之子，探讨丁鹤年表兄的情况不失为找寻其父职马鲁丁诸妻的一条途径。据笔者所知，丁鹤年诸表兄之一名吴惟善，乃樊川人。[1]清人汇集的元诗选集中收罗了几首他的诗作，如钱谦益所辑《列朝诗集》有两首，一首题为《寄武昌诸友》：

黄鹤山前汉水濆，一时英俊总能文。金钗佐酒年俱少，银烛钞书夜每分。

雁杳鱼沈劳远思，狼贪羊狠绝前闻。兵戈故国知谁在，目断西南日暮云。[2]

此诗当写于元军在湖北与红巾军鏖战时。《元诗选》中也收录了一首吴惟善的《小游仙》：

河汉无声海月寒，长鲸吸浪洞庭干。一声铁笛风云动，人在危

〔1〕〔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6。

〔2〕〔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6。

楼第几阑。[1]

从诗的内容看,吴惟善是站在元当局一边的,当时元军已经失去对两湖地区的控制。从这一点判断,其写作年代当稍晚于前首诗作。钱谦益所收吴惟善的另一首诗是写给丁鹤年的,题为《寄东海鹤年贤弟》:

鹤皋东望接三山,海上群仙日扣关。虎守月炉丹炼就,龙吟霜匣剑飞还。

故园松菊余三径,老屋烟霞恰半间。为问林泉逃世者,如公今有几人闲。[2]

此时丁鹤年已经在浙东。吴惟善是扬州北面不远处的樊川人,其地与镇江很近,不过隔扬子江相望而已,但笔者没有找到丁鹤年奉母夫人避兵镇江时与吴惟善往来的资料,可见元末兵乱时,吴惟善并不在樊川。此外,除元末明初人黎民表的一首诗《寄吴惟善、陆本仁二君》:

五湖秋望远,怀古意徒深。尔逐关门吏,犹悬魏阙心。

相思如梦寐,得句动沉吟。愁绝荆溪上,菱歌不易寻。[3]

尽管今天也许已经找不到有关吴惟善更多的资料,但从他与丁鹤年既以表兄弟互称,则其姑母当为职马禄丁诸妻之一无疑。从姓氏与籍里看,吴惟善当为汉人,由此观之其姑母应当不是丁鹤年奉之外逃的职马禄丁的"母夫人"。

丁鹤年还有一位表兄姓白,他有一首诗题为《奉寄表兄白留守兼呈杨廉使》:

白发先朝旧从臣,悬车遍看五湖春。养恬高节矜持重,优老浓恩拜奉频。

每有缁黄谈幻化,可无朱紫问经纶。座中不遇杨开府,肯把平生对客陈。[4]

时诗写于明初,其时这位白留守年事已高,坚守元遗民气节。除此

---

〔1〕〔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64。

〔2〕〔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6。

〔3〕〔明〕黎民表撰:《瑶石山人稿》卷7,清道光粤十三家集本。

〔4〕《鹤年先生诗集·海巢集》。

诗外，笔者未能查到有关此人的更多信息。但如果白留守的姑母是丁鹤年的"母夫人"的话，丁鹤年应当与他有更密切的往来。以此反证，鹤年之父职马禄丁的正妻并不是娶自白家。

丁鹤年还有一位表兄赛景初，为咸阳王赛典赤裔孙。明钟嗣成在记述元明词曲家时，提到此人，称他为：

> 西域人，大父故元中书左丞，考浙省平章政事。公天姓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巎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源嘉之。后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宾)[滨]。[1]

文中提到的赛景初大父，即祖父，曾任中书左丞，当指赛典赤之孙长子纳速剌丁。纳速剌丁至元二十九年逝后，被追授予中书左丞；而其曾任"浙省平章政事"父亲，则为纳速剌丁次子乌马儿。这位赛景初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7.2.3.2　桑哥同党乌马儿

乌马儿是世祖朝色目高官集团的重要成员，为丁鹤年舅父，但其身世有许多疑点。至元二十四年之前，曾与沙不丁任二十六年(1289)，曾受桑哥举荐任江淮行省平章，[2]故而乌马儿与沙不丁均为桑哥同党。桑哥倒台后，乌马儿也受牵连下狱，事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冬。《元史》记此年冬十月"敕没入琏真加、沙不丁、乌马儿妻，并遣诣京师。"[3]负责处置乌马儿的重要人物是蒙古燕只斤氏彻里。

彻里又作彻理，姚燧有《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记此事经过稍详。桑哥钩考钱粮，在南方引起社会动乱，彻里在世祖面前数发其奸，犯颜直谏，世祖为之震怒，"遣左右批其颊"，彻里犹辩不已，"帝意始解，命将卫士百人，控鹤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罪既彰白，始钤其人，诸系计局者皆出之。"由此开始清除桑哥党羽，拘系者有"浙省诸臣平章，左右丞参政乌马、蔑列、忻都、王济等

---

〔1〕钟嗣成等：《录鬼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与《录鬼簿续编》，1卷；朱权：《太和正音谱》，2卷；吕天成：《曲品》，2卷；高奕：《传奇品》，2卷合刊)。

〔2〕《元史》卷205《桑哥传》："桑哥尝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

〔3〕《元史》卷16《世祖纪》。

家，并桑葛之姻鄂省要束木”。〔1〕上引《徐国公神道碑》说，上述诸人“皆醢以谢天下，以成其狱。”“醢”(hǎi)，意为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而《彻里传》则称在拘系桑哥之后，彻里“复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党江浙省臣乌马儿、蔑列、忻都、王济〔2〕，湖广省臣要束木等，皆弃市，天下大快之。”〔3〕总之，按彻里家传资料，乌马里是被杀了。

但查证其他资料，可发现此案受牵连人员并未全部被处死。《世祖纪》提到，在事发后的次月，即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剌丁灭里、乌(里)[马]儿、〔4〕王巨济、琏真加、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与，受赇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载路，今或系狱，或释之，此臣下所未能喻。’帝曰：‘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在狱，〔5〕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6〕

在牵入此案的一名重要人物是纳速剌丁灭里(Nasr al-Dīn Malik)。汪辉祖《元史本证》卷38，证名2将之分为两人，即纳速剌丁与灭里。《元史》卷16《世祖纪》标点本校勘记(11)虽确定此名为“纳速剌丁灭里”，但在其余各处均点断为两人人。高荣盛教授已经指出，将“纳速剌丁”与“灭里”点断有误，并举出《元史·崔彧传》称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为“三人”加以佐证，〔7〕此说甚是。

这里言及在事发一个月后，桑哥党羽中沙不丁被释，而纳速剌丁灭里仍在狱中，但未言及乌马儿。案件审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处置方案明晰起来，《世祖纪》提到：

〔1〕姚燧：《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4。此碑为《元史》卷130《彻里传》之所本。今存《牧庵集》各种版本中，源于非汉语的专门术语在乾隆修四库时改过，故《徐国公神道碑》当参照《元文类》卷59(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2〕周良霄《〈元史〉校点献疑》(《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认为：党附桑哥者有王巨济，此处脱“巨”字。(点校者注：提到桑哥党属“王济”的还有《元史》卷172)。

〔3〕《元史》卷130《彻里传》。

〔4〕《元史》标点本校勘记(10)：乌(里)[马]儿据上文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壬寅、二十五年四月辛酉、二十八年十月己丑诸条及本书卷130彻里传、卷205桑哥传改。本证已校。

〔5〕《元史》标点本校勘记(11)纳[速]剌丁灭里据上文补。按本书卷130《不忽木传》、卷173《崔彧传》均作“纳速剌丁灭里”。

〔6〕《元史》卷16《世祖纪》。

〔7〕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12，注(2)。

庚辰,月儿鲁等言:"纳速剌丁灭里、忻都(Hindu)、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其初士民犹疑事出国家,今乃知天子仁爱元元,而使民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莫不愿食其肉。臣等议,此三人既已伏辜,乞依条论坐以谢天下。"从之。[1]

而纳速剌丁灭里、忻都与王巨济三人被处死的时间是次月,《世祖纪》对此有明确记载:

丁未,纳速剌丁灭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理逋负迫杀五百二十人,皆伏诛。王巨济虽无赃,帝以与忻都同恶,并诛之。[2]

前已提及,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被杀事,《崔彧传》中在至元二十八年项下亦有记载:

又奏:"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积久逋赋,期限严急,胥卒追逮,半于道路,民至嫁妻卖女,殃及亲邻,维扬、钱唐受害最惨,无故而殒其生五百余人。近者,阇里按问,[3]悉皆首实请死,士民乃知圣天子仁爱元元,而使之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莫不愿食其肉。臣等共议: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书省、御史台,从公论罪,以谢天下。"从之。[4]

中书省与御史台为此还共同制定了"赃罪十三等,枉法者五[5],不枉法者八[6],罪入死者以闻。制曰'可'。"[7]由此可见,在桑哥被杀后,继而被处死的大臣是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三人,但乌马儿未被

[1]《元史》卷17《世祖纪》。

[2]《元史》卷17《世祖纪》。

[3]"阇里",《蒙兀儿史记》卷104《崔彧传》作"彻里",注云:"原作阇里,校从本传"。

[4]《元史》卷173《崔彧传》。

[5]《蒙兀儿史记》卷8下注"自一贯至十贯,笞四十七起。至百贯,笞一百七。"

[6]《蒙兀儿史记》卷8下注"自一贯至二十贯,笞四十七起。至三百贯以上者笞一百七。"

[7]《元史》卷17《世祖纪》。

提及。

其实参与处置乌马儿案的，并不止彻里一人，康里人不忽木也是与案的重要大臣。《不忽木传》提及桑哥案说：

> 桑哥党人纳速剌丁等既诛，帝以忻都长于理财，欲释不杀。不忽木力争之，不从。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1〕

在被处死的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三人中，纳速剌丁灭里是罪有应得，先被处决，他家中的聚额财产亦被处置。《至顺镇江志》提到忽必烈之子脱欢太子镇南王的家产中就有籍没的纳速剌丁灭里的田产多处：

> 镇南王府四十二顷九十六亩六分二厘至元二十九年拨赐断没纳速剌丁灭里等家产，俱系有司。丹阳县三十三顷四十二亩一分：官三顷八十七亩，民二十九顷五十五亩一分。金坛县民九顷五十四亩五分二厘田三十九顷六亩六分七厘丹阳县二十九顷五十二亩一分五厘：官三顷八十七亩，民二十五顷五十五亩一分五厘。金坛县民九顷五十四亩五分二厘地三顷八十九亩九分五厘并丹阳县。〔2〕

另一位涉案者王巨济其实并未贪赃，只因党附桑哥而被杀。而忻都，因善于理财，世祖曾想留之，但在不忽木的力争之下，最终被处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提及乌马儿。

但笔者在核对《不忽木传》之所本的《康里公碑》时，却发现《元史》编修者在抄录此碑文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据此碑记载，“桑哥之党唯忻都、纳速纳丁蔑理、王济等罪状尤著，则劾治而诛之，其余随才拔擢，待之无间，繇是人情翕然悦服。”〔3〕

笔者推测，“随才拔擢”的人之中应当包括乌马儿，这一假定对我们理解赛景初与康里巎巎的关系很重要。而正因为赛景初之父乌马儿在桑哥案中逃过一劫，才有可能后来出任江浙行省平章之事。

〔1〕《元史》卷130《不忽木传》。

〔2〕《至顺镇江志》卷5。

〔3〕《松雪斋集》卷7。

17.2.3.3　江浙行省任上

乌马儿何时任江浙行省平章，事关赛家何时移居杭州的问题，因而与本研究关系非常密切。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卷80）与柯劭忞的《新元史》（卷155）的《赛典赤赡思丁传》均有乌马儿附传，其资料均依据上述《松乡集》中的《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与《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两人一致认为乌马儿任江浙行省平章事在英宗至治元年（1321）。近十余年来，有数篇重要研究涉及乌马儿。对乌马儿最为关注的是已故的杨志玖先生，他的有关研究集中体现在两篇论文中，即《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1〕与《回回人与元代政治》（5下）。〔2〕此外，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今北方民族大学）教授何兆吉（今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依据任士林《松乡先生文集》卷1中的《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与同书卷2中的《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撰写了论文《元代回回乌马儿史事札记》，〔3〕对乌马儿任行省平章时的事迹作了考证。此外，南京大学高荣盛教授近年来有两篇论文在考证回回沙不丁时涉及乌马儿，其一为《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4〕及《元沙不丁事迹索考》〔5〕。

杨志玖教授发现，在屠寄与柯劭忞英宗所判定的至治元年（1321）乌马儿任江浙行省平章之前，即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七月，《松乡集》作者任士林已逝世。因此，他根据其他史料对证，确定乌马儿任江浙行省平章事在武宗至大元年（1308）与至大四年（1311）年之间。

17.2.3.4　丁鹤年"母夫人"家情考察

丁鹤年呼赛景初为表兄，足见鹤年父职马禄丁所娶的是纳速剌丁

〔1〕原文刊于《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1期；收入杨志玖著：《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见页179-186。

〔2〕《回族研究》，1995年第2期，页2-17；收于杨志玖著：《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见页263-268。

〔3〕《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页20-23。

〔4〕原载于《元史论丛》第9辑，中国广播电视公司出版社，2004年；收入高荣盛著：《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见页20-48。

〔5〕原载于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收入高荣盛著：《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2010年，见页49-68。

之女、江浙行省平章乌马儿之姐妹。虽然伊斯兰教实行多妻制，但男子的诸妻中，出自名门与出自一般人家的，地位肯定有别。赛景初的姑母出自咸阳王家，因此不大可能是职马禄丁的次妻。因此，笔者的推论是，丁鹤年之父职马禄丁的正妻，也即丁鹤年的母夫人，应当就是赛景初的姑母。因此笔者的第一个推论是，元末丁鹤年在武昌城破之前，舍弃自己的生母，侍奉避难的母夫人，应当就是她。

此外，纳速剌丁官居云南行省平章，而丁鹤年之父职马禄丁仅为武昌县达鲁花赤，虽然同为回回人，种族与文化背景相近，但毕竟两者地位悬殊，纳速剌丁为什么会将女儿嫁给职马禄丁？为解答这个疑问，就不能不探求一下纳速剌丁的家庭情况。

《元史》赛典赤本传记载，纳速剌丁有子十二人，[1]并举出其中七位的名字与官衔[2]。此外，留存至今的各种赛典赤家谱也提供了一些比对资料，笔者手头目前能找到的只有《郑和家世资料》，[3]汇集了数种咸阳王家系资料以及《影印孤本〈咸阳王家乘〉考释》[4]。此外笔者还曾收集到一种约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的波斯文赛典赤家谱，但一时未能找到。今以《元史》本传所罗列的纳速剌丁的七子为基础，补以上述《郑和家世资料》中所提供的资料，共录得纳速剌丁十二子的名字与官职，具体如下：

(1)伯颜(Bayan)，中书平章政事。《赛氏族谱》补："封淮王，[5]谥予忠敏"。[6]

(2)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赛氏族谱》补："公生三子(二十二

[1]《咸阳王宗祧记》：纳速剌丁生子十一人(《郑和家世资料》，页60)。

[2]《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

[3]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与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4]马元恭录并收藏，马颖生考释，大理白族自治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编委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

[5]《咸阳王宗祧记》亦称纳速剌丁子伯颜封淮王，详见下。

[6]《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淮王伯颜乃蒙古八邻氏人，虽与纳速剌丁子同名，但并非同一人。多数赛典赤家族、家传及郑和家谱、家传资料均误植。

世)”。并在二十三世中开列其中二子名字:黑里[1]、拜杭。[2]

(3)《赛氏族谱》:第三子为米里哈。[3]

(4)《咸阳王宗祧记》:第三子为“阿立普舍,孛罗郡马”。[4]

(5)剳法儿(Zafar),荆湖宣慰使。《赛氏族谱》补:“公生一子,姓忽”。[5]

(6)忽先(Husein),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氏族谱》补:“公生一子,里董阿”。[6]《咸阳王宗祧记》补:“今居昆明、呈贡、陆凉、嵩明等处,是其后也”。[7]

(7)《赛氏族谱》补:哈辛(Qasim),宣慰副使兼宿卫将军[8]。公生一子矣郊(附此。系沙的公子)。[9]

(8)沙的(Šād),[10]云南行省左丞。《赛氏族谱》补:住镇交元路[11]总

---

[1]黑里当为黑黑之误,详见下文有关乌马儿诸子部分。

[2]《郑和家世资料》,页15-16。按,这里乌马儿二子皆未冠姓,丁鹤年表弟赛景初是否计入三子之内,待考。

[3]《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此子未见《元史》提及。元人夏庭芝记元杂剧名角,其中有名“米里哈”者:“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婉妙入神,品貌虽不扬,善攻花旦、杂剧。余尝识之,名不虚传也”。——《青楼集》,明抄说集本。《青楼集》中所收名角均为女子,其中的戏子米里哈当与纳速剌丁子无关,但米里哈的确是回回人的名字。

[4]《郑和家世资料》,页60。按,此子未见《元史》提及。阿立普舍或为突厥-波斯混合称谓Alp Šāh之音译,华言“勇士王”。在笔者见闻范围内,元代尚无回回人名以汉字写作“阿立”者。“孛罗郡马”,待考。

[5]《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回回人以单字为姓始于元末。

[6]《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里董阿”当漏“明”字,即为“明里董阿”(Malik Tongqa)之误。“明里董阿”是元代蒙古人/色目人中的一个常见名字。

[7]《郑和家世资料》,页60。

[8]元确有宿卫将军之职。如阿术“中统三年秋九月,自宿卫将军拜征南都元帅,治兵于汴。”——苏天爵:《丞相河南武定王》,《元名臣事略》,卷2。

[9]《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此子未见《元史》提及。笔者在元代文献中未能检得此名,但明代土鲁番、哈密人贡番夷中有名哈辛者,或可说明《赛氏族谱》有关纳速剌丁的诸子的内容系据明代资料。

[10]《咸阳王宗祧记》作“砂的”——《郑和家世资料》,页60。

[11]疑有误,元代并无交元路。

管元帅。生一子矣郊。[1]

(9)阿容,太常礼仪院使。《赛氏族谱》补:"公生二子,姓苏"。[2]

(10)伯颜察儿(Bayančar)[3],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4]《赛氏族谱》置此子于阿容之前,并补:公生三子:马、哈、沙。[5]《咸阳王宗祧记》补:"今居直隶、松江(松江,吴松江之别称——原注)、济南、利州(利州即陕西南郑县——原注)者,是其后也"。[6]

(11)《赛氏族谱》补:哈三帖木儿(Hasan Temür),国子舍人,孝廉。公生一子保帖木。以上十子皆延安王之子。[7]《咸阳王宗祧记》:十,母哕帖儿,国子舍人。[8]

(12)《咸阳王宗祧记》补:"十一,月鲁帖木儿,建昌路平章政事[9]。今居建昌者,是其后者。"[10]

上述各种咸阳王家谱所列纳速剌丁诸子信息,有一些能与元代的史实对应,说明这些家谱在编写时有一定独立的资料来源。纳速剌丁仅儿子就有12个以上,女儿的数量也不会少。因此他不可能将所有女儿都嫁到门当户对的人家之中,其中有些女儿下嫁官职低微者,也就没什么可奇怪了。再者,由于子女数目众多,可以想象,似乎不可能全部

[1]《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此子未见《元史》提及。笔者在元代文献中未能检得此名,但明代土鲁番、哈密人贡番夷中有名哈辛者,或可说明《赛氏族谱》有关纳速剌丁的诸子的内容系据明代资料。

[2]《赛氏族谱》置阿容于伯颜察儿之后,《郑和家世资料》,页15。元代确有名阿容者,如元人陈旅有诗《次韵阿容参政省中夜坐上都》——《安雅堂文集》卷2,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60年。

[3]《元史本证》卷46,证名10:伯颜察而,成宗纪。

[4]《元史本证》卷35,证遗12:案顺帝纪至元四年,赠守诚佐治安惠世美功臣。《考异》卷95:顺帝纪作"忠宣"。

[5]《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回回人以单字为姓始于元末。

[6]《郑和家世资料》,页60。

[7]《郑和家世资料》,页15。按,此子未见《元史》提及。笔者在元代文献中未能检得哈三帖木儿,但明代色目人戴此名者甚多。

[8]《郑和家世资料》,页60。

[9]按,路一级无平章政官职。

[10]《郑和家世资料》,页60。

出自一位母亲。也就是说,纳速剌丁的诸子女中,有一些当出自正妻,有一些可能出自次妻。

尽管从理论上讲,穆斯林允许至多娶四个妻子,且丈夫应平等对待各妻,但实际上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出自正妻的女儿,会有更多的机会嫁入高官家庭,而次妻的女儿则往往会许配给地位较低的人家。因此,笔者的第二个推论是,丁鹤年之父职马禄丁的正妻,也即鹤年的母夫人,虽然出自咸阳王府,但或许为纳速剌丁次妻所生。

在此基础上,笔者的第三个推论是:丁鹤年的两位兄长烈瞻与爱理沙,有可能出自职马鲁丁正妻,这样他们以回回名行世,不冠丁姓也就有了解释。

17.3 赛景初学字考

《咸阳王宗祧记》:生十四子,[1]并列出十四子中十二子,《马氏家乘》列出乌马儿十四子之名。今以《咸阳王宗祧记》为基础,补证以《马氏家乘》的内容,列出乌马儿诸子如下:

(1)赛黑黑,章庆路同知。[2]

(2)赛生故,云南同知。[3]

(3)赛拜杭,鹤庆路军民总管府达鲁花赤,授明威将军。[4]

(4)(赤)[亦]喇马丹[5](至元二年,遣使大理招抚诸蛮——原注)[6]——《马氏家乘》。

---

[1]《郑和家世资料》,页60。

[2]元回回人中名黑黑者有好几位。元代无章庆路,江浙行省有集庆路。

[3]明代有云南同知之职,如明万历《高州府志》"化州"条记载:"陈旿云南同知"。——[明]曹志遇纂:《(万历)高州府志》卷5,明万历刻本。

[4]鹤庆路在云南。

[5]"赤"当为"亦"之误。亦喇马丹为阿拉伯语 ramadan之音译,意为"斋月",汉语中无舌尖颤音 r-,部分在 r-之前添加元音 i-,读为 iramadan。

[6]《郑和家世资料》,页83。

(5)泥雅斯拉丁[1](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兼军民据户——原注)[2]《马氏家乘》在另一处又说此子为乌马儿长子:纳速剌丁次子"赛音鄂德齐(按,即赛典赤,此为修《四库》时改过的名称),又名乌马儿,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生十四子。(长子尼口斯拉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兼管军民万户——原注。"[3]

(6)赛咬住,奉议大夫、省辉路同知。[4]

(7)赛(米)[迭]里威失(Darvīš),朝列大夫、饶州路总管。[5]

(8)赛木八喇(Mubārak),奉议大夫、临江路总管。[6]

(9)赛马哈谋(Muhammad),大都路打捕鹰房总管。[7]

(10)赛列失,奉议大夫,庆元路治中。[8]

(11)赛和尚,[9]泉州发番船总管。[10]

(12)赛八哈失,福州路学正。[11]三支落籍江南。

(13)赛驴驴,锦衣(户)[卫]千户。[12]《马氏家乘》其后有注文"今

[1]此译名音译与元、明译音规则不符,当为清以后译名。

[2]《郑和家世资料》,页83。

[3]《郑和家世资料》,页82。

[4]元代只有卫辉路,无省辉路。

[5]原文为"迷里威失",当为"迭里威失"之讹。迭里威失(Darvīš),为苏非教苦行僧。笔者在元明文献中搜检曾任饶州路总管者,未发现有名迭里威失者。《马氏家乘》作蜜里威失(《郑和家世资料》,页83),显然源自前述"迷里威失",由此可证《马氏家乘》为晚出资料。

[6]笔者在元明文献中搜检曾任临江路总管者,未发现有名木八剌者。但确有一位木八剌曾任临江路达鲁花赤(《(隆庆)临江府志》卷5),或为此人。

[7]《元史》卷85《百官志》记,元政府设有"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等户都总管府,秩从三品",除达鲁花赤一员之外,还设有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其职责为"掌别吉大营盘事及管领大都路打捕鹰房等户。至元三十年置"。《元典章》提到,"句容县豪民王训白身,受宣大都等处打捕鹰房民匠总管"(《新集至治条例》"吏部,官制,总例"),当系同一职。

[8]笔者虽未检索到列失其人,但元代张伯惇(字师道),成宗时从奉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奉议大夫、庆元路总管府治中。"——程钜夫:《翰林侍讲学士张公墓志铭》,《雪楼集》卷17,洪武刊本。

[9]"和尚",《马氏家乘》作"和善"。——《郑和家世资料》,页84。

[10]元明时代未见有"发番船总管"之职。

[11]学正,当为儒学学正之简称。

[12]驴驴为元明色目人常见人名,又写为闾闾。他任职锦衣卫,说明其时已入明。

浙江杭州是其后。"[1]

(14)赛啰里迷,古赤勾当总领,[2]元主敕赠忠孝义门。[3]

虽然在上列乌马儿诸子中,未见赛景初其名,但笔者以为并不能因此全盘否定这些家谱的可信性,因为其所录者多为做官为宦者,象赛景初这样没有官职、混迹于戏子的乌马儿后裔,未被列名并不足为怪。因此,乌马儿之子的数量应当超过上述咸阳王家谱所述十四人。赛景初不过是乌马儿众多子女中的一位。从上述《马氏家乘》在提及其家族在杭州的枝系时,仅提及赛驴驴看来,赛景初在其家中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并不为赛典赤家族其他成员看重。

入明以后,赛景初家境跌落,鹤年有一首诗《赠表兄赛景初》提到:

> 萧条门巷旧王孙,旋写黄庭换绿樽。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4]

可见此时赛家不但门庭萧索,经济上也不宽裕。

钟嗣成说赛景初"幼从巎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所谓"巎文忠公"即康里巎巎,是元代著名色目书法家。赛景初的字曾受到过他的表彰。康里巎巎在元末曾任江浙行省平章,赛景初向其学习书法当在其时。

在笔者所见资料中,有几则明确提到康里巎巎在杭担任江浙行省平章的时间,其一为陶宗仪《辍耕录》中有关杜清碧的记录,称:

> 至正壬午(1342),中书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辞疾不行,盘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巎巎时来访。一日语及声律之学,因问国字何以用侯喉音有无字字为首。先生曰:"正如婴儿初堕地时作此一声,乃得天地之全气也。"平章甚说服。[5]

可见至正二年巎巎已经在杭。其二为清《墨缘汇观录》所录之《小

---

[1]《郑和家世资料》,页84。

[2]啰里迷,未见元明文献记载。"古赤",待考。

[3]《马氏家乘》曰敕赠"忠孝义门扁额"的是元仁宗,时为延祐二年三月十五日。——《郑和家世资料》,页84。

[4]《鹤年先生诗集·哀思集》。

[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0,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

楷书清净经卷》，称此“绢本如新，小楷字大三分许，沉着端严，体势裕如，可称极品。首书《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文》。内永字避讳不克考，后款水精宫道人。书下押赵氏子昂松雪斋二朱文。印后康里子山一跋，行书十四行，字大经寸，书法亦精，款至正四年(1344)五月十六日，题于杭州河南王第之西楼，康里巎识，下押子山正斋、恕叟二(失)[朱]文印。观此卷必有老子画像，后水精宫道人书之。书字似画字改者。然子山跋语未及之。”〔1〕

而黄溍的《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提到，至正二年(1342)夏四月，行省公署毁于灾，而省臣题名记刻石倒毁，在复建之后，“平章政事康里公视事伊始，命掌固考旧，椟合前宰执之氏名岁月，伐石而大书深刻焉”，且令黄溍叙次梗概。〔2〕浙省行署倒塌事在至正二年，复建在其后，而巎巎任浙省平章之初，便重新写下省臣题名录，刻之于石，从时间上推算，此事应大致在至正四年。元人周伯琦有诗题为《岁甲申三月陪平章喀喇公子山展墓作》：

东风拂面又清明，共揖西山晓出城。杨柳数村烟外过，杏花十里雪中行。

凤毛世表贤臣瑞，马踣人传故相茔。展墓归涂无限思，一尊松下重班荆。”〔3〕

这里的平章喀喇公即康里公，甲申岁为至正四年(1344)，足见此时巎巎乃在杭州。康里巎巎在杭停留时间不长，至正五年(1345)即被顺帝召回北京。《元史》本传对此有明确记载：

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觇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巎巎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1345)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4〕

〔1〕〔清〕安岐撰：《墨缘汇观录》卷2，法书下，清道光、光绪间粤雅堂丛书本。

〔2〕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8，续稿五。

〔3〕周伯琦：《近光集》卷2，四库本。

〔4〕《元史》卷143《巎巎传》。

由此可见,康里巎巎在杭的时间在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之间,赛景初向他学字亦应在此期间。鹤年有一首诗提及他与赛景初切磋书法,题为《雨窗宴坐与表兄论作诗写字之法》,曰:

南窗薄暮雨如丝,茗盌熏炉共论诗。天趣悠然人意表,忘言相对坐多时。

蝇头小楷写乌丝,字字钟王尽可师。忽悟庖牺初画象,工夫元不在临池。[1]

当时,赛景初虽然写的是"蝇头小楷",但在鹤年眼中却字字尽为师,可见他深得巎巎真传。巎巎的书法在元时已经极负盛名,时人将之与赵松雪相提并论,陶宗仪记到:

江浙平章子山公,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公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康里人。[2]

明初人解缙的《学书法》在介绍学书要道时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闲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工夫。"他还记录了巎巎学书传说的另一个版本:"赵子昂国公十年不下楼,巎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3]

赛景初并非巎巎唯一的学生。陶宗仪记道:

杜环,字叔循,金陵人,官工部员外郎,宋潜溪为立小传,盖义士也,后为晋王府录士,工临池之学。解大绅谓其与宋仲珩、詹孟举亲受业于康里子山门,故其书法相等埒耳。[4]

这里提到的解大绅即前述之解缙,按他的说法,杜环、宋仲珩与詹孟举均从巎巎学字。此外,元末文人苏伯衡提到,元人陈达"二十学书于平章康里公巎巎",而"三十书名与康里公上下。钦安殿成,在廷善笔

[1]《鹤年先生诗集·哀思集》。

[2]《南村辍耕录》卷15。元人杨瑀在其《山居新话》中抄录了此传说,仅在字句上略做变动,见《山居新语》,余大钧点校,中华书局,与《玉堂嘉话》合刊本,2006年。

[3][明]曹昭辑、[明]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

[4]《书史会要》续卷,明崇祯二年朱氏寒玉馆刻,清初朱统鈇重修补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札者，咸书榜上进，独用公所进者。”[1]这里称巎巎为“平章”，足见陈达向其学书时，巎巎适在杭任江浙行省平章。这说明陈达为赛景初同窗。

前引钟嗣成有关赛景初的文字中说他“姿状丰伟”，可见从体态上即可辩认为色目人。由此观之，很可能赛景初的姑母也一望可知为色目人。如果前面有关赛景初的姑母即鹤年的“母夫人”之说能成立的话，那么在元末天下大乱之中，一望即可知其为色目官宦家眷的她，没有鹤年的护送，是无法逃离武昌的。

17.4 余言

丁鹤年的亲生母亲，在《高士传》与《丁孝子传》中均称为“生母”，前已论及当为其父职马禄丁之次妻。在已知职马禄丁子女中，仅鹤年与其姐月娥两人冠丁氏，且起纯粹汉名。从父逝后鹤年遵从汉制守孝三年，八年不饮酒，其师大儒周怀孝[2]欲妻以女，其姐丁月娥夫婿亦为当名士葛通甫等因素判断，其生母当为汉人。前已言及，鹤年兄长烈瞻与爱理沙均死于元末兵乱，其后裔情况不明。仅据目前十分有限的资料判断，或许职马禄丁死后，其家族中用是否冠丁姓来区分回回妻与汉妻所生子女。

《高士传》提到鹤年父“武昌公在时，以鹤年倜傥类己，甚钟爱，畀荫

[1]《故元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墓表》，《苏平仲文集》卷13，四部丛刊景明正统本。

[2]〔明〕孙原理所辑之《元音》收有周怀孝诗两首：

周永言字怀孝，富州人

《春日感兴》

春风庭院柳吹花，暗度流年感物华。石斛水香鱼有子，画梁灰冷燕无家。

春愁烂漫来难遣，午梦飘萧去莫遮。欲泛曲江陪旧宴，浪船摇曳晚川斜。

《次毛楚实韵》

声誉无闻五十前，一身为客动经年。纱帷授业花生眩，银烛抄书雪满颠。

晴树画图开晓日，暮林楼阁倚春天。畏人风雨时时有，神剑那应久蛰渊。——卷11，四库本。

丁鹤年有诗《奉怀先师豫章周孝思先生》：

先生有道负清时，经济何由见设施。白水青山聊自适，光风霁月复谁知。

出尘标格三株树，瑞世文章五色芝。鸣鸟不闻人亦去，生刍一束起遐思。——《鹤年先生诗集·哀思集》。

从父桓州职[1],鹤年亦辞谢不敢有,惟益厉志为学,清苦自将,与寒畯贱士等。"按此说法,鹤年有志于学,宁愿放弃官位。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丁鹤年的遗诗看,他对有官位的亲属,皆称其职,几乎无一例外。如不但称其从兄吉雅谟丁为"太守兄",[2]而且称同出一父的仲兄为"烈瞻万户",称爱理沙为"应奉兄"。前文已经提及,应奉为翰林应奉文字的简称,这是爱理沙中举之后所得之职。由此可见,丁鹤年对官位是极为看重的。按元荫序制度,官员去世后,只荫其嫡子一人。职马禄丁诸子中,爱理沙通过科举获得官职,其次子烈瞻是否通过荫序获取官职,史无明文。而丁鹤年非职马禄丁正妻所生,按元制不得荫序。恐怕这才是丁鹤年未能赴桓州继其从父为官的真正理由。

《高士传》还提到,其父职马禄丁死后,诸子在分割家产时,鹤年"悉推与诸兄,不留一钱自遗也。"这一记载曲折地反映出,丁鹤年对自己在诸子中地位低下有清醒的认识。

考察丁鹤年的交游网络可以发现,他虽然是色目人,但与汉人、南人的往来更为密切。而在与他有交往的为数不多的色目人中,往来最

[1]元末人刘仁本《送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中提到,鹤年从兄吉雅谟丁(即马侯,吉雅谟丁汉名马元德)"世居燕山,登进士第,尝辟江南御史台掾。"(《羽庭集》卷5)。所谓"燕山"应指其家居桓州。

[2]鹤年凡与吉雅谟丁有关的诗几乎均称吉雅谟丁为"太守兄",如《太守兄阶下新竹数竿秀色郁然可爱索予赋诗敬制长律一十八韵》《观太守兄昌国劝农》以及《题余姚叶敬常州判海堤卷补先兄太守遗阙》(《鹤年先生诗集·海巢集》),《太守兄见遗纸帐仍赠以诗次韵奉谢》《题太守兄遗稿后二首》(《鹤年先生诗集·哀思集》)及《寄昌国济汝舟长老先兄太守尝题诗于其方丈》(《鹤年先生诗集·方外集》)。

密切者多为其亲属，如从兄吉雅谟丁、马子英，[1]兄长爱理沙，表兄赛景初等，除此而外与其他回回人群体几乎没有联系。

丁鹤年的身世见证了回回人中相当一部分虽然保持了回回人的身份，但选择汉化作为本土化的方向。这部分回回人虽然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学界既往对回回人的研究集中于他们。但这一阶层的回回人因为通汉文，并不需要借助阿拉伯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因此后来回回语言文字史中的小儿锦的创制，应当与这部分回回人无关。

（将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6辑，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院中心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1〕《高士传》提到“员外郎马子英不妄许可人，尝曰：‘吾友多矣，可托妻子者，惟鹤年一人，世以为知言。’”。此外，丁鹤年诗集中收有《题族兄马子英进士梅花》：

池馆春深看牡丹，五陵车马隘长安。谁知凛凛冰霜际，却是梅花守岁寒。

鹤年还有一首《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曰：

翠实可充丹凤食，乔枝仍待早莺迁。一拳苍藓荒秋雨，惆怅无人解补天。——《鹤年先生诗集·海巢集》。

上述两诗中“谁知凛凛冰霜际，却是梅花守岁寒”与“一拳苍藓荒秋雨，惆怅无人解补天”的对句，表明了马子英这位色目知识分子在元明交替之际坚持忠于元朝的气节。而元人王翰与马子英有诗歌唱和，其中一首题为《和马子英见寄韵》：

十年流落向炎州，判与刘伶作醉游。望国孤忠徒自愤，持身直道更何求。——《友石山人遗稿》1卷，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王翰的“望国孤忠徒自愤”的诗句也证实了马子英的政治态度。

鹤年的族兄吉雅谟丁汉名马元德，马子英亦冠马姓，两人是否为兄弟，待考。

18 高克恭杂考

18.1 族属与家世

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1]从史学角度对高克恭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成果，除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之外，当属马明达教授以十五年时间完成的力作《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2]马明达先生发现，明人曹昭的《格古要论》卷5中有"高士安。元高士安，字颜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玩，览其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3]同时，在传世高克恭的《眠食安好帖》中，高克恭自言有一兄，名子安。马明达先生据这两条资料，确定《格古要论》中的高士安就是高克恭。[4]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发现，惟曹昭的《格古要论》经明人王佐增补为《新增格古要论》后，在其后又增一条《高克恭》，但却未做辨析，是否明时已有人对高克恭是否就是高士安有所怀疑，待考。

研究记载其家世的最重资料是邓文原的《故大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5]，称："曾祖某，祖乐道，父亨，公讳克恭，字彦敬，其先西域人，

〔1〕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科学院的杨杰、卫欣先生的《元代画家高克恭"字号"考》，对"房山""房山道人""房山居士"与"房山老人"等字号做了认真考察，参见陕西社会科学院：《新西部》，2007年第12期，页170。

〔2〕《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30-145。

〔3〕〔明〕曹昭辑、〔明〕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卷5，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无影印出版年代。

〔4〕马明达：《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33-134。

〔5〕邓文原撰：《巴西邓先生文集》（简称《巴西集》）1卷，清抄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

后占籍大同，谱牒散佚，莫迹其所始。”邓文原在《行状》中未交代高克恭家族原居地及入华时间。高克恭本人了解其先世的情况已不清楚，但从《行状》未录高克恭曾祖这一点判断，高克恭去世后，其家族或许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原籍、入华历史以及曾祖父的名字。据《行状》，高克恭逝于至大三年，时年六十三岁，由此上推三代，推测其失名的曾祖父有可能生活于元太祖成吉思汗时代，或元太宗窝阔台时代，当为第一代移民，很可能随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来到汉地，落籍于大同，而高克恭则应为第四代移民。

陈桓先生称“然尚知其祖名亨，字嘉甫”，有误。高克恭祖父名“乐道”，而“亨”为其父名，嘉甫为父字。从其祖父名“乐道”看，其家族自入华第二代起已开始用汉名。而其父不但有汉名“亨”，字“嘉甫”。邓文原提到，高克恭之父嘉甫“以力学不苟媚事权贵，为六部尚书器重，归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马明达先生对邓文原提到的“六部尚书”作过考证，认为应为“行六部尚书”，而迄今所见蒙古国时期戴此衔者乃史秉直，[1]但未言及“母夫人翟氏”。此人当系高克恭祖父乐道之妻。高克恭家族移居燕京的时间当在宪宗蒙哥朝。而邓文原所述嘉甫“朝夕讲肄”，克恭“遂得大究于《易》《诗》《书》与《春秋》及关、洛诸先生绪言”，事应置于世祖朝初。

邓文原《行状》中提到，高克恭原配夫人曹氏所生子枢，“今为秘书著作郎”。马明达先生不但在元《秘书监志》卷10《题名·著作郎》的有关记载中，查得此人皇庆二年任职的情况，且进而考察了他以后的行迹。其继室刘氏，《行状》称其乃“便宜公之孙”。马明达先生考定为刘仲禄之孙女。[2]由此可见，高克恭家庭从其祖父起三代均娶汉女为妻，是一个高度汉化的色目家族。

高克恭之次女许配后任泰定朝平章政事之乌伯都剌（‘Abd al-Allāh），乌伯都剌又作兀伯都剌（《元典章》朝纲卷1，典章4“省部减繁格例”条，及刑部卷15，典章53“僧俗相争”条，《元史》中亦多见），程钜夫

〔1〕见上引马明达：《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页132。

〔2〕见上引马明达：《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页134。

《雪楼集》中有其三代封赠制文，据此可知曾祖父名木沙剌福丁(Mušaraf al-Dīn)，曾祖母名法都马(Fātima)；祖父名札剌鲁丁(Jalāl al-Dīn)，祖母名忽八；父名亦福的哈鲁丁(在《元史》中写作益福的哈鲁丁)，母名宰那不。其父亦福的哈鲁丁是传授亦思替非文字重要的学者。陈桓先生在此基础上，加以其他证据，如朱德润《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中"高侯回纥长髯客"[1]句所显示的高克恭的体质特征，及有关元文人笔下的"回纥"相当于世俗所称之回回等，推定高克恭为回回人。[2]

18.2 画作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回回文人，画、诗俱佳，其生时已经非常有名。元代画家的排名有几种，其中昆山人顾善夫举出十大家，收于元末文人柯久思的文集之中，题为《顾善夫集十大家》中记：

> 皇元画家如林然，亦悉萃于东吴，诚前代所不及也。故若赵松雪、高彦敬、钱玉潭、曹云西、黄一峰、赵仲穆、吴梅庵、倪元镇、王叔明、盛子昭诸君，莫不超越今古，辉映宇宙，即片纸尺幅，人不易得。惟善夫副使清雅博洽，为诸君所知爱，每邂逅间，乘闲请图，或致书索求，辄得小笔若干幅，各师古法，意态具足，如入武库。而夏璜、商彝错陈，宴昭阳而飞燕，玉环竞饰，采粲迎眸，诚希世之珍也，是宜什袭藏之，永为室家之镇。[3]

顾善夫将高克恭列为元代画家十人中的第二位，居于赵孟頫之后。陈桓先生将平日读书所见元人题咏中提及高克恭画者，归纳为目。北方民族大学(发表时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学者冯雪红、吴建

[1]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10，涵芬楼秘籍本。

[2]《元西域人华化考》，页92。南京林业大学杨杰、卫欣先生据一些史料中记载高克恭为"回纥"人或"回鹘"人，推定高克恭为畏兀儿人，此说难以成立。其一，畏兀人在元代有畏兀、伟兀等多种写法，但绝少写为回鹘与回纥。其二，畏兀儿人在元代或信奉佛教，或为聂思脱里教，但与回回人区别较大。史料中很少见畏兀儿人与回回人通婚的事例。

[3]柯九思：《丹邱生集》卷2，清光绪三十四年柯逢时刻本。

伟亦对高克恭的画做了详细考证。[1]今先录陈桓先生所举高克恭画目如下，再补入笔者所见画目，在附注中加入有关学者考论，以深入了解其华化程度：

桑落洲望庐山图[2]　云林烟嶂图[3]　越山图[4]

---

[1]《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6-38。

[2]冯雪红与吴建伟：此画"明清画史失载，目前只有《元诗选初集》卷二十二贡奎诗《高侯画桑落洲望庐山》可以证明，高克恭曾经有这样一幅画。"（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此说不确，袁桷与张昱也有诗提此画。袁桷诗《题高彦敬桑落洲望庐山图为秋泉作》为：

长江亭亭桑落洲，一塔独傲苹花秋。边声已逐鼙鼓尽，水气欲挟渔榔浮。

谪仙骑鲸五柳老，真景变灭随沙鸥。空余秦筝与羌管，断续不洗琵琶愁。

玉堂小窗解苍佩，宴坐得意毫端收。空青点云碧痕湿，方诸取月寒光流。

匡庐老人在何许，伛觉颔首相迟留。佳峰棱棱铁钩锁，寸树点点铜浮沤。

要知翰墨洒清气，俗子政尔劳雕锼。——《清容居士集》卷6，四部丛刊景元本。

张昱诗《高房山画庐山图，贡云林待制有诗在上，为其予户部尚书贡师泰赋，盖其家物也》：

万壑匡庐纸满张，好诗好画两相当。十年物色偶然得，二老风流何可忘。

还见虹光生静夜，却惊云气湿高堂。尚书座上多游客，独有张翰思故乡。——《张光弼诗集》卷6，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抄本。

[3]冯雪红与吴建伟对此画有研究，参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38。

[4]冯雪红与吴建伟：此画"只见于《元诗选初集》卷44吴师道诗《题高彦敬越山图》。"（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8）此说不确。

赵孟頫也有诗提及此画《题彦敬越山图》：

越山隔涛江，风起不可渡。时于图中看，居然在烟雾。——《松雪斋集》卷5，四部丛刊景元本。

明人郑真有《跋丽水俞元吉所藏高彦敬临米元章越山图》，提到此越山图并非高克恭自创，乃临模北宋名家米芾（字符章）。其跋文曰：

按松江夏氏《图绘宝鉴》云：米元章山水本出重源而天真发露，后二百余年高公彦敬实得其笔意，所临越山图，凛乎逼真。松雪赵氏与高公官于朝，亲书论定。后有作者，无敢异议。俞君元吉，家于括仓，正古句践封域。浮云白日，展图玩讽，殆如见诸君子于千岩万壑间也。原吉来淮海，出以相示。书二小诗以归之。

南宫跨鹤九天遥，云暗房山怅莫招。赖有吴兴书跋在，画图珍重似琼瑶。

浉江东渡指西陵，万迭天开紫翠屏。掉得扁舟归旧隐，夜凉光动少微星。——〔明〕郑真撰：《荥阳外史集》卷90，四库本。

山村图[1] 夜山图[2] 秋山暮霭图[3]
墨竹图[4] 青山白云图[5] 沧州石林图

---

〔1〕"仇远《题高房山写山村图卷并序》:'大德初元九月十九日,清河张渊甫贰车会高彦敬御史于泉月精舍。酒半为余作'山村图',顷刻而成,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张炎:《山中白云词疏证》卷6,民国十一年(1922)朱祖谋辑刻强村丛书本。仇远《山村遗稿》卷2(清抄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此诗字句有差别。

冯雪红、吴建伟认为此图与下述山村隐居图是同一幅,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8。

〔2〕陈桓先生认为,高克恭作品中"其尤习见者,为《夜山图》与《秋山暮霭图》二帧,当时有名诗人,题咏殆遍。"并举盲诗人侯克中的《夜山图》云:"幽人清夜思高闲,误落龙眠笔研间。万仞峰峦千里月,广寒宫里看三山。"——侯克中撰:《艮斋诗集》卷10,清抄本,〔清〕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

查赵孟頫亦有《题李公略所藏高彦敬夜山图》:

高侯胸中有秋月,能照山川尽豪发。戏拈小笔写微茫,只尺分明见吴越。

楼中美人列仙臞,爱之自言天下无。西窗暗雨政愁绝,灯前还展夜山图。——《松雪斋集》卷3。

冯雪红、吴建伟有关此图的研究见《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8。有关此图最近的讨论,见马明达上引文,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41-142。

〔3〕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同名图残件,冯雪红、吴建伟认为真赝难辨。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4〕《高彦敬尚书墨竹》:

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苍梧帝子秋风泪,翠袖佳人日暮寒。

妙处宁论铁钩锁,深情莫报翠琅玕。诛茅何处阴崖底,静看梢头玉露溥。——〔元〕释大欣撰:《蒲室集》卷5,元至元刊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冯雪红、吴建伟有关此图的研究见《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8。有关此图的最近讨论,见马明达教授上引文,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43。

〔5〕元人程端礼有《题高彦敬青山白云图》:

中州方岳岱为宗,谁写巍巍第一峰。肤寸云生雨天下,何曾有意为干封。——《畏斋集》卷3,民国四明丛书本。

此图盖仿米芾之子米友仁,元人刘仁本在《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题下有小字:

原注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而又多赝本,殊不知房山盖学米氏父子。慈溪乌性善出此幅示余,大不盈尺,而有江山无穷意态,聚画史观之,审定为米家物也。今房山不可得矣,况其师者乎!因题近体诗一首以归之。

元气淋漓湿未晞,何人胸次夺天机。白云兀突青山起,野水□茫绿树肥。

落笔总夸高彦敬,此图还忆米元晖。数椽茅屋如亲舍,回首家乡未得归。——〔元〕刘仁本撰:《羽庭集》卷2,四库本。

仿老米云山图[1]　　烟岭云林图　　山村隐居图[2]
秋山过雨图[3]　　春云晓霭图[4]　　墨竹坡山图[5]
云山双鹤图[6]　　越山春晓图[7]

除了上述几幅画之外,陈桓先生还提到:"：今故宫博物院所藏高克恭画,为吾所见者,尚十余轴,虽真伪一时莫辨,然已震而惊之矣。"据笔者初步查检,见于元人诗文的高克恭画作尚有一些,今先录其有关资料,再补入有关学者的考证:

(1)烟岚图,见于程钜夫的《题高彦敬烟岚图》:

西南多连峯,东北多大野。大野少人耕,连峯有人写。
写之给卧游,谁为识真者。独有房山公,癖山如癖马。
向宦浙河干,收拾不盈把。云烟何惨淡,水木亦萧洒。
匪徒妙丹青,秀句蔚骚雅。胸中殊磊磈,笔底聊复且。
君看诸可玩,何者独非假。削平艺稻粱,庶以饱天下。[8]

(2)吴山晚眺图,见于戴表元的《题高彦敬吴山晚眺六言》:

[1]现藏吉林省博物馆。冯雪红与吴建伟认为,此图与下文之云山图是同一幅图,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2]冯雪红、吴建伟认为此图与前述山村图是同一幅,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8。有关此图的最近研究,见马明达上引文,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42。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高克恭雨山图一幅,见冯雪红、吴建伟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这两幅图之间的关系,待考。

[4]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北方民族大学(发表时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学者冯雪红、吴建伟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6。

[5]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雪红、吴建伟认为与下文之"竹石图"是同一幅图,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6][清]卞永誉辑:《式古堂书画汇考》卷34,历代名画高册"第七幅,元高房山云山双鹤图,长方纸本,水墨,云山洞壑中二鹤并立"。——清康熙刻本,有抄配,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7]前已提及,陈桓先生认为,高克恭作品中"其尤习见者,为《夜山图》与《秋山暮霭图》二帧,当时有名诗人,题咏殆遍。"并举盲诗人侯克中的《题高彦敬越山春晓图》:

满目烟岚满意春,江山如画画如真。岩岩万壑千峰秀,可惜中间无一人。——侯克中撰:《艮斋诗集》卷10。

[8]程钜夫:《雪楼集》卷28,洪武刊本。

野渡寒潮落日，荒城淡树疏烟。行人白发如许，开卷青峰宛然。[1]

(3)云山图，[2]见于郑元祐的《题岳家旧藏高彦敬云山图》：

千柱华榱淇渌堂，只今衰草野田荒。空余宝玩谁开阖，一迭云山泪一行。[3]

亦见于朱德润的《题高彦敬尚书云山图》：

高侯以文章政事之余作山水树石，落笔便见云烟滃欝之象，真所谓品格高而韵度出人意表者也。[4]

(4)山水图，见于张翥的《高彦敬山水》：

房山得法黄华山，笔力断取青孱颜。居然真境开九琐，中有美人茅屋间。

羽人访道不辞远，一剑江湖游未返。时从画里到家林，老木清溪照层巘。

我思邓叶两隐君，天坛石室多白云。纷纷相寻采芝去，寄声黄鹄君应闻。[5]

及倪瓒的《题高彦敬山水图》：

房山青影浸湖波，绿玉苍烟泠荡磨。宝墨珍图人世满，水中照见百东坡。[6]

亦见于朱德润的《题高彦敬山水》：

高侯画学简淡处似米元晖，丛密处似僧巨然，天真烂漫处似董北苑，后人鲜能备其法者。今观此卷，天真烂漫，故可宝也。[7]

(5)巴陵山水图，有元末文人郯韶《题王仲弘县尹所藏高彦敬尚书

[1]戴表元：《剡源逸稿》卷6，六绝，缪氏藕香簃抄本，缪荃孙校并跋，现藏上海图书馆。

[2]现藏吉林省博物馆。冯雪红与吴建伟认为，此图与上文仿米氏云山图是同一幅图，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3]顾瑛：《草雅堂集》，卷3，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中华书局，2008年。此诗未收于作者的诗文集《遂昌杂录》与《侨吴集》。

[4]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7。

[5]顾瑛：《草雅堂集》，卷4。此诗未收于作者的诗文集《蜕岩词》与《蜕庵诗》。

[6]《清閟阁遗稿》卷8，明万历二十八年倪理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7]《存复斋续集》，涵芬楼秘籍本。

巴陵山水图》诗为证：

尚书爱画水，落笔生远色。微茫洞庭野，迥与湘渚隔。

青山迤逦盘春空，江波欲落江树重。望中云梦开七泽，猿啼直与巴陵通。

王郎家住巴陵道，按图只说巴陵好。巴陵女儿歌竹枝，微风落日行人少。

山中春雨生石田，柴门流水声溅溅。钓竿长日倚沙树，扁舟中阁生晴烟。

爱此只合山中住，十年作官不归去。高堂见画夜梦之，梦中离离湿秋露。

白头官满思转多，江南酒美仍蹉跎。人生得意夜行乐，酒酣且和巴陵歌。王郎王郎奈尔何。[1]

(6)乱石奔流图，元人胡助有《高彦敬乱石奔流》诗，云：

白云微茫横剑阁，兴到时时自盘礴。高侯写出胸中奇，乱石奔流美林壑。

西风老树三峡秋，雪花溅沫岩之幽。雷转空山骇猿狖，毫端直与元化侔。

倦客思归结茅舍，丹青一幅千金价。谁知正乏买山钱，安得长年看此画。[2]

(7)竹石图，[3]元著名文人柳贯有《题高彦敬尚书竹石图》：

尚书胸中贮秋色，翠石苍筠随点笔。当其被酒气初酣，芒角森森出矛戟。

墨痕散作纸背光，虎卧龙腾俱有迹。伯夷去后凛清风，叔向生来古遗直。

见之冠佩不敢燕，矧是圆坛方荐璧。房山西北弁山南，二老交

[1]顾瑛：《草雅堂集》，卷10。

[2]胡助：《纯白斋类稿》，卷6。

[3]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雪红、吴建伟认为与上文之“墨竹坡石图”是同一幅图，说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情尝莫逆。

陶泓毛颖始受呼，不写秾芳写寒碧。流传此物成宅相，钿轴缥囊新潢饰。

老夫馋口近更滋，便欲归山煮吾篢。诗成题作主林神，未害西湖渠不识。[1]

(8)枯木竹石图，此画元时已有人模仿，元人宋禧有诗《题郑山辉效高房山枯木竹石图》为证：

山辉戏作房山画，已亥[2]经今恰十年。馆阁当时文物盛，风尘何处画图传。

神交未觉龙蛇远，羽化犹疑翡翠鲜。前辈风流归郑老，令人注目海云边。[3]

此图与前述之竹石图之间的关系，待考。

(9)吴山夜景图，虞集有《赵伯高所藏高彦敬吴山夜景图》诗：

吴越苍茫咫尺间，尚书能画夜看山。尘销海市露初下，雪积江沙潮始还。

座上赋诗谁绝唱，梦中化鹤忽临关。高情已逐年华去，秋树寒波共妙颜。[4]

此图与前述之夜山图之间的关系，待考。

(10)远山木石图，袁桷有诗《高彦敬远山木石图为纪梦符学士作》咏此图：

身比寒厓枯木，心侣浮云太虚。落日前峰堪隐，丹青渺渺愁予。[5]

另外赵孟頫有诗《题高彦敬树石图》：

乔林动秋风，索索叶自语。堂堂侍郎公，高怀政如许。[6]

---

[1]《柳待制文集》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至正刊本，四部丛刊。

[2]大德三年(1299)。

[3][元]宋禧撰：《庸庵集》卷4，四库本。

[4]《道园遗稿》卷3，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5]《清容居士集》卷14。

[6]《松雪斋集》卷5。

他所题诗的树石图与木石图是否是同一幅图，待考。

(11)房山图，有朱德润《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为证：

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山南山北风景殊，妙写总能随笔墨。

当时我见浔阳图，踈林古墅秋岑寂。黄芦满滩飞鸟静，屋底渔樵行逼歹。

紫珠瑕玉久眩人，叹息此图谁复识。清氛满堂千叠山，华岳嵩高何峻极。

昔也悬心徐省郎，今日缄随石彭泽。只今世俗称高侯，多爱青山白云白。

白云已去作飞雨，貌得中原一片石。[1]

(12)云横秀岭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北方民族大学(发表时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学者冯雪红、吴建伟论文。[2]马明达教授对此图有详论。[3]

(13)春山晴雨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见北方民族大学(发表时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学者冯雪红、吴建伟论文。[4]马明达教授对此图有详论。[5]

(14)云峦飞瀑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北方民族大学(发表时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学者冯雪红、吴建伟论文。[6]

(15)群峰秋色图，收于《中国绘画经典》，未注明藏处。冯雪红与吴建伟认为有可能为赝品。[7]

(16)沧洲石林图，明人郁逢庆所辑元人扶风马庸提跋：

铁崖先生在云间时，朝阳薛真人偕玉峰顾仲瑛氏载酒见之，留

---

[1]《存复斋文集》卷10。

[2]《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6。

[3]《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42。

[4]《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6。

[5]《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42。

[6]《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6。

[7]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连于草莱阁。酒半，先生为真人题旧藏高尚书沧洲石林图，诚墨妙绝笔，得者当永宝之。以名物遇之有自，遂亦奉和，并致景仰。云间周谷宾。[1]

(17)巢云图，高克恭为伯几(即鲜于枢)作，见于明清数种画史资料。[2]

(18)寒江孤岛图，明人王行有《高房山寒江孤岛图》[3]。

(19)钟观图，明人王行有《题赵元临高房山钟观图》[4]。

(20)林壑高风图，清人张照在其《石渠宝籍》记：

元高克恭林壑高风图一轴上等昃一

素笺本墨画，款署克恭，上钤房山高氏一印，右方上署林壑高风四字，下有清森阁书画印一，印左方上有棠村审定，蕉林二印。下一印漫漶不可识。轴高二尺二寸四分，广一尺一寸八分，御笔题签。签上有乾隆宸翰一玺。[5]

(21)林峦烟雨图，清人张照在其《石渠宝籍》记：

元高克恭林峦烟雨图一轴上等昃二

宋笺本着色，画款识云：元统癸酉夏六月克恭。下有高氏房山一印，上方俞和题云：

云气蒙蒙绕涧流，眼明谁辨数峰头。深林茆屋依然见，应是前村雨脚收。至正廿三年秋七月紫芝俞和。

又吴寛题云：村居隐隐却通舟，中有山人旧姓仇。二百余年遗墨在，令人欲作武林游。成化庚寅修禊日长洲吴寛。

右方下有彭氏文贞、杨氏家藏二印。左方下有于思缉印、桐江

[1]〔明〕郁逢庆辑：《书画题跋记》，续卷9，四库本。数种明清画史资料亦著录此画，兹略。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2]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3]〔明〕王行撰《半轩集》卷10，四库本。冯雪红、吴建伟未录此画。

[4]〔明〕王行撰《半轩集》卷10。冯雪红、吴建伟未录此画。

[5]〔清〕张照撰：《石渠宝笈》卷38，四库本。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余铨二印。轴高三尺八寸五分，广一尺九寸一分，上方御题诗，云：

溟蒙那辨菇蒲屿，林鸟低飞乱烟雨。前溪渔父棹舟归，不觉蓑衣重几许。

御题下有乾隆宸翰、几暇临池二玺。御笔题签，签上有乾隆宸翰一玺。[1]

(22)松阴落涧图，明人张丑著录：

祝氏家藏高尚书松阴落涧图，迄今犹在。吴中购之弗获。尚记希哲一律云：

倚壑高松一万株，拂岩飞瀑　巾铺。白龙隐映苍龙舞，山气虚兼水气濡。

净壁沉沉悬瑀佩，空堂隐隐奏笙竽。平生负得匡庐约，幸拜尚书赐不孤。

每诵此诗，未尝不想象其神妙耳。[2]

(23)溪山返照图，明人张丑著录。[3]

(24)临米元晖画册，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4]

(25)高克恭时而与其他文人共同作画，如与赵子昂(即赵孟頫)合作画过兰蕙梅菊画卷，[5]两人作画时袁桷在场，并在画上题诗"《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曰：

余尝见彦敬、子昂亲作绘，事生香踈，影光透纸墨，观者莫不敛衽。二公既下世，摹传益多。优孟之叔敖，几不可辨，观此生意，犹

[1][清]张照撰：《石渠宝笈》卷38。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为林峦秋雨图，但未言所据，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2][明]张丑撰：《清河书画舫》卷11下，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序)，池北草堂刻本。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载于《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页37。

[3][明]张丑撰：《清河书画舫》卷6，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序)池北草堂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冯雪红、吴建伟文录此画名，但未言所据，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4]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7。

[5]冯雪红、吴建伟认为"这幅被名士风流韵致濡染而成的画，其创作过程广为流传，但原画失传已久，连个画名都没有留下"，因此两位作者为此画拟名为"共画奇石古木图"，参见其论文《元代回回高克恭存逸画目推索》，页38。此说不确，此画创作时，袁桷在场，并有诗记，见下。

侍杖屦时也。[1]

虞集亦曾为此画题诗《题高彦敬尚书赵子昂承旨共画一轴为户部杨侍郎作》:

不见湖州三百年,高公尚书生古燕。西湖醉归写古木,吴兴为补幽篁妍。

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老蛟欲起风雨来,星堕天河化为石。

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高怀古□两相得,□淡酬酢皆天真。

侍郎得此自京国,使我观之三叹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沦落文章付陈迹。[2]

虞集在大都见此画,为之"三叹息",称高克恭为"国朝"第一名笔,画中见高克恭在作画之前饮酒半酣之意境。[3]

陈桓先生提到,故宫博物院中藏有一批高克恭的画卷,如能对照历史文献研究,相信会有所发现。元人夏文彦评价道:"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其先西域人,后居燕京。官至刑部尚书。善山水,始师二米,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琐泼染,作者鲜及。"[4]而柳贯在《题姚子敬书高彦敬绝句诗后》称:"高公画入能品,故其诗神超韵胜,如王摩诘在辋川庄,李伯时泊皖口舟中,思与境会,脱口成章,自有一种奇秀之气。"[5]故而邓文原《高公行状》中称高克恭其"画墨竹妙处不减文湖州,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乃用李成、董源、巨然法,造诣精绝。公卒后,购公遗墨者,一纸率千百缗"不为虚词。

〔1〕《清容居士集》卷47。

〔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上海涵芬楼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3〕有关此画的讨论,见马明达上引文,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42-143。

〔4〕夏文彦:《图绘宝鉴》卷5,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本。

〔5〕《柳待制集》卷18,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至正刊本,四部丛刊本。

18.3 藏品

18.3.1 藏画

高克恭不但善画,也爱收藏历代画作的名品。周密提到:

> 高彦敬克恭房山所藏:赵昌画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踯躅鸡冠木、娟海棠。初不甚佳,却有老米诗及蔡元度、章子厚、林摅、林希、刘原父、王晋卿、徐竞诸人题跋。官印凡十数,内有太原府尹,中书省,秘书省,温、杭、苏州官察使等印私。印有林希子中秘籍、清玩及徐竞一印,保大骑省,宣和画学博士,及襄阳漫士等印,悉用黄绢素书。本杨和王家故物,有杨淡名印。后有周益文忠公必大,及萧然邻燧等题名。[1]

周密还提到,他曾经收藏过周文矩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

> 高彦敬处周文矩"韩熙载夜宴图",纸本,长七八尺。前有苏国老题字,内有题"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十字。后又有苏题识"神笔绝妙"。此方是文矩真迹也,此是大藏库物监卖张运副者示予。向见沈和庵有此,恐即此物,后归王子庆,今归赵左丞矣。[2]

周密曾亲见此画,并研究过其上的题记,认为是真品。

18.3.2 古董

笔者所见元代文献中提及高克恭所藏古董有古琴与灵璧石鱼,其中琴有两人件,一件有"金儒鸣玉"题名,另一件为三足琴,均为唐时物。这两件珍品周密均见过,并述其原委曰:

> 高彦敬二琴,其一后题金儒鸣玉,唐大中五年(851)处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鸣玉,下刻高士谈家宝藏六字,已为人削去,尚有书迹。此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后归大金。高士谈者,金人以与宋通,

[1]周密撰:《云烟过眼别录》卷3,民国重印明宝颜堂秘籍本,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本。

[2]周密撰:《志雅堂杂抄》,卷下,清粤雅堂丛书本。

被杀，故或者恶而去之。其色赤如新，栗壳断文，隐起如蛇虬，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860—874)中张钺断款，用小篆，精妙，又有铭文，漫漶不可识，但见龙取像等数字。[1]

而那件雕为鲤鱼形的灵璧石，大逾尺，曾为高克恭所有，后来转送他人。元末昆山文人顾阿瑛曾见之，并赋诗《题石鱼为杜丹邱真人赋》记之，曰：

仙人有灵玉，浑然神鲤形。曾作大鲸吼，振鬣徙南溟。灵璧石鱼，元高侯彦敬得之，径尺而鳞鬣口目具焉。侯遗南谷杜真人。真人仙去，为月溪王真人持去。月溪羽化，复为杜丹邱归之。[2]

高克恭的其他藏品，马明达教授作过讨论，[3]兹不重复。由此可见，高克恭不仅善诗、画、书，且具文人志趣，可见其华化之深。

〔1〕周密撰：《云烟过眼别录》卷4。

〔2〕顾瑛：《玉山璞稿》，杨镰整理本，中华书局，2008。

〔3〕见上引马明达文，载于《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页135。

19 迺贤杂考

19.1 籍贯及生平

迺贤，字易之，自冠姓马，又称马易之。族出哈剌鲁，即唐之歌逻禄/葛逻禄。哈剌鲁在元代又称葛罗鲁、合鲁、阿儿鲁等。元末西夏文人余阙称迺贤为合鲁易之，[1]而贡师泰则称之为葛逻禄易之。[2]

葛逻禄为操突厥语部落，其原名为Qarluq。该部虽然在唐代已多见于汉文史料，但汉文史料却未言其族源。操突厥民族除唐代立于蒙古的古突厥碑铭之外，尚有一种史料记载突厥民族的口传历史，即《乌古思可汗传》。该史料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为13世纪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史集》所收录，其中在述突厥民族传说中的祖先乌古思可汗率部从中亚归回其故乡时称：

> 他们在途中到了一座大山下，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有几个家族由于下了这场雪，落后了；因为不许有人落后，乌古思对此很不高兴，他说道："怎么能因为下雪就落后！"他便给这几个家族起名为

---

[1]《题合鲁易之四明山水图》

窗中望苍翠，春木起晨霏。孤嶂才盈尺，长松未合围。

萧萧此仙客，日日候岩扉。念尔空延伫，王孙且未归。——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1，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题合鲁易之鄞江送别图》

欲去更还顾，依依恋所知。今朝去京日，似子渡江时。——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1。

[2]《题黄太史上京诗稿后》

黄太史文名天下，而上京道中诸诗尤为杰作。葛逻禄易之得其稿以传，且谒诸君为之题，其知太史亦深矣。——贡师泰撰：《玩斋集》卷8，明嘉靖刻本。黄太史即黄溍，其上京诗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续稿一。

哈剌鲁(Qārlūq),意即"有雪者、雪人",哈剌鲁诸部都出自这些人。[1]

突厥语中qar意为"雪",Qarluq此言"有雪的"或"有雪者"。《乌古思可汗传》这里是在讲解葛逻禄部名的来源,这恐怕是一种通俗辞源说的解释。在11世纪成书的Divān Lughāt al-Turk《突厥语词汇》(我国习惯上译为《突厥语大辞典》中,亦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主人公并非乌古思可汗,而是亚历山大,他的部众是22人(即其作者所提到的22个"突厥部落"),其中虽没有葛逻禄部,[2]但该《词汇》中专有Qarluq条,称:"他们是游牧突厥人的一支,不是乌古斯人,也算是突厥蛮人。"[3]此外,该《词汇》第2卷中还有qarluqlandï"葛逻禄化了、变成葛逻禄人的样子了"词条,该条还举出例句:är qarluqlandï"人葛逻禄化了";qarluqlanur-qarluqlanmaq,"变成葛逻禄人的样子了","具有葛逻禄人的性格了";[4]及第3卷中的词条qarluqladï"认为是葛逻禄人了",ol anï qarluqladï"他认为他是葛逻禄人",qarluqlar-qarluqlamaq,"葛逻禄人(复数)—认为是葛逻禄人"。[5]

在成吉思汗兴起时代,哈剌鲁人没有统一的部落联系,而是分散于中亚各地,大致分为三个部落集团,一个居于今费尔干纳(Fergana);一个居于当时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Quz Ordu),即唐代之裴罗将军城(Balasaqun,当代有人译为八剌沙衮),另一个居于海押立(Qayalïq,突厥语,此言"有峭崖之地")。廼贤的祖先属哪一支哈剌鲁人,元代文献中没有记载。在上述三支哈剌鲁人中,原居于海押立的哈剌鲁人首领阿儿思兰汗率先投降成吉思汗,后来与蒙元皇室的关系很密切,廼贤的

---

[1]拉施都丁:《史集》(Rašīd al-Dīn Jāmi' al-Tawārīkh),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1卷第1册《部族志》(据1965年莫斯科波斯文合校本赫达古洛夫俄译本Рашид-ад-Д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т.1, кн.1,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137-138。

[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3卷,仲校彝译,2002年,页405-408。

[3]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何锐、丁一、仲校彝与刘静嘉译,2002年,页500。

[4]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2卷,仲校彝与刘静嘉译,2002年,页283。

[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3卷,页340。

祖先应当不是这一支哈剌鲁人。

在元代的侍卫亲军诸卫中,钦察军在元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钦察贵族所控制的大都督府之下,除钦察三卫之外,还编有东路蒙古军万户府、元帅府与哈剌鲁万户府。土土哈家族家传资料记载了哈剌鲁万户府的设立过程:至元二十五年(1288)在土剌河之战击败东道诸王叛王哈丹之后,元廷设东路万户府以镇其地。而在打败叛王乃颜、也不干等人之后,也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设哈剌鲁万户府。[1]这个时间较《百官志》所述哈剌鲁万户府设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晚了两年。据《百官志》记载,哈剌鲁万户府下辖千户所3个。

据笔者所见,现存史料中所提到的将领中,与哈剌鲁万户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脱因纳父子。《元史》卷135有《脱因纳传》,提到:

> 脱因纳,答答叉氏。世祖时从征乃颜,以功受上赏。大德七年(1303),授钦察卫亲军千户所达鲁花赤、武德将军,赐金符。八年(1304),改太仆少卿。十年(1306),迁阿儿鲁军万户府达鲁花赤,易金虎符,进阶怀远大将军。寻改中奉大夫、太仆少卿,仍兼前职。……皇庆元年(1312),授阿儿鲁万户府襄阳汉军达鲁花赤,仍领太仆卿。……
>
> 有子曰定童、只(沈)[儿]哈朗。[2]定童袭父职,阿儿鲁万户府襄阳万户府汉军达鲁花赤,佩金虎符,明威将军。……[3]

这位脱因纳父子的任职经历非常值得注意。脱因纳本人大德七年(1303)为钦察亲军千户达鲁花赤。三年后,即大德十年(1307)从钦察卫调入阿儿鲁万户府。这个阿儿鲁万户府应当就是前引《百官志》是提到的哈剌鲁万户府。在13世纪以前的蒙古语中,“在语音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在词首原音上出现摩擦音h。如aran读作haran,elige读作heli-

〔1〕据苏天爵记载,连在安西王位下的钦察人,也被编入土土哈军。见《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标点本,页48。

〔2〕中华书局标点本此处校勘记为“只(沈)[儿]哈朗‘只沈哈朗’,于蒙古、突厥语无释,‘沈’为‘儿’字之误,今改。下同。‘只儿哈朗’蒙古语,言‘幸福’。”见页3290。

〔3〕《元史》卷135《脱因纳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287。

ge，on读作hon等。"[1]南宋彭大雅1232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该书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其下有小字注"水鞑靼也"。"斛速益律子"之末字"子"为"干"之讹，故当订正为"斛速益律干"。"斛速"为蒙古语husu之音译，意为"水"。入元后，词首的摩擦音逐渐脱落，故而《元朝秘史》与元代其他史料中，蒙古语"水"的音译多作兀速（usu）。前引《突厥语词汇》的作者可失哈里（Mahmūd Kašgharī）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提到，一些突厥部落的方言中，有词首增减h-的现象。故而阿儿鲁（arluq）就是哈剌鲁。

《元史》卷86《百官志》记载，哈剌鲁万户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初置时，其职掌为"掌守禁门等处应直宿卫"。后来"移屯襄阳"。[2]脱因纳任职襄阳正与哈剌鲁万户府从蒙古草原移驻中原的记载相符。在脱因纳死于至治末英宗被弑之乱后，其二子之一定童袭职阿儿鲁（即哈剌鲁）万户府汉军达鲁花赤，这也证明了《百官志》所记哈剌鲁万户府后来驻在襄阳的记载不误。

另一则有关河南的哈剌鲁人的资料为《元史》卷122《铁迈赤传》。据该传记载，铁迈赤为合鲁氏，即哈剌鲁人。铁迈赤或可还原为Tamačï，即探马赤的另一音译。他原先为成吉思汗的忽兰皇后斡耳朵挏马官，即负责捣制酸马乳，与土土哈之父班都察一样，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牧奴。世祖朝，铁迈赤之孙塔海（虎都铁木禄兄子）从土土哈充哈剌赤。至元二十四年（1287），扈驾征乃颜。铁迈赤之子虎都铁木禄（Qudu Temür）曾从皇子镇南王征交趾。此时其家在南阳。对比《元史》卷86《百官志》，可知至元二十四年（1287）哈剌鲁万户府设置后，寻移屯襄阳，后征交趾。大德二年置南阳。[3]铁迈赤家族正是从辽海前线回到内地，先参与镇南王所领远征交趾之战。而此时铁迈赤之子虎都铁木禄（汉名汉卿）的家庭恰恰定居南阳。该传两还次提到脱因纳乃其上

[1]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2]《元史》卷86《百官志》，标点本页2176。

[3]《元史》卷86《百官志》，标点本页2175-2176。

司。[1]而脱因纳则执掌哈剌鲁万户府。

铁迈赤之孙塔海曾为世祖宝儿赤，武宗时迁和宁总管，后改汴梁。[2]《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提到塔海在汴梁时的一件事：

> 塔海武宗时为汴梁路总管。先是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征，民多逃窜。塔海言于朝，省民间虚粮二十二万，民赖以安。[3]

天历元年(1328)冬十月，控制上都的倒剌沙奉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为帝，而燕帖木儿则在大都迎立武宗子图帖睦尔，元廷爆发"两都之战"。居于南阳的哈剌鲁人塔海受命充枢密佥院，守潼关及河中府，并在南阳督诸卫军与上都军作战。[4]廼贤家族自称南阳人，可见他们出自驻守于此地的哈剌鲁万户府。

南开大学刘嘉伟先生对廼贤的生平做过较详细的研究，他从分析廼贤的诗《春晖堂为武陟赵太守赋》中"蓼莪久废泪沾襟"一句中的"蓼莪"入手，根据"蓼莪"是《诗经·小雅》篇名，后世常以其代指对亡亲的悼念，推断廼贤应当早孤。[5]明徐象梅撰的《两浙名贤录》中有《马从事易之》条，记廼贤家族因其兄塔海仕宦而移居宁波，并记其身世曰：

> 马易之名廼贤，本葛逻禄氏，汉姓为马，世居西北之金山，后为南阳人。其兄塔海仲良宦游江浙，易之遂家于鄞。博学能文，尤长于歌诗。志尚高洁，不屑为科举利禄之文。平生所为歌诗，不规规[6]雕刻而温柔敦厚，有风人之致。尝游京师，出入贤豪间，每一篇出，士人辄传诵之。至正间，用荐为编修官，需次于家。时桑哥失里同知枢密院事，领军东蓟州，辟为从事官。后命移军直沽，易

---

〔1〕《元史》卷122《铁迈赤传》，标点本，页3003-3005。

〔2〕《元史》卷122《塔海传》，页3005。

〔3〕〔清〕穆彰阿、〔清〕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123，四部丛刊续编景旧抄本，册2291。

〔4〕《塔海传》只言他在南阳与上都军作战事。《文宗纪》提到，战事在河南极为激烈。上都方面诸王"铁木哥兵入襄阳，本路官皆遁。襄阳县尹谷庭珪、主簿张德独不去，西军执使降，不屈，死之。时金枢密院事塔海拥兵南阳不救。"——卷32，标点本，页720。以上参见拙文：《钦察亲军左右翼考》，载于《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0-25。

〔5〕《元代葛逻禄诗人廼贤生平考述》，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页139。

〔6〕疑第二个"规"字为衍文，或为刻工之误。

之病风喑而卒所。著有《金台集》《海云清啸集》行世。[1]

由此可理解，廼贤可能在父亡之后，由兄长塔海抚养，所以随兄至浙东。塔海为延祐五年进士，其迁居浙东当在此后不久。

至于廼贤的后裔，刘嘉伟先生注意到，廼贤之师郑觉民之子郑真提到，洪武六年二月“十日入吏部见马易之子[中缺]及林原公恭。”[2]但未提及廼贤之子的名字。十一年半之后，也即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十九日，他在宁波又曾路遇廼贤之子，《荥阳外史集》对此记道：“望春桥见马鼎携其乃父易之《饶歌集》[3]而行。”[4]这位马鼎是与郑真在吏部所见的廼贤之子是否是同一人，尚不能断定。[5]此外，明人姜南所撰《先见》也提及廼贤的一子名子静，其文曰：

> 元至正十一年春，南阳廼易之四明、儿子静俱客京师。子静馆于王参政俨家。[6]一日亟告归，参政强留不可，复托易之留之。子静曰：“今发四十万人开黄河，乱将兴矣！不归何俟？”后果掘河无功，征役难作，中原道梗，四方绎骚。时子静已旋得保父母妻子，守其先人丘陇，卫及乡社，不罹于咎，岂非识见之预定哉。[7]

子静与入明以后郑觉在吏部所见廼贤之子及他洪武十七年在宁波所遇见的马鼎之间的关系，待考。

---

[1][明]徐象梅撰：《两浙名贤录》卷54，明天启元年徐氏光碧堂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海云清啸集》，未见。其身世变化见明黄润玉纂修：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4，民国四明丛书本；清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2]《荥阳外史集》卷97。

[3]其子所携带廼贤之《饶歌集》未见其他文献提及，待考。

[4]《上任录》，《荥阳外史集》卷1。

[5]《元代葛逻禄诗人廼贤生平考述》，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页139。

[6]胡助有《王公俨少监云松巢》诗若干首，还有《送王公俨代祠南镇》诗，分别见《纯白斋类稿》卷4、卷12；许有壬亦有《题王公俨云松巢公俨今为山东廉使因寄之》，《至正集》卷11，清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无出版时间。

[7][明]姜南撰：《蓉塘诗话》卷15，明嘉靖二十二年张国镇刻本，天一阁藏。此人是否即参政王俨，待考。

19.2 作品与评价

19.2.1 《河朔访古记》

元末明初著名文人王袆[1]曾作《河朔访古记序》,说虽然迺贤祖先自南阳迁居浙东,至元末已三世。但他却不愿意久居于此,矢志远游,所取路线是"乃绝淮入颍,经陈蔡,以抵南阳。由南阳浮临汝而西,至于雒阳。由雒阳过龙门,还许昌而至于大梁。历郑、卫、赵、魏、中山之郊,而北达于幽燕。"在赴大都的行程中,迺贤并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沿途探访古迹。故而"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邑,足迹几遍。凡河山、城郭、宫室、塔庙、陵墓、残碣、断碑、故基遗迹所至,必低徊访问。或按诸图牒,或讯诸父老,考其盛衰兴废之故,而见之于纪载。至于抚时触物,悲喜感慨之意,则一皆形之于咏歌。"《河朔访古记》就是此次北行沿途所记及咏唱作品的汇集。[2]

元末文人刘仁本为迺贤的《远游卷》写过一篇题记,其中说"南阳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师,朋侪不忍其离别,作为歌诗赠言以张之",可见迺贤辞家赴京事在至正六年(1346)。为他作送行诗的人中有一位曰袁士远,其诗题目为《送马易之》,诗中说迺贤出自"南阳将相家","朝仪闻素习,学力复何加",即熟悉元朝礼仪,更加有学识。诗中又说迺贤"外戚高攀桂,难兄早探花"。"外戚"当指明宗西行时在中亚所娶的哈剌鲁妃子,而"难兄"则指其兄塔海仲良。迺贤因朝中权贵荐举而入京师,因而送行诸友认为他将来会"食馔公厨膂,游乘内厩騊。皇恩宣紫诏,德泽沛黄麻,"[3]都以为他从此会飞黄腾达起来。

前述王袆题记中所言迺贤北上的路线是,"自浙江而溯淮经雒,访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盘桓两京之地",与王袆所记完全相同。刘仁本还说,迺贤在北上时,"极游览以快于心目。有所得,輙形赋咏",也同于

[1]王袆后来在洪武年初与宋濂一起,承担了《元史》编修任务。

[2]王袆撰:《王忠文公集》卷5,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四库底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3][元]袁士元撰:《书林外集》卷2,明正统刻本,袁克文跋,现藏北京图书馆。

王祎的《序》中所言,可见《远游卷》与《河朔访古记》当是同一篇作品。很可能其最初的书名为《远游卷》,定稿后改为《河朔访古记》。

廼贤自大都归来后,与诸友相见后,其友人张仲深曾撰诗《用蒋伯威韵贺马易之自京回》,其第二首最后两句为"近闻河朔新成记,快睹应知客满斋。"[1],在"近闻河朔新成记"之下,有小字注文:"易之有《河朔访古记》,黄政卿、危太朴、许可用三先生有序。"[2]足见他回到江南时,《河朔访古记》已经成书,友人争相阅读。

19.2.2 《金台集》与其他作品

廼贤的另一部诗集《金台集》的成书过程,危素的序言中有记载,称"易之《金台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师,又得《后稿》一卷。"[3]可见乃系《金台前稿》与《金台后稿》两稿合并而成。对于《金台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危素提出:"昔在成周之世,采诗以观民风。其大小之国,千有八百。西方之国,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寔在方畿,自秦而西,未见有诗。岂其风气未开,习俗不能以相通也欤!"换而言之,他认为在采集风雅,编写《诗经》的时代,采之于西部的不过七篇,采之于秦的不过十篇,没有一篇出于秦以西地域。究其原因,盖因其时西北地区风气未开,中原与西域"习俗不能以相通"。而廼贤族出之葛逻禄部,"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国远甚"。入元以后,"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廼贤之兄虽然登进士第,但他却无意仕进。因而,危素不但评价"其所为诗,清丽而粹密,学士大夫多传诵之",而且将少数民族研习汉文化,视为证明当时为"足以见文化之洽,无远勿至。虽成周之盛,未之有也"[4]的盛世的证据。

张之道的《序》,他认为廼贤"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充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皆欲追大历、贞元诸子之为者。而《颍川老翁》《新乡媪》《芒山》《巢湖新堤谣》诸篇,又以白传之丰赡,而

---

〔1〕〔元〕张仲深撰:《子渊诗集》卷4,七言律诗,四库本。

〔2〕〔元〕张仲深撰:《子渊诗集》卷4。

〔3〕危素:《危学士全集》卷4,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4〕危素:《危学士全集》卷4。

寓之张籍之质古，不浅而易，不深而僻，盖学诸唐人而有自得其得焉者矣！”他认为廼贤诗歌的风格源于他的行旅，“及观君之游两都，历邓郊而归吴越，其之官绝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长河而南迈，其游览壮而练习多，予知其诗雄伟而浑涵，沈鬱而顿挫，言若尽而意有余，盖将进于杜氏也乎！”[1]游历广而眼界阔。廼贤后期的诗作，追随杜甫、白居易的诗风，以其《卖盐妇》为例：

卖盐妇，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如缕。

三日破铛无粟煮，老姑饥寒更愁苦。道傍行人因问之，拭泪吞声为君语。

妾身家本住山东，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岖戍明越，妾亦万里来相从。

年来海上风尘起，楼船百战秋涛里。良人贾勇身先死，白骨谁知沈海水。

前年大儿征饶州。饶州未复军尚留。去年小儿攻高邮，可怜血作淮河流。

中原封装音信绝，官仓不开口粮缺。空营木落烟火稀，夜雨残灯泣呜咽。

东邻西舍夫不归，今年嫁作商人妻。绣罗裁衣春日低，落花飞絮愁深闺。

妾心如水甘贫贱，辛苦卖盐终不怨。得钱籴米供老姑，泉下无惭见夫面。

君不见，绣衣使者澌河东，采诗正欲观民风。莫弃吾侬卖盐妇，归朝先奏明光宫。[2]

此诗关注国运与民生，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时代性，但因未收入《金台集》，因而张之道《序》没有论及不足为怪。

---

〔1〕〔明〕张以宁撰，石光霁编、张淮续编：《翠屏诗文集》卷3，据明成化刻本抄，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2〕〔明〕孙原理辑：《元音》卷12，四库本。

危素与张之道两位廼贤的同时代人对作者的观察有明显的区别,危素的着眼点是廼贤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而张之道则更关注廼贤作品本身的风格。

至正十一年,廼贤在大都时曾赋五言诗十六首,他亲自书写赠送友人朱梦炎,因而作为书法作品流传至今,题为《南城咏古诗帖》,均收入了《金台集》。[1]元以后文献中提及的廼贤的文集有《海云清啸集》与《饶歌集》等,均已亡佚。南开大学刘嘉伟先生对廼贤的著述及版本流传有全面论述,[2]兹不重复。

廼贤家族所出身的哈剌鲁万户府,是一支汉军与哈剌鲁人、钦察、康里人混编的军队。廼贤之兄塔海仁宗时能登科举,与其家族在南阳时已经汉化很深是分不开的。

(将刊于《徐文勘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

〔1〕参见刘嘉伟:《廼贤文献情况辑考》,载于《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年4月。

〔2〕刘嘉伟:《廼贤文献情况辑考》,载于《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年4月。

20　从北平王到北安王

——那木罕二三题

漠北是蒙古部的肇兴地。1206年以前，漠北草原群雄并立：从西到东乃蛮(Naiman)、克烈(Kereyit)、蔑儿乞(Merkit)、蒙古(Monggol)与塔塔儿(Tatar)互相征战，草原无宁日。自成吉思汗统一毡帐中的百姓，建立蒙古国以后，与连续不断的攻金、灭夏、西征等对外征服战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蒙古草原上，所有牧民、领主均听命于黄金家族。尽管草原牧民像过去一样，负担着沉重的劳役、兵役，被迫输纳各种贡赋，但毕竟草原上没有了战事，牧人们经历了数十年相对和平的日子。漠北战事重启乃源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的分裂。

太宗朝蒙古亲贵议定发动长子西征，太宗窝阔台之子贵由与术赤之子拔都同在军中，拔都为长。术赤与窝阔台两家族素来不睦。据《元朝秘史》第275、276节记载，在攻克钦察蔑格惕城，俘获斡鲁速惕(Orusut)百姓后举行的大宴上，贵由与拔都公开争执，拔都为此告到太宗处，最终以太宗下诏斥责贵由了结。但蒙古亲贵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元太宗逝后，贵由即位，是为元定宗。他决心削弱拔都的势力，亲自率大军从漠北启程西征，拔都亦率其军东行迎敌。贵由在距其食邑叶密立(Emil)数日程的横相乙儿(Qum Sengir)之地突然死去，使一场预计要发生的蒙古内战停了下来。[1]定宗逝后，拔都在中亚草原的驻地召集忽里台大会，决议从窝阔台家族手中夺权，立拖雷长子蒙哥为帝。此议引起了太宗后裔宗王的坚决反对。在后来组织蒙哥即位大典时，窝阔台、察合台两家族宗王联合起来，谋图以武力反对蒙哥登位，但事泄失败。参与谋叛的窝阔台、察合台两家族成员受到追

〔1〕参见拙文《读〈定宗征拔都〉》，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页63-66。

究。[1]

所有这些事件均表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开始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各自拥有土地、部民。他们之间为扩大自己势力而进行的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地前草原诸部贵族之间的征战。这使得蒙古国时期漠北平静的局面被打破。

20.1 漠北前线的形成

蒙哥在拔都的支持下,从元太宗窝阔台家族手中夺取皇权的胜利,并没有消除黄金家族分裂的动因。1259年宪宗蒙哥死后,黄金家族的分裂向深度发展,拖雷家族内部也陷于分裂,形成了分别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首的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随即爆发战争。这场内战最终以阿里不哥投降而告终。

20.1.1 北安王那木罕出镇

阿里不哥失败后,大蒙古国瓦解。世祖忽必烈控制着大漠南北、汉地、中亚的东部、吐蕃、河西、云南,即后来的元帝国。术赤后裔控制的也儿的石(Irtiš)河以西、亦的勒(Etil)河谷与钦察之地,发展成为钦察汗国;领兵西征的旭烈兀及其后裔,吞并了原蒙古国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控制下的波斯之地,形成了伊利汗国;而驻牧于中亚的察合台、窝阔台后裔诸王,利用大蒙古国瓦解、国家统治体制陷于混乱之际,将原蒙古国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区收为己有,形成了以海都为首的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同盟,与元朝为敌。

目前尚无文献提及海都在宪宗即位风波中角色。但从《元史·宪宗纪》《元史·忙哥撒儿传》与波斯史家志费尼(Ata Malik Juwaini)的《世界征服者传》(Tārīkh-i Jahāngushā)中所记忙哥撒儿处置谋叛的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和有关的大臣,及处置畏兀儿亦都护的记载中,没有任何文字提及海都判断,海都可能并未参与谋叛。

---

[1]参见拙文《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载于《内陆亚洲历史文化论集——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69-96。

宪宗二年(1252)夏，宪宗在和林时曾对成吉思汗家族宗亲又做过一次重要的分封：

> 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Qadan)[1]于别石八里(Beš-balïq)地，蔑里(Melik)[2]于叶儿的石河(Irtiš)，海都(Qaidu)[3]于海押立(Qayalïq)地，别儿哥[4]于曲儿只[5]地，脱脱(Toqta)[6]于叶密立(Emil)地，蒙哥都(Möngetü)[7]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8]于扩端(Köden)[9]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定宗后[10]及失烈门(Širemün)母[11]以厌禳事觉，并赐死。[12]

这里提到的宗王与后妃中，属于术赤家族的有别儿哥，其中别儿哥曾亲自率军护送蒙哥回到成吉思汗大斡耳朵称帝；属于窝阔台家族的有代表太宗次子阔端的蒙哥都、代表太宗第四子哈剌察儿的脱脱、代表太宗第五子合失的海都、太宗第六子合丹、太宗第七子蔑里与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他们都得到了新的封地，且史文将他们别儿哥并提，足见他们均未参与谋乱活动。海都不但名列其中，且其所受封地海押立

---

[1]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合丹为太宗第六子，见标点本，页2716。《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与此同，见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40。

[2]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灭里为太宗第七子，见标点本，页2716；《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与此同，见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灭里(Melik)为回回名，阿拉伯语意为王。拉施都丁说，他是由答失蛮阿只卜(Dānišmand Hajib)抚养于窝阔台合罕之斡耳朵(周良霄汉译本，页43)。

[3]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海都为太宗第五子合失(Qaši)长子，见标点本，页2716。

[4]别儿哥(Berke)为术赤第三子。

[5]曲儿只，又作谷儿只，即今格鲁吉亚。

[6]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脱脱为太宗第四子哈剌察儿(Qaračar)之子，见标点本，页2716；《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与此同，见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1。

[7]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蒙哥都为太宗第次子阔端之次子，见标点本，页2716-2717；《史集》称为阔端长子，见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

[8]《元史》卷106《后妃表》所列太宗诸皇后中，有乞里吉忽帖尼三皇后，即此人。

[9]又作阔端，按《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阔端为太宗次子，见标点本，页2716；《史集》第2卷《窝阔台合罕纪》与此同，见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

[10]即斡兀立海迷失(Oγul Qaimïš)皇后。

[11]《史集》在述失烈门母时，其名称缺失，见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0。

[12]《元史》卷3《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45。

(Qayalïq)[1]过去并不属于窝阔台家族,足见海都此时尚受到宪宗蒙哥的信任。[2]未得封地的是太宗长子元定宗贵由后裔(察忽、脑忽与禾忽)、太宗第三子阔出后裔(失烈门)。但实际上海与窝阔台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对自己家族的皇权被拖雷家族夺取极为不满,一直怀恨在心。1256年,宪宗遣石天麟出使海都,被扣留于其境达数十年之久。[3]

据波斯史家瓦撒夫记载,阿里不哥之敌平定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曾向西域出兵:

چون نوبت خانیت بقاآن دلعا قبلا

čūn nawbat-i khāniyat ba-Qa'ān ʻādil-i Qubilā

当统治之机会轮到公正的忽必烈合罕

سیدر و حرکات ریغآ و تمرد الغو سبقت گرفته بود حکم فرمود تا لشکری دیر سون یعنی

rasīd wa harakāt-i Ārīgh wa tammrod-i Alghū sibqat girifta būd hukm farmūd tā laškarī-yi dirsūn[4] yaʻanī

且战胜了阿里[5]的激动与阿鲁忽之反叛之时,[他]下旨一支大军,即

بسیارتا کنار آب آموی در آیند و تمامت شاه زادکانرا که در حوالی بهر چند وقت صورت

bisiyāl tā kinār-i Āb-i Āmūy dar āyand wa tamāmat-i šāhzādikān-rā ka dar hawālī bahr čand waqt surat

---

[1]突厥语意为有峭崖之地。

[2]参见拙文:《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载于《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见页91。

[3]《元史》卷159《石天麟传》,页3619。有关石天麟的问题,详见下节。

[4]دیر سون (dirsūn),察合台语,意为"大量的""许多"。参见拉德洛夫:《突厥语辞源学辞典》,第3册,圣彼得堡,1905年(*Versuch einer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von Dr. W. Radloff, dritter band, 1905, St. Petersbourg.),页1764"дірсун[دیر سون (Dsch.)],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й—zahlreich, viel";并见德福:《新波斯语中的蒙古语与突厥语成份》,威斯巴登(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Wiesbaden.),1963年,第1卷,页331-332,第206条。

[5]即阿里不哥(Arigh Böge)。

即众多的[军队],朝阿母河岸前进,并将全部诸王——即那些在附近在一段时间里因为

استبدادی در کارخانه تخیل نقش می کنند و بواسطه آن در پنداشتی می باشند از میان بر دارند

istibdādī dar kārkhāna- yi takhayyul naqš mī- kunand wa ba-wāsita-yi ān dar pandāštī mī-bāšand

一直在幻想的作坊中描画独断的面孔,且由于那个原因沉浸在幻想之中的人,加以排除,

ایلچیان قاآنی بی شاخلی و اندیشه پیش شاه زاده هولاگو خان روند و آیند قایدوچنانچه

činānča īlčī-yān-i qā'ānī bī-šākhlī(?) wa andīša pīš-i šāhzāda-yi Hülägü khan rawand wa āyand Qaidu

这样朝廷的也里只们能够无bī-šākhlī(?)与顾虑地往来于旭烈兀汗大王。海都

مستشعر شده دم مخالفت ومصیان زد قدم در راه مجارات مبارزات نهاد

mustaša'ir šuda dam-i mukhālifat wa musiyān(?) zad qadam dar rāh mujārāt mubārizāt nihād

变得聪明起来,采取了反抗与musiyān(?)的态度,并且踏上了平等与斗争之路。[1]

而在《史集》中,拉施都丁在记旭烈兀受封为伊利汗时写道:

و بدین تازگی جانباز ختای ایلچیان رسیدند کی قوبیلای قاآن تختبر نشست و

wa ba-dīn tāzigī az jānib-i Khatāy īlčī-yān rasīdand kī Qubilai Qā'ān bar takht nišast wa

[1]瓦撒夫:《瓦撒夫史》第1卷,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与德译合璧本,1856年(Waṣṣāf, *Kitāb-i mustatab-i Waṣṣāf*, Geschichte Waṣṣāf's, Persisch herausgegeben und Deutsch übersetzt von Hammer-Purgstall, Bd. I, Wien, 1856),波斯文,页132;德译本,页126。

最近从汉地[1]有使臣来[称]:忽必烈合罕已登基,且

اریغ بوکا مطیع اوامر شد و آلغو وفات یافت هولاکوو ار یرلیغ شده کی از

Arigh Böge mutī' umr-ū šud wa Alghu wafāt yāft wa Hülākü rā yarligh šuda ka az

阿里不哥已听其[2]命,而阿鲁忽已逝,并向旭烈兀下旨[3]:从

آب آمویه تا اقصای شام و مصر پادشاه ستا و سی هزار سوار از جوانان مغول نامدار بمدد وا

Ab-i Amūya tā aqsāy Šām wa Misr pādišāh ast wa sī hizār sawār az jawānān-i Mughūl-i nām-dār ba-madad-ū

阿母河迄苫国及密昔儿[4]之边,以他为王。且三万名著名的蒙古青年骑兵作为他的援军

فر ستاده ندا

firistāda-and

已经派出了。[5]

对比上述《史集》与《瓦撒夫史》的记载,《史集》所述朝廷派出3万大军前往支援旭烈兀之举,应当与瓦撒夫所记世祖向西域出兵是同一件事,而这支大军西进的目的,在于驱逐位于汉地与波斯之间的叛王,以保证汉地与波斯之间的交通。

波斯史籍所述世祖在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后向西北派军,是否确有

[1]原文为ختای(khatāy),“契丹”。

[2]原文为وامر(umr-ū),“他的命令”,“其旨意”。“他”指元世祖忽必烈。

[3]原文为اریغ(yarligh),“札儿里黑”“圣旨”。

[4]شام(šām),阿拉伯语对叙利亚的称谓,元代此名无汉译,兹用唐译。مصر(misr),指埃及,阿拉伯文。

[5]جامع التواریخ(Jām' al-Tawārīgh, jild-i siwum)《史集》第3卷,巴库,1957年波斯文合校本,页90;汉译本,页94。并请参见拙文《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载于《蒙古史研究》,第2辑,1986年。

其事,值得探讨。查阿里不哥归顺后,元向西北出兵只有皇子那木罕(Nomoghan)统兵出征的规模最大。那木罕受封北平王,[1]出镇漠北事在至元二年(1265)二月,[2]时间与此亦合。根据汉文史籍记载,那木罕大军的目标是海都。

在中统年战乱中,阿里不哥与阿速歹,在讨伐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与窝阔台兀鲁思汗大名王禾忽之战中,夺取了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附近中心城镇阿力麻里。阿里不哥失败后,此地为海都所据。虞集记:"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帅诸王之师,镇祖宗龙兴之故地"。[3]足见至元廷派漠北与海都对抗的是北平王那木罕。又据《元史》记载,至元五年(1268),海都叛,自阿力麻里"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循二千余里。上令勿追"。[4]在北庭(Bešbalïq,别十八里)击败海都之军,并追击至阿里麻里的,应当就是那木罕之军。但在得知海都溃退后,世祖下旨不再追击。换而言之,如果那木罕所部,就是上述《瓦撒夫史》与《史集》所提到的元世祖遣往支援旭烈兀的军队的话,那么这支大军并未继续向西前进,而是止于阿力麻里。[5]

综合上述汉文、波斯文史料的记载,可知中统年战乱结束之后,元廷确曾向西域派兵。而在漠北和北庭出击败海都、并追至阿力麻里的元军,很可能就是那木罕所部。[6]那木罕在漠北所扮演的是元军主帅

---

〔1〕成吉思汗时,汪古部驸马镇国受封为北平王。其后数代继承人一直戴有北平王的封号。见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收于《元文类》,卷23,四部丛刊本;刘敏中:《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中庵集》,卷4,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据清抄本影印,第92册,页298。

〔2〕《元史》卷6《世祖纪》(页111)称那木罕受封为北平王事在至元三年(1266)六月;卷108《诸王表》(页2738)称那木罕受王封事在至元二年(1265)。

〔3〕《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

〔4〕《元史》卷63《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569。

〔5〕对于世祖遣其子那木罕西征之事,《史集》亦有如下记载:"时[海都]与火你赤(Qoniči)那颜攻击了依附于蒙哥之子玉龙答失(Ürüng Taš)的纳邻(Narin),驻军于彼处,杀人越货,叛迹昭然。合罕遣其子那木罕率如下左右翼诸王……前往讨之。"——《史集》卡里米刊本,页632-633;《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12。邵循正先生据《元史》卷132《玉哇失传》改"纳邻"为"八邻"。见《忽必烈汗纪纪译释》,页113。八邻即欠州附近的八邻万户。

〔6〕但是《史集》和《瓦撒夫史》在简略提及忽必烈的上述西征大军活动的同时,都又提到了那木罕出兵事,并未将二者等同起来。其间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的角色。

20.1.2 有关石天麟的疑问

至元十二年(1275),昔里吉等人发动叛乱,扣留了北平王那木罕与丞相安童。根据《元史·石天麟传》记载,昔里吉等人叛变后,将那木罕送交海都。

20.1.2.1 《石天麟传》的史源

元代萧𣂏撰的《勤斋集》卷3中有《忠宣石公神道碑铭》,当为《元史·石天麟传》之所本。这一点《四库全书考证》的作者[清]王太岳已经发现,他说《勤斋集》"卷三《石公神道碑铭》,岁丙辰(1256)命使西北亲王,遂见留止。按《元史·石天麟传》:宪宗六年(1256)遣天麟使海都,拘留久之。与此合。"[1]该铭文曰:

> 至大庚戌(1310)秋八月有六日,[2]荣禄大夫大司徒致仕石公薨于京师春台里第之正寝,寿九十有二。以是月二十有八日葬于顺州南蔡里之先茔。有司举褒恤之典以请。诏:"石蒙古达[3]六朝老臣,忠勤于国,谥赠宜从优异,太常集议,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追封冀国公、[4]锡号推诚宣力、保德翊戴功臣,谥忠宣。夫人和拉彻臣氏、夫人摩勒齐哩氏,皆封冀国夫人。"上赐可。
>
> 公讳天麟,字天瑞,古燕顺州人。世有积德,为盛族。赠中顺大夫、护军、武威郡侯,讳祥者,曾祖也;妣完颜氏。赠资善大夫、上护军、武威郡公、讳庆元者,祖也;妣张氏。赠荣禄大夫、上柱国、顺

---

〔1〕《四库全书考证》,卷85,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2〕本传称石天麟逝于至大二年(1309)。

〔3〕本传记石天麟蒙古名为"蒙古台"。

〔4〕冀国公之号延祐四年(1317)又追授给李铨的祖父李彦宏,其夫人赵氏追封为冀国夫人,见袁桷:《李司徒行述代作》,《清容居士集》,卷32,四部丛刊本,页418;英宗朝贾秃坚里不花被追授为冀同公,其夫人脱脱里不灰、王氏、林氏皆授为冀国夫人,见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7,四部丛刊本;至正八年(1248),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董守敬亦被追封为冀国公,见黄溍:《董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6,兹据《黄溍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671-673;欧阳玄之父母亦被追封为冀国公、冀国公夫人,见《欧阳公行状》,《圭斋集》,卷16,四部丛刊本。篇幅所限,兹不再举。足见国公之封似不能袭。

国公、[1]讳庭者,显考也,博学笃行、为阴阳家,言五行律历,靡不精究。王官麻革,铭之墓碑。妣薛氏。

太宗皇帝在御,公年十四,侍父顺国公从行在所,因得拜觐。蒙睿眷,备警卫。公勤悫英悟,不数岁学问有成,诗礼、阴阳固传家学,而旁及诸国书言,无不通习。闻义勇为,同列推服。时天造之初,条纲未完。上命中书耶律公兴举。厘革庶务。而毗赞难其人。佥议以命公,事或岨峿,每赖以济,因赐名蒙古达,华言犹国族也,[2]前代赐姓之通例。诏名王帅师征西域,[3]王以裨佐为请,命公辅行。繇是分隶,为断事官,兼教诸王子。[4]宪宗即位,熟公才德,复选为诸路断事官。时省部未立,犹相职也。岁丙辰(1256),命使西北亲王,遂见留止。至元乙亥(1275),边将盗兵,[5]劫皇子北安王,亦寓止公之处。公惶惧深念,因彼用事臣,数数以宗亲大伦、君臣正义、逆顺祸福、天道人事,反复告谕。彼始怒而中疑,终则欣然感悟,竟遣公护送北安王来归。世祖大悦,恩赐蕃庶,礼异绝群臣。授中书左丞、兼断事官。复命入中书。公再拜辞曰:'臣奉使无状,幸免罪责。又才识鄙薄,加以耄惛。何敢叨居显荣,为庙朝之辱。'终辞不拜,帝嘉其诚恳,褒慰良久,然礼遇益隆矣。时至元癸未(1283,至元二十年)岁,盖留西域者二十八年。

既而有谮丞相安图,[6]尝为官于彼者。世祖怒。公奏:"海都实亲王,非敌也。安图不以死拒绝之者,(政)[正]以其他日来庭,则欣然无所疑阻于其心也。"帝为霁怒。故今易名之制,有"韬尔符节"芘我本支,扞牧圉以来归,启羁縻而向化之训。他日,帝闻江左

---

[1]顺国公并非石天麟家专有。元初女真人萧丑奴祖孙三代均曾被追封为顺国公。见《元史》卷179《萧拜住传》,标点本,页4156。

[2]蒙古台/蒙古达(Monggoltai),此言"蒙古人"(男性)。

[3]太宗时发起的西征之役,当为"长子西征",即"钦察之役",领军的"名王"为术赤(Joči)之子拔都(Batu)。

[4]该《石公神道碑铭》后面说,石天麟曾六度往返内地与西北。此次随名王出征,在西北某处任达鲁花赤当为前两次往返。其任达鲁花赤,当在拔都处。

[5]所谓"边将",即昔里吉、脱脱木儿等人。

[6]即安童。

道观内有宋主土木遗像,言僧当致之大辟,何如。公对曰:"帝后祠像,西京寺内终金有之。"事乃得寝。二十六年(1289),赐以所御金龙头杖,曰:"汝老矣,拄此出入宫掖,无禁也。"时权臣僧格,[1]方柄用,凶焰熏灼,海内震慑。其官人也,必陈状纳贿而后遣,人莫敢言者。公愤其罔上蠹民,首发其慝。帝益感公忠。成宗即位,特授荣禄大夫、大司徒。大德戊子[2],玉德殿成,[3]以公元老,命大臣延公先宴其中。公再拜稽首曰:"殿宇新成,圣上未之临幸,臣等何敢当此礼。灼知陛下不为一己之安,将延天下贤俊论说政事于斯也,太平有日矣。"臣敢为天下贺,上深感其言,称善久之,赐御药。且命左右劝之酒。是日沾醉,以御辇送归第。武宗皇帝加平章事,尤蒙礼敬,晚节致仕。家居清心寡欲,时事弗以关怀,训教子孙,优游数载而终。

两夫人皆冀国也。夫人端氏未封,男六人,曰额棱布哈,藁城县达噜噶齐;曰用,礼部侍郎;曰珪,大司农[4];女曰燕,适傅氏。皆

〔1〕即桑哥。

〔2〕至元二十五年(1288)为戊子年。大德无戊子年。在整个成宗统治期间只有一个子鼠年,即庚子年(大德四年,1300)。

〔3〕玉德殿是大都宫中一个重要的大殿,见于许多元代文献。袁桷《张公家传》记:大德"八年(1304),上御玉德殿,赐玉冠为寿"。——《清容居士集》,卷34,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刊本,四部丛刊初编,页510。

虞集《曾巽初墓志铭》:"庐陵曾君巽初著卤簿图五卷、书五卷,郊祀礼乐图五卷,书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丞相斡直善之。二年,以其书上闻。中书省下其事大常,礼部会议皆以其书为然。太常礼仪使田忠良等以告中书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诏太常以图书与著书人入见,而巽初得对玉德殿。"——《道园学古录》,卷19,四部丛刊本。

黄溍《李孟行状》记:"至大三年(1310)春正月,入觐武宗于玉德殿"。——《黄溍全集》,王颋点校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419。

〔4〕《元史》本传记石天麟子"子珪,累官治书侍御史,迁枢密副使,复为侍御史,拜河南行中书省右丞,升荣禄大夫、南台御史中丞。"——卷153,标点本,3620。

又《至正金陵新志》卷6下记:侍御史"石珪奉政,元贞元年上";御史中丞"石珪资德,至治元年上"——《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景印四库全书本,1990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序言中写道:"此志现存元刻残本,明刻补配,然多漫漶不清,故用此本(笔者按,即四库全书本)。此本志名年号'至正'误作'至大'。"——序言,页2。

〔清〕胡聘之撰:《山右石刻丛编》卷28所收《陕西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新作孔子庙记》中提到,该题记书写者为"朝列大夫侍御史石珪",当即此人。(稿本,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

夫人金氏所出。男曰辉图[1],京南宣慰使;[2]曰图戬雅尔穆什,山东宣慰同知;[3]曰和尼齐,常熟州达噜噶齐;[4]女曰达什札卜,适总管胡瀹。皆夫人黙呼德呼所出。女曰德呼,适司徒哈勒哈齐;曰托克托,适总管岱尔马。夫人端所出孙男十二人,孙女六人。

公天资忠厚沈毅,周密平实,与物无竞。历事六朝,夔夔一节,罔有择言择行。耄期康强,子孙满前,为国元老,以厚禄终,可谓五福备具矣。惜其嘉谟嘉猷,入告于内者,皆宗社大计,不得备书。大抵主于睦懿亲,戢征伐,奖忠良,黜回遹,消物害,彰圣德,内隐忠贞,不形于外,此其可知也。

斢又闻之太子宾客王泰亨言,公尝告坐客曰:"人之为人,惟孔夫子,札萨克不可违耳。"札萨克,华言犹法律也。[5]问公:"有之乎?"曰:"有。"[6]俾取示客,则编之以韦,如西域书,乃《论语》也。

---

〔1〕《元史》本传记石天麟"次子怀都,初袭断事官,累迁刑部尚书、荆湖北道宣慰使。"——卷153,标点本,页3620。这里的辉图即怀都。

〔2〕京南的"京"当指燕京。燕京在金代为中京,金代就有京南的称呼,如石抹明安"乙亥(1215)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众降。明安命复其职,置之麾下。遂驻军于京南建春宫"。——《元史》卷150《石抹明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556。

元好问还提到"京南路"的行政区划:正大四年(1227)"特旨起复。宰相奏:拟公京南路司农卿。上曰:'吾欲得张某朝夕相见,勿令外补。'宰相以三路调度,京南当什六,司农寄托尤重,欲暂辍之以往耳。上从之,故有此授。"——《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遗山集》,卷20,兹据《元好问全集》,姚奠中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上册,页534。引文时标点有变动。

入元后,京南之名仍有使用。据《元典章》录:"于元贞元年(1295)十二月十七日奏过,京南府一个山裹普昭小名的和尚,伪造佛经。"——《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刑部卷之15,典章52,"伪造佛经"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下册,页1896。

笔者多方查检,未见元代有"京南宣慰司"之设,疑为"燕南宣慰司"之俗称,名见《元史》,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三月"桑哥妻弟八吉由为燕南宣慰使,以受赂积赃伏诛。"——卷16《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45。并见《程雪楼集》卷17《杨汉卿墓志铭》,洪武刊本;《滋溪文稿》,卷14《故真定路儒学教授节轩张先生墓碣铭》,四库本,见叶1。

〔3〕山东宣慰同知,即山东宣慰司同知。此机构名见于《元史》卷101《百官志》"鹰房捕猎",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600。

〔4〕常熟属杭州路,"唐以来为县,元贞元年升为州",见《元史》卷62《地理志》,标点本,页1494。

〔5〕即札撒(Jasaq),蒙古语,此言法。契丹语作"闸撒"。

〔6〕此言石天麟家坐客皆未见过《大札撒》,以为石天麟有《大札撒》文本。

呜呼！今孰不读《论语》，以之为法律当守者，独闻于公。是宜与夫光灵、荣宠同耀无穷。其辞曰：洪范五福，其四在天，在人者德。德备福全。人皆好福，而靡好德，乃怨乃尤，何其大惑。太师宣公，夙侍钧天严，畏格言迄于华颠，暨造中书，曰预邦政，无施不可，忠信笃敬，西域数万绝徼之远，繇懿亲故，凡六往反。世皇御天，实为亲臣，谟猷入陈，外莫悉闻。登善黜恶，蠲民之瘼，国脉以延，皇猷允若，列圣诞膺，祖武是绳，宠光旧德，蕃锡相仍，玉盘之珍，金罍之旨，赐缗盈亿，轻暖适体。谦抑方崇，若卫武公。顺常教忠，全福以终，云章烂然，荣生哀死，轨度朝绅，光昭国史。振振公子，象贤济美，爰录之诚，勤勤无止。爰参舆诵，爰探纶旨。酌之丰碑，式诏千祀。[1]

那木罕在海都境被拘留之处，恰为石天麟居地。上引《石公神道碑铭》记，天麟"惶惧深念，因彼用事臣，数数以宗亲大伦、君臣正义、逆顺祸福、天道人事，反复告谕。彼始怒而中疑，终则欣然感悟，竟遣公护送北安王来归。世祖大悦，恩赐蕃庶，礼异绝群臣。授中书左丞、兼断事官。"

石天麟原本是太宗的臣下，后受命随拔都西征，成为拔都辖地的一名达鲁花赤。史料未提及他此次出西域何时返回。元定宗贵由逝后，拔都在阿剌脱忽剌兀之地召集忽里台大会，议决立拖雷子蒙哥为帝。拔都还遣其弟别儿哥率军护送蒙哥归回蒙古本土。石天麟东回或在此时。"长子西征"时，蒙哥亦在军中，他后来受到蒙哥的信任当缘于此。宪宗蒙哥复派他出使海都，当因为他是太宗旧臣的缘故。宪宗六年(1256)从春到秋，宪宗蒙哥均在漠北。是年冬，宪宗渡漠南，出征南宋。[2]故石天麟受宪宗命出使的起点为蒙古本土。他后来之所以受到世祖赏识，是因为说服海都送还了皇子那木罕。

上引《石公神道碑》与《元史》本传均言，自石天麟宪宗六年(1256)被派出使，至至元二十年(1283)归回，被扣于海都境长达28年。但值

[1]《石公神道碑》，《勤斋集》，卷3，清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2]《元史》卷3《宪宗纪》，页49-50。

得注意的是，就在石天麟被扣于海都期间，仍有史料提及石天麟在汉地活动。

20.1.2.2　另一位石天麟？

如《伯颜传》所记，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庚寅，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事，世祖大悦，悉可其奏。"[1]陶宗仪亦记此事："明年乙亥（1275）春，诸郡望风降败。丞相伯颜遣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闻。世皇喜顾谓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恐畏。兹若遣使议和，邀索岁币，想无不从者。'"[2]

《元史》又记，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丁酉[朔]，诏刘颉、程德辉招淮西制置使夏贵。己亥，克临江军。庚子[3]，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遣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枢密使谢堂、端明殿学士佥枢密院事家铉翁、端明殿学士同佥枢密院事刘岊奉表以闻[4]。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笺[5]。是日宋文武百司出临安府，诣行中书省，各以其职来见。行省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都督忙古带、范文虎入城视事[6]。辛丑，伯颜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左右司官石天麟、杨晦等入城，取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

---

[1]《元史》卷127《伯颜传》，标点本，页3105。

[2]《南村辍录》卷1，"独松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页14。

刘敏中亦记此事："令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同万户额森布哈驰驿赴阙敷奏"。"三月癸酉至建康，大赉三军，镇江亦遣使来降。丞相遣行枢密院军马屯守镇江，由是淮西、江南、滁州、宁国等大小数十余城传檄款附。庚寅遣员外郎石天麟等皆诣阙奏事。至尊大悦。凡渡江获功人员及士卒升赏军务等事，皆可其奏。"——《平宋录》卷上，四库本，叶11、13。作者还记曰：四月"癸未，同吕文焕济江北。石天麟从行至清河口。丞相驰驿先赴阙，敷陈平宋筹划。至尊悉皆嘉纳"。——《平宋录》，卷中，四库本，叶1；该卷还有两处提到这位石天麟，引文见下。

[3]《蒙兀儿史记》卷7于此处作"辛丑"并下注"旧纪作庚子，此从伯颜传。"

[4]《蒙兀儿史记》卷7下注"此祈请使也。既而谢堂不行，奉命同行者，尚有左丞相吴坚、文天祥。天祥至镇江逃去。"

[5]《蒙兀儿史记》卷7下注"笺盖上元朝皇后者。"

[6]《蒙兀儿史记》卷7于此处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行都督事。"并下注"忙兀台传，十二年十二月授行两浙大都督府事。范文虎于十二年二月以安庆降时即授两浙大都督，见前，皆在临安未下时。"

悉罢宋官府，散免侍卫禁军。”[1]

汪辉祖早已注意到这位石天麟。他在读到《元史·石天麟传》中有关“天麟稍与其用事臣相亲狎，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理，海都闻之悔悟，遂遣天麟与北安王同归。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还”的记载后，提出质疑：“案传云‘二十八年’，则自宪宗六年至世祖至元二十年，俱在海都处矣。世祖纪至元十三年二月，伯颜令左右司官石天麟入城，取军民钱谷之数。岂别一人耶？”。[2]也就是说，如果这位石天麟就是出使海都者，他怎么会在被扣西北的同时又出现在江南？这个问题不能不加辨析。

20.1.2.3　两位石天麟辩

为便于叙述起见，我们将《石公神道碑铭》与《元史》本传中提到的石天麟暂称为石天麟A，而将随伯颜下江南者称为石天麟B。以下试辨析石天麟A与B是否系同一人的问题。

(1)石天麟A六度往返东西问题：

上引《石公神道碑铭》提到“西域数万绝徼之远，繇懿亲故，凡六往反”。也就是说石天麟A生前曾三次(六度)往返于汉地与西域之间。从《石公神道碑铭》与《元史》本传的记载看，石天麟A曾两次往来于东西。一次是，太宗朝“长子西征”时，他曾随行，并为达鲁花赤；另一次就是被扣留海都处。除这两次往返，他应当还曾经往返过一次西域，但未见文献记载。那么石天麟A会不会在伯颜征宋之前回到汉地，并随行下江南呢，然后再回到海都处呢？

考伯颜下江南之时，恰值昔里吉等发动叛之时，此时石天麟A正在海都境，不可能出现在江南。且史料明言，石天麟A在送回那木罕时已经留海都处达28年。因此石天麟A如果还有一次往返东西，也不可能

---

〔1〕《元史》卷9《世祖纪》，标点本，页178。

刘敏中又记：二月“辛丑委张惠、阿喽罕(即阿剌罕)、董文炳、石天麟、杨晦……入临安，取会军民钱粮之数及拘收宋朝百官诰命敕札符印”。三月“丞相出城湖州市，宿于秀王府。阿喽罕(即阿剌罕)、董文炳同预行省事，孟旗从行赴阙，石天麟仍领左右司事，杨晦、夹谷之奇同预焉”。——《平宋录》，卷中，四库本，叶11、13。

〔2〕《元史本证》卷20，证误20。

在是伯颜南下之时。

由此判断，石天麟A与石天麟B不可能为同一人。

（2）两位石天麟的地位与官阶考察：

石天麟B：伯颜取江南时（至元十二—十三年〔1275—1276〕），其的官职是“左右司员外郎”。元左右司之制沿袭金代，中书及各行省均设，掌文书。元左右司员外郎官阶为正六品，[1]为中级官员。

石天麟A，据《石公神道碑铭》记载，太宗时他已协助耶律楚材会决庶务。本传称平定江南七年后，即至元二十年（1283）他从海都处归来，授官中书左丞。元制中书左右丞官阶正二品，为中书省中仅次于平章政事的高官，其职掌为“副宰相裁成庶务，号左右辖”。可见两者地位相差悬殊。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随伯颜下江南的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B与被扣于海都处的石天麟A并非同一人。

明余寅注意到，宋元时代有两位石天麟，他写道：

> 宋石天麟，芜湖人，元丰间南北门蛮事起，诏募勇敢。天麟请行，与侍禁孝资同往。谕蛮酋以祸福洽懿，五州相率降服。
>
> 元石天麟，顺州人，初为断事官。宪宗遣使海都，被拘二十八年始得还。累官平章事，卒年九十二。[2]

但是余寅没有注意到元代几乎同时也有两位石天麟在南北活动。

20.2 那木罕统兵漠北

20.2.1 从晋邸追溯北平王斡耳朵

那木罕镇守漠北时，忽必烈的主要军事力量正集中对南宋用兵。故镇守漠北的只能是蒙古本土各部。钦察大将土土哈在那木罕被擒后曾参加北征，苏天爵对此记载：“宗室海都粤自先朝，畔涣朔方。国家根本之地在北，诏遣皇子北平王率诸王镇守之。”那么，那木罕初至漠北，

〔1〕《元史》卷85《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123。

〔2〕《同姓名录》，卷11，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叶39。

未赴阿力麻里之前，其驻地在何处，学者们见解不一。[1]

昔里吉叛变后，于至元十四年(1277)率军进攻漠北，“北平诸部暨祖宗所建大帐，尽为所掠。”[2]这里所提到的“北部诸部”即北平王那木罕诸部，而“祖宗所建大帐”即成吉思汗大帐。史料将那木罕之部属与成吉思汗所建大帐并提，足见其部属驻于其地。同年，土土哈受命赴漠北平叛，八月“败敌于斡耳欢河，获所掠祖宗大帐。”[3]那木罕被昔里吉集团叛王俘获后，其王位并未被夺。故而海都将他放归后，仍镇守漠北。至元二十一年(1284)东道诸王叛，阔列坚之后“也不坚引其趋怯绿怜河大帐”。[4]可见那木罕在漠北时，成吉思汗所遗诸斡耳朵即在其治下。

至元末年，真金次子甘麻剌受封晋王，按《泰定帝纪》的说法，他所接替的就是那木罕的位置：

> 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安王，镇北边。北安王薨，显宗以长孙封晋王代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5]

查《诸王表》与《显宗传》均言，晋王甘麻剌原为梁王，受封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镇云南。二年后，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改为晋王，出镇成吉思汗大斡耳朵。[6]而此时那木罕仍在位。那木罕逝于大德五年(1301)，无嗣。[7]故晋王与北安王两王并存近十年，所以上引《泰定帝纪》“北安王薨，显宗以长孙封晋王代之”一句所言不确。

晋王曾两赴漠北，取代北安王之事在其第二次出镇漠北之时。王恽曾作《范徽卿风雪和林图》诗一首，记范徽随晋王甘麻剌出镇漠北事：

---

[1]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原载于南京大学《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兹据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见页147。

[2]《枢密句容武毅王》，《元名臣事略》，卷3之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页48。

[3]《枢密句容武毅王》，《元名臣事略》，卷3之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页48。

[4]《元史》卷117《牙忽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908。

[5]《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637。

[6]《元史》卷108《诸王表》，页2736；卷115，《显宗传》，页2894。

[7]《元史》卷108《诸王表》，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736。

天策桓桓控上游，边庭都付晋藩筹。

河山表带连中夏，风雪洪蒙戍北楼。

笑看奇谋收药笼，未妨民赋课瓯娄。

丈夫志在飞而食，不让班超定远侯。[1]

诗中“边庭都付晋藩筹”一句，即是描述晋王第二次赴漠北执掌漠北军务之事。至于王恽《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中所述“至元丙戌(1286)，诏皇孙晋王于其地，建藩开府，镇护诸郡”之事，李治安先生已经辩证其讹。[2]

晋王家族自视为那木罕的后继。也孙帖木儿即位时发布即位诏书再次申明，他为嗣晋王时，“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3]那木罕逝于大德五年(1301)，而晋王甘麻剌逝于次年，同年也孙帖木儿袭封。所以泰定帝即位诏书中所述乃大德六年(1302)事。

那木罕受封北平王事在至元二年(1265)，至世祖朝末镇守漠北已二十余年，且因无嗣，以其他近亲诸王代之是可能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甘麻剌受封晋王时，朝廷命“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4]确有取代北安王那木罕的意义。当时便有大臣提议“今晋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视诸王宜有加”。此议为世祖采纳，遂设晋邸内史。而受旨担任内史者，正是北安王那木罕的王傅秃归。[5]

因而，从北安王与晋王权力交接的角度看，当初那木罕在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受封北平王，赴漠北就镇时，所承担的使命之一也应当是“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可见考察晋王漠北的驻地

---

〔1〕王恽:《秋涧集》卷23，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江南图书馆藏明弘治刊本，四部丛刊，页245。

〔2〕《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页313-314。

〔3〕《元史》卷29《泰定帝纪》，页638。

〔4〕《元史》卷115《显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894。晋王受命统率漠北诸部之事，在其家族世代相传。直至至治三年(1323)甘麻剌之孙也孙铁木儿在龙居河(克鲁伦河)即皇位(泰定帝)时，在其即位诏书中还申明:“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受封晋王，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元史》卷29《泰定帝纪》，页638)。此处最后一句标点似有误，应为“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委付来”。

〔5〕《元史》卷115《显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894。

对搞清那木罕的营地有重要意义。

一般以为,那木罕既受命统御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其主要驻地应在其中之大斡耳朵,即上述至元二十一年(1284)叛王也不坚所图之"怯绿怜河大帐"。这个"大帐"应当就是也孙铁木儿在受封晋王时所守之"大营盘"。〔1〕而至治三年(1323)年英宗被弑后,诸王大臣迎也孙帖木儿于其"镇所"。其即位之地为"龙居河"。此即上述"怯绿怜河大帐"。这里也应当是那木罕初至漠北时的居地。

在清方履籛所撰《金石萃编补正》卷4中收有《莱阳洞林寺圣旨碑》元白话碑,为"虎儿年(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二十一日赤那思有时分写来"的嗣晋王也孙木儿的令旨。〔2〕此地在元代又写作赤纳思、赤那思等。李文田已经注意到这个重要地名,他写道:"赤讷思,诏遣御史大夫秃只等即赤讷思之地,集诸王军将问战胜功状。'赤讷思'《元秘史》作'赤那思',是其地也。《秘史》卷4云:札木合回去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张翥《蜕庵集》有《送郑喧宣伯赴赤那思山大斡尔朵诗》,云:'那思山下水,曾睹六龙飞'"。〔3〕

李文田所提到的御史大夫秃只等事,即大德五年(1301)年帖坚古

〔1〕《元史》卷85《百官志》记兵部有"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等户总管府","掌别吉大营盘事"等;又有"管领本位下打捕鹰房等户都总管府","掌别吉大营盘城池阿哈探马儿"(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142)。此"别吉大营盘"当非晋王所守之大斡耳朵,应为拖雷妃唆鲁禾帖尼之营地,在欠州。元末杨瑀曾记载:"朔方缣缣州其西南有二石洞。一洞出石盐,皆红色,今湮没矣。一洞出清黑色者尚存。缣人皆食之。石文麄矿如南方青石,然调味甚适口。他处亦皆有捞盐海子,或出青盐,或红盐,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者。大营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不假人力,乃天成也。子友完者经历、夏石岩经历皆曾以此盐遗余。彼亦尝亲历其地。缣缣州,即今南城缣州营是其子孙也。自大都至彼一万四千里,与怯里吉思为邻境。过此即海都家望高处也。"——《山居新语》,卷1,余大钧点校本,中华书局与《玉堂嘉话》合刊本,2006年,页200。引文标点笔者有改动。

〔2〕清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总页70-71;并见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刊于《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24-225;此碑收入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3〕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胡玉缙抄本,复旦大学藏,页89。

之战之后，朝廷遣御使大夫秃只、[1]知枢密院事塔剌海、[2]也可札鲁火赤秃忽鲁[3]等朝廷大臣会集晋王、安西王阿难达、怀宁王海山等诸王与土土哈等，讨论战况的赤纳思之地之事。[4]

而《送郑喧宣伯赴赤那思山大斡尔朵儒学教授》诗有四首，其一为：

圣祖兴王地，风云护大营。天垂紫塞阔，星戴赤山明。

人俗殊淳古，皇文易化成。君行当劝学，无愧鲁诸生。

其二为：

绝漠同文轨，提封振古稀。大牙开武帐，元老秉天威。

白马紫驼酒，青貂银鼠衣。那思山下水，曾睹六龙飞。

其三为：

野散千军帐，云横万里川。寒多雨是雪，日近海为天。

黑黍甘供酿，黄羊饱割鲜。广文但少客，宁虑坐无毡。

其四为：

晨发戒行装，风沙碛路长。油鞯白鼻马，蓝绶赤铜章。

文学重新命，故人嗟异方。时时有北使，书札慰相望。[5]

其中第一首诗中的"赤山"与第二首中的"那思山"，即赤那思山。但诗中均未提及此山的具体地望。

至正十一年(1351)内史府椽史艾蜚英因"后至当远役"例，奉命分府北行"，宿赤纳思山下。李治安据此认为，这说明晋王藩府在这一带

---

〔1〕此人待考。

〔2〕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记月赤察儿有"有男七人"，长"曰塔剌海，夫人赤邻所生。端良刚毅，有古大臣风。至元三十年(1293)佩金虎符，特授昭勇大将军，左都威卫使。大德元年(1297)三月加阶昭武，七月迁荣禄大夫，徽政使仍左都威卫使。四年兼枢密副使。"见《元文类》卷23。此人当即赴赤纳思之地议事之知枢密院事塔剌海。

〔3〕黄溍：《敕赐康里氏先茔碑》：武宗时"边将脱火赤请以新军益宗王丑汉，廷议俾王往给其资装。王言：'时方宁谧不宜挑变生事，辞不行。遂遣丞相秃忽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往给之。事儿以激变。"——《黄金华集》，卷28；《黄溍全集》(王颋点校)据《黄文献公集》有改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706。这里的丞相秃忽鲁，应即前文中之也可札鲁火赤秃忽鲁。

此人在皇庆二年(1313)官居"摄太尉中书右丞相"，见程钜夫《皇后册文》，《元文类》，卷10，四部丛刊本。

〔4〕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叶10。

〔5〕张翥：《张蜕菴诗集》，卷1，四部丛刊本，叶10-11。

地区。[1]而陈得芝先生则论证,赤那思在曲雕阿兰(Köde'u-aral),今克鲁仑河与臣赫尔河汇流处。[2]比照虞集"皇子北平王帅诸王之师,镇祖宗龙兴之故地"[3]的记载,则赤那思山这里很可能就是那木罕的大营。

20.2.2 新帅统旧军——北平王那木罕麾下诸军

忽必烈派那木罕赴漠北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改变阿里不哥时代的漠北统治体制;其二是防备察合台与窝阔台两系宗王的敌对势力。他所能依靠的,基本上是黄金家族在漠北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划归那木罕指挥的诸军的主力,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后裔诸王所属各部。只有兀鲁兀台出自阔列坚。

图20-1是史料中提到的受那木罕节制的诸王的血统世系:[4]

图中所表示的阔列坚后裔的说明如下:据《元史·世祖纪》,在那木罕、安童被扣留后,世祖派伯颜至和林,时"诸王兀鲁带率其属来归,与右丞相伯颜等军合。"[5]这位兀鲁带应当就是阔列坚之子兀鲁兀台/兀鲁忽台。足见他原受那木罕节制,在叛军至和林附近时,逃归忽必烈阵营。

波斯史籍《瓦撒夫史》记载,支持阿里不哥的还有كلكان(Külkän,即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之子اغول ارقدای(Arqadai Oghul),[6]即《元史》中

[1]《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页315-317。李治安引《至正直记》"常见《和林志》所载,晋王大斡耳朵至赤纳思一千里"加以论证。笔者手头《至正直记》排印本中,"赤纳思"作"亦纳里"(卷1,"古阳关"条,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1。),待查。《和林志》原文今已不存,其中究竟具体怎样描述晋王大斡耳朵与赤那思的关系,目前无法查考。

[2]见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载于《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26。

[3]《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

[4]主要依据《史集》,另加补入者将专门说明。本表所列人名中,加括号者,并非那木罕属下,仅表示出世系所出。

[5]《元史》卷9《世祖纪》,页191。同书卷10《世祖纪》又记: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丞相"伯颜以渡江收抚沙阳、新城、阳逻堡、闽、浙所获功军士及降臣姓名来上"(页207)。朝廷虽已于去年任命伯颜为漠北戍军主帅,但他似乎尚忙于处理灭宋未尽之事,并未立即到任。

[6]《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页22。

成吉思汗

拖雷　阔列坚　？

蒙哥　忽必烈　旭烈兀　阿里不哥　拨绰　岁哥都　兀鲁兀台　札剌忽

阿速带　昔里吉　玉龙答失　那木罕 Nomoghan　真金　出木哈儿　药木忽儿 Yobuqur　明里帖木儿　薛必烈杰儿　脱帖木儿

撒里蛮　牙忽都

受那木罕节制的诸王中，有许多人曾参加过阿里不哥之乱。上表中以下划线标示者，即曾经参加过阿里不哥阵营的诸王。而以着重点标出者，则是后来背叛那木罕者。

图 20-1　受那木罕节制的诸王血统世系

- 也速该
  - 成吉思汗
    - 朮赤 — 斡耳答 — 哈剌察儿
    - 察合台
      - 合剌旭烈
      - 拜答儿 — 阿鲁忽
    - 窝阔台
      - 合丹
        - 忽鲁迷失
        - 纳臣
        - 睹尔赤 Dörji
      - 合失 — 海都
      - 阔端 — 也速
    - 拖雷
      - 蒙哥
        - 阿速带
        - 玉龙答失
      - 旭烈兀 — 出木忽儿
      - 阿里不哥
    - 阔列坚 — 兀鲁兀台
  - 铁木哥斡赤斤 — 只不干 — 塔察儿 — 乃蛮台
  - 别里古台 — XXX

图 20-2　支持阿里不哥的诸王世系

之兀鲁兀台[1]与斡鲁忽台。[2]

阿里不哥平息不久，参与反对阿里不哥的人中，除了少数大臣外，其余宗王皆得赦免，仍居于漠北。世祖忽必烈命那木罕至漠北，所变更的仅是漠北诸军的指挥系统。驻牧于其地的这些诸王多数为拖雷后裔。或许在忽必烈看来，这些人虽曾参加阿里不哥的阵营，与自己有过冲突，但毕竟与自己同出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且时帝位纷争已经解决。未来在他与一旦窝阔台、察合台后王发生利益冲突时，这些人理应站在自己一边。但实际上他低估了阿里不哥之乱在拖雷家族留下的伤痕。蒙哥后裔与阿里不哥系宗王却始终对忽烈称帝心怀不满。结果当他们与海都勾结起来后，那木罕的前线指挥部便顷刻瓦解。

20.2.3 漠北戍军的重组

昔里吉等宗王的叛乱证明，要巩固对祖宗肇兴之地的控制，仅仅变更漠北的统帅系统，而不触动驻守其地的诸王亲贵是不可能的。忽必烈在其兄蒙哥即位后，受命经略漠南，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培育出自己的势力。在即位后灭宋的过程中，他收编了大批原蒙古国在汉地的武装与南宋的降军——新附军。灭宋后，忽必烈除了重组漠北统帅部之外，他用于平定南宋的军事力量有了机动的可能，于是这些军队被大批地调入漠北与西域。

20.2.3.1 真金两至漠北

那木罕的统帅部被昔里吉等王颠覆后，忽必烈派其子真金赴漠北。据《伯颜勋德碑》：

> 十四年(1277)，宗王失烈吉畔，诏王(按，即伯颜)将兵讨之……十八年(1281)，诏从皇太子抚军北镇。[3]

《元史·伯颜传》有类似的记载，但称受命抚军北边的是燕王。[4]上

---

〔1〕《元史》卷117《牙忽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908。

〔2〕《元史》卷133《脱欢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233。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兹据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见页145。

〔3〕兹据苏天爵撰：《丞相淮安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2，中华书局，1996年，页20-21。并见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国朝文类》卷24，四部丛刊本。

〔4〕《元史》卷127《伯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113。

述两则史料所分别提到的“皇太子”和“燕王”，均指世祖子真金。真金受封为燕王事在中统三年(1262)，被立为储君的时间是至元十年(1273)。其受命赴北边抚军时已是皇太子。《元史》编纂者在《伯颜传》中改“皇太子”为“燕王”。

除上述《伯颜勋德碑》所提到的至元十八年真金抚军漠北之外，《裕宗传》还提到了真金的一次北巡，此次事在至元七年(1270)，曾至金山附近称海之地：

> 七年秋，受诏巡称海，至冬还。间谓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曰：“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于是撒里蛮曰：“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曰：“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尝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王曰：“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1]

据上述记载，真金此次称海之巡，伯颜亦在行中。此时伯颜的职衔是枢密副使。[2]值得注意的是，该记载提到此次真金在称海时，在与其他宗王会聚时提议各人叙述自己最为重视的格言，坐中有宗王撒里蛮与札剌忽。这位撒里蛮当即后来参与失里吉之乱的蒙哥之孙撒里蛮(Sarman)，乃玉龙答失(Ürüng Taš)之子，与真金互为堂兄弟。当初阿里不哥势穷时，其父玉龙答失在札卜罕河(Japqa)之地投降忽必烈，故此地当为其营地，与称海城相去不远。撒里蛮所颂言的太祖遗训，当听自其祖父蒙哥。另一位在座的宗王札剌忽亦见于《元史》，至元十九年(1282)春正月：

> 丁卯，诸王札剌忽至自军中。时皇子北平王以军镇阿里麻里

〔1〕《元史》卷115《裕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888。

〔2〕《元史》卷7《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28。

之地，以御海都。诸王昔里吉与脱脱木儿、籰木忽儿、撒里蛮[1]等谋劫皇子北平王以叛，欲与札剌忽结援于海都，海都不从。撒里蛮悔过，执昔里吉等，北平王遣札剌忽以闻。[2]

札剌忽其人既称诸王，肯定出自黄金家族，其世系有待于考察。他所述自己祖先训言待考。由此观之，《裕宗传》所记乃为真金在称海军中其他诸王的一次聚会，其时间当在昔里吉叛乱之前。札剌忽与撒里蛮相熟悉识，后来撒里蛮派他入元联系并非出于偶然。

伯颜出自蒙古八阿邻氏，其祖父阿剌在随成吉思汗西征时，参与平定忽阐(Khojand)之战，名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其父在宪宗朝旭烈兀西征时，随军至波斯。至元初随伊利汗使团至汉地，世祖留侍左右。据伯颜家传记载，至元七年(1270)，授为同知枢密院事。[3]此职即为他陪同真金驻称海时之衔。

那么，上述《裕宗传》真金至称海之事，是否就是《伯颜勋德碑》所提到的那一次。如果是，为什么两者时间不一致？如果另一次出巡，是否有其他史料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刘敏中亦曾提及过真金至称海之事：

畏兀儿人"起台不花早受知裕皇，给事东邸。裕皇封燕王，为

---

〔1〕《廿二史考异》卷87：按，宗室表旭烈兀大王、岁都哥大王之孙俱有脱脱木儿，未知孰是。籰木忽儿者，阿里不哥之子药木忽儿也。撒里蛮者，玉龙答失之子。

〔2〕《元史》卷12《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39。

《元史本证》卷3，证误3：继培案十四年(1277)七月已书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胁诸王以叛，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纳；诏伯颜往御之。《伯颜传》，十四年昔里吉叛，伯颜往讨之，遇于斡鲁欢河，破之，昔里吉走死。是昔里吉十四年即死矣。乃《土土哈传》，脱脱木、即脱脱木儿。失烈吉即昔里吉叛在十四年，与纪及伯颜传同。而十五年(1278)又有"追失烈吉踰金山"之文，是非死于十四年也。《忽都传》云："十三年(1276)失列吉、约木忽儿叛"，"十四年失列吉军乱，脱走"。是走于十四年而叛则在十三年也。《李庭传》云：十三年"昔里吉、脱脱木儿反，庭袭击，生获之，启皇子只必帖木儿赐之死"。《刘哈剌八都鲁传》云：十三年昔里吉叛，击破擒之，献俘行宫。(按《元史》卷169本传，昔里吉叛系于至元十七〔1280〕年后，本证引文有误。)是叛于十三年即被擒诛，非走死于十四年后也。《刘国杰传》云：十六年(1279)脱脱木反，残暴失众，众杀之来降。是脱脱木儿非死于十三年，亦非生获赐死也。《田忠良传》，十二年(1275)昔里吉劫皇子以入海都。是昔里吉之叛且始于十二年，而海都亦未尝不纳。今纪又云十九年(1282)叛被执，不唯与十四年(1277)纪不合，亦与各传岐互，史文何不检至此。

〔3〕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收于《元文类》卷24，四部丛刊本；苏天爵：《丞相淮安忠武王》据引，并称为元明善撰《伯颜勋德碑》，见《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1996年，页16。

印章。不成者，再卜，宜莅者。公告，往莅，乃成。由是眷遇益密。后从征称海，有功，擢大宗正，迁枢密院断事官”。〔1〕

刘敏中虽然称真金为“裕皇”，还称其王府为“东邸”，但都不过是事后追记，并不足以表明真金北巡金山时已经被立为太子。值得注意的倒是，碑文称真金为燕王，并提到此时“会巨奸专政，威福横甚”。这位巨奸应当就是阿合马。刘敏中还提到，起台不花逝于至元十七年（128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坐标。将此时间与伯颜陪同真金北巡（至元十八年）相较，起台不花在至元十八年之前一年已经去世，不可能在次年随同真金太子抚军漠北。故而起台不花随从真金“征称海”之事，不可能是《伯颜勋德碑》所记至元十八年他陪同真金北巡之役，而应当指的是上引《裕宗传》所记至元七年“巡称海”之事。

真金首次赴漠北时，曾至金山附近的称海之地。前引虞集所谓“皇子北平王帅诸王之师，”〔2〕不但包括后来叛变的昔里吉、撒里蛮与脱脱木儿，也包括真金。

上述比较说明，真金曾两至漠北，且伯颜均在军中。故而他在至元十八年（1281）受命抚军北边之前，对蒙古草原的形势已有相当了解。《裕宗传》虽未直按记录至元十八年（1281）他受命漠北抚军之事，但提到十八年正月，其母去世，真金“自猎所奔赴，勺饮不入口者终日，设庐帐居之”。真金之母为世祖察必皇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之女，主右大斡耳朵，《元史》有传。据百衲本本传，察必逝于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标点者据道光本《察必传》与《世祖纪》，订正为至元十八年二月。〔3〕故《裕宗传》此处所记有误。〔4〕《裕宗传》中的错误，当源自《实录》。《实录》中的错误，元时已经发现。元贞二年（1296）兀都带等人呈进所译《太宗实录》《宪宗实录》《世祖实录》时，元成宗申斥道：“顺圣太

〔1〕刘敏中：《哈飒不华昭先碑铭》，《中庵集》卷4，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据清抄本影印，第92册，页301。

〔2〕《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四部丛刊本。

〔3〕《元史》卷114《后妃传》，标点本，页2883，校勘记（7）。《元史》卷11《世祖纪》明确记载，察必皇后逝于至元十八年二月乙未（标点本，页230）。

〔4〕《元史》标点者已经发现这一错误，见卷115《裕宗传》，页2896，校勘记（3）。

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记日月先后差错。”[1]

《裕宗传》所云真金闻母丧时所在之“猎所”，当即指北巡抚军时的居地。可能就是怯绿怜河的成吉思汗大帐。如果真金闻知其母察必皇后去世事在至元十八年二月以后，再从漠北奔归，其动身北巡的时间当在至元十八年初。他至漠北后不久因母后去世而离去。真金身“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从次年大都发生阿合马被杀事件，事前真金太子与世祖均在上都，并不在漠北判断，他返回汉地后，并未再去漠北。故而他至元十八年受命抚军当是一次执掌枢密院的职务时的北巡。

20.2.3.2　再度掌兵

真金抚军是因为那木罕统帅部的崩溃。那木罕回归后，[2]改封为北安王，继续统兵漠北。乃颜叛乱之前，土土哈驻守漠北东部时，他与丞相朵儿朵怀[3]的上司即为那木罕：

> 二十四年(1287)春，东藩诸王乃颜叛，阴结其属也不干、胜剌哈于北边，谍者二人至军中，为公所执，尽得其情，遣使以闻，且言："宜召胜剌哈等赴阙。"一日胜剌哈设宴，召公及朵儿朵怀，朵儿朵怀将往，公止之曰："彼包藏祸心，吾属至，必被擒，大军谁与统属？"遂不往。寻有旨令胜剌哈入朝，将东道进。公言于北安王曰："若辈分地在东，脱有不虞，是纵虎入山林也。"乃命从西道进。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众欲先闻于朝，然后发兵。公言："兵贵神速，吾尽忠于国，当临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则与约而还。"众以为然。即日启行，公为前锋，疾驱七昼夜，渡秃兀剌河，与也不干战于孛怯岭。彼大败，俘获无算，也不干仅以身免。[4]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响应乃颜叛乱的也不干、胜剌哈企图以设宴的方式一举捕获元军大将朵儿朵怀与土土哈，乃颜本人也试图以同样方

〔1〕《元史》卷19《成宗纪》，标点本，页407。

〔2〕关于那木罕回归的时间，日本学者村冈伦与陈得芝教授皆有讨论，兹据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58。

〔3〕有关朵儿朵怀后来投降海都，复归降世祖的时间，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收于《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见页167。

〔4〕苏天爵：《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页49。

法拘捕统兵于北的丞相伯颜。但此计同样未能成功。对于伯颜识破乃颜的鸿门宴之事,伯颜家传资料记曰:

> 二十四年(1287),宗王乃颜将反,报者众至。诏王觇之,多载衣裘以往,至其境则赐驿人。乃颜宴王,王以大义语乃颜,乃颜阳应而阴欲执王,酒阑趍出,与其从者潜分三道以逸,驿人以得衣故,争献马以递,遂得脱追骑,以其实闻。〔1〕

也不干、胜剌哈与乃颜均设鸿门宴邀请元军将领,似乎不能以简单地用蒙古人惯于使用此计来解释,很可能出于乃颜叛王集团的统一布置,以期将元军各部将领一网打尽。但正如土土哈家传与仍颜家传资料所言,不仅乃颜勾结一些东道诸王的证据已事先为元军掌握,其间谍为元军捕获,且有关叛王集团的情报不断报到朝廷,元军早已有所准备。在也不干叛乱时,与土土哈商议应对举措的与诸将,即当包括北安王那木罕。

20.2.3.3　弃守和林

两年后,漠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和林失守。不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提及此年战事。

(1)从金山退至杭海

《元史》记:击败昔里吉之后,刘哈剌八都鲁被授以和林宣慰司副使之职。至元二十三年(1286),晋为同知宣慰司事。次年,升为和林宣慰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海都进犯漠北,次年(1289),海都进犯和林。那木罕遣使向镇守和林的怯伯(Kebek)与刘哈剌八都鲁(Liu Qara Ba'atur)报讯后避去。怯伯与刘哈剌八都鲁在退出和林的途中,怯伯投降海都,刘哈剌八都鲁脱归。〔2〕

从上述记载看,那木罕此时仍然负责和林的防卫。但上述记载过于简略,单凭此很难看出此年前后漠北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元二十四年(1287)世祖亲征辽阳,平定乃颜叛后不到一年,海都叛王集团的威胁日益严重。《元史·世祖纪》中连续提到了海都集团与东道叛王的犯边的

〔1〕《丞相淮安忠武王》,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2,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页21。

〔2〕《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974。

活动：

二十五年(1288)“六月戊辰，海都将暗伯、著暖以兵犯业里干脑儿，[1]管军元帅阿里带[2]战却之。”[3]九月乙未“都哇犯边”。[4]十月“庚午，海都犯边。……己卯，也不干入寇，不都马失引兵奋击之。塔不带反，忽剌忽、阿塔海等战却之。”[5]十一月癸巳“也速带儿、牙林海剌孙执捏坤、忽都答儿两叛王[6]以归。甲午，北兵犯边[7]。”十二月“丁巳，海都兵犯边，拔都也孙脱(Batu Yesün To'a)

[1]李文田在其《〈元史〉地名考》几次言及业里干脑儿之地，其一是：

“亦里黑，二十三年(1286)，徙戍甘州军千人屯田中兴，千人屯田亦里黑。二十五年(1288)海都将暗但著(刘按，应为暗伯、著暖)以兵犯业里干脑儿，元帅阿里带战却之。疑亦里黑即叶里干之对音也。”

其二是：

“业里干脑　二十五年(1288)海都将暗伯、著暖以兵犯业里干脑儿，元帅阿里带战却之。《耶律希亮传》有也里虔，城杭忽思传有押里。”

其三为：

“野泥《明宗纪》：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十余年间边境宁谧。《博尔忽传》：月赤察儿奏，宜处降人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云云。此纪所云命从者耕于野泥，必金山北屯田之处名。知前文斡罗斡察山者，亦金山之地名也。至元廿一年(1284)，纪云皇子北平王南木合以至元八年(1272)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城，留七年至是始归云云。则此野泥者，野里麻里也。麻里犹云八里，古语城也。按《世祖纪》至元二十五(1288)年，海都将暗伯以兵犯业里干脑儿，《杭忽思传》战于押里，《耶律希亮传》有也里虔城，皆似即野泥之地。盖地在金山之北。”——李文田《〈元史〉地名考证》，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胡玉缙抄本，不分卷，复旦大学藏，页47、49及页71。

李文田上述诸说问题很多。“业里干脑儿”，即今蒙古国西部之艾里克湖，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载于《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67。“野里麻里”(Almalïq，阿力麻里)中的“麻里”，并非如李文田所云“麻里犹云八里，古语城也”。其实alma突厥语，意为苹果。-lïq，为附加成分，意为拥有……的，不能断为malïq。根本不存在与balïq“城池”相勘同的问题。

[2]《元史》卷20《成宗纪》提到，大德六年(1302)“九月乙未，遣阿牙赤、撒罕秃会计称海屯田岁入之数，仍自今令宣慰司官与阿剌台共掌之。”——中华书局标点本，页442。此阿剌台当即阿里带。

[3]《元史》卷15《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13。

[4]《元史》卷15《世祖纪》，页315。

[5]《元史》卷15《世祖纪》，页316。

[6]《蒙兀儿史记》卷8下注此处三叛王名“皆不见世表，殆与乃颜同削籍于大宗正府者”。

[7]《蒙兀儿史记》卷8以为乃海都所部之军。

迎击,死之"。[1]

而至元十二年昔里吉、脱脱木儿、撒里蛮叛变时,被俘的八邻部众近四百人,亦于此时来归,元政府"赐钞万二千五百一十三锭。"[2]从此年底,与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干、海都集团等北方叛王的战事,在辽阳与漠北渐次扩大。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卯"合丹入寇。"[3]二月,世祖亲至上都,"以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将北边诸军。"而"合丹兵寇胡鲁口,开元路治中兀颜牙兀格战连日,破之。"[4]同年夏四月"癸丑,命塔海发忽都不花等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5]

从至元二十五年(1288),为对应海都的进犯,当时尚书省已经向世祖报告:"和林屯粮,当得知缓急轻重者掌其出纳。"[6]同年底,元政府加紧向辽东与漠北运粮:"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应昌府运米三万石给弘吉剌军"[7]漠北的政治中心是和林,而确保和林的稳定首先是驻军要有充足的军粮。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己巳"皇孙甘不剌所部军乏食,发大同路榷场粮赈之。"[8]皇孙甘不剌即后来的晋王甘麻剌。《元史》中有一段有关甘麻剌在受封梁王,出镇云南之前出镇金山的记载:

> 尝出征驻金山,会大雪,拥火坐帐内,欢甚,顾谓左右曰:"今日风雪如是,吾与卿处犹有寒色,彼从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庐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饔人大为肉糜,亲尝而遍赐之。抚循部曲之暇,则命也灭坚以国语讲《通鉴》。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辈辅助。其或依势作威,不用我命,轻者论遣,大者奏闻耳,宜各慎之使百姓安业,主上无北顾之忧,则予与

[1]《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17。《蒙兀儿史记》卷8以为此是奏报到枢密院之月日。拔都也孙脱其人待考。

[2]《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17。

[3]《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19。

[4]《元史》卷15《世祖纪》,页320。

[5]《元史》卷15《世祖纪》,页321-322。

[6]《元史》卷169,页3974。

[7]《元史》卷15《世祖纪》,页317。

[8]《元史》卷15《世祖纪》,页320。

卿等亦乐处于此，乃所以报国家也。”[1]

此次出镇金山，当在弃守和林之前。

从该史料所描述的在大雪中，元军将领身处穹庐，拥火而坐时，尚感寒气逼人，而元军士兵却不顾苦寒，“腰弓矢、荷刃周庐之外”的情景，表明当时金山地区敌我两军对垒气氛非常紧张。在通常情况下，甘麻剌所及其他驻于金山地区的元军，主要靠称海屯田所获军粮供亿。现在他们向朝廷请求协助，可能说明称海地区已经很不安全，或许所存军粮已为海都军所夺。

正是因为在上年底已经开始从上都向和林调运粮食，元政府才有能力在二月“己未，发和林粮千石赈诸王火你赤部曲。”同年夏四月“己巳，乞儿乞思户居和林，验其贫者赈之。”[2]每年冬季，漠北草枯，是人畜生存的艰难时期。而元廷在漠北大量驻军，在这种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只能仰赖于汉地的给养。除此而外，海都集团日益严重的威胁，也迫使元政府积储军粮，准备应付更大的冲突。

（2）弃守和林

入夏后，战事扩大了。《元史·世祖纪》提到在辽阳战场此年六月“庚申，诸王乃蛮带败合丹兵于托吾儿河”。是时辽阳地区的显赫蒙元贵族中，名曰乃蛮台者有两人，一为斡赤斤之子塔察儿之子，一为特薛禅后裔。在辽东击败合丹的诸王乃蛮带，当为宏吉剌氏特薛禅后裔。[3]

在漠北前线，元军已经节节败退。元军居于金山前线的是晋王甘麻剌的军队，而总兵于北的北安王那木罕则居于和林城以西数百里处的斡耳寒河（Orqon）河上源塔米儿河畔。[4]土土哈家传资料提及：

> 二十六年（1289）春，钦察军从皇孙晋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海岭，敌先据险，我师失地，为敌所薄，军士随溃。公一军独前鏖战，久之，翼晋王而出。行至信宿，闻袭骑在后，公选精锐为殿，设

[1]《元史》卷115《显宗纪》，标点本，页2893。

[2]《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1-322。

[3]《元史》卷118《特薛禅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916。

[4]《元史》卷117《牙忽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2908。

伏以待之,袭骑闻之,遂不敢进。[1]

这段文字虽然称甘麻剌为晋王,但甘麻剌尚未有晋王之封,属事后追记。土土哈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平定乃颜叛乱时,与朵儿朵怀均直接受北安王那木罕指挥。他至杭海前线当系受北安王命,支援金山前线受到海都军沉重压力的甘麻剌军。

甘麻剌在杭海前线时,军粮供应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答失蛮负责供应杭海前线的军粮,黄溍描写道:

> 杭海之役,督饷馈于云中,晋王军乏食,给以米数千石。师还,以专擅待罪。上善其有识量而知权变,嘉叹不已,赐白金百两,钞千五百缗。公回奏:"草青畜肥之日尚赊,今所给未充,恐终不免转死,请增给以半年之食。"上从之,众赖以安。[2]

杭海之战,元军后勤供应的大本营设于云中,即今之大同。数千石米运至漠北要花费极大的人力与物力。但数额这样巨大的军贮,依然不能满足晋王军的需要,需要再度补给。从兵力的角度看,晋王统辖下的军力是非常强大的,但却未能阻止海都的推进。

史料尽管极力描述土土哈作战如何勇猛,但甘麻剌从原先驻守的金山前线退至杭海,已经说明元军金山前线的崩溃。而统帅北安王那木罕营地塔米儿河恰恰位于杭海岭北麓。金山前线的失利使那木罕的大营直接暴露在海军兵锋的威胁之下。从金山前线撤至杭海的漠北元军,试图就地组织抵抗。但土土哈家传中有关海都军"先据险,我师失地,为敌所薄,军士随溃"的描述,也说明元军继金山失败之后,在杭海再遭败绩。在此战中,甚至甘麻剌本人也身陷重围,只是由于钦察军的拼死作战才突围而出。元军在溃退途中,还遭到海都军的沿途追击。这些描述的字里行间,均说明元军在杭海前线受到重大挫败。《刘哈剌拔都鲁传》中所述北安王向和林传报败绩之事,正是在晋王与土土哈战败之后发生的。

---

〔1〕《枢密句容武毅王》,《国朝名臣事略》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页50。

〔2〕《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4,四部丛刊本;兹据《黄溍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647。

与海军都同时入侵的，还有阿里不哥之子药木儿儿，《元史·世祖纪》中六月“丙寅，要忽儿犯边”[1]的所记就是这一支叛军的行动。那木罕所统领的元军之后在杭海以北塔米儿河失败之后，和林屏障尽失。同月辛巳日[2]“海都犯边，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满带、[3]副使八黑铁儿皆反应之。”[4]虽然上引《刘哈剌八都鲁传》中未提到那木罕放弃和林的时间，但《世祖纪》的上述记载使我们确信，那木罕放弃和林事在此年六月。和林弃守事关重大，亦见于《地理志》：“至元二十六年(1289)，诸王叛兵侵轶和林，宣慰使怯伯等乘隙叛去。”[5]在和林危急时投降海都、与刘哈剌八都鲁同为和林宣慰使的怯伯，是一位大都官场熟知的人物。一年前，在择人掌管和林屯粮时，尚书省所提名的就是他，但为世祖所否定。世祖对尚书省臣说：“钱谷非怯伯所知，哈剌斡脱赤可使也。”[6]由此可见，元世祖对怯伯相当了解。

《元史》在提及弃守和林后，又提到“合剌赤饥，出粟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奇以赈之。”[7]合剌赤，即钦察军，很可能就是土土哈所领导的那支军队。他们在杭海前线随同晋王的战斗中，必定辎重尽失，所以才需要元政府紧急提供军食。

海都兵临和林之前，元政府因为漠北军情急迫，已经紧急从辽阳调集军队赴漠北。《柏帖木儿传》提到，他所领导的军队原先驻于也真大王之境，以备其他东道叛王。此年“五月，海都谋扰边，有旨令钦察人伯帖木儿以其军先来，行至怯吕连河，值拜要叛，伯帖木儿即移兵致讨，擒其

---

〔1〕《元史》标点本校勘记(12)：要忽儿，《蒙史》云：“要忽儿犯边，即药不忽儿犯边之误脱。盖海都之前锋军。”《蒙兀儿史记》卷8下注“盖海都前锋军。”

〔2〕标点本校勘记(13)：辛巳按是月戊申朔，无辛巳日。此“辛巳”在丙寅十九日与甲戌二十七日间，疑为己巳二十二日或辛未二十四日之误。

〔3〕这里所提到的在和林叛元的乃满带，与前述击败东道诸王的乃蛮带并非同一人。

〔4〕《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3-324。

〔5〕《元史》卷58《地理志》，标点本，页1383。

〔6〕《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标点本，页3974。

〔7〕《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3-324。《元史本证》卷49，证名13：者连怯耶儿，仁宗延祐五年。速怯那儿，百官志2、兵志2。“速”当作“连”。(点校者按，“那”当作“耶”，点校本元史已校。)折连怯呆儿，兵志2。

党伯颜以献，帝深加奖谕，赐以所得伯颜女茶伦。”[1]这里提到的拜要与伯颜，均应是元守官。他们驻守的怯吕连河营地，位于和林之东相当远处，足见海都入侵动乱的范围已经从蒙古高原西部的金山，漫延至蒙高原的东面。由于柏铁木儿的战功，“是年冬，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升怀远大将军、上万户，佩三珠虎符。”[2]

(3)世祖亲征与伯颜的角色

现存史料中有关此时伯颜在漠北的活动较多。按《元史》记，伯颜再至漠北，乃因“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诏伯颜代总其军”。[3]可见此时伯颜所统辖的是原先受阿只吉指挥的军队。阿只吉为察合台后裔，其部下多数应当是蒙古部民。这些士兵的生活极为困苦，没有充足的给养。伯颜接掌指挥权后，命令士兵大量采集可食的叶子(蔑怯叶儿)、块根(蓿敦之根)及草种充食。凡士兵捕旱獭(塔剌不欢，即土拨鼠)，[4]其皮裘皆积。在全军冬衣无着落时，伯颜令将所存旱獭皮运至大都，以向朝廷换取冬衣。[5]

《元史》中至元二十六年春(1289)年二月，“以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将北边诸军”的记载[6]，应即伯颜家传所称“二十六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总北军”[7]之事。

参与杭海之役的元军，还有金人贾昔剌之子秃坚不花。据《元史》记载：

> 军次杭海，敌猝至，帝令急击之。诸近侍见其势盛，多畏避，秃坚不花即驰入其阵，疾战，破走之，擒其首将以归。移军哈罕，大

---

〔1〕《元史》卷131《柏帖木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195。

〔2〕《元史》卷131《柏帖木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195。

〔3〕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元文类》，四部丛刊本；《元史》卷127《伯颜传》，页3114。

〔4〕《考异》卷95：塔剌不欢，即塔剌不花，兽名，状如獾，见祭祀志。塔剌不欢即旱獭，蒙古语为tarbaghan。

〔5〕《元史》卷127《伯颜传》，页3113-3114。

〔6〕《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0。

〔7〕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元文类》，四部丛刊本；《元史》卷127《伯颜传》，页3114。

风，昼晦，敌兵千人，鼓噪以进，秃坚不花奋击，身被十余疮，犹力战，复大破之，帝奇其勇。杭海叛者请降，众议以为亲犯王师，宜诛之，秃坚不花独曰："杭海本吾人，或诱之以叛，岂其本心哉！且兵法，杀降不祥，宜赦之。"帝曰："秃坚不花议是。"[1]

按秃坚不花乃因随世祖亲征而至杭海。所以他所参加的，并非晋王与北安王失利的那次战事。

六月和林的失陷震动朝廷。元史本传称伯颜进知枢密院事后，"出镇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伯颜始"。[2]在前述海都攻陷和林的过程中，各种史料均未提及伯颜，可见在此年二月伯颜接掌诸王阿只吉兵权后，并未进入和林。他在和林置知院也应是在恢复和林之后。

在世祖忽必烈因和林失陷而决定采取的举措中，最重要者就是御驾亲征。《世祖纪》在至元二十六年七月项下，记载了一系列与此次亲征有关的活动，"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犯边，帝亲征。……丙戌，命百官市马助边。……丁亥，发至元钞万锭，市马于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发和林所屯乞儿乞思等军北征。……丁酉，命辽阳行省益兵戍咸平、懿州。……辛丑，发侍卫亲军万人赴上都。"[3]一个月前在杭海战场失败的土土哈所率领的钦察军，此时也重新调入前线。土土哈家传资料提及的"秋七月，世祖巡幸北边……还至京师，会宴群臣，复谕公曰：'朔方人来，海都有言：杭海之役，使彼边将人人善战如土土哈，吾属安所措矣'"[4]，即当此事。

冬十月，甲寅"以驼运大都米五百石有奇给皇子北安王等部曲。"[5]

---

[1]《元史》卷169《贾昔剌传》，页3970-3971。

[2]《元史》卷127《伯颜传》，页3114。

[3]《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4。《蒙兀儿史记》卷8下注"车驾西征，上都守备空虚故。"

[4]《枢密句容武毅王》，《国朝名臣事略》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页50。

[5]《元史》卷15《世祖纪》，标点本，页325。

20.3 那木罕的人神世界

20.3.1 祀岳渎事件

20.3.1.1 桑哥举报那木罕

那木罕从海都处回来时，正是吐蕃人桑哥当权之时。苏天爵所撰安童家传资料在记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世祖决心设尚书省，起用桑哥时，引述了《野斋李公文集》中的一段记载，云：

> 先是，王子北安王尝遣使持香祠岳渎，时桑哥领功德使。使者偕参政吕公合剌以王教谕之，遂给驿以往。其后，桑葛平章尚书省事，所忌者唯丞相安童，将甚害之，诬言北安王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明知而不以闻，指吕公为证。世祖召问，吕公对曰："时桑哥主祠祭，北安王使者实同臣往求驿传，安童未尝知也。"桑哥不能对。[1]

祠岳渎是古时帝王祭祀天地山川的仪礼。在元代始于世祖，多非帝王亲祀，而是遣使代祀。《元史》记载，中统二年(1260)世祖于秋七月"乙丑，遣使持香币祀岳渎。"[2]上述苏天爵所引《野斋李公文集》的记载是说，桑哥向世祖报告那木罕以皇子祭岳渎违制，并称安童知情不报。那木罕归回事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而苏天爵将《野斋李公文集》这段记载置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叙事之下，且言"先是"。如果所言确实，即应发生在至元二十三(1286)年与二十四年(1287)之间。

笔者查检后发现，《环宇访碑录》收录了两则北安王的"降香记"，分别为："皇子北安王降香记傅孟弼□正书，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河南济源"，以及"皇子北安王降香记秦良佐撰，徐秉忠 正书，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河南济源"。[3]

---

〔1〕苏天爵：《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1，姚景安点校本，中华书局，1886年，页12。《野斋李公文集》今已不存，但除《元名臣事略》多处引述之外，经检索可知野斋李公其人也数见于刘埙的《重修学记》与《奉议大夫南丰州知州王公墓志铭》(见《水云村稿》卷3、卷8)，许有壬：《世忠堂记》(《至正集》卷36)、虞集：《曹文贞公文集序》(《道园学古录》卷31)与张之翰：《舒啸亭记》(《西岩集》卷15)等。

〔2〕《元史》卷4《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页72。

〔3〕〔清〕孙星衍、邢澍：《环宇访碑录》卷11，〔清〕嘉庆七年刻本，现藏华东师大图书馆。

皇子北安王即那木罕。这两则"降香记"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一则，应当就是上述桑哥一党向世祖告发那木罕违制祭岳渎事，足见《野斋李公文集》所记那木罕祀岳渎确有其事。再查《世祖纪》中亦有至元二十三(1286)年春正月，壬午"遣使代祀岳渎东海"[1]的记载。而上述《环宇访碑录》收录的第一则北安王的"降香记"所署日期正是"至元二十三年正月"。这说明此碑正是那木罕遣使随朝廷使臣祀岳渎所立。再查《世祖纪》，发现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正月"庚寅，遣使代祀岳渎、后土、东海。"[2]而上述《环宇访碑录》收录的另一则北安王的"降香记"所署日期正是"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

从那木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其时他已在辽阳前线对东道叛王作战)仍然遣使往祭岳渎来看，桑哥一党的告发没有起到阻止那木罕的作用。桑哥与安童关系不谐举世皆知，但目前尚无任何其他史料言及桑哥与那木罕之间的关系。桑哥一伙向世祖告发那木罕的具体理由也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桑哥等人敢于中伤那木罕，似说明他回归后在皇室中的地位有所降低。

20.3.1.2 那木罕—安童—吕合剌小集团

上引《野斋李公文集》中提到了一位与此次举报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参政吕公合剌"，即吕合剌，其职衔为参知政事。那木罕要求遣使随朝廷功德使桑哥往祭岳渎，是这位吕公代为向桑哥联系安排驿传的。而桑哥指责那木罕违制祠岳渎，安童知情不报，所举证人即此吕合剌。但吕合剌在廷辩中却表明，此事是自己向桑哥联系的，与安童无关。从《野斋李公文集》的记载看，这位吕合剌与那木罕的关系极为密切。

揭傒斯撰有《故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吕公墓志铭》，墓志铭主名吕天祺。该墓志铭称其"世家辽东之咸平，今为燕人。曾大父讳元，仕金为监军。太祖建帝号之八年(1213)，以其众北归，从

〔1〕《元史》卷14《世祖纪》，标点本，页285。同书卷76《祭祀志》"岳镇海渎代祀自中统二年(1261)始"。——标点本，页1900。

〔2〕《元史》卷14《世祖纪》，标点本，页295。

光献皇后弟入事上”。[1]光献皇后即成吉思汗正后孛儿帖,光献皇后为至元二年所加谥号。[2]元太祖八年(1213)秋,成吉思汗分兵三路深入金境,以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台、薄刹“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路而还。”[3]《元朝秘史》记,成吉思汗指示合撒儿率左军沿海“自大宁经过女真,若便归附,即缘彼中边郡,经涪剌(Ula)、纳涪(Na'u)二江,溯讨涪儿(Tawur)河回营;不然,即纵兵剿捕。合撒儿同主儿扯歹(Jürčedei)、脱仑(Tolun)三人至大宁。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余城池,悉来归附。遂溯讨涪儿河回旧营了。”[4]随哈撒儿东征的诸将,《秘史》正文中为主儿扯歹((Jürčedei))、阿勒赤(Alči)与脱栾·扯儿必(Tolun čerbi)三人。其中之阿勒赤(Alči)即《特薛禅》的宏吉剌氏按陈那颜,为《太祖纪》中提到的随哈撒儿东征的斡陈那颜之父;主儿扯歹(Jürčedei)即《太祖纪》中之拙赤台;脱栾·扯儿必(Tolun čerbi)或即《太祖纪》中之薄刹。[5]光献皇后弟即宏吉剌氏特薛禅之子按陈。这位吕合剌的祖父吕元,显然是在哈撒儿出征辽东时,降附了这支东征军中的宏吉剌族军。

该墓志铭又记,吕天祺“大父讳惠坚及夫人董氏,以顺圣皇后媵臣为皇子北安王保傅,能恭慎纯悫,得幸上。”顺圣皇后即元世祖忽必烈正后察必,乃按陈那颜之女。所谓“媵臣”,即从嫁人。换而言之,吕惠坚乃察必出嫁忽必烈时,其父按陈那颜作为陪嫁随行至忽必烈家中,成为忽必烈的家臣。那木罕出世后,吕惠坚被指定为其保傅。从嫁人为蒙古贵族家庭中女主人从娘家带来的奴仆,蒙古语称为“引者思”,突厥语称为Ev Oghulan。元初权臣阿合马也是察必皇后的从嫁人。[6]故而吕惠坚他与阿合马应当有很长久的关系史,在察必皇后娘家时就相识。

---

[1]揭傒斯《揭文安公文集》卷13,四部丛刊本。

[2]《元史》卷106《后妃表》,标点本,页2693-2694;并见卷114《后妃传》,标点本,2869-2870。

[3]《元史》卷1《太祖纪》,标点本,页17。“遵海而东”的“海”指渤海。

[4]《元朝秘史》节253,总译。涪剌水,即今松花江;纳涪水,即今嫩江;讨涪儿河,今洮儿河。

[5]《圣武亲征录》的记载兹不再举。

[6]关于阿合马是察必皇后的从嫁人身份,参见拙文《从阿合马的身份谈起》,载于《元史论丛》,第9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页136-150。

而墓志铭中其“父讳合剌”，就是《野斋李公文集》中，“参政吕公合剌”。按墓志铭的记载，他的确担任过中书参知政事。吕合剌之父既为那木罕保傅，很可能吕合剌本人就出生于察必皇后的斡耳朵中，或至少从小就成长在察必皇后身边，生来就是那木罕的奴仆，自幼为其童伴，所以那木罕归来后，在欲随祭岳渎时，向他求助是理所当然的。而众所周知，安童出自成吉思汗的世仆札剌亦儿氏，曾受世祖派遣北征，又一起在叛乱中被俘，可谓患难之交。所以苏天爵所引《野斋李公文集》的记载透露出一个秘密，即那木罕、吕合剌与安童是一个相互交往密切的小圈子。前面提到，在世祖面前为那木罕祭岳渎事庭辩时，吕合剌说：“时桑哥主祠祭，北安王使者实同臣往求驿传，安童未尝知也。”从安童、那木罕与吕合剌之间密切关系判断，安童有可能知情。所以该墓志铭才会说到阿合马“欲害之不能”，而桑哥诬陷丞相安童，“则力为之辨焉”。

另一位与那木罕有关的人物是李伯坚。“他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来典保定。盖为王守分地也。安静乐易，屈己下士。郡尝被水灾，力请于朝，多所蠲复，郡人赖之，为郡五年。王朝京师，有司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1290)二月十五日，诏下当往荆湖保府”。[1]

20.3.2 护国仁王寺——那木罕的安息地

《元史》记载泰定帝也孙帖木儿登位为后，于英宗至治三年(1323)十一月癸丑下旨“会福院奉北安王那木罕像于高良河寺。”[2]人们不禁会问，泰定帝为什么要将那木罕像置于高良河寺？会福院是何机构？高良河寺又是一所什么寺院？

20.3.2.1 高良河寺

高良河寺即大护国仁王寺，又称护国仁王寺，是一所佛寺。据《元

[1]刘因：《静修集》卷13，遗诗1，四部丛刊本。

[2]《元史》卷29《泰定纪》，标点本，页640。

史》记载，至元七年十二月辛酉“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1]单从《元史》的记载，很难看出谁主导了这所佛寺的建立。程钜夫的《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是一篇帮助我们了解这所寺院的资料，该文记载，“至元七年秋，昭睿顺圣皇后于都城西高良河之滨，大建佛寺而祝厘焉。肇基发迹，天人之应，神物之感，云臻雾集，昭烂赫奕，三年而成。”[2]昭睿顺圣皇后即忽必烈正后宏吉剌氏察必，是她主导了这所寺院的建立。至于建寺的时间，程钜夫所记在至元七年(1270)秋，与《元史》所记年底相差数月，但程钜夫明言，建寺持续了三个月。

释志磐提到，至元“七年，诏请胆巴金刚上师住持仁王寺。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敕更定僧服色。”[3]前已论及，至元七年十二月，即1271年初，只是下诏修建该寺的日子，寺成是在三年之后。胆巴佛师即便住持该寺，也不可能在寺院尚在建设时之时，而只能在寺建成之后。实际上，胆巴入护国仁王寺是在成宗即位之后，关于这一点，详见后。

负责筹建护国仁王寺的是曾任右丞的汉人李明之。[4]程钜夫的《白鹤歌并序》提到，右丞李君明之性至孝为世祖与察必皇后所知，擢为大护国仁王寺总管。至于建寺的过程，程钜夫说：

> 寺之役方兴，高深大小之宜，君实度之。梓匠工役之勤，君实董之。簿书之期会，钱毂之出纳，一无私焉，迄致重门复殿，金碧交辉，巍巍煌煌，为京师诸宝坊冠冕。

---

〔1〕《元史》卷7《世祖纪》，标点本，页132。此年十二月辛酉已经是1271年。佛教典籍中有关大护国仁王寺建于至元七年底的记载，均应取自《元史·世祖纪》的这一记载，见释志磐：《佛祖统纪》卷48，明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本；释心泰：《佛法金汤编》卷16，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本。

〔2〕程钜夫：《程雪楼集》卷9，洪武刊本。

〔3〕《佛祖统纪》，卷48，明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本。释心泰：《佛法金汤编》卷16，也抄录了这段文字，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北大图书馆(元至元年刻本，北图)藏本。

〔4〕蒲道源曾为李明之诗集题诗《题李明之右丞鹤至卷》二首，以颂其代父受死的孝行：

“凤览德辉方肯下，鹤因孝感固宜来，须知人好鸟亦好，况此休征不用猜。”

“父生母鞠报能全，代死开蒙事灼然。不待仙禽鸣且集，孝声久已闻于天。”——《闲居丛稿》卷7，清初抄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

曾写诗赞美此寺的有翰林王鹿庵、李韦轩、商左山等人。后来“继作者无虑百家”。[1]元贞元年(1295)胆巴国师奉诏住持大护国仁王寺时,也发现“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2]可见其壮丽名冠大都。

对其地望,程钜夫仅言在大都之西“高良河之滨”。李文田曾录宋路振《乘轺录》的有关记载:“幽州城永和馆、孙侯馆,出北安门十里至高梁河,又三十里孤沟河,又三十五里长城,至顺州。”[3]

人们会继续问:高良河寺的供养之费从何而来?何人管理寺产?程钜夫答复了这些问题,他写道:

> 以佛法不徒行,必依于人。人不可以无食,中宫乃斥妆奁营产业以丰殖之。已而效地献利者,随方而至。物众事繁,建总管府统于内,置提举司提领所分治于外,岁滋月积,府之政日以懈,田失故额,租赋不登,寺之赖日以削。

这是说,察必皇后以中宫粉妆之费经营产业所得利钱,来用作护国仁王寺的香火开支的启动资金,从此以后便有人奉献土地和金钱。由于寺产规模巨大,元政府遂设立两个机构,一个是总管府,管理寺内事务;一个是提举司,管理寺外的事处。这种运作机制维持了数十年,弊端越来越明显,寺田的租额变得模糊,寺里收不到租,以致经济情况恶化。于是至大元年,“罢总管府建会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院使按巴哈玛尔布哈为会福院使。”

根据程钜夫的记载,我们了解到护国仁王寺从至元七年(1270)的开始建造,历三年,至元十年(1273)成。寺内事务的管理机构是总管府,而寺外产业的管理机构则提举司。这种体制运作了30余年,至武宗即位后,总管府改为会福院。《元史》如下记载:至大元年(1308)十月乙巳“改护国仁王寺昭应规运总管府为会福院,秩从二品”[4]印证了程钜夫所记不误。

---

〔1〕《程雪楼集》卷29,洪武刊本。

〔2〕《佛祖通载》卷22,元至正七年(1347)释念常募刻本,北图图藏本。

〔3〕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胡玉缙抄本,不分卷,复旦大学藏,页68。

〔4〕《元史》卷22《武宗纪》,标点本,页504。

20.3.2.2 塑像师刘元

凡佛寺均有佛像。护国仁王寺中的造像乃出于匠人刘元之手。陶宗仪对此记曰：

> 刘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元尝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而独长。于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严设梵天佛像，特求奇工为之。有以元荐者，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1]

陶宗仪所提到的"黄冠"为道教中对男性道士的称谓，可见刘云的塑像技艺初得之于道观。他在青州的道观中除学习塑像之外，还掌握了其他知识，故而见识在一般匠师之上，至元七年之前在塑像界已经相当有名。但在接世祖召请之后，他又专门向当时在大都的尼泊尔著名工匠阿尼哥学习，使其技艺更为精湛。在护国仁王寺中塑像的成功，使他名声大噪，后来他在大都、上都多处佛寺中造像。陶宗仪说：

> 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无与比。所谓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像也。昔人尝为之，至元尤妙，抟丸又曰脱活，京师语如此。[2]

刘元是元代名匠，《元史·阿尼哥传》末附有其传略，云：

> 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由是两赐官女为妻，命以官长其属，行幸必从。
>
> 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

---

〔1〕陶宗仪：《辍耕录》卷24，"精塑佛像"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页294。

〔2〕陶宗仪：《辍耕录》卷24，"精塑佛像"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页294。

大夫观者,咸叹异焉。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

元官为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以寿终。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像云。[1]

上述《阿尼哥》附传中刘元的传略与陶宗仪的记载,当出自于同一史源。上引《阿尼哥传》中刘元历"官为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的记载,可从王士点、商企翁所录元"秘书监卿"人名中得到证实。在历任秘书监卿人官员中,有:"刘□延祐元年九月初七日以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上。"[2]虽然这里仅录有其姓氏"刘"而名称"元"缺失,但从"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的职衔可以肯定,就是刘元。

刘元的名声至清初仍为人称颂,于敏中还曾专门在燕京佛寺寻找当时所存刘元所塑佛像。他提到:

"原经厂又西曰洗白厂"。明末清初时,"洗白厂久废"。其"稍西地名刘銮塑,内有真武庙"。"原京师像设之奇古者曰刘銮塑,说者疑'銮'与'元'音相近而误。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贤祠,其像塑自刘銮。则銮别是一人,著名于正奉之先者也。正奉塑像,虞文靖特为作记。《元史·方技传》云:有刘元者,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下云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

又曰:

《增元都胜境》,在弘仁寺西,建于元。相传为刘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清,仪容肃穆、道气深沉。左殿塑三元帝君,上元执簿,侧首而问,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甚战栗。一堂之中皆若悚听严肃者,神情动止如闻謦欬,真称绝艺。《金鳌退食笔记》。

臣等谨按《元都胜境》,建于元代。因内有刘銮塑像,其地因之得名。本朝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赐名天庆宫。前殿额曰"泰钧",后殿额曰"统元",皆皇上御书赠。乾隆二十七年(1762),御制天庆宫像元刘銮塑诗:

"南雕北塑古所传,大都神塑犹存元。名手刘姓元与銮,东岳

---

[1]《元史》卷203《方技工艺附》,标点本,页4546。

[2]王士点:《元秘书监志》卷9,高荣盛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61。

传换称元贤。

兹天庆像銮坯埏，栋宇剥落像巍然。呵护丁甲其敢延，为新栋宇舟艭鲜。

像弗增易如故焉，是日路便展礼虔。高居上帝绛节翩，侍臣仪从飘乎仙。

曹司聋哑解事艰，斯非曲欲为其难。以神喻人至理存，一絜矩乃为心寒。"[1]

于敏中还记下了在他在燕京东岳庙中寻访考察刘元塑像遗迹的结果：

原朝阳门外有东岳庙，其塑像刘銮手制。墀中丰碑三通，其一为张天师神道碑，赵文敏孟頫书；其一为仁圣宫碑，虞文靖集书；其一为昭德殿碑，赵世延书《燕都游览志》。

臣等谨案。刘銮应作刘元。观后条虞集《道园学古录》及陶宗仪《辍耕录》可证其误。至銮在元前别是一人，详见皇城天庆宫所引周篔《析津日记》条下。庙内赵孟頫书《张留孙神道碑》，今存虞集书。仁圣宫碑赵世延书《昭德殿碑》，今无考。[2]

20.3.2.3　察必皇后的家庙

值得注意的是《元史》中的以下记载：大德五年（1301）春正月壬子"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3]昭睿顺圣皇后即世祖正妻察必皇后，她的遗像供奉在护国仁王寺之中。而那木罕是察必之子，其的遗像被供奉该寺之中是在二十余年之后。换而言之，寺中所供奉的是察必皇后母子的遗像。

元代置放帝后遗容之场所称影堂，又称神御殿。影堂是元皇室在宗庙以外供奉祖先遗像之所。虞集曾经提到"国家宗庙之外，别立神御殿于佛祠，会其成功率，其费十余万。"[4]《元史》记载：

[1]〔清〕于敏中、窦恺鼐等撰：《日下旧闻考》卷42，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2]〔清〕于敏中、窦恺鼐等撰：《日下旧闻考》，卷88。

[3]《元史》卷20《成宗纪》，标点本，页433。

[4]《赵曼龄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19，四部丛刊本。

神御殿，旧称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纹绮局织锦为之。影堂所在：世祖帝后大圣寿万安寺，裕宗帝后亦在焉；顺宗帝后大普庆寺，[1]仁宗帝后亦在焉；成宗帝后大天寿万宁寺；[2]武宗及二后大崇恩福元寺，[3]为东西二殿；明宗帝后大天源延圣寺；[4]英宗帝后大永福寺；也可皇后大护国仁王寺。世祖、武宗影堂，皆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仁宗影堂，藏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皇后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英宗影堂，藏皇帝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凡帝后册宝，以匣匮金锁钥藏于太庙，此其分置者。

泰定二年(1325)，亦作显宗影堂于大天源延圣寺，[5]天历元年废。

又有玉华宫孝思殿在真定，世祖所立。以忌日享祀太上皇、皇

---

〔1〕《元史》卷27《英宗纪》：至治元年(1321)二月"己酉，作仁宗神御殿于普庆寺"。——标点本，页610。该寺后来在相当长时期内亦为作太祖、太宗与拖雷的影堂。详见下。

〔2〕《元史》卷30《泰定帝纪》：泰定四年(1327)五月"乙巳，作成宗神御殿于天寿万宁寺"。——标点本，页679。

〔3〕《元史》卷32《文宗纪》：天历元年(1328)十二月"丙午，幸大崇恩福元寺谒武宗神御殿"。——标点本，页722。

同书，卷33《文宗纪》：天历二年(1329)三月"丁丑，文献昭圣皇后(笔者按，武宗妃，唐兀氏)神御殿月祭，特命如列圣故事"。——标点本，页732。

〔4〕揭傒斯为明宗神御殿碑的撰稿人，见欧阳玄：《揭公墓志铭》，《圭斋文集》卷10，四部丛刊本；黄溍《文安揭公神道碑》，《金华集》卷26，四部丛刊本；兹据《黄溍全集》，王頲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684。

〔5〕《元史》卷29《泰定帝纪》：泰定元年(1324)二月"丁巳朔，作显宗影堂"。——标点本，页643。

同书，卷30：泰定三年(1326)二月"丙申，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寿)[圣]寺。"——标点本，页668；标点本校勘记(4)记："大天源延(寿)[圣]寺据下文十月庚辰、癸酉、致和元年三月辛未诸条及本书卷75祭祀志改。类编已校。"(页688)

同书同卷：泰定三年八月乙亥"大天源延圣寺神御殿成。"——标点本，页672。

同书同卷：至和元年(1328)三月"辛未，大天源延圣寺显宗神御殿成，置总管府以司财赋。"——标点本，页685。

太后御容。〔1〕

其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在翰林者，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命承旨和礼霍孙写太祖御容。十六年(1279)二月，复命写太上皇御容，与太宗旧御容，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二十四年(1287)二月，翰林院言旧院屋敝，新院屋才六间，三朝御容宜于太常寺安奉，后仍迁新院。至大四年(1311)，翰林院移署旧尚书省，有旨月祭。中书平章完泽等言："祭祀非小事，太庙岁一祭，执事诸臣受戒誓三日乃行事，今此轻易非宜。旧置翰林院御容，春秋二祭，不必增益。"制若曰"可"。至治三年(1323)迁置普庆寺，祀礼废。〔2〕泰定二年(1325)八月，中书省臣言当祭如故，乃命承旨斡赤赍香酒至大都，同省臣祭于寺。四年(1327)，造影堂于石佛寺，未及迁。至顺元年(1330)七月，即普庆寺祭如故事。二年(1331)，复祀于翰林国史院。重改至元之六年(1340)，翰林院言三朝御容祭所甚隘，兼岁久屋漏，于石佛寺新影堂奉安为宜。〔3〕中书省臣奏，此世祖定制，当仍其旧，制可。〔4〕

---

〔1〕《元史》卷32《文宗纪》：致和元年(1328)九月戊寅"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笔者按，拖雷妃唆鲁禾帖尼)神御殿作佛事。"——标点本，页710。唆鲁禾帖尼为克烈部人，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由此可见，直至元中期，元廷仍然以聂思脱里教仪式祭祀她。

〔2〕《元史》卷29《泰定帝纪》：泰定元年(1324)八月"辛亥，遣翰林学士承旨斡赤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普庆寺。"——标点本，页650。标点本校勘记(14)记："辛亥按是月甲寅朔，无辛亥日。此'辛亥'在庚申初七日、庚午十七日间，疑为辛酉初八日或癸亥初十日之误。"(见664)

同书卷30《泰定帝纪》：泰定三年(1326)二月"甲申，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翰林国史院"。——标点本，页668。

同书卷30《泰定帝纪》：泰定四年(1327)二月"甲戌，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大承华普庆寺，以翰林院官执事。……丙子，命亦烈赤领仁宗神御殿事，大司徒亦怜真乞剌思为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达鲁花赤，仍大司徒。"——标点本，页677。

同书卷33《文宗纪》：天历二年(1329)二月"丙申，命中书省、翰林国史院官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普庆寺。"——标点本，页730。

同书卷34《文宗纪》：至顺元年(1330)七月"丁巳，命中书省、翰林国史院官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于大普庆寺。"——标点本，页760。

〔3〕《元史》卷40《顺帝纪》：后至元六年(1340)春正月丁卯"甲戌，立司禋监，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于石佛寺。"——标点本，页853-854。

〔4〕《元史》卷75《祭祀志》，标点本，页1875-1877。

按上述资料，元代官方所设影堂为：

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与睿宗拖雷初无独立影堂。成吉思汗遗像初绘于至元十五年(1277)十一月。拖雷与元太宗窝阔台遗像则绘于次年二月，相距不过三个月。三人遗像均置于翰林国史院，以为影堂。至治三年(1323)三人遗像迁置普庆寺。因此普庆寺，也即真金子答剌麻八剌影堂长期作为太祖、太宗与拖雷的影堂。泰定四年(1327)，开始建造影堂太祖影堂于石佛寺，后至元之六年(1340)，翰林院议迁太祖、太宗、拖雷三朝影堂于石佛寺，因中书省反而作罢。

但《英宗纪》至治二年(1322)十月有"甲申，建太祖神御殿于兴教寺"[1]的记载；《泰定帝纪》泰定元年(1324)九月有"丙申，葺太祖神御殿"[2]的文字；《文宗纪》至顺三年(1332)二月有"己巳，命燕铁木儿集翰林、集贤、太禧宗禋院，议立太祖神御殿"[3]的记录。故而颇疑《祭祀志》所记有误。

无元定宗贵由影堂。

无宪宗蒙哥影堂。但《元史·王守诚传》："宜宾县尹杨济亨欲于蟠龙山建宪宗神御殿，儒学提举谢晋贤请复文翁石室为书院，皆采以上闻成之。"[4]按此，似乎后来建了宪宗影堂。此事待考。

拖雷遗像除与成吉思汗、窝阔台先后合置于翰林国史院与大普庆寺之外，还有单独的影堂，位于真定玉华宫孝思殿，供奉拖雷夫妇御容。

世祖影堂：大圣寿万安寺，供奉世祖帝后遗像、未即位而逝的真金太子夫妇遗像。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

成宗影堂：大天寿万宁寺，供奉成宗帝后遗像。

武宗影堂：大崇恩福元寺，供奉武宗帝后遗像。皆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

顺宗影堂：大普庆寺，供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夫妇遗像、仁宗帝

---

〔1〕《元史》卷28《英宗纪》，标点本，页624。

〔2〕《元史》卷29《泰定帝纪》，标点本，页650。

〔3〕《元史》卷36《文宗纪》，标点本，页801。

〔4〕卷183，标点本，页4210。

后遗像。藏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皇后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1]

英宗影堂:大永福寺,供奉英宗帝后遗像。英宗影堂,藏皇帝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

明宗影堂:大天源延圣寺,供奉明宗帝后遗像。

在世祖以后诸帝中,无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天顺帝阿剌吉八与元文宗图帖木儿三位帝的影堂。[2]

世祖大皇后影堂,大护国仁王寺,供奉也可皇后,即世祖正后察必遗像。元代所有皇后中,仅世祖察必皇后拥有独立的影堂。察必皇后的遗像供奉在两处,除了与世祖遗像一起供奉在世祖影堂大圣寿万安寺中之外,还供奉在大护国仁王寺中。而那木罕的遗像同其母亲的遗像一起在该寺供奉。

显宗影堂,大天源延圣寺,泰定二年(1325)置,供奉真金之子、泰定帝之父甘麻剌,天历元年(1328)废。

元《经世大典》中原有《工典》一章。这一部分在明初编《永乐大典》时被抄入。清代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得以存留至今,其中有《大元画塑记》。该记中有御容一节,提到:

> 大德十一年(130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敕丞相脱脱、平章秃坚帖木儿等,成宗皇帝、贞慈静懿皇后御景,依大天寿万宁寺御容织之。南木罕太子及妃、晋王及妃,依帐殿内所画小影织之。[3]

大天寿万宁寺,即安放成宗帝后御容的影堂。而南木罕即那木罕。他与晋王死后,均绘有遗像,被置于帐殿之内。至成宗去世后,武宗命依画像织遗像。

---

[1]史文中称之为顺宗影堂,而称仁宗遗像置于其中,其后文又称之仁宗影堂。

[2]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敕建大承天护圣寺,见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道园学古录》卷25,四部丛刊本。《元史》卷35《文宗纪》有:至顺二年(1331)三月"甲申,绘皇太子真容奉安庆寿寺之东鹿顶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仪"——标点本,页778。此些影堂后来如何,待考。

[3]参见《元代画塑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页1;与《寺塔记》《益州名画录》合刊。应当指出的是,此圣旨虽然署明时间为大德十一年十一月,但并非出自元成宗皇帝本人,而是代之继立的元武宗海山。元成宗逝于大德十一年春。武宗即位后的第一年,仍然沿用成宗大德年号。

20.3.2.4 与护国仁王寺有关的人物

元代帝后周围活动着一批信奉藏传密宗的僧人，与元皇室有密切的关系。以至连一些汉人也会西番语。至元十九年(1282)春三月十七日，义士高和尚、王著等人利用世祖巡幸上都的机会，借口真金太子有令，计划刺杀权臣阿合马。王著令人扮作西番僧人，通知真金太子当晚将还宫做佛事。当值者未闻真金太子有此行，“以西番语问僧曰：‘主人与国师今至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对。即改用汉语诘之，僧色变辞穷。曰：‘是诈也’。叱卫士执付功德司讯之。”[1]王著等人的计谋竟因为几句西番语而败露，足见由于藏传佛教的势力而造成藏语在大都社会上层的流行。

那么护国仁王寺究竟是汉传佛教寺院还是喇嘛教寺院？前面谈到，释志盘提到，至元“七年，诏请胆巴金刚上师住持仁王寺。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敕更定僧服色。”[2]《元史》中胆巴有传，云“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八思巴荐之。”[3]所谓“突甘斯”即朵甘思。赵孟頫曾撰有胆巴碑。[4]有关胆巴较详细的资料见于《佛祖通载》，其中列出了胆巴历年的活动：

> 壬申(1242，乃马真后元年)，入汉地，留京师。
>
> 乙亥(1275，至元十二年)，建神庙于涿之阳。
>
> 壬午(1282，至元十九年)，力乞西归，上不能留。初相哥受师戒，继为帝师，门人屡有言其豪横自肆者，师责而不悛，由是御之。逮登相位，惧师谠直，必言于上。乃先人巧言赞师。故有是请。首于云中，次至西夏，以及临洮求法益众。

---

[1]《道园学古录》，卷17《高鲁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2]《佛祖统纪》，卷48，明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本。并见释心泰：《佛法金汤编》卷16，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本。

[3]《元史》卷202《释老传》，标点本，页4519。

[4]“胆巴碑赵子(昴)[昂]延祐二年(1315)奉命书胆巴帝师碑。胆巴华言秘密。”，见《吴山咏古诗二首·麻曷葛剌佛并序》，〔清〕厉鹗撰：《樊榭山房集》卷5，四部丛刊。此碑如能找到，当会提供有关此护国仁王寺更多的情况。

己丑(1289,至元二十六年),相哥遣使传召还都,于圣安寺安置。四月赴省听旨令往潮州。师忻然引侍僧昔监藏孑身乘驿,即日南向。未几召还,相哥已伏诛矣。

癸巳(1290,至元三十年)夏,于内殿建观音狮子吼道场。

甲午(1294)四月成宗皇帝践祚,遣使召师。

元贞乙未(1295,元贞元年)四月,奉诏住大护国仁王寺,敕太府具驾,前仪仗,百官护送。寺乃昭睿顺圣皇后所建,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是年遣使诏师问曰:"海都军马犯西番界。师于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祷摩诃葛剌,自然有验。"复问曰:"于何处建坛?"对曰:"高粱河西北瓮山有寺,僻静可习禅。"……于是建曼拏罗,依法作观。未几,捷报至,上大悦。[1]

由此可见,胆巴入高良河寺在成宗即位之后,而非至元七年。

胆巴权势极大,连信奉汉地佛教的南人也奉迎有加。黄溍撰有《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提到浙江会稽人澄湛堂"至元丙子(至元十三年,1276)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门殊律师。明年祝发,又明年受具戒,持法华诸经为日课。""乙酉(至元二十二年,1285)始依佛鉴铦法师为天台之学,闻鼎山举法师讲席之盛,更往依焉。"因"天台国清寺,实智者大师行道之所,或据而有之,且易教为禅",于是向宣政院求助,他"师不远数千里走京师,具建置之颠末,白于宣政院,才复恢旧教。"当他了解到藏传密宗流行于大都时,便以"以秘密教不传于东土,因禀戒法于胆巴上师。既入其室而受觉海圆明之号。又从哈尊上师传修习法门,而究其宗旨。"[2]

胆巴权势的故事,直至元末仍在世间传播。陶宗仪记载:"大德间僧胆巴者,一时朝贵咸敬之。德寿太子病瘢薨,不鲁罕皇后遣人问曰:'我夫妇崇信佛法,以师事汝。止有一子,宁不能延其寿邪?'答曰:'佛法譬犹灯笼,风雨至乃可蔽,若烛尽则无如之何矣。'此语即吾儒死生有

[1]《佛祖通载》卷22,元至正七年(1347)释念常募刻本,北图藏本。

[2]《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金华集》卷41,四部丛刊;兹据《黄溍全集》,王頲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609-610。

命之意，异端中得此，亦可谓有口才者矣。”[1]

文献中提到与护国仁王寺有关的人还有畏兀儿僧人间间[2]、储普华[3]以及南人陈萍。他是南宋末丞相陈宜中族弟，被世祖养育成长，因通佛教而被赐名为亦辇真加剌思，为真金太子随从，曾以吐蕃宣慰使统兵出征多含思（朵甘思）、桑思加（萨伽）与康撒儿之地。武宗时“以功拜大司徒、进阶银青荣禄大夫，以宣政使兼会福院使，延庆司使、土蕃宣慰使如故”。[4]前面已经指出，会福院乃负责护国仁王寺内部运作的机构。足见与此寺有关之人，即便非密宗曾人，也是与吐蕃有关的人士。

20.3.2.5　佛诞日活动

《元史·祭祀志》中记载了元皇家御影堂的各种祭祀活动。除此以外，在护国仁王寺组办的法事活动中，以春季迎佛仪式最为盛大。虞集提到：

> 国家岁以二月八日，迎佛于城西高良河。京府尽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马器服，俳优獿杂子女，百戏眩鬻以为乐。禁卒外卫、中宫贵人，大家设幕以观、庐帐蔽野。诸王、近侍、贵臣，宝饰异服。驰骏盛气，以相先后。国家一日之费巨万，而民间之费称之。僧格者，本大浮图师之译者，得见幸遇，故其事尤侈。织染提举储普华者，高良寺中之人也。并缘为贪虐尤甚。[5]

二月初八为佛诞日，辽代就有庆祝活动。《辽史》记载“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6]

---

〔1〕《辍耕录》，卷5，“僧有口才”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0年，页564；上述这段话为杨瑀所摘抄，见《山居新语》，卷1，余大钧点校本，中华书局与《玉堂嘉话》合刊本，2006年，页207。

〔2〕杨瑀：“畏吾儿僧间间，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汉名总统，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悉以铜为弦。余每叩，乐工皆不能用也”。——《山居新语》，卷3，页221。

〔3〕虞集：“普华者，高良寺中之人”，见《追封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有关此人，详见后文。

〔4〕黄溍：《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陈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7，续稿24；兹据《黄溍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699。

〔5〕虞集：《追封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6〕《辽史》卷53《礼志》，中华书局标点本，页878。

入元以后，因为吐蕃密宗在大都的势力极大，迎佛活动声势更为浩大，并得到皇室的支持。程钜夫记载，“中统壬戌（二年，1262）春”，世祖下诏，令“都城二月八日大建佛事，临通衢结五采流苏，楼观集教坊百伎，以法驾迎导。”[1]《元史·释老传》也记载：“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2]中统初年的迎佛活动在大都全城举行，但在护国仁王寺建成后，每年春季的迎佛活动便改在该寺所在的高良河边举行。

由于迎佛系由国家出面组织，带有官方的性质，因此参与者有“中宫贵人”，诸王、近侍、贵臣，还有京府富人。这样佛诞日具有了官方节日的性质，教坊百伎皆登场演出，人们都着节日盛装。显贵们还搭起帐幕，作为观礼休息之地，一时高良河畔显得庐帐蔽野。不但国家花费巨资，私人的消费数额也极为惊人。其中以桑哥与储普华最铺张。

据《元史·奸臣传》记载，桑哥是“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及后贵幸，乃讳言师事胆巴而背之。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3]而储普华，虽然任织染提举司提举，但在宗教上是高良河寺中人。前面已经提到，他与桑哥结为一党，利用举办迎佛日的活动，大役民力，重敛民财。这样侈费财力，引起了有识官僚的极力反对。这件事的经过有3个大致相同的说法，其一为虞集的描述：

> 公以御史执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诘之曰：“汝不欲为天子求福邪？祸且不测！”公徐曰：“储普华欺上虐下，为天子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罢。尔后颇知国用之耗，或间岁一省，或略应故事，不复如昔之盛。[4]

第二个是傅若金的说法：

---

〔1〕《拂林忠献王神道碑》，《程雪楼集》卷5，洪武本。

〔2〕《元史》卷202《释老传》，标点本，页4521。

〔3〕《元史》卷205《奸臣传》，标点本，页4570。

〔4〕虞集：《追封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42。

京师岁以二月八日，大张百戏，列伎乐迎佛城西高良河，费以巨亿计。织染提举储普华，倚相权并缘为奇。衰公立按之，用事者挟声势求解，不听，走白相。召公至省，诘曰："国家事佛求福利，若弗欲，敢坏挠耶。"怒不可测。公从容对以侵扰之实，且曰求福所以安上利民耳。今奸人乘大役，重裒敛以病天子民，使愁怨塞道，且乖其和，坏福利，孰大？于是相熟视，公辞不少屈，卒从其理。〔1〕

第三种是马祖常的记载：

岁二月八日，京师迎佛解祠于城西，流外诸司集与其役。织染局使储普华倚时相受赇。公纠以法。时相怒，召公政事堂，诘曰："国家岁祠佛以侥善利，若独沮不虔邪？"公具事质，从容论其罪。时相为叹息，许之俾治如律。〔2〕

上述3种描述有共同的史源，均出自御史赵思恭家的自述。综合这3种说法，可大致了解事情的经过，3位关键人物是赵思恭、储普华与时相。这位时相，只有虞集径呼其名，即桑哥。而傅若金与马祖常，皆称为相，或时相。3则史料均是说，负责经办二月初八佛诞日活动的储普华依仗桑哥的势力，无节制地花费，受到御史赵思恭的查办。《元典章》提到："大德十二年(1308)二月初八日，钦奉圣旨，中书省官人每奏：国家应办支持浩大，所用之物必须百姓每根底和雇和买应办。"〔3〕但桑哥却要求御史台放人，赵思恭不允。桑哥召赵思恭至尚书省理论，以佛诞日活动是为皇家祈福为辞，以此威胁赵公。赵公则以做佛事滥加征敛，引发民怨据理力争。桑哥辞穷。后来他也发现了花费太大，采取了一些节支的做法。

储普华与迎佛日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颇值得推敲。储普华在织染局为官，从职务上来说，与佛诞日的活动本无关系。但可能他本人是护国

〔1〕傅若金：《追封天水郡伯赵公行状》，《傅与砺文集》，卷10，明洪武十七年(1384)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第92册，叶730。

〔2〕《金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赵公神道碑》，《马石田文集》，卷12，至元五年(1268)扬州路儒学刻本，北图藏本。

〔3〕《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圣政卷之二，典章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页64。

仁王寺中的人，而该寺又是这项活动的举办方，所以他才积极与事。

但实际上官僚们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效果。佛诞日的活动仍在进行。《元史》中有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己巳有英宗下旨“敕罢明年二月八日迎佛”的记载，[1]足见直至此年之前，二月初八日迎佛诞的活动仍年年举办。

20.3.2.6　不择手段聚敛寺产

前面提到，护国仁王寺作为察必皇后的家庙，其规运之费最初是察必皇后捐出的妆资。至大元年，因原设总管府与提举司日久政懈，收入下降，遂进行改革，“罢总管府，建会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院使按巴哈玛尔布哈为会福院使，综核名实，遣官分道，约部使者集郡县吏，申画疆场，树识封畛，历四载始仍旧贯。”会福院设立后的第一要务，便是查核寺产。护国仁王寺的寺财遍布全国，会福院派员到各地，会同当地大小官员当面确定寺产疆界，并立疆界，此事历时长达四年。于是护国仁王寺的岁入有了成倍的提高。

据程钜夫记载，至大年间，护国仁王寺的不动产有：

(1)大都等处：

水地：28663顷51亩多。

旱地：34414顷23亩多。

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苇、鱼、竹等场29处。

矿场：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之地15处。

栗树：19061株。

酒馆：1处。

(2)大都以外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者：

水地：13651顷。

旱地：29805顷68亩多。

江淮间酒馆：140处。

湖泊津渡：61处。

税务闸坝：各一处。

[1]《元史》卷27《英宗纪》，标点本，页609。

(3)附属内外人户：总数为37059。

实赋役。17988。

(4)房产：

殿宇：175间。

棂星门：10处。

房舍：2065间。

(5)畜具：

牛具：628件。

江淮牛之隶官者：133。

这样规模巨大的皇庄清理资产当然是一件不易的事。完成之后，按巴哈玛尔布哈受到武宗的褒奖，被封为秦国公。[1]

看了上面统计的人，都会为护国仁王寺产的巨大规模而吃惊。仅它在大都内外所拥有的水旱田地，即达10万顷以上，相当于1万平方公里，几乎达到当代江南10个县域的面积，按今天的生产力，以可养活上千万人口。人们不禁会问，单靠察必皇后捐出的妆资，护国仁王寺怎么能在短期内聚积起这样大数量的财富？

高良河寺是察必皇后的家庙，其威势可谓遍天下。时人即使有所不满，也不敢见诸文字。但毕竟还是有材料提到该寺的种种不法行为。黄溍提到高邮"会福院所设营田提举司，厉民最甚，用公言罢去，而责成于有司，民力以纾"。[2]在程钜夫撰《护国仁王寺恒产碑》所列举的寺产中，有属江淮等处提举司所领者。黄溍所提到设在高邮营田提举司，即应为会福院在当地管理机构。大德年间由于高邮判官李拱辰的极力反对，该营田提举司被撤去。可能正是因为各地官民的反对和营田提举司被裁撤，造成护国仁王寺的收入减少。程钜夫所提到护国仁王寺至大年中撤总管府设会福院的整顿行动，应当置于这样的背景中理解。

〔1〕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9，洪武刊本。

〔2〕黄溍：《奉议大夫御史台都事李公墓志铭》，《黄金华集》，卷31，续稿28；兹据《黄溍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447。

而马祖常所撰《霸州长和实拉赛音遗爱碑》,更明确指出一则会福院霸占田土的典型事例,他写道:

霸州达噜噶齐于阗和实拉赛音去官之明年,州人列其事状,将勒诸石。太史氏按事状而为论同,次之曰:始州有恶子房黑厮,籍属县,益津诸田五百顷上于会福院者。会福以祷祠为官,不急民事。即遣属人按图制民田,前官悉不敢向问。而君乃告于太府,请于礼部,竟归其田于民。[1]

《遗爱碑》所提到的霸州的恶民房黑厮,竟然将当地民田五百项,奉送给会福院。会福院将其纳入地籍,地方官不敢过问。这里所提到的情况,或为上述程钜夫所记"効地献利者,随方而至"中的一桩,或为会福院在至大年间赴全国各地,会同大小官员勘划寺产诸事中的一次。由此可以推测,护国仁王寺这样庞大的寺产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种种不法手段巧取豪夺而来的民产。像和实拉赛因这样据理上告,得归旧主的毕竟是少数。

《元典章》中录有一则记载元政府动国家力量维护护国仁王寺的寺产收入的文件:

(僧道租税体例)元贞元年(1295)闰四月□日,钦奉圣旨,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行中书省、行御史台、司农司、宣慰司、管民官、应管公事大小官吏、诸色人等:据中书省、宣政院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等,地粮商税、所办钱物,若不再行明谕,恐在下官府合征纳者,妄作免除;不应征纳者,却行追收,致使僧道人等生受。乞降圣旨事。"准奏。所有条昼开列于后。

其中第四项条画为:

上都、大都、杨州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与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出办钱物,令有司通行,管办赴官送纳。寺

[1]马祖常:《霸州长和实拉赛音遗爱碑》,载于《马石田集》,元至元五年(1268)扬州路儒学刻本,北图藏本。

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无得以前另设人员侵损官课。[1]

因此《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中"皇元以仁得天下,其爱卫社稷,福绥生民之道甚备"[2]之类粉饰太平的话,是不可信的。研究元代历史,不仅要关注那木罕、察必这些皇亲贵族,也要看到他们所统治下的兆民。

(本文所引《元史》中所附之《廿二史札记》《元史本证》《蒙兀儿史记》等注文,均系参加《元史今注》项目研究生补入。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1辑,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院中心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40。)

[1]《大元国朝圣政典章》,户部卷之十,典章2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中册,页1040。

[2]程钜夫:《程雪楼集》卷9,洪武刊本。